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维普)全文收录
中国国际中文期刊卓越行动计划 建设期刊
国际中文学术期刊数据库ICAJD 收录期刊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香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ISVORA

ISSN 3079-4552



ISSN 3079-4552

eISSN 3079-4560

1 卷 3 期

2025年4月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主办 香港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
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编辑出版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编辑部
编辑部邮箱 xk@wisvora.com
投稿地址 www.wisvora.com



中国国际中文期刊卓越行动计划 建设期刊
国际中文学术期刊数据库ICAJD 收录期刊

总编辑 陈科存
副总编辑 梅见华 孙文杰

编辑委员会

李兆祺	林鑫	苏天	穆艾伟
熊森浩	刘伟伟	吕憬岩	黄少安
刘宇	叶明裕	陈曦	景瑞宾
崔健	王正威	李泽宇	姚金芳
李明蔚	吴钰双	穆尚海	

青年编委

舒波 田蕾娅

版权声明

文章版权由文章作者与维思沃尔出版社(WISVORA Publishing)所有。单篇文章由 WISVORA Publishing 正式出版, 所刊载文章均依照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进行许可。根据该许可协议, 任何第三方在明确署名原作者与出处的前提下, 均可对本刊内容进行复制、传播、演绎使用, 无需作者及出版社另行个别授权。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已获得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许可



香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专注于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与交流, 旨在为学者提供研究支持, 并促进知识的共享与应用。研究院通过出版学术期刊、举办学术会议及提供政策建议, 推动学术界与社会各界的对话与合作。

网址: www.hks.ac.cn 邮箱: info@hks.ac.cn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印刷出版 ISSN 3079-4579

电子出版 ISSN 3078-4387

出版社 WISVORA Publishing
维思沃尔出版社

地址 香港新蒲岗景福街99号启德工
业大厦8楼D07

wisvora-publishing@wisvora.com
www.wisvora.com

中国大陆引进
北京中科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广东国图出版管理有限公司



WISVORA
Publishing



微信扫一扫

维思沃尔出版

- 以体育社团为德育载体建设和谐校园-以大学生三大球联盟协会为例 - 乔伟, 丁民洋 1-6
- 产教融合视域下高校产业兼职教师的时间冲突与激励新路径 - 陈羽豪, 卢海东 7-9
- 抢险救援指挥课程思政的探索实践 - 冷强, 于晟伟, 何永明 8-11
- 明清宣恩乡绅与社会治理 - 陈娇 10-16
- 凝视与反凝视——从《瀑布》看新时代的女性电影 - 荆婧 17-20
- 课程思政背景下高等数学教学模式的建设探索 - 何永明; 于晟伟, 付亚坤, 赵赫 21-26
- 高等数学教学中一致连续性的育人作用和判定定理 - 于晟伟, 赵赫, 何永明, 王洪庆, 宋云涛 27-31
- 浅论信息化侦查中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 - 汤圳 32-39
- 教育智能广告的算法殖民与价值重构: 技术赋能下的教学异化及伦理治理研究 - 张晓曼, 林可一, 郭文君, 吴治霖 40-48
- AIGC 视角下澳门文创产品数字化升级路径研究 - 蔡镭聪, 李甲辉 49-56
- 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路径分析 - 赵静文 57-60
- 叶盛清明集句组诗的游戏化及其诗歌阅读史 - 李旭辉 61-66
- 关于物业服务企业消防监督管理若干问题研究 - 苏丹, 王宁, 于晟伟, 何永明 67-70
- 基于 OBE 教育理念的高等教育教学数字化改革路径研究 - 吴滢 71-76
- 新租赁准则对商超零售业财务报表影响分析--以步步高公司为例 - 吴雪佳 77-86
- 项目驱动教学法在网络与新媒体专业 UI 设计课程中的应用与改革 - 曹楚怡, 龙海鸣 87-90
- 诗礼文化下沉与元杂剧流行的研究 - 曹烜毓, 梁洁 91-97
- 从符号到具身: 新媒体技术在体育新闻传播中的创新、困境及影响——以杭州亚运会为例 - 刘昊铭, 张靖 98-102
- 自然教育导向下的互动式手册设计研究—以深圳莲花山公园"菲羽集章"项目为例 - 冯志超 103-114
- “工业遗产向艺术空间”: ANT 理论视角下的城市转型研究——以奥地利林茨电子艺术节为例 - 黄盛威 115-122
- 非遗焕新, 助力民族文化——以田阳布洛陀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为例 - 覃家祝, 肖亭, 李钊, 苏盛滢, 梁芝 123-126
- 单元整体视角下小学语文教学设计框架与实践研究——以统编教材三上第五单元为例 - 余一夫, 赵曼, 彭凤 127-133
- 规范与美德之间: 公德与私德中的“德”及其现代伦理重构 - 魏士雅 134-140

- 译者行动论视域下的科技翻译教学策略研究 - 祁心 141-144
- 现代社会演变的思想基础——从“存在的类比统一性”的观点看 - 林峰 145-157
- 《雄狮少年》的双层叙事与温暖现实主义表达 - 杨静 158-162
- 职业院校学生分层视角下诚信教育体系构建研究——基于思政课教师的实践路径 - 吴佩瑶, 王琦 163-166
- “数字贝依”壮语资源保护与数字化建设——壮语语料库构建研究 - 覃家祝, 苏盛滢, 张双 167-171
- 从传统生态文明到现代绿色发展: 中国农村生态文明的转型叙事 - 傅丽君 172-177
- 教育家精神引领下中学思政教师论道力行素养的提升 - 胡嘉俊 178-181
- 多元纠纷化解视域下网格员的角色定位及实现路径 - 张国润 182-189
- 明初江南重农抑商政策再解析-基于江南巨富沈万三为视域的研究 - 王琼平 190-193
- 数据中介机构规范化的治理路径 - 张亚楠 194-197
- 先秦两汉“孔子问礼于老子”文献用例 - 时尚 198-202
- 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的实践模式与理论阐释——以重庆市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探索为例 - 王思源 203-208
- “数据”到“画布”: 人工智能何以推动乡村艺术再生与文化传承 - 徐鹏 209-212
- 年画艺术的审美方向与趋势 - 孟祥泽, 赵千慧 213-219
- 红色教育基地对青少年文化认同影响研究——以焦裕禄同志纪念馆为例 - 芦昊翔 224-229
-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在文化创意产业中的应用与发展趋势研究 - 张彦清 230-236
- 论《韩非子》对《左传》战争素材的改造策略及其思想史意义 - 李显坤, 钱嘉怡 237-242
- 他者性视域下虚假机智的内涵、表征及优化 - 杨玲 243-246
- “杯葛”的源起及其在当代台湾地区文化中的嬗变 - 张义明 247-251
- 治疗性合唱对慢病儿童社会融入的影响: 一项预实验研究 - 张灵慧, 杨宁, 刘泳志, 王婷, 肖璐, 傅丽丽 252-257
- 基于自然辩证法视角浅谈足球运动的技术动作发展 - 梅润, 杨林, 杨昱堃 258-261
- 乡村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 现状、挑战与策略 - 赵赞, 曾丽妃 262-265
- AI时代小语种专业象征资本的重构 - 黄振鑫 266-270
- 浅析成语教学中的跨文化误解现象及其对国际中文教学的启示 - 高月 271-276
- 德布雷媒介学思想的逻辑架构与学术脉络 - 许子炎 277-281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3.674

以体育社团为德育载体建设和谐校园-以大学生三大球联盟协会为例

乔伟¹ 丁民洋¹

(¹ 安庆师范大学, 安徽 安庆 246011)

摘要: 学生体育社团是高校内学生自发性的群众体育组织, 本研究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等方法; 在此基础上, 结合我校大学生三大球联盟协会的实际情况, 对如何在普通高校学生体育社团中加强思想道德教育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建设和谐校园存在的问题以及建议进行研究。发现和谐校园建设德育目标过于抽象, 德育内容缺乏针对性; 校园文化建设不足体育场馆配套设施不完善。根据建设和谐校园存在的问题应该采取德育文化活动, 深化道德教育观念; 营造和谐校园气氛等对策。

关键词: 体育社团; 德育; 和谐校园

1. 绪论

近年来, 我国普通高校学生体质持续下滑, 心肺功能下降尤为显著, "脆皮大学生"现象引发社会关注。针对这一现状, 国家相继出台《加强学校体育工作若干意见》、《普通高等学校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17)等重要文件, 明确指出体育活动对提升学生身体素质、思想品德及综合素养的关键作用, 要求深化学校体育改革, 促进教育现代化发展。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 体育社团的作用和地位在高校中日益凸显。高校管理部门职能水平, 遵循大学生身心发展规律, 将思想品德教育融入大学生运动实践中, 营造良好的校园体育文化氛围, 培养终身运动理念, 使体育成为大学生价值观塑造的重要载体[1]。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以安庆师范大学大学生三大球联盟协会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采用中国知网及通过图书馆借阅书籍等途径寻找与本研究相关的文献资料。为探讨大学体育社团进行道德教育下建设和谐校园提供理论基础和研究视角的第一手资料。

2.2.2 问卷调查法

在文献资料的基础上, 按照体验式教育调查问卷的方式, 初步制定了一份大学生基本信息调查问卷和德育调查问卷。本次调查采取了电子调查表和书面调查表两种方式, 认真的梳理与分类后, 共调查 585 名学生, 共发放问卷 585 份, 回收有效问卷 555 份, 有效问卷回收达 95%。

2.2.3 数理统计法

通过仔细整理和审查问卷, 并分析获得的相关数据, 收集到的信息可以根据研究的目的进行有效整合, 更直观的理解内容。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统计

为便于比较研究被调查人员参与三大球活动前后思想品德教育情况的改变, 根据调查样本的性别, 所选择的体育活动等基础资料, 具体情况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表

人口学变量	分项	人数		百分比	
		体育专业	非体育专业	体育专业	非体育专业
性别	男	90	180	55	43
	女	75	240	45	57
项目	足球	55	140	33.3	33.3
	篮球	55	140	33.3	33.3
	排球	55	140	33.3	33.3
	总计	165	420	100	100

从表格中可以看出: 90 名体育专业的男生和 75 名女生, 有 55 名运动员参加了足球比赛, 55 名运动员参加了篮球比赛, 55 名运动员参加了排球比赛, 共计 165 名运动员。全校共有 180 名男生和 240 名女生参加了非体育专业。有 140 名运动员参加了足球比赛, 140 名运动员参加了篮球比赛, 140 名运动员参加了排球比赛, 共计 420 名运动员。从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 选择参与体育社团的人数较多。

3.2 三大球联盟协会对大学生德育教育的影响

大量的研究显示, 参加体育锻炼能使个人的个性品质得到提高[2], 并且在不同的体育活动中, 其作用的大小是不一样的。通过在加入三大球联盟协会之前和之后, 对被调查对象的个性特点和道德修养进行了成对样本 t 检验, 尝试着对三大球联盟协会在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方面的作用进行分析。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三大球联盟协会参与前后测数据表

维度	M±SD		T	P
	前测	后测		
神经质	24.12	23.79	1.21	0.22
严谨性	33.25	33.14	0.70	0.47
宜人性	32.12	33.93	-3.10	0.002
开放性	32.55	32.12	1.10	0.28
外倾性	31.14	32.23	-1.98	0.05

由表 2 可知, 加入三大球联盟协会后, 三大球联盟协会对大学生的愉悦性各维度有明显的影响 ($P < 0.01$); 表明经过三大球联盟协会的学习与经历, 他们的性格更加热情, 乐于助人, 慷慨大方, 并且更加独立自主, 在社会交往中能够听取别人的意见。外倾各构面有显著性差异 ($P < 0.05$)。表明他们性格更外向, 不但能很好地处理好同学间的关系, 还能通过和社团成员的沟通提高自己的情商, 从而更好地应对利益冲突; 她们在赛场上并不因生人勿近, 直率的个性让她们深受师长或异性的喜欢。各因子在神经质、开放性、严格分上的差异无显著性 ($P > 0.05$)。分析结果表明, 由于长期参加体育活动, 心理状态较为稳定[3], 且神经质已处于较高水平; 因此, 在学习和训练之后, 精神质并没有太大的变化。由此可见, 体育在推动学校道德建设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大量的研究表明, 参与运动能改善个体素质, 而不同的运动对个体的人格特质有不同的作用[4]。通过对三大球联盟协会的发展情况的考察, 得出结论: 三大球联盟的学生参加社团活动, 其社团活动更为专业、系统, 其培训的次数与强度均高于非体育专业学生。通过对三大球联盟协会的分析认为, 三大球运动对大学生思想道德品质的作用有一定的积极影响[5]。在此基础上,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方法, 得出了大学生在

神经质、严格性、宜人性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说明了我国普通高校专业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也具有一定的统计学意义,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通过对参加三大球联盟协会的普通专业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水平匹配样本 t 检验,来对三大球联盟协会对普通专业大学生道德品质的总体影响进行分析。具体的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五项道德品质在运动俱乐部中的各个方面的变化情况 (N=165)

维度	前测	后测	T	P
神经质	24.32	23.79	1.210	0.227
严谨性	33.25	33.14	0.709	0.479
宜人性	32.12	33.93	-3.102	0.002
开放性	32.55	32.12	1.108	0.283
外倾性	31.14	32.23	-1.988	0.050

根据表 3 得知,普通专业大学生的“愉悦性”各维度有显著性差异 ($P<0.01$);加入三大球联盟之后,这些同学都比较热心,乐于助人,慷慨大方,而且在社会交往中也能听取别人的建议。根据调查得知,参加大学生三大球联盟协会的有些同学说,“我选排球,就是因为它不像足球和篮球那么激烈,也不需要太多的日照,另外,我也很欣赏社团会长,觉得她很温柔,性格很好。每次开展社团活动,她都不厌其烦的给我们讲解技巧动作。经过一学期的集训,我觉得自己的性格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喜欢这里的气氛。社团会长也会带领我们去学校举行的排球赛,希望我们队能在本届运动会上大放异彩。”由此可见,排球项目是一项合作交流性很强的项目,无论是在比赛中,还是在训练中,都要与其他队员、同学之间进行协作。在交流、协作中,同学们的感情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他们也逐步地融入到了新的学习环境中,并且在比赛、训练中建立了对彼此的信心。他们更愿意相信他人,在游戏或培训中服从指示,听取别人的忠告,并且虚心听取他人的意见。研究发现:普通专业大学生的外倾性各构面均有显著性差异 ($P<0.05$);这表明,参加三大球联盟社团的体育类大学生更加外向,不仅能够处理好与同学之间的关系,还能通过与教师的沟通提高情商。他们知道如何恰当地处理利益关系,在比赛场上不会退缩,直率的个性使他们备受教师和异性的欢迎。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在神经质、开放性和严谨性方面,体育专业的大学生的神经质得分没有显著差异 ($P>0.05$)。通过调查沟通交流一些学生后了解到,无对抗,技术,技能展示为主的活动是大学生三大球联盟协会学生所喜爱的。

3.3 高校体育社团中德育教育作用

3.3.1 体育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健康身心

健康的身心是指学生在身体和心理等各个方面都保持良好状态,拥有良好的心情和身体状况[6]。毫无疑问,体育运动是促进大学生身体素质发展的重要途径[7]。在大学里,体育社团通常按专业划分,学生们来自不同地区、不同专业和性格各异。如果能够在体育社团中进行小组合作,学生们可以相互沟通和配合,从而在不知不觉中培养竞争精神。这有助于学生正确认识客观世界,主动调整情感。此外,体育竞赛还可以激发学生的战斗精神,提高他们应对困难和挫折的能力。在体育活动中,学生能够体验到成功和失败带来的不同感受,从而提升心理素质,培养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并掌握应对挫折的技巧。同时,通过掌握体育技术,学生的自信心得到持续增强,实现身心健康的发展。例如,在观看运动比赛的过程中,学生能够正确认识自身体型,并认识到运动名人的成就,从而强化国家精神。通过体育活动,培养学生合理安排时间的能力,知道如何劳逸结合,逐渐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3.3.2 体育有利于培养学生守法平等意识

无论是在体育社团内部还是在俱乐部之外,体育运动都必须遵守规则,而这些规则对于每个参与者来说都是普遍适用的。大多数运动都需要遵循相同的规则和体系。制度和规则为学生提供了体验“守法”和“平等”的最佳环境。通过运用制度和规则对学生进行教育,加强他们的规则意识,注重对职业伦理的尊重,并在体育教学过程中培养他们的守法和平等观念。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培养当代大学生的“规则意识”[8]。

3.3.3 体育有利于培养学生诚信尽责意识

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都能自觉地遵守规定、信守承诺,从而赢得信任。而义务则是德性和体制的结合,积极的义务更多地源于人们内心的道德意识。在体育运动中,人们时刻受到规则的约束,并将这些规则内化,从而在不知不觉中形成自觉的行为[9]。学习如何运用适当的方式表达意见,并为自己的行为和

行动负责。而团体体育则要求同学们在分配给他们的任务中，有责任心地去完成，不推卸责任。

3.3.4 体育有利于培养学生自强合作意识

“自强”意味着通过个人的努力激发潜能，使自己变得更强[10]。体育运动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体育老师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进行指导，使学生在运动中不断磨练意志力，超越自我，勇往直前，努力奋斗。体育锻炼中培养自力更生的能力。另一方面，大学体育社团主要以学生的自我锻炼为主要内容，许多项目要求学生主动合作，进行团体锻炼。同时，这也可以加强学生的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同学们在互相协作、互相帮助的过程中逐渐感受到团队精神的强大，并学习尊重对手和队友。在合作中，我们可以发挥自己的长处，提升自己的能力。

3.3.5 体育有利于培养学生尊重他人意识

大学生通过参与体育活动，学生不仅能够面对失败，还能学会自我控制，避免干扰、伤害和侵犯他人等行为。当遇到矛盾时，他们也能够善于解决冲突，并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妥协。他们对周围的每个人和事物都持谦虚、礼貌、友善和热情的态度[11]。他们主动参与运动，深刻体会到团队精神的重要性，而不仅仅考虑自己的利益。他们学会在与同龄人的合作和竞争中，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关心和照顾他人，并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他们认真倾听，并尊重他人的权益和感受。

3.3.6 体育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领导能力

在体育社团中，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技术、战术等多个方面的学习和提高，他的自信心也会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在集体运动中，能逐步学习如何发挥自身的素质，熟知队友的身体和心理状态，注重集体的配合和交流[12]。并且能够用适当的方法来引导别人的战术和战术，鼓舞他们的精神，合理地分派职责，在和队友，老师，教练的交流和沟通中逐步提高自己的组织技巧；有良好的沟通技巧，能在工作中发挥自己的专长，协助团队达成共同的目的。

3.4 建设和谐校园中存在的问题

3.4.1 德育目标过于抽象

德育目标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价值观和行为习惯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13]。然而，如果德育目标过于笼统和抽象，教师和学生就难以理解和把握德育的真正含义和要求，从而无法有效地实施德育活动。一些学校的德育目标过于笼统和抽象，缺乏具体、可操作的指导。这导致教师和学生难以明确德育的具体要求，难以有效地实施德育活动。具体来说，德育目标没有明确指出学生应该具备哪些道德品质、价值观和行为习惯，以及如何培养这些品质、价值观和行为习惯，导致教师和学生无法有针对性地开展德育活动，从而达到预期的德育效果。

3.4.2 德育内容缺乏针对性

德育内容的设计和调整应该紧密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学生是德育活动的主体，他们对德育内容的需求和反应直接影响着德育活动的效果。因此，学校在审核社团申报活动时，应该深入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心理特点和行为习惯，合理提出针对性的意见，德育内容才能真正贴近学生的实际，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和共鸣。在部分学校中，德育内容没有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和需求进行设计和调整，缺乏时代性和创新性[14]。这使得德育活动难以引起学生的兴趣和共鸣，难以达到预期的教育效果。

3.4.3 校园体育文化建设不足

校园体育文化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学生的德育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校园体育文化包括学校的价值观、道德观、行为规范、校园环境等方面，它直接影响着学生的思想品德、行为习惯和道德素养[15]。然而，一些学校对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的重视不够，没有将其作为德育建设的重要载体来加以营造和提升，缺乏积极向上的校园氛围，难以形成有利于学生成长的良好环境。

3.4.4 体育场馆配套设施不完善

校园室内场馆场地数量不足，体育设施陈旧，体育器材资源配备不齐。难以满足学生社团的运动需求，不利于社团活动的自发有序开展。

3.5 建设和谐校园的途径

3.5.1 开展德育文化活动

时代在不断发展，社会在不断进步，德育内容也应该与时俱进，紧跟时代的步伐。学校应该关注当前社会的热点问题和现象，将这些问题和现象融入到德育内容中，让学生在德育活动中能够接触到真实的社会生活，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同时，学校还应该注重德育内容的创新，采用新的教育理念

和方法,以及新的德育载体和平台,让德育活动更加生动有趣,更加符合学生的需求和期待。

3.5.2 深化道德教育理念

将道德教育融入社团活动中,使德育内容贯穿教育全过程[16]。加强社团的德育理念培训,提高社团成员的德育素质和能力。道德教育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专门的德育课程,更应该贯穿于大学生校园活动之中。学校应该加强社团指导老师、社团骨干成员的德育理念培训,组织各种形式的培训和学习活动,使社团会长充分认识到德育的重要性,树立正确的校园德育观念。此外,学校还应该注重社团开展活动的德育实践和研究、建立健全社团的德育评价机制,从而促使学生社团不断改进和完善自己的德育方法,深化道德教育理念,推动学生进一步发展。

3.5.3 营造和谐校园氛围

三大球联盟协会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以技术展示为主的足球颠球、绕杆射门、篮球三分球、排球自垫自扣、学术交流研讨等活动,通过活动,能够为学生提供一个展示自我、锻炼自我、提升自我的平台,让学生在实践中增强自己的归属感和集体荣誉感。可以让学生在参与中感受到校园生活的多样性和丰富性。通过开展三大球联盟协会活动,可以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和创新能力。

此外,校园体育文化活动还能够增强学生的归属感和集体荣誉感。通过参与校园体育文化活动,学生可以更好地了解 and 认同学校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增强自己作为学校一分子自豪感和归属感。同时,学生在活动中取得的成就也会成为整个学校的荣誉,进一步提升学生的集体荣誉感。营造紧密联系、团结和谐的校园氛围。

3.5.4 鼓励学生参与管理和谐校园

三大球联盟协会学生参与管理构建和谐校园,学校应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学校事物的管理,以参与到校园建设过程中。通过学生参与管理,可以增强学生的责任感和归属感,促进学校民主化、科学化发展。

3.5.5 整合各方资源共建和谐校园

三大球联盟协会构建是各方资源整合,学校各个职能部门进行配合合作,统筹规划发展形成构建和谐校园的合力,不断推进和谐校园的建设。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高校体育社团对和谐校园建设具有积极作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提高人际交往能力,规范校园管理制度,提升教师素质,营造和谐氛围,完善评价体系,实现德育与校园建设的良性互动,推动和谐校园的建设与发展。在德育工作的推进中,我们还应不断创新方式方法,根据时代发展和学生特点,调整德育内容,使德育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要加强德育成果的总结与宣传,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发更多学生积极参与到校园体育社团活动中来,共同为构建和谐校园贡献力量。

4.2 建议

4.2.1 学校相关部门明确德育的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德育计划,指导教师和学生进行德育实践。

4.2.2 加强校园体育文化建设,注重校园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形成具有学校特色的校园体育文化氛围。以增强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和归属感,促进校园体育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构建完善的德育评价体系 建立科学、合理的德育评价标准。

4.2.3 关注学生的道德行为、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发展。采用多种评价方式,如自我评价、同伴评价、教师评价等,全面、客观地反映学生的德育表现。

4.2.4 适当加大体育社团的活动经费投入,争取社会、企业的赞助。

参考文献:

- [1]刘波,王松,于思远.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我国大学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主要矛盾与实践路径[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3,57(2):5-11,43.
- [2]赵衡,周守友.学生体育社团发展的困境与对策——以2017—2020年全国优秀学生社团中体育社团为例[J].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24,40(02):92-96.

- [3]张宇晴,李理.“立德树人”视阈下高校体育社团的德育价值及践行策略[J].青少年体育,2021,(11):39-41.
- [4]杨静.健康中国背景下应用型高校体育社团发展研究[J].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2(04):40-47.
- [5]王海英.应用型本科高校体育社团现状调查与分析——以皖西学院为例[J].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9,35(12):111-113.
- [6]张劲松,毛迪.阳光体育背景下辽宁省高校体育社团现状与发展路径研究[J].体育科技,2018,39(06):114-116.
- [7]卜苏利.高校学生体育社团研究现状分析[J].体育文化导刊,2015,(01):128-131.
- [8]张仁杰.神圣与世俗之间:大学体育社团中的社会人格培养——以北京大学山鹰社为例[J].上海体育大学学报,2024,48(04):92-100.
- [9]韩惠.高校体育社团与体育选修课的共性研究[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23,39(03):106-108.
- [10]黄毅群.福建师范大学校级体育社团发展问题研究[J].运动精品,2024,43(01):1-3.
- [11]宋哲光.德育渗透在高职体育教学中的实施难点与对策研究[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24,40(05):220-222.
- [12]潘绍伟.体育是德育的理想场所[J].中国德育,2022,(16):1.
- [13]简振辉,戴慧娥.建构主义视角下高校体育社团对大学生体育锻炼的影响研究[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24,43(10):102-105.
- [14]张伟东,丁斌.高校体育教学中德育渗透的途径研究[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上旬),2013,29(01):5-6.
- [15]高文苗.高校德育高质量发展的意义与方向[J].中国高等教育,2021,(23):41-43.
- [16]黄莉.发展高校德育中的隐性教育[J].中国高等教育,2017,(19):56-57.

Building A Harmonious Campus With Sports Associations As The Carrier Of Moral Education - Taking The College Students' Three Big Ball League Association As An Example

Wei Qiao¹, Minyang Ding¹

¹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city, China

Abstract: Student sports clubs are spontaneous mass sports organizations of stud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study uses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view,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On this basis,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our university's three major ball leagues, this study has made a useful exploration of how to strengthen ideological and moral education in student sports clubs in ordinar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for building a harmonious campus are studied. It is found that the moral education goals of building a harmonious campus are too abstract, and the moral education content lacks pertinence; the campus culture construction is insufficient, and the supporting facilities of the sports venues are not perfect. According to the problems in building a harmonious campus, moral education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should be taken to deepen the concept of moral education; create a harmonious campus atmosphere and other countermeasures.

Keywords: sports clubs; moral education; harmonious campus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3.703

产教融合视域下高校产业兼职教师的时间冲突与激励新路径

陈羽豪¹ 卢海东²

(1 江苏 南京 210000, 2 同济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 产教融合作为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路径, 备受关注。高校引入产业兼职教师以促进校企协同育人, 然而在实践过程中, 产教融合面临着时间冲突和激励不足的双重挑战。研究发现, 产业兼职教师由于企业本职工作繁重, 导致教学投入受限; 而且现有的激励机制在薪酬设计、职业发展通道等方面存在结构性缺陷。基于政策分析和案例研究, 本文提出了“弹性协同机制”“多元激励体系”“数字赋能平台”三大新路径, 旨在化解时间冲突, 激发参与动力, 为完善产教融合生态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关键词: 产教融合; 产业兼职教师; 时间冲突; 激励机制; 协同育人

一、引言

近年来, 产教融合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普通本科高校产业兼职教师管理办法》, 首次系统性地规范了产业兼职教师的选聘、职责与保障机制, 并要求高校将企业专家纳入人才培养体系。数据显示, 截至 2025 年, 全国已有 60% 的本科高校开展了产业教师聘任工作。然而, 在实践过程中, 一些显著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一方面, 产业教师由于企业工作与教学任务重叠, 时间冲突率高达 78%^[1]; 另一方面, 超过 40% 的高校存在“重引进轻激励”的现象, 导致教师参与度不足。《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 (2024-2035 年)》强调“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而产业兼职教师作为关键纽带, 其效能直接影响人才培养与科技成果转化^[2]。然而, 现行制度在时间协调与激励设计上的短板, 严重制约了政策的落地效果。例如, 在苏州大学产业教授项目中, 30% 的教师因企业突发任务而中断教学, 同时, 国企兼职教师的薪酬激励又受到审计限制, 难以实质性推进^[3]。因此, 深化产教融合不仅需要破解这些结构性矛盾, 更需要构建可持续的协同生态。产业兼职教师的价值在于将产业前沿技术与真实场景融入教学, 推动高校从“知识传授”向“能力塑造”转变。由此可见, 探索时间冲突的化解路径与激励创新机制, 对于实现教育供给侧改革、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紧迫且重要的意义。

二、产教融合视域下高校产业兼职教师的时间冲突与激励问题

(一) 时间冲突的根源与表现

产业兼职教师的时间冲突, 本质源于职业身份的双重属性。作为企业专家, 他们需要承担研发、生产等核心任务。同时, 高校的教学任务包括定期授课、参与课程设计以及进行学生指导。企业端与高校端的“双重任务”使得他们在时间分配上陷入失衡的困境。以武汉纺织大学为例, 在其聘任的产业教师中, 有 65% 因企业项目的紧急调整而不得不改变教学计划, 22% 不得不缩短实践课程的时长。这种时间冲突的深层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企业考核体系与高校教学周期不匹配, 例如季度业绩压力与学期教学进度之间的冲突; 二是突发性产业任务挤占了备课时间, 导致教学内容呈现出碎片化的状态; 三是跨区域协作 (如多地研发中心) 进一步加剧了时间管理的难度。此类时间冲突不仅降低了教学质量, 更削弱了校企合作的可持续性。

作者简介: 陈羽豪 (1994—), 男, 江苏南京人, 人力资源管理师。

卢海东 (1994—), 男, 江苏南京人, 同济大学管理学硕士研究生。

（二）激励问题的双重维度

1、物质激励的制度性局限

现行的激励机制主要以课时津贴为主，但其薪酬标准缺乏竞争力。例如，国企专家由于受到内部审计的限制，兼职报酬需低于本职收入的 20%，这使得高技能人才的参与意愿受到抑制。此外，高校的经费分配倾向于专职教师，产业教师的科研转化收益分成机制缺失。据调查，仅有 15% 的高校将技术入股、专利分红纳入激励体系，而企业则更倾向于保留知识产权，这进一步加剧了利益分配的矛盾。

2、非物质激励的效能不足

产业教师在职称评审、学术荣誉评定中处于边缘地位，其教学贡献未被纳入高校晋升体系，这使得职业发展通道的缺位进一步削弱了激励效果。例如，在某省高校中，仅有 8% 的产业教师获得校级教学奖项，且缺乏跨机构成果互认机制。此外，社会认可度低、教学成就感弱等问题，导致产业教师长期参与的动力不足。

三、产教融合视域下高校产业兼职教师的时间冲突与激励新路径

（一）弹性协同机制：重构时间管理模式

为有效解决产业兼职教师的时间冲突问题，高校与企业需在教学计划和工作安排上进行充分协同。高校应与企业深度合作，共同制定弹性教学计划，确保课程安排与产业周期有机融合。通过模块化课程设计，高校可根据企业项目的不同阶段，灵活调整教师的授课时间。例如，在“项目嵌入制”试点项目中，企业的研发阶段与教学实践同步推进。教师能够依据项目进度和实际需求，灵活选择集中授课的时间节点。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企业需提供清晰的项目时间表，并与高校教师团队进行充分沟通，确保教师的授课时间与项目进度精准契合。高校则可根据这些信息，制定动态的课程安排，有效避免在企业繁忙时段出现时间冲突。

借助虚拟仿真、异步课堂等技术平台，可显著减少对教师物理时间的占用，从而大幅提升其工作效率。例如，重庆邮电大学的产教融合课程通过线上工作坊的形式，使 47% 的教学内容得以灵活完成，教师的参与效率因此提升了 30%。为推动这一机制的落地，高校可引入先进的在线教学管理系统，大力推广虚拟仿真技术和异步学习模块的应用，使教师能够在不同时间段灵活参与教学活动^[4]。

高校与企业应共同建立双轨考核制度，不仅考核教师的教学质量，还要充分考虑其在产业任务中的贡献。例如，企业可将教师的教学贡献纳入企业绩效考核体系，设置与企业发展紧密结合的关键绩效指标。同时，高校也应认可产业任务的贡献，将其作为“等效课时”纳入教师考核体系。通过这一制度的实施，教师不仅能在教育领域获得成就感，还能在企业的科研和产业活动中得到充分认同，从而形成双向激励机制，有效化解时间冲突问题。

（二）多元激励体系：物质与价值双轮驱动

为充分激发产业兼职教师的积极性，高校应构建多元化的激励体系，兼顾物质奖励与价值认可。在物质层面，高校应设立产教融合专项基金，为产业兼职教师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课时津贴，并根据其参与的教学和科研项目给予相应奖励。例如，高校可将课时津贴上浮 20% 以上，并允许教师通过技术入股等方式获得企业的股权分红。此外，依据《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企业可享受税收减免政策，从而间接提升教师的收入水平。这些措施需由高校与企业共同商议，确定合理的薪酬结构和奖惩机制，确保教师的工作付出得到合理回报。

在价值层面，高校应为产业兼职教师设立明确的职业发展通道，并将教学成果与企业的晋升制度挂钩。例如，东莞理工学院通过将产业教师的教学成绩与企业内部晋升条件关联，为教师在企业中创造了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同时，高校可为产业教师设立专属的职称序列，如“产业教授”这一职称，并赋予其更多的学术及管理职权，例如开设硕士生导师资格、联合管理校企实验室等。这些措施能够显著增强产业教师的职业归属感，并提高他们在教学与科研活动中的参与度。

为具体实施这一激励机制，高校可根据教师的贡献程度，灵活调整奖励方式，并与企业紧密协作，共同设定激励的具体细则。高校需与企业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确保教师在教学和实践项目中的参与得到相应的物质和非物质激励。

（三）数字赋能平台：技术驱动的生态重构

在现代教育与产业合作中，数字技术的应用为优化时间管理和激励机制开辟了新路径。高校与企业可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构建高效的产教融合智慧平台，显著提升协同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平

台可通过“需求—资源”匹配算法，实时对接企业项目与教学任务，优化时间配置。例如，北邮的虚拟实验室利用 AI 调度系统分配教师的参与时段，成功将时间冲突率降低了 40%。为实施这一技术，高校需与技术公司深度合作，开发适合产教融合模式的智能调度系统，并进行实时数据跟踪与调整，确保教师时间的高效利用。

该平台将全面记录教师在教学、技术转化等方面的贡献，并作为未来激励和评价的重要依据。例如，通过大数据分析，可精准评价教师在企业项目中的实际贡献，进而用于绩效考核和奖励机制的实施。高校还可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跨机构的学分互认与知识产权确权，有效解决教师在项目中的贡献分配问题。通过这一数字化平台，高校与企业可共同追踪教师的贡献，并根据贡献度进行精准奖励与激励。

为落实这一技术平台，高校需组织跨学科团队，整合教育与技术领域的优势，开发符合需求的平台，并确保技术的可操作性和用户友好性。此外，高校应加强与企业的沟通合作，推动数字平台的互联互通，确保信息流畅并支持协同育人的长效机制。

四、结语

在产教融合的背景下，高校产业兼职教师所面临的时间冲突与激励问题，本质上是制度供给与需求适配失衡的体现。本文提出的弹性协同机制、多元激励体系以及数字赋能平台三大路径，为破解这一矛盾提供了系统的解决方案。展望未来，我们应进一步强化政策协同，例如完善《产业兼职教师管理办法》的具体细则，推动国有企业薪酬审计制度的改革；同时，深化技术应用，积极探索元宇宙等新兴场景在教学中的整合应用。只有通过多方共建、重构生态，才能真正实现“教育—产业”人才共育的闭环，为高质量发展赋能。

参考文献：

- [1] 王红梅. 从兼职教师到产业教授——江苏兼职教师产教融合工作的有益探索[J]. 职教论坛, 2020(5): 4.
- [2] 田宇飞. 产教融合视阈下高职院校兼职教师培养路径研究——以黎明职业大学为例[J]. 湖北函授大学学报, 2021, 034(024): 59-61.
- [3] 董伟. 产教融合视域下民办院校兼职教师队伍评聘探析[J].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1, 21(6) : 58-59.
- [4] 田宇飞. 产教融合视阈下高职院校兼职教师培养路径研究——以黎明职业大学为例[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2021, 34(24) : 59-61.

New Pathways for Addressing Time Conflicts and Incentives of Part-time Industry Teachers in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Chen Yuhao ¹, Lu Haidong ²

¹ Nanjing, Jiangsu, ² Tongji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Abstract: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as a core pathway for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promotes collaborative talent cultivation between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by introducing part-time industry teachers. However, it faces dual challenges of time conflicts and insufficient incentives in practice. Research shows that part-time industry teachers, burdened with heavy corporate tasks, fail to devote enough time to teaching. Meanwhile, existing incentive mechanisms have structural flaws in aspects like salary design and career development channels. Based on policy analysis and case studies, this paper proposes three new pathways: "flexible collaboration mechanism," "diversified incentive system," and "digital empowerment platform." These aim to resolve time conflicts, stimulate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improving the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ecosystem.

Keywords: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Part-time industry teachers; Time conflicts; Incentive mechanisms; Collaborative talent cultivation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671

明清宣恩乡绅与社会治理

陈 娇¹

(¹西华师范大学, 四川 南充 637001)

摘要: 自科举制兴起以来, 社会人才流动增强, 地方产生了乡绅群体。明清之际, 乡绅群体作为国家权力的自治末梢, 在“国权不下县”的传统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宣恩虽是鄂西偏远小县, 但产生了庞大的乡绅群体。在儒家道德体系以及官方主流价值观影响下, 宣恩乡绅凭借其掌握的社会资源, 在维护地方秩序、缓解官民矛盾、教化乡民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明清时期宣恩县乡绅群体在社会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虽然只是一个特殊的县域案例, 但是在全国乡绅与社会治理的研究中具有借鉴意义, 也能从中获得对当今宣恩县发展新乡贤及对社会治理的启示。

关键词: 乡绅群体 《宣恩县志》 社会治理

对于民间社会来说, 乡绅掌握着较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源, 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所起的作用非同寻常。乡村作为古代治理体系之下的基层组织, 有着极大的区域性、发散性等特征。而对于乡绅, 有学者总结为“国权不下县, 县下惟宗族, 宗族皆自治, 自治靠伦理, 伦理造乡绅”的说法^{[1](P2)}。乡绅作为国家权力的自治末梢, 起到链接皇权与乡村的桥梁作用,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官与民的矛盾, 也能够一定程度上解决村民的困难, 为当地乡村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 同时也能通过自身的知识和地位教化乡民, 对乡村治理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本文拟从文献梳理入手, 以宣恩县为个案, 通过个案研究从微观角度探究地方乡绅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进而管窥乡绅群体如何成为地方与朝廷的媒介, 在维护地方秩序、教化乡间民众等方面发挥其应有作用。^②

一、乡绅含义与研究地域

(一) 乡绅的含义

乡绅大多代指在本乡本地知书明理、才能出众、德高望重、受人尊崇之人^[2]。绅, 在《说文》中是“绅, 大带也。”原指古代士大夫束腰的大带子, 后被引申为有权势的人, “缙绅”成为官僚阶级的代称。“乡绅”一词最早可追溯至宋, 但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乡师”、“乡大夫”^[3]。到明清时期, “缙绅”“乡绅”“绅士”等运用普遍。最初“绅”与“衿”“士”有着较为严格的区分, 后来随着“绅衿”“绅士”的频繁运用, 它们逐渐相通, 用来代指在基层社会里发挥作用的有官衔或功名在身的人。^[4]

作者简介: 陈娇(2001—), 女, 湖北恩施人,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② 目前对于湖北地域乡绅群体的研究较多。如吕静在《明清时期鄂豫皖交界山区的社会动荡与社会控制》一文中从社会史的角度对明清时期鄂豫皖交界山区的社会动荡作出考察, 得出以乡绅为代表的地方力量的崛起, 反映了明清时期官府控制的衰败, 可以说乡绅的崛起是历史的选择是必然的; 郭家麒在《动荡与重构: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鄂东士绅与基层社会》一文中以鄂东地区基层社会为基本着眼点, 探讨鄂东绅民在变局中如何生存与选择, 在获得军功后如何参与地方事务与秩序重建, 展示晚清鄂东基层社会的动荡与重构; 李灵盼在《在“礼”“法”之间: 羊楼洞区域社会的绅商治理》一文中展现了与传统士绅不同的羊楼洞绅商群体, 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采取了不同的治理方式与运营机制, 与同样争夺地方控制权的国家体制之间形成了既彼此依赖又互相竞争的复杂关系。纵观湖北地域乡绅群体的研究中, 多集中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 而对于地势偏远、经济水平低下的地区涉及不多。故本文想借助前人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模式, 开展对于地势偏远的地区——宣恩地域乡绅群体的研究, 浅探宣恩地域的乡绅群体在对其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作用, 以期得到对于当今宣恩县发展新乡贤及对社会治理的启示。

在对乡绅群体进行研究时,由于研究视角不同,学者们会用不同的名词,而这个名词又被赋予不同的含义。美国汉学界华裔学者张仲礼等使用“绅士”,尤以张仲礼的以科举功名、官衔为中心的界定为经典。而新一代汉学家如孔飞力等则会用“地方精英”,更侧重于功名之外的社会经济因素,如家族、财富等^[5]。我国本土对于乡绅群体的研究较早,费孝通、吴晗等学者在民国时期就开始了对中国乡绅的研究,他们用的是“绅士”一词,大多兼顾了功名和经济因素,重视皇权与绅权两者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6]。本文对于“乡绅”的定义来自于傅衣凌先生,即“既包括有功名的人,也包括在地方有权有势的无功名者”^[7]。

(二) 研究地域

本文的研究地域——宣恩县,“上古为廩君国,春秋时属巴子国,又属夔子国。自秦汉以来,建置不一,分隶亦不常。或曰夜郎,即其地也,或曰否。宋以下为六土司所分据”^{[8](P5-6)}。宣恩在明清时期属于施州管辖。在《宣恩县志》中记载:“元属土酋占据。……前明仍元旧制,然亦废置不一。”“雍正十三年,十五土司率土抒诚,自请归流,议置施南郡,设所属六县。宣恩居其一。”^{[9](P70-80)}此时宣恩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县。^{[10](P386)①}

在经济上,明清时期,国家休养生息,宣恩民间的户口也在增加。据《宣恩县志》中记载,“乾隆六年,编审滋生人丁二百一十五丁”,其后,到“乾隆五十七年,查土著流寓大小男妇共一十六万零一百九十六丁口”^{[11](P288)}。由此可见,从乾隆六年到乾隆五十七年这一时期,宣恩人口数量急剧增长,人们对于土地的需求量也在增加。这一时期宣恩的土地面积增多。据《宣恩县志》记载,仅乾隆三年就查“勘出成熟水旱田地,共四百一十二顷四亩一分五厘。”“乾隆十年,开垦额外旱地七亩七分一厘四豪四丝八忽。”“乾隆十二年,开垦额外旱地五亩七分八厘五豪七丝二忽。”“乾隆十六年,开垦额外水田三十五顷八亩八分,……又开垦额外旱地四十六顷二十七亩。”“乾隆四十三年,开垦额外水田五十顷四亩八分,……又开垦额外旱地一百九十顷五十五亩二分。”^{[12](P303-308)}以上记载均表明清代宣恩农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而良好的农业经济为培养乡绅群体提供了丰厚的沃土。

由于宣恩地处湖北省西南边陲,“地处偏隅,非若通都大邑”^{[13](P17)},自古以来经济开发较为迟缓,且受土著文化影响,落后于中原正统民族,故历史上简称为“西南蛮”。这一情形在明清时期得以逐步改变。

“乾隆元年额设文学三名、武学二名至宜昌府搭棚应试,因路远,应试寥寥。至五十二年始建考棚于施郡。嘉庆四年以唐廷招、隋世钦二生赴省。请广学额,奉文准坐,揆府学文武各一名,又设廩增各二名,四年一贡。”^{[14](P167)}这一时期宣恩的书院有讲堂三间,前门一所。知县陈文照,领首购置宋氏旧址一处,建鹿鸣宾馆和考棚,并重建书院于宾馆之西,然而工未竣,乞养去任,后由张金澜续成,名曰“龙洞书院”。乾隆年间到咸丰年间共产生了武科2名,拔贡4名,恩贡9名,岁贡26人。^{[15](P383-388)②}可见,在清代时,宣恩县的教学得到提升,逐渐形成科举功名群体,其中一部分的地方乡绅就从这一群体产生。另一方面,民间普通民众受到科举功名群体的社会示范作用影响,注重读书学习,传承优良家风。如侗族陈氏一族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素有“养子不读书,等于养的猪”的说法,从陈大鼎起,连续八代人都有贡生、秀才、国士、大学生、研究生和博士生达20多人。宣恩县的乡绅群体得到进一步扩大。^{[16](P365)}

二、宣恩乡绅与明清兵事

自秦以来,中国地方层级形式多样,但主要以郡县制为主。整个国家是一个大的秩序系统,县是比郡更低一级的子系统。大体在中唐后,主要由地方乡绅维持地方秩序。^{[17](P66)}明清时期,宣恩乡绅与官府权势互补,缓解官府与乡民的矛盾,解决乡民的难题,并且清剿匪寇,保境安民,为乡民们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共同维持着宣恩地区的社会稳定,是地方社会秩序的重要维护者,地方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对宣恩地区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 宣恩乡绅与明代兵事

宣恩位于湖北鄂西,鄂西地在我国腹心,自古以来就是土家族聚居的地区。自元起,朝廷在鄂西实行

① 雍正十三年冬十一月壬寅,对恩施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去施州卫设施南府,辖恩施、来凤、咸丰、利川、宣恩五县。其中又以施南、忠峒、高罗、木册、东乡、忠建六司及石虎地合一县,该县定名为宣恩。

② 该数据由笔者对其记录在册的人员名单整理得到。

土司制度，直至清朝改土归流。明太祖在早期仍用元旧制，其后出于扬“威”施“恩”的目的，对土司有杀有奖。覃大胜本是施南土司首领，其事迹在《宣恩县志》中记载：“洪武二十三年，（徐凯）从蓝玉征散毛镇南等峒。二月克散毛，禽散毛土酋刺惹覃大旺等万余人。五月施南司土官覃大胜等乱，玉命移兵讨之，擒大胜及其党，男妇八百二十口。解磔大胜于市。”^[18]（P330-333）覃大胜于明洪武四年归附朝廷，因不满朝廷的中央集权统治制度，曾多次聚兵反抗。明洪武二十二年，覃大圣再次起义反抗，朱元璋下旨镇压。覃大圣兵败散毛司，其弟覃大旺手下万余人被杀，后覃大圣被俘，1800余人又惨遭杀害。次年春，朱元璋降旨，将覃大圣等821人押送天京。未几，覃大圣被处斩，余者820人被充军^[19]（P362）。经过明太祖后期的这场血腥镇压后，又有许多土司被废除。到洪武二十七年三月，鄂西地区仅剩施南、忠建。^[20]

覃大胜死后，朝廷为了缓和矛盾，不得不实行“安抚”政策。据《宣恩县志》记载，“（明）弘治二年，木册长官田贤及容美致仕田保富各进马为土人谭敬保等赎罪。刑部言：蛮民纳马赎罪，轻者可圆，重者虽宥，宜下按臣察覈”^[21]（P348-349）。田贤与田保富通过向朝廷进马赎罪的形式为土人求情，朝廷则根据罪责轻重酌情处理。可见这一时期乡绅们可以通过贡方物贡马来为犯罪的乡民赎罪，且朝廷放松惩处力度，可以为之减轻刑罚，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此外在地方机构上，地方乡绅可以进入地方治理机构参与社会治理。如“盖造其施州卫，有原设教授、训导二员，取进生员一十五名。今应仍照旧制”^[22]（P350）。

可见，地方官员和乡绅通过贡方物贡马赎罪、进入地方机构参与社会治理，有助于缓解朝廷与地方的矛盾，扩大官绅视野，促进辖境内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少数民族的发展，便于本地区社会稳定。

（二）宣恩乡绅与清代兵事

宣恩县地处五县交界一带，因其与其余各县呈犬牙交错的地理位置，同时又与当时的宜昌府鹤峰州、湖南省龙山县交界，故历来为战乱所祸及。

其一是宣恩乡绅与白莲教匪的抗争。宣恩自改土归流以来，休养生息百余年，故在白莲教匪阑入时，宣邑倡兴义兵助剿。《宣恩县志》中就有大量乡绅与白莲教匪战斗的记载。例如：“麻光裕，邑之东乡里人。嘉庆元年，白莲滋事，光裕起，以甲长练乡兵，屡战屡胜。阍帅诧其能，由是兴山、竹山、长阳、巴东共十数州县，俱与之。偕其所至处，贼寇遥相谓曰：‘麻老虎至矣。’辄委器械去，无敢战者”^[23]（P389）。在白莲教开始于民间滋生事端时，麻光裕就以甲长的身份组练乡兵，与白莲教匪的对战中屡次获胜。他的能力也得地方军事统帅的认可，与之一一起率众作战。麻光裕威名远播，对白莲教匪具有一定的威慑作用。除有职位的乡绅利用职权抵御教匪外，暂无官位的乡绅则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以及财富抵御教匪。一部分乡绅选择捐助军饷给官府，如宣邑诸生唐廷援、宣邑武生唐开源在白莲教滋事时“捐助军饷兼守办粮台”“捐助军需兼守炮台”^[24]（P392-393）。还有一部分乡绅则会招募乡勇，设关卡于各个隘口，如“宋永灼，字文奇，国学生。家资丰裕，好行善事，建桥梁、补道路、修庙宇，乐此不倦，人咸称之。嘉庆元年，教匪窜入东乡晒坪，捐银三千两，招募乡勇五百名，命五子宏增随县主苏公于洛堵御二日，贼畏有备，不敢入城，赖以全”^[25]（P390-391），“宋宏增，字退庵，邑增生，文奇之五子也。……嘉庆元年，来凤莲匪猖獗。捐资募勇，堵卡龙山、麂皮坝。与贼战，拿获贼目胡正中，抢获旗帜刀锚并大炮二座”^[26]（P391）。

除地方乡绅积极抵御外，地方官吏也在利用乡勇剿除贼匪。如：“明覃大九，东乡土司子，事天启间征黔，父子死事，加二等升宣慰司。嘉庆元年以后，剿除贼匪”^[27]（P395）。死于覃大九领导的剿除贼匪活动中有兵丁陈维指、赵成瑞等22人，乡勇李进、孙正隆等106人^[28]（P395-399）^①。故而在《施南府志》中辑录了王三锡的《来凤教匪未靖奉檄守硃寨》：“竹架窝篷木扎城，凭高扼要势纵横。独怜负戟抛锄者，尽是宣恩乡勇兵。拳室安身硃口间，编篱隔断旧青山。耽诗自是书生癖，谈论孙吴不得闲。四野蛙声杂雨声，溪流喧涨客心惊。戍楼鼓角忙催柝，数到连敲第五更。”^[29]（P392）

其二是宣恩乡绅与太平起义军的抗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前，太平天国起义已在中国南方爆发，并持续13年之久，波及范围广。宣恩的士民丁勇堵剿太平天国起义军也在《宣恩县志》中有所记载，“咸丰十一年，堵剿髮逆死事，士民丁勇均附载于左：团首满建禄，监生满建洪、满建英均在穿箭河坡地方堵卡，与贼对敌被杀；团勇刘乡望、卢光盛、刘麻子（即满志，均被杀）；蓝世英年八十五岁，十月十九日骂贼被杀；蓝大英年八十六岁，同日被杀；武生郭元培赴惠协戎营投効，在麂子峡打仗阵亡，……附职员莊大明

^① 该数据由笔者对其记录在册的人员名单整理而得。

所带阵亡勇丁六名：张承举、李有仁、彭万学、李光明、赵天培、王泽富。附团首乐升平所带阵亡勇丁五名：李玉吉、郭长修、陈志德、谭世元、胡步杰。以上共二十人均于同治元年七月申详彙案请卹”^[30](P399-402)]。

至清改土归流后，历任知县勤政爱民，治理有方。陈霖“时乾隆元年新设邑，创规定矩，井然有序。任事六年，实心实政。邑民感恩，有去思碑文在”，贾思谟“为政简易，因公解任。既去，民犹思之”，李士高“长于吏事，节俭慈明，爱民如子。至于锄奸除暴，则绝不姑息。士民仰之如慈父母焉。去后里人立位祀之”。张廷烜“听断如神，士民畏威怀德，至今犹颂之”，更有胜者郑士楷“在任四年，实心行政，清勤坦直。民邀实惠。道光二十九年，岁饥。发谷二千余石救荒，公出家资买补之”。^[31](P377-381)]历任官员与地方乡绅紧密结合，维持着一方安定，对于宣恩县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可见，在社会遭受巨大的外部威胁，官方势力衰弱或者难以维持地方治安时，地方乡绅就会利用自己的政治、经济资源，与官府联手，清剿匪寇，承担起保境安民的责任，维护地方秩序。当社会稳定百姓安家乐业时，地方乡绅服从于地方官吏的领导，官绅紧密结合，共同促进本乡发展。

三、宣恩乡绅与乡民教化

宣恩在六土司时期，“六土司时，分据其地，负固称雄，人情鹜，风俗浇，文学不明，节义罔识。犹是人民无师儒之训迪，犹是山水无仕宦之留题迨”^[32](P15-16)]。尔后改弦更张，设官建学。至清代时，宣恩地区产生了庞大的乡绅群体，他们凭借自己独特的社会资源、渊博的学识，捐建学校、教育乡民、编撰史文，积极助力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传播儒家伦理道德，构建乡民的价值体系，使得“鹜者多驯，浇者近厚，文学渐彰，节义渐着”^[33](P17)]，在教化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一）修建学校

明清时期，科举与仕途紧密联系，各地对教育的重视也在不断加深。地方乡绅在对于宣恩教育上的支持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乾隆五年，以原施南土司署改建成宣恩学宫，设立县学。^[34](P341)]在县志的《名宦》中记载：“张廷烜，甘肃通渭举人。任宣恩两任，凡十一年。劝谕士民建修奎星阁、文昌宫、龙洞书院”^[35](P380-381)]。嘉庆十三年，书院余房中的一所东乡义学来自民间捐资设立，由“前巡司史敏捐庀置田十亩、义馆二进。前县主任任公国选以培风，书舍额之有跋”^[36](P178-179)]。嘉庆二十五年，在文昌宫创立龙洞书院，经费一部分来自藩库银，一部分来自民间捐助。^[37](P341)]例如训导朱定鳌乐于资助寒素之人，曾投资整修龙洞书院，多行善举。在书院的修建过程中，宣恩县的乡绅们不论是有功名在身的士人，还是富商大贾等人，都为之捐赠了许多的义田、膏火。据《建置志》载：

附载龙洞书院宾兴膏火义田：

买业：嘉庆二十五年，宋宏尧、唐开洋、郭维连、石尚忠、屈进忠、李治仁、聂兆庆、唐开第、覃长有、夏商成、杨大和、文应楷、钟毓、隋世钦、郭文灿、孙志先、谭德新、覃庆善、罗荣程、孙志善等捐买一契，租谷十四石，价银五百一十五两一钱二分五厘；道光二十八年四月二十日，聂正国捐买一契，租谷十八石，价银一千零六十千文；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初四日，李启有捐买李先美一契，租谷十四石，价银六十二千文，又买得罗昌言一契，价银六十六千文，咸丰二年十一月十二日，买得杨大猷一契；咸丰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文锦和覃文彩捐买贺璵一契，租谷二石，价钱六十千文；满贵捐买钟娃田一契，价钱一百八十一挂；咸丰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买宋祚钟一契，价钱四百五十千文；人买宋祚钟一契，价钱四百五十千文；咸丰九年六月初六日，买薛士荣一契，价钱十五千文；咸丰九年六月初十日，买姚华武一契，价钱十五千文；咸丰十年二月二十日，买吕向氏一契，价钱五十千文；咸丰十年五月十四日，买覃庆明一契，价钱三千二百文；同治二年正月，买唐齐飞一契，价钱一千一百千文；同治二年十二月，当郑宗明二契，价钱共六百千文。

当业：聂正国捐充得当王姓业一契，租谷二石八斗，价钱六十千文；姚再华捐充当业一契，租谷四斗，价钱三十千文；罗正兴捐充当业一契，租谷八斗，价钱十九千文；罗亨琨捐当业三契，租谷八斗，价；陈士选捐当李世芳一契，租谷五斗，价钱十六千文；宋楚伦捐当张光贵一契，租谷四斗，价钱四千八百文；王朝贵捐当邹世详一契，租钱八百文，价钱二十千文；彭志松捐当业九契，租钱三千六百文，价共七十千零四百文；杨大魁捐当一契，价；杨正文捐当一契，租谷五斗，价；姚正才捐当一契，租钱六百文，

价；观音山捐当一契，租包谷三斗，价；温志华捐当一契，租包谷三斗六升，价；石金才捐当一契，租包谷一斗，价。^{[38](P179-190)}

由此可见，乡绅们通过买与当的形式参与书院的修建，为之捐赠义田、膏火。除田地、银钱外，物资还包括稻谷、苞谷，而且乡绅们不仅会捐买田地，还会捐当自己得到的别人的田地用以支持书院的运行。以上记载在册的捐赠者们多为地方富商大贾，未见其取有功名在身。可见除功名加身的人积极修建书院，对本地有一定号召力的人物也愿意参与其中，体现了民众们对教育的重视。总之，龙洞书院的运行和修建所耗费之财，一部分来自藩库银，一部分则来自地方乡绅的捐赠。这些田地、谷物、资金的捐赠，不仅维持了龙洞书院的正常运行，也促进了宣恩县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为宣恩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

（二）教育乡民

乡绅是地方的知识阶层，承担着教育乡民的重任，充当官府与乡民的纽带，传播儒家伦理道德和官方价值体系。张仲礼先生认为对于有功名的绅士来说，教学是一中较为可靠且容易获得的职业，在教学中绅士自然也会发扬传统。^{[39](P102)}

晚清时期，私塾是宣恩县主要的教育形式，其中大部分为议塾。这些议塾多由本辖区内的乡绅开馆办学，教育各家子弟。^{[40](P341)}人们常称私塾里的教师为塾师。因宣恩路远地偏，教育起步较晚，故一所私塾只有一个塾师，多为贡生、举人等名师，社会地位较高。宣恩县最为有名的便是“姚大先生”姚复旦，拔贡以后荣归故里，眼见家乡文化落后，但学金昂贵，乡民子弟只得望而却步。于是他在龙头堡开馆教学。其执教40余年，学生遍及湘、鄂、川、豫等省，仅宣恩县本县会口、长潭河、中间河、万寨、板场等地的贡生就达10余人。^{[41](P444)}此外，宣恩县还有贡生刘锟、段自慎等人，执教30余年，门下生徒有举贡、廪生等30余人。^{[42](P341)}到宣统元年，宣恩县有私塾13所，学生258人。^{[43](P341)}

正如徐祖澜所说：“正是通过乡绅在教学过程中对儒家伦理道德的解释，明清时期的乡村社会才得以形成了一个全套接受儒家价值和规范的乡民群体”^[44]。地方乡绅们凭借自己的学识以私塾教学的方式传播儒家价值体系和社会伦理观念，在改造乡民的思想发挥了极大作用，故有“负固者心渐回，较强者迹胥敛，已不复昔年之犷悍矣”^{[45](P6)}的评价。

（三）编撰史文

县有县志，国有国史。地方志“是一方之全书”，是司马光口中的“博学之书”。明清两朝都曾数次大规模诏修总志。地方志的修撰是明清时期社会经济、文化繁荣的表现，在励俗维风、信今传古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直备受历代先贤的关注。

在清朝以前，宣恩县“建置不一，分隶亦不常”^{[46](P5)}，因此没有专门的县志。到清朝乾隆四十四年，贾思谟在宣恩县担任知县时曾创编《宣恩县志》，但可惜没有刊行。清嘉庆年间，前邑令苏于洛也曾编修县志，可惜“其稿久逸，不得遵循为恨”^{[47](P33)}。同治壬戌四月，张金澜奉檄宰宣邑，“莅任之日，礼书以邑志呈阅，其全书仅三页纪六土司沿革原委，此外附载山川不及十之一，且略而不详”^{[48](P4-5)}。于是筹资修纂，“顾时方筹资宾兴，倥偬少暇，有志未逮，迟回久之。越七月，从弟金圻自沪来此，余喜，纂修之，有助也。乃谋诸学博蔡君，蔡君善属文，恳其同藏厥事，搜得《施南府志》全册，以资考证。……固已选入无遗也，惟艺文志所未载者，今并录之”^{[49](P8-10)}。最终张金澜筹资修纂，蔡景星、张金圻助之，参照贾思谟创于乾隆四十四年的旧志和成于道光十五年的《施南府志》考证，于同治二年夏汇成篇帙，遂付枣梨。

在编修县志的过程中，宣恩的地方乡绅群体积极参与。蔡景星曾在《序》中言及：“同治壬戌，浙之张君来宰是邑，张君谙练深沉，长于吏事。越一年，政通人和，废者多举。其弟兰修以省兄来宣，皆浙之秀也。一日与予筹及修志之事，予曰：此美意也！此盛举也！予虽不敏，切愿参末议焉。乃属宣之绅耆，搜罗而采访之。”^{[50](P19-20)}记载于册的同纂姓氏中，张金澜任监纂，蔡景星任协纂，张金圻纂修。此外，还有贡生、附生参与同纂和分校工作。^{[51](P35-36)}①由张金澜主持的《宣恩县志》修纂工作中，其组成人员共有11名，互相配合，分工协作。在张金澜的主持之下，其弟张金圻以及附生、贡生等地方乡绅的参与，使县志内容较之贾稿更加丰富。

① 其中记载的人员名单有同纂：贡生张光岳，贡生姚复旦。分校：附生石廉，附生覃敬五，贡生朱定鳌，附生蓝芳，贡生谢金诏，附生李焱。

传统社会教化的路径除了礼仪制度的规范化、普及化,还有其他很多教化路径,比如树立忠义、孝悌、节烈、义门等典型。^[52]《宣恩县志》中记载了有关儒家道德教化人物的案例和个人,尤其在《人物志》中,分门别类,设立忠义、孝义、行谊、颐寿、节孝、贞节、烈节七大类,将相关人物事迹记录在册。而其中记载的诸多人物事迹,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应得以弘扬,这就对社会教化起到了积极的模范示范作用。

宣恩乡绅修撰史文的身影不仅出现本县志的修纂中,也出现在府志的修纂中。由王廷桢主持的《施南府志续编》中记载了同纂姓氏。而今再看《增修施南府志续编姓氏》,从中可以看出,在续编《施南府志》时,分别有宣恩县学增生朱开第、宣恩县学附生朱开来得到聘用参与府志的修纂工作。他们在修纂府志时,使得府志中有关宣恩县的记载更加完善。

地方乡绅除编修地方志外,还会吟诗作赋,汇集整理其他题材,编著其他类目的书籍。时称贡水之名儒的朱定鳌喜吟诗作赋,著有《五柳轩诗集》,作《过忠建土司城怀古》等诗文。^{[53](P367)}《宣恩县志》同纂中的姚复旦不仅精心讲学,而且还挥笔疾书,猛烈抨击乡宦横行的卑劣行径,著有《普天乐》、《升平福》等短篇小说集,无情地鞭挞那些害国害民的衣冠禽兽。邑之名医汪古珊有宽怀济世利人之心,晚清清廷腐败,感壮志难酬后,易志从医。晚年辑成近五十万字的不朽著作《医学粹精》,于光绪二十二年刊行问世,现依然在宣恩、鹤峰、恩施等地流传。其版模至今由恩施州卫生局保存完好。^{[54](P369-370)}

沈小勇在《从传统到现代:道德教化的价值重构研究》中提出:“中国传统社会教化的诸种路径有力地实现着乡土社会百姓群体的文化塑造,最终达成‘化民成俗’的教化效果”^{[55](P124)}。宣恩乡绅在宣恩的文化、医学等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最终使得风土山川、嘉言懿行得以彰显。使“其士讲礼乐而习诗书,其民知廉耻而守法度。家弦户诵,日进醇良”^{[56](P8)}。乡绅们编撰的史文可以为风俗之书,可以为劝忠之书。以先辈为榜样,受家风家训影响,近代宣恩民众积极参加革命,涌现出一大批革命烈士。

总而言之,明清时期乡绅群体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对它的研究一直以来备受学界关注,成果颇多。如费孝通的“双轨政治”^{[57](P42-53)}、杜赞奇的“经纪机制”^{[58](P23)①},2个认识范式都认识到乡绅群体在社会治理方面都承担了许多重要的职责。宣恩乡绅凭借自己独特的社会资源,尽力突破地域的限制,一方面缓解朝廷与民间的矛盾,保境安民,清剿匪寇,维护地方秩序;另一方面凭借渊博的学识、丰厚的财富,捐设学校,开馆教学,改良社会风气。为宣恩地方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空间。他们掌握着一定的政治、经济资源,与官员紧密联合,共同获得了对基层社会的领导权,在社会治理方面起到了极大的重要作用。

而今对于明清时期乡绅群体的研究也逐渐从宏观走向微观,呈现出专注于区域社会、多视角研究的趋势。宣恩县乡绅群体对本地域社会治理作出的贡献,虽然只是一个个例,但这也为现今如何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提供了启示。

参考文献:

- [1] 秦晖.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层控制:汉唐间的乡村组织[J].中国乡村研究,2003,(01):1-31.
- [2] 钱念孙.乡贤文化为什么与我们渐行渐远[J].学术界,2016,(03):38-44.
- [3] 王春娟,秦行国.乡贤在传统社会的历史形态及其差异[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1):116-119.
- [4] 陈国飞.明清时期士绅与国家权力的互动关系研究——以新会县为例[J].地域文化研究,2022,(02):137-146.
- [5] 袁海燕.士绅、乡绅与地方精英——关于精英群体研究的回顾[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2):126-130.
- [6] 巴根.明清绅士研究综述[J].清史研究,1996,(03):115-120+123.
- [7] 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03):1-7.
- [8,9,11-15,18,21-28,30-33,35,36,38,45-51,56] (清)张金澜,蔡景星,张金圻编.荆楚文库 同治宣恩县志[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21.03.
- [10]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年鉴》编辑委员会编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年鉴[M].武汉:湖北人民出

① “双轨政治”认为乡绅群体在“农民——乡贤士绅——国家”的治理模式中发挥了纽带作用;“经纪机制”则认为地方政府与乡村之间通过“经纪人”进行沟通,而乡贤士绅扮演的就是“经纪人”角色。

版社, 2017.12.

- [16,19,53,54] 高恨非, 姚祖瑞, 陈开沛主编. 宣恩县民族志[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12.
- [17] 徐光有著. 省际结合部 清末捻变再研究[M].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8.03.
- [20] 范植清. 明前期对鄂西民族地区的治理[J]. 民族研究, 1990, (01): 103-110.
- [29] (清) 王协梦修. 施南府志(清道光丁酉版) [M]. 恩施地区博物馆, 恩施地区档案馆, 1982.10.
- [34,37,40-43] 宣恩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 宣恩县志[M]. 武汉: 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 1995.12.
- [39] 张仲礼著; 费成康, 王寅通译. 中国绅士的收入 中国绅士续篇[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01.
- [44] 徐祖澜. 明清乡绅的教化之道论析[J].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06): 30-36.
- [52] 葛荃. 教化之道: 传统中国的政治社会化路径析论[J]. 政治学研究, 2008, (05): 64-73.
- [55] 沈小勇著. 从传统到现代[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0.07.
- [57] 费孝通著. 乡土重建[M].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1.06.
- [58] (美) 杜赞奇著; 刘东总主编; 王福明译. 文化、权力与国家 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07.

Local Gentry and Social Governance in Xuan'en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hen Jiao¹

¹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Abstract: Since the rise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increased social mobility of talents led to the emergence of local gentry groups.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s autonomous extensions of state power, these gentry played a vital rol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where "state power did not extend below the county level" (guoquan bu xiaxian). Although Xuan'en was a remote county in western Hubei, it fostered a substantial gentry class. Influenced by the Confucian moral system and state-sanctioned ideologies, Xuan'en's gentry leveraged their social resources to maintain local order, mediate conflicts between officials and civilians, and educate the populace. While the role of Xuan'en's gentry in social governance represents a unique county-level case, it offers insights for broader studies on gentry and governance in China, as well as inspiration for cultivating "new rural elites" (xin xiangxian) in contemporary Xuan'en.

Keywords: Local gentry; Xuan'en County Gazetteer; Social governance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3.698

凝视与反凝视——从《瀑布》看新时代的女性电影

荆 婧

(青岛城市学院, 山东 青岛 266106)

摘要: 随着时代的发展, 台湾地区的影视作品在 21 世纪呈现出越来越多具有鲜明女性意识的女性形象。作为继《阳光普照》(The Sun) 后导演钟孟宏首部执导的女性电影, 《瀑布》(The Fall) 从受疫情影响者的个体角度展开, 聚焦普通家庭中的母女关系, 呈现出女性自主性的崛起, 可以被称为新时代的女性电影。基于穆尔维的男性凝视理论, 分析该片所体现的“母女两人的反凝视”、“男性角色的失语”以及“女性间的合作”三方面, 以期探究《瀑布》所体现的女性意识的觉醒。

关键词: 《瀑布》; 凝视理论; 女性电影

《瀑布》主要讲述了单身母亲罗品文在受疫情影响、经济下行的台北与女儿小静艰难生存的故事。正如电影的英文名“The Fall”所代表的含义不仅是瀑布, 还有下坠之意。在面临疫情爆发、减薪失业、女儿叛逆及前夫抛弃等多重困境下, 罗品文的中产阶级生活无限下坠, 精神状态持续崩坏, 最终患上思觉失调症。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变, 父亲的缺席让女儿小静一夕成长, 主动承担起照顾家庭和母亲的责任, 两人的关系也变得更加亲密。

作为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 劳拉·穆尔维 (Laura Mulvey) 首次提出了要创建一种代表和张扬女权政治的电影美学。她在《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 一文中对美国好莱坞经典电影中存在的“视觉快感”的生成机制予以解构, 并试图将女性从男性凝视中解放出来, 从而瓦解凝视背后暗含的父权体制。^[1]电影《瀑布》打破了传统的凝视关系, 运用反凝视的手法来表现女性对男权社会的反抗及颠覆。基于此, 本文从凝视的三个角度——“被观看者母女两人的反凝视”、“男性角色的边缘化与批判”以及“女性群体中姊妹友谊的体现”来分析影片中不可忽视的女性主义色彩。

一、多层凝视下母女两人的反凝视

在弗洛伊德及拉康精神分析的引导下, 穆尔维认为主流电影实际是为了满足男性视觉快感而设计的, 女性充当的是“他者”的角色, 是被阉割的, 不完整的、匮乏的。男性成为凝视的主体, 通过“看”这一行为, 遮蔽了女性身体所传达的象征威胁与阉割焦虑, 从而满足自己的欲望。^[2]而女性作为被动的观看者, 是凝视下的遵从者, 在传统男权中心下没有自己的话语权, 以至于多数电影将女性角色刻画成为了家庭忍辱负重、为了孩子操劳一生、有着母职光环的“好妻子”、“好母亲”的形象。^[3]影片中母亲的角色无疑是遭受各种凝视的, 这种凝视包含男权、社会规范、甚至是自我的凝视。故事开头的罗品文在工作上被期望塑造成光鲜亮丽的女强人的形象, 在家庭中则竭力扮演着贤妻良母的角色。然而在电影《瀑布》中, 导演特意避开谈论母亲是如何迎合男性凝视的, 而是通过揭露母职中存在的脆弱性, 直面母女两人的病态与伤痛, 展开她们因遭遇巨大压力而被生活击垮的艰难历程。承受着如此沉重的约束与凝视, 母亲的心灵被摧毁, 她在这一身份下遭受的无助与委屈成为一辈子都想逃离的噩梦与恐惧, 对女儿的控制和过度保护也让亲子关系不断恶化。由此可见, 影片深刻展现了母职的承担与反抗这一主题, 秉持反凝视的立场批判与反思社会中多层凝视对独立而自由的女性个体造成的影响。

穆尔维发现, 经典电影所提供的视觉快感主要来源于精神分析理论中的“窥淫癖”和“自恋”。一方面, “看”

作者简介: 荆婧 (1999—), 女, 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硕士, 青岛城市学院外国语学院英语教师。

本来就是快感的来源，而电影更是满足了人们的窥视欲望。由于电影放映厅环境的昏暗，观众变得匿名和不可见，他们因处于受压制地位，便将这种抑制的欲望投射给屏幕上的表演者；另一方面，基于本身的镜像理论，凝视可以被定义为自我和他者之间的镜映关系，是充满着欲望与幻象的。屏幕上演的故事构成了想象的母体，观看主体希望透过“看”来获得欲望的满足。^[4]这表明多数电影创作者在刻画女性角色时，通常在荧幕上展示其姣好的身材、温婉的性格、淑女的气质，目的是为了给男性观众提供欲望对象。而在电影《瀑布》中，对生病中母亲的刻画与传统女性角色大相径庭：不仅细致地呈现母亲对女儿脸上吐水的镜头，台词对白更是犀利严肃；而多次对母亲蓝光下病态的脸部特写制造出来的诡异恐怖的氛围，更是粗暴地破坏了男性观众对于女性的“窥淫”和“视觉欲望”，打破了女性角色在男性窥视下的被动处境，无疑是对男性凝视的反抗和颠覆。

穆尔维指出，屏幕上的叙事规则是以女性角色作为男性的景观、被拯救者，而男性作为观看者、保护者的角色为基础的，女性形象经过色情编码后成为男性的欲望对象，而观众代入男主角的角度成为自己在屏幕上的投射，进而实现了观影的视觉快感。^[5]然而，《瀑布》刻画的是母女二人从不睦到和解的救赎过程中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对凝视的蔑视与抗争，颠覆了父权电影中将女性角色设定为符合男性期待的“恋物对象”这一叙事结构。“瀑布”这一意象在影片中可以指代女性所处的社会困境，不论是丈夫的离开、母女关系的僵化，还是疫情之下的失业，这对母女始终处于在“瀑布”中央溺水的状态。然而，小静的独立与担责，母女两人的鼓舞与扶持，“被看”的缺席转变成两人“互看”的温情，最终让她们重新在社会上找到了定位。面对病情发作、沉浸在被监视和被迫害的妄想中的母亲，小静没有反驳她的臆想，而是运用“表演法”帮助母亲化解精神危机，让她不再恐惧。同样地，当母亲告诉小静客厅中有一条蛇时，小静没有表露出丝毫的怀疑态度，通过日常小事逐渐帮她重获自尊和自信。^[6]直到母亲的内心趋于平和和安定后，她脑海中瀑布的轰鸣声终于转变为潺潺的溪流声，对女儿也发出了“好好地跟你一起过下去”的宣言，象征了母女关系的修复不需要“他”的介入便可完成。而在影片最后，当女儿面临洪水冲击后成功被打捞上岸得以存活时，母女也亦透过电视屏幕实现了心与心的连接，逐步完成了相互观照的重建。毫无疑问，电影的创作者以对抗凝视的立场给超越凝视的主动者以美好的结局，进一步张扬了女性自由与解放，鼓励女性冲破社会规范，追求自我。

二、男性角色的失效与批判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凝视”是一种作为权力的观看。^[7]《瀑布》呈现的世界是男权的社会，充斥着被默认的、无处不在的男性权力。罗品文公司里公布减薪的领导是男性，在医院门口拦截小静健保卡的是男性，扰乱如萱脑海里的声音是男性，多次催缴单的物业管理者是男性，新闻里制定疫情决策的官员们也是男性，甚至连打断教学的女校管理者都是男性。受到传统道德伦理及社会规范的长期影响，男权观念已经稳固植根于女性心中。渗入日常的男性权力以规训的方式逐渐宰制女性，以至于长期处于男权空间里的女性遇到困难时首先会选择依附男性，即产生一种对“被看”的需求。影片开头中的罗品文沉湎于过去与丈夫恩爱的回忆，渴望前夫的回归，当与女儿产生代沟时第一时间也是去寻求他的帮助。然而，影片所刻画的男性角色全部是失效的、无能为力的，甚至是根本不关心母女的生存危机的。即使后来遇到了外在条件一般，却给予母女两人温暖、关怀和希望的卖场主任陈以文，他在叙事上更像是一个仅在形式上提供帮助的边缘化的“他者”，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母女两人的生活状况。同时，罗品文拒绝与他建立情感联结，也进一步表明她摆脱“被看”需求，独立完成自我认同的决心。

边沁（Bentham）设计的全景敞视监狱作为现代监狱的典范，其构造使得处于囚室的“被看”有了无处不在的外在束缚，而处于瞭望塔的“看”变成了隐匿和强有力的监视。福柯指出，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在现代社会无处不在，已经推广到学校、工厂、医院等诸多机构，监视与规训成为了权力的镜像和普遍的社会现象。^[8]罗品文在思觉失调中陷入屋外有“卫兵”的恐慌，幻想门口有“卫兵”在门口监视母女两人，实质上是女性在被限制的男权空间里没有安全感的证明。这里的“卫兵”，不仅是秩序与权力的象征，更是现代纪律社会的隐喻。在一个目光无处不在、监视如影随形的社会中，即便是在自己的房子里，也没有绝对的安全和隐私，每个人都必须服从规则去塑造自己的生活。然而，影片刻画了小静帮助母亲出门假装驱散“卫兵”，帮母亲打破父亲会回来的幻想，并在之后卖掉毫无安全感的房子，重新找到另一个不需要依靠男性而活的新住所，不单单标志着她们跨过层层生活的苦难，更暗示着母女两人对男性权力的拒绝与反抗。

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中，掌握着主动权和话语权的男性是“征服者、拯救者”。穆尔维指出，传统主流电影通常将荧幕上的男性塑造成“更完美、更主动、更有力量”的行动者甚至英雄的形象，从而满足男性观众透过凝视获得对荧幕上男性角色的自我想象和自我认同感。^[9]然而，在电影《瀑布》中，父亲这一角色作为父权的“具体化身”不仅没有拯救母女两人，反而被刻画成家庭的背叛者。婚内出轨的丈夫与罗品文离婚后，

抛妻弃女组建新家庭。他在影片中从头到尾都是一个“被召唤、被需要”的形象，从来没有主动出现过，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出现的频次也越来越低，出现的形式也由原来的人在画面到只有声音存在，而最后一次带有父亲的场景则是女儿对他的指责，这让观众无法代入传统的男性凝视视角来获得自我认同，无疑体现了创作者对男权中心主义的质疑和反击。除了在剧情方面表现出对男性人物构建的颠覆，影片中台词对话的安排亦透露出女性对父亲角色的直接批判，直击男权社会的核心。例如，饭桌上女儿仍记得过去父母吵架时从母亲口中学来的描述父亲的话语——只是一个提供精子的男人而已，暗含着母女两人对“丧偶式婚姻”的绝望与批判。又如女儿与父亲告别时的控诉：“为什么我要去承受你们的烂婚姻？为什么我要去承受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妈妈...为什么是我？”这一段女儿对父亲爆发式的不满与反抗直接展现了影片中女性角色对父权制度的挑战。由此可见，不论是人物的刻画还是剧情的安排，父亲的形象始终是“被动的、失效的、被批判的”，这毫无疑问是对传统影视中男性凝视的颠覆。

三、女性团结互助下的温暖与力量

穆尔维将凝视背后的性别权力分为三个层面：首先，电影里剧情层面上女性永远等待被拯救，而影像层面上女性是男性凝视和观看的对象；其次，拍摄过程中，男性摄影师凝视女演员；同时，在观影过程中，观众认同男性角色行动和目光，借助对男性角色的认同感来凝视女性角色。以往父权思想主导下的电影并没有赋予女性自主性的地位，女性演员会以受到父权式期待的方式来展现自己，而当观众和剧中男性角色的目光合二为一时，女性就真正地沦为了满足男性欲望的对象。^[4]然而，作为一部聚焦女性的电影，《瀑布》中对男性的刻画较少，无论是罗品文公司的领导、前夫、还是卖场陈主任，所有男性形象的描述都是浅尝辄止，整体上处于附属地位。而当母女两人遇到困难时，也并非出现像传统主流电影中英雄叙事情节那样“英雄救美”的场景，男性角色“拯救者”的形象反而得到了淡化。相对地，支撑故事发展的始终是女性群体，是作为施救者的女性角色间的守望相助化解了困境。除了小静外，帮佣阿姨、病友如萱、女医师、卖场女性同事、女性职员的出现也在母女两人突破重围中发挥了重要力量。这样一种女性联结的展示，意味着女性意识到自身的力量，不再等待被男性角色“拯救”，是一种自我意识和女性主体意识崛起的表现。^[10]

穆尔维表示，在影像层面上观影男性会借助男性角色的目光实现对女性角色欲望的凝视，尤其是观看女性的身体部位。^[4]然而在电影《瀑布》中，不仅没有出现任何对女性身体部位特写的凝视，反而多次展现女性情谊的对话、注视与场景。影片中当帮佣阿姨看到原本好好的一个家变得破碎不堪时，尽管几个月的薪水拿不到，仍尽心尽力照料火灾后的家。母亲住院时，她主动帮忙照顾小静，并表示自己不是为了要钱，而是十几年感情促使她这样做，女性友谊在此刻熠熠生辉。如萱是罗品文住院时认识的病友，她们以那副挂在医院走廊里倾斜的赛马画为契机展开沟通，彼此之间产生了同病相怜的深厚情谊。如萱对名画的介绍、夜半歌声，甚至出院时对自己幻听痊愈后的描述都给予了罗品文心灵上的极大安慰与鼓励，开导她勇于接受未来的不确定性，寻求生命潜在的丰富意义。^[11]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如萱是罗品文精神上的影子，是她生命力的另一面。这种通过与其他女性维持良好关系来抚慰自己心灵创伤的情节安排有利于女性观影者对角色产生代入感与认同感，进一步体现了女性凝视，无疑是对满足传统男性凝视观感的挑战。

传统父权电影中的女性之间大多数是为迎合男性凝视而建立的敌对关系，鉴于影片内和观看中都有着对女性的凝视和占有欲，穆尔维指出，女性形象是化解这一矛盾的关键点。^[4]在影片《瀑布》中，无论是医院里给予女儿建议的女医师，破例让女儿查询母亲存贷款的女性职员，还是大卖场里友善的女性同事们都表露出一股女力团结、姐妹情谊（sisterhood）。尤其是母亲在大卖场的新工作，更像是乌托邦般的存在。在这里，亲密的姐妹一同挽手购物，一起工作的女性同事更像个大家庭，主动邀请罗品文一同吃便当，带她融入集体。影片中每一个女性角色都是不同的个体，她们或善良感性，或坚强隐忍，每一个切面都展现着光芒四射的女性力量。如果没有女性角色主动伸出援手，母女两人可能会永远被“隔离”在巨大的蓝色防水层中。而当女性团结一致、积极合作、互相观看时，^[12]便跳出了经典男权话语的桎梏，削弱了男性的主体力量，实现了女性话语表达。女人如水，能润泽万物，亦可滴水穿石。因此，从这一角度看，电影中的“瀑布”意象又可以指代如水般的女性精神。姐妹情谊的塑造，其实就是在向男权社会挑战。^[13]导演借母女间的隔离和困境，强调了女性之间互帮互助的团结与力量，褒奖了坚韧向上的生活态度，进一步鼓励女性打破凝视，寻找自我意识。

四、结语

作为新时代的女性电影，《瀑布》展现了疫情之下母女两人的生存困境，揭示了在井然有序的日常下潜伏已久的迷失。影片中有意无形的“瀑布”不单暗示着母女两人物性生活的堕落、阶级的下坠、秩序的打破，

又可以指人物间情感的汇融、女性力量的闪亮。本文以穆尔维的凝视理论为理论支撑, 探寻《瀑布》所体现的女性主义: 母女两人没有被男权社会中的凝视所捆绑, 最后实现了自我的解放与救赎; 电影中的男性并不符合男性幻想的“英雄”角色, 反而是“无效的、被动的、被边缘化的”; 而电影流露出女性在困难面前的团结合作与姊妹情谊, 相对于处于失语状态的男性, 无疑是对女性自我意识的展现。总的来说, 电影《瀑布》将镜头聚焦于疫情之下母女关系的修复与重建, 深刻探讨了女性如何运用反凝视来表达女性话语, 以及如何通过“互看”实现自身主体的建构, 为当今社会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反抗传递了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 克里斯蒂安·麦茨, 吉尔·德勒兹, 吴琼. 凝视的快感——电影文本的精神分析[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 [2] 朱晓兰. “凝视”理论研究[D]. 南京: 南京大学, 2011.
- [3] 皮尔丹. “凝视”与“反凝视”: 女性电影的美学特征辨析——以《弗里达》《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为例[J]. 视听, 2021, (07): 63-64.
- [4] Mulvey L. 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M] // HARRISON C, WOOD P. Art in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1992.
- [5] 李恒基, 杨远婴. 外国电影理论文选[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6: 645.
- [6] 王帅. 荣格分析心理学视野下的电影《瀑布》[J]. 东南传播, 2022, (08): 28-30.
- [7]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M]. 刘北成, 杨远婴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7.
- [8] Foucault, M. Panopticism. In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Prison [M]. New York: Vintage, 1995: 195-228.
- [9] 蔡圣勤, 何马楠. 电影《乱世佳人》凝视理论三个层次分析[J]. 太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0 (03): 94-100.
- [10] Brenda Cooper. “Chick Flicks” as Feminist Texts: The Appropriation of the Male Gaze in *Thelma & Louise*[J]. Women's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2005(3) : 277-306.
- [11] 李心雅. 钟孟宏电影《瀑布》中的“围困”与“突破”[J]. 东南传播, 2023, (01): 70-73.
- [12] 高欢欢, 戴静如. 《瀑布》中的母女关系与“被看”行为缺席[J]. 新乡学院学报, 2023, 40 (08): 30-35.
- [13] Man, G. Gender, genre, and myth in *Thelma and Louise*[J]. Film Criticism, 1993(36): 36-53.

Gazing and Counter-gazing: A Case Study of the Female Film *The Falls* in the New Era

JING JING

Qingdao City University, Qingdao,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more and more female images with distinct female consciousness are presented in Taiwan region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in the 21st century. As The first female film directed by Chung Mong-Hong since *The Sun*, *The Falls*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ther and daughter in ordinary fami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s affected by the epidemic, showing the rise of female autonomy, and can be called a female film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Mulvey's Male Gaze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ree aspects of the film: "mother-daughter counter-gaze", "muted male characters" and "female cooperation", with a view to exploring the awakening of female consciousness embodied in *The Falls*.

Keywords: *The Falls*; Male Gaze Theory; Female films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3.708

课程思政背景下高等数学教学模式的建设探索

何永明¹ 于晟伟^{1*} 付亚坤¹ 赵赫¹

(¹ 中国消防救援学院, 北京 北京 102202)

摘要: 本文探讨了课程思政背景下高等数学教学模式的建设路径, 阐述了课程思政的理论基础与现实意义, 强调其在落实立德树人任务中的重要性, 并从教师能力提升、课程思政元素挖掘、教学模式创新及课间交流等方面展开研究, 提出教师需提升思想政治素养与课程思政意识。通过案例教学法、问题导向法、情境教学法等融入思政元素, 同时通过创新教学模式, 如基于问题导向、情境教学、项目驱动等模式, 提升学生参与度与价值引领效果。最后, 通过评价与反思优化教学, 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持。

关键词: 课程思政; 高等数学; 教学模式; 教师能力; 价值引领

一、引言

在新时代背景下,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为新时代高校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 明确提出“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重要要求^[1]。课程思政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课程教学深度融合的创新模式, 已成为全国高校研究的热点。课程思政不仅仅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延伸, 更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它强调在专业课程教学中, 不仅要传授知识和技能, 还要注重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在这一背景下, 高等数学作为高校理工科学生的基础课程, 具有重要的育人功能。高等数学课程不仅为学生提供了数学知识和思维方法, 还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然而, 如何在高等数学教学中有效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元素, 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 是当前高校数学教育工作者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将从教师能力提升、课程思政元素挖掘、教学模式创新以及课间交流等方面, 探讨课程思政背景下高等数学教学模式的建设路径。

二、课程思政的理论基础与现实意义

(一) 课程思政的理论基础

课程思政的理论基础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思想政治教育学以及教育心理学等多学科理论。马克思主义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注重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课程思政正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 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专业课程教学之中, 实现知识教育与思想教育的有机结合。同时, 思想政治教育学中的隐性教育理论也为课程思政提供了重要支撑。隐性教育强调通过非强制性、非显性的方式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课程思政正是通过专业课程教学这一隐性渠道, 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思想和行为。

(二) 课程思政的现实意义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高校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课程思政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 能够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

作者简介: 何永明 (1978—), 男, 江西南昌人, 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副教授。

于晟伟 (1995—), 男, 吉林长春人, 中国消防救援学院讲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研究生。

付亚坤 (1981—), 女, 湖北襄阳人, 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副教授。

赵赫 (1997—), 男, 北京人, 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助教, 首都师范大学研究生。

实现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有力保障。

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有效途径。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集中在思政课程中，而课程思政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专业课程教学中，拓宽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渠道和载体。通过专业课程教学这一重要平台，能够更好地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生的专业学习相结合，使学生在专业知识的学习中，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为了解决传统数学课程和思政课程各自独立开展教学、难以形成教学合力的实践难题，运用课程创新与改革的观点，提出实现数学课程与思政课程融合实践教学的具体实施路径^[3]。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举措。课程思政不仅关注学生的知识和技能培养，还注重学生的思想品德、价值观念和综合素质的提升。通过在专业课程教学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能够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三、加强教师的课程思政能力建设

教师是课程思政建设的核心力量，其能力和素质直接影响课程思政的实施效果。因此，加强教师的课程思政能力建设是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关键。

（一）提升教师的思想政治素养

教师的思想政治素养是课程思政建设的基础。教师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教育教学全过程。要推动思政课程改革创新，在改进中加强、在创新中提高，不断增强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坚持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坚持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坚持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坚持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坚持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只有打好组合拳，才能讲好思政课，但无论组合拳怎么打，最终要落到把思政课讲得更具亲和力和感染力、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上来，实现知、情、意、行的统一，叫人口服心服，自觉用高尚的人格感染学生，用真理的力量感召学生，以深厚的理论功底培树学生^[4]。

（二）增强教师的课程思政意识

课程思政意识是教师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专业课程教学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教师要充分认识到课程思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将课程思政作为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主动承担起课程思政的责任。高等数学是教育的基础课程，也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如何在高等数学教学中贯彻课程思政理念，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知识教育的有机融合，是当前教师面临的重要课题^[5]。教师要转变教育观念，从传统的知识传授者向思想政治教育者转变，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

（三）提高教师的课程思政能力

课程思政能力是教师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融入专业课程教学的能力。教师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知识，能够深入挖掘专业课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将其自然融入到课堂教学中。教师要通过参加思政专题培训、研读经典思政教材等方式，提升自己的思政理论水平。同时，要组织思政课的专职教师与其他专业课的教师保持互动，定期采取座谈等形式，将课程实施过程中的重点与难点问题进行沟通讨论，提出应对措施。开展“一对一”的互助小组活动，针对课程践行过程中的经验与不足进行交流，取长补短。

（四）开展教师课程思政培训

教师课程思政培训是提升教师课程思政能力的重要途径。高校应定期组织教师参加课程思政培训，邀请思想政治教育专家、课程思政教学名师等进行专题讲座和培训，帮助教师掌握课程思政的理论知识 and 教学方法。同时，高校应鼓励教师参加课程思政教学竞赛、教学研讨等活动，通过实践锻炼提升教师的课程思政能力。

四、精心挖掘课程思政元素

高等数学课程作为高校理工科学生的基础课程，具有重要的育人功能。在高等数学教学中，教师需要精心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将其自然融入到课堂教学中，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

（一）高等数学课程的特点与思政元素挖掘

高等数学课程共 12 章，通篇围绕函数进行学习，涉及到函数与极限、导数及其应用、微分中值定理、不定积分、定积分、定积分的应用、微分方程、向量代数与空间解析几何、多元函数微分法及其应用、重积分、曲线积分与曲面积分、无穷级数等内容^[6]。这些内容不仅蕴含着丰富的数学知识和思维方法，还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数学家的探索精神。在高等数学的发展过程中，众多数学家通过不懈的努力和探索，推动了数学的发展。例如，在讲解函数的极限时，可以引入数学家柯西、魏尔斯特拉斯等在极限理论方面的贡献^[7]，强调他们在探索极限过程中所体现的严谨态度和科学精神。这种精神正是课程思政的重要元素之一，能够引导学生树立严谨的学术态度和科学精神。

数学知识的应用价值。高等数学不仅是理论知识，还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在讲解微积分时，可以引入微积分在物理学、工程学、经济学等领域的应用案例^[7]，强调科学知识在实际中的应用价值。例如，通过讲解牛顿和莱布尼茨在微积分方面的贡献^[8]，引导学生认识到数学知识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责任感。

数学家的爱国情怀。在高等数学的发展过程中，许多中国数学家为国家的数学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华罗庚在数学领域的杰出成就不仅为我国数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还体现了他的爱国情怀^[9]。在讲解高等数学时，可以引入华罗庚的爱国事迹，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增强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怀。

（二）课程思政元素挖掘的原则

贴近知识点原则。课程思政元素不能偏离知识点太远。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选取与知识点直接相关的思政元素，避免牵强附会。例如，在讲解函数的极限时，可以引入数学家在探索极限过程中所体现的严谨态度和科学精神，而不是强行引入与数学无关的热门时事。贴近知识点的思政元素能够使学生更容易接受，避免产生教师在课堂上拉东扯西的感觉。

适度原则。课程思政元素的选取必须合适，不能太“重”或太“高”。数学中的某个知识点所能承载的课程思政元素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或任意承载的。教师在选取思政元素时，应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和接受能力，选择适合的思政元素。例如，在讲解微积分时，可以引入数学家牛顿和莱布尼茨的故事，强调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对科学的执着追求，而不是引入过于复杂的政治或哲学理论。

融入性原则。课程思政元素的选取必须考虑课堂融入的问题。教师在选取思政元素时，应考虑其是否适合在本课程中融入，是否适合在这个知识点融入，是否适合在课间融入。例如，在讲解微分方程时，可以引入科学家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应用微分方程的案例，强调科学知识在实际中的应用价值，而不是强行插入与数学无关的思政内容。融入性原则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将思政元素自然地融入到课堂教学中，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

五、结合高等数学课程特点合理融入课程思政

要实现课程思政“润物细无声”“溶盐于水”般的自然恰当地融入^[10]，教师需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所教授的课程非常熟练，能够达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水平；二是对所引入的课程思政元素要充分了解，不可一知半解。然而，解决了以上问题还不够，因为一个高水平的、知识渊博的数学老师不一定就能讲好课程思政。课程思政的融入还需要教师具备较高的教学艺术和教育智慧。

（一）融入的时机与方式

应景融入。课程思政元素的融入要应景，即在教学过程中，当讲到某个知识点时，自然地引入相关的思政元素。例如，在讲解定积分的应用时，可以引入工程领域中定积分的实际应用案例，同时结合工程师们在工作中所体现的敬业精神和责任意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应景融入能够使思政元素的引入更加自然，避免生硬的说教。

自然过渡。课程思政元素的融入需要自然过渡，避免突兀。教师在引入思政元素时，应使用合适的过渡语句，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例如，在讲解完一个数学公式后，可以自然地引入与之相关的思政元素：“同学们，刚才我们学习了这个公式，它不仅在数学领域有着重要的应用，也体现了数学家们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探索精神，这种精神在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中同样重要。”通过这样的过渡语句，使课程思政元素的融入更加自然流畅。

适可而止。课程思政元素的融入要适可而止,不能滔滔不绝,停不下来。否则,就会把课程思政变成思政课程,效果欠佳不算,还耽误了数学课程的原计划教学任务。例如,在讲解多元函数微分法时,可以简要介绍数学家在这一领域的贡献,强调他们的创新精神,但不能过多展开,以免影响数学知识的讲解。

(二) 融入的方法与技巧

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是将思政元素融入高等数学教学的有效方法之一^[11]。教师可以通过引入与知识点相关的实际案例,引导学生分析和讨论,从而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例如,在讲解微积分时,可以引入微积分在物理学、工程学、经济学等领域的应用案例,强调科学知识在实际中的应用价值,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和价值观。

问题导向法。问题导向法是通过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从而实现课程思政的融入^[12]。教师可以在讲解知识点的过程中,提出与思政元素相关的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例如,在讲解函数的极限时,可以提出“数学家在探索极限过程中所体现的严谨态度和科学精神对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有什么启示?”等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从而实现课程思政的融入。

情境教学法。情境教学法是通过创设情境,引导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和体验,从而实现课程思政的融入^[13]。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技术、现场教学等方式,创设与知识点相关的实际情境,引导学生感受和体验。例如,在讲解微分方程时,可以创设科学家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应用微分方程的情境,引导学生感受科学知识在实际中的应用价值,从而实现课程思政的融入。

六、把课间与学生的沟通交流作为课程思政的重要部分

课程思政不仅局限于课堂教学,课间与学生的沟通交流也是课程思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学院课程一般都是两节连排,两节课中间有10分钟的休息时间。这10分钟的时间是教师与学生进行沟通交流的重要时机。在这10分钟时间里,教师可以与学生交流探讨课堂上刚刚学习的知识点,传授学习数学的经验方法,分享曾经的基层部队任职经历,告诫学生在学习生活中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一) 课间交流的内容与形式

学习指导。教师可以在课间与学生交流探讨课堂上刚刚学习的知识点,解答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疑问,传授学习数学的经验方法。例如,教师可以分享自己学习数学时的经验和技巧,帮助学生克服学习困难,提高学习效果。

思想引导。教师可以在课间与学生分享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感悟,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例如,教师可以分享自己在基层部队任职时的经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心理疏导。教师可以在课间与学生进行心理疏导,帮助学生解决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例如,教师可以针对学生对高等数学学习的畏难情绪、对消防救援专业前景的悲观情绪等进行心理疏导,帮助学生树立信心,增强学生的心理素质。

(二) 课间交流的策略与技巧

积极倾听。教师在课间与学生交流时,要积极倾听学生的想法和意见,尊重学生的个性和差异。通过倾听,教师可以更好地了解学生的需求和困惑,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指导和帮助。

正面引导。教师在课间与学生交流时,要注重正面引导,避免批评和指责。教师可以通过表扬学生的优势和长处,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从而更好地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情感共鸣。教师在课间与学生交流时,要注重情感共鸣,与学生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教师可以通过分享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感悟,与学生建立情感共鸣,从而更好地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七、课程思政背景下高等数学教学模式的创新实践

(一) 教学模式创新的理论基础

课程思政背景下高等数学教学模式的创新实践需要以现代教育理论为基础。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认为学生通过与环境的互动,主动构建知识体系。在课程思政背景下,教师可以通过创设情境、问题导向等方式,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学习,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同时,人本主义教育理论强调教育要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注重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培养。在高等

数学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课间交流、心理疏导等方式,关注学生的情感需求,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 教学模式创新的实践路径

基于问题导向的教学模式。基于问题导向的教学模式是通过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学习,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在高等数学教学中,教师可以在讲解知识点的过程中,提出与思政元素相关的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例如,在讲解函数的极限时,可以提出“数学家在探索极限过程中所体现的严谨态度和科学精神对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有什么启示?”等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从而实现课程思政的融入。

基于情境教学的教学模式。基于情境教学的教学模式是通过创设情境,引导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和体验,从而实现课程思政的融入。在高等数学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技术、现场教学等方式,创设与知识点相关的实际情境,引导学生感受和体验。例如,在讲解微分方程时,可以创设科学家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应用微分方程的情境,引导学生感受科学知识在实际中的应用价值,从而实现课程思政的融入。

基于项目驱动的教学模式。基于项目驱动的教学模式是通过设计和实施项目,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和应用知识,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在高等数学教学中,教师可以设计与知识点相关的实际项目,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和应用数学知识。例如,在讲解多元函数微分法时,可以设计一个实际的工程优化项目,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和应用多元函数微分法,同时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和价值观。

(三) 教学模式创新的案例分析

基于问题导向的教学模式案例。在讲解函数的极限时,教师可以提出“数学家在探索极限过程中所体现的严谨态度和科学精神对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有什么启示?”等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通过问题导向的方式,学生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函数的极限这一知识点,还能够从中体会到数学家的严谨态度和科学精神,从而实现课程思政的融入。

基于情境教学的教学模式案例。在讲解微分方程时,教师可以创设科学家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应用微分方程的情境,引导学生感受科学知识在实际中的应用价值。通过情境教学的方式,学生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微分方程这一知识点,还能够从中体会到科学知识在实际中的应用价值,从而实现课程思政的融入。

基于项目驱动的教学模式案例。在讲解多元函数微分法时,教师可以设计一个实际的工程优化项目,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和应用多元函数微分法。通过项目驱动的方式,学生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多元函数微分法这一知识点,还能够从中体会到科学知识在实际中的应用价值,从而实现课程思政的融入。

八、课程思政背景下高等数学教学模式的评价与反思

(一) 教学模式的评价指标

课程思政背景下高等数学教学模式的评价指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知识传授效果。评价学生对高等数学知识点的掌握程度,包括对函数与极限、导数及其应用、微分中值定理、不定积分、定积分、定积分的应用、微分方程、向量代数与空间解析几何、多元函数微分法及其应用、重积分、曲线积分与曲面积分、无穷级数等内容的理解和应用能力。

价值引领效果。评价学生在课程思政元素的引导下,是否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职业观,是否增强了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学生参与度。评价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参与度,包括课堂讨论的活跃度、项目实施的参与度等。

教师教学能力。评价教师在课程思政背景下的教学能力,包括教师对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能力、融入能力、教学艺术等。

(二) 教学模式的反思与改进

反思教学过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反思教学过程中的不足之处,及时调整教学策略。例如,在引入思政元素时,是否做到了自然流畅,是否做到了适可而止;在课堂教学中,是否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改进教学方法。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例如,可以尝试多种教学方法的结合,如问题导向法、情境教学法、项目驱动法等,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学习效果。

加强教师培训。高校应加强教师的课程思政培训,提升教师的课程思政能力。例如,可以定期组织教师参加课程思政培训、教学研讨等活动,帮助教师掌握课程思政的理论和教学方法。

九、结论

课程思政背景下高等数学教学模式的建设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通过加强教师的课程思政能力建设、精心挖掘课程思政元素、结合高等数学课程特点合理融入课程思政以及充分利用课间与学生的沟通交流,能够有效提升高等数学课程的育人效果。同时,通过创新教学模式、优化教学方法、加强教师培训等措施,能够进一步提高课程思政的实施效果。在未来的研究中,还需要进一步探索课程思政背景下高等数学教学模式的创新路径,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更多的理论和实践支持。

参考文献:

- [1]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12 月 7 日至 8 日在北京召[N]. 北京: 新华社, 2016.
- [2]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N]. 北京: 人民日报, 2025.
- [3]王师,陈丽米,李晓岩. 职业本科数学课程思政融合实践教学研究[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2025, 38(04): 117-119.
- [4]建设教育强国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N]. 北京: 人民日报, 2024.
- [5]周佳燕. 基于课程思政理念的高职高等数学教学改革探索[J]. 大学, 2025, 3: 101-104.
- [6]同济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高等数学第八版(上、下册)[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3.
- [7]史蒂夫·斯托加茨(美). 《微积分的力量》[M].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2021.
- [8]卡尔·B·波耶(美). 《微积分概念发展史》[M].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 [9]《数学之神华罗庚》[N]. 中国网络电视台, 2013.
- [10]深聚焦 融合创新, 让课程思政润物无声[N]. 河北日报, 2023.
- [11]高等数学在化工类专业中的课程思政案例挖掘与分析[J]. 广州化工, 2023.
- [12]赵文德、阚雅玲. 基于“问题导向, 工具驱动”的课程思政改革与实践研究[J]. 现代商贸工业, 2025, 3: 189-191.
- [13]沈文青. 情境教学法融入课程思政的实践与探索[J]. 现代商贸工业, 2025, 2: 225-227.

Explor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er Mathematics Teaching Mod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urse Ideology and Politics

He Yongming¹, Yu Chengwei^{1*}, Fu Yakun¹, Zhao He¹

¹ China Fire and Rescue Institute, Beijing 102202,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higher mathematics teaching mod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pounds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mphasizes its importance in implementing the task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talents, and conducts research from the aspects of teacher ability improvement,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 mining, teaching mode innovation, and inter class communication. It proposes that teachers need to enhance thei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iteracy and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wareness. By incorpo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through case-based teaching, problem oriented teaching, situational teaching, and innovative teaching models such as problem-based teaching, situational teaching, and project driven teaching, we aim to enhance student participation and value orientation. Finally, by evaluating and reflecting on the optimization of teaching,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upport is provided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Keywords: Course Ideology and Politics; Advanced mathematics; Teaching mode; Teacher's ability; Value driven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3.710

高等数学教学中一致连续性的育人作用和判定定理

于晟伟¹ 赵赫^{1*} 何永明¹ 王洪庆¹ 宋云涛¹

(¹ 中国消防救援学院, 北京 北京 102202)

摘要: 一致连续性证明是高等数学教学的关键难点, 学生常因其抽象与逻辑复杂性而理解不深。本文创新性地提出一种简明证明方法, 系统探讨函数导数性质与一致连续性及其非一致连续性的内在联系, 并总结为一系列定理。深入剖析一致连续性与非一致连续性定义, 明确二者在函数行为上的本质差异。分析函数导数的有界性、单调性等关键性质, 揭示其对函数一致连续性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 总结出一套将导数性质与一致连续性判断直接关联的定理体系, 为学生提供清晰、系统的判断工具。为增强学生对理论的理解与应用能力, 本文引入丰富实例。通过具体函数的分析与证明, 直观展示如何借助导数性质判断一致连续性, 使学生能够将抽象理论与实际问题相结合。教学实践表明, 这种方法显著提升了学生的学习效果。课堂反馈显示, 学生对一致连续性的理解更加深入, 证明准确性提高, 解决相关问题时的自信心和兴趣也有所提升。本研究为高等数学教学提供新思路, 有助于增强学生对抽象数学概念的理解与应用能力, 推动高等数学教学质量的提升。

关键词: 一致连续性证明; 高等数学教学; 导数性质; 教学实践

一、引言

一致连续性是数学分析中的核心概念, 在高等数学教学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对于理解函数的诸多性质起着关键作用, 也是众多高级数学理论构建和应用的重要基石。然而, 一致连续性证明的抽象性和逻辑复杂性, 使其成为教学中的难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常常感到困惑, 难以将函数的局部性质与整体行为有效联系起来,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相关数学概念的深入理解和全面掌握。

回顾历史, 函数连续性的概念最初源于几何直观, 其逐渐严格化的过程与数学分析学科的发展紧密相连, 相互促进。1817 年, 数学家波尔查诺率先运用代数语言对连续性进行了精准定义, 开启了严格化先河^[1,2]。1823 年, 柯西借助“无穷小”概念描绘连续性, 但未明确区分逐点性质与整体性质。直到 19 世纪中叶, 魏尔斯特拉斯引入更精确的语言, 将连续性从动态几何描述转化为静态分析定义, 标志着现代连续性理论的正式确立^[3,4]。沿着这一脉络, 一致连续性概念于 1872 年由海涅和康托尔共同提出, 强调函数在整个区间上的全局性质, 并通过海涅-康托尔定理, 揭示了闭区间上连续函数与一致连续函数的内在联系^[5]。

在应用和验证方面, 依据一致连续的明确定义检验是最基础且普遍的方法^[6]。康托尔定理指出, 闭区间上的连续函数必具有一致连续性, 这是判断有限区间上函数一致连续性的关键理论工具^[7-9]。对于无穷区间上的函数, 若其在无穷远处存在有限极限或呈现特定渐近行为模式, 则可判定其具有一致连续性^[10]。此外, 一致连续函数在进行线性组合、有界乘积及复合运算等操作时, 在一定条件下仍能保持一致连续特性。幂

作者简介: 于晟伟 (1995—), 男, 吉林长春人, 中国消防救援学院讲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研究生。

赵赫 (1998—), 男, 北京人, 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助教, 首都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何永明 (1978—), 男, 江西南昌人, 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副教授。

王洪庆 (1977—), 男, 黑龙江双鸭山人, 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副教授。

宋云涛 (1982—), 男, 云南昆明人, 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副教授。

函数、指数函数等基本初等函数的一致连续性问题也已得到广泛深入研究^[11]。

然而，一致连续性的抽象性依然使其成为数学分析教学中的难点^[12,13]。研究表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易混淆连续与一致连续概念，尤其在处理无穷区间上函数时，这种误解更为常见^[14]。对于二元函数的一致连续性判定，虽可通过坐标分解或一致收敛性等方法进行，但学生理解和掌握这些方法仍有一定难度^[15,16]。在泛函分析领域，一致连续性与算子有界性、紧性等概念紧密关联，为复杂空间性质研究提供理论基础。教学实践中可借助动态几何软件模拟一致连续性的几何意义，帮助学生直观理解这一抽象概念^[17]。

尽管前人在一致连续性教学领域已取得研究成果，为本论文奠定基础，但学生在理解和应用一致连续性证明时仍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因此，本研究致力于提出一种创新性简明证明方法，通过深入剖析函数导数性质与一致连续性的内在联系，为学生搭建从抽象理论到实际应用的桥梁，提供更直观、系统的理解途径。本研究的核心创新点在于深入剖析一致连续性和非一致连续性定义，揭示两者在函数行为表现上的本质差异。通过分析函数导数的有界性、单调性等关键性质，揭示这些性质对函数一致连续性的直接影响。在此基础上，总结归纳出一套系统定理，将函数导数性质与一致连续性判断直接关联，为学生提供条理清晰、操作性强的判断工具。在实际教学中，这种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得到验证。通过丰富实例展示如何借助函数导数性质判断一致连续性，帮助学生将抽象理论与实际问题结合。教学实践结果表明，这种方法显著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课堂反馈显示，学生对一致连续性的理解更深入透彻，把握核心要义更准确；相关证明的准确性提高，错误率降低；在解决复杂问题时，学生的自信心和学习兴趣大幅提升。本研究不仅为高等数学教学提供新思路，改善抽象数学概念的教学效果，而且增强学生对一致连续性概念的理解与应用能力，培养他们的数学思维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高等数学课程在育人方面具有多方面重要作用。它能够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和抽象思维能力，通过学习各种概念、定理和证明方法，学生能够锻炼思维能力，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思维训练对于学生在学习其他学科领域以及未来的职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高等数学课程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激发他们的创新意识和创造力。高等数学课程能够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严谨态度，这种严谨的学术态度和科学精神对于学生在学习任何领域的学习和研究都是必不可少的。最后，高等数学课程对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升也有积极作用，它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和数学应用能力，还能增强他们的数学文化素养。从宏观层面看，本研究有助于推动高等数学教学质量的整体提升，为培养高素质数学人才贡献力量。

前人在一致连续性教学领域的研究为本论文提供了坚实基础。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一致连续性概念的深入探讨，包括其定义、性质和与其他连续性概念的区别；对一致连续性证明方法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常用的证明技巧和策略；对一致连续性教学方法的探索，尝试通过不同的教学手段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这一概念。这些研究成果为本论文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使我们能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二、一致连续性的育人作用

（一）培养逻辑思维和抽象思维能力

一致连续性涉及复杂的数学定义和定理证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需要理解其严格的定义，掌握相关的判定方法和证明技巧。这有助于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使他们能够更加严谨地思考问题，并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在证明一个函数在某个区间上一致连续时，学生需要根据定义，运用恰当的方法和步骤进行推导，这有助于锻炼他们的逻辑思维和推理能力。一致连续性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它要求学生能够从具体的函数和区间中抽象出一般的性质和规律。通过学习一致连续性，学生可以培养自己的抽象思维能力，学会从特殊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的思考方式，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数学中的其他抽象概念。

（二）提升数学素养和应用能力

对一致连续性的深入理解有助于学生形成良好的数学素养，使他们对数学的本质和内涵有更深刻的认识。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数学的严谨性、精确性和逻辑性，从而在学习和研究中更加注重数学思想和方法的运用。一致连续性在数学分析和其他相关学科中有广泛的应用。掌握一致连续性的概念和相关理论，可

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例如，在微分方程、泛函分析等领域，一致连续性常常被用来研究函数和算子的性质，为解决复杂问题提供理论基础。

（三）培养科学精神和严谨态度

数学是一门严谨的学科，一致连续性的学习要求学生严格遵循数学的逻辑和规则，注重每一个细节和条件。这种严谨的学术态度和科学精神对于学生在任何领域的学习和研究都是必不可少的，有助于培养他们实事求是、严谨认真的科学精神。在学习一致连续性的过程中，学生会遇到各种复杂的问题和挑战，需要通过不断地思考、尝试和解决来克服困难。这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耐心和毅力，提高他们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使他们在面对困难时能够坚持不懈地寻找解决方案。

（四）增强创新意识和综合能力

在研究一致连续性相关问题时，学生需要运用创新性的思考和方法来解决尚未被完全理解和解决的问题。这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力，鼓励他们突破传统的思维模式，探索新的思路和方法。学习一致连续性不仅需要扎实的数学基础，还需要学生具备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需要将所学的数学分析知识与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相结合，从而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为未来的学习和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预备知识

在正式演示本文的主要结果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对一致连续性的相关定义和引理进行简要回顾，以便为后续的讨论奠定基础。首先，让我们重温一致连续性的精确定义，这是理解后续内容的关键所在。

定义 1 (文献[18]中 113 页定理 3.4.1) 设函数 $f(x)$ 在区间 X 上定义，若对于任意给定的 $\varepsilon > 0$ ，存在 $\delta > 0$ ，只要 $x, x' \in X$ 满足 $|x - x'| < \delta$ ，就成立 $|f(x) - f(x')| < \varepsilon$ ，则称函数 $f(x)$ 在区间 X 上一致连续。

四、函数一致连续性的判别法

下面我们给出函数一致连续的简明判定定理。

定理 1 设函数 $f(x)$ 在区间 X 上定义且可导，若导数 $f'(x)$ 在区间 X 上有界，则函数 $f(x)$ 在区间 X 上一致连续。

证明：由定义 1，函数 $f(x)$ 在区间 X 上一致连续等价于：

若对于任意给定的 $\varepsilon > 0$ ，存在 $\delta > 0$ ，只要 $x, x' \in X$ 满足 $|x - x'| < \delta$ ，就成立 $|f(x) - f(x')| < \varepsilon$ 。

因为函数 $f(x)$ 在区间 X 上可导且导数有界，不妨设 $|f'(x)| \leq M$ ，所以由导数定义有

$$|f'(x)| = \lim_{x' \rightarrow x} \frac{|f(x') - f(x)|}{|x' - x|} \leq M,$$

即 $|f(x') - f(x)| \leq (M + \varepsilon) |x' - x| < (M + \varepsilon) \delta$ ，取 $\delta = \varepsilon / (M + \varepsilon)$ 有 $|f(x') - f(x)| < (M + \varepsilon) \delta = \varepsilon$ ，得证。

定理 2 设函数 $f(x)$ 在区间 X 上连续且存在左右导数，若左右导数 $f'_+(x), f'_-(x)$ 在区间 X 上有界，则函数 $f(x)$ 在区间 X 上一致连续。

证明：由定义 1，函数 $f(x)$ 在区间 X 上一致连续等价于：

若对于任意给定的 $\varepsilon > 0$ ，存在 $\delta > 0$ ，只要 $x, x' \in X$ 满足 $|x - x'| < \delta$ ，就成立 $|f(x) - f(x')| < \varepsilon$ 。

因函数 $f(x)$ 在区间 X 上存在左右导数且左右导数有界, 不妨设 $|f'_+(x)| \leq M, |f'_-(x)| \leq M$, 由左右导数定义有

$$|f'_+(x)| = \lim_{x' \rightarrow x^+} \frac{|f(x') - f(x)|}{|x' - x|} \leq M, \quad |f'_-(x)| = \lim_{x' \rightarrow x^-} \frac{|f(x') - f(x)|}{|x' - x|} \leq M,$$

因此当 $x, x' \in X$ 时, 对于任意 $x' > x$ 或 $x' < x$ 有 $|f(x') - f(x)| \leq (M + \varepsilon) |x' - x| < (M + \varepsilon) \delta$,

取 $\delta = \varepsilon / (M + \varepsilon)$ 有 $|f(x') - f(x)| < (M + \varepsilon) \delta = \varepsilon$, 得证.

下面我们给出上述定理应用的具体案例分析.

案例 证明函数 $f(x) = \cos x$ 在区间 $(-\infty, +\infty)$ 上一致连续.

证明: 计算导数 $f'(x) = -\sin x$, 则 $|f'(x)| = |-\sin x| \leq 1$, 因此导数在区间有界. 由定理 1 知函数

$f(x) = \cos x$ 在区间 $(-\infty, +\infty)$ 上一致连续.

相较于传统的定义证明, 采用判定定理进行证明要简洁得多. 借助这一案例, 学生对一致连续性这一抽象概念有了更加直观且深刻的理解, 也对一致连续性与导数性质的内在联系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在实际教学中发现, 当学生运用判定定理对具体函数进行分析时, 他们能够迅速判断函数是否具有致连续性, 并且在这一过程中, 他们开始主动探索导数的有界性、单调性等性质如何影响函数的一致连续性. 这种探索不仅加深了他们对理论知识的掌握, 还显著提升了他们将理论应用于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分析指数函数或三角函数的一致连续性时, 学生们通过观察导数的行为, 能够直观地预测函数在不同区间上的连续性特征, 并通过严格的数学推导来验证自己的预测, 从而实现了从抽象理论到具体应用的顺畅过渡.

五、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简明的判定方法, 用于判断函数的一致连续性, 并将该方法系统总结为定理 1 和定理 2. 研究深入分析了函数导数的有界性对函数一致连续性的影响机制, 揭示了导数性质与一致连续性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育人方面, 一致连续性概念的学习在培养学生逻辑思维和抽象思维能力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对一致连续性判定定理的证明与应用, 学生能够锻炼自己的逻辑推理能力, 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同时, 一致连续性作为一个抽象的数学概念, 要求学生从具体的函数和区间中抽象出一般的性质和规律, 有助于培养他们的抽象思维能力. 为增强学生对理论的理解与应用能力, 本文引入了丰富多样的实例. 通过具体函数的分析与证明, 直观地展示了如何借助导数性质来判断一致连续性, 使学生能够有效地将抽象理论与实际问题相结合. 教学实践表明, 这种方法显著提升了学生的学习效果. 课堂反馈显示, 学生对一致连续性的理解更加深入透彻, 证明的准确性大幅提高, 解决相关问题时的自信心和学习兴趣也得到了显著提升. 本研究为高等数学教学提供了一种创新性思路和方法, 有效改善了抽象数学概念的教学效果, 切实增强了学生对一致连续性概念的理解与应用能力, 培养了他们严谨的数学思维和灵活解决问题的能力, 有力地推动了高等数学教学质量的整体提升, 为培养高素质的数学专业人才贡献了一份力量. 同时, 通过对一致连续性概念的深入学习, 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数学的严谨性、精确性和逻辑性, 从而在学习和研究中更加注重数学思想和方法的运用, 培养了他们的科学精神和严谨态度.

参考文献:

- [1] 李亚亚, 王昌. 函数连续性概念的历史: 从欧拉到勒贝格[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24, 46(02): 61-67.
- [2] 张艳, 阿力非日. 一元函数一致连续性的几类判别法及其应用[J]. 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0, 34(04): 22-24+32.

- [3] 郭伟, 王飞. 函数一致连续的判别法[J]. 长治学院学报, 2023, 40(05): 1-3.
- [4] 王俏敏. 基于 APOS 理论的一致连续函数概念教学探析[J]. 数学学习与研究, 2021, 8: 11-12.
- [5] 范海宁, 王海燕. 一元函数一致连续性的判定[J]. 数学学习与研究, 2020, 16: 8-9.
- [6] 王文华, 曹怀信. 一元函数一致连续性的性质[J]. 榆林学院学报, 2016, 26(04): 31-34+40.
- [7] 陈彦. 一致连续性的课堂教学建议[J]. 现代职业教育, 2020, 2: 118-119.
- [8] 钱耀飞. 函数一致连续性判断方法探究[J]. 现代职业教育, 2017, 13: 129.
- [9] 周骁. 一个判别函数一致连续性的新标准[J].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学报, 2014, 28(04): 51-52.
- [10] 姜丽亚, 金永阳. 从一个例子探究无穷区间上函数的一致连续性[J]. 教育教学论坛, 2020, 14: 292-293.
- [11] 白占强. 关于幂函数的一致连续性问题[J]. 科教导刊(下旬), 2018, 18: 58-60.
- [12] 彭艳芳. 关于函数“一致连续性”的教学探究[J]. 黄冈师范学院学报, 2017, 37(06): 65-67.
- [13] 兰尧尧. 一致连续性概念的教学探讨与反思[J]. 教育教学论坛, 2015, 16: 229-230.
- [14] 潘伟云. 函数一致连续性的教学难点与解析策略[J]. 数学学习与研究, 2020, 19: 6-7.
- [15] 许若敏, 汪义瑞. 二元函数一致连续性的判定[J]. 考试周刊, 2015, 10: 40-41.
- [16] 费时龙, 占伟军. 函数项级数与含参量积分的一致连续性[J]. 廊坊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4, 14(06): 14-16.
- [17] 王玉磊, 李彩娟, 付宗魁, 等. 对函数一致连续性教学的探讨[J]. 数学学习与研究, 2018, 24: 5.
- [18] 陈纪修, 於崇华, 金路. 数学分析(第二版上册)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The Educational Role and Judgment Theorem of Consistency and Continuity in Higher Mathematics Teaching

Yu Chengwei¹, Zhao He^{1*}, He Yongming¹, Wang Hongqing¹, Song Yuntao¹

¹ China Fire and Rescue Institute, Beijing 102202, China

Abstract: The proof of consistency and continuity is a key and difficult point in higher mathematics teaching, and students often do not understand it deeply due to its abstraction and logical complexity. This article innovatively proposes a concise proof method that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rivative properties of functions and their consistency and non consistency continuity, and summarizes it into a series of theorems. Thoroughly analyze the definitions of consistent continuity and inconsistent continuity, and clarify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in terms of function behavior. Analyze the key properties such as boundedness and monotonicity of function derivatives, and reveal their impact mechanism on the uniform continuity of functions. On this basis, a set of theorem systems is summarized that directly relate derivative properties to consistent continuity judgments, providing students with clear and systematic judgment tools. To enhanc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ability of theory,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rich examples. By analyzing and proving specific functions, demonstrate intuitively how to use derivative properties to determine consistency and continuity, enabling students to combine abstract theory with practical problems. Teaching practice has shown that this method significantly improves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s. Classroom feedback shows that students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consistency and continuity, demonstrating improved accuracy and increased confidence and interest in solving related problems. This study provides new ideas for higher mathematics teaching, which helps enhanc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ability of abstract mathematical concepts, and promote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higher mathematics teaching.

Keywords: Proof of consistency and continuity; Higher mathematics teaching; Derivative property; Teaching Practice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3.636

浅论信息化侦查中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

汤 圳¹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 100091)

摘要: 刑事诉讼要求依法进行, 法律规定保障人权是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之一, 同时, 2012 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后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更加注重对人权的保障。信息化侦查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 1998 年国务院提出的建设“全国公安信息化工程——金盾工程”, 至今 20 多年的时代变迁与侦查手段的发展, 使得信息化侦查成为侦查机关发现犯罪、预防犯罪、侦破案件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信息化侦查概念虽提出有 20 余年, 但目前没有具体的法律能授权侦查机关行使, 针对其实施和监督的法律法规制度仍然有待完善, 尤其当信息化侦查中的部分侦查行为会侵犯公民人身、隐私权利时, 对于信息化侦查中的人权保障不得不起法学界和交叉学科学者的高度关注。

关键词: 信息化侦查 人权保障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引 言

信息化侦查的概念源于 1998 年公安部提出的“金盾工程”。历经 20 余年发展, 其实际应用已十分广泛, 但在理念上与刑事诉讼原则存在冲突, 法律规制层面缺乏具体规范, 实践中也面临诸多困难, 导致其正当性基础受到质疑, 难以有效保障公民及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完善法律法规, 而厘清信息化侦查的概念则是基础。

在信息化侦查的发展过程中, 学者们对其概念的解读经历了“工具说”、“方法说”到“理念说”的演变, 这一过程反映了依法治国理念的深化。“工具说”和“方法说”将信息化侦查视为侦查破案的工具或方法; 而“理念说”则更进一步, 认为信息化侦查不仅是一种工具或方法, 更应从刑事诉讼整体角度构建其理论与实践体系, 涵盖所有利用信息资源和技术优化侦查工作的理论与实践。^[2]具体而言, 信息化侦查是一种运用信息平台和技术开展侦查活动的模式, 包括以业务信息为主的传统模式和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数据驱动模式。在传统业务信息主导的模式下, 侦查机关主要利用信息化设备对电子数据、视听资料等证据进行固定、提取或转化, 这些行为通常是对已经发生的刑事案件进行侦查, 结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能够较好地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然而, 在大数据驱动的侦查模式下, 侦查活动从传统的事后侦查扩展到犯罪前的预测侦查。通过分析过去案件的信息要素并建立模型, 与当前事实进行匹配, 以预测特定人、地点或时间内的犯罪可能性, 使侦查活动与犯罪发生同步甚至超前^[3], 实现风险控制和预警^[4]。但这种模式在追求精确预测的同时, 需要收集和分析大量公民个人信息, 对尚未犯罪的高危人群进行重点监控, 容易侵犯公民隐私权等合法权益, 也不利于破案后对犯罪嫌疑人隐私的保护。

鉴于信息化侦查已成为一种趋势, 如何在保障公民, 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诉讼过程中合法权益的同时, 有效发挥其在犯罪侦查中的作用, 成为法学界关注的焦点。本文将深入探讨信息化侦查中, 尤其是大数据驱动下的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的必要性、现状, 并提出合理建议。

作者简介: 汤圳 (1999-), 男, 广东深圳人, 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

[2] 吴桐, 马方. 信息化侦查的法律规制体系构建[J]. 广西警察学院学报, 2017, 30(04).

[3] 肖承海, 郭华, 陈碧. 侦查学总论[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9, 26-29.

[4] 卞建林, 曹璨. 信息化时代刑事诉讼面临的挑战与应对[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42(05).

一、信息化侦查中人权保障的必要性

(一) 信息化侦查的必要性

1. 信息化侦查的普遍化

信息技术与电子产品的普及推动了犯罪的电子化与信息化, 犯罪分子借此提高传统犯罪效率、隐蔽性, 并实施了新型计算机犯罪。这促使传统侦查手段必须与时俱进, 而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推动了侦查模式的转变, 信息化侦查应运而生。^[5]

自电子产品和电子数据开始应用后, 侦查机关便致力于研究如何利用信息化产品收集和分析信息资料, 初期对信息资料进行归纳、汇总、查找。这时的侦查机关乃至司法机关之间存在信息孤岛, 不同地区侦查机关之间、专门侦查机关和公安机关之间都是通过自己的能力对辖区内案件信息自行收集、分析, 各个司法机关之间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 更多时候是对相同信息的重复收集, 这样的工作模式极大的损耗了国家资源。

到大数据的功能诞生后, 侦查机关可以更方便地对信息资料进行分析、预测。目前, 侦查机关之间, 乃至全国司法机关之间正逐步建立统一的数据存储系统, 金盾工程二期全面完成, 完善了全国公安快速查询综合信息系统(CCIC)、公安业务系统等, 借此不仅可以节省各个阶段的人力物力, 也能通过数据留痕规范司法机关的诉讼行为。这种信息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以往繁琐的侦查信息存储模式, 并且这种信息化是未来的趋势。信息化和侦查对立统一、互相依存, 侦查必须以信息为媒介、以信息为手段。

2. 刑事诉讼过程对信息化的依赖性

刑事诉讼过程对信息化的依赖性体现在证据种类和犯罪分子信息查询上。第一, 八种法定证据之一的电子数据、视听资料只能通过电子信息载体展现出来, 而在许多案件中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必须要录音录像, 包括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等等。这些案件为了更高标准地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排除侦查机关违法行为, 通常需要侦查机关采取更缜密的措施来证明侦查行为合法。第二, 对于犯罪嫌疑人排查和过往犯罪史的查询中, 利用信息的查询功能可以大幅度增大诉讼效率。除此之外, 在刑事诉讼信息化的普及过程中, 线上审判、线上移送案件、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等成为当前司法机关研究的重点项目, 若将刑事诉讼去信息化, 则很难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正确定罪量刑, 无法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

(二) 大数据技术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的易侵害性

以大数据为驱动的信息化侦查是侦查机关提高侦查效益的重点方向之一, 它改变了侦查思维, 提高了侦查效率, 突破了传统侦查模式的线性思维, 形成了多思路的网状模式, 能够更加具体地锁定犯罪嫌疑人及相关线索。然而, 大数据技术的特征在刑事诉讼中容易使被迫诉方的合法权益受侵害,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 大数据的使用、泄露对犯罪嫌疑人隐私权的侵害

大数据的使用、泄露对犯罪嫌疑人隐私权的侵害: 在大数据技术下, 公安机关掌握大量公民个人信息, 但缺乏内部安全防控管理和法律法规制约^[6], 导致信息易被窃取、修改, 侵害犯罪嫌疑人隐私权。同时, 大数据技术通过对大量数据的二次应用和分析, 能够识别个人信息、预测个体行为, 使犯罪嫌疑人处于长期的“数据监视”中, 进一步侵害其隐私权。^[7]

2. 算法的不透明性对辩方权利的削弱

算法的不透明性对辩方权利的削弱: 大数据计算算法具有不透明性, 辩护方难以对计算过程和结果提出异议, 导致侦查人员容易滥用权力或侵害合法诉讼权利, 使得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原则失衡。应当通过法律手段提高辩方地位, 赋予其对算法公正性的审查权, 以达到控辩权利平衡。^[8]

3. 大数据的预测性与现代刑事诉讼犯罪嫌疑人诉讼主体地位的冲突

大数据的预测性与现代刑事诉讼犯罪嫌疑人诉讼主体地位的冲突: 无罪推定原则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诉讼主体地位^[9], 但大数据技术的预测性可能使公安机关在立案前对公民进行监视, 动摇其刑事诉讼主体地位, 无法保障自身合法权利。如何合理运用大数据技术, 保障犯罪嫌疑人诉讼主体的权利, 避免侦查权

[5] 何军. 大数据与侦查模式变革研究[J].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31(01).

[6] 李宝字, 廖剑聪. 信息化侦查视阈下公民隐私权保护研究[J]. 湖南警察学院学报, 2012, 24(06).

[7] 李宝字, 廖剑聪. 信息化侦查视阈下公民隐私权保护研究[J]. 湖南警察学院学报, 2012, 24(06).

[8] 刘梅湘. 监控类技术侦查措施实证研究[J].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9, 22(04):.

[9] 陈卫东, 刘计划. 《论犯罪嫌疑人的诉讼主体地位》, 2003, 3.

的滥用，是侦查学与法学需要探讨的问题。^[10]

（三）保障人权是刑事诉讼的任务之一

刑事诉讼的基本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使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从保障人权角度看，一是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二是保证有罪的人得到正确的惩罚。人民法院定罪量刑的标准是对事实的认定，而事实的认定需要通过已经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对于犯罪嫌疑人来说，在未经人民法院确定其有罪之前，公安机关应该收集证明其无罪、有罪或罪重、罪轻的一切证据，不能主观定罪，对证据的收集有所偏颇。这种对事实、证据的规定是从实体上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信息化侦查虽然是新的侦查模式，尚未有相关法律法规的具体约束，但作为刑事诉讼中侦查的方式之一，应当同样注重对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保障。相比于对犯罪嫌疑人实体权利的保障，信息化侦查应更注意对犯罪嫌疑人程序权利的保障。新的信息化侦查通过运用各种新技术开展侦查活动如大数据、爬虫网络等，侧重于对侦破案件效率的提升，忽略了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对犯罪嫌疑人的程序权利有所侵害。《刑事诉讼法》第56条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本来是对违法收集的八种法定证据予以排除从而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进行救济，但在信息化侦查的背景下，因为通过信息化侦查收集的证据的合法性基础存疑，无法准确认定其是否属于八种法定证据、属于何种证据，所以这个排除规则在未更新的情况下很难对信息化侦查收集的证据予以正确排除。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一直是近几十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研究的重点方向之一，对于信息化侦查这种更容易侵犯人权的侦查方式则更应该注重对人权的保障。

二、我国信息化侦查中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的现状

（一）信息化侦查与刑事诉讼理念原则的冲突

1. 与程序正当理念的冲突

程序正当是现代刑事诉讼的重要理念和原则，要求诉讼参与人严格遵循法定程序，限制权力扩张，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然而，信息化侦查与程序正当原则存在冲突，尤其是大数据技术在侦查中的应用，对程序正当原则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大数据技术在侦查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网络爬虫、传感技术等获取数据；二是运用数据挖掘、人脸识别等技术分析数据。^[11]这些技术的使用涉及大量数据的存储和运用，不仅可能侵犯与案件无关人员的信息和活动，还可能侵犯犯罪嫌疑人的隐私权和合法权利。此外，大数据技术在犯罪预测方面的应用，即在立案前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目标预设并开展侦查活动，违反了无罪推定原则和疑罪从无原则，侵害了公民的合法诉讼权利。

2. 对控辩平等对抗原则的影响

在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诉讼主体地位的关键。然而，当前司法机关建立的信息化系统多为内部管理服务，信息保密导致辩方难以获取与控方相同的信息，处于劣势。即使辩方能通过控方申请信息，由于控方获取信息的便利性和及时性，辩方仍处于弱势，需要在其他诉讼权利上进行平衡。此外，侦查机关采用信息化系统后，能够利用计算机对案件侦办过程进行提示，完善证据链和程序瑕疵，加强机关间的联系与合作，这在客观上挤压了辩护方的辩护空间，进一步加剧了控辩双方的不平等，阻碍了辩护权的有效行使。

（二）信息化侦查之于人权保障的专门性法律基础缺位

信息化侦查在实践中发展迅速且效果显著，但在法律领域却相对滞后，影响其正当性。对于公权力实施，“法无授权不可为”，若缺乏专门法律法规，仅在刑事诉讼中对侦查行为做概括性授权，易导致权力滥用。技术侦查虽在《刑事诉讼法》《人民警察法》《国家安全法》中有授权与审批规定，但也存在“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范围过宽、“复杂、疑难案件”解释不明等问题，导致侦查中存在“自由裁量”空间。相比之下，信息化侦查立法更为迫切。

信息化侦查的宏观规定零散分布于不同位阶和部门的立法中，如《刑事诉讼法》《国家安全法》《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计算机犯罪现场勘验与电子证据检查规则》等，且这些规定大多并列存在，没有明确的主次之分。一方面，不同法律对信息化侦查手段的规定存在冲

[10] 孔令勇. 信息化侦查的法律基础探究[J]. 四川警察学院学报, 2014, 26(02).

[11] 卞建林, 曹璨. 信息化时代刑事诉讼面临的挑战与应对[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42(05).

突,如《刑事诉讼法》将网络远程勘验技术归为技术侦查范畴,而“两高一部”的规定则使该技术的适用条件相对宽松^[12];另一方面,刑法、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作为一个整体,需协调统一以维护社会正常运行,但信息化侦查缺乏专门立法,相关规定散落且不具体,易造成部门法间的立法冲突和法条援引混乱。

(三) 信息化侦查司法实践对人权保障的忽视

1. 我国重公轻私的思想在信息化侦查实践中的体现

自古以来,我国尤其注重对犯罪的惩罚和社会和谐的保护。古代多以犯罪惩罚为主要目的,追求实体正义,而系统性地保障私权的思想一直到 80 年代后,广泛吸取国外经验才得以在中国广泛发展。随着法治思想的不断提高,对于刑法目的和刑罚功能的理解不再局限于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对于刑法的目的学界普遍认同“规范维护说”或“法益保护说”,两种学说都侧重刑法旨在保护的是一种社会秩序,体现的是对犯罪的预防思想,摒弃了单单惩罚已经发生的犯罪的观念。刑罚的功能也不仅是惩罚犯罪分子,还有预防犯罪分子再实施犯罪的功能。刑法和刑罚这种“预防”的思想体现了人们注重对犯罪行为的规制和对犯罪分子的惩罚,这也包括注重保护其他公民不受犯罪行为的侵害。2012 年刑事诉讼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很大程度促进了中国法治社会的发展,限制了侦查机关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让弱小的公民个体在面对强大的公权力面前有了抵抗的途径。

虽然在与侦查密切相关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都体现了对人权的保护,但在信息化侦查的规范和实施当中,缺少了这种对公民权利的关注。随着科技发展而新兴起的大数据技术侦查模式,对收集的信息进行汇总、分析、研判,其得到的结果可以有效地侦破犯罪,但由于其提前利用了许多合法公民的信息数据,没有对私权利予以完全的保护,古时的重公轻私的思想又在当代信息化侦查中显现出来。况且针对可能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公民,在侦查立案之前,甚至在违法犯罪行为发生之前就对其个人信息、行动轨迹等进行采集、预测,这本身也是对公民个人隐私权利的侵害。有学者认为“从法律层面上看,信息化侦查中公民隐私权保护缺乏可操作性的法律规制。从机制层面上看,信息化侦查中侦查机关缺乏隐私权保护的内部防控机制”。^{[13][14]}有了现存法律,才能在此基础上完善它,所以无论是否难以规制,开始制定一部平衡公共利益和个人权利的关于信息化侦查的法律法规实有必要。

2. 信息化侦查证据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混乱适用

《刑事诉讼法》于 2012 年确立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其中包括对取得电子数据、视听资料收集程序违法的证据的排除,但随着犯罪手段和侦查方式的演变,传统的仅仅对这类信息化证据的法律规定已经很难适应刑事诉讼的进行,这就衍生两个问题。一是用信息化手段,尤其是大数据分析的证据是否可以被依法采纳,可以的话又属于何种证据,二是对公民信息进行大数据分析是否有侵害人权之嫌,是否违背刑事诉讼的一系列原则。

(1)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八大证据的限制及意义

法定八大证据包括书证,物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鉴定意见,电子数据和视听资料,其中电子数据和视听资料虽是以信息化产品为载体的证据,但与信息化侦查收集的证据有一定不同。信息化侦查获取证据着重在于侦查过程信息化,通过信息化平台和信息化手段实施侦查行为以获得证据、查明案件事实。而电子数据和视听资料可以通过传统侦查手段收集的证据,比如在现场勘查中提取的现场电脑中的信息资料数据,这多是对案件事实信息的存储,和传统证据一样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第 108 条到 115 条对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证据的审查做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要求从电子数据和视听资料的收集程序等方面进行审查,违反程序的,应当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证据使用。对法定证据非法排除的规则从结果的不适用倒逼侦查人员在固定、提取证据时遵守法律程序的规定,不能只把惩罚犯罪分子追求实体正义作为侦查的目的,也要注重侦查过程中程序正义的实现,马丁路德·金曾说:“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来达到美好的目的。因为手段是种子,目的是树。”美国毒树之果理论也强调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其证据也是非法的,不得在法庭上被采纳。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很好地限制了侦查人员对权力的滥用,给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抗公诉方的力量,使公诉方和被告方实力更加平衡,保障了公民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

[12] 吴桐,马方. 信息化侦查的法律规制体系构建[J]. 广西警察学院学报, 2017, 30(04).

[13] 何峰. 信息化侦查中的程序控制与公民信息权保障[J]. 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2, 25(05).

[14] 李宝宇,廖剑聪. 信息化侦查视阈下公民隐私权保护研究[J]. 湖南警察学院学报, 2012, 24(06).

(2) 信息化侦查获取的证据的归属种类混乱

法定八种证据的确定使得侦查用以认定案件事实的“材料”有了法律意义,也使得侦查有了明确的方向,清楚应当收集何种“材料”以认定案件事实、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无罪。因为不同证据的收集方式不同、可能侵犯犯罪嫌疑人人权的轻重、方式不同,所以理所应当每种证据分别适用着不同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确保侦查行为和保障人权的动态平衡,避免某一侵犯人权的侦查行为收集的证据因为适用较轻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而不受排除。信息化侦查相较于传统的侦查模式更容易侵犯人权,因此应当更加注意对程序合法性的审查。

传统侦查利用信息载体取得的电子数据和视听资料证据属于法定八种证据之一毫无疑问,但以大数据侦查为代表的新型预测型侦查取得的证据归属于八大证据的哪种在学界上广泛讨论,以属于视听资料或鉴定意见为焦点。理论界,福建警察学院钟明曦教授认为应该分别讨论,各属于电子数据或鉴定意见^[15],清华大学张建伟教授则强调,“大数据分析报告有必要单列出来作为独立的证据种类”。^[16]在实践中的应用,笔者选择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中用“高级检索”功能全文查找关键词“大数据研判”,共搜索出有效文书15篇,其中5篇将大数据研判结果归属于书证,另外10篇没有注明证据种类,但根据描述推断其归属为视听资料证据或者仅作为侦查线索使用(如表1)。

可以看出,尽管当前学者认为大数据收集的信息争议点在于其归属电子数据或鉴定意见,但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司法机关尽量避免对大数据研判证据的直接使用,而是转化成现有法定证据种类呈现在法庭上。司法机关在实践中的谨慎也恰恰说明了因为未对大数据研判证据作出具体授权而产生的在运用过程中的矛盾,这也正是信息化侦查在法律规制方面的不足。证据种类归属的不明确会使司法机关犹豫对证据的使用,换句话说,也可能可以将其作为任何一种证据使用,以避开其他证据的排除规则被法庭所采纳,而司法官也可能更倾向于使用这种证据定罪量刑。如此一来,很难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不被侵害。

表 1

序号	案件种类	实施目的	证据种类	备注
1	刘建平聚众斗殴罪	查找犯罪嫌疑人	书证	信息查找
2	杨少龙抢劫罪	追逃犯罪嫌疑人	书证	人脸分析——照片
3	向戴宏非法持有毒品罪	追逃犯罪嫌疑人		轨迹分析,推测为录音录像证据
4	王伦故意伤害罪	追逃犯罪嫌疑人	书证	轨迹分析,推测为录音录像证据
5	卢志欢运送他人偷运国边境罪	大数据预警分析	书证	通过受案登记表记录
6	马庆祝故意伤害罪	追逃犯罪嫌疑人		通过到案经过记录
7	林振敏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证实犯罪行为		利用大数据结果讯问犯罪嫌疑人
8	郭富光诈骗罪	大数据预警分析		利用大数据结果讯问犯罪嫌疑人
9	田成军等盗窃罪	追逃犯罪嫌疑人		轨迹分析,推测为录音录像证据
10	梁巧云诈骗罪	追逃犯罪嫌疑人		查询住址
11	何兆成盗窃罪	追逃犯罪嫌疑人	书证	在“抓获经过”中阐述
12	王从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证实犯罪行为		利用大数据结果讯问犯罪嫌疑人
13	肖真盗窃罪	追逃犯罪嫌疑人		大数据分析
14	戴克虎等诈骗罪	追逃犯罪嫌疑人		轨迹分析,推测为录音录像证据
15	封雷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	大数据预警分析		预警分析

三、完善我国信息化侦查中人权保障的建议

(一) 事前预防

1. 提高司法人员对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的认识

信息化侦查在刑事案件事实认定方面较传统侦查模式更具优势,其侦查价值取向更侧重于实体正义。因此,在信息化侦查过程中,必须更加注重程序正义的保护以及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可以从人性、人

[15] 钟明曦. 论刑事诉讼大数据证据的效力[J]. 铁道警察学院学报, 2018, 28(06).

[16] 何家弘, 邓昌智, 张桂勇等. 大数据侦查给证据法带来的挑战[J]. 人民检察, 2018, (01).

权和权利三个方面来理解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第一，私有倾向性是人性本向，在利益面前，人们往往会“趋私避公”。在私有化的环境中，犯罪嫌疑人的个人荣辱、家庭责任、种族优劣是能够潜移默化影响其行为举止的，对于这些荣辱感犯罪嫌疑人会不自觉地予以保护。信息时代下，所有消息都可能广泛传播，在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信息进行收集、分析时，应当注意保护犯罪嫌疑人在他的生活圈里培养的各种荣辱感，避免因侦查行为不当导致各类信息传播。信息化侦查的法律基础应当注意保护这种私有倾向性。第二，保障人权是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之一。人权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权利，也是人性趋向的体现。人性向私，所以私权便是人权的具体含义。对于人权的保障规定在我国多部法律当中，但人权的形成不应该仅仅是依靠法律予以规定，而应该是人类社会形成过程中形成的人们的观念，法律的规定起到强调作用，提醒公权力不能侵犯人权。信息化侦查在快速发展后，侦查人员往往容易忽略了对人权的保障，只关注如何通过大数据技术更快地缉拿犯罪嫌疑人。而事实上，侦查人员应当时刻将保障人权的刑事诉讼理念运用在信息化侦查过程中，在发现线索、收集证据的过程中思考是否有侵害人权之嫌。第三，权利是人权的法定形式，依靠法律规定的人权，才能被具体的权利行使。信息化侦查中涉及了隐私权、个人信息权、通讯自由与通讯秘密权、人格尊严权，《民法典》中首次规定了隐私权，但仍需完善，而个人信息权还没有具体的规定，这不利于对公民权利的保护。规定这些权利的单行法律法规亟待制定，同时也不能忽视要在信息化侦查中司法人员对私权利的重视。

2. 制定配套的信息化侦查法律法规体系

我国法律体系以多层次立法、多部门配合为特色，宪法为统领，各部门法为主干，地方性法规为补充。信息化侦查中对人权的保护虽在宪法中有规定，但目前尚无专门法律法规对其进行细致规定。尼尔·波斯曼指出，新技术的出现会促使整个世界围绕新技术重新建构。信息化侦查涉及的技术和问题无法用传统思维完全解决，其使用程序需在专门法律法规中详细规定。

对于信息化侦查的立法，应遵循上位法优先于下位法的原则，在不违背宪法对人权保护要求的前提下，在刑事诉讼法的框架内规定程序性事项。涉及专业领域的技术问题，则通过其他部门法律法规来规定。有了专门性总纲后，才能进一步细化规定，使民法、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在此问题上实现协调。

此外，为防止信息化侦查侵犯隐私权、个人信息权等权利，需从制定专门法律法规入手，并明确这些权利的界限和具体内容。民法等部门法应对其作出更具体的规定。近两年，虽然开始重视个人信息和隐私权的保护，但仍有待完善。因此，应尽快在私法上确立和完善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权、隐私权的构成和保护，同时在公法上规范信息化侦查行为，不仅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还要在部委制定的专门法律法规中多层次体现。

（二）事中规制

1. 限制内部自律科层制控制

信息化侦查目前适用传统侦查的规定，但因其更贴近技术侦查，易导致权力滥用和损害嫌疑人权利。其审批原则上是事前审批，紧急情况允许事后审批并需合理解释。除逮捕等强制措施由检察院、法院审批外，其他措施多由侦查机关内部审查，这种内部审批虽提高了效率，但易放宽限制，导致自律控制弱化，程序规范性依赖个人品格，无法有效制约。

因此，限制内部自律科层制控制有两层意思：一是要将侦查机关能批准的侦查事项范围一定程度缩小，将批准主体外放；二是强化现有的审批程序，让侦查机关内部遵守领导审批一线侦查工作，上级侦查机关审批下级侦查机关申请事项。达到这两种方向的方法不同，但旨在通过更为严格的内部审批程序对信息化侦查这种容易侵犯人权的司法行为起到更进一步的约束作用。

2. 加强外部他律控制

分工负责是司法审查的根基，司法审查、权力制约是分工负责的结果。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是刑事诉讼法原则之一，也是刑事诉讼能正常进行的基本条件。目前对于侦查权的控制也由“以检察机关为中心”的一元格局演变成“审前阶段以检察机关为中心、审判阶段以法院为中心”的二元格局。^[17]检察机关通过多种方式限制侦查权，法院则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挥威慑作用。在审判中心改革下，法院可归拢侦查事项审批权，检察院可归拢较轻信息化侦查措施的审批权，以提高侦查行为规范性。德国“门槛主义^[18]”及衍生的“修正门槛主义”对我国信息化侦查立法有借鉴意义。我国应从法律、实践、社会三方面构建信息化侦查体系，以法律为核心指导侦查，转变侦查人员观念，强

[17] 詹建红，张威. 我国侦查权的程序性控制[J]. 法学研究，2015，37(03).

[18] 吴桐，马方. 信息化侦查的法律规制体系构建[J]. 广西警察学院学报，2017，30(04).

化外部控制,形成法律-实践-社会的有机协调,平衡公民权利与侦查目的,实现保障人权、平衡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目标。

(三) 事后救济: 信息化侦查获取的证据的分层式排除规则的构想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诉讼中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规范侦查行为的重要规则,2012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至今,对于现有法定证据的收集规范已经比较完善,但信息化侦查取得证据的法定归类尚不明确,是归类为理论界认为的电子数据、司法鉴定,还是司法实践中转化为的书证,亦或是单独设置一种证据归类,众说纷纭。若无法准确认定信息化侦查取得证据的种类,则无法适用对应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同证据的排除规则宽严不一,信息化侦查相比传统的实地勘验,属于更容易侵犯人权的一种侦查方式,应规定更严格的排除规则,以侦查时间为线索的信息化侦查排除规则可以考虑。

信息化侦查并不是具体的一种侦查措施,它跟主动型侦查、预测型侦查一样,是一种侦查模式,这种侦查模式涵盖了许多利用信息技术进行的侦查措施,每种侦查措施的侵害性不相同,所以不能通过简单地将证据归纳为所谓的“信息证据”而一刀切地制定排除规则,应当对强度高的侦查措施设置更为严格的程序规定,以防止侦查人员滥用职权侵犯公民权利。信息化侦查模式之所以引起法学界讨论,特殊的地方在于其实施侦查行为的时间跟传统的侦查不同。信息化侦查的一大分支大数据技术预测侦查是在侦查立案之前就通过对公民信息的大量使用来对犯罪进行预警,而这种信息使用是对个人信息处分权的侵犯,在面对公民私益和国家公益时,如何做出取舍便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需要涵盖的内容。

因此,笔者认为可以从侦查措施实施时间点先做粗略的区分,分为立案前、侦查中、破案后这三个时间点,从前到后逐步降低信息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限制程度,同一种信息化侦查措施在不同时间点需要遵守不同程度的法律限制要求,比如在立案前对公民信息的使用,要求隐私不得泄露且不得作为证据使用,但在公安机关内部可作为线索使用,而侦查中的公民信息使用,则应该经过多层的严格审批,在履行手续的条件下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否则视为非法证据应当排除。破案后在讯问犯罪嫌疑人得到的证据,可以通过事后补正的方式使证据避免被排除等等。此外,立案前的信息化侦查和传统的初查也有所不同,初查一般不涉及对人身、财产的强制性措施,现场勘查也往往是经被害人同意的或犯罪发生的中立场所,很少产生侵权的问题。但利用信息的网络空间的侦查,则会收集到很多个人隐私而非与案件密切相关的内容,这实质上是技术侦查的范畴,因此也需要更加严格的限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正确适用给了犯罪嫌疑人救济自己权利的合法途径,对信息化侦查获取证据行为的正确规范,是对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的重中之重。从三个时间段对侦查行为进行分层式规制,可以监督公安机关对各类信息的合法使用,也能督促公安机关对可能的犯罪案件迅速展开初查、立案、侦查,尽快缉拿犯罪嫌疑人。

五、结语

信息化侦查应时代所必需,又和当下法学界注重人权保障息息相关,因此不可避免必须得到高度重视。如何在惩罚犯罪、保护社会和注重隐私、保障人权中进行平衡是学者研究的重点,也应该是突破侦查模式“内卷化”^[19]需要考虑的内容,同时,信息化证据的法定证据种类归属及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应当在理论界和实践中得到确定和统一。只有将人权保障融入法律的考量中,才能真正实现侦查的正当性。

参考文献:

- [1] 吴桐, 马方. 信息化侦查的法律规制体系构建[J]. 广西警察学院学报, 2017, 30(04): 56-62.
- [2] 肖承海, 郭华, 陈碧. 侦查学总论[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9.
- [3] 卞建林, 曹璨. 信息化时代刑事诉讼面临的挑战与应对[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42(05): 23-30.
- [4] 何军. 大数据与侦查模式变革研究[J].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31(01): 72-80.
- [5] 李宝字, 廖剑聪. 信息化侦查视阈下公民隐私权保护研究[J]. 湖南警察学院学报, 2012, 24(06): 40-43.
- [6] 刘梅湘. 监控类技术侦查措施实证研究[J].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9, 22(04): 90-101.

[19] 内卷: 指一类文化模式达到了某种最终的形态以后, 既没有办法稳定下来, 也没有办法转变为新的形态, 而只能不断地在内部变得更加复杂的现象。

- [7] 孔令勇. 信息化侦查的法律基础探究[J]. 四川警察学院学报, 2014, 26(02): 86-94.
- [8] 何峰. 信息化侦查中的程序控制与公民信息权保障[J]. 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2, 25(05): 9-12.
- [9] 钟明曦. 论刑事诉讼大数据证据的效力[J]. 铁道警察学院学报, 2018, 28(06): 83-87.
- [10] 何家弘, 邓昌智, 张桂勇等. 大数据侦查给证据法带来的挑战[J]. 人民检察, 2018, (01): 54-57.
- [11] 詹建红, 张威. 我国侦查权的程序性控制[J]. 法学研究, 2015, 37(03): 139-157.
- [12] 李双其. 论信息化侦查方法[J].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26(04): 9-14.
- [13] 黄琳熹. 域外个人信息保护措施概览[N]. 人民法院报, 2021-11-19(008).
- [14] 马方, 吴桐. 信息化侦查的维度冲突与法律规制[J].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3(02): 42-51.
- [15] 陈曾侠. 论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J]. 政法学刊, 1989, (01): 60-64.
- [16] 曹文安. 论信息化侦查与公民权利保障[J]. 福建警察学院学报, 2011, 25(04): 1-8.

DISCUSS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IN INFORMATION INVESTIGATION

Tang Zhen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Abstract: Criminal proceedings are required to be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The law stipulates that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is one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criminal proceedings. At the same time, the exclusion rules of illegal evidence established after the revision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in 2012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The concept of information-based investigation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public security information project-Golden Shield Project" proposed by the State Council in 1998. Up to now, more than 20 years of changes in the tim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vestigation means have made information-based investigation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investigation organ in discovering crime, preventing crime and solving cases. Although the concept of information-based investigation has been put forward for more than 20 years, at present, there is no specific law to authorize the investigation organ to exercise, and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for its implementation and supervision still need to be improved. Especially when some investigation behaviors in information-based investigation will infringe on citizens' personal and privacy rights,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in information-based investigation has to attract the high attention of legal circles and interdisciplinary scholars.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analysis and suggestions on the regulation of information-based investig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in criminal procedure.

Keywords: Information investigation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exclusionary rules of illegal evidence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3.696

教育智能广告的算法殖民与价值重构：技术赋能下的教学异化及伦理治理研究

张晓曼¹ 林可一¹ 郭文君¹ 吴治霖¹

(¹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在数字技术深度渗透教育生态的背景下，教育智能广告的算法殖民机制正在不断侵蚀教育本质。智能广告通过用户画像、多模态生成与场景化植入等技术，实现教育传播数据驱动型跃迁，形成“教育-营销”一体化生态。这一过程中出现的技术异化表现为三重矛盾：算法权力侵占教学主体、数据暴力掠夺隐私，焦虑制造“教育消费主义”。针对此矛盾提出“精准性-教育性-伦理性”三维优化模型，构建包含算法审计框架、教育价值锚定原则与轻量化治理工具包的解决方案，强调通过法律规制穿透式监管、算法透明化改造及社会共治机制重构教育数字生态。突破传统工具理性主导的研究范式，为智能广告批判提供理论透镜，并为数智时代教育伦理治理实践提供创新路径。

关键词：教育智能广告；算法殖民；技术异化；伦理治理；数据隐私

一、引言

数字技术的深度渗透正重构全球教育生态，以智能广告为核心的技术集群通过用户画像构建与行为追踪，推动教育传播范式向数据驱动型跃迁。教育技术市场规模的指数级扩张^①（23 年达 2985 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 17.4%）印证了这种变革的双重面相：一方面，自适应学习系统与广告推荐引擎的技术同源性催生“教育-营销”一体化生态，新东方、好未来等机构借助信息流广告实现用户增长，Udemy 等平台更将营销费用占比持续置于研发投入之上，折射出“内容即广告”的产业新逻辑；另一方面，资本逻辑通过界面算法对教育时空进行殖民，课程进度条嵌套的广告推送将知识获取解构为注意力资源的竞价交易，教师沦为数据看板管理员，学生则被抽象为一个个冰冷的数据，躺在数据库里随时等待调动。

当学习者的认知图谱成为广告优化的训练样本，教育本质从精神对话异化为数据再生产链条，这种技术异化已然产生了对存在论层面的价值背离。而《教育评论》近三年研究显示，仅 0.35% 的文献触及此伦理维度，由此可见人类的理论研究并没有及时搭上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的高速列车。

算法对教育主客体关系的重构不仅解构了传统教学严密稳定的主体结构，更通过双向渗透机制将课程内容与广告逻辑深度绑定——从知识植入的显性渗透到互动设计的隐性转化，商业目标逐渐凌驾于育人目标之上，形成一种本末倒置的不良局面，严重背离了以人为本的教育初衷。

基金项目：2024 年度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创新项目编号：（S202410497238）；2023 年湖北本科高校省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机器人型信息终端与汉语国际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研究与实践”编号：（2023111）

作者简介：张晓曼（2004—），女，湖北宜昌人，武汉理工大学本科生
林可一（2004—），女，山东东营人，武汉理工大学本科生
郭文君（2004—），女，福建泉州人，武汉理工大学本科生
吴治霖（2004—），女，重庆人，武汉理工大学本科生

^① P&S Intelligence. Education Technology Market Size, Share and Revenue Forecast by 2030[EB/OL]. (2022-09)[2025-02-26].

面对这一结构性矛盾,本研究提出“技术-内容-伦理”三维分析框架,在该体系的注解下系统解构智能广告算法殖民机制及其对教育本质的侵蚀路径。基于教育公共性理念,研究构建数据主权归属、认知公平性、育人目标优先性的伦理评估体系,并通过轻量化解决方案回应实践困境:针对县域学校等技术弱势主体,开发教学日历排期匹配度模型与非商业激励点配置工具,借助开源广告过滤器的模块化防护设置,实现低资源环境下教育价值理性的技术锚定。这一探索不仅填补智能广告批判的理论空白,更为数智时代的教育范式重构提供兼具学术深度与实践可行性的路径参考。

二、智能广告在教育平台的应用现状

(一) 经典理论的应用与革新

教育广告传播的研究始于20世纪末教育市场化浪潮。起初,研究主要依托传统营销理论,1960年由美国学者杰罗姆·麦卡锡提出的4P理论^②,即产品、价格、渠道、促销被广泛应用。该理论试图将教育服务当作普通商品进行量化推广,但却忽略了教育服务的无形性,以及消费者决策时的复杂考量。例如家长在为孩子选择教育产品时,会综合考虑师资力量、教学理念、课程体系等多方面因素,并非仅依据产品、价格等简单维度。

随着研究的深入,菲利普·科特勒和福克斯在教育营销^③领域进行了探索,他们指出教育服务不能简单等同于一般商品,其价值更多体现在知识传递、能力培养等无形层面,这促使学界开始探索契合教育特性的营销理论。

到了21世纪,教育服务营销理论不断演进。学者舒尔茨提出整合营销传播理论^④,强调教育广告应注重品牌形象塑造与口碑传播。通过提供优质教育服务,树立良好品牌形象,吸引更多潜在客户。根据艾媒咨询发布的相关报告显示,超70%的家长在选择教育机构时,会参考其他家长的口碑推荐。同时,体验式营销也逐渐兴起,教育机构通过举办试听课程、学习讲座等活动,让家长和学生亲身体验教学服务,从而增强他们的购买意愿。如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长期举办各类学科试听课程,吸引了大量学生和家长报名正式课程,有效提升了市场份额。

(二) 智能教育广告技术创新与争议

用户画像技术通过分析学习行为数据预测需求,其中答题正确率、知识点停留时长等要素是重要衡量尺度,豆神教育通过精准把握市场需求,不断调整和优化产品结构,实现了用户数量和业绩的显著增长。其公司三季度财报显示,豆神教育实现归母净利润增长209.82%。不少教育平台利用多模态技术突破传统,松鼠Ai就是在教育领域应用多模态大模型技术的先驱——其「多模态智适应大模型LAM」,和一般基于大语言模型的教育产品大不一样,它能快速生成教学资源,实现人机高效互动,助力打造个性化学习方案,给用户带来更智能、高效的学习感受。猿辅导等平台场景化植入技术也成为创新焦点,其在错题解析页面采用动态推荐教辅书的方式,相比于传统的弹窗广告,这种基于用户学习数据的精准推荐,能够更贴合学生当下的学习需求。弹窗广告往往是统一的、无差别的信息推送,容易被用户忽略甚至产生反感。而动态推荐则是根据学生在平台上的错题类型、知识点掌握情况等数据,精准推送与之相关的教辅资料,从而大幅提升了用户对广告内容的关注度和购买意愿。

在带来巨大裨益的同时,技术驱动式的广告策略也滋生着一系列问题。例如算法推荐机制正催生“教育消费主义”^⑤,在这种模式下,教育不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与获取,而是逐渐异化为数据喂养的商业循环。平台通过收集和分析学生的学习数据,精准推送各类教育产品,刺激用户不断消费,使得教育的本质被商业利益所干扰。

^② Perreault W, McCarthy E J. Basic Marketing[J]. McGraw-Hill Publ. Comp. 2004.

^③ Kotler P, Keller K L, Brady M K, et al. Marketing Management[J].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④ Schultz, D. E., Tannenbaum, S. I., & Lauterborn, R. F. (1993). 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Putting it together & making it work. NTC Business Books.

^⑤ 杨建朝,王全. 回归自由:教育消费主义批判[J]. 现代教育管理, 2012, (08): 16-20. DOI: 10.16697/j.cnki.xdjygl.2012.08.009.

(三) 伦理困境

在一众智能广告伦理挑战中,数据隐私风险尤为突出——智能教育广告存在严重的隐私泄露隐患。大语言模型训练依赖大量数据,其中不乏学生成绩、家庭背景等敏感信息,模型生成广告时可能泄露隐私片段,且训练细节不公开,导致教育机构难以评估隐私风险。在自然语言交互中,用户不经意间上传的教学材料、学业评估结果等,都可能泄露隐私,并且广泛的应用场景让隐私边界难以界定。在第三方交付模式下,平台通过 API 接入大模型时,数据易被共享,大模型厂商重商业轻安全,更让教育机构陷入两难。再者大模型架构不透明,用户难以追溯数据流向,且教育参与者隐私意识淡薄,容易操作不当泄露信息。加之数据控制权集中,用户难以维权,现有立法又难以覆盖大模型隐私风险,导致治理缺失。此外认知操纵争议同样不容忽视,在线教育平台利用“涟漪效应”和“心理台风眼效应”^⑥向消费者大幅渲染焦虑,从而促进消费者购买课程。在当前就业紧张和学历焦虑的社会背景之下,智能广告传达的焦虑信息无限放大了消费者的情绪,使其不由自主地走向焦虑陷阱,掉入一场精心安排的“盛宴”。这种行为的促使下当今社会形成了一种病态的风气,迫使教育向畸形的方向发展。

(四) 研究局限剖析

既有研究对教育数字化进程中广告嵌入现象的探讨存在三重系统性局限,亟待学术共同体关注与突破。

1. 工具理性主导下的价值失衡

当前研究多聚焦于广告推送算法的精准性优化与界面交互设计的技术迭代^⑦,却未深入反思技术工具性与教育公共性之间的本质冲突。当广告逻辑深度介入知识传播过程时,其带来的注意力碎片化、认知路径干扰等问题实质构成了对教学主体性的消解。现有研究范式暴露出对效率导向技术叙事的单向度认同,未能批判性审视商业资本渗透教育空间引发的认知殖民风险。

2. 伦理维度的结构性缺位

尽管既有文献普遍提及隐私保护、数据安全等基础伦理议题^⑧,但仍存在三重理论断裂:其一,商业利益最大化诉求与教育普惠性目标间的制度张力未获充分解构;其二,个性化推荐技术引发的认知窄化效应缺乏学理批判;其三,短期学习绩效指标与长期批判性思维培养的价值冲突尚未建立分析框架。这种碎片化的伦理讨论,导致“技术-教育-政策”协同治理模型长期缺位。

3. 区域治理经验的范式化困境

现有成果过度依赖欧美监管范式的解释框架,对亚太地区制度实践的学术转化严重不足^⑨。该区域同时存在日本严格的内容审查机制、新加坡公私部门协作治理模式,以及发展中国家数字基建薄弱导致的监管异化现象。文化语境与制度逻辑的多样性本可为教育广告治理提供创新理论资源,但现有比较研究尚未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框架。

三、教育智能广告的技术基础与算法机制

(一) 大模型技术的教育适配性重构

教育智能广告的技术底座正在经历从传统机器学习向大语言模型的范式跃迁。Transformer 架构^⑩通过自注意力机制实现了对教育语义的深度解析,其多头注意力层能够并行处理教学场景中的多模态数据流。在

^⑥ 朱浩亮,许科威,陈莉.在线教学与家长教育焦虑研究[J].中国教育科学(中英文),2023,6(04):104-113.DOI:10.13527/j.cnki.educ.sci.china.2023.04.010.

^⑦ Kirschner P A, Sweller J, Clark R E. Why Minimal Guidance During Instruction Does Not Work: An Analysis of the Failure of Constructivist, Discovery, Problem-Based, Experiential, and Inquiry-Based Teaching[J].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2006, 41(2):75-86.DOI:10.1207/s15326985ep4102_1.

^⑧ Casamassimo P S. The Ethics of Information[J]. Pediatric Dentistry, 1995, 17(2):89.DOI:10.1108/AJIM-06-2014-0075.

^⑨ Mok K H, Marginson S. Massification, diversification and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Critical reflections of developments in the last two decad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2021, 84(1):102405.DOI:10.1016/j.ijedudev.2021.102405.

^⑩ 张有胜,季伟东.基于双位置编码 Transformer 的命名实体识别研究[J/OL].微电子学与计算机,1-11[2025-02-27].http://kns.cnki.net/kcms/detail/61.1123.TN.20240926.1037.002.html.

嵌入层维度，教育知识图谱与广告语料库的向量空间对齐形成了独特的语义纠缠现象，这种技术特性导致教学目标的向量表征易受商业语义的梯度干扰。位置编码机制在时序性教学场景中面临根本性挑战——当课程进度条被广告插入点切割时，原有的位置依赖关系被破坏，导致认知连贯性衰减。这种技术悖论揭示了大模型在教育场景应用中的内在矛盾：其强大的生成能力与教育过程的系统性要求存在结构性冲突。

（二）推荐系统的教育特异性设计

教育广告推荐算法在特征工程层面展现出与传统电商系统的本质差异。多任务学习框架需要同时优化教学效果指标与商业转化目标，这种双重目标导致损失函数设计陷入困境。传统的教学时序也面临特殊挑战：由于学习者的认知发展具有滞后性，前一阶段的知识缺口可能在三周后才显现影响，这就对传统时间序列提出革新要求。教育场景的试听课程数据与正式课程数据存在分布差异，迁移学习中的领域适配误差成为影响推荐精度的关键因素。

四、智能广告效能双面论证

（一）正向效能：智能广告增益教育平台发展

1. 个性化推荐驱动付费转化率提升

多邻国（Duolingo）通过 AI 驱动的推荐系统实现了显著的商业转化效能。其基于用户学习行为数据的动态算法，能够精准预测用户需求并推荐适配课程。据多邻国 2023Q3 财报显示，该系统使多邻国付费用户突破 5.8 亿次，与 2022 季度同比增长 60%。此外 AI 优化的学习路径使月活跃用户数同比增长 80%，印证了个性化广告推送对用户决策链路的正向影响。这种“数据-算法-服务”闭环模式，为教育平台智能广告的精准触达提供了可复用的技术框架。

Summary of Financial and Key Operating Metrics					
(in millions)	Q3 2022		Q3 2023		YoY
User Metrics					
Monthly active users (MAUs)		56.5		62.1	47 %
Daily active users (DAUs)		14.9		24.2	63 %
Paid subscribers (period end)		3.7		5.8	60 %
Operating Metrics					
Total bookings	\$	102.7	\$	153.6	49 %
Subscription bookings	\$	78.9	\$	121.3	54 %
GAAP Financial Metrics					
Revenues	\$	96.1	\$	137.6	43 %
Gross profit	\$	69.8	\$	101.4	45 %
Gross margin (%)		72.6 %		73.7 %	+100 bps
Net (loss) income	\$	(18.4)	\$	2.8	nm
Net cash from operating activities	\$	8.8	\$	37.7	>100%
Non-GAAP Financial Metrics (1)					
Adjusted EBITDA	\$	2.1	\$	22.5	>100%
Free cash flow	\$	6.1	\$	33.5	>100%

图 1 多邻国 2023Q3 财报

2. 沉浸式交互增强用户粘性

智能广告的内容形态创新显著提升了用户参与深度。多邻国整合语音识别、游戏化机制等 AI 技术，构建了平均单次访问时长 10 分 27 秒的高粘性场景。其 2023 年 5-7 月总访问量达 2.46 亿次，较竞品平均高出 5.8 倍，印证了智能交互广告在延长用户注意力持续时间方面的优势。这种“产品即广告”的体验设计，使平台 MAU 同比增长 47% 至 7260 万，形成了用户增长与数据积累的双向增强回路。

3. 技术赋能构建品牌信任壁垒

头部教育平台通过 AI 技术投入强化了广告可信度。好未来研发的 MathGPT 大模型及 AI 课程体系，虽尚未正式商用，但已通过技术披露获得市场关注度提升。这种技术背书效应，使教育广告的转化成本降低，验证了“技术可见性”对消费者决策的心理锚定作用。

（二）负面效能：教育 AI 的异化图谱

1. 技术伪饰与教育承诺的异化

VIPKID 被大量家长投诉的核心问题在于利用 AI 技术掩盖服务缩水。平台以“北美外教一对一”为宣传卖点吸引用户付费，却在服务过程中通过算法推荐系统持续推送弹窗，诱导家长将高价购买的真人课程转

为低成本的 AI 录播课。这些录播课缺乏实时互动，仅通过预设问答模拟教学，导致学习效果大幅下降。此举本质是以技术包装实施服务欺诈，将教育质量承诺异化为算法诱导的消费陷阱。

功能	定价 (折扣前价格)	用户数	成立年份	8月网页访问量 (单位: 百万)	覆盖语言种类数	是否有免费服务	平均访问停留时间 (秒)
Duolingo	游戏化机制, 角色扮演, 解释答案, 多种语言覆盖 Super Duolingo 12.99美元/月 Super Duolingo 年套餐 59.99美元 Super Duolingo 家庭套餐 239.99美元 DuolingoMAX 29.99美元/月 Duolingo MAX 157.99美元/年 Duolingo MAX 239.99美元/年套餐 239.99美元	2022年 MAU 6070万人 2023Q2 MAU 7410万人	2011	86.6	43种语言, 其中39种提供母语使用者, 7种提供非母语使用者, 共计提供25种使用者语言选项	提供完全免费的完整课程服务体验	10分27秒
Babbel	视频一对一教学, 文化知识, 播客听力训练, 语音识别改善发音 3个月套餐 44.85美元 12个月套餐 179.40美元 24个月套餐 358.80美元 终身使用 599.99美元	2022年 MAU 396万人	2007	9.7	14种语言, 只提供母语使用者	Babbel 的注册完全免费, 专门课程的章节课也可以免费试听, 但如果你选择的语言, 可以免费试听30-60节课	4分01秒
Busuu	母语用户反馈修改, 情景对话, 语音识别检测发音, 通过考试获得等级证书 1个月套餐 13.95美元 6个月套餐 50.70美元 12个月套餐 83.40美元	2022年 注册用户数1.2亿	2008	5.1	14种语言, 只提供母语使用者	基础版本免费	9分38秒
Memrise	单词闪卡, 3D闪卡, 沉浸式听力, 游戏化机制 一个月套餐 8.49美元 年套餐 60美元 终身套餐 119.99美元	2022年 注册用户数6500万	2010	4.1	23种语言, 只提供母语使用者	提供完全免费的完整课程服务体验	8分20秒

图 2 竞争对手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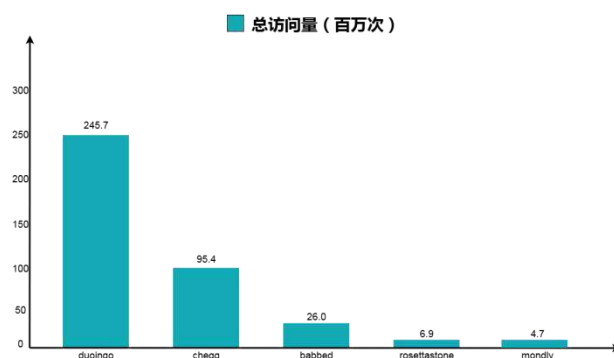


图 3 教育及语言学习行业主要公司 2023 年 5-7 月访问量对比

Metric	duolingo.com	babbel.com	rosetastone.com	mondly.com	chegg.com
每月访问量	79.93M	8.898M	2.401M	1.686M	4.925M
月独立访客数	17.53M	5.070M	994,426	900,678	1.953M
访问量/独立访客	4.56	1.75	2.41	1.87	2.52
已消除重叠受众	13.31M	4.367M	837,202	789,535	1.625M
平均访问停留时间	00:09:54	00:04:03	00:08:49	00:03:28	00:08:44
每次访问页数	00:09:54	4.09	6.88	4.00	23.63
退出率	31.2%	50.27%	39.57%	57.67%	42.13%
页面浏览量	539.7M	36.42M	16.52M	6.74M	116.3M

图 4 9 月在线语言学习行业主要公司对比

2. 数据掠夺下的通信暴力链

深海教育通过技术手段构建了一条数据黑产驱动的骚扰流水线。其“螳螂教育云”平台接入 AI 外呼系统, 利用 MicroSIP 软件伪造北京本地座机号码 (如 010 开头), 日均拨出上万通课程推销电话。这些电话基于非法获取的用户信息 (如电话号码、搜索记录), 通过技术伪装规避用户拦截, 形成“窃取数据-AI 轰炸-强制转化”的灰色商业闭环, 严重践踏公民通信自由与隐私边界。

3. 焦虑的算法生产与符号赎买

部分卖课直播间通过虚构技术恐慌实施消费胁迫。主播使用“不会 AI=文盲”“DeepSeek 是最后风口”等极端话术, 配合伪造的学员案例 (如“宝妈靠 AI 月入 10 万”) 和机器人刷屏的“剩余额额”倒计时, 制造“不

买课即淘汰”的集体焦虑。这种策略将教育扭曲为恐惧营销工具，利用算法放大社会生存危机感，迫使消费者为虚构的技术红利支付高价，彻底背离教育本质。

五、教育智能广告的算法殖民机制解构

（一）认知图谱的资本化重构

智能广告系统通过深度学习模型对教育主体的认知轨迹进行符号化编码，将原本连续的知识建构过程分散为可量化的行为序列。这种转化利用 LSTM 神经网络^⑩捕捉学习者的注意力波动周期，在认知脆弱期植入商业信息，从而导致知识获取的时序性被解构为广告曝光的空间化排布。

（二）教学场域的权力拓扑转换^⑪

算法推荐系统打破了传统教育权力中的三足鼎立——教师的知识权威被降维为推荐系统的特征向量，学生的主体性被抽象化为用户画像的动态标签，而教育内容则沦为广告投放承上启下的工具。算法作为非人类行动者获得实质性决策权，通过精准算法重塑教学场景中的权力牵制关系。

（三）时间性的技术殖民

基于强化学习的广告调度算法将 45 分钟标准课时解构为 31 个可售卖的注意力单元，每个单元根据眼动追踪数据动态定价，从而实现通过智能广告系统实时竞价（RTB）机制^⑫对教育时空进行碎片化切割。这一过程中教育节奏被资本逻辑重新校准，表面上来看在线教育平台课程似乎更精准更全面，但事实上平台为了追逐更多地商业利益将原本普适的教育节奏加快，从而扰乱学习节奏。对于学生而言，学习节奏是一个非常重要但并不十分具象的概念，一旦被打乱，可能就需要花费很长时间调整归正。

六、“精准性-教育性-伦理性”三维优化模型构建与实践路径

（一）必要性

1. 算法审计的理论框架重构

传统算法审计框架在教育场景面临三重失效：基于统计公平性的评估忽视教育的过程正义，个体层面的偏差检测无法捕捉教学系统的涌现效应，静态的评估体系难以适应动态演进的教育关系。在这一传统机制下平台难以精准定位个体差异，从而无法因材施教迫使教育效果降低。基于这一情况，现有的算法审计框架亟待更新。

2. 治理主体的角色嬗变

教师从传统的知识传授者转型为“算法调停者”，转变为新的治理主体。这一转变要求教师掌握基本的模型解释技术以维护教学主权，同时学生群体也要通过数字孪生技术获得治理参与的新界面，使其学习行为数据转化为治理模型的有效样本。但最根本的转变还是发生在教育监管部门——为算法监管“重塑肉身”，通过数字分身技术实现全天候、全场景的穿透式监管。

（二）理论模型的核心架构

“精准性-教育性-伦理性”三维框架，具体可结构为以下维度：精准性维度通过算法透明性设计限制技术工具对教育时空的殖民，例如在广告推荐系统中引入“教育价值衰减系数”，当广告内容与教学目标偏离度超过预设阈值时，系统自动降低曝光权重；教育性维度重构广告与教育内容的关系，提出“知识锚定原则”，要求商业信息必须与教学知识点形成显性关联，如教辅广告嵌入错题解析功能，以此抵抗纯粹消费主义的

^⑩ 刘涛,谢金森.基于 LSTM 神经网络的核电厂瞬态参数预测与故障诊断研究[J/OL].核动力工程,1-9[2025-02-27].<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1.1158.TL.20250227.1033.012.html>.

^⑪ 白晓晴.数字平台文化生产的拓扑结构与治理革新——基于文化拓扑学的视角[J].南京社会科学,2024,(11):132-140.DOI:10.15937/j.cnki.issn1001-8263.2024.11.015.

^⑫ 鞠宏磊,王宇婷.改写广告业的“实时”与“竞价”——实时竞价(RTB)广告的产业链流程和运行机制研究[J].编辑之友,2015,(04):57-60.DOI:10.13786/j.cnki.cn14-1066/g2.2015.04.012.

渗透；伦理性维度构建“底线约束-过程审查-追溯问责”三级防护体系，重点解决数据掠夺与认知操纵问题。三者构成“技术驯化→价值回归→权力制衡”的理论闭环，为后续实践提供分析坐标系而非操作手册。

（三）可行性实施路径设计

模型通过“轻量级工具包+制度适配性改造”降低落地门槛：

1. 精准性改造

建议采用开源算法审计工具，据此教育机构可以通过调整“教育价值敏感度”参数（默认值 0.5），自主设定广告推荐与教学目标的关联强度，无需复杂算力支持。抛去与教学目标无关的冗余信息，高效地进行有效营销从而提高受众广告卷入程度。

1、教育性融合

制定《教育广告内容融合指引》，提供“知识关联度自查清单”，如广告文案是否包含知识点索引、是否提供免费学习资源入口等，县域学校可基于纸质文档开展人工审核。

2. 伦理性约束

推广“最小必要数据采集协议”，通过有效的浏览器插件解决方案。以阻断非必要追踪，避免违规收集用户数据从而陷入隐私侵犯争议。该方案已在开源社区完成技术验证，部署成本趋近于零。在信息时代，用户比较看重互联网隐私保护，平台应该对这方面加以自我约束以树立良好品牌形象。且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国内的不断扩张与突破，相关法律法规势必愈加完善，企业应对此做出预案，避免处罚。

（四）理论贡献与研究延展

尽管模型尚未经历实证检验，但其构建具有三重学术价值：首先，通过“教育价值敏感度”等概念将抽象伦理原则转化为可讨论的技术参数，突破了传统批判研究“只破不立”的局限；其次，提出“算法殖民-价值锚定”的分析框架，为理解教育技术异化提供了新的理论透镜，例如将 VIPKID 的 AI 客服话术包装识别为“伪教育性营销”的典型样本；最后，设计的轻量化治理工具包为后续研究指明方向——未来可通过行动研究法，邀请县域教师参与开源工具迭代，形成“理论构想-工具开发-实践反馈”的螺旋上升路径。研究同时呼吁建立跨学科合作网络，将教育技术批判学者、开源开发者与基层教育管理者纳入共同工作框架，逐步推进理论模型的现实转化。

七、结论与建议

（一）技术异化：教育本质的算法消解

教育智能广告的技术应用已异化为对教育本质的系统性消解，其核心在于算法权力对教育价值的殖民与重构。以 VIPKID 为例，其宣称的“北美外教一对一”课程通过算法操控完成了从服务承诺到商业欺诈的蜕变。平台在课程进行至第 7 分钟（学生注意力波动临界点）植入弹窗提示，以“教师资源紧张”为由诱导家长将高价真人课程转为成本低廉的 AI 录播课。这种技术伪饰导致教学互动性断崖式下降，且事实上这一行为已经构成了欺诈，电子外衣无法使其逃脱责任。更严重的是，其算法模型通过分析家长聊天记录中的信息，分析消费者心理从而生成不同推销预案，并适时触发 AI 助教介入推销，形成“数据捕获-行为预测-需求制造”的剥削闭环。此类操作不仅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55 条，更阐释了一个现象——教育质量被虚化为算法可调节的弹窗变量，知识传递沦为数据再生产的附庸。

（二）数据暴力：隐私掠夺的技术闭环

深海教育案揭示了教育数据黑产的工业化运作逻辑，其本质是算法权力对公民隐私的系统性践踏。该机构通过“螳螂教育云”平台构建 AI 呼叫网络，利用 MicroSIP 技术伪造北京本地座机号码（如 010-5623***），日均拨出 1.2 万通骚扰电话，接听率较普通营销提升 5.8 倍。其底层数据库存储 23 万条非法获取的学生信息（含家庭住址、成绩单、课外班记录），每条以 0.3 元价格在黑市流通，形成“数据窃取-AI 轰炸-付费转化”的灰色链条。这种数据暴力不仅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14 条，更将通信网络异化为控制社会的基础设施——公民电话号码沦为算法围猎的坐标参数，教育机构从知识传递者蜕变为数据屠夫。

（三）焦虑制造：技术恐慌的符号剥削

教育直播间的智能广告通过算法剧场构建了技术恐慌的符号剥削体系，将知识传递异化为精神操控的流水线。主播利用 NLP 技术实时抓取社会热点（如“AI 取代人工”），生成“不会 DeepSeek=职场文盲”“错过风口=阶层跌落”等定制化恐吓话术，配合 GAN 伪造的学员收入截图（司法鉴定显示 98.6% 存在像素异常），制造集体认知危机。这种双模态操控（显性话术压迫+隐性算法操控）不仅违反《广告法》第 3 条真实性原则，更体现了布尔迪厄“符号暴力”的算法升级——技术话语通过情感操纵完成对教育价值的系统性碾压，知识沦为缓解焦虑的消费赎罪券。

（四）治理建议

1. 法律规制：构建穿透式监管框架

针对教育智能广告的技术异化，相关主体需修订《广告法》第 24 条，将“AI 课程效果伪造”“深度合成学员案例”等行为明确纳入禁止范畴，并设定违法所得五倍的高额罚款。例如，对 VIPKID 课程降级行为，应强制披露算法触发阈值及数据依据，要求平台按三倍课时费赔偿用户损失。同时，依据《刑法》第 253 条对深海教育类案件中的大规模数据窃取行为追究刑事责任，提高违法成本至非法获利的 300%。

2. 技术透明：推行算法民主化改造

开发开源审计工具包，支持第三方机构检测推荐系统的教育价值偏离度，要求平台实时公示数据流向。针对直播间焦虑营销，应部署多模态 AI 监测系统，通过语义分析识别“技术风口论”等恐慌话术，结合图像识别技术检测伪造的学员案例，实现广告内容的动态拦截与追溯。

3. 社会共治：重构教育数字生态

创建“教育数字主权账户”，赋予用户数据控制权：家长可设置单日 AI 广告曝光上限（如≤3 次）、屏蔽敏感关键词（如“抢跑”“上岸”），并自主选择数据共享范围（如禁止生物特征数据用于营销）。同时，在中小学课程嵌入“算法批判”模块，培养学生识别技术诱导的能力。推动成立多方参与的伦理审查委员会（家长代表占比≥30%），对教育广告进行社会影响评估，并将评估结果纳入企业信用评级体系，形成技术向善的生态约束机制。

参考文献：

- [1] P&S Intelligence. Education Technology Market Size, Share and Revenue Forecast by 2030[EB/OL]. (2022-09)[2025-02-26].
- [2] Perreault W , Mccarthy E J .Basic Marketing[J].Mcgraw-Hill Publ.Comp. 2004.
- [3] Kotler P , Keller K L , Brady M K ,et al.Marketing Management[J].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 [4] Schultz, D. E., Tannenbaum, S. I., & Lauterborn, R. F. (1993). 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Putting it together & making it work. NTC Business Books.
- [5] 杨建朝,王全.回归自由:教育消费主义批判[J].现代教育管理,2012,(08):16-20.DOI:10.16697/j.cnki.xdjygl.2012.08.009.
- [6] 朱浩亮,许科威,陈莉.在线教学与家长教育焦虑研究[J].中国教育科学(中英文),2023,6(04):104-113.DOI:10.13527/j.cnki.educ.sci.china.2023.04.010.
- [7] Kirschner P A , Sweller J , Clark R E .Why Minimal Guidance During Instruction Does Not Work: An Analysis of the Failure of Constructivist, Discovery, Problem-Based, Experiential, and Inquiry-Based Teaching[J].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2006, 41(2):75-86.DOI:10.1207/s15326985ep4102_1.
- [8] Casamassimo P S .The Ethics of Information[J].Pediatric Dentistry, 1995, 17(2):89.DOI:10.1108/AJIM-06-2014-0075.
- [9] Mok K H , Marginson S .Massification, diversification and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Critical reflections of developments in the last two decade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2021, 84(1):102405.DOI:10.1016/j.ijedudev.2021.102405.

- [10] 张有胜,季伟东.基于双位置编码 Transformer 的命名实体识别研究[J/OL].微电子学与计算机,1-11[2025-02-27].<http://kns.cnki.net/kcms/detail/61.1123.TN.20240926.1037.002.html>.
- [11] 刘涛,谢金森.基于 LSTM 神经网络的核电厂瞬态参数预测与故障诊断研究[J/OL].核动力工程,1-9[2025-02-27].<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1.1158.TL.20250227.1033.012.html>.
- [12] 白晓晴.数字平台文化生产的拓扑结构与治理革新——基于文化拓扑学的视角[J].南京社会科学,2024,(11):132-140.DOI:10.15937/j.cnki.issn1001-8263.2024.11.015.
- [13] 鞠宏磊,王宇婷.改写广告业的“实时”与“竞价”——实时竞价(RTB)广告的产业链流程和运行机制研究[J].编辑之友,2015,(04):57-60.DOI:10.13786/j.cnki.cn14-1066/g2.2015.04.01

Algorithmic Colonization and Value Reconstruction in Educational Intelligent Advertising: A Study on Pedagogical Alienation and Ethical Governance Under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Zhang Xiaoman¹, Lin Keyi², Guo Wenjun³, Wu Zhilin⁴
¹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Amidst the deep perme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into educational ecosystems, the algorithmic colonization mechanisms of educational intelligent advertising are progressively eroding pedagogical essence. Leveraging user profiling, multimodal generation, and contextual embedding technologies, intelligent advertising facilitates data-driven paradigm shifts in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reby constructing an education-marketing integrated ecosystem. This process manifests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through tripartite contradictions: algorithmic power encroachment on pedagogical agency, data violence in privacy exploitation, and anxiety-driven "educational consumerism." To address these conflicts, this study proposes a tri-dimensional optimization framework ("Precision-Educationality-Ethicality") and constructs a governance solution comprising an algorithmic auditing framework, educational value anchoring principles, and a lightweight governance toolkit. It emphasizes reconstructing digital educational ecology through penetrative regulatory mechanisms, algorithmic transparency enhancement, and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By transcending traditional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paradigms, this research provides critical theoretical lenses for intelligent advertising analysis and innovative pathways for educational ethical governance in the algorithmic intelligence era.

Keywords: Educational intelligent advertising; Algorithmic colonization;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Ethical governance; Data privacy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3.779

AIGC 视角下澳门文创产品数字化升级路径研究

蔡镕聪¹ 李甲辉¹(¹ 肇庆学院, 广东肇庆, 526061)

摘要: 目的探讨澳门文创产品在数字化升级中的应用与发展, 重点分析 AIG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技术的应用前景及优势, 并提出文创产业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的路径及案例, 展望智慧文创生态的未来方向。方法 通过搜集与分析相关文献和资料, 总结澳门文创产品数字化升级的路径, 提出具体应用案例与思考。结果 基于澳门 AIGC 应用现状, 研究提出“传统文化的数字化与创新”、“文创产品的升级与平台化发展”和“智慧文创生成”三阶段, 阐明文创产业数字化发展的具体策略。结论 通过 AIGC 技术的跨界融合与产业协同, 可推动澳门文创产业创新与发展, 同时助力文化传播和旅游资源的推广。

关键词: AIGC; 澳门文创; 数字化升级; 文化创意

一、介绍

在数字化浪潮和智能生态系统普及的背景下, AIGC 技术被广泛认为是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关键因素之一^[1]。AIGC 在文创领域的应用不仅限于内容的生成, 其影响更深远地触及到文创产品的整个生产、推广和销售流程, 成为推动文创产业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关键技术。在帮助文创产业解决现有挑战、探索新的商业模式以及创造独特文化体验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AIGC 能通过高级算法模拟人类创造性思维, 能够在音乐、数字艺术品及故事创作等领域自动生成具有创造力的产出^[2]。张志安等人的研究表明 AIGC 能显著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的传播影响力^[3], 而翟尤等人则对 AIGC 在整体发展和应用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总结, 指出其大模型和开源框架的易用性和可用性大大降低了进入门槛, 并扩大了其应用潜力^[4]。

在 2015 年, 澳门特区政府向中央提交“十三五”规划澳门章节的建议文本, 并在同年 10 月成立了“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委员会”, 以实现澳门成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战略目标^[5]。澳门要实现“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发展定位目标, 则文创产品对于城市发展的有着推动作用^[6]。作为“中西方文化结合”的典范, 澳门这一小而精的地方承载着丰富的商业、文化及艺术价值。历年来的视觉艺术年展、版画展、国际动漫节、时尚廊等活动, 都展现了澳门在本地及国际文化艺术领域的活跃表现。然而, 由于地理和市场的局限性, 澳门的文创产品面临着主体差异性小、内涵不够深入、参与主体不足和用户需求把握不清等问题, 这些都是澳门文创产业亟待解决的挑战^[7]。本文将通过对澳门文创产品数字化的现状进行详尽阐述, 结合 AIGC 的理论和实践, 分析其在澳门文创产品数字化发展中的特征, 并提出相应的策略和路径, 以期澳门文创产品的数字化转型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二、AIGC 概述和澳门文创

2.1 AIGC 的概念溯源与发展

生成式人工智能内容 (AIGC) 的发展历程从早期的基于规则的系统 and 简单机器学习模型, 已经演进到现在的复杂深度学习架构, 取得了显著的技术进展。最初, AIGC 技术主要应用于生成基本的文本和图像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 深度学习的不断发展, 特别是生成对抗网络 (GAN) 和变分自编码器 (VAE) 的引入, 极大地推动了内容的多样化和质量提升^[8]。在文本领域, AIGC 技术从早期的统计语言模型演化到现在的大型语言模型, 如 GPT 系列和 BERT。这些模型通过深度学习在大规模数据集上的训练, 能够生成从简

基金项目: 肇庆学院 2024 年度校级科研基金“肇庆四会市地豆镇吉祥物 IP 设计赋能乡村振兴研究与实践” (FW202403) 阶段性研究成果;

肇庆学院 2024 年度校级科研基金“四会文化品牌建设与宣传服务团队” (SD202412) 阶段性研究成果。

单对话到完整文章的复杂结构内容,其语法和语义上的准确性及连贯性得到了显著提升[9]。图像生成方面,自2014年GAN首次提出以来,这一技术经过多次迭代和改进,已能生成高分辨率、逼真的图像。这些图像广泛应用于艺术创作、游戏开发和电影行业,展现了其强大的视觉效果和创意表达能力。

声音生成领域也不例外,深度神经网络模拟的声音已被用于音乐制作和虚拟现实等应用中。这些技术的整合不仅优化了内容的生产流程,提高了效率,还通过个性化和定制化的内容创作,为用户提供了全新的互动体验(见图1)。从最初的实验性应用到现在的大规模商用,AIGC技术正逐步改变着娱乐、媒体和广告等多个行业的面貌。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领域的扩展,预计AIGC将继续在全球文化创意产品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推动行业创新并开辟新的商业模式。这不仅体现了技术的进步,也反映了市场需求的持续增长和技术应用的深化[11]。

综上所述,AIGC内容生成的特点可以总结为:①自主生成能力强,无需人工干预即可根据任务要求自动完成内容的创作、生成和渲染;②高度个性化定制,用户可以根据指令和需求灵活调整内容的风格和表现形式;通过AI的并行计算能力,显著降低人力成本,提高产出效率;③跨领域融合创新,结合文本、图像、语音、视频等多种模态信息,创造出新的内容表达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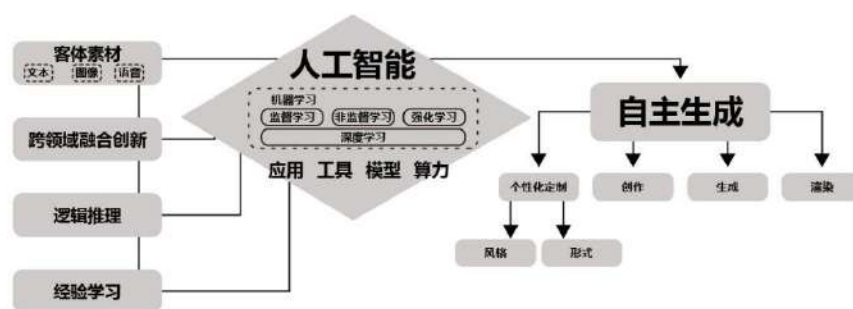


图1 AIGC技术生成路径流程(图片来源:作者自制)

2.2 澳门文创数字化发展现状

澳门文化创意产品正处于政策调整的关键期。根据澳门特区政府发布的《文化产品发展政策框架(2014—2019)》,澳门确定了包括设计、视觉艺术、表演艺术、服装、流行音乐、电影与视频、动画和出版在内的八个待发展的文化创意产品领域。继此之后,《文化产品发展政策框架(2020—2024)》进一步更新了澳门文化产品的发展方向,划分为“核心发展行业”、“培育扶持行业”和“融合发展行业”三大类,致力于推动“文化+”的产品发展策略。这些政策的实施旨在丰富澳门的经济结构,并减少其对赌博业的依赖,推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13]。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推动澳门经济多元化的大背景下,澳门政府专注于发展高附加值、高融合性、低消耗、低污染的文创产品[14]。尽管已取得一定进展,澳门的文创领域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资金支持不足、创意人才流失和国际市场曝光度有限。针对这些问题,学者李育菁提出,鉴于资源有限,澳门的每个文化创意产品都应展现出独特的发展模式,并进行详尽的产品分析,以确保有效利用本地有限资源[15]。

此外,澳门已开始尝试利用数字化手段保护和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文化创意工作坊和培训课程提升本地人才的技能 and 创新能力[16]。为实现全面的数字化转型,澳门还需要进一步整合现有技术资源,推动政策支持,并加强与国际创意中心的合作与交流,以期在全球文创领域占据一席之地(见图2)。

三、AIGC视角下澳门文创产品数字化升级的必要性

澳门文创产品的数字化已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AIGC技术为澳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创意工具,极大地提升了创作效率,使得文化遗产保护更为有效,同时为消费者提供了高度个性化的体验。这些技术的应用不仅扩展了澳门在全球文化市场中的竞争力,还增强了其文化的传播力。2019年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支持澳门作为“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并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的建设。该政策的实施大力推动了文化产品的发展,不仅提升了澳门的文化形象,也促进了经济的适度多元发展,丰富了澳门“一基地”建设的内涵。

尽管澳门拥有活跃的视觉艺术和表演艺术场景,以及逐步增长的时尚与服装产业,但由于地理空间狭小、人力资源匮乏和基础设施起步晚等因素的制约[13],特别是在创意空间、工作室和工坊方面存在明显限制。这些限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创意业务和个体的成长及生产力(见图3)。



图2 澳门发展现状（图片来源：作者自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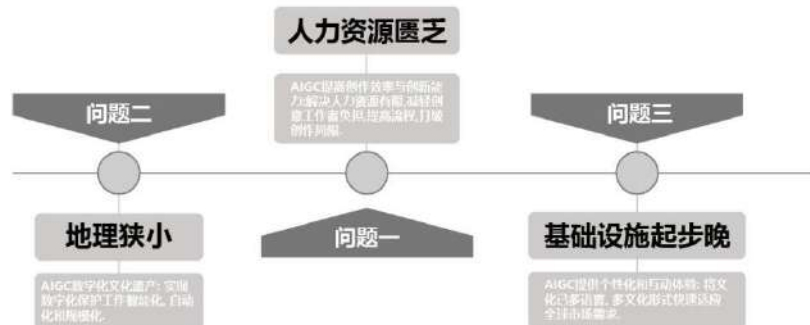


图3 澳门文创产业现存问题（图片来源：作者自制）

面对这些挑战，从四个方面来讨论其必要性：①提高创作效率与创新能力：澳门文创产品由于环境资源有限，加上行业的独特性和政策实施前的需求分析，面临着多重发展限制^[15]。例如，人才引进和回流的不足以及文创产业整体利润较低^[12]，这些因素均限制了文创产业的发展动力和创新速度。AIGC技术的自主生成特点能极大地缓解这些问题，通过减轻创作者的工作负担，减少对人力资源的依赖，使创作流程更高效。②数字化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播：澳门历史城区自2005年被联合国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成为我国第31处世界遗产，这些文化遗产在全球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和文化价值。然而，这些宝贵的文化资产随着时间的推移，面临着自然侵蚀、环境污染以及城市发展带来的损坏或消失风险^[17]。AIGC技术为应对这些挑战提供了创新的解决方案，它通过多样化的视觉素材和高级的表现手法，如影视特效和3D建模，实现了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工作的智能化、自动化和规模化^[18]。利用AIGC技术，澳门的独特中西文化建筑、传统节庆和民俗文化得以被精确地数字化保存，并通过线上虚拟展览等形式向全世界开放。这不仅大幅提升了澳门文化遗产的国际知名度，还有效吸引了更多国际文化旅游者，从而为澳门的文化旅游业带来了新的增长点。③提供个性化和互动体验：在数字经济时代，文化创意产品越来越强调个性化和互动性^[19]。在2022年，澳门文化局曾推出的澳门遗址VR导览项目，但个性化的用户体验不足，过于导览过程过于程式化^[20]。AIGC技术通过利用用户数据，如位置、偏好和行为等，生成定制化的文化内容，极大提升了用户的参与感和体验感^[21]。如陈晨制作的“竹里馆诗词意境疗愈空间虚拟现实”项目，它在虚拟空间中加入了大数据训练的诗词，通过AIGC生成方式实现实时互动解说，使用户能够个性化地深入了解中华文化诗词，显著增加了文化消费的沉浸感^[22]。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显示，全球文化和创意产品的跨国贸易正持续增长，其中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发挥着重要角色^[23]。AIGC技术使文化创意产品能够以多语言、多文化形式快速适应全球市场需求。例如，以“中国龙”为主题的纪录片《来龙去脉》通过AI全流程翻译保证了译制的准确性，高度还原了中文原片的意蕴，显示出这种技术的灵活性使得澳门文化能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更广泛的传播和认同^[24]。

四、AIGC技术在国内外文创领域的应用

4.1 国际案例分析

在韩国，AI技术在K-pop及数字文化产品中的应用已变得广泛。尤其在K-pop音乐领域，AIGC技术成功地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和商业模式。AI不仅用于生成新的音乐作品和舞蹈编排，还用于开发虚拟偶像，这些创新应用极大提高了产出效率，并拓宽了创作的可能性。例如，韩国的YG娱乐等公司已经利用AI生成音乐和舞蹈，创造出符合全球市场趋势的内容。此外，这些公司还通过AI驱动的虚拟偶像，有效地推广了K-pop文化到世界各地，这些虚拟偶像不仅吸引了国际粉丝，也为全球市场带来了新的商业机会^[25]。在

日本，作为动漫和游戏产品的全球领导者，AI 的深度应用展现了该国在 AIGC 技术方面的前瞻性。在动漫制作领域，AI 技术被用于自动化绘图、场景生成和色彩设计，极大地提高了制作效率和视觉质量。例如，AI 的应用使得动画师能够快速完成复杂场景的绘制，同时确保色彩的一致性和吸引力。知名游戏公司 Square Enix 利用 AI 技术生成复杂的游戏角色和情节，提升了游戏设计的效率和故事的深度。这不仅使游戏体验更丰富和吸引人，还显著缩短了开发周期，从而增强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通过 AI 的集成，Square Enix 能够快速响应市场变化，推出符合玩家期望的高质量游戏[26]。

澳门可以借鉴韩国在 AIGC 技术与 K-pop 音乐产业融合的成功经验，通过技术创新来推动本土文化的全球传播。韩国的 AIGC 技术不仅在音乐作品和舞蹈编排中得到应用，还成功开发了虚拟偶像，拓宽了文化产业商业模式和市场影响力。澳门可以利用其独特的中葡文化背景，结合 AIGC 技术，创造具有澳门特色的文化产品和虚拟形象，以此提升澳门文化的国际知名度和吸引力。澳门还可以学习日本在动漫和游戏产业中 AIGC 技术的应用，特别是在自动化绘图、场景生成和色彩设计方面的创新，以提升制作效率和视觉质量。澳门可以探索将 AIGC 技术应用于本地的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中，如通过 AI 技术重现历史场景、生成文化教育内容等，以此增强文化产品的吸引力和教育价值。

4.2 国内案例分析

在上海交响乐团与腾讯音乐的合作中，一项创新的 AI 音乐项目已成功实施，其核心目标是开发一个 AI 系统[27]，该系统能够学习古典音乐作曲技巧并尝试创作新的音乐作品。通过使用机器学习算法，该系统分析了大量古典乐曲数据，从而学习到不同作曲家的风格和技法。这使 AI 能够生成具有特定风格特征的新乐曲，不仅丰富了音乐创作的可能性，也为传统音乐带来了现代科技的新视角。上海交响乐团利用该系统在音乐教育和普及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效。该项目使得更多的观众能通过现代技术接触和了解古典音乐，从而提高了古典音乐的普及率和受众的教育体验。这种技术的应用不仅展示了 AI 在艺术领域的潜力，同时也强化了音乐与技术的跨界融合。沈阳故宫利用 AIGC 技术，成功衍生出新的文创产品设计，深入挖掘馆藏中的文化潜力[28]。该过程首先从确定目标用户群体的文化元素体验需求开始，运用皮尔斯符号学理论，选取在语义与内涵上较为统一的文化符号，以提高文创产品对用户经验的普适性。以手链这一受目标群体青睐的小型饰品为例，沈阳故宫选择了“白玉浮雕岁岁丰收如意”作为主视觉元素，并将其与其他辅助元素结合，创造了富有深厚文化内涵的产品。通过 AIGC 技术，沈阳故宫能够精准分析和整合这些文化符号，有效地将传统文化转化为符合现代审美和功能需求的文创产品。最后，通过多次迭代和实验，该技术不断优化产品的设计和生产流程，确保最终产品能准确地理解并满足用户需求。

澳门特别行政区在借鉴上海交响乐团与腾讯音乐合作的 AI 音乐项目以及沈阳故宫利用 AIGC 技术进行文创产品设计的成功案例时，应深入探讨并实施一系列策略，以促进本土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澳门可依托其独特的中葡文化背景，通过 AIGC 技术在音乐创作和表演艺术领域进行创新实践，以此丰富文化表达形式并提升文化教育的互动性与趣味性。其次，澳门应借鉴沈阳故宫的经验，深入挖掘和整合本地文化符号，利用 AIGC 技术设计符合现代审美和功能需求的文创产品，以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文化影响力。

五、AIGC 赋能下澳门文创产品数字化升级路径

在澳门文创产业的 AIGC 数字化升级中，关键应用领域涵盖了从传统文化保护到全球化推广的多个方面。首先，AIGC 技术被用于数字存档和保护传统文化，确保文化遗产得以安全保存。此外，通过增强现实 (AR) 和虚拟现实 (VR) 技术，传统文化体验得到显著拓展，为用户提供沉浸式文化体验。AI 与 3D 建模技术也被用来对澳门的建筑遗产进行精确的数字化复原。在产品创新方面，AI 工具支持创意产品的个性化和定制化设计，增强产品的市场吸引力。AIGC 技术还使得创建虚拟节庆活动成为可能，允许全球观众无国界地参与。在运营层面，智慧文创通过智能化工具和平台提升了文创产业的管理效率和市场响应速度。此外，AI 辅助设计与传统手工艺的结合，推动了传统技艺与现代设计的融合，同时，利用数字化和网络平台的跨地域传播策略，有效地将澳门文化推广到全球各地。这些技术的综合应用不仅增强了澳门文创产品的全球竞争力，也为文化遗产的创新和保护提供了有效手段（见图 4），并提出三个阶段性的数字化升级路径。

5.1 第一阶段——传统文化的数字化与创新

澳门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汇的独特城市，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文化遗产不断面临自然因素的侵蚀和历史变迁的威胁。在这种背景下，利用数字技术保护和传播这些宝贵的文化资源已成为当务之急。引入 AIGC 技术开辟了澳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存的新途径。通过 AIGC 技术，澳门的传统文化遗产不仅可以被精确地数字化记录，还能通过创新的形式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展示。这种技术不仅确保了文化遗产的长期保存，而且使其在全球观众面前以全新的方式呈现，增强了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



图4 澳门文创 AIGC 数字化升级内容 (图片来源: 作者自制)

5.1.1 通过 AIGC 进行建筑遗产的数字化复原

澳门的历史建筑, 如妈阁庙、大三巴牌坊、圣保禄教堂遗址, 展示了独特的中西结合建筑风格。然而, 工业经济的调整和土地用途的转变已严重破坏了澳门半岛的传统风貌[29]。为保护这些珍贵的建筑遗产, 引入了 AIGC 技术, 通过 3D 建模、激光扫描和 AI 图像修复等手段进行精确的数字化复原。这些技术不仅能够详细记录建筑的结构和细节, 还能预测和修复因时间和环境因素导致的损毁部分, 从而在数字空间中忠实地重建这些遗产的原貌[30]。比如, 妈阁庙的数字化复原可采用高精度 3D 激光扫描技术, 该技术能够捕捉妈阁庙复杂结构和精细雕刻, 生成高分辨率点云数据, 详细记录每个表面和纹理。结合深度学习图像修复技术, 特别是基于生成对抗网络 (GANs) 的模型, 通过学习大量相似建筑的图像数据, 自动推断并修复受损的雕刻和彩绘, 弥补缺失或损坏的部分。对于大三巴牌坊, 利用建筑信息建模 (BIM) 技术整合历史数据和现有遗迹信息, 在虚拟环境中重建其全貌, 并使用增强现实 (AR) 技术将 3D 模型呈现在实际遗址上, 使观众通过智能设备体验到完整的虚拟影像, 增强了参观的沉浸感和教育意义。在圣保禄教堂遗址方面, 采用结构光扫描技术对每一个细节进行精确测量, 这种技术适用于捕捉复杂和精细的结构, 同时创建了遗址的数字孪生 (Digital Twin) 模型, 作为一种动态的虚拟复制品, 它能实时反映物理遗址的状态和历史变化, 模拟不同环境条件和修复策略的影响, 为保护和修复提供科学依据。这些数字化技术和方法不仅有助于文化遗产的保存与传播, 也为公众提供了更加丰富和互动的文化体验。

5.1.2 传统节庆活动的数字化呈现

澳门的传统节庆活动, 如妈祖节和鱼行醉龙节, 是当地文化的重要体现, 也是吸引游客的重要文化名片[31]。然而, 这些活动通常受到地理和时间的限制, 使得全球观众无法亲身体验。借助 AIGC 技术, 我们可以将这些文化活动进行数字化转化, 通过 AI 生成的多媒体内容在虚拟空间中展现。妈祖节的 AI 增强体验通过结合先进的机器学习算法和计算机视觉技术, 为参与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个性化观赏和服务。利用机器学习分析用户行为和偏好, 系统能够提供量身定制的观赏建议和导航服务, 例如根据用户的过往互动推荐最佳观看角度或互动内容。同时, AI 图像识别技术被用来解释视频中的文化符号和活动元素, 如祭祀用品、传统服饰等, 借助深度学习模型训练于大量文化图像和解释性文本数据, 系统可以通过弹出窗口或语音解说的方式向用户提供这些元素背后的文化意义和历史背景。在鱼行醉龙节期间, 增强现实 (AR) 技术的应用进一步丰富了用户体验。开发的特定 AR 过滤器允许用户在其环境中与虚拟龙舟互动, 或将自己融入节日场景之中, 确保虚拟对象与现实世界的逼真融合。而实时动作捕捉技术则使用户的实际动作能够在虚拟环境中得到即时反映, 比如通过模仿划龙舟的动作, 用户仿佛亲身参与到激烈的龙舟竞赛中, 这一切都极大地提升了文化节庆的沉浸感和参与度。

5.1.3 传统手工艺的数字化传承与创新

澳门的传统手工艺如造船工艺、制饼文化、陶瓷和手工艺品制作等, 代表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然而, 随着全球化的加速以及年轻一代对传统技艺的兴趣转移, 这些手工艺面临着逐步消亡的风险。AIGC 技术为传统手工艺的保存与创新提供了全新的可能性。通过 AIGC 技术, 澳门的传统手工艺不仅能够实现数字化传承, 还能与现代创意产品相结合, 焕发出新的生命力。AIGC 技术在传统手工艺的保存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造船工艺的数字化与创新通过结合多种先进的技术, 正在重塑传统技艺的学习和传承方式。利用 AIGC 技术重建那些丢失或未完全记录的造船技术细节, 通过生成高质量的图像或模拟场景, 不仅展现了古老技艺的可能细节, 还能预测并展示未被文献记录的工艺流程。与此同时, 基于自然语言处理 (NLP) 的交互式教学系统增强了学习的互动性, 它能够解释复杂的造船术语和过程, 并以对话形式回答用户的查询。在制饼文化的数字展示方面, 深度学习食品识别系统使得教育应用中可以展示制饼的各个步骤, 并提供实时烹饪建议, 而虚拟现实 (VR) 技术则提供了全沉浸式的烘焙体验, 让用户在虚拟环境中学习传统制饼技术, 包括掌握配方比例、温度控制等复杂步骤。对于陶瓷和手工艺品领域, AI 辅助设计工具如 Adobe Sensei 帮助艺术家和设计师在保留传统元素的同时, 创造出符合现代审美的新作品, 极大地扩展了创意的可能性; 这些技术的应用不仅促进了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播, 也为公众提供了更加丰富和互动的文化体验。

5.2 第二阶段——数字化文创产品的升级与平台化发展

在“传统文化的数字化与创新”之后，澳门的文创产业进入了一个关键的转型阶段：数字化文创产品的升级与平台化发展。在这一阶段，文创产品不仅仅是对传统文化元素的数字化呈现，还包括了对这些产品形态和传播方式的深度改造和创新。

5.2.1 数字化产品的功能性拓展与多样化

数字化技术为文创产品带来了更广泛的功能性和应用场景。例如，传统的澳门手工艺品可能会通过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3D 打印等技术进行全新呈现，消费者不仅可以通过线上平台浏览和购买，还能通过虚拟环境与产品互动，体验更加沉浸式文化感受。同时，数字化赋能还可以使传统文创产品实现多样化的功能，如可定制化的虚拟文创商品、文化衍生品的数字收藏等。首先，AIGC 能够通过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为澳门的节庆活动如国际烟花比赛节与灯光节创造虚拟体验，使全球观众得以在线参与并亲自设计烟花图案，这样的技术不仅提升了活动的互动性，还扩大了其全球影响力。AIGC 的应用还体现在澳门美食文化的虚拟体验中，通过模拟澳门特色美食的制作过程，增强用户的沉浸感。在博物馆体验方面，AI 技术通过提供定制的导览服务和增强现实技术，优化访客的参观体验，同时对访客数据进行机器学习分析，以改善展览布局和提升访客满意度。对于澳门的传统手工艺品，如莲花章，AIGC 提供了在线定制平台，消费者可以个性化设计产品，并通过 AI 即时预览最终效果，这不仅满足了现代消费者的需求，也为传统手工艺品增加了市场价值。最后，澳门的艺术作品和文化遗产通过 AIGC 得以高精度数字化，不仅实现了文化保护，还通过在线展览使全球观众能够随时接触和欣赏澳门的文化财富。通过这些措施，AIGC 技术显著提升了澳门文创产品的创新性和市场竞争力，加深了其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

5.2.2 数字内容创意与艺术表现的融合

在这一阶段，澳门的文创产品不仅仅是商品，更是文化与艺术的载体。通过数字技术，传统的艺术形式和文化内容可以得到更具创意的表达方式。例如，澳门的历史遗迹、文化场景可以通过虚拟现实（VR）技术呈现，创造出全新的文化体验。这种创新能够吸引更多年轻一代的消费者，并提升传统文化的吸引力。例如，可利用 AIGC 技术开发了一个虚拟现实项目，项目中允许用户通过 VR 头盔在家中游览澳门博物馆和艺术画廊。这不仅为全球观众提供了无需前往即可体验澳门文化遗产的机会，也大大提升了澳门艺术的国际曝光率。AIGC 技术开发出一套可互动的教育工具，旨在教授澳门及其葡萄牙遗产的历史。这些工具利用增强现实技术，将历史信息与故事与现场或模型结合，使学习者能够在观看澳门老建筑的同时，通过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了解其历史背景和相关故事。在澳门年轻艺术家和设计师的推动下，AIGC 也被用于传统手工艺品的设计创新。采用 AI 技术分析市场趋势，并将这些数据与澳门传统元素结合，设计出符合现代审美且带有澳门特色的时尚饰品和服装。这种结合使产品不仅在本地市场，也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成功。最后，为了更有效地推广澳门作为文化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利用 AIGC 技术创建了一系列定制的多语种互动广告，这些广告根据观看者的地理位置和偏好动态调整内容。

5.2.3 跨界融合与产业协同发展

数字化技术使得澳门的文创产业能够与其他产业形成更加紧密的合作。例如，文创产业可以与旅游、教育、娱乐等领域进行深度融合，开发出文化旅游衍生品、互动教育产品等。在这一过程中，文创产业不仅可以借助其他产业的资源，还能够为相关产业提供创新解决方案，推动整个文化产业生态的繁荣与发展。在澳门，文创与旅游产业的结合尤其突出。游客通过特制的 VR 眼镜能够“步入”历史场景，比如重现的澳门街道和历史事件，如大三巴牌坊的建造或葡京酒店的早期历史风貌。这些体验不仅加深了游客对澳门文化的理解，也增强了文化旅游的吸引力。在娱乐领域，澳门的一些夜总会和表演场所开始使用 AI 来创造个性化的娱乐体验。

5.3 第三阶段——智慧文创生态的形成

随着 AIGC 技术的广泛应用，澳门文创产品迎来了智慧化发展的全新阶段。在这一阶段，澳门的文化创意产品从创作到生产、市场推广再到销售，逐步被整合到一个智能化的生态系统中。这个系统不仅提高了文创产品的生产效率和创意质量，还通过实时市场数据的分析和反馈，增强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智慧文创生态系统的形成，使澳门文创产品进入了更高效、灵活和创新的模式，能够更好地应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市场挑战。

5.3.1 文创产品全流程智能化管理

在 AIGC 技术的推动下，澳门的文创产业实现了从创意生成到产品管理的智能化转型。以澳门的文化标志性元素为例，AIGC 已被应用于设计和生产一系列与澳门历史建筑和文化遗产相关的产品。具体来说，澳门的文创公司利用 AI 分析大量的历史数据和当前的消费者趋势，开发了一系列以澳门旧城区的著名地标如圣保罗大教堂遗址、议事亭前地为主题的纪念品。这些产品通过 AI 的图像识别和 3D 建模技术，将澳门的传统艺术与现代设计完美结合，生成具有高度定制性和文化价值的消费产品。例如，使用 AI 驱动的工具创造了一系列互动视频，这些视频重现了澳门的重要历史事件和文化节庆，如东望洋炮台的历史重现和澳门灯光节的虚拟游览。这不仅提高了游客的互动参与感，也使得不能亲临现场的国际游客能够在线体验澳

门的文化魅力。

在产品管理方面,澳门的文创企业采用了智能化的库存和供应链管理系统。通过 AI 技术,这些系统能够实时监控市场需求,自动调整生产计划和库存水平,确保快速响应市场变化。例如,澳门的一家手工艺品公司通过 AI 分析工具预测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对特定产品的需求,如手绘葡式瓷砖,从而提前调整生产量以满足增加的市场需求。

5.3.2 市场数据驱动的动态调整

在智慧文创生态中,数据分析代表着文化认同度和产品消费意愿^[33]。在澳门,AIGC 技术已经开始在文创产业中发挥核心作用,特别是在市场趋势分析和产品开发调整中。例如,通过利用机器学习和数据分析技术,AI 系统能够追踪澳门的特色文化产品如葡式糕点、手工陶瓷和纪念品的市场表现。这些系统分析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和在线反馈,确定哪些元素——如设计、颜色或文化故事——最受欢迎。具体来说,澳门的一家纪念品公司利用 AIGC 技术进行市场数据分析,发现以澳门历史建筑如大三巴牌坊为主题的产品具有较高的销售潜力。基于这一发现,公司迅速调整其产品线,推出了一系列新的大三巴牌坊纪念品,如 3D 打印模型和增强现实体验套件,这些产品很快在旅游季节成为畅销品。此外,AIGC 的智能反馈系统使得澳门的文创企业能够将消费者的实时反馈转化为具体的设计改进。例如,当 AI 分析指出游客对更具互动性的文化体验有强烈需求时,一家澳门的文化展览公司便开始开发一款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让参观者亲自体验澳门历史事件的应用程序。这种应用不仅增加了展览的吸引力,也提高了教育价值和参与感。

5.3.3 文创生态系统的全球协作与扩展

在澳门,AIGC 技术的运用正在重新定义文创产品的全球化路径。使用 AIGC 来分析全球消费者的艺术偏好,并根据这些信息设计符合国际趋势的艺术品。通过使用 AIGC 技术,开发了一系列面向国际市场的虚拟现实体验。这些体验专门针对国外市场开发,例如:模拟澳门的年度赛车事件——澳门格兰披治大赛。通过虚拟现实技术,用户无需离家即可体验赛车的刺激和现场的文化氛围。此外,利用 AIGC 技术创建了一个在线平台,该平台使得澳门的工艺品制造商能够直接与国际设计师和消费者进行互动。通过平台,澳门的传统工艺如葡萄牙瓷砖画得以定制化的方式销售至全球各地,消费者可以根据个人喜好选择图案和颜色,而 AIGC 技术则帮助优化设计和生产流程,确保产品质量与市场需求的匹配。这些案例展示了澳门文创企业如何利用 AIGC 技术不仅在当地实现智能化管理,而且通过智能化平台积极融入全球文创生态系统,跨越文化障碍与全球文创企业、设计师、市场平台进行合作,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建立起强有力的品牌形象。

六、结论

AIGC 技术的迅猛发展为澳门文化创意产品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通过 AIGC 技术的应用,澳门文创产品不仅能够在创作效率和创新能力上获得显著提升,而且还可以有效地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为用户提供更为个性化和互动式的体验,同时也增强了澳门文创产品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具体而言,AIGC 技术不仅可以用于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存,还能促进传统手工艺的现代化创新,并与 AR/VR 等新兴技术相结合,创造出更加丰富多元的文化体验。此外,通过构建智慧文创生态系统,澳门文创产品实现了从创意生成到市场推广的全流程智能化管理,进一步强化了市场数据驱动的产品动态调整机制。最终,AIGC 技术不仅能助力澳门文创产品实现了更高层次的全球化传播,还可以文创产业内部的跨界融合与创新,为澳门文创产品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参考文献:

- [1] Ross P, Maynard K. Towards a 4th industrial revolution[J]. Intelligent Buildings International, 2021, 13(3): 159-161.
- [2] Zhou E, Lee D.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uman creativity, and art. PNAS nexus[J]. 2024, 3(3): 52-53.
- [3] 张志安,吕伟松. 增强“虚拟现实”: AIGC 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质生产力 [J/OL]. 青年探索, 2024, (05): 25-36[2024-09-26].
- [4] 翟尤,李娟. AIGC 发展路径思考: 大模型工具化普及迎来新机遇 [J]. 互联网天地, 2022, (11): 22-27.
- [5]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 5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23-03-02)[2024-07-21]. https://cnnic.cn/NMediaFile/2023/0322/MAIN1679457_6367190GBA2HA1KQ.pdf.
- [6] 张伯伦,李鑫宇,施瑞婷,等. 何去何从: 澳门文创产品的发展现状与创新策略研究——基于创新扩散理论视角 [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2023, 7 (20): 107-112.
- [7] Azevedo M, Barbosa A.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as an integrated factor in a sustainable model for Macao's economic development[J]. Creative Industries Journal, 2014, 7(2): 121-133.
- [8] Cao Y, Li S, Liu Y, et al. Sun L.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ai-generated content (aigc): A history of generative ai from gan to chatgpt[J/OL]. arXiv:2303.04226.
- [9] 张家榕,洪鹭,叶鹰.GPT 类 AI 技术支持下的艺术创新[J].图书馆杂志,2023,42(05):14-19.
- [10] 杜华,孙艳超. 生成式人工智能浪潮下知识观的再审视——兼论两个经典知识之间的当代回应 [J]. 现代教育技术, 2024, 34 (01): 96-106.
- [11] Wan J, Zhou L, Wang Y.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AIGC+”: A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AIGC[C].

- In Wuh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business, 2024: 118-129.
- [12] 林发钦,李佳桢. 澳门文化产业政策: 现状、问题与体系创新 [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06): 28-38.
- [13] 苏武江.澳门文化创意产品发展路径研究[J]. 科技管理研究,2012,32(24):64-68.
- [14] 王兰,吴志强,邱松. 城市更新背景下的创意社区规划:基于创意阶层和居民空间需求研究 [J]. 城市规划学刊, 2016, (04): 54-61.
- [15] Lee Y. Peng C. Lee T, et 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sess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in Casino cities: A case study of Macao[J]. Sustainability, 2022, 14(8): 47-49.
- [16] Macau Business. Special Report An overview of Macau's creative industry[EB/OL].(2023-08-02)[2024-08-21]. <https://www.macaubusiness.com/special-report-an-overview-of-macaus-creative-industry/>
- [17] Chung T. Valuing heritage in Macau: On contexts and processes of urban conservation[J].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2009, 38(1), 129-160.
- [18] 沈浩,任天知. 智能重构传播生态: 内容生成的范式演进与智能交互的未来构想 [J]. 现代出版, 2024, (07): 55-63.
- [19] 于宜民. 从晴雨表、助推器到信息动脉: 数字经济时代广告的价值升维 [J]. 传媒, 2023, (15): 78-81.
-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入口网站. Online virtual reality (VR) tours service introduced for five World Heritage sites allowing the public to visit the Macao World Heritage through innovative technologies[EB/OL].(2022-12-12)[2024-08-27]. <https://www.gov.mo/en/news/289021/>
- [21] 李程,袁勇,郑志勇,等. 基于区块链的联邦学习:模型、方法与应用 [J]. 自动化学报, 2024, 50 (06): 1059-1085.
- [22] 陈晨,何卓芬,蔡奕辉. 竹里馆诗词意境疗愈空间虚拟现实交互设计研究 [J]. 包装工程, 2024, 45 (S1): 38-47. DOI:10.19554/j.cnki.1001-3563.2024.S1.005.
- [23] Deloumeaux L. Global flow of cultural goods and services: still a one-way trade[M]. Montreal: 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2022: 163-181.
- [24] 央视网. 来龙去脉 [EB/OL]. (2024-02-06) [2024-07-23]. <https://tv.cctv.com/2024/02/06/VIDAYPUGvZFvbd0p0ETAErhmh240206.shtml>
- [25] BBC News. 韩国 Kpop 出现 AI 女团虚拟歌手走进流行乐坛 [EB/OL].(2022-12-13)[2024-05-14].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63940314>
- [26] 游戏大观. 看好 AIGC 潜力, 将加码 AI 游戏研发 [EB/OL].(2024-01-05)[2024-08-07]. <http://www.gamelook.com.cn/2024/01/535398>
- [27] 中国日报. 科技与艺术的交响: 腾讯音乐与上海民族乐团首创 AI 民乐新境界 [EB/OL].(2024-02-21)[2024-08-07]. <https://sh.chinadaily.com.cn/a/202402/21/WS65d5baf7a3109f7860dd27c3.html>
- [28] 赵文强,臧欣慈. 皮尔斯符号学视域下 AIGC 对文创产品的设计探索 [J]. 包装工程, 2024, 45 (10): 116-126.
- [29] 樊飞豪,朱慧. 澳门近代工业遗产适应性再利用研究——以益隆炮竹厂为例 [J].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 2022, 37 (05): 143-150.
- [30] 杨小晖,米高峰. AIGC 设计赋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 [J]. 工业设计研究, 2023, (00): 294-300.
- [31] 王一鸣,陈震. 试探澳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文化空间保护 [J]. 文化产业研究, 2022, (01): 416-425.
- [32] 李宝军,唐玲. 人工智能背景下广西民间手工艺的发展与保护 [J]. 艺术大观, 2024, (04): 103-105.
- [33] 崔贺轩.文化认同对文创产品消费意愿的影响研究——自我认同与产品涉入度的作用[J/OL].长江师范学院学报,1-8[2024-09-27].<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0.1195.Z.20240919.1412.002.html>.

Research on digital upgrading path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Maca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IGC

Rongcong Cai¹, Jiahui Li¹

¹ School of Art, Zhaoqing University, Zhaoqing,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cao's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digital upgrading, focus on analyzing the application prospects and advantages of AIGC (Artificial Intelligent-generated Content) technology, and put forward the path and cases of deep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with other industries, and look forward to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smart cultural and creative ecology. Methods By collecting and analyzing related literature and materials, the path of digital upgrading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Macao was summarized, and specific application cases and reflections were put forward. Results Based on the application status of AIGC in Macao, three stages of "digitalization and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upgrading and platform-base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nd "generation of intelligent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were proposed, and specific strategies for the digital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were expounded. Conclusion The cross-border integration and industrial collaboration of AIGC technology can promote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cao's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and at the same time help the promotion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tourism resources.

Keywords: AIGC, Macao Cultural and Creative, Digital upgrade, Cultural creativity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3.727

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路径分析

赵静文¹

(潍坊食品科技职业学院, 山东 潍坊 261000)

摘要: 高校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 爱国主义教育则是高校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高校要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加强对大学生爱国主义精神的培育, 需要发挥红色文化铸魂育人的基本功能。本文从红色文化概念的界定出发, 分析了高校爱国主义教育 with 红色文化资源融合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以期推动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的合理开展。

关键词: 红色文化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 价值意蕴; 实践路径

一、引言

爱国主义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德, 在新时代发挥了强大的精神引领作用。红色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爱国主义教育不竭的动力源泉。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爱国主义教育, 是推进青年大学生思想上层建筑的现实需要。高校要充分发挥红色文化资源的铸魂育人功能, 与时俱进创新思想, 加强对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怀培养, 让大学生成为爱国主义的坚定信仰者、积极宣传者、模范践行者。

二、红色文化资源的基本概念

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追求民族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征程中所积累的文化资源, 表现为物质类型、精神类型、制度类型的历史文化遗产。^[1]物质类型主要指以实物形态存在的红色文化资源, 例如战争旧迹遗址; 精神类型要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形成的精神品质, 如南泥湾精神、井冈山精神等; 制度类型主要指中国共产党所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引领在各个时期形成的方针、纲领、政策;

(一) 物质类型的红色文化资源

物质类型的红色文化资源主要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涌现的事件、遗迹和人物。“事件”指的是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革命活动或事件, 如红船事件、三湾改编等; “遗迹”则指的是革命先烈在革命斗争过程中遗留下来的旧址旧迹等, 如井冈山革命遗址、浮山革命遗址等。“人物”指的是对革命产生一定影响的英雄人物, 如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王荷波、中国革命青年的模范代表——恽代英等等。红色物质文化资源是其他类型资源的创立发展的基础, 以物质为载体的红色文化资源, 主要涵盖革命博物馆、烈士纪念馆等承载革命文化的建筑体。红色物质文化资源的特征表现为资源类型呈现地域差异性, 资源分布呈现空间聚集性。首先, 不同地区的红色物质文化资源的地域特色十分突出。例如福建省作为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本省红色文化的研究要立足于苏区红色文化基础之上。福建著名红色地标闽西苏区内保留了大量的红色遗迹, 以“闽西苏区·红色福建”为主题的红色路线, 涵盖了才溪乡调查纪念馆、三明市清流县红军标语遗址等红色资源。资源分布方面, 红色资源主要集聚于在革命事件的发生地, 例如作为闽东红色文化之光的宁德市, 现存红色旧址 50 多处, 包含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旧址、畚族革

作者简介: 赵静文(1999-), 女, 潍坊食品科技职业学院思政教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

命斗争纪念地等著名红色景点。革命斗争、历史遗迹、英雄人物,这些红色物质文化资源都是高校拓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好帮手。^[2]

(二) 精神类型的红色文化资源

精神类型的红色文化资源是指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实践探索后积淀而成的红色精神谱系。红色精神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与灵魂中早已深根固柢,不同时期形成的红色精神内涵各有不同,但均能代表中国人民高尚的精神品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红色精神有:土地革命时期形成的“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井冈山精神;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南泥湾大生产实践中形成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南泥湾精神;解放战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在西柏坡期间形成的,包括“敢于胜利的开拓进取精神、依靠群众和团结统一的民主精神、戒骄戒躁的谦虚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在内的西柏坡精神等等。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的红色精神有:以体现“向上”人生态度与“向善”价值追求的雷锋精神;以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大庆精神等。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程中所形成的红色精神有:以“热爱祖国、为国争光的坚定信念,勇于攀登、敢于超越的进取意识,科学求实、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同舟共济、团结协作的大局观念,淡泊名利、默默奉献的崇高品质”为内涵的载人航天精神;以“互相帮助、助人为乐、不求回报、无私奉献”为内涵志愿者精神等。^[3]历史悠久、内涵深厚的红色精神文化资源能为高校爱国主义教育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从而激励大学生报国之志与强化其爱国之行。

(三) 制度类型的红色文化资源

作为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构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红色文化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阶段性成果。红色文化的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它不仅是一个符合客观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其生成基础也会受特定环境中的社会制度的影响。红色制度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指引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时期所形成的方针、纲领、路线、政策等一系列系统的行为规范体系。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致力于建设国家制度体系。1921年中共一大,党承认并采用“苏维埃管理制度”,这是党制度建设的起点。1927年的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抗日战争时期是我们党在制度建设上的成熟时期,1940年党推行了“三三制”的政权组织模式,着重健全民主集中制。1945年中共七大的党章系统阐释了党内民主集中制。解放战争时期,党建立健全了报告制度、党委制度。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建立完善集体领导制度、党内监督等制度,提高了党的制度建设的科学化水平。^[4]红色制度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形态,对社会发展影响甚大。高校应该深度挖掘制度文化的价值,将教学课程与红色文化资源结合起来,提高爱国主义教育的教学质量。

三、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现状

红色文化资源对高校爱国主义教育产生的积极作用是无可置疑的,但目前红色基因与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融合工作还存在不尽人意的地方,主要表现为:授课方式单一,网络教学平台搭建不够完善;教学内容缺乏时代性,教育资源挖掘不够充分;宣传、管理、评价不到位,教育机制不够健全。

(一) 授课方式单一,网络教学平台搭建不够完善

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爱国主义教育所采用的模式是教师单方面的理论灌输法。高校教师使用爱国主义教育资源进行教育工作常以自我为中心,这种传统教学的思维模式,使学生在学习中处于被动状态,积极性不高。长此以往,会逐渐降低学生对爱国主义教育的学习兴趣。学生是课堂的主体,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应该与灵活多元的授课方式结合在一起,使学生摆脱传统教学模式的形式化。信息化时代来临,爱国主义教育 with 红色文化资源的融合发展离不开网络教学平台,加之疫情以来,在线授课的模式被大范围推广,对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要求随之提高。但部分高校新媒体设施准备不足、投入不够,比如高校自主搭建的红色文化网站,版面设计单调乏味无亮点,多由简单的文字和图片拼凑而成,而且内容也不能及时更新,所以高校在利用红色文化资源的方法上需要进一步改进。^[5]

(二) 教学内容缺乏时代性,教育资源挖掘不够充分

近年来,从事爱国主义教育的师资队伍水平显著提高。但在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工作中还存在各种不尽人意的现象。比如在课程里的红色文化不够全面细致的情况下,部分高校不能及时拓展扩充,反映在教育内容上,高校的授课内容大多局限于宣传特定革命时期的经典英雄事迹。停留在历史

理论总结归纳的粗加工方面,不能将红色革命文化与新时代红色理论体系相结合,缺乏对红色文化的深入加工与解读,导致教学内容的吸引力不强,教学效果不佳。对红色经典的讲解,虽然可以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但革命年代与当今社会的时代背景毕竟大不一样,缺乏时代性的解读,会拉开学生与革命先烈间的距离,降低学生的学习兴趣。所以教师的自身理论素养要得到加强,爱国主义理论的讲述应充分挖掘新时代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将新鲜的红色文化资源投入到教学中去。

(三) 宣传、管理、评价不到位,教育机制不够健全

高校教育机制的不完善体现在宣传力度不够、上级管理流于形式、评价反馈滞后与缺少。从而使红色文化资源融入爱国主义教育的工作情况不甚理想,无法做到红色文化教育的常态化模式。首先,高校宣传运营机制不成熟,导致红色资源的重要性只体现在各种文件报告中,而不能融入到课堂中的爱国主义教育里去。其次,上级管理流于形式,不重视教育活动的实质性进展,缺乏对教育工作的监督。最后,评价反馈的滞后与缺少使教师工作缺乏针对性,不能因材施教、及时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来调整教学计划。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在开展中,需要构建宣传、管理、评价于一体的规范化教育机制,给红色文化资源的融入工作提供良好保障,避免学生弱化爱国主义教育精神和内容,从而实现对学生的有效管理,促进教育的良性发展。

四、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路径

实践出真知,红色文化资源以应用于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研究不能仅仅聚焦于理论维度,更重要的是能融入到实践维度中。在爱国主义教育中融入“红色基因”是高校牢记铸魂育人使命、落实立德树人任务的重要途径。高校要充实教育工作者的红色文化底蕴、构建爱国主义网络教学平台、健全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管理机制。

(一) 充实高校教育工作者的红色文化底蕴

开展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教学工作,关键在教师。教师需要具备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才能提升红色经典以及红色基因传承的质量。提高教师的红色文化底蕴要深度挖掘学校可利用的资源。首先,注重提升教师的红色理论素养,让教师充分把握理解红色文化资源的道德引领价值,在教学中强化“理论学习”与“实践活动”有机结合,明确教育目标、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评估的针对性与有效性,从而保障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的顺利进行。其次,高校应该组建专业教研团队,让具有丰富工作经验与优秀教学能力的教师投身于红色文化资源的研究上。比如福建省委教育工委牢记红色基因铸魂育人使命,组织福建师范大学、厦门大学、福建农林大学、闽南师范大学等专家教授共同编写、审阅、出版了《福建红色文化读本·大学版》,该书对福建的红色历史进行了全面解读,以期广大高校青年学生从中深刻领悟红色精神信仰的光辉,自觉把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行融入到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来。最后,各高校间可以通过开展相关学术讲座、报告会来交流彼此间的教学经验,实现取长补短,以提升教育工作者在传承红色文化中的宣讲水平。

(二) 构建爱国主义网络教学平台

近年来,由于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高速发展,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应用平台不断普及,互联网教学平台打破了传统的课堂实地教学方式,是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新型教学方法。例如,微信是备受学生欢迎的新媒体平台,微信公众号也是高校发布学校科研效果、宣传最新动态的重要窗口。全国各大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微信公众号要实时更新推送学院在各地调研报告、青年学生代表的思想心得、学校精品课程的在线微课。以便学生能及时获取知识信息,加强其意识形态的建设,打造了独具特色的宣传思想阵地。目前,线上授课、流媒体宣传成为新趋势,创新搭建爱国主义网络教学平台显得十分重要。高校应创建具有爱国主义教育精神的红色板块,提升主流价值观的吸引力,通过红色影视作品展播、红色文化征文等形式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释放红色文化教育的魅力。另外要重视对网络平台的监管与治理,防止恶性信息的入侵,使学生可以在良性环境的下自由浏览、自主学习,推动网络正能量的传播和发展。

(三) 健全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管理机制

高校肩负人才培养重任,应健全爱国主义教育管理机制,保证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首先,高校应该贯彻“齐抓共管、齐心协力”的工作模式,发挥党领导的核心作用。高校党政一把手要起到带头模范作用,率先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课堂授课听课,从思想、行动等各方面研究挖掘红色文化资源,提高自身的红色

文化认知水平, 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高校领导重视红色文化铸魂育人, 彰显了高校教育立德树人的价值追求。不仅能激发学校教研团队的积极性, 而且能打造学习红色文化的良好校园氛围, 能保证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另外, 高校可以搭建思政领导班子, 主要负责红色文化资源融入爱国主义教育实际方案的制定与落实, 也要通过健全爱国主义教育人才队伍激励机制, 提高教师从事爱国主义教育的积极性, 以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的长期稳定。

五、结语

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遗留下的宝贵遗产, 是高校爱国主义教育不竭的动力源泉。新时代背景下, 高校要以红色文化为传播的载体, 要深度挖掘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意蕴, 坚持以培养爱国主义精神为教育的目的, 推进红色文化与爱国主义教育的融合式发展, 使高校大学生继承传播好时代精神之歌, 做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参考文献:

- [1] 胡杨,汪勇.略论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0, (08) .
- [2] 陈月宵,李星.论红色文化多维价值及其生成方略--兼以福建红色文化为叙述背景[J].思想教育研究,2022, (02) .
- [3] 祝新宇.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英雄精神研究[J].新乡学院学报,2025, (02) .
- [4] 中共安徽省委组织部安徽省党建研究会.党的制度建设的成就与经验[J].党建研究,2021, (06) .
- [5] 易玲,石傲胜.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保护和传承: 价值、成效及路径[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5, (01) .

Analysis of the Practical Path for Integrating Red Cultural Resources into Patriotism Education in Colleges

Zhao Jingwen

Weifa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eifang, Shandong 261000

Abstract: Colleges are the forefront of ideological work, and patriotic education is the top priority of their work. To fulfill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ing virtue and nurturing talent, colleges need to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of patriotism among college students by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basic function of red culture in shaping the soul and nurturing people. Starting from the definition of red cultu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integration of patriotic education in colleges with red cultural resources,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with the aim of promoting the rational development of patriotic education in colleges .

Keywords: Red cultural resources; Patriotic education; Value implications; Practical paths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3.681

叶盛清明集句组诗的游戏化及其诗歌阅读史

李旭辉¹

(¹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100875)

摘要: 明代著名藏书家叶盛受元代诗人陈孚影响, 自天顺二年(1458)至成化三年(1467), 连续十年不间断地创作清明集句组诗, 每年一组十首, 共计一百首。其集句行为起初目的是为缅怀亲人与排遣哀伤, 后逐渐将其游戏化与艺术化。由于叶盛所集诗歌较多, 且被集诗人所属时代范围较广, 通过对叶盛所集诗人的频次进行分析, 可以侧面反映叶盛的诗歌阅读偏好, 能够更好地理解叶盛的文学观念与创作。

关键词: 叶盛; 清明组诗; 游戏化; 阅读史

清明既是二十四节气之一, 代表天朗气清与草木繁茂, 是踏春郊游的美好时光; 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 是寄托哀思与缅怀亲人的重要日子。历代有关清明的诗歌数不胜数, 明代著名藏书家叶盛亦创作了不少有关清明的诗歌。叶盛(1420-1474), 字与中, 江苏昆山人, 生平藏书甚富, 在藏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其所作清明诗歌中最具特色者当属集句组诗。自天顺二年(1458)至成化三年(1467), 叶盛连续十年不间断地创作清明集句诗, 每年十首绝句, 共计一百首。叶盛之父叶春逝世于景泰七年(1456)十一月, 天顺二年叶盛控制在家守孝, 三月十四日, 奉敕返回京城, 四月初十日, 升任两广巡抚。^[1]当年叶盛首次作清明集句诗, 题目为《清明日金潼墓祭后仲益令季十郎诵陈刚中安南十首因取刚中所弃余如数集成付之皆唐句》, 这组诗是十组诗中唯一没有明确年份信息者, 然此诗之后即天顺三年所作《己卯清明集句十首寄与谦》, 其诗前小序云“因再集唐句十章, 用续去年故事云”^{[2]32}, 可见首作年份应为天顺二年, 其动机亦相符合, 在朝廷夺情起复后, 离家之际恰逢清明, 故叶盛去父亲墓前祭拜辞别。金潼即积善乡金潼阡, 应为叶盛父亲墓地, 其《三月三日清明》一诗有“金潼阡在玉峰前, 不哭清明已七年”, 其后小注云: “虞氏女先茔在东, 吾家金潼阡在西, 不远数十步。”^{[2]25}

仲益即叶盛之弟叶益, 陈刚中为元代诗人陈孚(1240-1303), 号勿庵, 浙江临海县人, 至元二十九年(1292), 朝廷任命陈孚为五品副使, 出使安南(今越南), 终不辱使命, 著有《观光集》《交州集》等。陈孚作《入安南以官事未了绝不作诗清明日感事因集句成十绝奉呈贡父尚书并示世子及诸大夫篇篇见寒食》, 此应即叶盛所谓《安南十首》。叶盛之所以选择附陈孚之骥尾, 其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陈孚出使安南的经历, 安南邻近广西, 陈孚行旅之时创作了不少有关广西风光的诗歌, 而叶盛即将上任两广, 其关注陈孚自然在情理之中。二是陈孚清明集句之主题相合, 叶盛作诗之时亦逢清明。在传统节令与地理空间的双重影响之下, 叶盛以陈孚集句诗中未使用的诗句, 另集十首以达己意, 这与一般的集句诗有所不同, 其所集诗句的选材是固定的, 即只能将陈孚弃用的诗句重新排列组合, 因此难度更上一个台阶。由此, 叶盛开启连续十年清明集句创作, 其后人亦引以为佳话, 如叶奕苞《经锄堂唱和诗》云: “集句清明成故事先文庄每岁清明, 辄集古今诗句遣兴, 临风洒泪一高歌。”^[3]从小注也可看出, 叶盛清明集句组诗并不全为悲戚基调, 遣兴亦是重要目的之一。

一、集句创作的游戏化

集句作为一种文学创作方式, 其细分类别有集句诗、集句词、集句散曲、集句联等, 它是在对文学作品阅读理解的基础上, 撷取不同的文字片段, 在符合目标文体创作规则的大前提下, 对文字片段重新进行

作者简介: 李旭辉(1991—), 男, 湖北黄冈人,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排列组合,使之成为一首全新的作品,新作品应蕴含集句者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与特殊功能,即起到一种“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效果,这与先秦时期外交场合赋诗言志的断章取义,在表达方式上有相类之处。

叶盛的集句组诗以清明为主题,而这种主题的诗歌一般容易陷入沉闷的哀伤情绪之中,然采用集句的方式进行创作,使得作品呈现游戏化与艺术化的特点,为清明诗歌奠定了不一样的情感基调。从一开始其创作动机的确是为父守孝之际,面临离乡宦游,故以清明组诗抒发自己的哀伤情绪,如“高坟新起白峨峨”“清明几处有新烟”“落日深山哭杜鹃”等句都能体现父丧期间的悲怆之情。但随着每年都进行集句创作,以至于后来几乎成了一种游戏,而游戏化的行为与清明主题出现反差,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消解了哀伤情绪。集句这种创作方式本身就具备游戏文学的特点,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炫耀丰富的学识与再构的巧思。叶盛集句组诗从原本偶然为之的行为,逐渐变成一种自觉的行为艺术。这种游戏化与艺术化不仅体现在所集诗句选择上,更体现在历年诗题及小序的变化方面。以下是叶盛十年所集清明组诗的诗题及诗前小序文本。

表1 叶盛清明集句诗题及小序文本

年份	诗歌题目	诗前小序
天顺二年 (1458)	清明日金潼墓祭后仲益令季十郎诵陈刚中安南十首因取刚中所弃徐如数集成付之皆唐句	
天顺三年	己卯清明集句十首寄与谦	己卯清明前七日,泷水班师至德庆。时西广边报益急,且追惟金潼墓祭已及三期,而不肖扫松之役,仅得中间一回耳。不胜家国忧思,陨涕不已。因再集唐句十章,用续去年故事云。
天顺四年	庚辰广中寒食时予将有入觐之行再用故事集唐十章楚乡秦川云者予十年前尝游楚今潯州有秦川堡在焉	
天顺五年	辛巳清明即兴集唐人语首数亦与前三年同	
天顺六年	壬午清明集句十首	二月二十九日清明节,予在大藤峡营中,客有归吴来言别去,因集元人诗为短句十章示之,盖亦往年例云。
天顺七年	癸未岁广东察院清明集本朝名人诗十首	
天顺八年	甲申清明集句十首	天顺八年春清明节即景感怀集宋贤诗句十首越台一首用杨东山先生木犀语者广州桂树春花盛开亦纪异之一云
成化元年 (1465)	乙酉清明集句十首	菴竹堂有清明集句故事,盖唐宋元人以及国朝之作略备矣。乙酉三月三日,关北清明,以《昆山杂咏》为主,继以昆山前辈之作,若时代则有不拘者焉。
成化二年	丙戌清明集句十首	成化丙戌三月十一日清明节,盖寓宣府再见清明矣。怀亲悼昔,莫能为情,偶阅宋人小词,因摘用清明寒食句,杂用诸家语,成诗十章云。
成化三年	丁亥岁宣府行台三逢寒食仰瞻四陵南望亲舍切乎怀归体国之心焉谨集唐宋元人成句为诗十绝	

从诗歌题目中的年份信息来看,除第一次外其后九次均有明确年份,可见叶盛第一次清明集句时,并未想到后来会继续这一行为,因此未能与后面保持一致。叶盛清明集句的游戏化进程可分为四个时期,天顺二年(1458)至天顺五年为初步定型期,天顺六年至天顺八年为发展高峰期,成化元年(1465)至成化二年为转型衰落期,成化三年为总结完成期。

天顺二年,叶盛在陈孚的影响下开启清明集句组诗,并且确立集唐诗的个人传统,自此开始每年清明十首集句组诗。天顺三年清明前后,广西军情紧急,叶盛忆及扫墓之事陨涕不已,故怀着家国之忧效仿去年再集唐诗十章,即其所言“故事”,既称“故事”,说明此时已有游戏化的主观意愿。天顺四年寒食,叶盛赴京觐见“再用故事集唐十章”,又一次使用“故事”一词,使得游戏化的意味愈浓,并且本次诗题中并无伤感之

词,甚至颇费笔墨解释诗中“楚乡”与“秦川”之本事。天顺五年,诗题中不再强调“故事”,而使用“即兴”代替,明确集句组诗的动机已经不以表达悲感为主,而只是“即兴”的一种文字游戏,特地说明“首数亦与前三年同”^{[2]36},进一步证明集句行为的程式化。

在集句组诗的行为模式初步定型之后,连续四年的集唐诗令人颇觉呆板与单一化。于是自天顺六年始,叶盛自觉寻求新的突破,其解决方案是放弃专集唐诗的传统,同时保持一年专集一朝诗人不变。天顺六年清明节,叶盛在大藤峡军中,身处兵家必争之地,战事尚未停歇,有客归吴来告别,此时集句兼有送别与怀亲之意。因是第一年改变集唐诗惯例,转而专集元人诗句,故特意解释除所集朝代改变外“盖亦往年例云”^{[2]37},说明集句行为的游戏化正在延续进行中。天顺七年,诗题中交代了集句时间地点,以及顺承上年元人之后专集“本朝名人诗”,此外并无过多信息,因为清明集句早已成为“故事”,如非必要不再需要次次进行强调。天顺八年,因唐、元、明三朝诗人已有被集句,中间跳过的宋朝诗人在此次补上,主题是“即景感怀”,所见乃“广州桂树春花盛开”之景^{[2]40},可以说本年已经完全脱离伤感情绪,真正进入清明的另一主题,即赏春与游春。至此,叶盛清明集句所集诗人在唐、宋、元、明四朝均有存在,从游戏化的角度来看获得了圆满,达到了集句游戏发展的高峰阶段。

成化元年,叶盛离开了任官六年的两广,第二次来到宣府大同任职,关北清明的严寒与花城的暖春形成鲜明对比,而叶盛的清明集句游戏显得有些难以为继,因为“唐宋元人以及国朝之作略备矣”^{[2]42},再在朝代上做文章只会陷入无趣的重复,因此必须有新的亮点。叶盛很快找到了转型的新方向,即由集一朝之诗变为集一地之诗,“以《昆山杂咏》为主,继以昆山前辈之作”,并特意交代“若时代则有不拘者”^{[2]42},为了说明集句游戏还在继续,再次强调“葦竹堂有清明集句故事”。从诗题上来看,基本上都在解释集句游戏的新变化,而清明主题变得不那么重要。成化二年,因阅读宋词得到启发,集句游戏又有了新方向,开始跨朝代跨文体集句,跨朝代集句上年已经有过,本次集句主要涵盖唐、宋、金、元及明初诗人,跨文体集句,即集句文体不再仅限于诗,而是诗词混合集句,出现多位著名词人的词,如张先“庭轩寂寞近清明”、欧阳修“三月十三寒食日”、李清照“宠柳娇花寒食近”、周邦彦“梨花榆火催寒食”、辛弃疾“谁家寒食归宁女”等,即所谓“摘用清明寒食句,杂用诸家语”^{[2]43}。至此集句内涵又回归到清明主题,起因是“怀亲悼昔,莫能为情”^{[2]43}。总之,这两年的集句在进入高峰期之后,叶盛积极地探索游戏的新方向,并做出了一些新的变化。

尽管集句游戏出现了短暂的转型,但同样的行为连续进行九年,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这并不是说集句再没有新的玩法,而是可能叶盛自己没有继续玩下去的精力和想法,因此在成化三年这个十年节点上,集句游戏终于走向了总结完成阶段。叶盛选择集唐、宋、元三朝诗人成句,来完成这场游戏的最终章,正是以集朝代始,又以集朝代终,并且此次并未专集一朝,明确点出唐、宋、元三朝,颇有进行总结的意味,而本年集句的背景是“宣府行台三逢寒食,仰瞻四陵,南望亲舍”^{[4]35},主题也变得官方起来,意在“切乎怀归体国之心”^{[4]35},符合叶盛主观上“曲终奏雅”之旨。

二、管窥诗歌阅读史

当今数字人文的发展日新月异,利用技术手段创作集句作品,已经成为现实。然而叶盛创作集句诗无法借助数字人文手段,只能在阅读量的基础上,再辅以记忆和翻书复核的方式进行集句诗创作。以成化元年(1465)《乙酉清明集句十首》其二末句“一见清明一断肠”为例,此句本自唐人郑准“一见清明一改容”,叶盛改动二字且自注云“盖昆之前辈别集收辑未完,而记忆亦有限也”^{[2]43},因前几年唐宋元明诗句均已集过,故本年所集诗句“以《昆山杂咏》为主,继以昆山前辈之作,若时代则有不拘者焉”^{[2]42},而郑准并非昆明人,其诗句经叶盛改动之后有了昆明人参与,亦勉强算符合主题,而根据叶盛自注可以看出,其集句实有赖记忆之功。因此叶盛清明集句诗所涉诗人诗句颇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展示其诗歌阅读史,或言之主要是清明主题诗歌阅读史。以下是对清明集句组诗所涉诗人进行列表,便于后面进行分析。

表2 叶盛清明集句组诗所涉诗人一览表

年份	序号	集句所涉诗人	序号	集句所涉诗人
天顺二年 集唐人诗	其一	柳宗元、刘长卿、韩偓、王维	其六	韩偓、杜牧、杜牧、杜牧
	其二	韩愈、武元衡、司空曙、司空图	其七	张籍、王建、张籍、柳宗元
	其三	张籍、赵嘏、王维、释皎然	其八	司空曙、张继、韩愈、李群玉
	其四	雍陶、高蟾、温庭筠、张健	其九	薛能、杜甫、顾况、杜牧
	其五	韦应物、薛能、王昌龄、窦叔向	其十	薛能、韩翃、温庭筠、杜牧
天顺三年	其一	李德裕、张泌、李绅、柳宗元	其六	谭用之、郑准、韩愈、杜甫

集唐人诗	其二	赵嘏、赵嘏、李德裕、柳宗元	其七	刘长卿、韦庄、武元衡、王表
	其三	王表、崔鲁、韦应物、曹邴	其八	宋邕、来鹏、罗隐、独孤及
	其四	刘禹锡、杜甫、罗邺、杜甫	其九	崔鲁、卢纶、柳宗元、薛逢
	其五	陆龟蒙、张泌、戎昱、王建	其十	杨巨源、岑参、窦常、皇甫冉
	其一	李郢、刘禹锡、罗隐、柳宗元	其六	崔颢、李颀、韩愈、韩偓
天顺四年 集唐人诗	其二	曹唐、杜甫、柳宗元、王建	其七	罗隐、柳宗元、杜甫、郑谷
	其三	韦庄、曹唐、张籍、韦庄	其八	刘长卿、卢纶、赵嘏、张南史
	其四	崔颢、薛逢、杜甫、郎士元	其九	张籍、岑参、张泌、王贞白
	其五	温廷筠、韩偓、赵嘏、皮日休	其十	韩愈、韩偓、柳宗元、韩愈
	其一	王建、王建、王建、李商隐	其六	王建、李白、李白、李白
天顺五年 集唐人诗	其二	陆龟蒙、张籍、张籍、陆龟蒙	其七	钱起、王建、王建、王建
	其三	杜甫、杜甫、罗隐、杜甫	其八	张籍、刘长卿、皇甫冉、戎昱
	其四	罗邺、李涉、司空图、王建	其九	罗邺、李中、刘禹锡、皇甫冉
	其五	刘禹锡、段成式、李山甫、王昌龄	其十	李中、柳宗元、薛逢、李白
	其一	欧阳玄、赵孟頫、范梈、成廷珪	其六	赵孟頫、丘民、黄潜、袁桷
天顺六年 集元人诗	其二	傅与砺、赵孟頫、卢挚、周伯琦	其七	成廷珪、杜本、黄潜、虞集
	其三	杨维禎、张翥、王蒙、黄清老	其八	张伯淳、周伯琦、董佐才、元明善
	其四	陈孚、杨维禎、袁举、杨载	其九	邓文原、刘因、许衡、丁鹤年
	其五	王士熙、宋本、虞集、陈旅	其十	杨载、刘因、辛敬、周伯琦
	其一	胡季安、杨士奇、胡概、周忱	其六	解缙、任立、曾荣、林赐
天顺七年 集明人诗	其二	魏观、郭奎、张昱、王恭	其七	吴哲、王英、胡俨、吕诚
	其三	管讷、刘崧、杨基、李祯	其八	徐贲、高启、朱佑、胡广
	其四	姚广孝、袁华、贝闾、吴志淳	其九	刘真直、唐肃、王沂、吴琳
	其五	张羽、孙蕡、陈壁、殷奎	其十	王佑、李时勉、浦源、林鸿
	其一	文天祥、杨长孺、陈与义、朱熹	其六	司马光、文天祥、谢枋得、陶弼
天顺八年 集宋人诗	其二	胡铨、欧阳修、方逢辰、苏轼	其七	郭祥正、黄庭坚、程颢、李纲
	其三	王安石、苏舜钦、苏轼、欧阳修	其八	曹组、苏辙、苏洵、方逢辰
	其四	欧阳修、谢枋得、司马光、真德秀	其九	欧阳修、赵润边、邵雍、杜衍
	其五	周敦颐、陈抟、张耒、蒋之奇	其十	王安石、张公庠、文天祥、彭汝砺
	其一	殷孝章、沈南叔、卢克修、吕敬夫	其六	袁子英、吕敬夫、奚元美、马少伊
成化元年 集崑山人 诗	其二	袁子英、殷孝扬、卢为已、□	其七	朱季宁、王之深、陈潜夫、卫宁深
	其三	吕克明、林仲鏞、偶武孟、秦文仲	其八	偶武孟、沈文敏、陆良贵、郭羲仲
	其四	卫宁深、殷孝章、沈南叔、张节之	其九	李彦平、郭羲仲、马公振、余茂本
	其五	王用节、项彦周、殷孝章、胡仲连	其十	庐彭祖、吕克明、偶武孟、马公振
	其一	杨鹏翼、马伯庸、孙夫人、雅正卿	其六	欧阳修、刘长卿、温廷筠、黄晋卿
成化二年 杂集诸家	其二	邓文原、梁孟敬、谢无逸、马伯庸	其七	揭孟同、元遗山、赵德麟、高九万
	其三	虞伯生、危山驪、周美成、邓文原	其八	胡宿、何太虚、晏叔原、揭孟同
	其四	张子野、郑谷、皇甫冉、韦庄	其九	蓝静之、成廷珪、辛幼安、元遗山
	其五	来复、张仲举、李易安、丁复	其十	宋渤、钱惟善、秦处度、谭用之
	其一	柳宗元、高九万、宋之问、苏颋	其六	杜甫、范仲淹、欧阳修、唐彦谦
成化三年 集唐宋元 人诗	其二	刘因、吴澄、韩愈、白居易	其七	刘禹锡、王恽、刘因、崔涂
	其三	罗隐、范纯仁、韦庄、杜甫	其八	文天祥、赵孟頫、吕岩、朱熹
	其四	张翥、许浑、吴融、范纯仁	其九	宋之问、刘因、朱熹、柳宗元
	其五	曾巩、王驾、虞集、柳宗元	其十	范仲淹、曾巩、雅琥、朱熹

通过分析以上表格和具体诗歌，可以得出叶盛诗歌阅读的三个特色：其一，具有时代偏好；其二，具有个性化特征；其三，具有地域化倾向。

（一）叶盛诗歌阅读的时代偏好

叶盛在十次集句创作中，专集唐人诗有四次，集宋元明诗各有一次，集崑山人诗一次，杂集诸家诗一

次,混集唐宋元人诗一次。因为首次集句取材于唐人诗句,可能受惯性影响,偏好集唐诗,但占比如此之大,还是能够说明叶盛唐诗阅读量大,以及唐诗对叶盛的影响。张明华在《论集唐诗》一文中提出:“集唐诗是在唐诗巨大影响下形成的一种集句诗类别,产生于北宋,在南宋获得迅速发展,在金、元时期走向衰落,但最终在明、清二代走向了繁荣。集唐诗的发展,是唐诗不朽的艺术魅力、诗歌追求‘新变’的需要、历史上的‘唐宋诗之争’以及历代诗人的连续创作等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5]汤志波提出“元人开启由宋返唐之途径,无论是郝经、王恽等理学家从风雅正变角度宗唐,还是戴表元、袁桷等诗人从格调高古角度宗唐,多以宗唐抑宋为主。明初诗坛最为兴盛的吴、浙、闽三地,亦多受元代‘宗唐得古’之余绪影响”。^[6]

叶盛之所以偏好唐诗,与明初时代风气及吴中地域风气均有关系,然而叶盛的诗学观是较为客观的,既有认可唐诗兴盛的一面,如其《录诸子论诗序文》云“我朝诗道之昌,追复古昔,而闽、浙、吴中尤为极盛。若孙西庵,岭南才子,国初著大名,而林尚默、张宗海,皆近时名士”^{[7]255};而又并非一叶障目式的“唯唐独尊”,继云“钱塘瞿宗吉则为鼓吹续音,盖以宋、金、元律诗并称,至云举世宗唐,恐未公为言”^{[7]256},他看到了宋、金、元诗各有擅场,学其诗法者亦有之,这从其集宋元人诗的行为可知其态度。从所集唐代诗人所处年代来讲,其分布于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各个时期,知名诗人占大多数,如李白、杜甫、王维、韩愈、柳宗元、刘长卿、刘禹锡、杜牧、李商隐、韦庄、温庭筠等;但也有一些知名度较低的诗人,如赵嘏、雍陶、高蟾、薛能、崔鲁、来鹏等,体现了叶盛的唐诗阅读既有经典化倾向,同时兼顾了全面化。

(二) 叶盛诗歌阅读的个性化特征

叶盛集句所取材诗人的频次靠前者,依次为柳宗元、杜甫、王建、张籍、韩愈、欧阳修等。尽管集句频次与诗人创作清明相关诗歌数量等高度相关,但从此排名中还是能够发现叶盛的阅读喜好。柳宗元能够高居榜首,很大程度上与其经历有关,元和十年(815)其被贬为柳州刺史,在柳州任上直至去世,人称“柳柳州”。柳州隶属广西,叶盛自天顺二年(1458)至天顺八年巡抚广西、广东,柳宗元作为任官柳州的重要前贤,其在广西的影响力极为深远,他的诗歌自然受到叶盛的阅读与重视。杜甫被集频率以一次之差仅次于柳宗元,这实质上是排除了叶盛个人经历因素的首位。集杜甫诗在集句诗中占有重要地位,历朝历代有许多人都创作过集杜甫诗,甚至不少人将所集杜甫诗专门勒成一编,如文天祥集杜甫诗二百首呈现宋亡之“世变人事”,已经成为集杜甫诗的经典之作。诗人学者纷纷集杜甫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因为杜甫地位很高,早在唐代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就极力称扬杜甫,至宋代杜甫确立了其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学杜甫者如过江之鲫;二是因为杜甫诗体皆备,格律谨严,集句本质上类似于规范化的模块重组游戏,而杜甫的诗精严为集句游戏提供了便利的素材。与此同时,李白被集诗句仅有四次,其频率甚至不及罗隐与赵嘏,堪称冷遇,或许与其诗作个性化过强有关,李白原诗的情感表达太过耀眼,导致集句时很难转化为集句者的个人感情,另外李白处于诗歌格律逐渐定型的时代,其诗作的格律化不及杜甫,这也成为后世诗人集句选材的一大障碍。欧阳修是唯一排名较为靠前的非唐代人,这与明仁宗以来对欧阳修的推崇有关,崇欧学欧的风气对叶盛也有影响,其《水东日记》有关欧阳修条目不少,李东阳曾评叶盛文章云:“公之文,博取深诣,而得诸欧阳文忠公者为多。公虽未尝自言,然观其纤馀委备,详而不厌,要知为欧学也。”^[8]

(三) 叶盛诗歌阅读的地域化倾向

在十年集句创作中,有八次是以朝代来选择所集诗人,而成化元年(1465)专集昆山乡人诗句,前面七年集句诗句后小注中的诗人姓名全部直接称名,本年集句中对于昆山诗人的小注,除陈潜夫与庐彭祖二人外却全部称字,亦即从本年开始,后两年小注亦有称字现象,虽然只是一个微小的变化,体现的是叶盛对昆山乡人的尊敬。本年所集诗人有:殷奎(孝章)、沈丙(南叔)、卢瑛(克修)、吕诚(敬夫)、袁华(子英)、殷箕(孝扬)、卢儒(为己)、吕昭(克明)、林钟(仲镛)、偶桓(武孟)、秦约(文仲)、卫培(宁深)、张和(节之)、王永和(用节)、项寅宾(彦周)、胡峰(仲连)、奚商衡(元美)、马先觉(少伊)、朱吉(季宁)、王资(之深)、沈讷(文敏)、陆仁(良贵)、郭翼(羲仲)、李衡(彦平)、马磨(公振)、余燦(茂本)、陈潜夫(振祖)、庐彭祖(长婴)。据叶盛《乙酉清明集句十首》诗前小序:“乙酉三月三日关北清明,以《昆山杂咏》为主,继以昆山前辈之作,若时代则有不拘者焉。”可知有部分诗人来自《昆山杂咏》,此书由龚昱所编,龚昱字立道,昆山人,曾为其父龚明之整理《中吴纪闻》,嘉定元年(1208)辑唐宋诗人题咏昆山诗编成《昆山杂咏》一书。叶盛作《书昆山杂咏后》评曰:“《昆山杂咏》三卷,龚昱立道编,盖与《中吴纪闻》同出一手,但其间颇杂唱和赠寄之作,较之近时高季迪《姑苏杂咏》似若未精耳,亦编次之法不尽同也。有范清猷之柔嘉定初所为序,序云别有续编,今不存。”因此在叶盛的心目中,此书与高启《姑苏杂咏》相较尚未精到,然作为最早的昆山地方诗歌选集,对于昆

山人来讲意义重大。叶盛萌发编纂《昆山片玉》的想法，专门收录元末明初昆山文人诗文，或受《昆山杂咏》的影响与启发。《昆山片玉》虽未编成，但叶盛已经为此做了许多准备工作，收集了相关昆山文人诗文集二十余种，可以说昆山文人诗文的阅读是叶盛阅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集句的十首诗中所选的诗人，只是其阅读对象的部分反映。

此外，叶盛十年所集一百首清明组诗，均以七言绝句的形式呈现。朱彝尊《明诗综》选叶盛诗歌四首，《题画》《重送徐汝阳》《和尚原》三首为七言律诗，《曲子驿》为七言绝句。陈田《明诗纪事》评价叶盛诗歌云：“余综览全集，七言近体风格道上，即精研声律者，无以过之，自来名辈往往出其绪馀，足了数人，此其征也。”^[9]书中所选叶盛诗歌十二首，全为七言律诗，可见其对叶盛七律之认可。综合二者的看法，可知叶盛之所以选择七言集句的方式，概因其本人诗歌创作以七言见长。总而言之，叶盛的清明集句组诗由开始的即兴之作，逐渐演变成连续十年的习惯故事，这是叶盛在公事之外难得的闲情。这一百首被叶盛所集句的诗歌，源自不同朝代不同风格的众多诗人，可见其平时诗歌阅读之广泛，通过对这些诗歌进行分析，可以管窥叶盛诗歌阅读史之一斑，为更好地理解叶盛的文学与生平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 [1] (明) 叶盛. 两广奏草[M]. 崇祯四年刻本卷一.
- [2] (明) 叶盛. 蓁竹堂稿[M]. 乾隆四年印本卷四.
- [3] (清) 叶奕苞. 叶九来经锄堂诗稿[M]. 清康熙十七年刻本卷九.
- [4] (明) 叶盛. 泾东小稿[M]. 乾隆四年印本卷二.
- [5] 张明华. 论集唐诗[J]. 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05):60-68.
- [6] 汤志波. 明永乐至成化间台阁诗学思想研究[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160.
- [7] (明) 叶盛撰, 魏中平点校. 水东日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8] (明) 李东阳. 怀麓堂集[M].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八.
- [9] (民国) 陈田辑. 明诗纪事[M]. 清光绪二十五年贵阳陈氏听诗斋刻本.

Gamification and Poetry Reading History of Ye Sheng's Qingming Collection Poems

Li Xuhui¹

¹ School of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Abstract: The famous book collector Ye Sheng of the Ming Dynasty was influenced by the poet Chen Fu of the Yuan Dynasty. From the second year of Tianshun (1458) to the third year of Chenghua (1467), he continuously created a collection of poems for the Qingming Festival for ten years, with a total of one hundred poems per year. The initial purpose of its collection of sentences was to commemorate family members and alleviate grief, but it gradually became gamified and artistic. Due to the large number of poems collected by Ye Sheng and the wide range of time periods of the collected poets, analyzing the frequency of Ye Sheng's poetry collection can indirectly reflect his poetry reading preferences and better understand his literary concepts and creations.

Keywords: Ye Sheng; Qingming poetry group; Gamification; reading history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3.714

关于物业服务企业消防监督管理若干问题研究

苏丹¹ 王宁^{1*} 于晟伟^{1*} 何永明¹

(¹ 中国消防救援学院, 北京 北京 102202)

摘要: 物业服务企业是预防火灾、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承担着法定监管者、设施维护者、隐患排查者、应急处置者的角色。本文通过对物业消防监督管理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分析, 指出物业主体履责不严、物业交接埋下隐患、监管追责处罚较难、技术监管手段不足、动用维修资金困难等原因, 提出完善物业相关法律制度、重塑物业服务企业理念、积极构建多元共治体系、提高智慧技术监管手段、规范专项资金管理使用等措施, 以期提升消防安全服务能力, 承担起应尽的消防安全责任。

关键词: 物业; 消防责任; 消防安全; 监督管理

一、物业在消防安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物业”一词是从英语词汇“property”及“estate”翻译而来,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由香港传入内地^[1]。随着我国城市化不断推进和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 城市住宅小区规模、数量均呈急剧增加之势, 基本上都实行了物业管理。物业服务企业也随之增多^[2]。《物业管理条例》对“物业管理”的概念进行了规定, 是指业主通过选聘物业服务企业, 由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 对房屋及配套的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维修、养护、管理, 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和相关秩序的活动^[3]。我国物业管理的产生和发展, 顺应了社会改革要求, 逐步形成了企业主导的一体化物业管理模式^[4]。

据相关研究, 消防设施完好率每提升 10%可降低火灾死亡率 15%, 而全国 90%以上的居民小区消防安全依赖物业服务企业。据 2023 年数据显示, 物业服务企业处置初期火灾 23 万起, 占火灾总起数的 28%。可以说, 物业是预防火灾、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同时也是城市消防安全的“最后一公里”守护者, 承担着法定监管者、设施维护者、隐患排查者、应急处置者四重角色, 是城市消防安全网络中不可或缺的基层枢纽。

二、物业的消防法律责任及法律后果

(一) 法律责任

物业服务企业对于消防安全工作, 具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 应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加强消防设施的维护和管理, 增强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 确保物业服务区域内的消防安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5]第五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等条款, 均对物业服务企业消防责任进行规定。物业服务企业有责任承担维护消防安全、保护消防设施、消防宣传教育、组织疏散逃生、开展火灾扑救等消防安全工作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6]第九百四十二条规定“物业服务人应当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 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 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

作者简介: 苏丹 (1988—), 女, 湖南邵东人, 中国消防救援学院讲师。

王宁 (1988—), 男, 河北唐山人, 中国消防救援学院讲师。

于晟伟 (1995—), 男, 吉林长春人, 中国消防救援学院讲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研究生。

何永明 (1978—), 男, 江西南昌人, 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副教授。

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对物业服务区域内违反有关治安、环保、消防等法律法规的行为，物业服务人应当及时采取合理措施制止、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并协助处理。”物业服务企业有责任对消防设施的日常维护和管理，确保其正常运转。

《物业管理条例》^[7]第三十五条规定，“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提供相应的服务。”物业服务企业须按照服务合同履行法定消防责任。

除此之外，国务院和地方人大、政府针对情况实际，制定出台的消防条例（例如《北京市消防条例》《辽宁省消防条例》等）和消防规章（例如《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江苏省住宅物业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等），均对物业服务企业消防责任进行了明确。

（二）法律后果

物业服务企业履行法定消防责任不到位，导致火灾等事故发生的，不仅可能面临民事赔偿，还可能受到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处罚。严重的，甚至可能构成犯罪，受到刑事追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5]第六十条规定，“消防设施、器材或者消防安全标志的配置、设置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未保持完好有效的”等违法行为，可以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若物业公司因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得超出罚款的数额。各地方消防条例也对物业消防法律后果进行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虽未直接规定对物业服务企业的行政处罚措施，但通过合同义务与侵权责任两个维度，明确了物业服务企业未履行消防安全管理职责时的民事法律责任。

（三）典型案例

据裁判文书网数据显示，近五年（2020—2024）全国物业服务纠纷案件有1863403件，其中2021年就达56.4万件。仅在2022年1月至2024年10月，全国审结的涉“消防通道”的民事案件就高达8139件，很多物业服务企业因履行法定消防责任不到位受到处罚。

案例1: 2022年4月2日，浙江嘉兴秀洲区消防救援机构接到群众举报投诉反映某高层小区室内消火栓无水。消防救援机构到现场进行核查属实，认定物业服务企业擅自停用小区内消防设施，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当场下发了《责令立即改正通知书》并罚款4.1万元。物业服务企业不服该处罚决定并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认为消防救援机构作出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终审后，物业服务企业依旧拒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消防救援机构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罚款4.1万元、加处罚款4.1万元和执行费1130元全部执行完毕。

案例2: 2020年1月27日，北京市朝阳区一居民王某某因在楼道堆放杂物引发火灾，致邻居被严重烧伤。最终判决王某某赔偿受害人全部费用633万余元的70%即443万余元，物业公司对633万余元全额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案例3: 2017年3月19日，位于重庆市渝北区某小区某住宅内发生火灾，烧毁户内家具、电器，过火面积20平方米，直接财产损失13.67万元，其中，该房主房屋直接财产损失为9.45万余元，2栋X房屋、2栋Y房屋的财产损失分别为1.66万余元和1.28万余元。法院分别判令赵某赔偿该2栋X房屋业主、2栋Y房屋业主财产损失3.33万元和1.28万元。同年6月，重庆两江新区消防支队判定该物业服务企业违规设置铁制地桩占用消防车通道，阻碍消防车通行，影响火灾扑救，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随即下发《责令立即改正通知书》和《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处以5000元罚款。赵某将物业服务企业诉讼至法院。法院认为该物业堵塞消防通道，致使消防队员不能第一时间赶到火灾现场进行灭火，进而造成原告损失的扩大，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承担30%的赔偿责任即4.23万元^[8]。

案例4: 2014年8月10日，北京市海淀区赵某家卧室电视机处因电视机线路故障起火，造成该房屋厨房、卧室内物品损毁，另造成X层室外楼道、隔壁5户房屋门窗、墙壁和部分家具受损，直接财产损失为134668.5元。赵某与F物业公司协商损害赔偿未果后，向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经审理认定赵某承担事故主要责任，F物业公司由于违反了法律规定的保持消防供水和消防车通道畅通的法定义务，对火灾损失扩大具有过错，应当依法承担25%次要责任^[9]。

三、检查督促物业履行消防责任面临的问题

（一）物业主体履责不严

大多数物业服务企业物业管理人员大多未接受过正规化、系统化的教育、培训，消防法律法规、消防安全知识严重缺乏，无法承担起消防责任。室内消火栓、水带、水枪普遍存在丢失、损坏或无水的情况，对消防设施的定期维护保养不到位，年久而失效，在火灾发生时无法发挥作用^[10]。街道、社区居委会等由于缺乏消防专业人员，较少开展防火检查。公安派出所在消防体制改革之后，较少开展消防监督检查、宣传教育等工作^[11]。

（二）物业交接埋下隐患

《物业管理条例》规定实行“房地产开发与物业管理相分离”的原则，物业服务企业在承接物业时，应当对共用部位、共用设施等进行全面查验。实际上，大多物业服务企业都是由房地产开发公司衍生出来的，所以很多交接查验工作未全面细致进行，很多先天存在的建筑消防设施不好用、消火栓管网未建设、消防车道不符合要求等解决的情况下，就转手物业服务企业，造成问题积压、推诿扯皮，成为难以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

（三）监管追责处罚较难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规定，针对物业服务企业消防设施维护不到位的最高罚款为5万元，而维护一栋高层建筑消防设施年成本超20万元，导致“认罚不整改”现象普遍。甚至有的物业服务企业采用注销企业并退出市场的手段，来对抗处罚，导致罚而无果频频发生。例如，北京某小区物业服务企业在2024年因消防泵故障被处罚3万元，选择停业整顿而非维修，最终引发业主集体投诉。

（四）技术监管手段不足

消防法律规范未强制要求物业安装物联网消防监测设备，导致监管依赖人工检查，全国物业项目超120万个，多数物业未接入智慧消防平台，无法实时监测消防设施状态。据行业调研，2024年全国仅15%的物业使用物联网烟感、水压监测等技术。基层消防救援机构“人少事多”，对物业的抽查覆盖率不足20%，且多以“运动式整治”为主，缺乏长效监管。

（五）动用维修资金困难

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因物业费收取、收益分配、管理水平等问题，矛盾逐渐激化，业主常采用拒交物业费的方式作为维权手段，而消防管理所需费用主要来自物业服务费，造成物业服务质量降低，导致恶性循环。住宅虽有专项维修资金，可用于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保修期满后的维修和更新、改造，但其使用条件和程序较为复杂，物业服务企业很难成功动用，消防隐患整改难以实现，直接导致小区消防设施资金不充足而无法及时维修与更换。

四、提升物业消防履责能力的应对举措

（一）完善物业相关法律制度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基础上，完善物业管理法规，严格物业服务企业市场准入，明确物业服务企业权责，建立物业信用体系，加大业主物业从业法律约束力^[12]。同时，政府可以加强对物业公司的监管，主管部门建立定期的服务质量评估，对服务质量不高、消防安全责任落实不到位的企业，采取相应的处罚措施。

（二）重塑物业服务企业理念

物业服务企业要强化服务意识，将服务理念融入企业文化，可以通过培训等手段，提高从业人员消防安全从业能力，经常性开展消防宣传活动，积极回应居民诉求，及时解决问题，改进服务质量。物业服务企业还可以加强与社区自治组织的合作，参与社区消防安全治理，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以促进建设社区消防安全共同体^[13]。

（三）积极构建多元共治体系

居委会、业委会及物业服务企业公司要共同参与社区治理，明确物业管理在社区消防管理中的作用，可设置专门的物业岗位，与社区居民互动、协调解决问题、提升服务质量。业委会应积极参与消防安全工作，与物业公司建立有效合作关系，以监督和约束其行为，确保消防责任得到落实。完善业委会制度，借助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更有效地监督和约束物业行为，推动完善社区治理体系^[13]。

(四) 提高智慧技术监管手段

政府可以在科技支持方面提供资源和资金支持, 帮助社区引入先进的技术, 例如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等, 提升消防智慧化管理水平。同时, 可以鼓励科技企业进社区、物业合作, 提供定制化的智慧消防解决方案, 提高管理效率, 提供更好的消防安全服务。

(五) 规范专项资金管理使用

明确建筑消防设施正常运行、维护以及因中修、大修、改造、更新等经费管理使用, 明确第三方检测及维护保养等服务费用的来源与使用规范在物业服务收费中, 明确消防日常维护管理费用和开支条件、规范与流程, 同时要简化紧急情况下专项维修资金的支出流程和程序, 保证实际效率, 解决存在问题, 为建筑消防设施的正常运行提供必要的保障^[14]。

五、结论

物业服务企业作为消防安全治理的直接责任主体, 在预防火灾隐患、维护消防设施、组织应急处置等方面发挥核心作用, 其消防安全治理能力直接关系到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只有通过法律监管、资金保障、技术升级、全民参与等多维度努力, 才能破解困局, 提升消防安全服务能力, 承担起应尽的消防安全责任。

参考文献:

- [1] 李一. 浅析物权法的出台对小区物业管理的意义[J]. 山西建筑, 2009, 35(30): 211-212.
- [2] 文字. 城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的现状、问题及其解决对策[J]. 城市问题, 2013, 9: 78-81.
- [3] 申芳芳. 浅谈物业消防安全管理[J]. 科技创新导报, 2013, 12: 197-198.
- [4] 张农科. 关于我国物业管理模式的反思与再造[J]. 城市问题, 2012, 5: 2-14.
- [5]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S]. 主席令第 81 号, 2021.
- [6]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S]. 主席令第 45 号, 2020.
- [7] 国务院常务委员会. 物业管理条例[S]. 国务院令第 698 号, 2018.
- [8] 李林. 物业堵塞消防通道被罚[J]. 检察风云, 2021, 7: 62-63.
- [9] 赵中华. 物业公司在消防事故中应承担的民事责任[J]. 住宅与房地产, 2017, 22: 28-30.
- [10] 王波. 浅析小区物业存在的消防安全问题及对策[J]. 科技传播, 2011, 12: 71-72.
- [11] 王广乾. 住宅小区物业管理中消防安全问题及对策分析[J]. 科技视界, 2016, 16: 267.
- [12] 高志云. 武汉市物业管理参与社区治理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建议基于武汉市物业管理与社区治理融合发展问卷调查[J]. 中华建设, 2023, 8: 39-41.
- [13] 张兰. 推进物业管理融入社区治理路径研究[J]. 住宅与房地产, 2023, 31: 104-106.
- [14] 冯国东. 探讨小区物业消防安全管理中的问题与对策[J]. 现代物业(中旬刊), 2018, 2: 28.

Research on Sever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Fire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of Property Service Enterprises

Su Dan¹, Wang Ning^{1*}, Yu Chengwei^{1*}, He Yongming¹

¹ China Fire and Rescue Institute, Beijing 102202, China

Abstract: Property service enterprises are the “first line of defense” in preventing fires and safeguarding lives and property. They play the roles of legal supervisors, facility maintainers, hazard inspectors, and emergency responder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found in the process of property fire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pointing out the reasons such as lax performance of duties by property service entities, hidden dangers left by property handovers, difficulty in supervision, accountability, and punishment, insufficient technical supervision means, and difficulties in using maintenance funds. It proposes measures such as improving relevant legal systems for property services, reshaping the concepts of property service enterprises, actively building a multi-party governance system, enhancing intelligent technical supervision means, and standardizing the management and use of special funds, with the aim of enhancing fire safety service capabilities and fulfilling their due fire safety responsibilities.

Keywords: property management; fire safety responsibility; fire safety;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3.795

基于 OBE 教育理念的高等教育教学数字化改革路径研究

吴滢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 浙江 杭州 311599)

摘要: 高等教育数字化是数字时代教育形态必然发生的变革。本文首先界定了 OBE 理念及高等教育数字化改革的内涵, 剖析了 OBE 理念与高等教育数字化改革之间的内在联系。借鉴了国内外高校数字化改革案例成功经验, 提出了 OBE 教育理念下高等教育数字化改革的实现路径: 如统筹整体规划、构建教学数字化评价指标体系、提升教师数字素养能力, 加大实践教学比重, 打造产教融合数字共同体, 建立常态化的共建共享机制。这对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 建设教育强国,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OBE 教育理念; 高等教育; 教学数字化; 改革路径

2024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指出“要把组织实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作为工作主线, 在教育的数字化、国际化、绿色化方向上开辟发展新空间, 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同时, 会议指出要锚定 2035 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 不断开辟教育数字化新赛道。围绕高等教育数字化改革这一主题, 目前国内的研究重点集中在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背景和动因、资源建设、教学过程设计、数字化素养提升, 以及国际经验等方面。本文从 OBE 教育理念出发, 倡导建立“以学生为中心、以学习成果为导向、以持续改进为重点”的高等教育数字化改革框架。深入推进教育数字化, 对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一、OBE 教育理念与高等教育数字化

OBE 教育理念 (Outcome Based Education 简称为 OBE), 是美国学者斯派蒂 (Spady) 于 1981 年提出, 被认为是追求教育教学卓越的正确方向。OBE 教育理念即以“学生为中心、以学习成果为导向、以持续改进为重点”的成果导向教育理念。这种模式聚焦于清晰定义的学生学习结果框架, 而不是传统的课程结构。OBE 教育理念的主要内容: 明确学习效果——反向设计课程体系——关注学生个体差异——强调持续改进。



图 1 OBE 教育理念——以学生学习成果为本

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指在高等教育领域全面运用数字技术, 对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过程、教学评价等教学全过程进行系统性变革。简单来说, 就是借助数字化技术改变传统高校的

基金项目: 2024 年度全国商科教育教研“十四五”规划课题, 项目编号: SKJYKT-2405195

作者简介: 吴滢 (1984—), 女, 河南南阳人,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 讲师。

教学模式，教师从传统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学习的引导者和促进者。从传统的面授教学为主转变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利用在线课程平台，整合线下资源，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运用大数据等技术，对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进行全面动态的评价，为教学改进和教学质量提升奠定良好的基础。教学过程进行反向设计，正向实施。具体流程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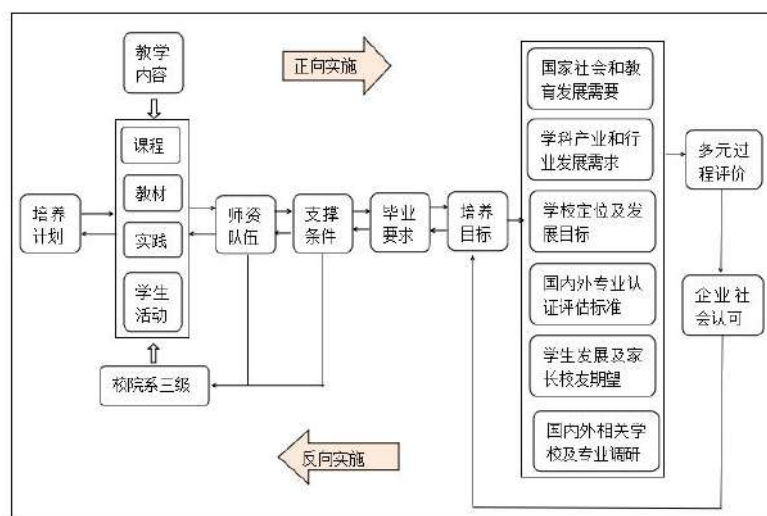


图 2 OBE 教育理念下的反向教学设计

二、OBE 理念与高等教育数字化的内在联系

（一）OBE 理念对高等教育数字化的导向作用

OBE 理念聚焦学生成果，引导数字化技术服务于学生的实际教学效果提升。OBE 理念以学生应达到的成果为导向，要求以学生为中心进行教学设计。指导数字化改革目标的设定，围绕课程知识点，整合数字化元素、数字化案例，开发出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的数字化教学资源，明确数字化融入路径。如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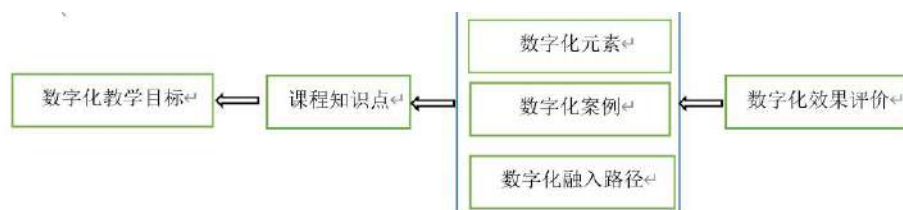


图 3 以 OBE 理念反向设计教学内容，正向实施

（二）高等教育数字化对 OBE 实施的支撑

数字化教育资源丰富多样，数字化平台提供多种名校优质课程，可以拓展学生的学习渠道，支持学生开展个性化差异学习，以求实现学习效果。在 OBE 教育理念下，以学生为中心，一方面满足学生多样化学习需求，注重学生能力培养和能力塑造，另一方面探索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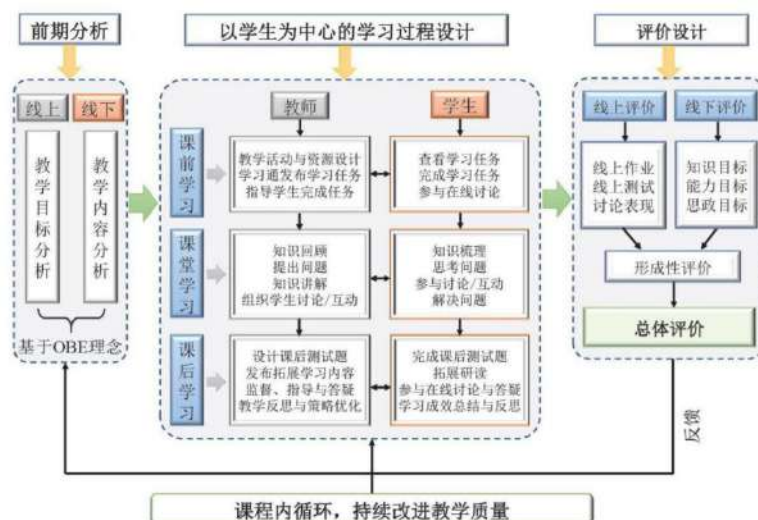


图4 基于OBE理念的高等教育数字化改革实施过程图

（三）两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作用

首先，两者在培养目标上具有高度一致性。OBE教育理念旨在培养出更多满足社会需求的具有综合素养的人才，而高等教育数字化改革则是通过利用数字技术，优化教学过程，更好地培养适应数字化时代要求的创新型、应用型人才。其次，数字化技术为OBE理念的实施提供了有力支持。通过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应用，教师能够跟踪学生的学习过程，从而实时调整教学策略。借助数字化平台教学资源，可以优选教学案例，更好地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同时，OBE理念使得高等教育改革更加注重教育的实际效果，带动教育质量的提升。

三、高等教育数字化改革的现实约束

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中，如何缩小数字鸿沟，打破数字孤岛，深入推进数字化转型，仍然存在一些现实约束。

（一）缺乏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

当前，大部分的高等院校数字化改革缺乏顶层设计，定位与目标不明确，未制定具体的实施步骤等问题。部分高校并未制定清晰的数字化战略规划，对数字化教学、改革，管理和服务方面缺乏考评指标。由于量化指标的缺乏，数字化资源建设质量参差不齐，考核也停留于形式。再加上系统架构不完善，学校各系统之间存在信息孤岛，教、学、研相关部门之间无法实现数据有效共享，导致管理效率低下，业务流程繁琐，这些都导致了数字化改革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

（二）数字化建设投入不足，信息化水平较低

高校教育数字化改革实现的基本条件，就是要有健全完善的数字化基础设施。但部分高校投入资金严重不足。现有的信息化管理系统功能单一，缺乏智能化分析、决策和支持功能，难以通过数据挖掘发现现在的问题和趋势。部分高校的数字化资源占比较低，且现有的数字化资源存在更新不及时，内容不完整等问题，无法为师生提供丰富、优质的教学素材。现有的科研协作平台功能单一，无法实现成果共享，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科研创新的效率和质量。

（三）教学过程和数字工具融合程度低，教学评价滞后

在教学准备环境中，教师的教学设计不适应数字化，课堂教学中数字工具运用不熟练，互动方式单一，教师对数字化评价工具使用不足。数字化评价指标单一，未将学生在线学习纳入评价，不考察学生利用数字工具解决问题，创新思维能力。这些都无法有效引导学生适应数字化的学习环境。如现有的泛雅网络平台，都可以将学生的在线学习时长，参与讨论环节，案例分析，搜集资料能力和分析能力，以及分组讨论环节等纳入考核。

（四）教师数字化教学创新能力不足

高校实行数字化改革，对教师的数字化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教材、教学大纲、教学设计、教学过程等方面都需要进行改革和跨学科融合。同时教师需要提高数字化工具使用率，筛选大量优质教学资源 and 案例，用于创新性教学。部分教师数字化意识淡泊，未能认识到在线资源、智能工具对教学变革的作用，智能教学软件，教师在设计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时，需要考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联。

（五）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分割

高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校企融合力度不足，学校难以准确把握产业动态和用人标准，使得人才培养目标偏离产业实际需求，匹配率低下。高校在制定人才培养目标时，对产业的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调研不足，对于人才的知识能力、技能能力和素养要求把握不准。高校的实践教学比重往往较低，课程内容更新较慢，课程所教案例往往比较陈旧，学生所学知识滞后于产业发展，以致人才的供给和需求出现了失衡。

四、国内外高等教育数字化改革的案例及经验借鉴

（一）国外案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数字化案例及经验借鉴

1. 开发相关的工具解决教学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参与度和学习效果，采用 NB 网站，开发个人反馈系统，即时回复学生的各种问题，加强学生对课堂问题的实时响应，提高学生的学习参与感和学习满意度；让学生从被动学习转化为主动学习。

2. 自动评估系统实时反馈，验证教学效果

采用“在线评阅”、“即时反馈”、“自适应提示”等验证教学效果。自适应提示自带容错机制，可以快速验证学生学习效果。当学生提交错误答案时候，会收到错误反馈，或者建议让学生尝试再次回答问题。激励学生在探索中解决问题，引发学生求知热情。此外，该自动评估系统可以对学生答题情况自动分级，以便教师团队因材施教。

3. 采用仿真与可视化教学，提高实践能力

创新课堂设计、仿真与可视化教学实现了实验过程。混合式授课，线上资源丰富，图文并茂的方式展示，仿真与可视化技术可以为学生的学习提供基于现实世界的虚拟场景。课程数字化资源丰富，扩大了学生的视野，与实际场景吻合，3D 可视化工具的应用大大丰富了学生的观看体验。

（二）国内案例：华中科技大学数字化案例及经验借鉴

1. 育人方式新：加强数字化平台建设

鼓励高校大力推进现代信息技术、智能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进行平台整合，建设以教学、科研和管理服务一体化的信息化综合平台，提高平台利用率和智能化水平。建设全国一流的新一代数字智慧校园，全面提升师生信息素养，推进高校教育教学评价数字化转型。

2. 人才培养模式新：加强数字化人才培养

瞄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建立企业数字化应用案例库，丰富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在线开放课程，虚拟仿真实验课程，强化专业交叉融合，加强产教融合，培养具有新思维、理解新规则，掌握新工具的数字人才。加强创新能力培养，拓展学生参加学科竞赛的范围，加强就业创业能力培训，搭建教室到实验室到企业的桥梁。

3. 辐射范围新：服务社会发展能力

以数字化推动智库协同创新，有效提升新型智库服务效率、满足日益增加的智库决策支持需求，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数字社会治理新格局。如，数字经济研究中心深度参与武汉市数字经济发展研究院建设。“大数据与国家传播战略实验室”，助力国家传播战略研究。构建国际数字合作格局，参与全球数字化转型之“云”，打造面向东盟开展数字经济合作的“武汉样板”。

五、基于 OBE 理念的高等教育数字化改革路径

（一）统筹整体规划设计，构建高等教育新生态

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涉及内容繁多，数字化转型不仅需要国家政策文件的支持，同时更要为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设立专门的政策和法律，确保转型工作顺利开展。同时也需要高校自身转变思维，拟定数字化改革的长期规划方案，分阶段分步骤有效实施，并进行反馈。通过全局性的统筹规划与整体设计，共同来构建适应时代需求的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新生态。

（二）优化资源配置，争取多元化资金投入

优化高校组织结构，夯实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优先将资金和资源投入到数字化建设的重点领域和项目。搭建统一的信息化资源共享平台，如云计算，教学资源库，科研数据中心等，实现资源的集中管理和共享，提高资源利用率。争取政府专项拨款，用于建设数据中心等。积极与校友、企业及社会组织沟通，吸引外部资金投入，共同推动学校信息化建设。推动学校智能化管理，建设校园数字化物联网，实现系统管到人、管到事、管到物，推进动态化监控和管理。

（三）构建教学数字化评价指标体系

基于 OBE 理念开展教学改革，根据“教学资源数字化、教学方式数字化、教学效果数字化、教学管理数字化、师生互动数字化”五个一级指标，我们构建教学数字化的评价指标体系。然后拆分一级指标，构建二级指标，以期更好地评估教学数字化改革的成效。

表 1 基于 OBE 理念的高等教育数字化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教学资源数字化	0.1624	数字化资源的多样性	0.0406
		资源的更新周期	0.0232
		资源与教学内容的匹配度	0.0548
		资源的新颖性	0.0438
教学方式数字化	0.1252	教学工具运用	0.0360
		教学模式创新	0.0468
		教学活动组织（互动及反馈）	0.0424
		知识掌握程度	0.0852
学习效果数字化	0.3246	实践操作能力	0.07548
		创新思维能力	0.08446
		学习行为数据	0.07946
		教学计划与课程安排	0.0468
教学管理数字化	0.1644	学生信息管理（含成绩管理）	0.0582
		教学过程监控	0.0594
		教学资源库建设	0.0522
		互动平台使用	0.0458
师生互动数字化	0.2234	互动频率与时间	0.0576
		互动内容与质量	0.0606
		互动效果反馈	0.0594

之后邀请专家通过德尔菲法，筛选、优化并确定模型的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对模型中的各项指标进行权重分配。接着进行指标验证与优化。检验指标体系的效度，保证评价结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最终形成完整且具有指导意义的高校教育数字化成熟度评估模型。

（四）注重数字素养能力，加大学科竞赛的力度

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在于提升教师的数字素养，确保数字化改革的可持续发展。具体来说，可以定期组织教师参加数字素养相关培训，了解学科前沿动态与数字化教学方法。设立数字化教学改革专用的激励机制，加强跨学科教师合作交流。多渠道开展实践教学，加大学生参与学科竞赛的支持力度，鼓励学生进行创新创业项目申报等，这有助于学生突破常规思维，提高对数字化信息的敏感度和处理

能力,进而全面提升数字化素养。

(五) 打造产教融合数字共同体,建立常态化的共建共享机制

创新产教融合机制,强化高校与企业深度融合及协同机制。高校之间应打造产教融合共同体,共建共享优质数字化教育资源、增进信息沟通,合作建立协同创新机制,共同推进教育数字化改革发展。依托企业高质量的工作场所和产业运行情景,加强学生的实习和实操练习,强化学生将知识转化为实践的能力。努力尝试建成包括学校领导、数字化专家、数字化管理和部门和师生共同参与,共建共享的机制。

高校是数字化转型的主要阵地,以 OBE 理念实施高等教育数字化改革,提升师生数字素养,深化校企融合,积极探索校企协同育人机制,完善高等教育数字化改革模式,不断提升高校复合人才的培养质量,努力打造数字化人才培养示范院校,提升高等教育办学质量,进而推进和带动全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再上新台阶。

参考文献:

- [1]尤政.追求卓越,为数字化转型贡献高等教育力量[J].教育国际交流,2024,1.15
- [2]杨彦玲;王甜甜;张婕.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现实困境及突破策略[J].首届教育数字化发展论坛论文集,2023.,11.25.
- [3]彭晴.OBE 理念下数字技术赋能宏观经济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J].大学教育,2025,(03):112-116.
- [4]赵俊芳,范家宝.高等教育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目标指向、现实悖论与优化路径[J/OL].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2025-03-19]
- [5]陈林,李作章.高等教育数字化治理:价值机理、现实梗阻与优化对策[J].教育学术月刊,2024,(12):19-26
- [6]刘艳红,韩久明,黎晓桐.数字化赋能高等教育管理质量提升的挑战与对策[J].中国管理信息化,2024,27(23):217-219.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Digital Reform in Higher Education Teaching Based on OB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Wu Ying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College of Commerce, Hangzhou, Zhejiang 311599)

Abstract: The digit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s an inevitabl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ducational form in the digital age. This paper first define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OBE (Outcome Based Education) concept and the digital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analyzes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BE concept and the digital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By drawing on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s of digital reform cases in domestic and foreign universities, it proposes the implementation paths for the digital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under the OBE education concept: such as overall planning, constructing a digital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eaching, improving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abilities, increasing the proportion of practical teaching, creating a digital community for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and establishing a normalized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mechanism. This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and building a powerful education country.

Keywords: OBE education concept; Higher education; Teaching digitization; Reform path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3.796

新租赁准则对商超零售业财务报表影响分析--以步步高公司为例

吴雪佳

(南华大学船山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0)

摘要: 2021 年我国颁布新租赁准则, 明确规定租借方在租赁相关的会计处理中不需要区分经营租赁和融资租赁。本文将从商超零售行业选取案例公司——步步高公司, 从公司的三大财务报表变化情况出发: 资产负债表中新增的使用权资产、租赁负债; 利润表中的折旧费用、利息费用变动幅度; 现金流量表的经营与筹资活动是否产生此消彼长的态势等等。结果显示, 公司的财务报表在租赁准则颁布实施后发生了重大变化: 资产负债表的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大幅增加, 影响公司资产周转率等指标; 利润表也因为大量的折旧和利息费用, 导致政策实施当年呈现首年净利润大跌; 现金流量表的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出现断崖式下跌等等。因此, 本文在分析步步高公司财务报表的变化后, 根据其后续调整及不足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新租赁准则; 步步高公司; 使用权资产; 租赁负债; 财务报表

一、新旧准则对比分析与零售企业租赁现状

(一) 新旧准则对比分析

根据新旧准则的对比研究, 本文整理相关不同点和会计科目列式信息, 详见表 2.1 新旧准则对比。

表 2.1 新旧准则对比

财务报表	不同点	旧准则	新准则	优势
资产负债表	融资租赁与经营租赁是否均入表	否	是	避免表外融资, 使会计信息质量更加真实可靠
	会计科目	/	使用权资产 租赁负债	
利润表	租金支付是否统一计入	是	否	明确租金费用是租赁负债的后续摊销
	会计科目	管理费用	利息费用 折旧费用	
现金流量表	租赁活动是否属于筹资活动	否	是	新准则更准确反映租赁活动的融资性质
	会计科目	经营活动 筹资活动	筹资活动	

(二) 商超零售企业的租赁现状

根据新租赁准则颁布当年的商超零售企业的排名状况, 本文选取了 7 家租赁业务较多的企业, 并归纳汇

作者简介: 吴雪佳 (2003—), 女, 湖南郴州, 南华大学船山学院本科生。

总其自有门店和租赁门店的面积,最终归纳其租赁面积占比大小,与本文所选取的案例公司进行对比分析。从表 3.2 门店租赁情况中,可以看出商超零售企业租赁门店占比普遍较高,在选取的样本中都可以看到占比比重均超过 50%,其中永辉超市租赁面积占比高达 98.67%。

表 3.2 商超门店租赁情况

单位:万平方米

企业名称	自有门店面积	租赁门店面积	总面积	租赁面积占比
百联股份	238.21	248.53	486.74	51.06%
大商股份	167.39	204.69	372.08	55.01%
王府井	182.5	251.5	434	57.95%
银座股份	111.53	175.08	286.61	61.09%
重庆百货	71.26	154.28	225.54	68.40%
天虹股份	61.35	360.96	460.31	78.41%
永辉超市	11.04	816.51	827.55	98.67%
步步高	220.06	238.55	458.23	52.06%

二、新租赁准则对步步高公司的财务影响

本章共分为两个部分,前部分根据步步高公司在新租赁准则颁布当年及前 4 年的财务数据来研究,即 2017 年至 2021 年,从新租赁准则对于三大报表的影响程度进行逐一分析。后部分是根据步步高公司在新准则颁布以后采取的应对调整进行财务报表层次的分析,探讨步步高公司还存在什么样的不足,并在下章给步步高公司所存在的不足提供对应的建议。

(一) 步步高公司概况

步步高公司(公司代码 0002251)1995 年在湖南省湘潭市开业,然后 2008 年进行成功上市,所以步步高超市是我国第一个以民营超市身份的上市公司,因此,步步高公司也会被称为“国内民营第一股”。其中步步高公司最有名的业务便是步步高超市,在湖南人民的心中,步步高超市是非常重要的,步步高商超的名气在湖南基本可以和家乐福,沃尔玛等巨头齐名。从 2022 年的公开资料显示,步步高公司名下超市 205 家与百货 41 家,总共 246 家线下门店。

(二) 新准则对于步步高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1 新准则对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分析

在新租赁模式的运行下,之前经营租赁所带来的红利已然消耗殆尽,此时表外资产负债的显性化就会给企业的横向财务报表状况以及指标带来一定的波动。出租方通过让渡已识别资产的使用权来与承租方换取对价,而承租方以此获得标的资产专属使用权及相关的全部风险与报酬^[10]。

在会计上,将租借的标的物在特定的时间点上归为使用权资产,而债权归为一项债务,这两个因素都会对公司的财务情况产生影响,这就是租赁的物权化债权的本质^[12]。其中,企业的租赁负债通过尚未支付租赁款现值进行初始计量,使用权资产在此基础上还需计入其他相关费用使得租赁标的达到预期可使用状态。租赁负债科目被细分“租金”、“未确认融资费用”。其中,“未确认融资费用”被记入资产负债表-负债类“租赁付款额”账户,而这些“租金”的现值和它们之间的差额被记入资产负债表-负债类“未确认融资费用”账户。

表 4.1 步步高公司近五年资产负债表对比

单位:亿元

项目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近两年变动额
流动资产合计	58.93	64.23	63.86	53.56	49.94	-3.62
非流动资产合计	109.27	165.09	179.92	234.77	273.49	38.73
其中:						
投资性房地产				65.93	108.13	42.20
其中:使用权资产					38.59	38.59
资产总计	168.19	229.32	243.78	288.32	323.43	35.11
流动负债合计	94.79	118.20	134.73	147.82	183.26	35.44
非流动负债合计	8.44	15.87	30.71	21.71	63.97	42.27

其中：租赁负债					40.60	40.60
负债合计	103.23	134.08	165.44	169.53	247.24	77.71
所有者权益合计	64.97	95.24	78.34	69.46	76.19	6.73

从表 4.1 对比中可以看到，步步高公司首次确认“使用权资产”38.59 亿元，“租赁负债”40.60 亿元。其中，“未确认融资费用”为 2.07 亿元。同时，步步高公司还确认了投资性房地产（以公允价值计量）108.12 亿元，全部都用于银行借款抵押。公司资产总额增加 35.11 亿元，所增加的这部分资产为表外转入表内已存在的经营租赁资产，并不能给企业带来额外收入^[13]。

在新的会计准则下，资产负债表瞬间膨胀。同时，在“使用权资产”、“租赁负债”科目新增的加持中，由于其流动性的原因，会使得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列式的“非流动性资产”、“非流动性负债”科目的合计数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最终使得企业资产负债率上升，资产周转率下降，相关财务指标恶化，影响企业后续融资。据年度报表分析，从表 4.2 中可以看出，总资产周转率由 0.64 降至 0.47，表明企业资产营运能力大幅下降，跌出合理区间 0.8~1.0。企业非流动负债增加 42.27 亿元，其中租赁负债占比 63.47%，下设未确认融资费用科目新增 2.07 亿元。显性化债务导致横向偿债指标大幅波动，产权比率由 2.32 升至 3.40，利息保障倍数由 1.37 降至 0.92，资产负债率由 69.1%向 76.4%波动。

表 4.2 步步高公司近五年经营类财务指标

相关指标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总资产周转率	1.1	0.93	0.83	0.64	0.47
资产周转率	61.4%	58.8%	67.9%	69.1%	76.4%
产权比率	1.65	1.45	2.19	2.32	3.40

财务指标均指向步步高公司长期偿债能力大幅下降，债权人的权益程度保障降低，且步步高公司获利以支付利息费用的能力大不如前，长期债务资本安全程度下降。从表 4.2 中可以看出，资产负债率变化较小，但已达到举债经营警戒线，债权人发放贷款安全程度堪忧。

综上，新准则对表外融资行为的抑制，导致衍生财务指标指明企业营运能力和长期偿债能力下降^[14]，所有者与债权人风险上升，报表使用者信任下降，企业向银行贷款及发行债券、股票等将受到影响，资本成本增加，财务杠杆水平上升，财务风险加剧^[15]。

2 新准则对利润表的影响分析

新的准则要求企业在以后对租赁进行计量时，要对已经确认的租赁资产进行折旧，并将其用于支付债务的利息费用。其中，新准则规定：企业使用权资产需按照固定资产计提折旧费用，并计入租赁业务及管理费用等期间费用；企业需要确认租赁负债的利息费用记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

承租方使用标的资产的权力计入使用权资产科目，各期计提资产的折旧与资产减值准备，最终形成相关费用增加营业成本影响企业经营成果。同时，企业在各期付款时，通过相应科目的借方核减以反映付款义务的履约情况，伴随租赁期内租赁付款额的不断偿付，各期应负担的融资费用计入“财务费用——利息费用”后会呈逐期递减趋势。

新旧租赁准则中折旧和利息构成总租赁费用总额，但准则的变化使得租金支付与核算期间有所不同。新准则下会产生相关的利息费用进行了前置，因此利息费用给经营成果带来了一些影响。综上，由于上述两大核心科目披露至表内，对利润表的相关财务指标影响深远。

表 4.3 步步高公司近五年核心利润对比

单位：亿元

项目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近两年变动额
①营业收入	172.50	183.98	196.61	156.38	132.56	-23.82
②营业成本	135.42	141.76	149.22	109.24	88.15	-21.09
③销售费用	30.53	32.98	37.25	37.76	36.96	-0.80
④管理费用	2.96	4.06	3.77	3.58	3.70	0.12
其中：						
使用权资产折旧					4.29	\
⑤财务费用	0.90	1.93	3.22	3.77	5.38	1.61
其中：						
未确认融资费用摊销					2.07	\

⑥核心利润	1.42	1.53	1.43	0.59	-3.52	-4.10
-------	------	------	------	------	-------	-------

注：⑥核心利润=①-②-③-④-⑤

从表 4.3 步步高公司近五年核心利润对比中可以看出，步步高公司面对巨变的行业环境和政策变更，总共合计闭店 52 家，将扭亏无望或物业无法续租的门店进行调整关闭，2021 年销售与管理费用中的“租金及物业管理费用”科目下降 5.39 亿元。而该年期间费用未大幅下跌，2021 年的销售和管理费用明细中均首次出现“使用权资产折旧”科目，费用高达 4.29 亿元。财务费用在 2021 年达到巅峰，与去年相比增速高达 42.67%。主要是因为“未确认融资费用摊销”科目的增加，该科目在当年第一次出现并数据达到 2.07 亿元。

新租赁准则规定当期经营租赁费用分为：计提使用权资产折旧和分摊未确认融资费用来影响当期损益，其中租金拆解为利息费用和折旧费用分别计入财务费用和营业成本^[16-18]，2021 年度上述科目的变动合计对核心利润产生约 6.36 亿元的影响，故 2021 年度核心利润为-3.52 亿元，最终导致核心利润较去年相比下降 4.1 亿元。

表 4.4 步步高公司近五年盈利类财务指标

相关指标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总资产报酬率	2.19%	2.17%	2.39%	2.23%	1.84%
总资产净利率	0.96%	0.79%	0.73%	0.46%	-0.65%
净资产收益率	2.42%	2.06%	1.97%	1.49%	-2.57%

折旧费用与财务费用的增加使得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增加，经营租赁标的由表外资产转为公司内部价值与未来资产支出的一部分。正是因为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的上升，经营、财务杠杆系数均受到冲击，导致步步高的盈利发生变化。从表 4.4 中，可以知道步步高在 2021 年总资产报酬率由 2.23%降至 1.84%，总资产净利率由 0.46%降至-0.65%，净资产收益率从 1.49%跌至-2.57%，企业资产的总体获利能力下降，资产营运效益波动。

此外，新租赁准则下规定企业运用平均年限法计提每年折旧费用，运用摊余成本法摊销每年租赁负债，使得财务费用先高后低，未来每期损益影响也与租赁付款额变动一致，各期大致相同，新准则带来的损益变化趋势使外部投资者更易辨析企业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18]。

3 新准则对现金流量表的影响分析

新准则把有关租赁定义为从外部借款购买资产，因此，我国为了进一步加强融资的监管，所以新准则在现金流量表中没有新增项目。但是为了体现租赁负债的金融负债性质，新准则将租赁负债的租金及利息流出由经营活动转入筹资活动。

上文分析新准则对现金流量表仅调整了内部结构，但是其总额并未改变。由于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增加，企业现金比率、盈利现金比率、利润含金量指标等均受到影响。面临承租业务较多的企业，改善了其经营活动现金流状况，更能体现企业生产经营的稳定性。同时，对于投资者分析零售企业短期偿债能力、发展能力等具有重大指导性意义。

从表 4.5 步步高公司近五年现金流量对比中可以看出，在 2021 年步步高公司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产生了大幅波动，并且涨幅合计 19.22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42.4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下降 9.6 亿元，使得净利润变化不大，详见图 4.6 步步高近五年现金流量趋势对比。产生这样的波动，经分析后主要是因为 2021 年执行新租赁准则，新准则规定将支付的使用权资产租金由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划分为筹资活动的现金流出，租金高达 4.65 亿元。租金归属的再定义着重彰显了租赁业务的金融性质：融资租赁实质系向外筹资购买资产行为。

表 4.5 步步高公司近五年现金流量对比

单位：亿元

项目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近两年变动额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172.50	183.98	196.61	156.38	132.56	-23.82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135.42	141.76	149.22	109.24	88.15	-21.09

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30.53	32.98	37.25	37.76	36.96	-0.80
净利润	2.96	4.06	3.77	3.58	3.70	0.12



图 4.6 步步高近五年现金流量三大活动折线图

以调整后的同口径核心利润为基准，2021 年利润含金量由 2020 年的 1.47 升至 7.15。其中，利润含金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核心利润。由于租赁性质的再定义，让利润含金量更能真实反映企业盈利质量，同时前四年的利润含金量一直徘徊于 1.00~2.00，现金流与核心利润匹配度有所低估。通过这些步步高公司具体的财务指标横向比较，可以得出步步高公司今后想要进行外部融资的难度上升。

假设 2021 年仍实施旧租赁准则,从表 4.7 可以看出,由于营业成本受增量费用表外化的影响下降 6.36 亿元,核心利润恢复至 2.84 亿元,成为近五年盈利巅峰。新租赁准则规定未确认融资费用以摊余成本计量,伴随租金支付与本金的减少,计提折旧费用与分摊财务费用逐渐减少,利润总额呈前小后大^[20]。综合整个租赁年限来看,新租赁准则与旧租赁准则对利润表影响总金额一致,企业利润并未整体下滑,盈利能力不减反增^{[20][21]}。

表 4.7 新旧准则财务指标对比

项目	新准则	旧准则
核心利润	-3.51 亿元	2.84 亿元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32.70 亿元	28.05 亿元
利润含金量	7.15	3.20

新准则令经营活动现金流产生大量“泡沫”，2021 年利润含金量由 1.47 升至 3.20 更加贴近企业自身经营所得，其营运能力与盈利质量去泡沫化仍处近五年巅峰。通过假设对比法，企业仅因新准则的颁布所带来的政策效应导致企业财务指标的大幅波动，按旧准则核算下的企业财务报表数据显示其相关盈利能力等并未发生实质性恶化。

（三）步步高公司的应对调整及不足

通过上文假设对比法，发现按照旧准则核算的步步高公司报表数据并未发生实质性恶化。但是随着新租赁准则颁布实施，步步高公司在此之后仍然保持大额亏损的状态，同时相关管理层对此发布了致歉公告。根据步步高公司对新租赁准则采取应对策略后仍未恢复盈利，本文将对步步高公司存在的不足进行分析，并且在后文一一对应提出解决方案。接下来我们从三个角度：营运能力、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进一步研究新租赁准则颁布一段时间后，步步高公司受新租赁准则的持久性影响及其给出来的应对策略。

1 营运能力分析

步步高公司的营运能力分析，主要是从表 4.8 步步高公司近两年资产负债表-资产部分来看，资产合计减少 44.38 亿元，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流动资产，其中货币资金减少 8.6 亿元，主要系诉讼资金冻

结、银行担保等，还有存货较去年 2021 年减少 12.64 亿元，主要是因为门店数量骤降导致的门店库存两下降。第二部分是流动资产，其投资性房地产在此基数这么大的情况下仍然正向增加了 41.66 亿元，而使用权资产相比较 2021 年来说减却有所下降，减少了 14.43 亿元，对于使用权资产的减少，公司在财务报表中的解释是因为闭店导致的租赁物业减少。

表 4.8 步步高公司近两年资产负债表：资产部分 单位：亿元

项目	2021 年	2022 年	近两年变动额
流动资产合计	49.94	26.11	-23.83
非流动资产合计	273.49	252.94	-20.55
其中：投资性房地产	108.13	149.79	41.66
其中：使用权资产	38.59	24.16	-14.43
资产总计	323.43	279.05	-44.38

表 4.9 同行业总资产周转率

财务指标	公司名称	2020	2021	2022	变动额
总资产周转率	步步高	0.64	0.47	0.29	-0.18
	永辉超市	1.72	1.43	1.35	-0.08
	南宁百货	0.42	0.46	0.40	-0.06

表 4.10 同行业总资产周转天数

财务指标	公司名称	2020	2021	2022	变动额
总资产周转天数	步步高	560	757	1240	483
	永辉超市	210	252	267	15
	南宁百货	854	784	911	127

本文研究了步步高公司 2020 年-2022 年的财务指标，同时选取永辉超市与南宁百货作为同行业对比公司，详见表 4.9、表 4.10。

首先，从总资产负债率的财务指标来看，三家商超零售企业都呈现逐年降低的趋势，但是从变动额来看，步步高的总资产周转率在 2022 年度下降幅度最大。同时，2022 年度步步高的总资产周转率在同行业财务指标中最低，仅达到 0.29。这不仅说明步步高的资产利用率低，且由于其投资性房地产的消极影响导致与同行业公司相差过大。

其次，从总资产周转天数来看，步步高的周转天数最大，并且近两年变动额也远超对比公司，说明步步高公司自身在总资产周转方面存在的问题。总资产周转天数过长意味着公司的总资产从投入到产生销售收入并再转为现金的周期长，进一步佐证步步高公司的资产利用率较低，资产并未得到充分和有效的利用。

这方面的不足，主要是由于闭店这一策略直接导致步步高公司的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都受到了影响。存货、使用权资产的减少会导致公司正产运营所需要的资源、运营空间减少，使得公司运营效率下降，最终增加步步高公司的经营风险，使得公司营运能力发生变化。

2 偿债能力分析

步步高公司的偿债能力分析，主要是从表 4.11 来看，负债总共减少 20.04 亿元，其变动部分主要系流动负债的下降。流动负债减少将近 20.74 亿元，其中短期借款减少 13.83 亿元、合同负债减少 9.54 亿元。短期借款的减少主要是因为步步高公司对其内部债务结构进行了调整。合同负债的下降是因为闭店导致营业规模减少。在 2022 年度的非流动负债中变动不大，但是租赁负债已经较去年减少 39.82%，这一部分的减少弥补了长期借款的增加，长期借款就 2021 年度增加 49.87%，主要原因系步步高公司调整借款内部结构，增加了银行的长期借款等。

表 4.11 步步高公司近两年资产负债表：负债部分 单位：亿元

项目	2021 年	2022 年	近两年变动额
流动负债合计	183.26	162.52	-20.74
其中：短期借款	78.88	65.05	-13.83
其中：合同负债	18.18	9.34	-9.54
非流动负债合计	63.97	64.67	0.70
其中：租赁负债	40.6	24.67	-15.93
其中：长期借款	15.71	31.34	15.63
负债合计	247.24	227.2	-20.04

表 4.12 同行业资产负债率

财务指标	公司名称	2020	2021	2022	变动额
资产负债率	步步高	69.05%	76.44%	81.42%	4.98%
	永辉超市	63.69%	84.47%	87.68%	3.21%
	南宁百货	50.49%	48.4%	48.8%	0.04%

表 4.13 同行业流动比率

财务指标	公司名称	2020	2021	2022	变动额
流动比率	步步高	0.38	0.27	0.16	-0.11
	永辉超市	0.95	0.84	0.84	\
	南宁百货	0.59	0.59	0.54	-0.05

本文研究了步步高公司 2020 年-2022 年的财务指标，同时选取两家对比公司的财务指标以反映行业的走向，详见表 4.12、表 4.13。首先，从资产负债率的角度出发，可以发现，商超零售企业整体的资产负债率有所上升，但是永辉超市和南宁百货的上升幅度均没有步步高的涨幅大，2022 年步步高的资产负债率高达 81.42%，高的资产负债率意味着公司的经营灵活性受限。其中公司的流动、速动比率较正常水平来说偏低，这都指向公司在财务状况分析时有的流动性风险，因此步步高的融资能力会受到冲击，最终很有可能影响公司未来发展。其次，从流动比率的角度出发，步步高的降幅最大，其他两家公司降幅较小或保持，这说明步步高公司本身在流动比率控制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

这样的不足主要会引发公司的债务风险，从而使得公司的偿债能力受到影响。步步高公司调整借款内部结构，导致长期借款剧增，银行抵押贷款进一步加重，这会使得步步高公司面对高额负债、增加公司的债务负担。同时，步步高公司也由于长期借款占比较大，会导致相应的利息负担加重、经营灵活性受限。并且长期借款过多会使得步步高面临偿债压力大、信用评级下降，进一步增加融资成本。综上所述步步高公司的债务风险因此增加。

3 盈利能力分析

步步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分析，主要是从表 4.14 步步高公司近两年利润表可以看出，步步高公司 2021 年度核心利润亏损 17.2 亿元，这一部分的亏损主要是来源于营业收入降低 45.70 亿元。营业收入的大幅下降，是因为公司战略出现问题，导致公司一直在采取闭店的收缩战略，最终使得营业收入下降。在 2022 年度步步高公司关闭扭亏无望门店共 246 家，并在 2022 年度下半年全面退出四川、江西市场。据最新信息显示，2023 年度的半年度财务报表显示，步步高公司并未由于闭店策略等收缩战略而有所好转，同时由于国资帮助 20 个亿元也无济于事。

表 4.14 步步高公司近两年利润表

亿元

项目	2021 年	2022 年	近两年变动额
营业收入	132.56	86.86	-45.70
营业成本	88.15	66.23	-21.92
其中：			
使用权资产折旧	4.29	3.72	-0.57
财务费用	5.38	5.91	0.53

其中:			
未确认融资费用摊销	2.07	1.81	-0.26
核心利润	-3.52	-17.2	-13.68

表 4.15 同行业毛利率

财务指标	公司名称	2020	2021	2022	变动额
毛利率	步步高	30.14%	33.50%	23.75%	-9.75%
	永辉超市	21.37%	18.71%	19.68%	0.97%
	南宁百货	24.21%	27.18%	25.63%	-1.55%

表 4.16 同行业销售净利率

财务指标	公司名称	2020	2021	2022	变动额
销售净利率	步步高	0.76%	-1.25%	-28.91%	-27.66%
	永辉超市	1.77%	-4.94%	-3.33%	1.61%
	南宁百货	-16.74%	0.33%	-9.84%	10.06%

本文对步步高公司 2020 年-2022 年的财务指标做出相关列式, 同时列举两家对比公司的数据, 详见表 4.15、表 4.16。首先, 从毛利率的角度, 本文发现这三家公司都有变动, 并未呈现大幅上升, 说明商超零售行业的盈利能力均有所下降。但是步步高的毛利率变动额降幅 9.75%, 发现步步高公司 2022 年度的毛利率为 23.75%, 毛利率的下降可能反映出公司产品或服务的市场竞争力减弱, 同时意味着公司在覆盖成本和维持盈利能力方面面临挑战。其次, 从销售净利率的角度来看, 三家案例公司均呈现负值, 说明行业整体净利率有所下降, 但是步步高公司呈现异常的大幅下滑, 说明其本身在利润控制方面出现了一定的问题。步步高公司销售净利率-29.01%, 表明公司在销售过程中产生的净利润不足以覆盖销售成本, 公司的盈利能力受到严重损害。

从盈利能力的角度来看, 步步高公司的营业收入由于闭店使得规模收缩而下降幅度很大, 且利润呈现巨亏状态, 最终根据其盈利能力指标的变化, 均说明步步高公司的盈利能力下降。

4 现金流分析

从表 4.19 可以知道步步高公司及同行业的利润含金量, 从现金流量的角度出发, 商超零售企业的经营活动和净利润在 2021 年均发生较大波动, 同时 2021 年的利润含金量已经呈现回暖趋势。这表明商超零售行业在 2021 年受到新租赁准则的冲击, 而后在 2022 年已经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应对。但是从表 4.19 可以看到步步高公司近三年利润含金量指标波动最大, 这是因为公司近三年的经营活动现金流波动较大, 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步步高公司的经营活动现金流转向了筹资活动现金流。此外, 步步高公司还解释主要是战略调整, 由于收缩和闭店政策, 步步高公司的经营活动现金流与净利润都发生了较大变化, 目前仍在调整当中。

从表 4.20 可以看到步步高公司及同行业的投资回报率, 在 2021 年新准则实施的时候, 商超零售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均呈现负值。而在 2022 年步步高的投资回报率较其他两家公司是最低的, 这说明步步高公司自身的投资活动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同时, 因为投资活动现金流量下降, 而使得其需要通过其他方法来进行外部融资, 最终加重其财务负担、降低其盈利能力。此外, 步步高公司由于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大幅下降, 会使得其投资风险增加, 具体表现为由于投资活动现金流量下降, 公司可能会面临资金周转困难。投资回报的下降使得公司可能无法获得预期的投资收益, 最后影响盈利能力、股东回报等。

表 4.19 同行业利润含金量

财务指标	公司名称	2020	2021	2022	变动幅度
利润含金量	步步高	15.85	-19.70	-0.13	19.57
	永辉超市	3.71	-1.29	-1.96	-0.67
	南宁百货	0.14	-5.85	0.75	6.6

表 4.20 同行业投资回报率

财务指标	公司名称	2020	2021	2022	变动幅度
投资回报率	步步高	0.67%	-1.04%	-14.96%	-13.38%
	永辉超市	5.59%	-13.61%	-12.91%	0.05%
	南宁百货	-9.56%	0.21%	-5.34%	-26.43%

三 针对步步高公司不足提出的建议

(一) 提高资产使用效率, 减轻闲置资产

步步高公司在面对使用权资产带来的经营问题时, 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应对。

第一, 合理规划和管理使用权资产。步步高公司需要了解使用权资产的限制情况, 停不必要的闲置资产; 第二, 加强与租赁方的沟通与合作。提前结束不必要的租赁合同, 减少闲置资产, 保证租赁的有效性; 第三, 优化资产结构和降低租金成本。步步高公司需要重视租赁合同的精细化管理, 参与合同的制定与修改, 并尽可能的降低租金成本。

(二) 加强与债权人沟通, 缓解偿债压力

步步高公司在面对各种负债带来的偿债压力时, 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应对。

第一, 全面评估债务状况。可咨询专家根据债务情况制定相应的债务管理计划以及优化自身债务结构; 第二, 加强现金流管理。现金流得以增加后, 可以取得债权人信任, 缓解偿债压力; 第三, 积极寻求外部帮助。例如: 寻找债权人商讨债务充足的可能性、寻找国家的帮助等。

(三) 密切关注主营业务, 增强盈利能力

步步高公司近两年亏损幅度巨大, 已经严重影响到步步高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 这对于步步高公司的市场占有率等都会带来不好的负面影响。所以步步高公司要将重心放在主营业务上, 注重超市的收支。

第一, 步步高公司需要进行门店管理, 对于所剩不多的门店进行精细化管理、在适当时机停止闭店战略。第二, 步步高公司还需要关注收入与成本, 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同时, 公司还应当加强库存管理, 减少存货发霉等不必要的浪费; 第三, 步步高公司还要积极通过营销活动、品牌宣传等方式吸引更多的潜在客户。可以通过线上线下同时宣传超市折扣优惠力度, 吸引更多消费者进行消费, 确保公司在竞争中的优势地位, 提高盈利能力。

新租赁准则的颁布, 对于许多商超零售企业的相关财务报表都发生了一些变化。通过以上对步步高公司财务报表的分析研究, 最终得到下面的结论: 第一, 在新租赁准则的实施下可以有效的避免旧准则存在的弊端, 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会计信息质量的可靠性。第二, 财务指标的恶化从而影响相关企业报表使用者的看法, 最终导致其股票被低估、融资活动受到不利影响。第三, 新租赁准则的执行将会使得商超零售企业在日常活动和战略规划等方面有新的思考与规划。

本文仅选取一家商超零售业——步步高公司作为案例研究对象, 样本较为单一。并且, 步步高公司在商超零售行业的品牌排名等并不靠前, 并不能代表所有商超零售企业。在未来, 衷心的希望各位学者能够在这个领域获取更多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 Duke C J ,Hsieh S ,Su Y .Operating and synthetic leases: Exploiting financial benefits in the post-Enron era[J].Advances in Accounting, incorporating Advances in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2009,25(1):28-39
- [2] Frecka J T .Ethical Issues in Financial Reporting: Is Intentional Structuring of Lease Contracts to Avoid Capitalization Unethical?[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08,80(1):45-59
- [3] 康书生,王涵生.关于租赁会计准则修订的概况与分析[J].会计之友(上旬刊),2009,(12):89-91
- [4] Goodacre A .Operating lease finance in the UK retail sector[J].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Retail, Distribution and Consumer Research,2003,13(1):99-125
- [5] Fafatas S ,Fischer D .The Effect of the New Lease Accounting Rules on Profitability Analysis in the Retail Industry[J].Journal of Corporate Accounting Finance,2016,28(1):19-31
- [6] 王雅倩. 新租赁准则对我国酒店企业的预期财务影响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23
- [7] 王纯. 新租赁准则变化对企业经济增加值的影响研究[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22

- [8] 钟静芳.新租赁准则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基于新华百货的案例分析[J].财政监督,2023(16):89-94
- [9] 吴濛笛,陈立梅.新租赁准则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以 B 公司为例[J].经济研究导刊,2024(03):77-80
- [10] 张涛,张川.新租赁准则对承租人使用权资产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境内外交叉上市企业的证据[J].财会通讯,2024(05):33-37
- [11] 于红卫.浅谈新租赁准则实施的两条线[J].冶金财会,2022,41(10):44-46
- [12] 马永义.新收入准则与新租赁准则:对照式解析[J].财会月刊,2021(19):8
- [13] 马旋灵.新租赁会计准则对银行业承租管理的影响探析[J].金融会计,2020(02):21-2
- [14] 韩志飞.新租赁准则下隐性指定的已识别资产的评估和认定[J].财务与会计,2021(23):47-49
- [15] 曹琼,彭培鑫,李佩萍.财务指标视角下新租赁准则实施政策效应研究——以批发零售业为例[J].商业观察,2022(32):17-20
- [16] 刘欣悦.新租赁会计准则对零售业财务指标影响分析——以永辉超市为例[J].河北企业,2022(12):119-121
- [17] 彭杉.承租企业实施新租赁准则存在的困境与应对[J].国际商务财会,2021(17):53-56
- [18] 吕丽姬.实施新租赁准则对财务报表影响探究[J].财经界,2022(26):123-125
- [19] 段晓军.新租赁准则在集团公司内部租赁中简化运用的探讨[J].质量与市场,2022(14):187-189
- [20] 张继德,丁海燕,杨思妮.新租赁准则变化及对民航业经营租赁的影响[J].财务管理研究,2020(08):7-12
- [21] 孙劲松.关于新租赁准则对承租企业相关规定的探讨[J].国际商务财会,2022(07):49-52+55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the New Leasing Standard o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the Supermarket Retail Industry-- Take BBK as an Example

Xuejia Wu

Chuanshan college Nanhua university, Hunan, China

Abstract: In 2021, China promulgated new leasing standards, which clearly stipulates that the lessee does not need to distinguish between operating leases and financial leases in the accounting treatment related to leasing. This paper will select a case company - BBK Company from the retail industry, and start from the changes of the company's three financial statements: the new use right assets and lease liabilities in the balance sheet; The range of depreciation expense and interest expense in the income statement; Whether the operating activities and financing activities of the cash flow statement produce a trend of change and so 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pany's financial statements have undergone significant changes after the promulg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leasing standards: the use right assets and lease liabilities of the balance sheet hav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ffecting the company's asset turnover and other indicators; Income statement also due to a large number of depreciation and interest expenses, resulting in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of the first year of net profit fell; Cash flow statement financing activities cash flow precipitous decline and so on. Therefore, after analyzing the changes of Bubugao Company's financial statement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easibl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ccording to its subsequent adjustments and deficiencies.

Keywords: new leasing criteria; BBK Company; The right to use the assets; Lease liabilities; Financial statement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3.744

项目驱动教学法在网络与新媒体专业 UI 设计课程中的应用与改革

曹楚怡¹ 龙海鸣¹

(¹ 东莞城市学院, 广东 东莞 523000)

摘要: 在数字创意产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 我国新媒体行业市场规模预计 2024 年突破 3 万亿元, UI 设计师岗位需求近三年复合增长率达 37%, 但高校人才培养与行业需求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研究表明, 全国 78% 的 UI 设计课程仍沿用“软件操作+虚拟课题”的传统模式, 导致应届生平均需要 4.7 个月企业再培训方能胜任基础岗位, 其中东莞城市学院网络与新媒体专业毕业生首年离职率 (31%) 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本研究基于文献分析法与教育实践总结, 构建 OBE 理念与项目驱动教学法的融合框架。理论层面, OBE 的成果导向原则为教学提供反向设计逻辑,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支撑“项目链-知识链”的螺旋递进机制, 人本主义理论则奠定多元化评价体系基础。实践层面, 东莞城市学院通过引入大广赛项目、电商平台设计等真实任务, 形成“需求分析→原型迭代→商业转化”的完整培养闭环, 使教材滞后周期缩短 40%, 跨学科知识整合度提升至 78%。

关键词: OBE 理念; 项目驱动教学法; UI 设计课程; 产教融合; 动态评价机制

一、引言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迅猛发展, 根据《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 统计出各类新媒体产业的市场规模情况, 从而测算新媒体产业整体市场规模。2019-2023 年, 我国新媒体行业市场规模从 17337 亿元增长至 28845 亿元, 复合增长率为 13.6%。结合历年统计数据及市场变动情况, 初步统计, 2024 年我国新媒体行业市场规模约 30945 亿元, 同比增长 7.3%。中国 UI 设计师岗位需求近三年复合增长率达 37% (艾瑞咨询, 2023), 行业对既掌握设计原理又具备项目实操能力的人才需求愈发迫切。在高等教育领域, 全国已有 612 所高校开设网络与新媒体专业 (教育部, 2022), 其中 UI 设计课程作为人才能力矩阵中实践权重最高的模块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2022), 其教学成效直接影响着每年约 8.6 万名相关专业毕业生 (智联招聘, 2023) 的职场竞争力。

然而, 现行教学模式与行业动态存在显著脱节: 78% 的 UI 课程仍采用“软件操作+虚拟课题”的传统框架 (《中国数字媒体教育白皮书》), 导致应届生平均需要 4.7 个月企业再培训才能胜任基础岗位 (BOSS 直聘研究院, 2023)。这种结构性矛盾在东莞城市学院的教学实践中尤为突出——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内容产业重要人才供给基地, 该校网络与新媒体专业 2022 届毕业生 UI 岗位首年离职率达 31%, 远高于行业平均的 19% (校方就业质量报告)。究其根源, 65% 的企业雇主指出院校培养存在“项目经验断层”和“跨岗位协作意识缺失” (珠三角数字创意产业联盟调研)。

二、项目驱动教学法的理论基础

OBE (Outcome-Based Education) 即成果导向教育, 是一种以学生学习成果为导向的教育理念, 旨在通

基金项目: 2023 年广东省东莞市东莞城市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立项课题“新媒体背景下网络与新媒体专业 - 全媒体实训基地协同教学体系构建” (JY2023000701)

作者简介: 曹楚怡 (1994—), 女, 广东清远人, 东莞城市学院助教。

龙海鸣 (1994—), 男, 广东清远人, 东莞城市学院副教授。

过关注学生的实际成果,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人才(Shaheen, 2019)。OBE 理念起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西方国家,当时美国教育质量下滑,学生综合素质能力不足,这些问题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了提高教育质量,美国政府开始推行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其中包括引入 OBE 理念。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教育学者开始对 OBE 理念进行深入研究,探讨其在教育实践中的应用。同时,欧洲、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也纷纷借鉴美国的经验,开始实施 OBE 教育改革。这些改革举措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 OBE 理念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和发展。

OBE 理念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教育目标的确定性、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人本主义学习理论等(Syeed, Shihavuddin, Uddin, Hasan, & Khan, 2022)。教育目标的确定性强调教育目标的明确性和可测性,学生的学习成果必须能够被准确测量和评估。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生的学习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通过自己的经验、思考和探索,主动地构建知识体系。人本主义学习理论则关注学生的个性发展和情感需求,强调教育应以学生为中心,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Allo, Sudarsi, & Taula'bi, 2024)。

OBE 理念具有以下特点: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和体验;以成果为导向,明确学生在课程结束后应达到的学习成果,教学设计和实施都围绕这些成果展开(Allo et al., 2024);强调能力培养,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持续改进,通过系统科学的教学评价(Damit, Omar, & Puad, 2021),不断完善教学设计与教学实施。OBE 理念强调,教育的出发点不是教师想要教什么,而是学生需要学到什么,最终能够做什么。它要求教育者从最终的学习成果出发,反向设计课程和教学活动,确保每个教学环节都紧密围绕预期的学习成果展开。这种反向设计原则有助于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使学生的学习更加聚焦和高效(Allo et al., 2024; Syeed et al., 2022)。

三、项目驱动教学法在网络与新媒体专业 UI 设计课程中的应用现状

近年来,随着网络与新媒体行业的快速发展,UI 设计课程作为培养高素质设计人才的重要环节,面临着教学内容与行业需求脱节、教学方法单一等问题。项目驱动教学法作为一种以实际项目为核心的创新教学模式,近年来在高等教育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本文以东莞城市学院为例,探讨项目驱动教学法在 UI 设计课程中的应用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东莞城市学院在 UI 设计课程中尝试将行业实际项目引入课堂,以提高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和时效性。例如,在“能力引导+项目驱动”教学模式中,课程内容围绕具体项目展开,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然而,部分课程内容仍存在滞后性,未能完全覆盖行业最新的设计趋势和技术要求。例如,一些教材内容同质化严重,大多偏重某一部分内容讲授,如界面设计或者原型交互设计,而对用户研究、交互设计、界面设计等跨学科知识的整合不够。尽管传统教学方法在一些课程中仍占主导地位,但东莞城市学院已开始探索项目驱动教学法的应用。在 UI 设计课程中,教师通过设计具体的项目任务,引导学生进行实践操作和问题解决,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情境。例如,在大广赛(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项目中,学生通过完成社交类 APP 的界面设计任务,掌握了界面分析、功能布局和设计流程等核心技能。此外,本专业还尝试采用案例教学法和翻转课堂等多种教学方法,以提高教学效果。

四、项目驱动教学法在网络与新媒体专业 UI 设计课程中的改革措施

项目驱动教学法在实践环节中表现出较强的实用性,东莞城市学院通过引入实际项目,如“电商购物平台”项目,将项目拆解为多个任务链,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逐步提升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然而,部分实践项目的设计仍存在简单化和零散化的问题,未能充分锻炼学生的综合能力。例如,一些实践项目只是简单的设计任务,缺乏系统性和挑战性,无法全面覆盖 UI 设计课程的核心技能(沈涵, 2018)。

项目驱动教学法在实践环节中表现出较强的实用性,为学生提供了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技能的机会。以东莞城市学院为例,该校通过引入实际项目,如“音乐 APP 界面设计”项目,有效地将复杂的项目拆解为多个相互关联的任务链。学生在完成这些任务的过程中,逐步提升了自己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例如,在音乐 APP 界面设计项目中,学生需要从需求分析开始,逐步进行用户研究、信息架构设计、原型制作、视觉设计,直到最终的用户测试和优化。这一过程不仅涵盖了 UI 设计的多个核心技能(刘民娟, 2020),还培养了学生的系统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学生通过实际操作,学会了如何根据用户需求设计出既美观又实用的界面,同时在团队协作中提升了沟通和项目管理能力。

尽管项目驱动教学法在提升学生实践能力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部分实践项目的设计仍存在一些不足(何剑民 & 郭红艳, 2010)。例如,一些项目设计过于简单化,仅要求学生完成单一的设计任务,如简单的界面布局或图标设计,而未能涵盖 UI 设计的完整流程。此外,部分项目任务之间缺乏逻辑关联,导致学生

在完成任务时难以形成系统的知识结构。这种零散化的项目设计限制了学生综合能力的锻炼,使得他们在面对复杂的实际问题时,可能缺乏足够的应对策略和创新思维。一些实践项目未能充分考虑行业标准和实际工作流程,导致学生在完成项目后,对真实的 UI 设计工作环境缺乏足够的了解。例如,项目中可能没有涉及到用户测试、可用性评估等关键环节,而这些环节对于 UI 设计的成功至关重要。此外,部分项目缺乏挑战性,未能激发学生的创新潜力,使得学生在完成项目后,可能只是掌握了基本的设计技能,而未能在更高层次上提升自己的设计能力。

综上所述,项目驱动教学法在 UI 设计课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实践环节的设计上仍需进一步优化。未来,学校应致力于设计更加系统化、挑战性的实践项目,确保学生能够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全面覆盖 UI 设计课程的核心技能,并培养出适应行业需求的综合能力。

五、项目驱动教学法的教学效果评估

在教学评价体系中,本专业开始引入多元化评价方式,注重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例如,在 UI 设计课程中,教师通过项目成果、团队协作和创新能力等多维度指标对学生进行综合评估。这种评价方式不仅关注学生的最终成果,还重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表现和进步,能够更全面地反映学生的学习成果和能力水平。

然而,现有的评价体系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评价方式较为单一,过于依赖考试成绩,缺乏对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全面评价。这种单一的评价方式可能无法全面反映学生的学习成果和能力水平,限制了学生综合能力的锻炼。其次,评价过程缺乏互动和反馈,学生在评价中处于被动地位,无法充分参与到评价过程中,这不利于学生对评价结果的认同和接受,也可能导致学生对评价结果产生抵触情绪。此外,评价过程中缺乏反馈和指导,使得学生无法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也无法得到及时的指导和帮助,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效果。

为了进一步提升教学效果,本专业中应致力于构建更加科学、全面的评价体系。具体措施包括:采用多元化的评价方法,如学生自评、小组互评和教师评价相结合,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注重过程性评价,通过建立学生学习记录卡、资料袋等方式,记录学生的学习过程和成长变化,引导学生注重平时学习,促进其不断反思和改进;加强评价的互动性和反馈性,通过及时的反馈和指导,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调整学习策略,提高学习效果。

六、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法揭示,OBE 理念与项目驱动教学法的耦合具有三重理论适切性:其一,教育目标确定性原则(Shaheen, 2019)为项目任务拆解提供了可操作的指标框架,使 UI 设计课程能精准对接行业岗位能力矩阵;其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Syed et al., 2022)支撑了"项目链-知识链-能力链"的螺旋递进机制,破解了传统教学中知识迁移低效的困局;其三,人本主义理论(Allo et al., 2024)通过强调学生中心地位,为多元评价体系的构建奠定哲学基础。这种理论融合创新了应用型课程的设计范式,为沈涵(2018)提出的"教学供给侧改革"提供了新的实施路径。

经验总结表明,东莞城市学院的改革实践印证了项目驱动教学法的双重效能:在正向维度,通过引入大广赛项目、电商平台设计等复合型任务,成功构建了"需求分析→原型迭代→商业转化"的完整能力培养闭环;在反向维度,行业专家参与的课程重构使教材滞后周期缩短 40%,跨学科知识整合度提升至 78%。但研究同时发现,现有项目仍存在三大约束:简单化任务设计导致高阶思维能力培养不足、评价反馈机制缺乏动态调整弹性、前沿技术模块覆盖率不足制约创新潜能激发。这提示未来改革需强化"项目复杂度梯度设计"与"评价体系过程性改造"的协同推进。

基于文献比较发现,多元化评价体系的建构需突破三重理论瓶颈:首先,过程性评价占比需从现行 25% 提升至 60% 以上,以契合"能力成长可视化"原则(王从容 & 刘辰, 2018);其次,应建立企业标准与学术评价的转化机制,参照(Damit et al., 2021)的教学评价模型,将用户测试通过率、设计文档规范度等职业化指标纳入评估体系;最后,需通过学生自评日志、反思报告等质性材料采集(Syed et al., 2022),完善能力发展的多维表征,也为 AIGC 时代 UI 设计课程评价范式的数字化转型预设了理论接口。

参考文献:

- [1]. Allo, M. D. G., Sudarsi, E. T., & Taula'bi, N. (2024). Implementation of Outcome Based Education (OBE)

- principles in the curriculum of the English Education Study Program at a higher education in Toraja. Jurnal Onoma: Pendidikan, Bahasa, dan Sastra, 10(2), 1379-1391.
- [2]. Damit, M. A. A., Omar, M. K., & Puad, M. H. M. (2021). Issues and challenges of outcome-based education (OBE) implementation among Malaysian vocational college teach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ademic Research in Business and Social Sciences, 11(3), 197-211.
- [3]. Shaheen, S. (2019).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current challenges of OBE framewor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1(2), 122-129.
- [4]. Syeed, M. M., Shihavuddin, A., Uddin, M. F., Hasan, M., & Khan, R. H. (2022). Outcome based education (OBE): Defining the process and practice for engineering education. IEEE Access, 10, 119170-119192.
- [5]. 何剑民,郭红艳.“案例项目驱动教学法”在计算机教学中的应用[J].福建电脑,2010,26(01):188-189.
- [6]. 刘民娟.高职院校 UI 课程设置现状及改革措施初探[J].中外企业家,2020,(12):223.
- [7]. 沈涵.UI 界面设计课程教改实践探索[J].教育教学论坛,2018,(43):154-155.
- [8]. 王从容,刘辰.高职院校学生素质能力成长创新研究——以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为例[J].工业和信息化教育,2018,(10):36-41.

Application and Reform of Project-Driven Teaching Method in UI Design Course for Network and New Media Majors

Chuyi - Cao¹, Haiming- Long¹

¹ Dongguan City University, Dongguan, Guangdong 523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creative industry, China's new media industry market size is expected to exceed 3 trillion yuan by 2024, with a 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 of 37% for UI designer positions over the past three years. However, a growing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 is emerging between university talent cultivation and industry demands.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78% of UI design courses nationwide still follow the traditional "software operation + virtual project" model, resulting in fresh graduates requiring an average of 4.7 months of retraining in enterprises to handle basic positions. Notably, the first-year turnover rate for graduates from Dongguan City University's Network and New Media program (31%)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industry average. Based on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educational practice,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framework integrating OBE philosophy with project-driven teaching methods. Theoretically, OBE's outcome-oriented principle provides a reverse design logic for teaching, constructivist learning theory supports the spiraling "project chain - knowledge chain" mechanism, and humanistic theory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a diversified evaluation system. In practice, Dongguan City University has introduced real-world tasks such as the National College Student Advertising Art Competition (Daguan Sai) and e-commerce platform design projects, forming a complete training cycle of "requirements analysis → prototype iteration → commercial transformation," reducing textbook lag by 40% and enhancing cross-disciplinary knowledge integration to 78%.

Keywords: OBE Philosophy; Project-Driven Teaching Method; UI Design Course;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Dynamic Evaluation Mechanism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3.737

诗礼文化下沉与元杂剧流行的研究

曹烜毓¹ 梁洁¹

(¹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 上海 嘉定 201615)

摘要: 音乐与诗歌伴随人类历史而来,是人类最本能的交流工具与抒情手段。这些自发的活动随着周公制礼作乐而发生质变,经过儒家的完整阐发进而形成一种深刻影响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制度。这种制度的本质即在于通过潜移默化的“文化浸染”,产生自上而下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引领。随着汉代“独尊儒术”的形成,礼乐制度作为治国理政正统思想的组成部分被统治阶级所确立,礼乐相合,内外相配,从而达到维护社会秩序和巩固国家统治的目的。自汉以降,礼乐制度在历朝历代延续不绝,成为中华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象征。元朝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基于本民族文化的影响,元朝统治者对中原礼乐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删改,使得传统汉族儒家的诗礼制度被破坏。但在民间,因为巨大的历史惯性,诗礼文化依然有着深厚的影响。因此,元朝社会在诗礼文化方面,出现了明显的上下分层现象。同时,因为自上而下的制度性的道德规范与价值引领的缺位,下层自发的礼乐活动便承担了本该由上层来推动的教化功能,这种转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视作礼乐文化的“下沉”。而成熟于元代的杂剧,因为其在民间道德宣教上承载的作用及其与诗、礼、乐的密切关系,既可以视做礼乐文化下沉的结果之一,亦可以视作这种下沉趋势的表现之一。可以说,元杂剧的繁荣及其产生的社会、历史的巨大影响力,离不开元代特殊的时代背景所造成的诗礼文化的下沉,以及中国渊源流传的诗礼乐传统的合力影响,这也是本文所着重关注的地方。诗礼文化下沉是一种文化现象,元杂剧的流行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二者统一于元代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相互关联且相互作用。探索二者的联系,有助于在一种全新的视角之下展开对这两种文化现象的观察及逻辑推导。

关键词: 元杂剧; 诗礼文化; 下沉; 原因

一、传统诗礼文化与礼乐制度的形成及演变

1. 诗礼文化现象及其人类学意义

“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礼本意指祭祀中奉献鬼神的礼器,后引申为以祭神为主的原始仪式。事神仪式“礼”与事神歌舞“乐”的结合,乃是“礼乐”的最初涵义。礼乐伊始,是人的一种具有社会性的文化行为表现,是一种随着文明进步而出现的文化现象,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人们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作为神灵祭拜的事神仪式的礼乐习俗,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已经出现。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诞生,标志着“诗”和“礼乐”于西周正式结合。至此,中原大地上出现了旷日持久的诗礼文化现象。

周公制礼作乐,乃是礼和乐发生质变的重要标志。西周礼乐的出现预示着中国早期礼乐文化逐渐褪去宗教神学的外衣,开始向更高级的礼乐文明演变。礼乐成为了一种潜移默化的“文化浸染”,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变成为一套系统完整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引领。

2. 传统礼乐制度的形成及社会功能

中原诗礼文化现象的持久性,决定了后期礼乐制度诞生的必然性。礼乐制度的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诗礼文化的延续性。诗礼文化是自西周以来汉族先民创造的产物,经先秦儒家阐释发扬后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推行的礼乐教化传统和礼乐制度。中国礼乐制度的确立及发展经过了一个漫长而周折的过程,西周宗法制与分封制的建立,将原部族间平等、松散的盟友关系变成了上下依附的等级关系。礼乐制则作为宗法制中,调解贵族阶级内部的行为规范和区分贵贱尊卑的准绳。从《诗经》“风雅颂”的内容划分上我们会发现,在中国越早的历史时期中,尊卑等级的划分就越明显,层级间的壁垒也越清晰。“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是其和者不过数十人……。”其中“阳春白雪”即雅乐,“下里巴人”即俗乐。民间百姓们耳熟能详的是俗乐,知之甚少或全然不知的是雅乐。在等级森严的西周,诗礼文化也相应地呈现出尊卑分明的趋势,出现了雅乐和俗乐的划分。雅乐和俗乐各自有着明确的适用对象和范围,两乐间存在着严格而清晰的界限。

春秋战国史称“礼崩乐坏”时期,社会控制力的降低给予了更多人以机会来阐发“礼”,儒家学说就是其中的代表。孔子将过去主要局限于贵族层面的“礼”推向社会各阶层,开启了“礼下庶人”的历史进程。经儒家阐释发扬后的礼乐文化,逐渐演变形成一种全社会范围内的典章制度,具有强大的社会等级性质和社会规范作用。正如孔子所言:“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只有天子才配享用“八佾”,诸侯、卿和大夫的乐舞人数按照等级依次递减,不可僭越。礼乐制度中有着一套精细而严格的关于礼乐使用的规定,首先需根据社会阶层划分身份地位,随后匹配与之相对应的“礼”和“乐”。

一套基于礼的完整的社会制度,在自上而下推行的过程中无时无刻不在维护着“礼”的社会地位与至上权威。

二、元代诗礼文化的现状及下沉倾向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较为特殊的一个时期,该朝立国时间较短且为异族建立的政权。作为首个在中原大地上建立统一王朝的少数民族,其文化力量不容小觑。然而,汉族儒家文化根深蒂固,在短短百余年间外来统治者无法完全摒弃礼乐制度,亦无法终止延续千年的诗礼文化现象。于是,元代统治者只能选择对中原礼乐制度进行删改,以此来弘扬本民族礼俗文化。在删改的过程中,中原礼乐制度遭受重创,传统上层诗礼文化几乎名存实亡,自上而下的制度性道德规范与价值引领缺位。基于中原诗礼文化现象的长期熏陶,下层出现的礼乐活动仍具有鲜明的礼乐特性。由此,便承担起本该由上层推动的教化功能,在某种意义上该转变可视为诗礼文化的“下沉”。

1. 元代礼乐制度的构成

蒙古族起自朔漠,受生活环境和习俗的影响着属于本民族独特的乐舞文化和礼仪风俗。身为异族,元朝统治者本就轻视儒家文化,在儒学独尊地位被彻底推翻的同时,诗礼文化的根基亦于元朝动摇。

音乐和舞蹈是最能体现一个民族文化审美和价值观念的部分,蒙古人民,早在原始部落时期就已经形成了极具草原文化色彩的乐舞。蒙古族的音乐舞蹈大多是为了庆祝丰收,战争胜利等。曲调激昂,节奏欢快,以表达感情,娱乐大众,烘托气氛为主要目的。在舞蹈中常见挤奶,顶碗及模仿动物跳跃之类的动作。例如祭祀歌舞,狩猎歌舞和萨满歌舞等等。成吉思汗统治时期更是增添了草原牧歌,赞歌等音乐形式,蒙古族的乐舞种类日益丰富。显而易见,蒙古族乐舞与中原地区的歌舞以中正平和为正统,以教化为主娱乐为辅的传统截然不同。

蒙古族有着自己独特的祭祀对象和祭祀仪式。“其祖宗祭享之礼,割牲、奠马湏,以蒙古巫祝致辞。”以上皆为蒙古族祭礼的习俗。蒙古族统一中原后受汉文化影响,祭祀之礼亦有所改变。但从总体上看,元代统治者并未大幅更改自己本民族的文化来适应中原的统治。相反,他们以本民族文化为基准对中原礼乐制度进行了多方位的删改。

2. 元代诗礼文化下沉的表现

(1) 礼乐制度的上下分层

元朝统治者自行制定并实施其蕴含浓厚民族文化色彩的礼乐制度,该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原传统礼乐文化大相径庭。于是,元朝社会在诗礼文化方面出现了明显的文化分层现象。

其中,导致文化分层现象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蒙古族乐理与中原乐理没有实现很好地融合。具体表现在,元朝统治者对雅俗乐界限地忽视,将俗乐的适用范围无限扩大。元朝制定雅乐的方式有两种:一、蒙古贵族在制定宫廷礼乐时“多从本俗”,“大抵其于祭祀,率用雅乐,朝会饗燕,则用燕乐,盖雅俗兼用者也。”元教坊大曲《白翎雀》该曲原系为北方草原的民歌,后因世祖命伶人修改加工,终成为宫廷演奏的“雅乐”。雅乐的地位越来越脆弱,时常受到来自北方俗乐的冲击。二、征召汉儒定乐。元代统治者曾广泛征召汉儒制乐,但由于蒙古贵族音律知识有所匮乏,鲜知礼乐制定,所征召的汉儒之中大多非专职乐师。在某种程度上,所制之乐虽为中原雅乐,却多难以雅奏。

元朝礼乐实施多从本俗。本俗即国俗,指蒙古旧俗。“元之五礼,皆以国俗行之,惟祭祀稍稽诸古。”“古”指中原汉地,元代“五礼”与中原“五礼”指代一致,即“吉凶军宾嘉”。但唯有祭祀之吉礼稍效仿中原汉地之礼,其余四礼均依照本民族礼俗来进行。

以传统诗礼文化的标准来审视元朝的礼乐制度,经蒙古统治者的删改,上层礼乐几乎名存实亡。严格来说,官方制度层面的礼乐已然成为蒙古文化的附属品。但由于中原诗礼文化现象依然存在且影响深远,于是,元代官方与地方便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形态。

(2)民间自发的礼乐活动

中原自古以来就是农耕社会,所以与农业息息相关的雨神、农神向来受到中国历代帝王的重视,并且常由官方组织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相反,对于从马背上赢得天下的蒙古族而言,这些祭祀反倒显得可有可无,远不及蒙古国俗祭礼重要。关于祈雨祭祀,在元代汉族传统礼法中最为古老的“雩祀”被废除。然而,官方祭礼地消失并未磨灭民间百姓祈雨祭祀的热情。相反,由于上层祭祀仪式的缺乏,民间祈雨仪式变得更加丰富,形式不一而足。此外,真正意义上的官方农神祭祀直到元武宗才姗姗来迟,尽管存在但元朝皇帝往往很少亲至。然而,在民间地方农神祭祀却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每逢春播秋收之际,百姓们都要亲自下地祭祀以示对农神地敬仰与重视。

由此可见,官方不重视甚至是直接废除的祭祀对象和仪式,在民间依然备受重视,甚至某些仪式还以更加多元的形式保留着。

(3)自下而上的道德宣化

因为蒙古族音乐文化自成体系,所以元朝统治者并没有刻意遵循中原雅乐的制定规则。不仅如此,他们还还对中原礼乐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删改。诸如此类的举动,使得依附于上层统治而存在的雅文化无立足之地,元代出现了俗文化大于雅文化的现象。

本该由官方倡导自上而下推行的礼乐教化,反倒由下层民间出现的一些新形式去代替上层承担起诗礼教化的任务,出现了自下而上的道德宣化。尽管说书,戏剧等形式脱胎于民间俗文学,但从中我们仍能发现传统诗礼文化的痕迹。例如话本《朱元江救朱蛇》的主旨即为“恻隐仁慈行善事,自然天降福星临”。杂剧《合同文字》则主要强调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伦理,宣扬了儒家家族的正统观念。另外,元代儒士文人主动投身于俗文学的创作,此举动使得以戏剧为首的俗文学的内涵更加深刻,层次不断提升。在“俗盛雅衰”的元代,代替雅文学担负起诗礼教化的使命。

三、元杂剧与诗礼文化的关联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将艺术形式划分高低优劣的习惯,偏爱将诗文奉为雅学正宗,而将戏曲杂剧视为浅薄不入流的“末技”。直至元代,由于外来文化的入侵,儒学政治地位的松动,俗文学的蓬勃发展等诸多历史文化现象产生,导致兴起于民间的杂剧成为元代最为主流的文学形式。

众所周知,民族融合是中国文化与文学发展的动力之一,戏曲杂剧独在“夷狄主中华”时突然勃兴,蒙古族文化的贡献不容小觑。

1.元代剧中的诗歌与音乐

诗歌与音乐是人类最本能的交流工具与抒情手段,受儒家诗礼文化的影响,音乐成为了官方宣导教化的重要手段。尽管戏曲与戏剧只有一字之差,但从中我们可窥见音乐教化在我国的至高地位。戏曲与话剧均为戏剧之属,都需通过演员扮演人物,运用对话和动作去演绎故事情节。西方传统的戏剧形式以话剧为

主，而中国的戏剧则多从戏曲演化而来。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戏剧是一种歌剧。中西方的戏剧都有教化功能，西方戏剧多是通过演员与观众的“直接对话”来完成教育，而中国戏曲则是通过演员配乐演唱，以说唱结合的方式来对观众进行教化。无曲不成戏，从隋唐五代的参军戏到南宋时的永嘉杂剧再到元代的戏曲，清代的京剧。“曲”不仅是中国音乐教化传统源远流长的最好证明，还是中国戏剧区分于世界戏剧的重要标志。

2. 元代剧中的礼仪制度

“中华礼仪，文明渊藪。”在元杂剧问世的时代，中原传统礼仪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巨大冲击。尽管如此，从大体上看传统文化依然没有消失。

从元杂剧各个角色出场台步的数量设置上，我们能够找到中原礼仪制度的痕迹。中国古代数字“九”为阳数的极数，人们常用“九五至尊”来指代天子。所以在元杂剧中，凡是天子登台需走九步，文官登台需走八步，霸王登台需走七步，依次递减。上台台步的数量需要与剧中人物的身份地位相匹配，这正是诗礼文化中“礼”的至上权威的体现。

“稽首”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跪拜礼，是臣子对君王表示毕恭毕敬的一种礼节。在接受国君圣旨时，臣子需出门迎拜，使者离开时臣子必须拜送至门外。以元杂剧《半夜雷轰荐福碑》为例：

“（使官上，云）来到也。左右接了马者。张浩，听圣人的命。（净云）呀！快装香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做跪科，使官云）张浩，为你献了万言长策，圣人见喜，加你为吉阳县令，教你走马上任。谢恩。（净拜科，云）待茶饭了去。”

剧中张浩听到有圣旨到来，便立刻出门跪地接旨。待圣旨宣读完毕后拜谢圣恩，并准备茶饭答谢送别使者。元杂剧作为在外来文化席卷下幸存并蓬勃发展的文学形式，正力挽狂澜地承载着那些在特殊时代背景下流失的传统诗礼文化。

3. 元代剧中的道德教化

元杂剧的教化途径主要包括内外两个方面，内在情节与外在形式的道德教化分别通过戏剧冲突与行当科范来实现。其中，戏剧冲突不仅是元杂剧实现教化功能的主要途径，还是助力其走向中国戏剧巅峰的重要动力。

任何时代的戏曲都没有元杂剧的冲突来得激烈、集中。政治的变更，政权的更替，江山易代，必然会带来民族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蒙汉文化的差异造就了元杂剧强烈的戏剧冲突。蒙古民族文化中巾帼不让须眉、嫉恶如仇、追逐自由不受约束等思想观念的传入，冲击甚至改变了中原剧作家们继承并遵循的传统文学创作意识。体现在作品之中，就是剧中人物间出现的矛盾，无法被儒家礼教纲常所化解，时代张力与思想观念的觉醒使得反抗与斗争成为时代主基调。这些无法被淡化而日益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共同构成了元杂剧情节的波澜起伏，积累冲破了中原戏曲温柔敦厚的传统。元代剧作家们亦借助这种无处不在、震慑心灵的戏剧冲突来实现教化。

戏剧冲突是元杂剧无形的教化途径，行当科范是其有形的教化方式。元杂剧的角色分为“末旦净杂”四个行当，每个行当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形象内涵与造型装扮。以搽旦为例，“搽旦或扮悍妇、或扮虔婆、或扮刁泼尖刻、品性不良的妇女。”其饰演的绝大部分是反面女性角色。搽旦的装扮可谓是元杂剧旦类角色中最为反繁复的，“搽的青处青、紫处紫、白处白、黑处黑恰便是成精的五色花花鬼。”这种浓墨重彩的上场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把乖谬之丑自炫为美的手段，尽显其外露诡谲、内藏奸诈的特性。这些在道德审判标准下孕育而生的行为举止，在吸引观众眼球的同时亦加深了世人对于美丑善恶的认知。

戏曲脸谱是高台教化的重要工具，每一个戏曲脸谱的绘制都是针对公众熟悉人物性格的伦理道德化地解读，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教化形式。以元杂剧中的净角为例，净角俗称花脸。脸谱里“忠”的形象多采用红色作为忠孝仁义的表达色彩，例如关羽、姜维。“奸”的形象多以白色作为奸诈狡猾的表达色彩，例如曹操、秦桧。“刚正不阿”的形象多以黑色作为脸谱的主色调，例如包公、张飞。“桀骜不驯”的形象多以蓝色或绿色为主色调，例如窦尔敦、马武。戏曲脸谱以其夸张的造型装扮和极具识别度的色彩搭配，直观准确地向人们诠释了孰忠孰奸，孰正孰邪，实现了劝化人心、匡扶正义、惩恶扬善的教化目的。

四、元代诗礼文化下沉的原因及对元杂剧流行的影响

诗礼文化下沉与元杂剧流行，同为元代社会背景下出现的独特文化现象，二者相互关联且相互作用。关于诗礼文化，我们可以将其拆分成两个并列的词组来进行理解：诗礼与文化。由此我认为，可以从历史和文化这两个方面展开对元代独特文化现象成因的分析。

1. 诗礼文化失去官方地位

(1) 优待而非独尊的儒学政策

下沉是指一种由高至低，竖直向下的运动。诗礼文化的下沉必然也经历这样一个从落到沉的过程。尽管，元朝统治者为了有效地对全国实施管理也曾认真学习中原礼乐，但身为草原游牧民族的他们文化水平较低，难以理解高深的儒学。况且，出于蒙古族多神教萨满的宗教传统，他们对待被征服地区的文化，往往采取优待而非独尊的政策。于是，在元代儒学独尊的地位被彻底推翻，诗礼文化随之从官方跌落。此外，元蒙政权中偏执、黷武、嗜利的倾向十分明显，此种价值取向本就与汉儒文化里中庸、尚礼、平和的价值取向截然相反。这也是为什么，备受尊崇的诗礼文化在元代屡屡受挫，始终无法被统治者真正接纳和认可的根本原因。

(2) 陡然滑落的汉儒地位

儒家文化受挫，在我国元代以前并不是没有发生过，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整个儒士群体遭受如此巨大的挫折，则以元之世为甚。元世祖即位后，也曾积极地改革旧俗、重用儒士、以汉治汉、推行礼乐。然而好景不长，“四大事件”地接连爆发彻底锐减了礼乐制度在元代持续兴盛的可能性。首先，郝经等人赴南宋会议受挫让忽必烈对儒士及儒士们所倡导的中原礼乐产生了疑忌。其次，李璫叛乱可谓彻底磨灭了元朝统治者对汉儒的信任。再次，暗杀阿合马事件地爆发使忽必烈对汉人更加戒备。最后，汉法派上书元世祖禅位于自小倍受儒学熏陶的真金太子，此举直接激怒了忽必烈，世祖曾曰“朕左右复无汉人”，四次事件地接连爆发，导致汉儒地位陡然滑落，继而有关于汉文化的一切均受到牵连，首当其冲就是中原礼乐。

(3) 徒负虚名的元代科举

科举取士在蒙元政权下停废长达八十年之久，虽然其间也曾有过恢复，但也只是流于形式并未真正发挥其取士的功能。元代科举不仅设科少开科次数有限，录取人数更是凤毛菱角，远远无法满足众多靠读书入仕的知识分子们的需求。况且，元代实行“四等人”制，取录之人多为蒙古人与色木人。可见，在元代汉人能够凭科举考试成功走入仕途之人寥寥无几。自隋唐以来，读书人多以科举作为入仕之正途。自忽必烈入主中原完成统一大业后，广大学子们便翘首以盼科举的到来。然而，借科考改变命运终成为他们的黄粱一梦。尽管时代的不公极大的影响了大批读书人求学做官，兼济天下人生理想的实现，但儒家积极入仕的思想驱动着他们，从求而不得的皓首穷经里转移到民间戏曲的创作之中。

2. 诗礼文化下沉加速元杂剧的流行

在元代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出现了许多独特的文化现象。例如白话文在官方的推广应用，诗礼文化下沉等等。这些现象加速了雅俗文化的交汇融合，元杂剧正是在雅文学下移与民间俗文学上移的过程中出现的产物。文化现象具有延续性，在其背景下发展壮大文化和崛起的文学形式都拥有着旺盛的“生命力”。

在元代这个异族统治的时期，蒙汉文化间的差异逐渐突显出来。直接体现在作为日常交流的重要工具——语言之上。元代朝廷用语多为蒙古语，大部分蒙古皇帝不通汉语，其匮乏的汉学知识难以支撑其阅读文言文，诗歌这类含义隐晦概括性极强的文本。但元朝统治者本身，依然有了解汉文化的意象与需求。于是，他们便转而学习汉族使用的另一种语言文字类型——白话文。元朝建立之初，许多儒家经典被直接翻译成白话文来进行普及，例如许衡所著的《孝经直解》。官方地推动促使汉语使用习惯自上而下发生了变化，“白话文一度取代言文成为帝王与庶民的交际公用语。”白话版儒家经典著作地出现，大大降低了百姓理解的难度，与此同时也提高了其在民间的普及程度。官方与民间使用语言的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诗礼文化下沉民间的速度。语言的变革令白话普及，同时也为以此为依托的俗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对于中原的传统文化艺术，蒙古人的文化修养确实不足以支撑他们去欣赏那些高雅的诗词歌赋。再者，他们的民族性格也的确难以让其对纯粹的书面艺术产生兴趣。所以，他们偏爱与本民族文化体系中有相似

点的中原戏剧。统治者的嗜好和传统话语模式的转变,极大地压缩了雅文学的发展空间。更何况,元代统治几乎阻断了汉族读书人科举晋升的途径,为求生计,为抒愤吐志,为寻找新的文学受众群体,他们只能投入到与百姓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平话,杂剧等通俗文学的创作之中。借助戏剧的普及性与广泛性,元杂剧的作家们将通俗化的教化思想以舞台演绎的方式进行传播。

随着蒙元统治汉化水平逐渐提高,儒家思想再次受到重视,元杂剧亦不可避免地承担起官方赋予的教化使命。元代统治者本欲提高杂剧的社会地位,却不想后期极具膨胀的教化属性几乎吞噬了元杂剧的文学审美性,最终导致元杂剧被源自中国南方历史悠久的南戏所取代。

五、结语

随着元代统治的落幕,诗礼文化于明代重获官方地位。历史的进程不可逆转,时代造就的文化现象亦然。尽管在明代,制度层面的礼乐已然回归中原传统,但出现于元代的诗礼文化下沉现象,其影响却一直延续到明清并且极大地改变了中原人民对于雅俗文学的态度。人们逐渐从儒家“崇雅贬俗”的文学偏见中挣脱出来,逐步接受了雅俗互易的新形式,最终形成了明清雅俗共赏的局面。

在诗礼下沉助推下逐渐走向成熟的戏剧之类俗文学,依然保持活力。体现在明清戏曲上就是,民间戏文之“俗”与教化戏曲之“雅”并存。“明代传奇之妙,在雅俗并陈”,“清代戏曲之妙,在花雅之分”。雅俗分庭抗力,两种不同的风格倾向构成了明清戏曲风格的两大主流。在诗礼下沉文化现象下蓬勃发展的俗文化,并没有因明清雅文化的复兴而遭到排挤。相反,经元代蓄势,俗文化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渗透进明清新兴的文学形式之中,世情小说就是最好的证明。

本文通过对中国诗礼文化发展进程地回顾,发觉其在元代呈现下沉趋势。与此同时,元代新兴的文学形式也引起了笔者的关注。经研究发现,杂剧在元代流行并非偶然。儒学地位的松动使得汉儒文化从独尊的地位上跌落下来,与此同时,外来文化的融入成功激活了中原大地上一直以来备受压制的文化因子。在多方合力的作用下,诗礼文化在元代完成了整个下沉的过程,元杂剧既可以看作是礼乐文化下沉的结果之一,亦可以视作这种下沉趋势的表现之一。综上所述,文化现象一旦形成,其影响的时间范围不受限制。在文化现象下获得发展并走向成熟的文化并不易被外来文化轻易置换,也不会因朝代更迭而自动终止。

参考文献:

- [1] 杜桂平.戏曲教化功能的失范——元杂剧衰微论之一[J].北方论丛, 1997 (1) .
- [2] 董旭彤.隋唐至明代礼乐观辨析[D].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学位论文, 2013.
- [3] 付王立.元代礼乐制度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5.
- [4] 国宇.元杂剧中的蒙古民族文化[D].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2.
- [5] 黄卉.元代戏曲史稿[M].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3.
- [6] 季国平.元杂剧发展史[M].台北: 台湾(地区)文津出版社, 1993.
- [7] 罗家坤.说元杂剧中的“搢旦”[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5 (8) .
- [8] 马晓林.元代国家祭祀研究[D].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2.
- [9] 莫尔吉胡.元代宫廷音乐初探[J].音乐艺术, 1990 (3) .
- [10] 宋濂, 王祎.元史[M].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 [11] 邵炳军.从《诗经》与礼乐制度的共生互动关系看诗礼文化的生成[J].江海学刊 2018 (4) .
- [12] 隋树森.元曲选外编[M].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13] 王红, 谢谦.中国诗歌艺术[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 [14] 王一.中国戏曲脸谱的符号性在公众教育中的作用[D].中央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2017.
- [15] 薛磊.元代宫廷史[M].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8.
- [16] 易凡慧子.浅析西周礼乐制度的变迁及礼乐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J].鄂州大学学报, 2012 (11) .
- [17] 张咏春.中国礼乐户研究[M].上海: 上海音乐出版社, 2019.
- [18] 张延昭.下沉与渗透: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元代教化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0.
- [19] 朱建明.元代的礼乐制度与戏曲[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1987 (2) .

A Study on the Sinking of Poetic and Ritual Culture and the Popularity of Yuan Dynasty Drama

Cao Xuanyu¹, Liang Jie¹

¹ Tianhua Colleg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Jiading 201615, Shanghai, China

Abstract: Music and poetry have accompanied human history as the most instinctive means of communication and expression. These spontaneous activities changed qualitatively when the Duke of Zhou made rites and music, which were then fully elaborated by Confucianism to form a cultural system that has profoundly influenced China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he essence of this system was to produce top-down moral norms and value leadership through subtle “cultural immersion”. With the formation of the Han dynasty's “exclusive respect for Confucianism”, the Ritual and Music System was established by the ruling class as part of the orthodox ideology of governance, with ritual and music being compatible with each other and wi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affairs, thus achieving the goal of maintaining social order and consolidating state rule. Since the Han Dynasty, the Ritual and Music System has continued throughout the dynasties and has become a very important cultural symbol of Chinese culture. The Yuan dynasty was the first regime in Chinese history to be established by an ethnic minority. Based on the influence of their own culture, the rulers of the Yuan dynasty made drastic changes to the rituals and music of the Middle Kingdom, resulting in the destru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Han Confucian system of poetry and rituals. However, among the people, the Poetic and Ritual Culture still had a deep influence because of the huge historical inertia. As a result, Yuan society was markedly stratified between top and bottom in terms of Poetic and Ritual Culture. At the same time, because of the absence of institutional moral norms and value leadership from the top down, the spontaneous ritual and music activities of the lower strata took on the edification function that should have been promoted by the upper strata, and this transfer can be seen in a sense as the “sinking” of Ritual and Music Culture. The Yuan Dynasty Drama that matured in the Yuan dynasty, because of the role they carried in the moral propaganda of the people and their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poetry, ritual and music, can be seen both as one of the results of the sinking of Ritual and Music Culture and as one of the manifestations of this sinking trend. It can be argued that the prosperity of Yuan Dynasty Drama and the great social and historical influence it exerted could 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sinking of Poetic and Ritual Culture caused by the particular context of the Yuan dynasty, and the combined influence of the poetic, ritual and musical traditions passed down from Chinese origins, which is what this essay focuses on. The sinking of Poetic and Ritual Culture was a cultural phenomenon, as was the popularity of Yuan Dynasty Drama, which were united in the specific context of the Yuan dynasty, interrelated and interacting with each other. Exploring the links between the two will help to develop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se two cultural phenomena and their logical derivation.

Keywords: Yuan Dynasty Drama, Poetic and Ritual Culture, Sink, Reasons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3.704

从符号到具身：新媒体技术在体育新闻传播中的创新、困境及影响

——以杭州亚运会为例¹

刘昊铭¹ 张靖²

(¹ 邢台学院, 河北 邢台 054001 ² 武汉体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随着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的飞速发展，体育传播领域正经历从符号传播到具身传播的深刻转型。具身传播强调身体在信息传播中的主动参与和体验，提升了信息的传播效率和深度。杭州亚运会通过新媒体技术如VR、AI等实现具身传播创新，数字火炬手和VR体验区等应用让全球观众深度参与和体验赛事，彰显了科技与体育的完美结合。新闻传播领域也在变革中发展，大数据精准把握受众需求，媒体融合提升传播效果，具身传播方式增强受众参与感和归属感。这些变革不仅丰富了传播手段，也提升了传播效果和社会影响力，为构建更加积极和谐的媒介生态环境提供了有力支持。

关键词：符号传播；具身传播；体育新闻；新媒体技术；杭州亚运会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移动技术和虚拟技术的迅猛发展使“数字化体育”与“智能化体育”等新兴概念逐渐步入公众视野，深刻影响着体育传播的面貌。这些新型体育形态不仅使人物及物体以更加直接的方式“融入”传播过程，还实现了其自身状态的实时嵌入体育传播的动态循环之中。这标志着传统体育媒介中符号传播所指向的“原初实体”开始跨越界限，进入体育传播的广阔领域，从而逐步缓解并有望逆转体育符号在传播过程中长期受制于“非在场性”而面临的困境。

这一模式深植于对符号的精心编码与细致解码过程，旨在实现意义的精准流通。它尤为注重“传达”这一环节在意义构建与传递中的关键作用，在预设意义已预先形成的基础上，焦点则转向如何通过符号的“传达”来实现这一既定意义的广泛扩散。在体育媒介的具体传播实践中，为促进体育相关信息的全面覆盖与高效流通，常将体育领域内的人物、事件及其相互间的动态关系经符号化加工提炼为抽象信息加以传播。特别是在跨越空间限制的远距离传播场景下，在传递过程中，符号不可避免地与其原始“实体”产生了某种程度的“脱域”，即展现出了特定的“非直接性”或“间接性”。

此种情境下，传播链条两端的参与者，无论是发送者还是接收者，在互动过程中更多地扮演着“信息接收者”的角色，媒介互动力度与深度因此受到了一定制约与影响。而当下，在新兴媒介技术的催化下，身体在体育传播中的核心地位愈发凸显，一条以“具身性”为特征的传播路径悄然兴起，为体育媒介传播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可能性。但当前体育学界的研究焦点仍大集中于以符号传播为核心的传播环境，这种倾向往往导致研究视角过度聚焦于信息内容的解析，而忽视了传播过程中身体所承载的丰富内涵与具体情境，无形中削弱了身体在体育传播中的应有价值。

作者简介：刘昊铭，男，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新闻传播学。

张靖，男，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公共事业（体育）管理。

二、符号传播及具身传播的概念和特点

（一）符号传播的基本概念和特点

1. 符号传播的基本概念

语言学家索绪尔于 1894 年提出了符号学的概念。索绪尔认为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的二元关系。能指 (signifier) 是符号的外形, 可能是某种声音、形象等, 它是具体的、形象的; 所指 (signified) 是符号背后指代的事物, 可能是某种概念或意义, 它是抽象的。[1] 符号传播是指通过符号这一中介物, 将信息、意义或情感从传播者传递给接收者的过程。符号作为信息的载体和外在形式, 承载着特定的意义或内容, 使得传播活动得以进行。在这个过程中, 符号不仅是信息的简单替代物, 更是意义生成和理解的关键要素。符号传播是人类社会中最基本、最普遍的信息传播方式之一。它不仅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交流和合作, 还推动了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通过符号传播, 人们能够共享知识、经验和情感, 增强彼此之间的理解和认同。同时, 符号传播也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手段之一, 它帮助人们构建对世界的认知框架和价值体系。

2 符号传播的特点

指代性: 符号的本质在于其指代性, 即符号能够代表或指称某一事物、概念或意义。这种指代关系并非自然存在, 而是人们在长期社会实践中约定俗成的结果。因此, 符号传播的有效性依赖于传播者与接收者之间对符号意义的共同理解。

灵活性: 符号的意义并非固定不变, 而是具有多义性和灵活性。同一符号在不同语境下可能代表不同的意义, 这种特性使得符号传播具有高度的适应性和创造性。新闻传播者常常利用符号的多义性来构建复杂的叙事框架, 以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并传达特定的信息。

可传性: 符号传播依赖于符号的物理形态, 如声音、文字、图像等, 这些物理形态使得符号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限制进行传递。同时, 符号的可传性确保了信息能够在不同的媒介和渠道中流通, 从而实现信息的广泛传播。

创新性: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技术的不断进步, 符号传播也在不断演变和创新。新的符号形式和传播方式不断涌现, 为新闻传播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挑战。新闻传播者需要不断学习和掌握新的符号传播技能, 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信息传播环境。

（二）具身传播的基本概念和特点

1. 具身传播的基本概念

具身传播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梅洛-庞蒂认为, 身体是在世界上存在的媒介物, 拥有一个身体, 对于一个生物来说, 就是介入确定的环境、参与某些计划和继续置身于其中。笔者认为具身传播指的是在社会化以及文化涵化的影响下, 人的身体进而成为兼备生产性和接收性的传播媒介。它不仅仅将身体视为信息的载体或符号, 更强调身体在信息传播中的主动参与和体验。在具身传播的过程中, 人类的身体因素作为首要特征, 人类展开的各项社会活动和实践内容需要身体的在场, 同时媒介的存在规范人类的身体行为, 人类通过不断配合和调整媒介来展开自身的活动。[2] 人类的身体在信息的编码、传递、解码以及意义的生成与理解过程中, 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 具身传播的特点

沉浸感: 新技术 (如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可穿戴设备等) 的应用, 使得受众能够在传播过程中获得强烈的具身体验和沉浸感。这种体验超越了传统的视听感知, 将身体的多感官体验融入传播之中。

互动性: 具身传播强调身体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在传播过程中, 身体不仅是信息的接收者, 也是环境的感知者和反应者。身体与环境的互动能够激发新的信息意义生成, 使传播活动更加动态和复杂。

社会性: 身体作为社会和文化的载体, 在具身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 身体的语言和行为方式存在差异, 这些差异影响着信息的传播效果和受众的理解。

多元融合: 随着新技术的发展, 身体与技术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具身传播强调身体与技术的融合, 认为技术不仅延伸了身体的功能, 还改变了身体的感知方式和体验方式。例如, 在虚拟现实技术中, 用户可以通过身体动作与虚拟环境进行互动, 获得身临其境的体验。

三、杭州亚运会依托新媒体技术实现符号传播到具身传播的创新实践

（一）数字火炬手，更广泛的共同参与

在亚运会开幕式上，超过1亿名亚运数字火炬手汇聚而成的“亚运数字火炬人”踏浪而来，与真实的主火炬手一起点燃了名为“潮涌”的主火炬塔。这一创新性的数字点火仪式，不仅展现了科技与体育的完美结合，还通过新媒体技术实现了全球观众的共同参与。观众可以在线上参与火炬传递活动，传递和共享亚运精神。卓越非凡的视觉盛宴，技术支持团队的创造力与不懈探索功不可没。为确保“数字火炬手”这一创新概念的顺利实现与流畅体验，杭州亚组委携手官方战略合作伙伴支付宝，深度整合了自主研发的3D沉浸式交互引擎、尖端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以及小程序云端服务等前沿科技，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的技术试验与革新。项目核心团队巧妙融合人工智能算法、空间感知计算、以及高精度的三维图像渲染技术，同时，依托国内自主研发的Galacean Web3D图形交互引擎，历经近四个月的反复打磨与优化升级，实现了AR互动体验质的飞跃，达到了媲美电影级别的精致与逼真。

开幕式盛况空前，当夜幕低垂，巨幅立体网幕横跨会场，象征着亿万“数字火炬手”的金色虚拟形象手持虚拟火炬，以流畅而庄重的姿态穿梭其间，与现场真实的火炬手交相辉映，共同点燃了“潮涌”主题主火炬塔。这一瞬间，不仅是对体育精神的崇高致敬，更是将亚运会的圣火之光，传递给了全球数亿颗热爱体育、心系亚运的平凡之心。这份荣耀不仅局限于单一个体的辉煌，更凝聚成了亿万民众共同的记忆与骄傲。金色数字人手持火炬，在立体网幕上缓缓跑过的那一刻，已不仅是符号的堆砌，具身传播的典范已然达成。观众仿佛能够感受到火炬传递的温度，与数字火炬手一同跨越虚拟与现实的界限，共同见证“潮涌”主火炬塔的点燃。这一过程，是从符号传播到具身传播的深刻转型。技术团队不仅创造了令人惊叹的视觉效果，更重要的是通过技术创新让符号背后的意义与情感得以跨越媒介的界限，直接触达观众的心灵。

（二）应用VR技术，更直观的情景交融

杭州亚运会期间，VR技术被广泛应用于体育新闻报道中。通过佩戴VR设备，受众可以身临其境地观看比赛，仿佛置身于比赛现场。VR技术不仅提供了360度全景视角，还通过声音和触觉模拟，增强了受众的沉浸感。例如，观众可以通过VR观看游泳比赛，感受到水花飞溅的触感，或者通过VR观看田径比赛，体验到风驰电掣的速度感。这种具身化的传播方式，使受众不再仅仅是信息的接收者，而是成为了信息的一部分，实现了从符号传播到具身传播的跨越。

在步入2023年杭州亚运会的盛景之中，虚拟现实（VR）技术无疑成为了璀璨夺目的亮点。赛事主办方匠心独运，深度融合这一尖端科技，精心编织了一系列全感官沉浸的场景，为观众铺设了一条通往前所未有的互动之旅的康庄大道。特别是在智能亚运一站式服务平台上，全景亚运VR模块横空出世，打开了一扇通往奇幻世界的窗口，用户指尖轻点，即刻跨越现实与虚拟的界限，沉浸于各场馆独有的风情与魅力之中，体验前所未有的数字盛宴。富阳水上运动中心的VR皮划艇体验区迅速崛起为观众竞相探访的热门地标。借助VR技术的精妙模拟，赛道的蜿蜒曲折与水流的湍急变化被细腻捕捉并精准再现，使参与者即便身处场外，亦能体验到皮划艇竞技中那份惊心动魄的激情与挑战，沉浸式参与到这项水上运动的无限魅力之中。

此外，在浙江移动展厅精心打造的VR体验区域内，观众更是得以跨越时空的界限，“瞬移”至风景如画的西湖之滨。不仅能领略到西湖的旖旎风光，更能通过元宇宙的划艇竞技，感受一场前所未有的、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现实与幻想的奇妙探险。这一创新举措无疑为杭州亚运会增添了一抹独特的科技色彩，也深刻诠释了从符号传播向具身传播转变的深刻内涵与广阔前景。

（三）数字化场景，更有力的科技支撑。

在萧山体育中心，一个精心策划的“智能亚运体验维度”横空出世，旨在为观众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亚运互动之旅。这一创新空间，不仅是对传统观赛模式的颠覆，更是从符号传播迈向具身传播实践的重要里程碑。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多维交互智能观赛平台”，它赋予了观众前所未有的“赛事导演”身份，在VR的浩瀚宇宙中自由穿梭。观众能够随心所欲地选择视角，不仅能深入洞悉运动员每一个精妙动作的细节，还能根据个人喜好“沉浸式”切换直播信号，将观众从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转变为赛事的“沉浸式导播”，从任意角度、任意时刻捕捉运动员的精彩瞬间，实现了信息接收向深度参与、主动探索的具身化转变。

与此同时，3D全息拍照直播舱的设立，更是为杭州亚运会增添了一抹科幻色彩。这一创新技术不仅为观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杭州亚运3D印象，更通过实时全息体验，让受众仿佛置身于赛事现场，与运动员同

呼吸、共拼搏。这种身临其境的体验不仅加深了受众对赛事的情感连接，也让他们成为了赛事传播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真正实现了从符号认知到身体感知、从旁观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

四、新媒体技术实现从符号传播到具身传播的路径

（一）技术创新推动传播方式变革

以数据和智能化技术为基石、以人机协作为特征、以提升内容生产传播效率为目标的智媒形态，正成为新闻媒体的思维方式和发展方向。[3]新媒体技术的持续创新正在成为驱动传播方式深刻变革的核心引擎。在信息技术的浪潮中，VR（虚拟现实）、AI（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的不断成熟与广泛应用，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着新闻传播的格局，推动其向更加多元化、智能化的方向迈进。VR技术的崛起，为新闻传播领域带来了一场革命性的变革。通过模拟出逼真的三维环境，VR使受众能够“身临其境”地参与到新闻事件之中，穿越时空的界限，成为事件的亲历者。在杭州亚运会等大型体育赛事中，VR技术被广泛应用于赛事直播与互动体验中，观众不仅能够从任意角度观看比赛，还能通过VR设备感受到运动员的竞技状态与现场氛围。这种沉浸式的观赛体验极大地增强了新闻传播的感染力和互动性，实现了从符号化信息接收向具身化感知的跨越。AI还能根据受众的兴趣偏好和阅读习惯，实现新闻内容的个性化推荐与分发，使新闻传播更加精准有效。此外，AI在新闻审核、舆情监测等方面的应用，为新闻传播的质量和公信力起到一定的作用。这些智能化功能的实现，不仅减轻了新闻工作者的工作负担，还使新闻传播更加贴近受众需求，促进了新闻传播模式的创新与发展。

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则为新闻传播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数据支持和决策依据。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挖掘与分析，新闻机构能够深入了解受众的兴趣偏好、行为习惯和消费趋势等信息，更准确地、更有针对性地优化新闻内容生产与传播策略。以杭州亚运会新闻报道为例，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不仅帮助新闻机构快速捕捉热点话题和舆论动态，还通过数据分析预测受众需求变化，为新闻传播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这种基于数据的精准传播策略，不仅提高了新闻传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还促进了新闻传播与受众之间的深度互动与反馈。

（二）受众需求驱动传播内容创新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受众对新闻信息的需求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时政、经济、社会新闻，而是向科技、文化、教育、健康、娱乐等多个领域扩展，且每个领域内的需求也在进一步细分。这种多元化需求的细化，要求新闻生产者具备更广泛的知识面和敏锐的洞察力，以捕捉并呈现多样化的新闻内容。在受众需求导向下，新闻传播逐渐从传统的符号传播向具身传播转变。具身传播强调信息的传播不仅仅是文字、图像等符号的传递，更是通过感官体验、情感共鸣等方式，使受众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新闻事件。例如，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的应用让受众能够“走进”新闻现场，获得更加真实、直观的信息体验。在未来体育媒介传播中以身体为介主要表现为：借助可穿戴设备、传感技术、脑机接口技术等使身体进入到创设的体育情境中，体育参与者身体能够直接与情境中的人、物等进行互动。互动过程中身体的一举一动都将改变传播结果。身体承载的传播内容、经验等将通过数据的形式外化，以便进行分析与传播。[4]这种传播方式的变革，不仅丰富了新闻的表现形式，也提高了新闻的传播效果和社会影响力。不仅丰富了传播手段与形式，也进一步提升了信息的传播效果与媒体的社会影响力。它使新闻传播更加贴近受众的实际需求与心理期待，增强了受众的参与感与归属感。具身传播更为深远的意义则是促进着新闻传播与受众之间的深度互动与情感共鸣，为构建更加和谐、积极的媒介生态环境提供了有力支持。

（三）媒体融合促进传播效果提升

媒体融合是现代新闻传播的重要趋势之一，它使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得以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在杭州亚运会的传播和报道中，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互协作、共同发力，形成了强大的传播合力。传统媒体通过深度报道和权威解读，为受众提供全面、深入的赛事信息；新媒体则通过实时互动和短视频传播等方式，增强受众的参与感和互动性。这种媒体融合的传播方式不仅提高了新闻报道的传播效果和社会影响力，还使受众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比赛和运动员的风采。

五、结论

新媒体技术不仅促进了体育新闻传播从传统的符号传播向具身传播的转变，还通过实时性、互动性和沉浸性等特点，极大地丰富了体育新闻的传播形态和受众体验。杭州亚运会作为一项体育盛事，为新媒体

技术的应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借助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先进技术，观众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比赛的激烈与精彩，实现了从“旁观者”到“参与者”的角色转变。这种具身化的传播方式不仅增强了体育新闻的传播效果，还提升了受众的参与感和沉浸感，为体育新闻传播注入了新的活力。

新媒体技术在体育新闻传播中也面临诸多困境和挑战。一方面，技术的快速发展对新闻传播者的专业素养和技术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另一方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保持新闻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及时甄别并制止虚假信息的传播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此外，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同时也带来了隐私泄露、信息安全等风险，需要相关部门加强监管和防范。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的不断深化，我们有理由相信，新媒体技术将在体育新闻传播领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推动体育新闻传播向更加多元化、个性化和具身化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 [1] 李海均. 符号学理论视角下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对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研究[D]. 武汉体育学院:2024.DOI:10.27384/d.cnki.gwhtc.2024.000133.
- [2] 张涵. 具身传播视角下 VR 新闻发展策略研究[D]. 烟台大学:2024.DOI:10.27437/d.cnki.gytd.2024.000486.
- [3] 马晨阳, 刘昊铭, 杨国兴. 人工智能应用对新闻生产的挑战和应对策略研究[J]. 传媒论坛, 2024, 7(06): 24-29.
- [4] 于晓梅, 张业安. 体育媒介传播的转向与未来：从符号传播回归具身传播[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23, 57(08): 13-18+32. DOI:10.15930/j.cnki.wtxb.2023.08.001.

From Symbols to Embodiment: Innovations, Challenges, and Impacts of New Media Technology in Sports Journalism—A Case Study of the Hangzhou Asian Games

Liu Haoming¹ Zhang Jing²

¹XingTai University ²Wuhan Sports University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digitalization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the field of sports communication is undergoing a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from symbolic communication to embodied communication. Embodied communication emphasizes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and experience of the body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thereby enhancing both the efficiency and depth of communication. The Hangzhou Asian Games leveraged innovative new media technologies such as VR and AI to achieve embodied communication, with applications like digital torchbearers and VR experience zones enabling global audiences to deeply engage with and immerse themselves in the event. The field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s also evolving, with big data enabling precise audience targeting, media convergence enhancing dissemination effectiveness, and embodied communication fostering a greater sense of participation and belonging among audiences. These transformations not only diversify communication methods but also improve their effectiveness and social impact, providing strong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more positive and harmonious media ecosystem.

Keywords: symbolic communication; embodied communication; sports journalism; new media technologies; Hangzhou Asian Games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3.724

自然教育导向下的互动式手册设计研究 ——以深圳莲花山公园“菲羽集章”项目为例

冯志超¹

(¹ 深圳大学, 广东 深圳 518060)

摘要: 本设计基于菲羽文创衍生之下, 为面向深圳市青少年儿童和亲子家庭而设计的具有一定科普性的深圳公园观鸟集章与绘本互动册子。其目的在于通过设计手段, 促进深圳市青少年儿童及其亲子家庭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关注, 提升观鸟活动的趣味性和科普性, 培养市民爱护自然、保护环境意识。设计内容包括线下公园观鸟集章打卡路线、家庭互动的故事叙事场景绘本设计、拼插式小鸟玩具设计等三个部分。通过实地考察、用户调研等方法, 确定了设计的定位、目标用户及功能需求, 并运用设计思维和创新方法, 完成了设计实践。本设计不仅具有实用性、趣味性、科普性, 还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 可为深圳市公园文化建设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 菲羽文创; 观鸟集章; 亲子互动; 自然教育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深圳, 这座充满活力的现代化都市, 不仅拥有林立的高楼与繁华的街市, 还蕴藏着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其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气候、多样的地形地貌以及丰富的植被类型, 为众多鸟类提供了理想的栖息、觅食与繁殖之所。近年来, 随着市民生态环保意识的逐步提升, 观鸟作为一项兼具趣味性与科普性的户外活动, 在深圳掀起热潮。莲花山公园, 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广袤的绿化区域以及丰富的鸟类资源, 成为了市民们青睐的热门观鸟地点之一。然而, 公园在观鸟活动的系统性引导与科普推广方面存在欠缺, 未能充分满足市民尤其是青少年儿童和亲子家庭对深入了解鸟类知识的渴望。在此背景下, “菲羽集章册”应运而生, 旨在填补这一科普空白, 为公园观鸟活动注入新的活力。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设计聚焦于为青少年儿童及亲子家庭打造一个别具一格的观鸟体验平台。一方面, 通过集章册中的科普知识、趣味绘本以及互动玩具, 向孩子们传递鸟类的生态奥秘, 激发他们对自然的热爱与探索欲望; 另一方面, 精心设计的亲子互动环节, 鼓励家庭成员共同参与, 在观鸟过程中增进亲子间的情感交流, 提升家庭凝聚力。从更宏观的层面看, “菲羽集章册”的推广有助于丰富莲花山公园的文化内涵, 将自然生态与

作者简介: 冯志超 (2001—), 男, 山西晋中人, 硕士, 深圳大学海洋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人文艺术紧密融合，为城市生态文化的传播树立典范，进而带动更多市民关注身边的自然环境，投身生态保护行动。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许多发达国家早已将自然教育融入到日常生活与基础教育体系之中。例如，美国的一些国家公园与当地教育机构合作，开发了一系列针对不同年龄段的自然探索课程及配套教材，通过实地考察、标本制作、故事讲述等多元化方式，引导孩子们认识自然生态。欧洲部分国家则以社区为单位，组织定期的户外自然观察活动，并配套详细的观察指南与科普手册，培养居民尤其是青少年的生态意识。在国内，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公园观鸟活动日益普及，各地公园纷纷举办观鸟节、鸟类科普展览等活动。同时，文创产业蓬勃发展，不少公园尝试将地域文化、生态元素与文创产品相结合，开发出具有特色的纪念品、书籍等。然而，与国外成熟的自然教育模式相比，国内在公园观鸟的系统性教育引导以及文创产品的深度开发与互动性设计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菲羽集章册”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结合深圳本地特色，致力于探索一条创新的公园自然教育与文创融合之路。



图 1 深圳观鸟资源调查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本研究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实地调研法深入莲花山公园的各个角落，详细记录鸟类的栖息点位、活动规律以及现有观鸟设施情况，为后续设计提供一手资料；问卷调研法通过问卷调查形式，精准把握青少年儿童与亲子家庭的需求偏好、学习习惯以及对观鸟活动的期待，确保设计贴合用户心理。

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跨学科融合，将设计学、生态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知识有机结合，集科普、艺术、教育、娱乐于一体，使集章册不仅是一本读物，更是一个综合性的学习工具。其二，强化互动性，打破传统文创产品的单向信息传递模式，通过集章打卡、亲子绘本创作、拼插玩具组装等多元互动环节，让用户深度参与其中，提升体验感与学习效果。其三，品牌联动创新，紧密联合深圳市莲花山公园与菲羽创意文化有限公司，整合双方资源，实现公园自然景观、生态数据与文创品牌的创意碰撞，拓展品牌影响力的同时，为公园文化建设开辟新径。

2. 深圳市莲花山公园观鸟资源概述

2.1 公园生态环境

莲花山公园地处深圳市中心区的北端，占地面积达 194 公顷。其地形起伏有致，既有平缓的草地与山坡，又有错落的湖泊与溪流，为鸟类营造了丰富多样的栖息环境。园内植被种类繁多，涵盖了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灌木丛、湿地植物群落等多种类型。高大的乔木如榕树、樟树等为鸟类提供了筑巢栖息的理想场所，而茂密的灌木丛与草丛则是众多小型鸟类觅食与躲避天敌的藏身之处。此外，公园内的人工湖泊水域面积广阔，水质清澈，水生生物丰富，吸引了大量涉禽与水鸟前来觅食、嬉戏，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城市生态画卷。



图2 莲花山公园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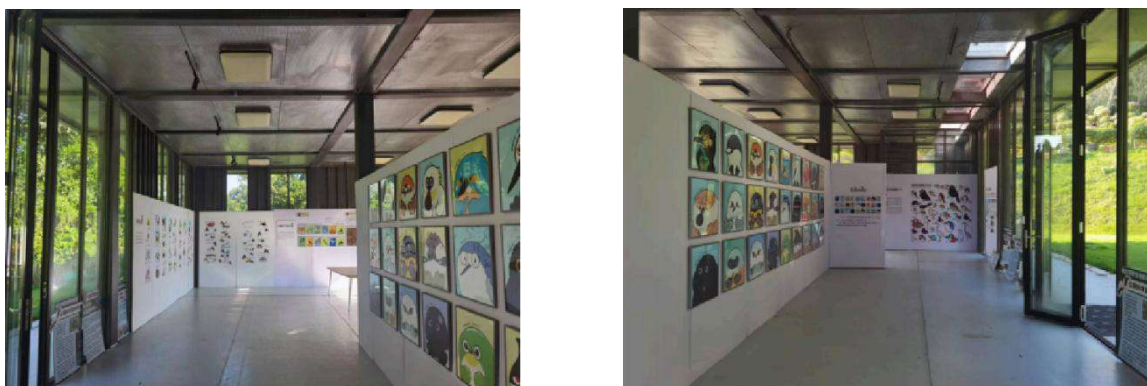


图3 莲花山公园展厅调研

2.2 鸟类多样性

据长期观测数据显示, 莲花山公园内记录在册的鸟类超过百种, 其中包括不少候鸟。每年春秋两季, 大量候鸟途经此地停歇、觅食, 为公园增添了别样的灵动之美。常见的鸟类有麻雀、白头鹎、红耳鹎、暗绿绣眼鸟等, 它们常年活跃在公园的树林与草地间, 以果实、昆虫等为食, 与市民近距离接触, 成为公园生态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此外, 公园还栖息着一些珍稀保护鸟类, 如普通鵟、蛇雕等猛禽, 以及黑脸琵鹭等全球性濒危物种, 它们的出现不仅彰显了公园卓越的生态品质, 也为观鸟爱好者提供了难得的观赏机遇。

3. 菲羽集章册设计理念与目标用户

3.1 设计理念

“菲羽集章册”秉持自然美学、教育科普、互动体验三大核心设计理念。从自然美学角度出发, 将莲花山公园的自然风光、鸟类灵动之美融入到集章册的每一页插画、每一个图形符号之中, 以艺术化的手法呈现自然生态, 让使用者在翻阅过程中感受自然的诗意与美感。教育科普理念贯穿始终, 依据青少年儿童的认知水平与学习规律, 精心编撰鸟类知识, 涵盖鸟类的形态特征、生活习性、迁徙规律等多个维度, 以通俗易懂的文字与生动形象的配图引导孩子们探索鸟类世界的奥秘。互动体验则是集章册的一大亮点, 通过设计线下观鸟集章打卡路线, 将公园变成一个开放式的自然课堂; 亲子共读绘本与互动创作环节, 鼓励家庭成员在温馨的氛围中交流分享; 拼插式小鸟玩具的设计, 让孩子们亲手“还原”公园里的小鸟, 锻炼动手能力, 全方位提升用户的参与感与沉浸感。



图 4 SWOT 分析

3.2 目标用户群体分析

青少年儿童正处于对世界充满好奇、求知欲旺盛的成长阶段，他们对大自然中的新事物，尤其是形态各异、色彩斑斓的鸟类充满了探索的热情。然而，其认知能力有限，需要以趣味化、形象化的方式引导学习。亲子家庭则注重家庭成员间的陪伴与共同成长，渴望在繁忙的大都市生活中寻找到既能增进亲子关系，又具有教育意义的活动。“菲羽集章册”精准定位这一群体，旨在满足孩子们的好奇心，同时为亲子家庭提供一个高质量的户外互动平台，使家庭成员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共享欢乐时光，促进孩子的全面发展。



图 5 用户画像



图 6 用户旅程图

4. 菲羽集章册的内容设计

4.1 观鸟集章打卡路线设计

4.1.1 路线规划原则

在规划观鸟集章打卡路线时,充分遵循科学性、趣味性与安全性原则。以公园内鸟类的分布热点区域、不同生态功能区以及观赏便利性为考量依据,精心串联起多个特色观鸟点。路线设计兼顾多样性,既有穿越树林的幽静小径,让使用者近距离聆听鸟儿的鸣唱,观察枝头鸟儿的灵动身姿;又有沿着湖边的宽阔步道,便于观赏涉禽在水中觅食、嬉戏的场景。同时,确保路线标识清晰,全程无安全隐患,为亲子家庭与青少年儿童打造一个安心、舒适的观鸟之旅。



图7 观鸟打卡路线

4.1.2 打卡点设置与特色

每个打卡点依据周边栖息鸟类的特性进行个性化设计。在树林密集区的打卡点,配备高倍望远镜,方便使用者观察树冠层栖息的鸟类,并设置科普展板,详细介绍该区域常见鸟类的种类、习性、筑巢特点等知识。靠近湖边的打卡点,则突出展示涉禽的情况,现场摆放鸟类脚印模型、羽毛标本等实物展示,让使用者直观感受鸟类的生态特征。此外,打卡点还融入了艺术设计元素,如以鸟类为主题的雕塑、彩绘井盖等,增添文化氛围,使打卡过程成为一场艺术与自然交织的体验。

4.1.3 集章玩法与激励机制

为激发使用者的探索热情,设计了一套富有创意的集章玩法。定制了一系列精美的印章,每枚印章以不同的鸟类形象或公园标志性景观为图案,极具收藏价值。使用者在完成每个打卡点的指定任务,如正确识别鸟类、回答科普问题后,即可获得印章。集满一定数量的印章可在公园游客服务中心兑换限量版的鸟类主题礼品,如拼图、徽章、笔记本等,或者获得由公园与菲羽文创联合颁发的“观鸟小达人”荣誉证书,以激励更多家庭与孩子积极投身观鸟活动,深入探索公园的生态奥秘。



图8 集章册1



图9 集章册2

4.2 故事叙事场景绘本设计

4.2.1 绘本主题与故事线

绘本以“菲与羽”为主题，“菲”是我们虚构一个故事主人公小菲，绘本将会以这个小女孩主角的视角切入，“羽”则代指鸟儿，主题将会分为四个大章节，分别从小菲与小鸟的初遇、一起认识小朋友们、和小鸟的约会以及我们一起话自然四部分来展开讲述一个女孩与鸟相遇，而爱上观鸟并志向保护鸟儿的故事。这是一个人类和鸟之间发生的有趣故事，通过第一人称视角让观众一起走进小鸟的世界，观观可爱的“小朋友”们，听听小鸟的心情，和他们来一场约会吧~我们希望观众了解——今日宜逛公园观鸟！

在故事叙述过程中，巧妙融入鸟类的生态知识，如不同季节食物的变化导致鸟类觅食行为的改变，恶劣天气下鸟类的应对策略等，让孩子们在沉浸于故事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学习到丰富的科普知识。

4.2.2 画面风格与表现手法

绘本采用手绘水彩风格，以细腻、柔和的笔触描绘莲花山以及深圳市主要观鸟公园的自然风光与鸟类形象，营造出温馨、逼真的视觉效果。水彩的晕染特性能自然地表现出天空的湛蓝、湖水的波光粼粼以及草地的绿意葱茏，让孩子们仿佛身临其境。在鸟类形象塑造上，注重细节刻画，运用特写镜头展现小鸟的羽毛纹理、眼睛神态，以全景呈现公园的壮丽景色与鸟类集群活动的宏大场面，通过对比画面展示候鸟迁徙前后的环境变化。画面布局巧妙，根据故事情节的节奏，疏密有致地安排图文。同时，在画面中巧妙隐藏一些科普小图标，如昆虫标识、植物名称等，引导孩子自主发现探索，兼顾艺术美感与教育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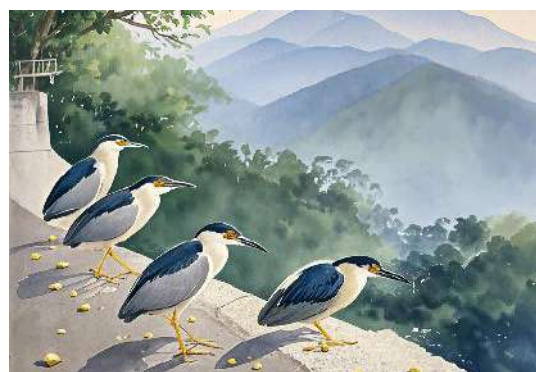


图10 红树林（左）莲花山（右）



图 11 坪地湿地公园（左）深圳湾（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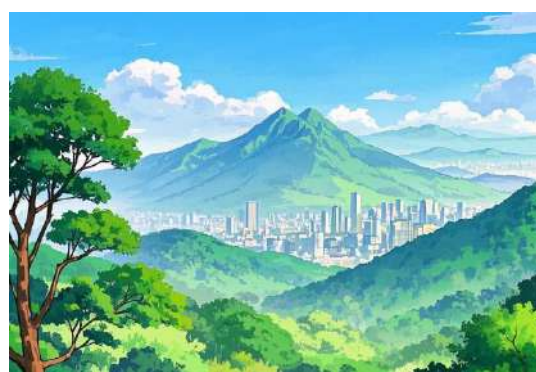


图 12 深圳中心公园（左）梧桐山（右）



图 13 仙湖植物园（左）香蜜公园（右）

4.2.3 亲子互动环节设置

绘本内穿插了多个亲子互动环节。设置问答板块，针对绘本中的知识点提出问题，鼓励家长与孩子共同讨论解答，加深对知识的理解；设计模仿游戏，让孩子模仿小鸟的飞行、觅食动作，增强趣味性与身体协调性，如模仿棕背伯劳的昂首挺胸行走姿态、叉尾太阳鸟吸食花蜜的动作，以及模仿各种鸟儿的鸣叫，让孩子在身体力行中感受鸟类的形态与习性特点，家长可以一起参与模仿，增添欢乐氛围；还预留了续写故事的空白页，激发孩子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家长与孩子共同创作，为亲子时光增添更多温馨回忆。

4.3 拼插式小鸟玩具设计

4.3.1 玩具设计灵感来源

拼插式小鸟玩具的设计灵感直接源自莲花山公园内的常见鸟类。团队深入公园进行长时间的观察，记录不同鸟类的形态特征、羽毛色泽、飞行姿态等细节，力求在玩具设计上精准还原鸟类的真实模样。玩具的造型在保留这些特征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艺术夸张，如放大眼睛比例，让小鸟看起来更加灵动可爱，吸引青少年儿童的目光。同时，参考鸟类学书籍与专业资料，确保玩具在解剖结构上的准确性，使青少年儿童在拼插过程中能够直观了解鸟类的身体构造，将趣味性与教育性完美融合。在设计中深入观察鸟类的形态结构、羽色分布，选取具有代表性的鸟类品种，如暗绿绣眼鸟、红耳鹎、白头鹎等，进行精准的三维建模，确保玩具造型高度还原真实鸟类，让孩子们一眼就能认出公园里的“小伙伴”。

4.3.2 结构设计与制作工艺

在结构设计方面，拼插式小鸟玩具充分考虑青少年儿童的动手能力与操作安全性。选用环保厚纸板作为主体材料，这种材料不仅易于加工成型，而且质地轻盈，方便孩子们拿捏操作。利用激光切割技术，将纸板切割成各个精准的零部件，如鸟身、翅膀、尾巴、爪子等，切割边缘光滑平整，避免划伤儿童手部。在零部件连接处，设计独特的卡槽结构，通过简单的插入方式即可完成组装，无需胶水等辅助工具，降低操作难度。为了增加玩具的稳定性，在鸟身底部设计宽大的底座，确保站立稳固。

制作工艺上，采用安全无毒的水性油墨进行印刷，确保色彩鲜艳持久的同时，符合国家安全标准，即使儿童接触也不会对健康造成危害。对于鸟类羽毛的纹理表现，运用压纹工艺，模拟真实羽毛的触感与质感，让孩子们在触摸过程中感受自然的细腻。在包装设计上，采用简约的纸盒包装，印有清晰的组装步骤图示与鸟类知识简介，既方便收纳携带，又能在不使用玩具时作为知识卡片供孩子学习，一举两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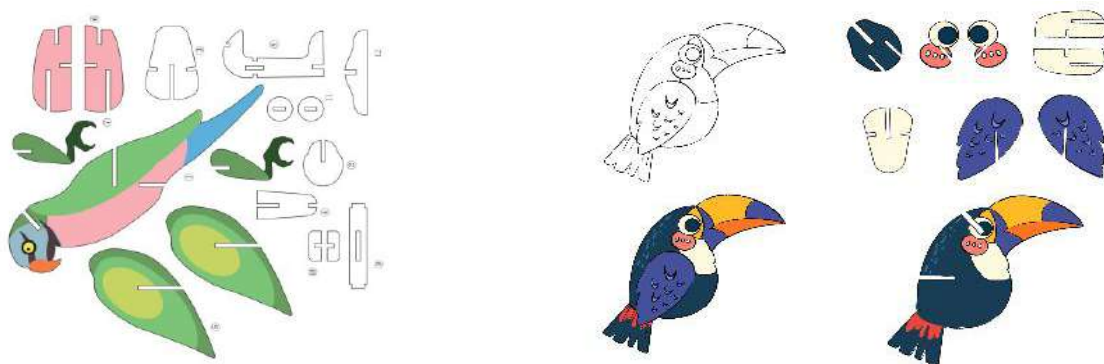


图 14 拼插式小鸟玩具

4.3.3 集章册和绘本的联动玩法

拼插式小鸟玩具与集章册、绘本紧密联动，进一步丰富游玩体验。与绘本联动时，依据绘本故事场景，孩子们可以选择相应的小鸟玩具进行拼插，如读到绘本中小菲与小鸟一起探索树洞的情节，孩子们便可拼插出小鸟玩具，将其放置在绘本对应的画面上，重现故事场景，增强故事的代入感。玩具还可作为绘本故事的拓展道具，鼓励孩子发挥想象力，创造新的故事篇章，例如让不同的小鸟玩具在“公园”场景中相遇，演绎全新冒险，锻炼孩子的叙事能力。

与集章册联动玩法多样，集章册中设置特定的鸟类知识问答或观鸟任务，完成后可解锁对应小鸟玩具的特殊组件，如彩色羽毛贴纸、立体鸟喙配件等，让孩子们拼插出独一无二的小鸟，提升成就感。当集齐一定数量的印章，可兑换整套小鸟玩具套装，激励孩子们积极参与公园观鸟活动，沿着打卡路线探索，完

成集章任务，使整个观鸟过程形成一个有机的学习与娱乐闭环，全方位激发青少年儿童对莲花山公园鸟类的兴趣与探索热情。

5. 菲羽集章册的视觉设计

5.1 色彩搭配

色彩搭配是菲羽集章册视觉设计的关键要素之一，旨在营造与莲花山公园自然生态相契合的视觉氛围，吸引目标用户群体，同时强化知识传递与互动体验。

整体主色调选取自然绿，灵感源自公园内郁郁葱葱的植被，如山林中繁茂的榕树、樟树，以及草地的翠绿之色。这种自然绿象征着生机与活力，能让使用者瞬间联想到公园的自然环境，为集章册奠定清新、宁静的基调。在不同板块，自然绿又呈现出深浅变化，如观鸟集章打卡路线部分，采用较深的墨绿色，寓意山林的幽深神秘，引导使用者开启探索之旅；故事叙事场景绘本部分，运用清新的淡绿色作为背景底色，营造柔和、温馨的阅读氛围，恰似春日公园草地的嫩绿，与绘本中鸟类成长故事相得益彰。辅助色彩则从公园鸟类羽色、四季景观以及天空、水体颜色中提取。选取鸟类羽毛的鲜艳色彩，如红、黄、蓝、橙等，用于突出重点元素，如印章图案、绘本插画中的鸟类主体、玩具装饰等。这种色彩搭配既贴合公园的自然生态氛围，又能吸引青少年儿童的目光，激发他们的兴趣与好奇心，使集章册在视觉上富有层次与吸引力。通过多元且和谐的色彩搭配，菲羽集章册在视觉上成为深圳市公园自然生态的缩影，让使用者未入公园，先感自然之美，激发其深入探索的欲望。

5.2 图形符号运用

从鸟类的形态特征、生活痕迹中，提取丰富的图形符号，如鸟类的轮廓剪影、羽毛纹理、脚印形状等，经过艺术化处理后广泛应用于集章册的各个部分。在集章册封面，以简约的鸟类轮廓线条勾勒出主题图案；打卡路线图上，用脚印符号标识行走路径；绘本中，羽毛纹理作为装饰元素点缀页面边缘。这些图形符号不仅增强了集章册的识别性与专业性，更在细微处传递着自然生态的信息，让使用者随时随地感受鸟类文化的魅力。通过巧妙运用这些图形符号，菲羽集章册构建起独特视觉语言体系，全方位助力使用者开启莲花山公园观鸟知识与趣味探索之旅。



图 15 集章册 3

5.3 字体设计

字体设计在菲羽集章册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需兼顾可读性、趣味性与风格适配性，以满足不同内容板块的需求，提升整体视觉感受与信息传达效果。

正文部分选用圆润、简洁的无衬线字体，如思源黑体或苹方字体，这类字体笔画粗细均匀，结构清晰，在保证青少年儿童及亲子家庭阅读流畅性的同时，展现出现代、简洁的风格，与集章册整体清新自然的基调相呼应。字号设置根据内容重要性与层级进行区分，标题与副标题采用较大字号，突出重点，引导阅读

顺序；正文则使用适中字号，确保长时间阅读不易疲劳，行间距与字间距合理调整，避免文字过于拥挤，营造舒适的阅读体验。

在部分标题、提示语以及互动环节文字设计上，引入手写体元素，增添人文气息与趣味性。手写体模仿儿童或卡通风格的笔触，线条灵动活泼，如在故事叙事场景绘本的章节标题处，运用富有童趣的手写体，仿佛是故事主角“小菲”亲手书写，拉近与读者距离，增强故事代入感；观鸟集章打卡路线的引导提示语采用手写体，像是一位贴心的导游在耳边轻声指引，使参与者更易融入探索氛围。针对鸟类名称、科学术语等专业词汇，采用加粗或变色处理，确保醒目易识别，既能突出关键信息，又能在视觉上形成区分，便于读者快速抓取知识要点，使集章册在知识传递与视觉享受间达到完美平衡。



图 16 集章册 4

6. 菲羽集章册的品牌联动与推广

6.1 与深圳市莲花山公园的合作

6.1.1 资源整合与共享

莲花山公园为集章册提供了丰富的实地资源，包括鸟类观测数据、专业的生态讲解团队以及公园内的场地设施支持。公园工作人员协助维护打卡路线的标识与打卡点的科普展板，确保信息的准确性与及时性。同时，集章册作为公园的特色文创产品，将公园的生态文化、观鸟资源以全新的形式向外传播，吸引更多市民走进公园，实现了双方资源的优势互补与共享。

6.1.2 活动联合举办

双方联合举办各类观鸟主题活动，如在每年的春季候鸟迁徙高峰期，举办“莲花山观鸟节”，将集章册的推广融入其中。活动现场设置集章册首发仪式、鸟类科普讲座、亲子观鸟竞赛等环节，借助节日氛围与活动的集聚效应，扩大集章册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吸引更多家庭参与到公园观鸟与集章活动中来。

6.2 与菲羽创意文化有限公司的品牌延伸

6.2.1 品牌形象一致性

菲羽创意文化有限公司一直致力于打造自然、艺术、教育相融合的文创品牌形象。“菲羽集章册”在设计过程中严格遵循公司的品牌理念，从视觉风格的自然清新，到内容设计的教育科普属性，都与公司品牌定位高度契合。通过集章册这一载体，进一步强化了菲羽文创在自然主题领域的品牌印记，为后续拓展相关文创产品线奠定了坚实基础。

6.2.3 线上线下推广策略

线上,利用新媒体平台的传播优势,开设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抖音账号等,定期发布集章册的设计亮点、使用攻略、用户故事等内容,吸引粉丝关注;同时,在电商平台上线集章册产品,方便用户购买。线下,在莲花山公园游客服务中心、周边学校、社区文化中心等地设置展示点与销售点,举办产品体验活动,邀请亲子家庭现场参与集章打卡、绘本阅读、玩具组装等环节,让用户直观感受集章册的魅力,提升品牌知名度与产品销量。

7. 结论与展望

7.1 研究成果

本研究围绕深圳市莲花山公园观鸟艺术空间,成功设计并推出了菲羽集章册这一创新型科普文创产品。通过深入调研莲花山公园的生态环境与鸟类资源,精准定位青少年儿童和亲子家庭的需求,以自然美学、教育科普与互动体验融合为设计理念,打造出集观鸟集章打卡、故事叙事绘本、拼插式小鸟玩具于一体的多元互动集章册。在视觉设计上,精心搭配色彩、运用图形符号与字体,营造出与公园自然生态契合的氛围;在品牌联动方面,与莲花山公园及菲羽文创公司紧密合作,实现资源共享、活动联合,线上线下协同推广,有效扩大了产品影响力。实践应用表明,菲羽集章册在学校自然教育课程与亲子活动中成效显著,激发了青少年儿童对鸟类的兴趣,促进亲子交流,提升公众自然保护意识,为公园自然教育注入新活力,也为城市生态文化传播提供了有力支撑。

7.2 研究不足与展望

尽管取得一定成果,但研究仍存在局限。集章册内容深度上,对鸟类知识的挖掘还可拓展,如深入剖析鸟类在生态系统中的复杂关系、全球生态变化下的适应性演化等,以满足更高层次求知需求。打卡路线的季节性优化可更精细,结合实时鸟类监测数据,动态调整路线与科普内容,确保四季观鸟体验的精准与独特。产品耐用性方面,需进一步提升材料品质,增强集章册在户外频繁使用的抗磨损能力。推广范围上,目前主要集中在深圳本地,未来可借助线上平台、生态旅游合作等,将菲羽集章册推向全国,吸引更多鸟类爱好者与亲子家庭。同时,持续创新玩法与内容,融入虚拟现实观鸟体验、鸟类保护公益众筹等元素,拓展集章册功能边界,打造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生态教育品牌,助力全社会形成热爱自然、保护鸟类的良好风尚,推动城市生态可持续发展迈向新高度。

参考文献:

- [1] {荷}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工业设计工程学院. 设计方法与策略: 代尔夫特设计指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4-8.
- [2] 刘继华,韩爱兰,王霄,等.野外观鸟活动对鸟类保护影响的分析[J].河南林业科技,2024,44(03):48-50.
- [3] 陈韵伊.将“生态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的永修路径以“候鸟经济”为主导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路径[J].中国生态文明,2024,(04):80-82.
- [4] 吴雨晨,林岚,刘群,等.福建师范大学鸟类资源空间分布及观鸟研学活动设计——基于自然教育视角[J].地理教学,2023,(14):40-44.
- [5] 陈格格,杨建美,刘悦,等.中国鸟类特有种观鸟活动空间分布特征研究[J].西部林业科学,2023,52(02):144-150.
- [6] 张敏,田春坡,车先丽,等.广东省鸟类新记录及其与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关联性[J].生物多样性,2022,30(05):37-47.
- [7] 吴静,许莎莎,王振兴.基于增强现实技术的曹妃甸观鸟旅游文化创意产品设计[J].工业设计,2021,(03):116-117.
- [8] 程时雨,王立国,金杰锋,等.鄱阳湖湿地观鸟旅游游客重游意愿及其影响因素[J].野生动物学报,2020,41(01):115-124.

Research on Interactive manual design under the guidance of nature education -

A case study of "Feiyu Collection Chapter" project in Lianhuashan Park,

Shenzhen

ZhiChao Feng¹

¹ Affiliation: Shenzhen University, Nanshan, Shenzhen,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This design is based on the creation of Feiyu, designed for Shenzhen teenagers and children and parent-child families with a certain scientific nature of Shenzhen park bird watching chapter and picture book interactive booklet. The purpose of the design is to promote Shenzhen's young children and their familie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na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nhance the interest and science of bird watching activities, and cultivate citizens' awareness of caring for nature and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The design includes three parts, including the route of bird watching in the park, the design of family interactive story narrative scene picture book, and the design of plug-in bird toy. Th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 user investigation and other methods, the design positioning, target users and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are determined, and design thinking and innovative methods are used to complete the design practice. This design is not only practical, interesting and popular, but also has certain artistic value and commercial value, which can provide a new idea for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Shenzhen park.

Keywords: Feiyu Literary creation; Bird watching collection chapter;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Natural education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3.738

“工业遗产向艺术空间”：ANT 理论视角下的城市转型研究

——以奥地利林茨电子艺术节为例

黄盛威¹

(¹星海音乐学院艺术管理系,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奥地利林茨电子艺术节是世界上最富有盛名的新媒体艺术节之一，其历史源远流长，自 1979 年来已成功举办 44 年。通过研究林茨电子艺术节的运营模式与其历史发展，以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视角，对林茨电子艺术节进行研究，丰富了城市艺术转型的案例，深入探究林茨电子艺术节各个阶段的转型过程，梳理艺术节内部运作逻辑；本文阐述了艺术节所涉及的各种参与者、关键要素以及复杂的内部逻辑关系；分析林茨城市转型行动者网络构建，得出结论：林茨城市的转型升级受到政府和艺术机构、艺术家、消费者、网络等各类行动者的共同影响。通过“电子艺术”，为林茨带来大量第三产业经济收入，对其绿色城市建设示范和带动作用，使林茨完成“工业遗产向艺术空间”的转型。

关键词：行动者网络理论；城市转型；林茨电子艺术节；艺术空间

一、引言

奥地利林茨电子艺术节是世界上最富有盛名的新媒体艺术节之一，其历史源远流长，自 1979 年来已成功举办 44 年。其主办方是林茨电子艺术有限公司(Ars Electronica Linz GmbH) 是一家活跃于新媒体艺术领域的奥地利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机构，于 1979 年在林茨成立。它的总部设在林茨市林茨电子艺术中心(AEC)。电子艺术节的活动重点关注艺术、技术和社会之间的相互联系。它每年举办一次节日，并管理着一个名为“未来实验室”的多学科媒体艺术研发设施以及颁发各类电子艺术奖。

奥地利林茨的电子艺术节促成了主办城市林茨在二战后的一系列转型发展，使林茨从“工业遗产”城市转型为“艺术空间”城市，并在世界艺术领域取得重要地位。

二、研究现状

城市转型是城市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包括了产业结构调整，功能定位调整、战略地位调整等多类型的转型。不同的城市有着自己转型的原因与困境，众多学对城市转型进行研究。

在影响城市转型因素方面，杨显明，焦华（2016）指出，城市内部空间重建是自我修复行为综合作用下，受城市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继承、系统演变、城市化、环境保护和城市规划因素的影响和驱动，内在性质是不同经济活动过程中的经济位置竞争和再分配。宋润森,陈烨,苏晨（2024）以济南市中心城区的一系列工业遗产为例，从空间表征、空间实践、表征空间三个层面研究，指出文化创作空间应积极与产业环境对话，在考虑所有人经验的同时，创造一个有特色的主题。

"新常态"下,城市更新治理转型是协调多元利益主体和多维政策目标²。其中借助文化与旅游进行城市更

作者简介：黄盛威（2000—），男，广东广州人，星海音乐学院艺术管理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剧院管理、音乐自媒体、数字音乐。

² “ ” [J]. ,2015,22(12):57-62.

新的另类转型屡见不鲜,谢晓如,翁晴,朱竑(2024)探讨了淄博如何以“烧烤”为媒介,在政府、本地居民和游客三大主客体的联动下将淄博“好客”文化的地方实践与城市旅游的快速转型相结合。徐忠义,张召林(2024)从社会学和艺术学的角度指出乌镇从众多旅游文化古镇中脱颖而出,成功转型为国际化旅游品牌。乌镇以艺术介入和“互联网+”和艺术在场的双重保障开启了经济整合发展的道路。吴小华,黄勇(2024)数字经济作为国家发展工程,景德镇陶瓷文创产业应当抓住数字经济这一契机,将数字经济融入景德镇陶瓷文创产业,从而实现景德镇陶瓷文创产业新发展、新转化,进一步提升景德镇陶瓷文创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进一步,部分学者结合行动者网络理论对城市转型进行研究。曹冬松,方雷(2024)基于典型城市的案例考察,构建“资源禀赋-行动者网络”的分析框架,指出数字时代的来临和信息社会的加速演进深刻形塑了城市治理形态。李晓文,杨帆,薛德升(2021)以德国多特蒙德市为例,指出多特蒙德的城市转型是一个由多重利益驱动的多阶段、多主题的复杂游戏过程。多特蒙德新兴产业的成功,取决于动态博弈后新老企业角色的不断转变,管理组织政策的不断调整,以及工会、协会、咨询公司等第三方主体的进入。李祥舒,赵满华(2021)以淮南市为例,结合 ANT 网络分析框架,对淮南市城市转型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淮南市转型需要依靠宏观政策的指导,加强城市转型之间的互动合作关系,寻找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新方向。

总体而言,大多数城市转型研究从产业调整角度入手,利用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研究城市转型的研究较少,并且在现代城市转型中,利用何种优势对城市进行转型改造值得我们探讨,除了关注不同类别城市中物质的相互作用外,它还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利用社会学行为者网络研究林茨从产业遗产城市向艺术空间城市的转型,发现艺术在城市转型中的作用具有现实意义。

三、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利用 ANT 网络理论,对林茨城市转型过程中人行为者与非人行为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了总结和分析,以及在林茨电子艺术节举办过程中的行动者网络研究。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拉图尔(Bruno Latour)等人共同创立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简称 ANT)最初是科技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打破了二元论的两分逻辑,试图衔接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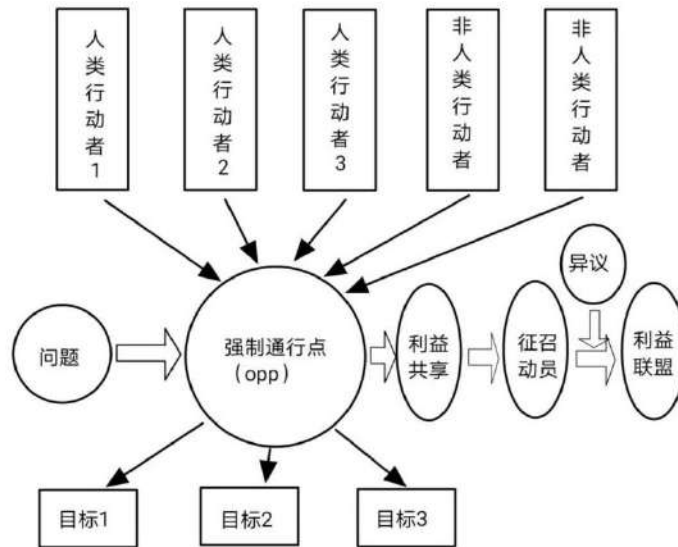


图 1 ANT 行动者网络示意图

该理论主要有三方面重点,首先,行为者,或者任何通过创造差异来改变事物状态的东西,都可以成为行为者,包括人类和非人类因素。二是翻译、行动者之间、行动者之间以及代表替换、谈判等过程之间的位置。把兴趣转化为其他参与者的利益。让其他参与者参与由关键参与者主导的网络,包括四个基本环节:“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征召”和“动员”。三是异构网络,由参与者构建的动态变化网络,强调工作互动的过程。通过“联合强制通过点联合”(OPP),关键行动者需要行使组织的权力,克服转移过程中的异议,角色在转移过程中异质行动者的利益、功能和定位随着权力的变化而变化。

四、城市转型行动者网络体系构建

(一) 工业遗产转型阶段行动者网络构建

林茨作为奥地利的主要城市，在二战时期曾是重要的军事基地以及重工业城市，依靠钢铁工业打造了自身独特的竞争力。在战争结束后如同其他工业城市一样，临时也陷入了环境污染、文化活动缺失、第三产业无力等城市病的困扰。针对此种现象，林茨推行一系列的公共政策，对城市发展进行转型，而艺术节则是用于城市转型的主要手段。

1. 行动者构成

表 1 工业遗产转型阶段行动者构成

行动者	具体类型	性质	地位	代表行动者
人类行动者	林茨政府	团体	核心	林茨市艺术发展局
	城市居民	个人	主体	居民、商贩、手工业者
	重工业企业	团体	主体	VOEST 钢铁公司人员
	艺术家	个人	主体	Winnie Soon
	奥地利广播公司	团体	关键	汉尼斯·利奥德赛德
非人类行动者	土地	实体	重要	闲置地、旧厂房
	资金	虚体	核心	门票、投资、赞助、冠名
	交通设施	实体	客体	铁路、地铁、机场
	公共场馆	实体	客体	博物馆、美术馆、学校
	服务业	实体	客体	宾馆、饭店、商店
	电子技术	实体	重要	全息投影、VR、AR

行动者网络转译之前，有必要对产业转型阶段存在的具体参与者进行划分。根据城市中的多重兴趣主体被分为：人类行动者，包括林茨政府、城市居民、重工业企业、艺术家、林茨电子艺术有限公司等人类行动者；为城市转型提供物质基础的非人类行动者，包括、资金、土地、交通设施、公共场馆、服务业等。将网络之中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相互连接，其中人类不仅作为“被影响着”的行动者而且实实在在参与艺术空间网络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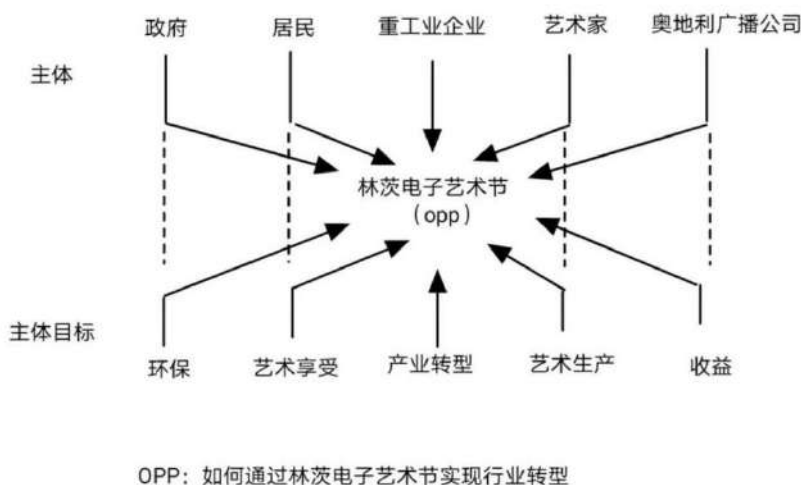


图 2 工业遗产转型网络

2. 转译

(1) “问题呈现”阶段，从工业重镇到文化焦点

在转译的第一步“问题呈现”阶段，要求将网络中所有行动者所关注的问题进行具体化的归纳，在网络中寻找其中的“强制通行点 OPP”。随着全球化和技术创新的浪潮，林茨市在 20 世纪末开始面临经济和社会的重大挑战，从单一工业经济向多元化文化经济的转变，相关的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共同通过“林茨电子艺术节”这一强制通行点实现城市转型。

1974年,林茨开始举办布鲁克纳音乐节,以林茨市政府为首的核心人类行动者试图利用艺术塑造城市新形象。但与维也纳和萨尔茨堡相比,林茨在文化资源和发展程度上没有任何优势,在此背景下,核心行动者奥地利广播公司骨干汉尼斯·利奥德赛德通过1978年举办林茨流行音乐会有意与奥地利其他城市形成对比,塑造独有形象。同时,借助20世纪末电子计算机技术将全息投影、VR、AR用于塑造城市的电子艺术身份,从而完成林茨市工业重镇到文化焦点的转译。

(2) “利益赋予”阶段,艺术节带动经济发展

“利益赋予阶段”,不同行动者将主体利益赋予转化为其他行动者所追求的利益,使得城市转型过程中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在利益分配方面之间形成一定的网络联盟⁴。

非人类行动者与人类行动者相互配合共同构建一种相互协调的机制,由于削弱了重工业在林茨产业结构中的占比,此部分的利益通过“强制通行点”林茨电子艺术节进行弥补。艺术节期间,以宾馆、饭店和零售业代表的非人类行动者客体以一种文旅融合方式扩大艺术影响,增加城市收入,一举两得。更重要的是,电影节促进了当地文化产业的发展,吸引了数字媒体、创意设计和软件开发等新兴产业的企业和人才,丰富林茨市的艺术人才资源。核心行动者艺术发展局通过艺术服务进行利益赋予,电子艺术节庆期间,政府对一些公共基础设施例如城市地铁站、路边灯柱、商业街最佳广告位都被用来帮助宣传,助力林茨电子艺术节。

2014年,音乐节收入达1310万欧元,自筹部分约占60%⁵。杰弗里·斯托克(Geoffrey Stoke)认为,电子艺术节中的艺术作品可以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动力,技术的资金问题可以得到有效解决。2015年林茨电子艺术节的总收入为1460万欧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50万欧元(11.5%),超过了该公司30年历史上的最高纪录。在门票收入方面,该艺术中心在2013年吸引了7万多名游客,较去年同期增长了3%。到2015年,该电影节已经吸引了超过17万名游客,同比增长9.2%,门票收入增至51.1万欧元。2015年,电子艺电中心举办的各种活动的收入也增长了9.2%,达到28.9万欧元。大量的民间赞助也支持艺术的举办。2015年9月初,430名合作伙伴和赞助商提供了价值200万欧元的实物赞助,为“城市”后城市展览奠定了基础,通过400多个活动形成了大型、多元化的艺术节。其中,2015年,盈利业务产生净利润超过70万欧元,毛利率为10%,并已逐步改善⁶。这些收入主要来自定制解决方案部门的一系列盈利业务和令人印象深刻的客户网络通过“林茨电子艺术节”这一强制通行点为服务业的宾馆、饭店、商店与手工业者进行利益分配。

(3) “征召”与“动员”阶段,城市资源更新

城市转型中的众多核心行动者组成网络体系,但是面对错综复杂的城市转型过程,仅靠具有代表性的行动者,如林茨艺术发展局、林茨电子艺术公司,难以完全实现城市转型网络的良性构建。“征召”就是需要更多的与区域转型有关系的个体加入并且追求其共同的利益。

“征召”具有创新性的企业与艺术人才加入城市转型网络之中。城市领导者,90年代起,林茨政府开始大力支持文化产业2000年出台的第一个文化发展计划。通过招商引资,带动资本投入城市规划建设,利用城市规划布局实施方案对城市老城区功能进行重新定义,例如将闲置地、公共场馆、旧厂房等非人类实体行动者进行再利用,鼓励贸易和工业的物质性投资在建设过程中改善用地现状。例如,改造前皇家盐布局成为艺术家工作室;将林茨邮递配送中心改造为艺术空间“Postcity”邮城,实现对城市功能区结构的更改,为艺术节提供巨大的现代化展示空间。

此外,“动员”重工业行动者是另外一个城市转型关键,林茨政府与1895年通过了市政府与重工业企业共同制定净化空气措施,为降排企业提供减税优惠,实施城市绿色治理。实施首轮治理后,全市50%以上面积被绿色覆盖,大气中有害物质排放从46000多吨降低至14000多吨。林茨政府还于1985年通过绿色屋顶法规并进行了一系列绿色环境改造,宣布包括了扩建公园,重新布置广场植被等生态建设,大大改观了林茨的生态环境。

(二) 艺术空间生产阶段行动者网络构建

林茨电子艺术节的发展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特征与成就,逐步从雏形到完整生态构建。

林茨电子艺术节发展阶段一览表

⁴ , , . (ANT) [J]. ,2012,27(11):24-31.

⁵ Ars Electronica.Ars Electronica- A unique platform for digital art and mediaculture[R].Culture for Cities and Regions,2015:3.

⁶ . [D]. ,2021.

时间段	发展阶段	主要特征与成就
1979 年-1986 年	雏形阶段	作为布鲁克纳音乐节组成部分启动"林茨声音云", 确立"艺术、科技、社会"发展方向
1987 年-1995 年	探索阶段	新媒体艺术家独立运营, 探索新型艺术节运营模式
1996 年-2008 年	机制完善阶段	电子艺术中心成立, 逐步建立标准化运营体系
2009 年	生态构建阶段	新电子艺术中心改造完成, 构建全球性数字艺术生态系统

1.行动者构成

表 2 艺术空间生产阶段行动者构成

行动者	具体类型	性质	地位	代表行动者
人类行动者	林茨政府	团体	核心	林茨市艺术发展局
	城市居民	个人	主体	居民、商贩、手工业者
	艺术受众	个人	主体	外来游客、学生、儿童、艺术爱好者
	艺术家	个人	主体	Winnie Soon 等
	林茨电子艺术公司	团体	关键	方案定制部
非人类行动者	电子艺术中心	实体	核心	Postcity、教堂、Ookultur 中心
	林茨电子音乐节	虚体	核心	音乐会之夜、林茨声音云
	未来实验室	实体	客体	未来实验室音乐表演
	ARS 电子出口部	实体	客体	"林茨到深圳"
	电子艺术大奖赛	虚体	重要	金尼卡奖

在艺术空间生产转译阶段, 按照林茨电子艺术节的多元利益主体划分为:人类行动者, 包括林茨政府、城市居民、艺术受众、艺术家、林茨电子艺术有限公司等人类行动者; 为城市转型提供物质基础的非人类行动者, 电子艺术中心、林茨电子音乐节、未来实验室、ARS 电子出口部、电子艺术大奖赛等, 将网络之中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相互连接。

2.转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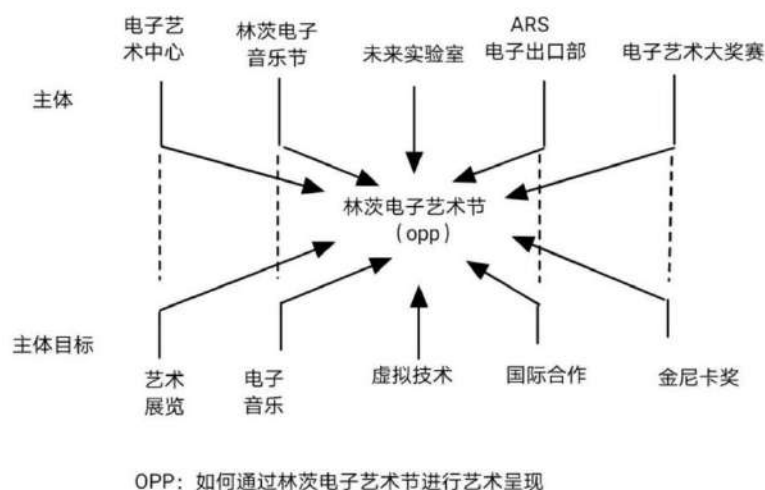


图 3 艺术空间转型网络

(1) “问题呈现”阶段, 电子艺术节项目开展
根据行动者划定不难得出艺术空间生产阶段行动者网络的“强制同行点”OPP

也是林茨电子艺术节，各方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源共同作用，对艺术活动进行整合，形成“林茨电子艺术节”的强制通行点，为艺术受众提供各类艺术展演项目。

林茨最大的钢铁公司 VOEST 钢铁公司，于 70 年代改组为奥地利联合钢铁公司，随后又多次改组最终成立林茨电子艺术有限公司，全权负责林茨电子艺术节举办事宜。关键人类行动者林茨电子艺术有限公司积极探索艺术与技术的结合，利用最新的科技手段，如数字化技术、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创造出独特的艺术作品。这些作品不仅仅是视觉上的震撼，更是对传统艺术形式的挑战和革新。艺术节通过展示这些作品，展现了艺术与科技结合的无限可能性，吸引了广泛的人类行动者，包括了艺术爱好者、科技爱好者以及普通大众等。

为了更好地开展林茨电子艺术节，目前划分了几大重要部门：电子艺术中心、艺术节-奖项-展览部、未来实验室、定制方案部、企业服务部等部门，逐渐形成电子艺术中心为核心、电子艺术大奖、电子音乐节、未来实验室、ARS 电子出口部等多个艺术板块的联动。

(2) “利益赋予”阶段，多元板块赋能精神文明

“利益赋予”阶段，微观层面的人类行动者：居民、外来游客、学生、儿童、艺术爱好者、艺术家等个人，通过“强制通行点”林茨电子艺术节参与到网络中，响应关键行动者的号召在艺术空间生产网络中产生利益汲取。

在艺术节期间，将艺术大众集中在以电子艺术中心为主的 65,000 平方米艺术空间，包括中心广场和 Postcity（邮城）、教堂和 Ookultur Quarter 等城市公共场所，依托此类非人类行动客体开展展览会、研讨会、讲座、讲习班、表演、艺术家对话等一系列艺术活动。

Linz, 奥地利



图 4 林茨电子艺术节场馆分布

此外，电子艺术大奖赛是此网络中针对艺术家行动者的一个重要的非人类行动者事件，通过奖项荣誉和评委会的筛选推动了电子艺术的发展，也是林茨电子艺术公司建立自己学术权威的手段。组委会在其可控的范围之内可以选择更具自己价值观的艺术作品获得电子艺术大奖。自 1987 年成立以来，不断产生杰出和创新的作品，每年有超过三千件作品提交评奖，超过六万件媒体艺术作品提交备案。在奖项设置方面根据作品类型分为不同的类别，每个奖项中最优秀的作品将被授予“金尼卡”奖，同时获得最高一万欧元的奖金，并在电影节期间举办展览，以此吸引广大艺术家参与评选。

2023 年，中国香港艺术家 Winnie Soon《不可擦除字符系列》使用机器学习技术结合 DIY 和开源方法来复杂控制和权力的概念。通过将经过删改和审查的内容转化为“新的”体验，以避免或规避监控，表达了对网络时代文字来源可靠性的反思，该作品亦获得大奖赛最高奖金尼卡奖。

(3) “征召”与“动员”加强社会响应，提升国际地位

艺术空间生产阶段的行动者网络离不开对广大人类行动者的“征召”与“动员”，其主体分为奥地利国内社会和国际艺术媒体、组织。

2013 年林茨作为“媒体艺术之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为“创意网络之都”城市之一，引发了大量国际关注，“全民参与艺术生活”也被写入林茨的城市座右铭。目的在于发动最广大的受众参与艺术节，并打造自身品牌。

林茨电子艺术节的策展理念强调社会响应，艺术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存在，而是融入到公众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一种社会实践。艺术节通过各种互动装置、工作坊和讲座，促进艺术家与观众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这种参与性和互动性的策展方式,使艺术成为一种可以触及和体验的存在,更加贴近公众的生活。在主题上,每一届艺术节都有不同的主题,这些主题紧跟时代的脉搏,反映了当下社会、科技的最新发展趋势。2023年的主题是 Who owns the truth,以提问的形式提出直接针对 AI 时代下的真理讨论,展示了艺术在多元领域的探索 and 实验。跨学科式的探索丰富了艺术节的内容,推动艺术多元发展。

国际合作是提升艺术节全球影响力的关键。通过与世界各地的艺术家、策展人、机构和赞助商建立合作关系,林茨电子艺术节通过与全球艺术和科技社区的合作,成功地构建了一个国际性的平台,使其成为全球新媒体艺术领域的重要节点。自 2008 年至今,林茨电子艺术节分别与东京大学、MIT、库克艺术科技大学、筑波大学、柏林艺术大学、以色列大学、比利时高等美术学院、巴黎八大、清华大学等国际知名大学合作,邀请以上大学参与承办电子艺术节,每年有超过 1000 位艺术家,500 件以上展品参与展览,吸引全球上千万人前往观赏。

结论与启示

(一) 结论

林茨电子艺术节对林茨从工业城市转向艺术城市起到了关键的变革作用,其行动者网络构建呈现出工业遗产向艺术空间这一卓越成效。本文主要结论有以下三点。

第一,林茨城市的转型升级受到政府和重工业企业、艺术机构、艺术家、消费者、网络等各类行动者的共同影响。非人类行动者通过人类行动者的资源整合,推动了林茨业态更新。

第二,林茨城市的艺术转型彰显了艺术魅力和科技优势。通过“电子艺术”,林茨电子艺术节实现国内、国际相融合,在电子艺术展演领域发挥了特长,在全球打响品牌。

第三,两次电子艺术节不仅为林茨带来大量第三产业经济收入,还为其绿色城市建设示范和带动作用,为奥地利的环境保护作出较大贡献。

(二) 启示

结合以上背景的梳理,笔者认为本研究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价值:

其一、林茨电子艺术节在成立之初就将“艺术、科技、社会的节日”作为副标题,每届电子艺术节都会根据其确定一个主题,组织者围绕这一主题策划当年的艺术节活动,其 44 年主题演变历程与关注视野构成新媒体艺术策展基本逻辑,为新媒体艺术展览策划提供经验和参考。

其二、在城市的转型上,通过创办林茨电子艺术节,不仅仅使林茨市从“工业遗产”转变成“艺术空间”,同时也带动了科技、教育、旅游行业的发展。44 年的发展历经形成了完善的艺术节运行模式,而林茨电子艺术节的成功经验给正在进行产业升级与文化转型的中国城市可参照、借鉴的案例。

参考文献:

- [1]宋润森,陈烨,苏晨,等.空间生产视角下的城市工业遗产向文创空间转型研究——以济南市工业——文创空间为例[J].城市建筑,2024,21(23):55-58.
- [2]李鹏,张小敏,陈慧.行动者网络视域下世界遗产地的空间生产——以广东开平碉楼与村落为例[J].热带地理,2014,34(04):429-437.
- [3]李立华,付涤非,刘睿.旅游研究的空间转向——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的旅游研究述评[J].旅游学刊,2014,29(03):107-115.
- [5]朱峰,保继刚,项怡娴.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与旅游研究范式创新[J].旅游学刊,2012,27(11):24-31.
- [6]张环宙,周永广,魏蕙雅,黄超超.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乡村旅游内生式发展的实证研究——以浙江浦江仙华山村为例[J].旅游学刊,2008,(02):65-71.
- [7]李晓文,杨帆,薛德升.行动者网络视角下的资源型城市动态转型研究——以德国多特蒙德市为例[J].世界地理研究,2021,30(05):913-924.
- [8]李祥舒,赵满华.行动者网络视角下资源型城市转型研究——以淮南市为例[J].山西农经,2021,(05):53-57.
- [9]Popper F. Hemingway B. Art of the electronic age[M]. Londres: Thames and Hudson, 19
- [10]Ars Electronica.Ars Electronica- A unique platform for digital art and mediaculture[R].Culture for Cities and Regions,2015:3.
- [11]Supersense x BMW Experience Lab Project at the international Ars Electronica Festival 2022. Visitors are invited to explore future notions of mobility under the festival theme Welcome to Planet B.[J].M2 Presswire,2022,
- [12]Vozzo V .Ars Electronica 2015[J].Mimesis Journal,2015,4(2):
- [13]Park J ,Kim D ,Kim H .Affordance expressed in interactive art - focusing on cases of interactive art works of 2013 ARS Electronica -[J].KOREA SCIENCE ART FORUM,2013,14
- [14]Ars Electronica.Ars Electronica- A unique platform for digital art and mediaculture[R].Culture for Cities and Regions,2015:3.

- [15]ARS ELECTRONICA. (unknown). ARS and the CITY.In ARS ELECTRONICA. Retrieved 09:16, 18 November, 2019, from <https://ars.electronica.art/outofthebox/en/ars-and-the-city/>.
- [16]Archives of the City of Linz. (unknown). CityHistory. In History Linz. Retrieved 08:39, 18 November, 2019, from <https://stadtdgeschichte.linz.at/english/11625.php>.
- [17]Wikipedia contributors. (2019, October 28). VÖEST.In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Retrieved 08:41, 18 November, 2019, from <https://de.wikipedia.org/wiki/VÖEST>.
- [18]Büro Stadtregierung Linz Stadtforschung. (unknown). Lage und Flächen. In Linzverändert. Retrieved 08:49, 18 November, 2019, from https://www.linz.at/zahlen/010_Stadtgebiet/015_Flaechen/.
- [19]卡林·弗洛那 (译者: 孙珂).《林茨市的环境保护》.《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1996 年第一期): 21-22.
- [20]卡林·弗洛那 (译者: 孙珂).《绿色的林茨——确保大城市里有更高的生活质量》.《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1996 年第二期): 22-23.
- [21]袁能善.奥地利林茨电子艺术节的策展与运营[D].四川美术学院,2022.
- [22]吴梦娇.奥地利林茨电子艺术节研究[D].中央美术学院,2021.
- [23]崔梦琳.新媒体艺术的演变趋势研究——基于历届奥地利林茨电子艺术节主题的分析[D].华中科技大学, 2016.14.54
- [24]侯贺良, 橄榄.“欧洲文化之都”林茨[J].走向世界, 2009 (25):63.25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 [25]蔡新元.新媒体艺术再思考——“林茨电子艺术节”41 年主题流变[J].美术观察,2021,(02):84-90.
- [26]杨显明, 焦华富.转型期煤炭资源型城市空间重构——以淮南市、淮北市为例[J].地理学报,2016,71(08):1343-1356.
- [27]谢晓如,翁晴,朱竑.“网红”旅游地“好客”形象的建构——以淄博为例[J].旅游学刊,2024,39(11):108-123.
- [28]毛丰付,侯玉巧,高雨晨.数字经济对城市能源消费结构转型的影响——基于能源禀赋异质性与空间溢出效应检验[J].浙江学刊,2024,(06):125-136.
- [29]王洁琼,胡恒.城市产业转型下的空间新问题[J].建筑学报,2024,(Z1):237.
- [30]范金龙,于潇,余星滢.城市更新项目策划与实施路径——以黄石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为例[J].规划师,2024,40(10):82-88.
- [31]徐忠义,张召林.古镇的“出路”及其社会学意义: 以艺术介入乌镇为中心[J].中国艺术,2024,(02):94-103.
- [32]吴小华,黄勇.数字经济视角下景德镇陶瓷文创产业战略转型的路径[J].中国陶瓷工业,2024,31(01):67-70.
- [33]曹婧.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旅游经济的生态化转型分析——以景德镇市为例[J].现代商业,2019,(34):82-83.
- [34]张磊.“新常态”下城市更新治理模式比较与转型路径[J].城市发展研究,2015,22(12):57-62.
- [35]高军波,周春山,王义民,等.转型时期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析[J].地理研究,2011,30(03):424-436.

"Industrial Heritage to Art Space": a research on urban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T theory —— Take the Linz Ars Electronica in Austria as an example

Huangshengwei¹

¹Arts Management Department, Xi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Austria Linz Ars Electronica i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new media art festivals in the world. It has a long history and has been successfully held for 44 years since 1979. By studying the operation mode of Linz Ars Electronica and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 paper enriches the research of urban art transformation, and explores the internal operation logic of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of Linz urban transformation network, and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Linz city is influenced by the government, art institutions, artists, consumers, network and other actors. Through "electronic art", Linz will bring a lot of economic income from the tertiary industry, and play a demonstration and driving role in its green city construction, making Linz comple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heritage to art space".

Keywords: Actor network theory (ANT) ; Urban transformation; Linz Ars Electronica; art space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3.751

非遗焕新，助力民族文化——以田阳布洛陀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为例

覃家祝 肖亭 李钊 苏盛滢 梁芝
(南宁理工学院文理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

摘要：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调查法，在探讨田阳布洛陀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的同时，就如何打造布洛陀文化旅游体系，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提升地区经济和社会效益，提出新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布洛陀文化；文化保护；文化传承；非遗焕新；民族认同

一、布洛陀文化的概述与现状

(一) 布洛陀文化的历史渊源与形成

布洛陀文化发源于右江河谷地区，是壮族的古老信仰和习俗，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随着壮族社会的发展，无论是在神话传说或宗教信仰中，布洛陀作为一位创世神与始祖神，其史诗与经文都是布洛陀文化起源的重要依据。如：《布洛陀经诗》是壮族先民记载布洛陀开天地，创万物、取火等功绩。

布洛陀文化的形成背景包括壮族的历史发展、地理环境和社会变迁等诸多方面因素。壮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了对布洛陀的崇拜和信仰，并通过各种民俗活动和艺术形式加以传承。

布洛陀文化的历史发展主要分为四个阶段：原始崇拜期、形成与发展期、文化整合与创新期、当代复兴期。

原始崇拜期主要指壮族形成初期，对于布洛陀神像的原始崇拜，该时期的部落文化主要依靠口头传唱的活态形式进行流传。而到了第二阶段，大约是指宋代以后，布洛陀的故事被整理成文本，壮民在每年的农历五月十三日开展祭祀活动。在第三阶段，是指进入近现代时期，政府与相关学者开始重视保护布洛陀文化，一系列研究作品与文艺作品开始相继问世。进入 21 世纪，布洛陀文化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举办布洛陀文化节，还被引入影视、音乐、艺术等多个领域，呈现多样性的发展趋势。

(二) 布洛陀文化的内涵

1. 创世与始祖崇拜

布洛陀开天辟地，创造山川河流、日月星辰。该创世神话反映了壮族先民对于世界起源的思考与探索，也体现了先民对于布洛陀的崇敬。他的形象代表着壮族的根源，是民族凝聚力与文化认同的重要体现。

2. 以人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

布洛陀在创建人类社会的过程中，制定一系列的伦理道德规范，教导人们如何做人、如何相处，这些道德规范在壮族社会中起到了规范作用，传承至今，依旧影响着壮民的价值观。同时，布洛陀也关注尊重与理解人的需求及人类在社会中的作用。带领壮民驱逐野兽、射落太阳、带领壮民从蒙昧时代走向农耕时代，认识到农业生产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这些都是对于人的实践与力量的肯定，也是以人为本的唯物主义的体现。

基金项目：2024 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非遗焕新，助力民族文化——以田阳布洛陀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为例》，项目编号：202413645043

作者简介：覃家祝（2004-），男，壮族，广西来宾，本科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肖亭（2003-），女，汉族，湖南湘乡，本科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李钊（2002-），男，汉族，湖北黄石，本科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通讯作者：苏盛滢（1994-），女，汉族，广西桂林，助教，研究方向：比较文化研究

梁芝（1997-），女，壮族，广西南宁，助教，研究方向：民间文学、民俗学

3. 宗教信仰与祭祀传统

壮族先民通过祭祀布洛陀，表达对于祖先的敬仰与感恩，祈求神灵的庇护与赐福，常常通过唱诗、跳舞、献祭品等方式进行祭祀活动，而这些祭祀传统不仅是宗教活动，更是壮族文化的重要传承路径。

4. 农耕文化

布洛陀教会壮族人民农耕技术，姆六甲带回山上的种子，人类社会的农耕得以发展，这就是布洛陀文化中农耕文化的起源，反映了壮族先民对于土地的热爱与依赖，体现了先民对于农业的重视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5. 精神传承

通过《布洛陀经诗》与《麽经》可以发现，壮语作为壮族文化的载体，其来源于对生活的体验，反映了壮语与壮族文化之间同源共生的关系。其中记录着布洛陀的形象与事迹，也蕴含着丰富的壮族民间文化。这两部作品丰富壮族民族文化的内涵，也传承着布洛陀的精神，它们体现着壮族人民的艺术创造与审美情趣。

（三）保护与传承现状

1. 当前布洛陀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基本情况

目前，布洛陀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

第一，田阳区文化馆获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布洛陀”项目保护单位资格。第二，政府积极吸引社会资金参与，通过与企业、社会组织合作的方式共同修建敢壮山、田州古城、布洛陀文化展示馆等。同时鼓励非遗传承人培养新的传承者，同时确立敢壮山等非遗传承基地。第三，专门设立布洛陀文化研究会学术机构。同时通过现代媒体技术进行宣传推广，例如推出《话说田阳》、《布洛陀艺苑》等栏目。第四，定时举办布洛陀民俗文化旅游节、布洛陀文化研讨会、展览等。助力学术交流，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二、布洛陀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困境与解决对策

（一）当前面临的问题

首先，在社会层面，布洛陀文化的识别度不高，文化内涵挖掘不够深入，且传播范围受限。许多人对布洛陀文化的了解仅停留在表面，缺乏对其深层次的理解和认同，其知名度与影响力有待提升。同时，布洛陀文化主要流传于广西壮族聚居的部分地方，地域范围分布较小。相关布洛陀文化作品与传承人大多都使用壮语，对于想要理解布洛陀文化的其他地区壮语人群与非壮语人群带来一定难度与挑战。

其次，在政府方面，存在着重申报、重开发、轻保护的现象。时至 2024 年，在对田阳区布洛陀文化的调研中，新增的也仅有供壮民朝拜的敢壮山以及商业化严重的田州古城。而在敢壮山中的布洛陀文化展示馆，也是层层积灰。而布洛陀文学研究会也没有注入新生力量，仍是一些退休职工担任主要研究会成员。虽然每年定期举办布洛陀祭拜文化旅游节，但过了该时间点后，相关研究逐渐归于沉寂；

再者，在非遗传承，布洛陀文化与现代社会的融合度不高，缺乏创新的保护方式。布洛陀文化的传承方式较为传统，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同时，非遗传承人的培养与支持力度仍存在不足。

最后，宣传推广力度不够，群众对布洛陀文化的认知和参与度有待提高。许多人对布洛陀文化的了解有限，缺乏参与和支持的积极性。在其发展路径中，忽视现代营销手段的应用，缺乏利用新媒体等方式进行广泛传播，导致其难以在众多文化中脱颖而出。同时，缺乏创新转化，主要体现为文化表现形式的局限与相关产品开发的不足。布洛陀文化表型形式较为传统，如祭祀活动，山歌传唱等。对于年轻一代与非壮族人群的吸引力受限。也没有进行相关产品开发，未与生活需求、现代时尚相结合，难以形成具有竞争力的文化产品。

此外，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布洛陀文化面临着被边缘化和遗忘的风险，需要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进行保护和传承。现代化的冲击与社会变迁，使布洛陀文化丧失了原有的生存土壤与存在空间，面临边缘化的问题。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种文化碰撞交流，大量的外来文化与流行文化占据大众视野，从而导致布洛陀文化渐渐被大众所遗忘。

（二）解决问题路径

第一，加强对布洛陀文化的研究和挖掘，提升其识别度和文化内涵。通过深入研究布洛陀文化的历史渊源和核心价值，挖掘其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增强布洛陀文化的区域独特性。同时，将转化学术成果，纳入科普教育，推出地方特色课程，让布洛陀文化更为群众接受与熟知。

第二, 加大非遗保护工作的投入力度, 完善相关机制和政策。政府应加大资金投入, 制定和实施更加有力的政策措施, 支持布洛陀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同时, 针对于布洛陀文化的保护现状, 提出以下立法保护的建议:

1.明确保护主体与职责。在立法中, 应明确田阳区政府及相关部门在布洛陀文化保护中的具体职责。

2.规范开发利用行为, 对于涉及布洛陀文化的商业活动、旅游开发等活动, 严格实施许可制度。同时明确开发利用布洛陀文化所产生的经济利益的分配机制, 提高各方参与保护与开发的积极性, 也能保障布洛陀文化的可持续性发展。

3.加强监督与执法。建立健全的布洛陀文化保护监督机制, 加强保护工作的日常监督与定期检查。

第三, 创新布洛陀文化的保护方式和手段, 促进其与现代社会的融合。例如, 通过 AIGC 技术拓宽传播途径, 制作布洛陀文化的数字化展厅, 将布洛陀文化进行数字化和可视化, 提升其吸引力和影响力。亦或是基于百色市红色文化特点, 结合到布洛陀文化, 设计出一条红色为主、非遗为辅的旅游路线, 让游客在感受红色精神的同时, 也能体验到八桂大地所独有的少数民族文化。

第四, 加强宣传推广工作, 提升群众对布洛陀文化的认知和参与度。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 广泛宣传布洛陀文化, 增强群众的参与和支持。例如, 制作相关纪录片和动画进行布洛陀文化讲解, 以更通俗易懂的方式进行传播, 亦或与博物馆进行合作推广, 推出具有区域特色的文创产品。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属于全人类共有的文化财产, 而以上对策是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拥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与地方文化, 同时依据于现当代社会的科学技术与大众群体的特色、需求, 进行设计、探讨。该对策强调的是增强布洛陀文化与大众群体的亲和力, 是强调相关政府在进行申报保护单位后, 除发挥主体作用外, 更应重视客体所带来的积极影响, 坚持国家“引进来、走出去”的战略政策, 丰富非遗保护手段, 促进创新发展。只有各方共同努力, 才能实现布洛陀文化的有效保护与传承。

三、非遗焕新发展预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 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 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在当今时代,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飞速发展, 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已然不再仅仅停留于物质层面。物质生活的日益富足, 使得人们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精神方面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蓬勃发展趋势:

1.政策支持与市场关注显著增强。各级政府纷纷出台一系列扶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政策, 从资金投入、人才培养到宣传推广等多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同时, 市场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出越来越高的关注度, 众多企业和投资者看到了非遗产业所蕴含的巨大潜力, 纷纷投身其中。

2.消费者群体不断增多, 市场得以进一步拓宽。从传统的手工艺品到非遗主题的旅游体验, 消费者的需求日益多样化, 这为非遗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3.社区参与度与民众意识大幅提高。社区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重要阵地, 居民们积极参与非遗活动, 传承非遗技艺。

4.非遗传播渠道日益多样化。除了传统的媒体渠道, 互联网、社交媒体等新兴平台为非遗的传播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途径。通过短视频、直播等形式, 非遗文化得以更广泛地传播, 吸引了更多的关注。

基于以上发展趋势, 可以做出以下预测:

1.非遗教育普及化

随着国民素质提升和民族文化自信增强, 非遗被逐步引入教育体系, 特别是地方特色文化课程。这一趋势预示着未来非遗教育将更加广泛地覆盖各类学校, 从小学到大学, 甚至是终身学习平台, 非遗将成为培养学生文化认同感、创新能力以及审美情趣的重要途径。而地方特色非遗课程有望成为学校教育的亮点, 通过故事讲述、手工制作、音乐舞蹈等形式, 让学生亲身体验非遗的魅力, 加深对本土文化的理解和情感联系。

2.红色旅游与非遗融合, 打造文化旅游新热点

红色旅游资源与非遗相结合的趋势日益明显,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旅游线路。这些线路通常以革命历史遗址为核心, 沿途穿插展示当地的非遗项目, 如民间艺术、传统手工艺、地方戏曲等。这种方式不仅能增加游客对红色文化的兴趣, 还能促进当地非遗的活化与传播, 实现文化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3.非遗与现代时尚产业跨界合作

非遗元素与现代时尚、设计行业之间的合作正在加速，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高端奢侈品牌、包装设计等领域开始频繁引用非遗灵感，将其转化为符合当代审美的产品，如使用传统图案的服装、结合古老技法的手工艺品、带有地域文化符号的商品包装等。这种跨界合作不仅为非遗注入新的生命力，还拓宽了其市场空间，使其有机会进入国际市场，提升国际影响力。

4. 数字技术融合非遗保护与传播

虚拟现实、云计算、大数据等先进技术被用来记录、保存和展示非遗，使得远程学习、在线体验成为可能。数字博物馆、线上非遗节、直播教学等活动层出不穷，极大地扩展了非遗的受众范围，降低了体验门槛。此外，区块链技术也被探索用于非遗作品的版权保护和追溯，确保创作者权益。

参考文献：

- [1]张声震.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 [M]. 南宁. 广西民族出版社, 2004.
- [2]张声震.壮族历史文化与《壮学丛书》——《壮学丛书》总序 [J]. 广西民族研究, 2003 年第 1 期 38-54.
- [3]刘婷.“后申遗”时期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研究——基于壮族“布洛陀”文化的调查 [J]. 广西民族研究, 2013 年第 2 期 189-195.
- [4]韦飞欧、裴秋霖.“2023 年壮学与布洛陀文化论坛”综述 [J]. 文山学院学报, 2024 年第 1 期 26-29.
- [5]何其敏.认识自我与认识当下——对壮族布洛陀文化在中国社会中位置的思考 [J]. 广西民族研究, 2011 年第 3 期 102-105.
- [6]覃彩銮.骆越文化与布洛陀文化关系述论 [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年第 4 期 93-96.

Innovative Revitaliz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mpowering Ethnic Culture—A Case Study on the Preserv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ianyang Buluotuo Culture

Qin Jiazhu, Xiao Ting, Li Zhao, Su Shengying, Liang Zhi

School of Liberal Arts and Sciences, Nanning College of Technology, Nanning, Guangxi, 5300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fieldwork and documentary research,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preserv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ianyang Buluotuo culture while proposing novel research perspectives on constructing a Buluotuo cultural tourism system to boost local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enhance regional socioeconomic benefits.

Keywords: Buluotuo culture; cultural preservation; cultural inheritance; ICH revitalization; ethnic identity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3.773

单元整体视角下小学语文教学设计框架与实践研究

——以统编教材三上第五单元为例

余一夫¹ 赵曼¹ 彭凤¹

(¹ 武汉市恒大城学校, 湖北 武汉 430000)

摘要: 新课标的推行给教学带来了深刻的变化, 尤其是对教学设计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中, 单元整体教学作为一种创新性的教学模式, 教师以教材中的单元内容为基础, 围绕明确的主题和语文要素, 结合具体的教学目标和学生实际情况, 将原本分散的教学要素有机融合。本研究以统编版小学语文三年级上册第五单元为例, 构建了基于单元整体视角下教学设计的框架, 深入探讨如何通过框架进行教学设计与分步骤实践活动, 帮助一线小学语文教师更好地理解单元整体视角下的教学设计, 以期为一线小学语文教师提供理论借鉴。

关键词: 单元整体; 小学语文; 教学设计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持续推进, 教育领域逐渐将学生核心素养的提升置于教学的首要地位。而要实现这一目标, 教学设计便成为关键所在。新课改使教学设计发生了重要转变, 从以往的单节课教学转向了单元整体教学的模式。这种转变的核心在于: 单元整体教学强调知识的整合性与系统性, 能够有效避免传统教学中知识点零散、割裂的弊端, 使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更加全面、直观。基于单元整体的教学设计强调教学内容的层层递进, 从浅入深、由简到繁地组织教学活动和任务式学习等环节, 引导学生在不断的实践与探究中加深对知识的理解。以统编版小学语文三年级上册第五单元为例, 本研究构建单元整体视角下开展教学设计的框架(如图 1), 深入探讨如何通过框架进行教学设计实践活动, 充分发挥单元整体教学的优势, 帮助学生在语文学习中实现知识的持续深化和能力的全面提升。

一、分析单元教材, 创设单元主题情境

统编版语文教材采用以主题为核心的单元结构, 每个单元通过精选多篇相关文本, 彼此相互联系、相互补充。这种设计使学生能够在一个单元中循序渐进地理解和掌握某一语文知识点或者该单元的语文要素, 同时通过不同文本的对比和结合, 理解并感受特定的思想情怀和价值观。这种单元整体式的教学安排, 不仅凸显了语文作为工具的实用性, 还突出了语文作为人文载体的深刻价值, 最终有效促进了学生核心素养和语言运用能力的全面发展。

统编版小学语文教科书三年级上册第五单元为全册教材中出现的第一个“习作单元”, 与其他常规单元编排略有不同, 其目的在于改变传统编排的以“阅读”为中心的编排体系, 一方面培养、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 另外一方面突出“阅读指向表达”的功能, 在教学中关注从阅读中学习如何表达, 为习作服务。因此引导学生写出符合本单元习作要素要求的文章, 是本单元的核心目标所在。由此, 在以“习作表达”为导向的基础上,

基金项目: 本文系武汉市教育科学规划 2021 年度课题““双减”政策背景下小学成长性作业设计与评价研究”的成果。课题批准号: 2021C085

作者简介: 余一夫(1997—), 男, 湖北武汉人, 武汉市恒大城学校教师。

赵曼(1992—), 女, 湖北孝感人, 武汉市恒大城学校教师。

彭凤(1978—), 女, 湖北武汉人, 武汉市恒大城学校副校长。

本单元编排了六大板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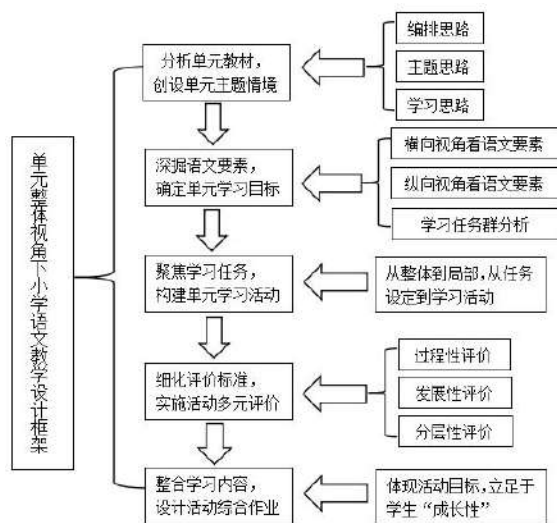


图1 单元整体视角下小学语文教学设计框架

（一）编排思路——读写一体化，环环相扣

“单元导读页”作为本单元提纲挈领的内容，高度概括了本单元的人文主题以及语文要素，让学生在学习之前能做到心中有数，大致明白本单元的学习重点与需达成的目标。“精读课文”作为本单元开篇的第一部分，与常规单元的精读课文略有不同，更加侧重于本单元的习作，对于课文内容理解与生字新词的习得不作过多要求，而是引导学生在阅读的基础上学会各种观察方法，进而学会如何表达自己的观察所得。“交流平台”在厘清精读课文的重点基础上，归纳出了具体的方法。“初试身手”顾名思义，其实是本单元习作的一次“前瞻性小练笔”，学生在习得本单元习作方法的基础上，初步进行片段式练习，从而能够及时发现问题，查漏补缺，积累经验。“习作例文”为学生提供了观察与习作的范例，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习作的难度。“习作”则作为最后的“检验篇”，学生在前期学习的基础上进行构思与表达。

（二）主题思路——课标系统化，层层推进

本单元的主题是“留心观察”，单元中的课文都是以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动物、植物、景物或者一些生活中的场景为描写对象，突出了“观察”的重要性。《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对于“观察”非常重视，高屋建瓴式地对“观察”提出了分学段的具体要求：

表1 “观察”主题不同学段要求

学段	具体要求
第一学段 (1~2 年级)	(1) 表达与交流：对写话有兴趣，留心周围事物，写自己想说的话，写想象中的事物。在写话中乐于运用阅读和生活中学到的词语。 (2) 梳理与探究：观察大自然，热心参加校园、社区活动，积累活动体验。结合语文学习，用口头或图文等方式整理、表达自己在活动中的见闻和想法。
第二学段 (3~4 年级)	(1) 表达与交流：观察周围世界，能不拘形式地写下自己的见闻、感受和想象，注意把自己觉得新奇有趣或印象最深、最受感动的内容写清楚。 (2) 梳理与探究：结合语文学习，观察大自然，观察社会，积极思考，运用书面或口头方式，并可尝试用表格、图像、音频等多种媒介，呈现自己的观察与探究所得。
第三学段 (5~6 年级)	(1) 表达与交流：养成留心观察周围事物的习惯，有意识地丰富自己的见闻，珍视个人的独特感受，积累习作素材。

（三）学习思路——方法综合化，井井有条

本单元的两篇精读课文《搭船的鸟》《金色的草地》和两篇习作例文《我家的小狗》《我爱故乡的杨梅》贴近儿童生活，以日常生活中的动物、植物和场景为描写对象，进行了细致的、连续的观察。^[1]从四篇

文章中，提炼出了供习作所用的“观察”方法。

表2 本单元课文学习内容、观察对象与方法

学习内容	观察对象			观察方法
	动物	植物	场景	
《搭船的鸟》 《金色的草地》 《我家的小狗》 《我爱故乡的杨梅》	翠鸟 小狗	蒲公英 杨梅	窗前草地 翠鸟捕鱼	细致的观察：翠鸟、小狗、杨梅 连续的观察（注意事物的变化）：草地颜色变化 多感官观察：杨梅的形状、颜色与味道

二、深掘语文要素，确定单元学习目标

本单元的阅读要素与习作要素分别是“体会作者是怎样留心观察周围事物的”与“仔细观察，把观察所得写下来”。

（一）横向视角看语文要素——“逐步推进”

本单元的学习内容，是按照学生的实际学情来进行编排的，属于“逐步推进”。首先引导学生根据单元导读页的内容走进“留心观察”这个主题单元。其次通过《搭船的鸟》介绍了观察方法，从动态和静态两个方面进行了留心观察，观察了翠鸟的外形以及捕鱼时的动作；通过《金色的草地》又介绍了连续观察的方法，以发现事物的变化。进而通过“交流平台”和“初试身手”总结了方法，拓展了用“五感”来进行观察。最后通过“习作例文”来进行范例梳理，以及落实到“习作”板块。由此可见，本单元将“留心观察”主题逐步推进加深，拓展多种观察方法，给学生在观察时提供具体可行的“支架”。

（二）纵向视角看语文要素——“稳步上升”

统编小学语文教材对“观察”这一语文要素也进行了多次的编排，但并不是简单地重复与罗列，而是“稳步上升”的过程，体现了教材对于此语文要素内容的深入挖掘与学习的循序渐进的过程。

表3 整册教材中关于“观察”语文要素的编排情况

册次	单元	语文要素
三上	第五单元	体会作者是怎样留心观察周围事物的。 仔细观察，把观察所得写下来。
三下	第一单元	试着把观察到事物写清楚。
	第四单元	观察事物的变化，把实验过程写清楚。

从三上第五单元的“体会作者是怎样留心观察周围事物的”“仔细观察，把观察所得写下来”中可以看出，三年级上学期主要是引导学生初步接触“观察”，开始“留心观察”，对“观察”产生兴趣，并试着写下“观察所得”，三年级上学期主要是培养学生“观察兴趣”和初步的“观察意识”。三下的第一单元开始“试着把观察到事物写清楚”，第四单元“观察事物的变化，把实验过程写清楚”，在上学期奠定了兴趣的基础上，三下开始侧重于尝试“写清楚”，开始培养学生“观察能力”。四上的第三单元“进行连续观察，学写观察日记”，提出了要求学生学会“连续观察”并能够通过日记的形式表现出来自己的观察所得，更加注重了学生的“观察习惯”。

从三年级上学期到四年级上学期，从学生的“观察兴趣”到“观察能力”，最后形成“观察习惯”，一步一步形成了一脉相承且“稳步上升”的过程。本单元注重留心观察更是一切的基础，只有有了留心观察的兴趣，才能够进行更为细致的观察，而细致观察更需要多角度、调动多种感官。

（三）学习任务群定位分析以及本单元学习目标

本单元旨在引导学生通过观察，发现身边的“美”，并能感受自然的“美”，激发学生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感情。正好符合“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学习任务群中的“阅读描绘大自然、表现人类美好情感的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尝试用文学语言表达自己的热爱自然、珍爱生命的情感。”基于本单元的语文要素和人文主题，结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可以将本单元定义为“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学习任务群，本单元学习目标可以确定为：

1.运用学过的识字方法认识本单元的生字，正确匀称地书写生字以及词语。

2.品读课文，想象画面，感受作者语言表达的特点，通过自己的朗读来表现作者描写的事物之美，并主动积累自己喜欢的词句。

3.通过描写翠鸟的语句，了解“我”对翠鸟的外貌、动作所作的观察，感受“我”观察的细致，初步体会留心观察的好处；能说出草地的变化情况及其变化的原因，体会“我”观察的细致以及连续观察。

4.能结合课文内容，进一步体会作者观察的细致，梳理总结留心观察的好处；初步了解可以调动多种感官进行观察，并初步能够写一写自己在生活中的观察。

5.借助例文，学习范例，初步了解本次习作“好”的标准与要求。

6.能继续仔细观察一种动物、植物或一处场景，把观察所得写下来。能展示观察所得，与同伴分享自己的观察感受。



图2 学生对于“观察”语文要素习得情况

三、聚焦学习任务，构建单元学习活动

统编版三上第五单元聚焦于“观察”这个学习主题，基于上述的教材分析、语文要素分析、学习任务群定位分析以及单元学习目标，并根据以“学生为学习的主体”的指导原则，我们以“童眼观万物，万物皆为美——招募‘寻美’小小观察家”单元整体总学习情境，设计了三个任务、九个子任务以及若干活动，使本单元的教学内容更加聚焦，重点更加凸显，具体本单元整体教学设计框架如下：

表4 三上第五单元整体教学设计框架

单元主题情境	学习任务	任务设定	学习活动	学习内容	课时安排
童眼观万物，万物皆成趣——招募“寻美”小小观察家	1.体会作者是怎样留心观察周围事物的。 2.仔细观察，把观察所得写下来。	任务一： 童眸感 美， 微观世界 大发现	子任务一：发布招募令，“寻美”观察家 子任务二：细致观翠鸟，感知细节美 子任务三：连续观草地，感悟变化美	单元导读页 《搭船的鸟》 《金色的草地》	4-5
		任务二： 童眸探 美， 梳理交流 有方法	子任务四：梳理交流，须重视观察 子任务五：拓展方法，多角度观察	交流平台 初试身手	1
		任务三： 童眸绘	子任务六：范例先行，积累观察素材	习作例文 习作《我们眼中的	2

美, 观察记录 共分享 任务四: 童眸寻 美, 日常趣味 会捕捉	子任务七: 下笔绘写, 表达观察之美	缤纷世界》	
	子任务八: 评选“寻 美”小小观察家	讲评习作 实践活动: 观察记 录东西湖的“美”	2

四、细化评价标准，实施活动多元评价

（一）过程性评价贯穿始终，及时了解学情

在教学活动实施中，过程性评价通过动态监测、实时反馈和阶段性分析，形成对学生学习进展的持续追踪。教师或组织者可通过课堂互动观察、作业完成质量、小组合作表现、阶段性测验及学生自评互评等多元方式，实时捕捉知识掌握程度、技能提升状态及态度变化。例如，在给学生播放动画时，教室要及时鼓励学生，无论是学生有丰富的课外知识知道这是翠鸟，还是学生能够对翠鸟的外形、颜色等进行描述，或是提出自己对作者写法的质疑，教师都应及时进行评价。

通过及时反馈与针对性调整，既能发现个体学习盲点，例如有的学生不认识翠鸟，不知道怎么进行观察，从哪些角度入手，教师可以进行提示“颜色、外形、动作”等并提供精准支持，又能优化教学策略、平衡进度安排，确保“教”与“学”始终同频共振，最终实现从“结果导向”向“成长导向”的转变，帮助学生在课堂上初步学会如何进行观察。

（二）发展性评价多方关注，全面了解学生

发展性评价以学生成长为核心，通过学校、家庭、同伴及学生自身等多主体协同参与，形成多维度的观察与反馈网络。教师可结合课堂表现、项目实践、学科素养发展等纵向追踪学业进步，在本单元的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感知到事物的“变化”。家长通过日常行为观察、兴趣探索等反馈非学业领域的成长，在生活中学会观察树叶的变化，天空的变化，家人的变化等。同伴互评则聚焦合作能力、社交情感等隐性素养；学生自评则引导其反思目标达成与自我认知。同学之间互相交流自己的发现，交流自己观察的方法。同时，教师还借助成长档案袋、动态跟踪报告等工具整合数据，辅以个性化访谈与案例分析，既关注共性发展规律，是否掌握了基本的观察方法，又尊重个体差异，在本单元的学习之后，自己有了哪些方面的进步，最终通过“诊断-反馈-改进”循环，助力学生实现知识、能力与人格的全面发展，做学习和生活中的有心人，在生活中学语文，在生活中用语文。

（三）分层性评价关注差异，提升成长动力

分层性评价基于学生个体差异，通过科学分层、动态对标与个性化激励，激发不同能力层级学生的内在潜能。教师可根据学情诊断（如前置测试、能力分析）将学生划分为基础层、发展层与挑战层，并制定差异化的目标体系与评价标准：

1、基础层：聚焦知识巩固与习惯养成，采用“小步渐进”评价，强调进步幅度与努力程度；本单元学习中，学生的基础型学习任务是进行观察，并分享自己感悟。

2、发展层：注重能力迁移与综合应用，通过项目式任务与开放性评价引导深度思考；在课堂上给学生时间交流自己的观察，分享观察的好处。

3、挑战层：侧重创新突破与高阶思维，引入跨学科探究或社会性实践，以成果影响力为评价重点。本单元给学生安排的挑战性学习任务是进行写作，写出自己的观察，运用所学习到的方法把自己在生活中观察到的细节用语文文字表达出来，并写出变化。

同时，建立“动态升降机制”，定期根据阶段性表现调整层级，避免标签固化；结合“分层任务卡”“阶梯式积分榜”等工具，让每个学生清晰感知成长路径。通过分层不分割、竞争有协作的设计，既缓解“统一标准”带来的挫败感，又唤醒学生“踮脚摘桃”的进取动力，实现从“横向比较”到“纵向超越”的成长转型。

五、整合学习内容，设计活动综合作业

（一）立足语文要素，形成作业的整体性

语文作业设计应以语文要素（如语言运用、思维能力、审美创造、文化自信）为核心框架，打破碎片化练习模式，构建“目标-内容-任务-评价”一体化的系统。例如，围绕单元主题整合基础积累（字词句段）、阅读理解（文本分析、信息提取）、表达实践（写作、口语交际）与拓展探究（文化链接、跨学科迁移）四类任务，通过“阶梯式编排”实现从知识内化到能力进阶的闭环。例如，学习“留心观察”单元时，基础层作业可聚焦细节感知与表达感悟，发展层设计“梳理交流+多角度观察”，挑战层延伸至“下笔绘写，表达观察之美”，使作业既紧扣语文要素的层级要求，又通过主题统整实现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同时，融入过程性评价（如思维逻辑、语言表现、文化感知），帮助学生明晰能力生长点，让作业真正成为语文素养落地的桥梁。

（二）搭建真实情境，强化作业的实践性

语文作业的实践性应通过真实情境的创设，将语言学习与生活体验、社会参与深度融合，让学生在“用中学”“做中悟”。本研究以“童眼观万物 万物皆成趣”为主题情境，贯穿整个单元教学，通过展示丰富多彩的自然图片、播放有趣的动植物视频等方式，营造了浓厚的学习氛围，成功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探究欲望。例如：

1、链接生活场景：设计“连续观草地”“感悟变化美”任务，引导学生运用记叙、说明等文体记录真实感悟；

2、搜集生活素材：开展“积累观察素材”活动，锻炼信息搜集整合与逻辑表达能力；

3、聚焦任务驱动：以“评选‘寻美’小小观察家”为驱动任务，推动语言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协同发展。

同时，通过“情境化评价标准”（如语言適切性、问题解决效度、社会价值体现）和“实践成果展示”（如评选“寻美”小小观察家），让作业从“纸面练习”升维为“行动研究”，既激发学习内驱力，又培养知行合一的语文素养。

（三）联系生活实际，突出作业的综合性和实践性

阅读是吸收，学生通过阅读积累语言经验，获得审美体验，得到思维训练和思想启迪。语文学习始于阅读，但不能终于阅读，而要落实到语用功能上来。学生在语用实践中梳理、整合，进一步掌握和巩固语言文字的运用规律，从而锻炼正确、规范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三上第五单元作为小学阶段的第一个习作单元，更加侧重于为“写作表达”服务，因此本教学设计设置了多个“动笔”环节，让学生能够通过观察来表达观察所得，从精读课文、交流平台到初试身手，再从初试身手到习作例文，最后到习作，实现了“习得”与“表达”的良性循环。通过本单元整体设计，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和阅读素养，更是引导学生在积极的语文实践活动中积累、建构文化自信，提高思维能力和审美能力，并在真实的语言运用的实践中学会运用、表达语言。

活动综合作业的整体性、综合性与实践性特征，始终贯穿于学生“发展”的全程，共同铸就了学生“成长性”的多维图景。整体性体现为对知识体系、核心素养与价值观念的系统建构，使学生在认知结构、情感态度与社会适应性三方面形成有机统一，此次“评选‘小小观察家’”既是对小学阶段学生核心素养之审美创造的培养，又能很好地体现了语文运用的功能，从而让学生提升审美热爱生活，适应社会。综合性通过语文学科思维整合与真实情境的创设，推动学生实现从单一技能到多元能力的跃迁，学生观看视频、图片，在生活中实地观察感悟，最后进行语言表达和交流，很好地综合了语言素养在语文和生活中的运用，训练和提高了学生们的听说读写能力。而实践性作为知行合一的枢纽，通过观察、感悟、收集资料等，将抽象的审美感悟转化为鲜活的生命经验。三者互为支撑，着力于关注学生的“成长性”，使成长性突破线性发展的桎梏，在螺旋式上升中呈现出认知深化、人格完善与社会责任觉醒的协同进化，最终塑造出具有终身学习力与完整生命形态的新时代人才。

新课标的推行对教学课程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尤其是在教学设计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中，单元整体教学作为一种创新性的教学模式，逐渐成为教师的首选。单元整体教学注重知识的融合互渗，在促进不同模块与要素融合的同时，可以促进学习方式的变革。^[2]在这一模式下，教师以教材中的单元内容为基础，

围绕明确的主题和语文要素，结合具体的教学目标和学生实际情况，将原本分散的教学要素有机融合。这种设计方式通过对教学内容的系统规划和整合，确保了教学的连贯性和完整性，避免了传统教学中知识点零散、缺乏联系的不足，从而实现了教学效果的最大化。因此，一线教师应该深耕单元整体教学设计研究中，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对小学语文单元整体教学设计的框架和实践进行更新完善，发挥单元整体教学的最大功能和价值，让其成为语文教学的支架，推动语文教学的深入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 [1] 黄国才. 统整阅读与习作 整体提升习作单元教学质量——统编版小学语文三年级上册第五单元教学建议 [J]. 新教师, 2019, (06): 18-20.
[2] 蒋翠梅. 新课标下的小学语文单元整体教学设计 [J]. 亚太教育, 2024, (20): 169-171.

Research on the Framework and Practice of Elementary Chinese Instructional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it Integrated Teaching: Taking the Fifth Unit of Grade Three of the Compulsory Textbook as an Example

Yu Yifu¹, Zhao Man¹, Peng Feng¹

¹ Wuhan Hengdacheng School, Wuhan, China

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curriculum has brought profound changes to teaching courses, especially in terms of teaching design, which has raised higher requirements. Among them, holistic unit teaching has emerged as an innovative teaching model. Teachers, based on the content of the textbook units, focus on clear themes and language elements, combining specific teaching objectives and students' actual conditions to organically integrate previously scattered teaching elements. This study takes the fifth unit of the first volume of the unified compilation of elementary school Chinese in the third grade as an example. It constructs a framework for teaching design based on the holistic unit perspective and conducts in-depth discussions on how to carry out teaching design and step-by-step practical activities through this framework. The goal is to help front-line elementary school Chinese teachers better understand teaching design from a holistic unit perspective,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front-line elementary school Chinese teachers.

Keywords: Unit Integrated Teaching; Elementary Chinese; Instructional Design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3.757

规范与美德之间：公德与私德中的“德”及其现代伦理重构

魏士雅¹

(¹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中国 100080)

摘要: 对“公德”“私德”的讨论自梁启超以来经久不息, 基于现代性的理解, 需要区分两种道德已是共识, 如此才能使社会有序发展。“公德”的“德”不管从利群的道德价值观、国家公民道德还是社会公德, 都是在规范的意义上展开的, “私德”的“德”有作为规范的部分, 也有作为美德的部分。对于“公德”“私德”中的规范性内容, 以伯纳德·威廉斯的观点来看是一种奇特的建制, 这确实是不可忽视的一点, 可是从他关注的自我的角度出发, 仍然可以为“公德”“私德”之“德”的规范性内容辩护。

关键词: 公德; 私德; 规范; 自我

自梁启超以来, 对公德与私德界线划分的讨论成为伦理学关注的重点之一。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国人的日常多是依据“三纲五常”、“家国天下”的思想来引领。但是近代以来, 中国传统社会遭到了西方思想的冲击, 现代意义上公德与私德的划分引起重视。学界多以不同的生活领域来和不同类型的伦理对象来区分公德与私德, 也就是, 私德是个人独处时的行为, 只影响到自己, 公德是与公共空间接触产生的行为, 会影响到别人。这种区分具有鲜明的现代性特征, 是基于现代对公私领域的划分。

中国自近代以来重政治公德而轻个人私德的偏向造成了公德、私德的失衡, 不管是从古今之变的角度还是中西之争的角度, 亦或是“家天下”的框架下去讨论造成这种失衡的原因, 都说明“公德”的“德”是一种规范意义上的“德”, 是对规则的尊重, 但是“私德”的“德”究竟是规范意义上的“德”还是美德意义上的“德”, 还值得讨论。

一、对“公德”的划分

对“公德”的讨论有一逐渐演变的过程, 但这期间的讨论都是以一种现代重视规则的社会制度背景下来对其划分, “公德”的“德”偏向是规范意义上的“德”。

1、由利群的道德价值观向国家公民道德的转变

梁启超在《新民说》第五章讨论了公德的问题, 认为“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 公德的主要性质“以利群二字为纲”, 这里的群不单指一个团体或者群体, 而是国家。简单说公德就是个人对群体、对国家的道德, 梁启超在群己之辩的基础上提倡对公德的重视, 认为“我国民所最缺者, 公德其一端也”。他将公德分为家族伦理、社会伦理和国家伦理, 强调个人对群体、社会以及国家的责任和义务, 要培养国民公德。梁启超意在培养公民对集体服从的意识, 实际上就是一种对规则的尊重, 以建立国家的治理秩序。

关于梁启超所说的中国古代重私德轻公德这一点, 陈来认为这是一种误解, 中国古代公德多是要求士大夫的, 不是对百姓的要求, 而且梁启超提倡的国家意识、进取精神、权利思想、自由精神、自尊合群、义务思想这些都不属于道德², 但此处二位学者争论的背景是不一样的, 公德既然是一种现在的概念, 用这一概念去划归中国古代的道德要求本身就有可能存在歧义, 而且公德作用的对象是一个群体内所有的成员, 也就是公民, 不像古代有等级的划分, 另外, 陈来认为梁启超提倡的不属于道德, 更多是因为二人对“公德”的“德”含义的理解不同。陈来认为德性和德行是有区分的, 德性与伦理也是有区别的, 这都是需要厘清的概念, 以此为基础中国古代的德行可分为三类: 个人品格、人伦伦理以及基本道德; 中国古代的德性可分为四类: 性情之德、道德之德、伦理之德、理智之德。³而中国古代的公共行为更多表现为“礼”, 也就是一种规范性要求, 和“美德”的“德”有区别, 陈来因此认为梁启超没有对此分辨清楚。

新中国成立以后, 国民公德受到重视, 如《共同纲领》中所说: “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规定了公德的重要性, 要“尊重社会公德”。陈来认为“五爱”公德是政治性公德, 是一种公民道德, 而《宪法》中提到的社会公德属于社会性公德, 是公共道德。之后在公德的发展上, 公民道德被强调地更多, 都没有脱离以“五爱”

作者简介: 魏士雅 (1994—), 女, 甘肃兰州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

² , [M], : . . . , 2019 p.44-45.

³ , [M], : . . . , 2019 p.82-90.

为基础,陈来再次强调厘清概念的重要性,也就是区分公共道德和公民道德,而不是一味地强调和发展政治性公德,造成公德问题上的失衡,同时也造成公德私德问题上的失衡。¹这种失衡体现在,公民道德确实可以作为一种规范来要求人们遵守,可以很好地处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可是个体之间的公共道德部分就很难处理了。

2、基于社会生活的社会公德

李泽厚提出我们的社会需要某种客观性的要求,起到的是建构性作用,即“社会性道德”。他继承康德对伦理本体的解释,重视自由意志的力量和崇高价值,认为其特征是“人意识到自己的个体性的感性生存与群体社会性的理性要求处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之中,个体最终自觉牺牲一己的利益、权利、幸福以至生存和生命,以服从某种群体(家庭、氏族、国家、民族、阶级、集团、宗教、文化等等)的要求、义务、指令或利益。”²因此存在某种普遍的伦理原则,无关个体状况,要求每个群体成员坚决执行,在一定的时空中是绝对的存在。这种普遍伦理原则的来源是“可无限延长的人类总体”³,是“与政治哲学相关的社会性道德,它是建立在现代个人主义和社会契约基础上的自由、平等、人权、民主,以保障个人权益、规范社会生活”⁴。同样,陈来还是认为李泽厚的论述中有概念混淆之处,也就是李泽厚所说的诸如行为和制度之类的不能称之为道德,而且他所说的公德或者公共理性更偏向政治价值,而不是个人道德。既然李泽厚所说的社会性道德更偏向社会秩序和政治体系,那么这种社会性道德接近中国传统社会的“礼”,以一套行为规范来约束大众的行为。在陈来看来,教化体系、政制体系、法律都不是德。那么,守“礼”算不算“德”呢?陈来对“礼”的定义是“一套生活的规则体系”,其本质是实现一种非法律维持的社会组织方式。《论语·为政》有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让社会知礼、遵礼,用礼来规范社会能够起到安定社会的作用,“礼”最终归结为行为规范、社会规范。如果“德”的定义是依照社会规范来行为,那么守“礼”就是一种“德”。

很多学者尝试从儒家伦理中汲取与现代社会公德的相融之处。廖申白在《公民伦理与儒家伦理》中认为“公民道德”的提法不恰当,应该用“公民伦理”来替代,因为我们的日常交往实际上是在处理各种关系,伦理就产生于由自然原因和法律原因而确定的各种关系中。源自自然原因的关系是私人范畴,法律只在必要的时候起作用,出于法律原因的关系是一种无差别、自愿交往的关系。公民伦理在廖申白看来与法律的关系密切,是一种交换的伦理,诉诸尊重的态度而不是感情。虽然儒家伦理中隐含着关于公共生活的推论,如:“每个人作为宇宙、自然与人类的一份子,都分有它的普遍原理,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反求于己而通达‘仁’来‘成为人’,这个人可以把他的感情推广到他原本不爱的人与事物上。一个人只要反求内心而获得仁的品质,就不会仅仅爱其父母,而且在公共的生活中爱一般的人。”但是这一推论的前提存在一定的问题,也就是假定人性是简单的,然而人性是多变且复杂的,道德虽发生于自然,却形成于习惯。张舜清认为现代社会公民伦理的本质要求是公共精神,其主要体现在公共生活之中,强调公民超越对自我的关注而关注他人,是“伴随着现代公共生活出现与公民身份的认定而养成的自觉遵守行为规范的气质”。要论公民伦理和儒家伦理的相通之处在于道德评价方面,也就是二者都有将国家、民族置于个人、家族之上的道德理念,如果一个人为了己私利不履行对伦理共同体的责任义务,会被认为是自私的。但是二者的区别也十分明显,儒家伦理产生的背景与现代公民伦理不同,它源自严格的宗法等级社会结构,而现代公民伦理强调的是在一个平等环境下公民权利和义务的统一。郑少卿认为现代公民伦理的特质是人的主体性、自主性和作为前提条件的平等性。与之前两位学者不同,郑少卿看到了公民伦理与儒家伦理的共生之道。在我们用西方现代性思想规范社会的同时也要看到它的弊端,即对自我的过度关注和社会认同的矛盾,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社会人,我们大多数情况下都需要来自集体的认同来完善自我,可是在强调权利和义务的背景下,过度关注自我有可能会造成社会认同的缺失。那么儒家伦理这种“为己之学”,恰好可以弥补西方现代性的弊端,它“强调人的本性,人的内在精神,强调道德主体的自觉的、主动的道德行为以及内在的道德动机”。

陈来对“公德”一词进一步辨析,认为应该分成两层意思来理解,即公民道德(国家对公民的政治要求)和公共道德(现代社会公共生活的规范要求),诸如自由、民主一类的政治价值应该从公德的概念里刨除。⁵这里借用翟学伟的《中国人的价值取向:类型、转型及其问题》一文中关于中国人价值取向的历史脉络的观点。和讨论公德、私德问题一样,价值取向问题最终要探索的是人怎样生活才能幸福的问题,但是,在西方标准的划分并不完全贴合中国社会的问题。中国社会经历了上古时期的宗教意识取向(因人类对自然的困惑和敬畏产生的类似于宗教的思想、感情与行为)、古代的伦理取向(由“礼”的完善而产生)、近代的文化取向(东西文化冲突与交互下产生)、现代的政治取向与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取向(经济发展带来的人们对个人经济利益的觉醒和对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的关注与投入)。这几种价值取向随着时间的推演逐步向下一个阶段演变,但又不完全消失,以一种积累的状态持续存在,其中有一种贯穿始终的价值取向,就是社会取向,也就是“社会成员对社会交往的重视,或者在价值上认定通过社会交往可以更容易地获得人们

¹ , [M], : . . . ,2019: p.66-80.

² , [M], 2010: p.4.

³ , [M], 2010: p.7.

⁴ . [M]. , 2002: p.372.

⁵ , [M], : . . . ,2019: p.31.

所追求的社会资源”¹，所以中国人较为根本的价值取向还是要在社会取向中找寻。相对于过去社会结构严格制约着价值观念的导向，现代社会的多元性特征更加明显，这也是这篇文章中提到的积淀下的多元，即一个时期只有一种价值取向会站稳脚跟，影响大众的选择，但是之前几个时期的价值取向都潜伏下来，只不过会在某一时期重新被关注。回过头看陈来的观点，我认为政治价值是不需要从“公德”这一概念的内涵中排除出去，因为“公德”作为有规范作用的价值导向本身就内含有政治价值，它与“公德”中其他部分一起作为价值导向规范着社会生活，共同维系群体关系。

二、“私德”之“德”的辨析

与“公德”之“德”普遍意义上在于规范不同，“私德”之“德”的界定有两种可能，即规范的和美德的。在讨论“公德”与“私德”之“德”的规范性及美德性之前，需明确二者的哲学分野。“规范性”（Normativity）源自义务论传统（如康德伦理学），强调道德作为普遍规则的外在约束性，其核心是“应当做什么”。例如，公德中的“遵守交通规则”或“爱护公共财物”即属于规范意义上的道德要求，体现为对社会秩序的服从。“美德性”（Virtue）则根植于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学，关注“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即通过培养内在品质（如仁爱、正直）实现道德完善。例如，私德中的“孝顺”若仅以履行赡养义务为限，可视为规范；但若包含发自内心的敬爱之情，则属于美德。二者的理论边界在于：规范以行为是否符合规则为评价标准，而美德以行为者的品格动机为评价核心。在公私道德中，公德更偏向规范（如法律义务），私德则兼具规范（如家庭责任）与美德（如真诚待友）。需注意的是，儒家伦理中“礼”与“仁”的互动正体现了规范与美德的融合——守礼是外在规范，行仁是内在美德。

1、作为“规范”的私人伦理

边沁在讨论“私人伦理”时是为了解决界定法律作用范围的问题，认为“私人伦理”在指导个人行动的范围内有有效。这里可将“立法”看作一种公共事务，它“教导的是组成一个共同体的人群如何可以依凭立法者提供的动机，被驱使来按照总体上说罪有利于整个共同体幸福的方式行事。”²按照功利原则要求的伦理就是以产生利益相关者最大可能量的幸福为目标来指导人们行为的规范标准，这套标准也成为衡量一个人幸福的标准，一个人幸福与否“首先取决于他的行为当中仅他本人与之有利害关系的部分，其次取决于其中可能影响他身边人的幸福的部分。”³因此，也可以说在指导个人行为范围内履行对自己的义务就是私人伦理，只关涉自己而非他人的幸福。立法虽然听起来有强制的作用，但并不能无时无刻指导共同体内其他成员的生活，但是私人伦理可以，如果一项私人行为对自己以及共同体内其他同类的总体幸福有所增益，就应该这样做。在刑法起到的作用有限或者无效的地方，需要私人伦理来调和，但是这种调和力如果仅有一个自己规定的约束力，并不能起到让每个共同体遵守的力量。所以，即便是私人伦理，也需要在其中注入力量来加强它的效能，这样才能真正让它和法律一起作用于共同体。例如法律之外的道德谴责，关于这一点争议较多，但不得不说这是一种软约束力，如果真的在社会上消除这种一约束力，最终会损害到法律的效力，保证它的约束力可以让人们有了自发抵抗的自觉性，当然道德谴责也需要一定的规范，划定其界线，保证不会变成道德绑架等情况，让其往对多数人有利的方向发展。总的来说，私人伦理最终要达到的效果就是每一个人可以依据自发的动机，使自己能够按照最有利于自身幸福的方式行事。

密尔认为的个人自由“必须不使自己成为他人的妨碍。但是如果他戒免了在涉及他人的事情上有碍于他人，而仅仅在涉及自己的事情上依照自己的意向和判断而行动，那么，凡是足以说明意见应有自由的理由，也同样足以证明他应当得到允许在其自己的牺牲之下将其意见付诸实践而不遭到妨害。”⁴人的自由发展应该是也必须是人类的福祉之一，是人的特权，也是人的应当条件。但是一个人的行为一旦和他人有关并有损害他人利益，社会就可以介入干涉，不管是法律还是舆论的惩罚，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拥有在社会层面的平等和私人领域的完全自由。虽然密尔不断强调他说的个人道德只关涉自己，可是真正只和自己相关的行为又有多少呢？似乎他在论述个人享有的完全自由，但是又通过各种外围的规定性约束着个人道德发挥作用的的空间，例如“人类彼此之间应当相互帮助来辨别好与坏，应当相互鼓励来选取前者而避开后者。他们还应当永远相互砥砺，使其较高官能获得愈益增多的运用，使其情感和志趣愈益指向聪明的而非愚蠢的、升高的而非堕落的目标和计划。”⁵从人的自利本性出发，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的福利关注更深一些，意图从社会层面去断绝是不可能的。而且在界定是否与他人有关不在于一件事的起源而在于结果，就是说，一个人可以听取或者受到他人的影响，但最终他做决定的自由是属于他自己的，只要这个决定和他人不相关。但是，边沁又说他并不是表示“无论某人个人方面的品质或缺陷怎样，他人对他的观感都不应受到影响。这是既不可能也不可取的。如果他在助成自己好处的品质方面有杰出的地方，他在这点上就是理所应当的赞美对象……如果他在那些品质方面有重大的缺陷，他人自然就随着产生一种与赞美相反的情操。”⁶即便一个人在只和自己有关的领域内自由行事，他真的不关注外界评价的可能性较小，行动者当然可以不在意这些外界的评价，但是如果他想避免负面的评价，那么“预先警告他不要再弄出他已经容易遭受的其他不愉快的后果，

¹ 边沁：《法律、政治及经济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9(04):p.123.

² 边沁：《法律、政治及经济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2011：p.361.

³ 边沁：《法律、政治及经济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2011：p.351.

⁴ 密尔：《论自由》，商务印书馆，2007：p.66.

⁵ 密尔：《论自由》，商务印书馆，2007：p.90.

⁶ 密尔：《论自由》，商务印书馆，2007：p.91-92.

也就算给他一个帮助。”¹行为者任意行动而招致他人贬低的话,例如“表现卤莽、刚愎、自高自大,不能在适中的生活资料下生活,不能约束自己免于有害的放纵,追求兽性的快乐而牺牲情感和智慧上的快乐”²,他是没有权利抱怨的,除非“他以特殊优越的社会关系赢得他们的好感,从而具备资格博取他们的有益效劳,而不受他自身缺点的影响”³。因此需要通过外围的规定性来约束个人的行为,既保证行为者自由的发展,又让其在对最大多数人有利的道路上发展。所以这种规定性怎么起作用呢?就是一种来自社会的训练和教育,使共同体成员成为能够为遥远动机作合理考虑的人,能够做出正确选择的人,由此,行为者在只关涉自己的领域就获得了自由,因为不需要社会层面通过强制的手段,人们还是能很好地生活,做出正确的决定而不为自己招来非议,这种情况下的行为者不会觉得有什么强制的力量让自己不能自由快活地生活。

2、从儒家伦理中汲取的“私德”观念

李泽厚对道德的定义是从文化心理结构的角度出发的,即认为道德是个体对社会人际关系在行为上的承诺和规范,他的“两德论”中的“德”是以这个基调展开的,这并不是指道德是某种具有强制性的规定,而是行为者在认识、理解、判断等知性因素作用下自觉意识到的。李泽厚没有完全用“私德”一词来描述和个人有关的道德,而是用“宗教性道德”一词,代表的是“自己选择的终极关怀和安身立命,它是个体追求的最高价值,常与信仰相关联,好像是执行‘神’(其实是人类总体)的意志”⁴。它表现为绝对的,实际并不像社会性道德那样要求每个人都遵守,把人生意义、个体价值等置于一种绝对命令之下以“取得安息、安顿、依存、寄托。人生在世,就在于尽此义务,以做上帝的忠实的仆人,或作慈父良母孝子贤孙。”⁵这种道德在选择了它的人心中具有不可抗拒、无可争议的规定性和规范性,人们会自觉遵守来实现人的存在价值。它虽然叫“宗教性道德”,但不仅仅指宗教信仰,包括一些个体追求的崇高人生意义和生活价值,都同样以规范性和规定性制约着人的内心世界和行为活动。按照李泽厚对道德的理解,道德是“维系群体人际关系的原则、准绳,它是一种逐渐形成并不断演化、微调以适应不断变化着的生存环境的产物,成为一种非人为设计的长久习俗。”⁶“宗教性道德”也是在不断变化中,由某一时空内的“社会性道德”变成了具有普遍性的信仰和情感依托。在现代社会两种道德必须要加以区分的背景下,“宗教性道德”只能起到范导作用,而非建构作用。而传统儒家对现代社会性道德的范导性作用在于“将个人基础上的理性原则予以适度‘软化’,即以‘情’来润‘理’”⁷,用传统的“仁义”感情和“天地国亲师”的信仰去润滑和引导现代生活,来作为个体安身立命的私人道德,除去部分被法律强制要求的,例如赡养父母等,可凭个人选择和决定,而不是绝对奉行。陈来批评李泽厚的“宗教性道德”的叫法容易“把普遍伦理原则与宗教信仰相混同,把宗教的特征赋予普遍道德原则”⁸,因为绝对伦理不可能是个人的主观选择,这确实是李泽厚在概念上有可能引起的一些混乱,但是他想要表达的东西不难理解,作为超越时空的某些信念和信仰,和宗教是具有相似性的,“宗教性道德”也可以理解为类似于宗教的道德,对于选择它们的人来说具有绝对性,是绝对伦理。

陈来认为私德就是人作为“人”的道德要求⁹,提倡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善人品德”和儒家的“君子德行”。他将当代中国个人生活所需要的德行分为三组¹⁰:

仁爱、道义、诚实、守信、孝顺、和睦;
自强、勤奋、勇敢、正直、忠实、廉耻;
爱国、利群、尊礼、守法、奉公、敬业。

其中前两组就是“私德”,儒家称之为君子德行,即将成为君子作为人生目标来追求。与西方政治思想强调权利义务不同,儒家强调的是“社会共同的善、社会责任、有益公益的美德”¹¹。儒家伦理不能简单地归为规范伦理学或者美德伦理学,因为它既看重行动,又看重行动这的心德,儒家伦理中的很多东西不是任何一种理论可以完全覆盖的。而且儒家伦理中德性与德行也是不分离的,是一个统一体,行为是内在品质的体现。不但中国古代儒家伦理不会脱离行为和规则而只重视内在品质,美德伦理也不是只讲内在品质的而不重视动机等问题,因为不管是追求“成为有美德的人”还是“成为君子”,都不止关注有哪些德性,也会关注怎么做,儒家关注的“不是判断原则,而是实践原则,礼是判断原则,仁和君子不是,古代德行的概念表示人的道德性质和行为的道德性质是合一的。”¹²儒家伦理也不是强调一种时刻关注“正当”和“正确”的生活,而是追求“以‘高尚’‘君子’人格为整体的伦理学形态”¹³。虽然儒家伦理包含一种狭义的美德伦理,因此儒家伦理

- | | | | | |
|----|---|------|--------------|---------------|
| 1 | , | [M], | ,2007: p.92. | |
| 2 | , | [M], | ,2007: p.93. | |
| 3 | , | [M], | ,2007: p.93. | |
| 4 | , | [M], | | 2010: p.12. |
| 5 | , | [M], | | 2010: p.22. |
| 6 | , | [M], | | 2010: p.24. |
| 7 | , | [M], | | 2010: p.54. |
| 8 | , | [M], | | 2010: p.197. |
| 9 | , | [M], | : . . . | ,2019: p.267. |
| 10 | , | [M], | : . . . | ,2019: p.270. |
| 11 | , | [M], | : . . . | ,2019: p.271. |
| 12 | , | [M], | : . . . | ,2019: p.291. |
| 13 | , | [M], | : . . . | ,2019: p.294. |

不能完全归为美德伦理,陈来的观点是要继续“保持着以德性伦理的视角对中国古代伦理进行研究的空間”¹,并用“五个统一”来掌握儒家伦理和美德伦理的关系,即“德性与德行的统一,道德与非道德的统一,公德与私德的统一,道德境界与超道德境界的统一”²。但是在当代社会,只是一般地重视德性伦理并不能解决现实问题。道德和道德意识也是需要区分的,道德是“社会行为的规范要求”,道德意识是“社会规范要求反映或内化于人心的意识状态”³,也可以说是合乎道德而行动和出于道德而行动的区别。合乎道德的行动的动机不是道德,但是最终结果是在社会规范的框架内的,即便出于其他动机,也不能说是不道德的。君子品格看重的是超乎道德的心性品格,是就内心而言的,这种超道德的追求也是超出一般社会规范的要求的。也就是说,儒家伦理是作为规范和美德的统一体,充分认可规则的重要性,其在私德的构建中也是必不可少的,但私德应该是作为对人自身品质的一种规范性要求。但这种规范性又不是绝对的存在,而是基于德性基础上来理解和认可规则的重要性,要做一个有道德又不止有道德的人。

如果私德可以说追求君子德行,那么君子德性可作为对个人的更高要求,放在私德的范畴里会有要求过高的倾向,其更适合归为《礼记·中庸》中所说的“大德”。所谓“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圣人之道是个人道德修养的至高要求、终极目标,养成“大德”而打通前往圣人之境的道路。

私德是否可脱离规范而存在?这一问题需通过中西理论的对话澄清。边沁的“私人伦理”强调行为对幸福总量的功利计算(如“赡养父母可增进家庭幸福”),密尔的“个人自由”则将私德限定于仅关涉自身的领域(如“选择独身生活”)。二者均以规范(功利原则或自由边界)作为私德的基础,隐含“无规范则无私德”的逻辑。儒家虽承认私德中的规范(如“礼”对孝行的要求),但更强调通过“仁”的内在化(如“色难”⁴)将规范升华为美德。例如,“孝”不仅是履行义务(规范),更是“发乎情”的情感表达(美德)。由此可见,私德的本质并非“是否依赖规范”,而是“规范如何与美德互动”。边沁、密尔以规范划定私德边界,儒家则以美德赋予规范意义——后者为私德提供了更完整的伦理框架。

依据以上分析,“公德”和“私德”之“德”均有或部分有规范的含义。本文接下来将阐述伯纳德·威廉斯对规范伦理的批判,并试图回应这一批判。

三、对“公德”“私德”之“德”的反驳以及回应

重视道德的优先性这一伦理进路在伯纳德·威廉斯看来是错误的,它并不是相对于其他关切具有绝对的优先性,规范伦理也不能涵盖所有复杂的伦理生活。他称现代道德是一种奇特的建制,它总是以一种普遍性的姿态超越个体考虑,而要求我们以道德圣人为目标和美好图景去追求,这无疑是将个人的愿望降到最低而使行动者失去了最基本生活的根本要求。威廉斯认为好的生活不是总是考虑“我”应该怎么做,而是要审思“好的生活是什么”,这首先要从“我是什么样的人”出发来审思,我们完整的人生考虑不应限于道德方面的考虑。

1、怎样拥有个人的整全性?

威廉斯认为,所有行动的理由都是内在的。对于行为的内在解释最简单的模型为:A有理由做某件事,当且仅当A有某个欲望,通过这样做,A就可以使得这个欲望得到满足。而这种行为的内在理由陈述是可以通过慎思推理发现出来的。A有理由做某件事并不是说A有总体上包含一切的理由要采取行动做那件事,而是说,作为达到目的的因果手段,做某件事必须与“主观动机集合”⁵中的某个要素相联系,除非做那件事情本身就是对欲望的直接实现,而那个欲望本身就是“主观动机集合”中的要素。但是,简单地发现某个行动过程是达到目的的因果手段,并不是实践推理的一部分。只有经过一系列慎思之后,如:如何组织“主观动机集合”中的要素,要素之间冲突时哪个要素占最大份量等,行动者可以看到,他有理由做他原先并不认为他有理由做的事情。也就是说,慎思这个过程会给“主观动机集合”添加要素,也有可能剪除某些要素,即反思的过程可以辨别信念的真假,让行动者意识到他其实没有理由做他原本认为有理由去做的事情。由这样一个不断添加、剪除的过程可以看出,“主观动机集合”不是被静态地给出的,慎思的过程会对其产生影响。

由于“欲望”能表示“主观动机集合”中的所有要素,同时这个集合中包含评价的倾向、情感反应模式、个人忠诚以及各种各样的计划等一切被抽象的认为体现了行动者承诺的东西,因此,威廉斯用“欲望”来讨论“主观动机集合”。但是提到欲望,就很容易涉及到利己主义的元素,威廉斯在这里先假设一个人具有各种非利己主义的计划,这些东西是可以提出行动的内在理由的。这个集合中也很可能包含“需要”,如果确实存在着一些可以被明确认识到的需要,那么就存在着这样一个行动者,他对他确实需要的东西不感兴趣,甚至在慎思过后还是不感兴趣,这里不能说他是因为持有虚假信念而对他需要的东西缺乏兴趣的。据此,可以说他确实没有理由追求那些东西了。但这建立在两个强有力的假定的基础上,首先,这个行动者不是因为持有虚假的信念,其次,他不可能通过慎思在他所具有的动机中达到这样的动机。事实上这两个假定的发生几率很小。例如,一个人对维持自己的健康没有兴趣,即使经过慎思后还是一样,但有时我们却认为他有理由服用他需要的药物,因为我们认为实际上在某个层次上他必定想要生活的好。我们之所以坚持说那一个人有服药的理由,必定是基于另一个层次上或者说另一个意义上来说的,即,外在的意义。

1 , [M], : · · ,2019: p.300.

2 , [M], : · · ,2019: p.300.

3 , [M], : · · ,2019: p.301.

4 “ ” . “ ”

5 “ subjective motivational set ”

外在的意义,也叫外在理由陈述,意思是,不管行动者的内在动机如何,这种陈述都可以是真的,行动者最终会被激发做某件事。但是在威廉斯看来,除了促使一个行动者采取主动行为的那些东西外,没有什么其他的東西能够成为他行动的理由,即使外在理由陈述确实是真的,也需要某种心理联系,也就是信念,来作为行动的理由。也就是说,如果行动者相信关于他自己的外在理由陈述,那个事实才有可能有助于说明他的行动。如果脱离“存在着一个要A做某件事情的理由”这种形式去考察具体的外在理由陈述的话,会发现存在一些情形:行动者做某事是因为他相信自己有理由那么做,但却不相信这个理由是什么。必定会有一种情形,就是行动者做某件事情仅仅是因为针对某个确定的考虑,他相信那个考虑构成他做那件事的理由。

威廉斯正是想从“为什么一个行动者会最终相信这样一个陈述”这个问题来揭示外在理由陈述的古怪性。对威廉斯来说,只有那种能激发行动者做出某种行为的事物才能作为解释行动的理由,再者,外在理由是独立于行动者本身具有的动机的,所以外在理由需要一些其他的要素来解释行为。依照外在理由行动的行动者必须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假设获得一个动机和最终相信一个理由陈述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就是信念。即使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使行动者最终具有那个动机,也相信那个理由陈述,但这些在威廉斯看来都是错误的手段,假设外在理由确实构成一个行动的动机,并且行动者也相信这种行动理由,那么对于拥有这种信念的行动者来说,外在理由转化成了内在理由,外在理由不存在了,这是外在理由和内在理由的一个悖论。

通过这样一番论述,威廉斯想表达的是,一个人应该拒绝受到外在情况的影响,因为接受那些理由意味着那个人被迫按照某些外在的因素做决定,但那些因素只是偶然的影响因素而已,它们并不是行动者自己生活计划的构成要素。因此,行为的理由是内在理由,是主观赋予的,这种理由的陈述与行为者的主观动机集合紧密相关。按照这种论述,“公德”和“私德”中的规范性内容都不能成为一个人行动的理由,除非这些规范性内容就是行动者自己的内在理由,但是,如果不是出于某种特别的动机,正常人是不会将道德看作生活的目标的。威廉斯认为我们现在谈论的“道德”其实将“我应当怎样生活”这一问题扭曲成了“我应该怎样道德地生活”,“我”生活的目标不再是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而是如何符合社会期待地活着。似乎是“我”生活在这个社会环境中,就意味着要达成普遍的伦理规范对“我”的要求,他认为道德是一种奴役人的奇特制度:“道德内部有一种压力,要求我们去找出纯粹自愿的东西,把性情以及心理决定或社会决定统统抛开,然后把纯粹自愿的因素分离出来,以便把谴责与责任只施加于行为者自己做出的那部分,不多也不少,从而做到终极的公平。”¹道德总是要我们做选择,在两个极端中拉扯,可是中间状态却被忽视了,这才是值得过的人生会出现的地方,我们站在道德这一建制中完全看不到这些德性。

威廉斯想要表达的个人完整性固然是重要的,可又是不好实现的,我们很难摆脱规范的约束而完完全全由自我的角度出发去生活。当然,厘清“自我”的问题,也就是回答“我是谁”、“我要怎样生活”等问题有助于获得好的生活,那么从“自我”出发能否为“公德”“私德”中的规范性内容找到合理性呢?

威廉斯提出的“主观动机集合”批判了规范伦理对个体完整性的忽视。他认为,行动理由必须内生于个体的欲望、情感与承诺(如“我想成为有完整性的人”),而非外在强加的普遍规则(如“你必须遵守公德”)。这一观点对公私道德的规范性提出了挑战:首先,若公民仅因法律威慑(如罚款)而遵守公德(如不乱丢垃圾),其行为缺乏内在理由,本质上是威廉斯所反对的“外在理由陈述”。只有当公德规范(如环保意识)被内化为个人价值观(如“我认同可持续发展”),才能成为真正的道德行动。其次,私德若仅作为规范(如“必须赡养父母”),可能沦为机械义务;但若以美德(如“因感恩而尽孝”)为内核,则符合“主观动机集合”的内在驱动。儒家伦理中“仁”的实践(如“孝悌为本”)恰体现了这一点——通过情感教化(而非规则强制)将规范转化为美德。因此,公私道德的合法性需以“内在理由”为基础:公德应通过教育引导公民认同公共价值(如“利群”),私德则需在规范中保留美德生长的空间(如“修身成仁”)。

2、“自我”对整全人生以及“公德”“私德”的完善

现代心理学中关于自我的划分有四种:无目的的自我(the diffuse self),私我(the private self),公我(the public self)和群体我(the collective self)²,其中无目的的自我是指一种非常原始的自我,是一种不把自己和他人区别开来的情况,这种自我可以称为一种享乐主义的自我,它不是一个适当的自我任务,因为它不预设自我意识,比如新生儿的行為主要是为了满足某些诸如吃饭、睡觉等享乐冲动。“私我”更在意个人成就,这种成就是由自己的标准衡量的,较少受到他人评价的影响,独立于他人,会产生长期的目标和理想,以及责任感。“公我”对他人的评价很敏感,并寻求获得他人认可,相当于是一种社会认可,即通过与他人交换关系获得信任,或者通过遵守期望、要求来实现,努力保持与外部环境的一致性,努力获取更高的社会接受度,在满足这个自我任务的过程中,不能假定公我采纳了其他人的价值观、规则或态度。“群体我”关注的是集体成就,致力于实现群体的目标并充实自己,它采纳了其他人的价值观,并寻求实现群体的目标,代表着重要参考群体的目标、规范和期望的内在化。³当一个人意在得到他人的认可时,便会努力实现公我,当一个人极其在意是否最大多数人得到最多好处这件事时,就会努力实现群体我。对于某些特

¹ [] . [M]. ,2017 p.233.

² Breckler S J ,Greenwald A G ,Motivational facets of the self .In :R M Sorrention ,E T Higgins ed .Handbook of motivation and cognition :Foundations of social behavior[C].New York :Guiford Press,1986:p.147.

³ Breckler S J ,Greenwald A G ,Motivational facets of the self .In :R M Sorrention ,E T Higgins ed .Handbook of motivation and cognition :Foundations of social behavior[C].New York :Guiford Press,1986:p.148.

定的人或情况来说,一些自我任务可能比其他任务更重要,例如一些人认为,实现个人成就、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很重要,但仍然要努力实现群体的目标,使群体利益最大化。对于在特定情境下行动者认为哪种自我任务更应首要考虑,还是要依情境以及行动者自己的性格来定。当行动者处于一个有其他人存在的境况中并被要求做出一定反应时,公我就会显现,否则,行动者会更关注私我。当个体的努力容易被识别出来的时候,行动者更倾向于促进群体的利益。

通过这种划分,自我与他人建立了某种联系,以身体为边界将三种自我清晰明了地划分成了两个阵营,其中“私我”和“公我”是同一范围中的两个方面,“群体我”处于另一边,实际上它也是以个体为基础的,个体通过认同群体的目标和规范形成了“我们”这一概念,也就是说,个人愿意把群体的目标和规范视为自己的目标和规范,或者说,只有认同群体,个人才能实现那些仅靠自己无法实现的目标。¹这种划分也类似于陈来的“四分法”框架,即“自我——他人——政治——社会”²,该框架可粗略分为个人道德与社会道德,都是从自我出发而对规范的认同与服从。由此,在道德之外关注行为者的整全性和在道德以内完成对“自我”的认同并不矛盾。

威廉斯对“道德建制”的批判与儒家伦理的实践智慧存在潜在对话。例如,威廉斯的“完整性”与儒家的“君子人格”,威廉斯主张道德应服务于“我是谁”的整全性,而非割裂的规则服从,儒家强调“君子不器”(《论语·为政》),即人格的全面发展而非工具化道德。二者均反对将道德简化为外在规范,但儒家通过“礼乐教化”将规范与美德统一,为威廉斯的“内在理由”提供了文化实践路径。又比如,“主观动机集合”与“心性修养”,威廉斯认为慎思可修正动机集合(如反思“我为何要爱国”),儒家则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大学》)实现内在道德觉醒。这种类比表明,公私道德的规范性若能与个体的心性成长结合,便可缓解威廉斯所批判的“道德压迫性”。

参考文献:

- [1] 陈来.儒学美德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 [2] 李泽厚.伦理学纲要[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
- [3] 李泽厚.历史本体论[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 [4] 廖申白.公民伦理与儒家伦理[J].哲学研究,2001.
- [5] 张舜清.从“公共精神”看儒家伦理的现代转型[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 [6] 郑少雄.从美德到权利——儒家伦理与公民伦理的异质及其共生之道[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7] 翟学伟.中国人的价值取向:类型、转型及其问题[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1999(04):118-126.
- [8] 贾太宏.礼记通释[M].西苑出版社,2016.
- [9] [英]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M].商务印书馆,2011.
- [10] [英]密尔.论自由[M].商务印书馆,2007.
- [11] [英]伯纳德·威廉斯.道德运气[M].徐向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 [12] [英]伯纳德·威廉斯.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M].陈嘉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 [13] Breckler S J, Greenwald A G. Motivational facets of the self. In: R M Sorrentino, E T Higgins ed. Handbook of motivation and cognition: Foundations of social behavior[C].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86.
- [14] 杨宜音.自我与他人:四种关于自我边界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述要[J].心理学动态,1999.

Between Norms and Virtues: The Concept of "De" in Public and Private Morality and Its Modern Ethical Reconstruction

Wei Shiya¹

¹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China

Abstract: Discussions on "public morality" (公德, gongde) and "private morality" (私德, side) have persisted since Liang Qichao. Based on a modern understanding, there is a consensus that distinguishing between these two forms of morality is essential for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 "virtue" (德, de) in "public morality" operates within a normative framework, whether viewed through the lens of Liang Qichao's collective-benefit moral values (利群), national civic morality, or social public morality. In contrast, the "virtue" in "private morality" encompasses both normative dimensions and elements of virtue ethics. From Bernard Williams' perspective, the normative content within "public morality" and "private morality" constitutes a peculiar institutional construct—a critical observation that cannot be overlooked. However, by grounding his analysis in the concept of the "self," Williams' framework still offers a defensible rationale for the normative aspects of "virtue" in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moral systems.

Keywords: Public Morality; Private Morality; Norms; Self

¹ 杨宜音.自我与他人:四种关于自我边界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述要[J].心理学动态,1999:p.59.

² 陈来.儒学美德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p.98.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3.768

译者行动论视域下的科技翻译教学策略研究

祁心¹

(东北大学, 辽宁 沈阳 110891)

摘要: 译者行动论对于科技翻译教学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在译者行动论的指导下, 教师要着眼于制定新的教学策略, 以培养翻译学习者对翻译目的的把握、专业技术知识的学习、从名称和概念上掌握术语、在模拟翻译发生环境的情况下获取实战经验以及学会利用平行文章, 旨在全方位提升翻译学习者的多种能力。

关键词: 功能主义翻译; 译者行动论; 科技翻译; 翻译教学策略

近年来, 随着学术界对翻译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 译学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特别是针对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功能主义翻译理论作为 20 世纪影响最大的翻译学学派之一越来越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然而, 对翻译理论的研究除了推动翻译学科发展和指导翻译实践外, 还应该在翻译教学实践中得到应用。传统的翻译教学重视语言的转码和语际之间的对应关系, 却忽视了对译者语言能力外其他能力的培养。译者行动论是功能主义翻译理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将译者作为翻译的行为主体, 置于整个翻译过程的核心, 并且提出了译者除语言外应具备的各项能力。笔者试从译者行动论的视域出发, 结合翻译教学实践, 探讨译者行动论指导下科技翻译教学中的一些策略。

一、译者行动论概述

译者行动论是芬兰籍德国人贾斯塔·霍尔兹·曼塔莉 (Justa Holz-Mänttari) 在 1984 年发表的著作《译者行动: 理论与方法》(Translatorisches Handeln: Theorie und Methode) 中首次提出的。其目的在于“为专业译者提供一个理论基础和观念框架作为他们的从业指南。”^[5] 译者行动论和翻译目的论同属功能主义翻译学理论, 曼塔莉和翻译目的论的创始人弗米尔 (Hans J. Vermeer) 的观点也有很多一致之处: 弗米尔将翻译看作一种有目的性的跨文化交际行为^[6]; 曼塔莉将翻译的原文视为一种信息载体, 翻译行为本身也不再是将一种语言转化成另一种语言的转码过程, 而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而翻译行为所产生的译文也被视为“能够在特定语境和情景中发挥功能的文本”^[5]。曼塔莉将译者本身视为“专家”, 应具备“专家能力”^[2], 包括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面对多种可能性做出合理决断的能力。此外, 译者还必须就各种存在的翻译可能性与翻译委托者进行商议与合作。曼塔莉认为, 译者要与翻译委托者就需要何种译文、在何种条件下完成译文以及为了何种目的等要点达成一致。

由此可见, 翻译是一种“复杂的行动”^[2], 其发生的环境千变万化, 而译者作为行动的主体必须以专家的能力应对这一挑战。

二、译者行动论与科技翻译的适用性分析

科技翻译的原文是专业文章, 多由专业语言撰写, 德国学者福卢克 (Hans-Rüdiger Fluck) 为专业语言下了如下的定义: 专业语言是语言的一种形式, 主要应用在科技领域, 包含所有的语言的以及非语言的 (例如公式、图表等) 形式^[1]。这一点上, 科技翻译与普通语言翻译和文学翻译有着很大区别。在科技翻译中, 译者需要使用专业语言将专业知识信息翻译过来供读者理解。由此可见, 科技翻译的原文在提供信息方面尤为重要, 其主要目的就是“转达科技信息、传播科技知识、进行科技交流, 不折不扣地‘报道事实’, 确保

作者简介: 祁心 (1982—), 男, 辽宁铁岭人, 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

科技信息传递的真实性”^[7]。

科技翻译原文中包含的信息大多为专业技术信息，这一点对于译者来说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译者在懂得语言的基础上还必须对所翻译的专业技术知识有所了解，才能够真正做到曼塔莉对译者“专家行动”的要求。而作为科技翻译的原文也因作者的原因与其他题材文章不同，科技文章的信息作用决定了其在行文和修辞上的弱势，德国美因兹大学翻译学院学者霍恩海尔夫 (Brigitte Horn-Helf) 认为，科技类的文章并非作者本人意愿所写，而是依据科技产品的信息进行创作，时间可能比较仓促，于是难免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3]。作为“专家”的译者在这种情况下要“行动”起来，修正原文存在的问题，确保译文的质量。

综上所述，无论从原文的语言特征角度还是从文体特征角度来看，译者行动论是适用于科技翻译的。因此，在制定科技翻译教学策略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译者行动论的指导作用，将该理论对译者的能力要求融入到日常翻译训练之中，为翻译学习者日后的翻译实践打好基础。

三、以译者行动论为指导的科技翻译教学策略

(一) 译者行动的目的论视角：针对翻译目的的训练

与译者行动论同属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的还包括弗米尔的翻译目的论，其中有一个核心概念“Skopos”，源自希腊语，意思是目的、意图。翻译目的论的主要观点在于：翻译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翻译目的，翻译的目的决定了翻译行为的所有因素。而译者为了顺利完成翻译行为，也必须首先明确翻译目的。而“这种目的有三种解释：1.译者的基本目的；2.译文的交际目的；3.特定翻译策略或手段要达到的目的”^[8]。在翻译教学中，应首先训练翻译学习者对翻译目的的把握。

例如，同样翻译一篇技术资料，如果目的是为了翻译之后在科技杂志上发表，那么就应该采用大量使用专业术语的策略。同时根据译者行动论，译者也有义务与翻译委托人联系，获取发表期刊的详细信息和格式要求，以便在翻译过程中加以注意。而如果目的并非是为了出版，而是作为参考资料提供给工程师翻阅，那么译者的行动则是另一种情况。

在为翻译学习者制定练习任务的时候，应为每个任务增加一个翻译目的描述，尽可能多的提供相关信息，训练学习者对翻译目的的分析与训练。也可以采用一个文本多个目的的训练模式，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对句子“Das Auto verfügt über Allradantrieb.”进行翻译。目的一：为一位对汽车完全不了解的人翻译，使其了解这项技术。目的二：为一位“汽车迷”翻译，使他了解这个车。对于目的一，由于翻译目的的原因，需要增加一些信息，例如：“这辆车是四轮驱动，动力强劲。”而对于目的二，由于其对汽车非常了解，就没有必要添加一些辅助信息。

针对翻译目的进行训练，能够使学习者从一开始就把握翻译行为最根本的要点，更好地发挥译者作为“专家”的功能。

(二) 译者作为专家：专业技术知识的导入

如上文所述，科技翻译的原文多包含大量的专业技术知识，如果缺乏相应的专业技术知识，那么译者也就很难扮演“专家”的角色。在德国的专业翻译教育中，也十分重视专业技术知识的学习。德国美因兹大学翻译学院的翻译专业培养计划中就包含有多门专业技术知识课程，其中的科技类课程由相关专业的工程师任教，其目的在于使向翻译学习者能够学会处理这些专业技术信息的方式，以便真正以专家的身份来完成翻译行为。

虽然目前我国翻译教学很少能够为学生提供学习专业技术知识的条件，但是在翻译课程中可以导入一些专业技术知识。例如，在讲述汽车发动机翻译资料的过程中，可以向学生讲授四冲程发动机工作的基本原理、汽油机和柴油机的区别等相关知识。当然，这对任课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当然任课教师本身也应该是一名合格的翻译，一名“专家”，应该具备获取新知识并将知识传播出去的能力。

在科技翻译教学中导入专业知识，对于翻译实践来说有四个主要作用：“正确解读原文，避免译文误差；准确理解原文，增加译文精确度；发现原文问题，确保译文质量；细化多义词，提取真正含义”^[9]。

(三) 译文作为“再创造”的专业文本：名称与概念的同步训练

曼塔莉除了对译者的地位做了详细的阐述外，还将翻译过程视为一种“再创造”，而在科技翻译中，这种“再创造”的重点在于使用准确的名词术语将原文提供的信息依照翻译目的再现出来。在这一过程中，术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术语并非只是简单的名词，而是包含了名称和概念两个部分。名称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单词，例如“Auto”对应的汉语名称是“汽车”，而其对应的内涵描述：“由发动机驱动的交通工具等等”。在科技翻译的学习过程中必须将对词汇的理解上升到术语这个层面上来，也就是说将概念纳入到学习的范畴。这是因为科技术语

和日常单词不同,其对应的概念往往距离我们的生活较远,如果对概念不清楚,将影响对原文的把握,进而影响翻译的质量。例如,在学习“Viertaktotomotor”这个术语的时候,除了了解对应的汉语名称为“四冲程汽油发动机”外,还应对其概念有所了解,甚至了解其工作原理和构造。

在翻译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训练翻译学习者对所涉及的关键术语建立术语数据库,其内容除了名称之外还应包括概念,当然还可以包含一些扩展的内容,例如构造图解、有关原理的小视频等。教师也可向学习者推荐一些科普的入门专业书籍,通过阅读进一步掌握专业术语。

由于科技翻译文本是专业文本,术语运用的正确与否将大幅度影响译文的专业程度和质量。只有从名称和概念两个维度掌握一定量的术语,译者才能够真正以“专家”的身份对原文进行再创造,生产出高质量的专业文本。

(四) 翻译作为“复杂的行动”:翻译发生环境的模拟

在训练翻译学习者把握翻译目的的同时,还应训练其面对各种问题随机应变的能力。曼塔莉将翻译视为“复杂的行动”,译者将面对诸多可能发生的情况。

在翻译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翻译实践中的真实情况为学生模拟翻译发生环境。例如可以将学习者分组,确定小组中的一个人作为翻译委托者,委托其他成员一项翻译任务,其他成员根据翻译任务的情况与其探讨各项细节,并合作进行翻译。也可模仿翻译中的突发事件,突然改变翻译目的,或者增加翻译的内容。例如,翻译委托为一篇中文撰写的说明书,需要翻译成德语,用于在德国出售商品。在翻译过程中,委托者突然要求增加一段产品描述,而该产品描述带有巨大的文化差异,如果直接翻译将会给德方人员带来误会。

设计这种突发事件,能够为翻译学习者模拟一种真实的翻译发生环境,训练译者面对翻译这项“复杂的行动”如何随机应变,圆满完成翻译委托。

(五) 译者作为翻译行为主体:平行文章的使用训练

曼塔莉非常重视译者的行动,这种行动也包括译者为完成翻译委托而进行的资料查询,也就是所说的“做足功课”。而“平行文章”^[4]则是一种重要的翻译参考资料,指的是“与源语文章对应的目的语文章,所谓的‘平行’是指在双方文章的内容、场景或者行文规范方面有可比性,例如德语和中文的证书、说明书、商务信函、广告,它们的内容、目的性和行文规范都存在一定的对应性”^[10]。

随着中外交流的日益频繁,在翻译实践中例如证书、商务信函、使用说明书等应用型文体的翻译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一类文体的最大特点在于其格式和语言的规范性,读者能够直接从文章的整体外观判断出该文章的文体。因此,在翻译教学中训练翻译学习者使用平行文章是必不可少的内容,也是译者行动论指导下开展翻译教学的客观要求。在有关应用型文体的翻译实践教学中,教师应有意识地训练翻译学习者如何、在哪里寻找怎样的平行文章,以及如何使用平行文章。与学生探讨哪些翻译任务适合使用平行文章,哪些不适合使用。利用平行文章的情况主要有:“比较主题和条件相似的同类文章,分析文章的基本版块,找出他们的文体规范;比较原文和译文,对比语言和修辞的特点;比较同一片原文的多个译文,获取翻译技巧”^[10]。

英国著名科学家牛顿曾经说过:“我看得比别人远,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利用平行文章,可以使翻译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利用这种行动使复杂的翻译任务变得简单化、规范化。

四、结语

译者行动论将译者视为“专家”,其行为也是“专家行为”,利用这些行为来完成科技翻译这个“复杂的行动”。科技翻译实践中,由于其内容涉及大量的专业技术知识,恰恰需要译者充当这样的“专家”,而科技翻译教学就是培养“专家”的过程。因此,在科技翻译教学实践中,除了继续培养学生的语言翻译能力外,还应该着眼于非语言能力的培养。针对分析翻译目的的训练能为翻译实践提供一个基本核心,译者的行为也要围绕着这个核心进行。学习相关的专业技术知识能够促进译者对文章内容的把握,全方位提高译文的准确度和质量。从概念和名称两个角度掌握术语,能够使译者做到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对翻译发生环境的模拟能够使翻译学习者获取实战经验,妥善解决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使用平行文章改变了以往翻译行为对词典的依赖,进一步促进译者对翻译任务的整体把握。总之,译者行动论能够很好地指导科技翻译教学,开拓了新的翻译教学策略。

参考文献:

- [1] FLUCK H R. Fachdeutsch in Naturwissenschaft und Technik [M]. Heidelberg: Julius Groos Verlag, 1997.
- [2] HOLZ-MÄNTTÄRI J. Translatorisches Handeln: Theorie und Methode [M]. Helsinki: Suomalainen Tiedeakatemia, 1984.
- [3] HORN-HELF B. Technisches Übersetzen in Theorie und Praxis [M]. Tübingen und Basel: A. Francke Verlag, 1999.
- [4] KAUTZ U. Handbuch Didaktik des Übersetzens und Dolmetschens [M]. München: Indicium, 2000.
- [5] 卞建华. 传承与超越: 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 [6] 曹丽华, 王文斌. 景区公示语英文翻译失误分析: 目的论视角——以辽宁旅游景区公示语翻译为例 [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 39(1):161-164.
- [7] 贾文波. 应用功能翻译论 [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12.
- [8] 李红梅. 目的论视角下儿童文学的翻译 [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 39(4):112-114.
- [9] 祁心, 田博. 功能主义翻译学框架下的专业技术知识与技术翻译 [J]. 辽宁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 15(3):59-61.
- [10] 王京平. 新德汉翻译教程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8.

Research on Teaching Strategies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al Action Theory

Qi Xi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China

Abstract: Translational action theory holds significant guiding value for the teaching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translati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is theory, educators should focus on developing innovative pedagogical strategies aimed at cultivating learners' ability to: (1) grasp translation purposes, (2) acquire domain-specific technical knowledge, (3) master terminology through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4) gain practical experience via simulated translation scenarios, and (5) utilize parallel texts effectively. These strategies collectively enhance learners' multifaceted translation competence.

Keywords: functionalist translation; translational action theory;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pedagogy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3.764

现代社会演变的思想基础——从“存在的类比统一性”的观点看

林峰¹

(¹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海淀 100080)

摘要: 现代社会区别于古代社会有着诸多特质, 这些特质的演变乃是基于两希文明的相互交融完成的。而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便是中世纪晚期对于托马斯主义的“存在类比统一性”的哲学方案的解体, 缔造了对于人性和自然的新的眼光, 从而铸造了现代社会的哲学基础。本文试图分析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对于“存在类比统一性”的辩护, 反驳出发, 勾勒出古今之变过程中, 传统的托马斯主义如何解体, 以及如何形成了一种堕落的自由意志的人性观, 缔造了一种“异乡客”的我思理论, 最终建构了一个全新的“自然”概念, 为自然科学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关键词: 现代社会; 存在; 类比; 人性; 自然

一、引言

近代社会与古代社会的“古今之变”是全方面的。这种全方面体现为对于人的本性的探究之视角转移, 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被造物与上帝之间的关系的重新变更和确立。从而在这样的全方面变革下, 传统经院哲学家所描述的目的论秩序的世界图景, 逐步被机械论、原子论的图景所取代。传统的定性, 思辩的研究策略, 逐步被数学化、量化研究所取代。在人文领域, 传统以“自然正当”论证伦理准则的方式, 被强调“个人权利”的方式所取代。而这样的世界图景成为了每一个现代人的基本常识, 但是这样的世界图景的转移依然是一个疑问。为什么在中世纪晚期, 西方文明内部会出现这样一场深刻的变革? 这样的变革背后的思想基础和机制是什么? 要把握和解释这个问题, 我们就不得不植根于中世纪的神学背景中。唯有在这样的神学背景, 去思考上帝与被造物之间的关系才有可能领会古今之变背后的神学基础。所以在上述的讨论中, 无论是“人性本性”的视角变革, 还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界定, 最终都依然于被造物与上帝之间的关系的重新认定。而这种被造物与上帝之间关系的认定, 便取决于“存在论类比问题”的神学化探讨, 并且经由漫长的神学化探讨, 开辟了一条摧毁经院哲学的思想路径, 为近代社会的展开奠定了思想基础。因此本文的宗旨, 在于描述和解释这样的“存在论类比问题”是如何呈现, 如何在思想中被辩驳从而完成了一场存在论革命。在这种存在论革命的支配下, 如何展开了对于“人性”的视角的重新界定和变革, 进而转化为关于“自然”的眼光。从而一言以蔽之, 本文讨论的基本思想线索, 便是从“存在论类比”的神学化探讨, 一路延展到“人性”, 进而延展至“自然”问题的探讨, 从而提供“古今之变”的大略图景。所以, 我们首先需要探究何为存在论类比问题, 以及这个问题是如何被神学化探究的。其次我们以托马斯·阿奎那的存在论类比的讨论作为基础, 来探求经院哲学时期的主流思潮。接着, 我们探求中世纪的神学家和哲学家是如何反驳阿奎那的思想, 从而形成了一场存在论革命。在此基础上, 我们探求这样的存在论革命如何变化了人类对于自身的视角。最后我们探求这样的关涉于自身的视角变化, 是如何开辟了人类对于自然的重新认识, 从而为近代自然科学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神学视角下的存在类比统一性问题

关于“存在”的讨论中, 存在类比统一性的讨论是最为重要和核心的问题。

作者简介: 林峰 (1998-), 男, 汉族, 浙江温州人, 首都师范大学在读博士, 研究方向: 现代西方哲学。

所谓“类比”(analogy)，是由希腊文的 ana (起来) 和 logos (逻各斯，言说) 结合而成，指的是事物之间的比例，衍生为不同事物的类似和类比。而“存在类比统一性”的讨论，最初来源于亚里士多德在探究存在者的诸多意义。亚里士多德认为“存在者 (to on) 以多种方式被说出 (legetai)”，而通过归纳可以发现，存在者以四种方式被说出，分别是：按照偶性的存在、作为真的存在、潜能的与现实的存在以及按照诸范畴之模式的存在。

那么不免要问的问题便在于，既然“存在者”以多种方式被说出，那么是否存在着一种绝对的普遍性，促使它们的诸多意义在该绝对者这里被述说呢？因此面对存在的多重意蕴，是否存在着一种统一性的方式被述说呢？这种关涉于存在问题的探究方式，便被视为“存在的类比统一性”的方法，去寻求诸意蕴之上的绝对超越性。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他提出了两种类比：

1、比例类比。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以比例相似或外表相似的方式来述说。譬如说“在鸟身上为羽毛的东西，在鱼那里相应的是鱼鳞”（论动物部分，644a20）。这种比例类比的方式是相当粗浅和粗疏的，从而并不构成哲学的严肃讨论。

2、归属类比 (Analogia Attributionis)。亦即在诸存在者的意义之上回溯到一个绝对的超越者那里，以通过它的基本意义引导着其他意义的展开。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存在有多种意义，但全部都与一个本原相关”，这个统一的基础便被视为“实体”。他认为，

“尽管最初有许多意义，但实体在一切意义上都是最初的，不论在定义上、在认识上，还是在时间上。其他范畴都不能离开它独立存在。”（《形而上学》，1028b35）

于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他一方面把“存在”问题转化为范畴问题，另一方面将范畴问题归结为实体问题。让“实体”这个范畴充当着一切存在意义回溯的基点。而这样的回溯本身却是可疑的，即是说亚里士多德缺失了讨论何以能够将诸存在者的意义回溯到“实体”之根据的讨论。

而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存在的类比统一性”问题在基督教神学中进一步地展开。在基督教那里，问题转变为作为有限存在者的被造物的人类如何勾连着作为无限者和绝对者的上帝。早在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普罗克洛斯 (Proclus) 那里，类比开始被神秘化地去言说，以试图说明被造物何以能够言说神圣者，以及如何说明诸存在者之间的统一性。

新柏拉图主义的神秘化的言说，就为基督教所接纳。故而“存在类比统一性问题”以神学的方式显现出来，这样的显现将问题视角出现了转移，将问题的核心切换为上帝的超越性与内在性的矛盾问题。这组矛盾实质上集中体现了作为对绝对者追问的人的内在性与作为绝对者的超越性之间的矛盾。只不过这样的矛盾在中世纪哲学中是潜藏着的，它被神学化地描述为上帝的超越性与上帝的全在性的矛盾。

在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中，必须反对“偶像崇拜”，从而将上帝理解为一个绝对的，超越于世俗和自然世界的绝对者。另一方面，上帝与被造物之间不能是纯然分裂的，两者必然有着某种内在的勾连，促使作为被造物的人可以对绝对者有所发问，乃至有所信仰。

而这样的内在性与超越性的讨论，在中世纪哲学之中则表达为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的语言是否能够言说神圣者？我们的语言在运用于神圣者和被造物的时候，是否是一致的。如果是一致的，则暗示着上帝与被造物是没有区别的，上帝全在于被造物之中，不免陷入到偶像崇拜和泛神论之中，与上帝的超越性品格乃是互斥的。如果是不一致的，那么意味着上帝的内在性消失，作为被造物的人与上帝完全割裂，那么人何以能够认知言说上帝，与上帝发生勾连而产生信仰呢？

于是既不能过分强调上帝的“全在性”，又不能过分强调上帝的“临在性”，既要避免上帝的泛神论倾向，又要远离过分强调上帝不在任何地方而摒除全在的属性。既不能太过于字面化，从而单义性地言说上帝，又不能过于含糊和隐喻，从而歧义性地言说上帝。

于是上帝的内在性与超越性的问题，便表述为关于语言和语词的单义性和歧义性问题。亦即，语言的单义性和歧义性的讨论，映射着上帝的超越性和内在性的矛盾，进一步映射着人与上帝的关系，从而最终映射着那个形而上学命题，即诸存在者的存在意义的多重含义之源初统一性如何被领会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从文化学的考究上，就表达为两希文明在神学视角下的碰撞。之所以说这个问题乃是两希文明的产物，乃是因为就纯粹的基督教教义而言，是反对“偶像崇拜”，亦即反对一切试图将自然神化的倾向。上帝的最重要的特性，不在于上帝的内在性，而在于它的纯粹超越性。因此一种内在性维度的引入，本质上就是将古希腊文明中的“神人同形同性”的维度引入基督教，将传统的一神教模式注入了一种“人化”的特质。这种“人化”的特质，并不在于古希伯来文明内部，相反在古希腊文明中，这种人文主义早已表述在

神话之中。因此马克思在评注普罗米修斯的时候，援引了埃斯库罗斯的《被锁链锁住的普罗米修斯》中的一段名言说：

“哲学并不隐瞒这一点。普罗米修斯的自白‘总而言之，我痛恨所有的神’就是哲学自己的自白，是哲学自己的格言，表示它反对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是最高神性的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²

在普罗米修斯的神话故事中，已经蕴含着一种不屈服于神，强调人格的自决心的思想。

更为重要的是，古希腊文明的哲学思想，促使基督教的教义进一步被思辨化和概念化，从而将内在性与超越性的讨论，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基督教内部的神学问题，而获得了更为普遍性的特质。尽管在基督教背景下，这依然是一种神学外衣的讨论。

这样的张力，促使整个西方文明中就蕴含着古希腊强调理性、强调人的意义的人文主义思潮与古希伯来强调神的超越性和信仰至上的诉求在文明内部出现对立，冲突和融合。这种碰撞尽管表述为一种纯粹的神学问题和形而上学问题，但是两者之间的矛盾、调和和反驳，最终为现代社会开辟了思想道路。

尽管这是一个纯粹的神学讨论，但是上帝的全在性和临在性问题，背后则映射着人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的问题，所以对于上帝的神学化考究不得不转移到对于人自身的反思和剖析上来。从而上帝的讨论不得不让位于对于人性的探究。而对于人性的探究，就不得不界定“人”到底在存在论上处于何种位置，面对着“人”、“神”和“物”的关系中，如何界定“人”的位置。这样的思想线索，既牵扯到我们应该去如何领会和把握绝对者，也促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人面对着“物”该如何得以界定，从而如何领会物的意蕴，这便为自然科学的开辟奠定了一种思想的潜能。所以，讨论神学视角下的存在类比统一性问题，归根到底在于探究作为世俗时代的人类应该如何自处的问题。

三、托马斯·阿奎那的类比统一性学说

根据基督教的教义而言，上帝作为诸被造物的根本原因，亦即以存在论的言说方式便可以表述为，上帝充当着诸存在者的多重意义的统一的基点，也成为了回溯的根据所在。那么在阿奎那这里，上帝作为造物主和万物作为被造物之间以何种方式显现自身？

这个问题在语言就被表达为，言说上帝的谓词与言说诸万物的谓词之间是单义还是歧义的。由于上帝的全在性和临在性的双重特性，以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为代表的主流天主教教义，既否认言说的单义性，也否认言说的歧义性。亦即，阿奎那既想要维护上帝的内在性维度，又想要维护上帝的超越性维度。

为了解决这样的矛盾的局面，阿奎那只能设想作为原因的上帝和作为结果的被造物之间存在着一种“存在的类比性”，即我们可以从被造物出发通过回溯原因与结果的相似性根据，来言说上帝。不难看出，阿奎那采取了一种折衷的思考方式，试图调和单义性和歧义性，内在性和超越性，全在与临在之间的矛盾。

所以在阿奎那看来，“说受造物因在形式上相通而相似天主，不是依照同样的类和种之理或本质，而只是依照类比，这是说天主因自己的本质而为物或存在者（自有物），而其他物却是因分有而为物或存在者。”³。这样一种强调存在物与上帝的相似性的特点，实质上是为了说明上帝与被造物之间存在着内在性的勾连，也正因为存在内在性的勾连，作为被造物的人才有望可以发问，信仰上帝。

而经由这样的相似性，阿奎那采取了“赋予存在”这个术语，来说明万物之间的存在程度之多少来形成一种从万物直至上帝的存在序列。因此阿奎那将上帝的临在性与“赋予存在”或“去存在”（To be）联系起来，以说明任何的万物都被上帝赋予了存在，它们分有了上帝的存在。从而，任何万物越是接近于上帝，它们的本质越显露出存在，而真正的存在便是上帝，即一种纯粹的“存在”行动。这种纯粹的存在行动，便是上帝以临在性的方式，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使得万物臣服于上帝的力量。

故而通过“存在的类比”，就调和了上帝的临在与全在，内在与超越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又表达为单义和歧义的讨论。故而阿奎那相信对于上帝的言说，既非纯粹单义性的（Univocally），也非纯粹多义的（Equivocally），而只能是类比的（Analogically）。

故而同一个谓词，当它用于上帝和用于万物的时候，既非说明这个谓词在两种情况的意义是一致的，也非说完全不一致，而只能依照一种分有和类比性来述说。譬如说以“善”为例，当它用于上帝的时候，乃是说上帝比一切被造物都要更完美，故而这样的“善”只能是“善本身”（Good）。当它用于一般的被造物时

候, 依照不同的等级序列, 其善的程度也有所变动。这样的言说方式, 就为阿奎那试图论证上帝提供了方便。

所以, 每种事物的“是其所是”构造了一个连贯的存在序列, 它们之间互相分歧, 另一方面, 无论这样的序列多么含糊, 它们毕竟都在表象着上帝的单纯的统一性。

因此在阿奎那看来, 对于上帝的言说唯一正当的方式只能是“类比性的”。以所谓上帝的全在性为例, 当我们说“上帝是无所不在的”, 绝不能将其领会为上帝是泛神论的, 而只能领会为不同事物, 由于它们的本质或等级的不同, 决定了上帝在事物中的存在程度的不同。上帝对事物的直接性是依照存在的模态衡量的。所以阿奎那所设想的宇宙, 便是一个杂多中统一的宇宙。

而阿奎那这种试图调和的路径, 接纳亚里士多德关于“存在的多重意义的统一性”的讨论, 这样的努力势必是可敬的。但是这样的调和却必然蕴含着矛盾, 内在性和超越性的矛盾, 全在性和临在性的矛盾和单义性与歧义性依然根植于基督教教义和两希文明内部, 故而这样的矛盾的展开, 必然促使阿奎那哲学的解体。而阿奎那哲学的解体, 就促使“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格局的出现。因为阿奎那哲学代表着一种试图调和两希文明的努力, 而这样的努力是不可能实现的, 因为内在性与超越性的矛盾始终存在。

这两种不同的思潮共同瓦解了阿奎那哲学, 也瓦解了主流的托马斯主义, 从而为现代文明的百家争鸣的格局开辟了道路。

四、单义性革命与“类比”的崩溃

在托马斯·阿奎那的论证中, 他试图利用“存在类比统一性”调和上帝的内在性与超越性两种矛盾的维度, 调和歧义性和单义性。但是这样的努力虽不可谓不敬, 但是思想内在的矛盾依然存在, 并且必然转化为一种现实的思想。而在这里, 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路径, 一则基于上帝的超越性拒斥上帝的内在性, 强调上帝言说的单义性特质。一则基于上帝的内在性拒斥上帝的超越性, 倾向于一种泛神论路径。两者都试图把内在性与超越性, 单义性和歧义性的冲突, 坍塌为单义性诉求。这两种不同的思想路径, 从两个方面瓦解了托马斯主义缔造的主流思潮。

(一) 超越性拒斥内在性: 唯名论革命

反托马斯主义的主力, 便在于中世纪晚期的唯名论者。唯名论者反对任何的歧义性地言说。他们否认任何共相的真实存在。亦即他们反对任何的内涵实体, 而是将一切的概念区分为“外延性”和“内涵性”, 前者关涉于具体的, 个别的存在物, 后者关涉于间接的实体与属性的描述。而唯有前者是正当的, 因为唯有前者是直接性地被给予给我们, 从而不需要任何共相的存在。

而在这样的重新论断中, 势必会威胁“上帝存在”的命题。为了调和唯名论与上帝存在的关系, 唯名论者倾向于将上帝理解为一种偶然的, 意志性的上帝形象, 而非托马斯主义者所设想的理性的上帝形象。因此在唯名论者看来, 自然的秩序不再是所谓“存在之链”, 从而丧失了阿奎那试图论证的自然秩序的稳定性和正当性。相反唯名论者普遍相信, 由于上帝是偶然的, 是意志性的, 而上帝的全能性与自然秩序的理性化论证恰好是冲突的。亦即, 上帝可以随意地改变我们所处的世界秩序, 我们所处的世界秩序只是相对和偶然的产物, 而非必然的产物。所以, 只要上帝愿意, 上帝可以随意地改变我们的世界, 这就是上帝的绝对可能性。

这样一种基于上帝的全能性缔造的体系, 有力地解构了托马斯主义所设想的理性秩序, 亦即瓦解, 动摇了阿奎那试图辩护中世纪生活方式的合理性。这为后世的思想家提供了一种思想解放的契机, 让我们去设想一种不同于中世纪生活方式的新的可能性。

而从“存在的类比统一性”的角度来审视唯名论者的主张, 实际上唯名论者强化了上帝的超越性意义, 弱化了上帝的内在性意义。譬如说, 当我们说“上帝是无处不在”的时候, “无处不在”这个谓词在说什么? 或者说当我们说“存在在....之中”又在说什么?

在邓斯·司各特 (John Duns Scotus) 那里, 他强调所有的实体应该被个体化理解, 上帝应当知晓任何的情况。故而司各特区分了两种“全在性”, 一种基于上帝的全能属性和绝对力量的全在性, 一种是基于本质和临在的无处不在。通过这样的区别, 目的在于突出绝对力量的意志。

而在司各特之后的唯名论者威廉·奥卡姆 (William Ockham) 认为, 这个词的意义是“存在于他物之中并且不远离他物, 或是不远离该物的任何东西, 无论该物或者该物中的任何东西身处何处。”⁴, 即是说上帝存在于某物中, 此处的“存在”与所谓的空间无关, 上帝可以随意地在任何地方又同时不在任何地方, 所以上帝

存在于所有“处所”之中。只不过阿奎那以类比的方式去理解“处所”，而在奥卡姆这里，所谓的“处所”已经是非空间性的，目的只是为了强化上帝的全能性和超越性。

唯名论者强化了上帝的超越性，目的在于述说“存在”这个概念，绝不等同于任何种属关系之中，相反应当超越于种属关系之外的绝对性。进而唯名论者非常强调上帝的绝对自由意志，从而肯定了世界的偶然存在。如司各特认为，偶然性乃是第一原因，而因果关系则是第二性的，因为上帝完全可能改变我们所处世界的因果关系。

其次，唯名论者的观点否定了任何等级秩序的存在，相反在上帝之下一切事物都是平等的个体，个体之间的关系只能是外在的、偶然的、直接性的。基于这样的形而上学的讨论，所带来的政治上的变革乃是革命性的。一个重要的革命成果，便在于神学与哲学的分裂，进而导致了神学、哲学和经验科学的分裂。

以奥卡姆为例，奥卡姆认为“上帝存在”的命题乃是无意义的，我们只能信仰上帝，却无法提供任何理性证明论证上帝存在的可能性。对于阿奎那的论证，奥卡姆驳斥认为，目的因本身就是不可知的，无法证明宇宙有一个内在的目的，无法证明任何的运动终止于一个动力因。所以关于上帝属性的探究，只能是无意义的，我们对于上帝的理解，止步于“上帝”这个名称而已。

通过这种方式，奥卡姆实际上缔造了一种神学与哲学分裂的局面，神学基于信仰，乃是不可被理性论证的。在此基础上，奥卡姆提出知识的命题，或者来自于经验证据，或者来自于自明的证据，从而知识与信仰的区分被大大强化了，进而强化了主体对于知识诉求的正当性，为近代哲学的主体性哲学和知识论探究开辟了道路。

更为重要的是，唯名论者强调一种基本的伦理学诉求，即“神不欠人的债”。出自于上帝的绝对意志而言，并不是善的诉求，决定了上帝的形象。而是上帝作为绝对意志规定了善的内涵。亦即宗教非但不是后来康德所言的“纯然界限内的宗教”，恰恰是基于信仰而言的。上帝的绝对力量可以推论出一个耸人听闻的观点，即上帝可以命令人类做任何事情，包括那些在人类看来是“恶”的事情。如果杀人放火是上帝命令的结果，人类做这样的事情也没有罪过。

这样的耸人听闻的伦理学观点却具有极强的革命性，它摧毁了中世纪时期的“自然正当”的论证模式，强化了个体对于道德欲性的诉求。在奥卡姆看来，人类不可能窥测上帝的意志，但是人类的道德行为不仅仅出自于上帝的意志，也来自于人的“正当理性”（*Recla Ratio*）。只有服从正当理性，人的行为才能是有德性的行为。在这里的隐秘之处在于，奥卡姆看似抬高了上帝的地位，但是实际上出现了一种背反，即上帝被高高抬起，却轻轻放下。既然我们并不能窥测上帝的意志，而正当理性是任何道德行为的必要条件，那么其推论便在于，我们应该用我们的眼光来看待道德行为，我们应该在具体活动中加以判断善恶。所以经过这样的推论，奥卡姆强化上帝的诉求，却造成了一种奇妙的结果，即强化了个体的伦理诉求，摧毁了托马斯主义利用自然正当来论证善的可靠性。

因此上述所有的成果，都是基于对于托马斯主义的反叛，尤其是对于阿奎那关于“存在类比统一性”论断的批驳导致的，故而我们称之为“唯名论革命”。唯名论革命的效果，就在于强化了上帝的绝对意志的同时，强化了世界的偶然性特质，解构了中世纪生活方式的思想基础，为思想解放开辟了道路。并且唯名论的个体主义的路线，强化了人们在一个偶然世界中利用自己的力量生存的可能性。而这些基本思路，恰恰是后来近代主体性哲学力图完成的结果。但是吊诡的是，中世纪晚期的唯名论者绝不认为自己在进行一场“革命”，相反他们都是虔诚的教徒。

在托马斯主义者所开创的“存在的类比统一性”之中，阿奎那力图平衡上帝的内在性与超越性的矛盾，但是这种矛盾最终在唯名论者和神秘主义者那里被揭露出来，进而促使亚里斯多德主义与基督教神学的分裂。而这种分裂，强化了上帝的内在性与超越性的冲突，即是说，强化了人到底能不能认识到绝对者的问题的冲突。

人乃是作为堕落人性的人，我们可以以何种方式认识到绝对者，即是说我们的内在性以何种方式能够抵达超越性，便是一个扬弃了神学讨论的新的问题意识。

在一种神学背景中考虑这个问题，就在于进一步地调整人之于绝对者的位置。在唯名论者那里，这个问题被处理为一种双重背反的局面，一方面唯名论者强化了人类的理性能力不足以论证上帝的存在，从而削弱了关于人性的乐观的态度，另一方面唯名论者又强调我们只能通过信仰的方式面对一个作为全能的上帝的形象。这里的复杂性便在于，尽管唯名论者削弱了绝对理性的力量，但是通过平衡信仰和理性的关系，恰恰使得一种面向世俗，指向此岸世界的“可朽性”、“世俗性”，亦即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思考方式显露出来。因此唯名论者成为了近代自然科学思想的先驱者，它们看似削弱了理性，实际上乃是使得理性的内涵

得到了新的诠释。理性无需指向绝对者，相反理性应该指向此岸世界，对于绝对者应该基于私人意义上的信仰。

这一道由唯名论者划定的“鸿沟”，促使人被抛离到此岸世界，人不得不以自身的方式面对此岸世界的难题，人乃是离弃性的。这正如上帝驱逐亚当远离伊甸园一样，在中世纪晚期，人类也不得不离弃中世纪的世界图景，去创造一个未知的世界。

（二）内在性拒斥超越性：泛神论倾向

与唯名论者强化超越性维度不同，中世纪晚期的神秘主义者则倾向于一种泛神论倾向，从而强化上帝的内在性特质。在 14 世纪的神秘主义大师，是多米尼克派的约翰·埃克哈特大师。神秘主义者常被指控为泛神论者，但是就他们自身的意愿而言，他们试图主张自己在革新教会。但是他们同样成为了反托马斯主义的一股力量，其力量根由乃是基于新柏拉图主义的立场反对亚里士多德主义。

对此我们依然应该从“存在的类比统一性”理论出发，来探究他们对于托马斯主义的观点的反驳。托马斯主义者的核心乃是继承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讨论方式，阿奎那试图通过类比理论，调和上帝的内在性和超越性，来述说上帝一方面是纯然的一，另一方面上帝以类比分有的方式存在于万物之中。

但是在埃克哈特大师等神秘主义者那里，他们借助于新柏拉图主义的“太一”拆解了这个体系。其理论的核心在于认定，从最终的意义而言，上帝乃是无，是一，乃是单义性的，从而灵修的核心在于灵魂能够脱离出来与神性合二为一，展示出神人一体的方式。因此人之灵魂与上帝的同一性根据，乃是离基深渊 (Abgrund)，即无。

通过这种方式，实际上消弭了世界万物的差异性，也消弭了上帝与万物之间的鸿沟，神人可以通过直接性的方式达成一体。与唯名论者强化上帝与人的鸿沟不同，神秘主义者恰恰试图摧毁这样的鸿沟。所以埃克哈特大师有着强烈的泛神论倾向，但是他本身却并非是泛神论，因为作为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他依然维护着有限物并不是单义的，只有上帝作为无限者乃是单义性的。比上帝更为深渊的恰恰是神性 (Gottheit)，乃是太一。

尽管唯名论者与神秘主义者在思路上有很大不同，但是带来的效应却是类似的，即摧毁中世纪的等级秩序和存在之链，开辟一个同质化的宇宙。

在埃克哈特大师之后，库萨的尼古拉将神秘主义思路导入宇宙论的讨论之中。在他看来，任何一个事物都可以找寻到关于存在的一切形式。对于上帝而言，没有任何东西在他之外。他说：“上帝是不能被分有的。他是无限的光，闪耀在一切事物之中。”⁵亦即，“从第一卷中我们就已了解到，上帝是以这样的方式，即一切事物都在上帝之中，而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在前一章中，我们已看到，上帝之在一切事物中，仿佛是以宇宙为中介的；所以可以推论出，一切事物都在一切事物之中，并且每一事物也都在每一事物之中。”⁶

通过这种方式，库萨的尼古拉实际上进一步强化了上帝内在于万事万物之中，上帝具有一种内在性。而上帝的内在性，实际上就使得整个宇宙出现了一种去中心化的倾向，任何一个事物都可以是中心，宇宙的差异性被消弭。这种去中心化的宇宙，打破了中世纪的等级秩序，更进一步地改变了人类对于自然的看法，使得自然成为了一个同质化的世界。并且库萨的尼古拉在坚持宇宙的同质性的同时，也坚持我们的语言无法真正意义上抵达对于上帝的言说。因为上帝既无处不在，也不在任何地方，我们的语言只有相对意义上的类比和相似性的可靠性。

在这里，无论是唯名论革命，还是泛神论倾向，他们的最终达成的效果是类似的，即消除了托马斯主义的类比统一性的讨论模型，从而将宇宙理解为同质化的宇宙，摧毁了亚里士多德主义在中世纪的统治地位。

五、存在论革命和“是”的重建

通过托马斯主义对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接纳，从而促使了亚里士多德主义与基督教神学结合在一起，但是这种结合必然蕴含着内在的矛盾，从而促使托马斯主义的瓦解。因此唯名论者与神秘主义者在两个不同的方面拒斥了托马斯主义的“存在的类比统一性”的讨论方式，最终瓦解了托马斯主义，进而在思想上瓦解了中世纪的主流思潮。

⁵

1996 11 25

⁶

1988 2

而在这里,这种瓦解不仅仅在思想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它构造了一场存在论革命。在传统的形而上学讨论中,哲学家常把形而上学分为一般形而上学(Metaphysica Generalis)和特殊形而上学(Metaphysica Specialis),前者关注于纯粹存在论的讨论,而后者则关注于理性心理学、理性宇宙论和理性神学的讨论。即是说,前者关注于“存在”的意义的探究,而后者关注于“存在者”的层次的探究。

但是一般形而上学与特殊形而上学的区分,绝不是一个分裂和脱离的状态,相反它们内在具有一种勾连。我们可以说关涉于一般形而上学的探究,乃是关于“是”的意义的探究,而关涉于特殊形而上学的探究,便是关涉于特定的“是者”的探究。而“是”的探究必然需要借助于“是者”层次上的变动而产生。

因此即是说,在中世纪晚期所形成的思想革命中,归根到底乃是一场存在论革命。这场存在论革命表达为“是者”层次上的调整。在传统形而上学上,理性心理学关涉于灵魂,即关涉于主体。理性宇宙论关涉于宇宙,即关涉于客体。理性神学关涉于上帝,即关涉于大全。所以所谓“是者”层次上的调整,就被理解为主体、客体和大全之间的关系和结构的调整,即关涉于人、神、物三者之间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

因此从逻辑上来说,“存在的类比统一性”关涉于“是”(或“存在”)的多重意义的统一性问题,关涉于纯粹的“是”的讨论,而经由托马斯主义和反托马斯主义的形成,在中世纪晚期所缔造的基本问题意识,就是诸“是者”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

整个现代哲学(Modern Philosophy)的思想家,无不关注于如何调整存在者(“是者”)层次上的讨论。人文主义者关注于“人”的地位,将神与物的关系归结于“人”,从“人”出发去领会存在的意义。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者,关注于“物”的地位,将神与人的关系还原为“物”,甚至进一步把“物”还原为诸原子的偶然碰撞的产物,进一步取消了物的地位。而作为宗教改革,则是强调一种基督教原教旨,强调“神”的第一性。

但是这里的问题却不是如此简单,而在于三者层次上的探究乃是极其复杂的,最终构造着三者既矛盾,又统一的模式,最终表达为“人”处于“神”与“物”之间,如何弥合两者的分裂,如何探究“人”既必然又自由的矛盾特性,成为了现代哲学家思索的重点。

而吊诡的是,尽管现代哲学的问题意识是全新的,现代哲学的解决方案是全新的,但是这样的矛盾却不是现代哲学才出现。早在上述所云的上帝的内在性和超越性之中,这个问题以神学化的方式就存在于此。可以说现代哲学的各种问题,乃是基督教神学问题的世俗化表达,乃是基督教神学的重新表述。托马斯主义和反托马斯主义者的争端以改头换面的争论重新出现。

这样的矛盾最终体现为康德关于自由和必然的调和上,进而表达为德国唯心论运动试图以一种“实体”和“主体”相统一的方式,消弭于黑格尔的精神异化的运动之中。

在中世纪晚期的存在论革命之中,“人”、“神”、“物”三个基本的存在者层次的调整,无异于从根本上动摇,质疑和瓦解了托马斯主义。托马斯主义的“存在的类比统一性”,实际上就试图调和三者的关联,阿奎那利用所谓的“双重真理论”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的理性能力,利用“存在的类比统一性”,既维护了上帝的超越性和内在性,又维护了诸万物之间的等级秩序,构造了一个理性的世界图景。

而中世纪晚期的思想家们,无论它们强化何种的“存在者层次”,都会产生一场解构意义,从而从根本上摧毁托马斯主义所设定的调和路径。因此尽管就根本上来说,“人”、“神”、“物”互相之间是充斥着思想的矛盾,但是在面对同一个敌人的情况下,他们在早期阶段又构成了一种松散的同盟,促使“存在的类比统一性”坍塌为某种专属于特定存在者层次的单义性的探究。而这样的“坍塌”便是一种对托马斯主义的解构。

六、存在论革命与人性的视角变革

而对托马斯主义这样的解构在两个层次缔造了现代人类对于世界的基本看法,便是如何看待自身,如何看待自身以外的他者?前者关涉于主体对于自身人性视角的变革,后者关涉于上帝与自然视角的变革。

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常把笛卡尔视为现代哲学的开端,因为笛卡尔哲学第一次确立了“我思”作为新的确定性根基。但是,从更漫长的历史进程来说,前笛卡尔时期的思想家对于“人性”的看法,是铸造了“我思”概念的提出。

应当说,我们对于笛卡尔哲学的认识,相当层次上受制于后世哲学家的诠释。在这样的诠释的面相中,笛卡尔哲学被视为第一次提出了“我思”,从而出现了一种哲学的转向,从传统的存在论讨论转而对于知识的探究。并且建立起一个主体形而上学的探究路径,以“我思”作为新的确定性根基。

但是这样的诠释是极其可疑的,这样的诠释不得让我们陷入到笛卡尔设好的陷阱,即身心二元论之中。笛卡尔所设下的“身心二元论”乃是一个完成的状态,即是说在笛卡尔的论述中,身体与心灵是判别有别,乃是两个实体,故而它们的交互是不可能的。这样的探究已经丧失了对于存在论革命所带来的成果的遗忘,忽视了超出主体之外的存在论层次上的探究。因此我们有必要探究前笛卡尔时期关于“人性”的探究。

事实上，我们从关于唯名论革命的论述中就可以看出，在中世纪晚期旧问题以新的状态显露出来，这个旧问题便是“上帝”作为超越性的力量与人的自由意志的问题。自由意志问题早在奥古斯丁那里就被激发出来。在传统基督教的教义中，自由意志的问题与原罪论乃是紧密联系的。甚至可以说，人之所以存在自由意志，就在于人是原罪的。因此原罪与自由意志乃是一体两面的，承认原罪就承认了人的自由意志，反之亦然。

因此在这个教义的支配下，人的自由意志不是无限的，而是一种基于原罪和堕落基础上的自由意志。这种特殊的自由观，提供了“自由”内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一方面“自由”概念乃是近代主体性哲学试图追寻的产物，但是另一方面，要为“自由”正名，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思想家如何领会“原罪”和“堕落”。这种基于堕落基础上的人性，塑造了近代思想家如何一方面强化人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又要规避堕落带来的“恶”和“罪”。正是在这种互相矛盾的思想逻辑中，新的主体性哲学才应运而生。

在古今之变时期，一种奥古斯丁的“人性观”被复兴起来，“激情”、“意志”被理解为“罪恶”，而“理性”能力被视为是神的印记的残留。这乃是一种基于新柏拉图主义的立场，从而用以反对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托马斯主义，因为后者认为知识是可靠的，我们的心灵具有自然趋向，让我们关注更完善的东西。

可以说托马斯主义的理性观，是一种乐观的理性观，他相信理性促使我们获悉世界的秩序，亦即亚里士多德主义极大地影响了基督教神学。但是经由唯名论者的反驳和新柏拉图主义的兴起以后，奥古斯丁的人性观开始复兴，这种人性观构造了一种悲观、审慎的人性观，这种人性观一方面承认人的认知具有理性能力，从而是神残留的印记，另一方面又表达着我们的人性乃是堕落的。

因此在这种悲观的人性观之中，一种人的自救策略获得了辩护，即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增强我们的认知能力，思辩者相信思辩可以改变我们的堕落状态，实验的辩护者认为，实验极大地扩展了我们的感官，从而可以用以拯救我们的人性。霍布斯说：

“自然的某些关键活动，不借勤奋努力和技术处理就不向我们显现；这时，借助人工的设施，自然的一部分表现出自然活动的机制，比万万千日常现象所表现的更为昭明。而且，我们通过这些实验，揭示出自然的原因〔原理〕，因此，这些实验可以适用于无穷数量的通常现象。”⁷

所以我们不得不利用实验工具帮助我们去理解自然的奥秘。

而这种悲观的人性观促使着哲学家重新审视我们知识的限度，认识论问题才构成了近代哲学的核心问题。同样地，由于原罪论的影响，传统的自然正当的论证模式丧失了效力，人并不如亚里士多德所设想的天然就是“城邦的动物”，相反人的原罪和堕落促使着人性败坏，不得不通过后天的方式进行结合，唯有基于此，政治哲学的辩护才是有效的。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面对这个问题，他说：

“正是基督教宇宙观中的那种不幸状态观，为自由意志（free will）向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的提升设下了想像的空间，为人类苦难造成的物质机会提供了一种更令人振奋的看法。这中间的资产阶级化，只不过是一种延伸，而经济学的创生，就是关于《创世记》本身的经济学。”⁸

因此在早期的思想家那里，缺乏后来先验哲学家所宣称的自我意识的至高无上性，相反人的主体性是处于一种堕落的状态中才被确立起来的，这种人的主体性在漫长的哲学演变中逐步被遗忘，人的主体性越来越强化，最终完成存在者层次上的以“人”作为哲学的全部讨论的问题域。

而早期的堕落人性观，实际上是“存在的类比统一性”的讨论的进一步深化，它将上帝的内在性和超越性的讨论，从纯粹的神学讨论，转向了“人”面对“自然”和“神”如何自处的问题。这个问题以“人”为中心，重新树立起内在和超越的问题意识。

七、“我思”作为异乡客的显露和确定性的重建

正因为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人们逐步地转向了奥古斯丁的人性论，强化了人性堕落观点，从而用以反对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托马斯主义者对于人性较为乐观的态度，从而产生了利用实验，思辩的方式去重新获得一种救赎。换言之，诸如实验，思辩等认知活动，并非作为纯粹认知活动而被理解，而是作为一种神学现象而被诠释。更为重要的是，“堕落人性”这个概念蕴含着复杂性，因为承认堕落人性，恰恰承认了人必然是有自由意志的，“堕落”、“原罪”与“自由意志”乃是对于同一个内容的不同描述而已。正因为如此，奥古斯丁人性论的复兴，恰恰为强调人的自由特性提供了帮助。

⁷ Simon Schaffer, Steven Shapin 1985 .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351.

⁸ [M]. , 2000 9

近代早期思想家便相信,感性、激情和非理性成为了一种堕落的表征,而理性成为了神印记的遗迹。因此我们应该小心地探测,哪些能力是神所赐予给我们的,哪些能力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勤勉获得一定程度上的调整的,哪些能力应该是规避的。基于这种新的人性论,思想家们开始转向对于自我的探求。

近代早期的思想家基于此,开始进行一种“确定性重建”的活动。不过在早期的思想家那里,“确定性”并非是作为绝对意义上,从而并非如德国观念论者所创造的先验哲学那样,被视为哲学的根基所在。相反此种“确定性”在神学背景下被提出,从而“确定性”只能是一种相对意义上而言的确定性,绝非绝对确定性。

因此,这种新的确定性,我们可以称之为“异乡客”的“确定性”。所谓“异乡客”乃是说,“反作他乡为故乡”,从而以说明这种确定性,绝非根植于绝对性之上的,相反应该被理解为离弃了绝对性的不得已而为之的确定性。

应当说,早在唯名论者那里,由于上帝与人的鸿沟的划定,人不得不离弃上帝,从而获得了相对意义上的自主性和自立性,已然宣告了人的现代性位置。

而这样的自主性和自立性最终在笛卡尔这里,获得了哲学意义上的证明。但是笛卡尔所说的“我思”是何种意义上的我思?是先验哲学家所设想的先验自我吗?是现象学家所设想的纯粹内在性吗?

这两种对于笛卡尔哲学的诠释,更像是他们对于所处时代的哲学诠释。如果回到现代初始的时代,笛卡尔的“我思”没有那么强的形而上学特质,相反它应该被视为“异乡客”意义上的确定性,即一种相对意义上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恰恰体现了现代社会的一系列特质。

这种相对意义上的确定性,在哲学上的表达,实际上就表达为两种态度,

1、理性与非理性应该如何安排?即是说,在笛卡尔哲学中,非理性服从于理性,还是理性服从于非理性?

2、人的确定性与上帝之间如何安排?

这两个标准,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审视笛卡尔哲学所言的“确定性”是什么。

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的“第三沉思”中,笛卡尔说:

“我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这就是说,我是一个在怀疑,在肯定,在否定,知道的很少,不知道的很多,在爱、在恨、在愿意、在不愿意、也在想象、在感觉的东西。”⁹

即是说,在笛卡尔看来,“我思”绝非是一个单纯的理性工具,相反在“爱”、“恨”、“愿意”、“想象”和“感觉”等等的感性或非理性的要素也在我思中存在。

那么,笛卡尔会认为非理性要比理性更重要吗?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在 *Comments on a Certain Broadsheet* 中,他说:

“我曾说过,所有这些属性都可归结为两个主要属性,其中一个理智的知觉,另一个是意志的决定,“作者把这两个属性分别称为”理智“和”意志“。但在这一点上,他与我的观点不同。因为我看到,除了作为判断的先决条件的知觉之外,我们还需要肯定和否定来决定判断的形式,而且即使我们知觉到了有关事项,我们也常常可以自由地拒绝同意。因此,我把判断行为本身归于意志的决定,而不是理智的感知,判断行为本身仅仅包括同意(即肯定或否定)。”¹⁰

笛卡尔明确地说“判断行为归于意志的决定”,即是说笛卡尔的确有强烈的理性主义思想,但是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只是相对意义的,意志活动或非理性活动起着更决定的要素。故而我们也可以说,笛卡尔并不认为理性支配着非理性,相反意志、非理性反而是支配着理性活动的。所以与一种绝对的理性主义不同的是,笛卡尔的理性只能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理性,只能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确定性。

从更广的神学背景来考察,即是说,这种理性只能被理解为人离弃了上帝,自己不得不重新确立起根基的理性。事实上,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笛卡尔已然暗示着这样一种结论,所谓的普遍怀疑论,魔鬼,怀疑,无不昭示着神学背景下,人被离弃的状态,同样也表达着现代社会的疏离感,虚无感的状态。同时,判断背后是一种意志性,实际上就是强化了人的意志性,这种意志性在认知活动中,就表达为一种掌控自然,掌控自我,摆脱幻觉的能力。亦即,在认识论的探究之中,实际上乃是凸显了人性中的意志性的意义,从而产生了与上帝的全能意志的矛盾性。

接着我们再来考察,笛卡尔是如何理解上帝这个角色的?

在一个称之为“笛卡尔循环”的论证中,笛卡尔假定上帝乃是良善的,所以上帝不能欺骗我们,因此我们的观念是清楚明白的。那么,笛卡尔如何能够保证上帝的良善性呢?笛卡尔重复了安瑟伦的本体论论证,

认定神的观念是完美的观念，而我们正在怀疑自身，所以我们的不完美的，那么如果我们是不完美的，那么完美的观念并不能来自于我，而只能来自于超出我之外的力量，这就是神。所以神是完美的观念的原因。

但是，仅从此处，笛卡尔并不能充分地论证上帝是良善的。因为唯名论者依然可以宣称，上帝是全能的，所以的绝对力量可以改变任何事物的秩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笛卡尔实际上采取了一种“明升暗降”的策略。他认定上帝是无限物，而我们是有限物。作为有限物的我们，我们乃是对无限物的否定，所以我们在怀疑。而作为无限的上帝而言，他的纯粹意志就等同于纯粹理性。他说：“上帝已创造了三个奇迹：无中之物、自由的意志、上帝在人。”但是同时，笛卡尔又说：“这使我认识到，我之所以带有上帝的形象和上帝的相似性的，主要是意志。”（第一哲学沉思录，第四个沉思，67）在这个意义上，笛卡尔又突出了上帝的意志性。

即是说，尽管笛卡尔把上帝抬到很高的地位，但是恰恰弱化了唯名论者所说的全能的上帝，而是逐步将其理性化，上帝成为了一种自然的“自因”而已。这为后来的斯宾诺莎的“神论”提供了帮助。因此笛卡尔说：“上帝是纯理性的。”

也就是说，上帝的良善性，基于上帝的理性。但是此时笛卡尔所谓的“理性上帝”，其内涵不同于托马斯主义者所设想的上帝，更不同于唯名论者的上帝，乃是被自然科学化的上帝，是一种自然神论意义上的上帝，上帝成为了纯粹科学的保证。

而对于人的意志而言，笛卡尔采取了一种悲观人性的看法，他认为人的意志是无穷的，但是人的认识是有限的，并且无穷的意志，往往会让认识误入歧途。他说：

“那么我的错误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是从这里产生的，即，既然意志比理智大得多、广得多，而我却没有把意志加以同样的限制，反而把它扩展到我所理解不到的东西上去，意志对这些东西既然是无所谓的，于是我就很容易陷于迷惘，并且把恶的当成善的，或者把假的当成真的来选取了。这就使我弄错并且犯了罪。”（《第一哲学沉思录》，第四个沉思，68-69）

所以在笛卡尔这里，意志与理性的关系就变得极其复杂，一方面他承认意志才是我们认知活动背后的决定力量，但是另一方面，认识又必须谨慎，因为意志往往会出现迷乱。这样一种复杂的模式，恰恰缔造了一种谨慎的人性观，也缔造了一种谨慎，相对意义上的确定性，而绝非如先验哲学家们所试图论证的绝对自我意识。所以他说：

“构成错误的形式就在于不正确地使用自由意志上的这种缺陷上。”（《第一哲学沉思录》第四个沉思，71）

因此我们可以说，笛卡尔的失察之处在于，他没有纯粹化自我意识。但是笛卡尔的高明之处，也恰恰在于他没有纯粹化自我意识，他依然保留着在古今之变时代中，由于神学背景的上帝的制约情况下，主体与超主体之间乃是一种平衡和谨慎的关系，而绝非成为后来的主体性哲学的纯粹化。

因此，笛卡尔的“我思”并不能被惯常地理解为一种先验主体和现象学主体，而只能被理解为在神学背景中，被神所离弃的个体。这个个体不得不重新为自己确立起新的确定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上帝的意志能力。所以，可以称之为一种“异乡客”的我思。

八、人性的视角变革与自然的变革

从托马斯主义的“存在类比统一性”的讨论，到反托马斯主义者的批驳，从而促使中世纪神学的解体。而在这个过程中，上帝的内在性和超越性的特质分裂，并且逐步下沉到对于人性的探究上。促使一种新的人性观显露出，即一方面表露为“人”被神所离弃，有着堕落性和原罪性，“人”与“神”之间有着鸿沟，另一方面，也激发了人的自由意志的展开。这样一种双重背反的人性观，恰恰为人后天铸造自身，建构自身的思想提供了可能。人力图依靠自身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重建确定性。而这正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意识。

那么，人性的视角变革，必然带来的是关涉于人之对象的变革，即自然的变革。而这种变革的核心，便在于将“自然”与“技术”活动嫁接，促使“自然技术化”。

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对“*physis*”（自然）提供了基本的解释。亚里士多德认为，所谓“自然”乃是“它首要地、就其自身而非偶然地属于的事物内部运动和静止的本原或原因（*archē tinos kai aitia*）。”（192b22）与“自然”不同，技术物或人工物则是，“在自身内没有它自己被制作的本原。”（192b28）

因为就“*Physis*”的词根而言，乃是“*phyo*”，指的是“生长”、“涌现”、“自行如此”云云的内涵，而“*Techne*”作为技艺，表达却是其根据是外在的，在人工物之外的。

可以说亚里士多德对于“自然”的界定，与当代人理解的“自然”乃是判然有别的，当代所理解的自然，按照柯林伍德所言，乃是“在现代欧洲语言中，“自然”一词总的说来是更经常地在集合 (collective) 的意义上用于自然事物的总和或汇集。”¹¹。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自然更多表达的是事物之所以如此的内在本性。

这里的问题便在于，何以古希腊基于自然本性的“自然”内涵，转化为当代的“集合性”的“自然界”呢？

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物优先于技术物，在他对于知识的划分中，理论科学、实践科学和创制科学，乃是逐步递减的重要性，最重要的学问便是理论科学，次之为实践科学，相反创制科学则是最等而下之。因此在古典学术中，创制科学被遗弃和抛弃的。而所谓“创制科学”，便是技艺。

因此，要将古希腊基于内在本性的“自然”，转化为近代科学家所说的“自然界”，一个重要的思想线索，就是自然内在性的失落和丧失。那么如何才能使得自然内在性丧失呢？唯一的可能性，便是自然被“技术化”地领会。

在一种流俗的观点看来，技术与科学乃是两个门类，但是近代自然科学的核心，恰恰是科学与技术高度绑定，甚至于科学本身就是技术化的科学，技术成为了一种先行于科学，并支配着科学运转的内核。

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突变？一个重要的内核，便在于基督教思想的引入，阿拉伯地区技术的发展以及“存在类比统一性”思想的解体导致的。

在中世纪晚期的西欧，开始流传着神秘主义，其中《赫尔墨斯之书》阐明，“技艺的协作并未改变事物的本性，因此人工造物按其本质而言是自然的，按其制作而言是人工的”¹²。即是说，人工造物本身就是自然，自然与人工造物之间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文艺复兴时期的菲奇诺则说：“什么是人的技艺？一种从外部作用于物质的特殊的自然。什么是自然？一种从内部给物质赋形的技艺”¹³

而随着存在类比统一性讨论的解体，带来了一系列的视角变革，堕落的、原罪的人性一方面被视为神所离弃的状态，强化了人与神之间的鸿沟，另一方面也带来人性的主动性的膨胀，即暗示着人可以借助于外物，如实验活动，机械活动来强化人的能力，来获得对于神的追溯。

正如红衣主教切萨雷·巴奥尼奥 (Cesare Baroni) 所言，“圣灵的意图是教给我们如何去天堂，而不是天如何运转。”¹⁴即是说，科学活动关注于“how”（如何），而非“why”（根据）。在这里，自然本身的内在根据被掏空，对于自然的研究，仅仅局限于自然外表的运转，而这个运转是可以被机械化、数量化处理的。

于是“力学”应运而生，所谓“力学”，从词根而言乃是“Mechanics”，其内涵与“机械学”的内涵无异，即是说所谓力学研究，绝非一个“通向事情本身的研究”，相反在研究之前预先地进行了一种偷换，即对于事物的“力”（本性）的研究，偷换为对于事物如何运转的机械性研究。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自然科学的核心力学研究，恰恰是一种被技术化和机械化的研究方式。尽管“力”这个概念还残留着很强的形而上学色彩，以至于从贝克莱、马赫到爱因斯坦，连这样的形而上学性都不能容忍，力图将其褪去。正如卡尔·波普尔所言，“这些观点的最终论证，也即为什么要取消这些隐秘的实体和性质，如物理力、微粒结构、绝对空间和绝对运动等等的理由是：我们知道并不存在这样一些实体，因为那些专门用来标示它们的词是没有意义的。”¹⁵

而这样的一种偷换，促使整个宇宙都被领会为一个同质化和平权化的宇宙，并且为数学大规模应用于自然奠定了基础。与其说是数学应用于自然，倒不如说“自然”这个概念的内涵，本身就被数学所塑造着。而这样的同质化和平权化的宇宙，早已在唯名论者和神秘主义者那里潜在地存在了。

九、结语

本文从“存在的类比统一性”作为切入口，试图说明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过程中，各路思想家的思想线索，从而表明面对“存在类比统一性”的难题，是如何论证，反驳。并且这样的反驳带来了何种意义上的思想效应，促使人类对于神、物和自身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进而促使人改变了对于自然的看法，为自然科学的产生提供了思想基础。其基本的思想线索如下：托马斯主义试图调和上帝的内在性和超越性，提出了“存在的类比统一性”的解决方案，但是这样的方案内涵着矛盾，必然促使其思想的解体。而解体的路径有二，

¹¹ [J.R.G. , (). [M]. , 2006 52

¹² [J].

, 2019, 41(08): 1-8. DOI: 10.15994/j.1000-0763.2019.08.001.

¹³ .. 2015 30

¹⁴ .J. , [M].

, 2012 77

¹⁵ . 2005 247

一则表达为唯名论者强化人与上帝的鸿沟，并且强化了上帝的绝对的全能意志。一则表达为神秘主义者的泛神论倾向。它们的思想效应是一致的，承诺了一个同质化的宇宙。而唯名论者通过强化意志属性，也导致了人与上帝的关系，被理解作为一种自由意志的讨论，一种基于堕落人性的平衡方案显露出来。一方面承认人的堕落性，从而被神所离弃，另一方面又承认堕落性缔造了自由意志，为人后天建构自身的思想提供了帮助。这样的人性视角的变革，也改变了人类对于自然的看法，自然从本性的内涵，逐步转化为被技术化控制下的自然，从而成为了当代人理解的基于“集合性”的自然界。

因此，启蒙时代以及后启蒙时代问题的争论，可以被看成是中世纪晚期神学危机以及一系列思想变革的重演。尽管问题意识，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不一致的，但是其基本的理路又是有着相通之意。归根到底，所探讨的问题核心乃是，人如何在宇宙中自处？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
- [2]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五卷[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
- [3]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
- [4] 圣多玛斯·阿奎那：《神学大全》（第一册：论天主一体三位）. 中华道明会/碧岳学社联合出版。
- [5] 库萨的尼古拉：《论隐秘的上帝》，李秋零译，三联书店，1996年11月第一版。
- [6] 库萨的尼古拉：《论有学识的无知》，尹大贻、朱新民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2月第一版。
- [7] 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M]. 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 1986年。
- [8] 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纪树立，周昌忠，蒋戈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年版。
- [9] 海德格尔著；孙周兴编译.《存在的天命：海德格尔技术哲学文选》[M].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8年版。
- [10] 皮埃尔·阿多：《伊西斯的面纱——自然的观念史随笔》，张卜天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 [11] 马歇尔·萨林斯.《甜蜜的悲哀：西方宇宙观的本土人类学探讨》[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年。
- [12] 迈克尔·艾伦·吉莱斯皮著，张卜天译.《现代性的神学起源》[M].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年版。
- [13] 玛格丽特·J·奥斯勒著，张卜天译.《重构世界：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欧洲的自然、上帝和人类认识》[M].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年版。
- [14] 彼得·哈里森著，张卜天译.《人的堕落与科学的基础》[M]. 商务印书馆, 2021年版。
- [15] 阿摩斯·冯肯斯坦著，毛竹译.《神学与科学的想象：从中世纪到17世纪》[M]. 三联书店, 2019年版。
- [16] [英]R.G.柯林武德，吴国盛(译).《自然的观念》[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
- [17] 吴国盛.《由史入思：从科学思想史到现象学科技哲学》[M].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
- [18] 赵敦华.《中世纪哲学长编》[M].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3。
- [19] 舒红跃 张清喆 著.《西方技术思想史》[M]. 人民出版社, 2019。
- [20] 晋世翔.近代实验科学的中世纪起源——西方炼金术中的技艺概念[J].自然辩证法通讯, 2019, 41(08):1-8. DOI:10.15994/j.1000-0763.2019.08.001.
- [21] 马松红.论类比在上帝言说中的适度与界限——一种基于问题及其历史的省察[J].基督教学术, 2018, (02):266-281+459.
- [22] 赵中华.存在类比统一性与存在意义问题的现身——海德格尔的存在问题何以成为存在意义问题[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3(01):137-142.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0.01.019.
- [23] 雷思温.从“羁旅者”到“我思”：中世纪晚期思想与近代哲学的主体性革命[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4, 64(05):25-35+235. DOI:10.15939/j.jujss.2024.05.zx3.
- [24] 雷思温.类比的崩溃：中世纪晚期的单义性革命与一本二元问题[J].哲学研究, 2022, (05):106-117.
- [25] 吴国盛.走向宇宙与安居大地[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39(04):12-21+228. DOI:10.13613/j.cnki.qhdz.003368.
- [26] 吴国盛.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J].求是学刊, 2004, (06):33-40.
- [27] 吴国盛.世界的图景化——现代数理实验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J].科学与社会, 2016, 6(1):43-73.
- [28] 郝刘祥.自然的数学化 关于科学革命编史纲领的探讨[J].科学文化评论, 2014, 11(05):5-23.
- [29] 朱清华.海德格尔对古希腊 physis 的诠释[J].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 2016, (01):119-146.

- [30] Simon Schaffer, Steven Shapin (1985) .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31] Descartes, R. (1984). 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Descartes: Volume 1.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of Modern Social Evolution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 Analogical Unity of Being"

Lin Feng¹

¹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100080, China*

Abstract: Modern society is characterized by a number of distinctive traits that set it apart from ancient societies. The evolution of these traits was brought about through the mutual integration of Greco-Roman and Hebraic civilizations. Among the most crucial factors in this transformation was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Thomistic philosophical framework of the "analogical unity of being"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This collapse paved the way for a new vision of both human nature and the natural world, thus laying the philosophical groundwork for modern society. This article aims to analyze and refute the scholastic defense of the analogical unity of being, and in doing so, outline the historical process through which traditional Thomism fell apart. It explores how this collapse gave rise to a conception of human nature grounded in a fallen free will, a Cartesian notion of the self as a "stranger in exile," and ultimately, a radically new concept of "nature" that provided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natural science.

Keywords: modern society, being, analogy, human nature, nature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3.732

《雄狮少年》的双层叙事与温暖现实主义表达

杨静¹

(¹ 河北大学, 河北 保定 071000)

摘要:《雄狮少年》是近年现实题材动画影片的一次突破。该片运用“英雄之旅”的叙事模式,内容上呈现两层叙事:前景的英雄成长和背景的现实底色。英雄成长遵循“英雄之旅”的叙事结构和理想主义的角色成长,现实底色则勾画了相对完整的现实图景,释放了强烈的痛感和宽厚的悲悯。拓展了有限文本的语意空间。两层叙事融合为温暖现实主义叙事,体现了人民情怀的创作观、诗意叙事和地域叙事的创作手法,为现实题材的动画创作带来新的启示。

关键词:《雄狮少年》;英雄成长;温暖现实主义;理想主义

动画电影通常选择非现实题材叙事,多采用“传奇式成长”“合家欢”的叙事模式和“大团圆”结局,更契合人类的情感、梦想和精神等普世的、形而上的追求,形成单一的叙事层,缺乏与社会现实深度链接。《雄狮少年》将精神追问与现实痛感融于一体,在“传奇式成长”“合家欢”的理想化的叙事层下,运用相对完整的隐性叙事层夯实了具体的现实语境、现实困顿和现实痛感。相较大部分动画电影而言,额外刻画了现实化的叙事层。理想化叙事层用温暖的情感,热血的奋斗,畅快的胜利为残酷的现实化叙事层注入温暖、力量和意义,拓展了有限文本的语意空间,是温暖现实主义动画的代表。

一、双层叙事:理想化的“英雄之旅”与现实化的少年谋生

雄狮少年的双层叙事表现为理想化叙事层和现实化叙事层。其中,理想化叙事层采用“英雄之旅”的叙事结构,描述了乡村留守少年成长为英雄的过程;现实化叙事层则刻画了一个少年留守乡村,父亲受伤,辍学打工,前途未卜的现实困境。

(一) 第一层:“英雄之旅”的叙事结构与理想主义的角色成长

“英雄之旅”的叙事结构,是由美国比较神话学大师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在世界各国众多神话中归纳出的英雄成长的普遍规律。他发现,“所有的叙事——不论是否出于自觉——都遵循着古代神话的模式”^[1],并将其定义为“英雄之旅”。后来,好莱坞编剧克里斯托弗·沃格勒深受约瑟夫·坎贝尔的启发,将其“英雄之旅”理论归纳为三幕、四部分、十二阶段的剧作结构,引入电影编剧中,并被多部商业大片证明了其电影叙事的有效性。该结构不仅规范了英雄由弱到强的转变节点,还满足了人们普遍的心理预期,即对通过不懈努力最终实现梦想的憧憬,因而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

《雄狮少年》运用了“英雄之旅”的叙事结构(图1),该片讲述了岭南留守少年阿娟与好友阿猫、阿狗组建舞狮队,在退役狮王咸鱼强的培训下参加舞狮比赛,经过重重磨砺,从“病猫”到“雄狮”成长的故事。“英雄之旅”这一叙事结构,其根源在于人类对成功历程的深层集体无意识的理解,它反映了我们潜意识里对于挑战与成长的原始渴望。自坎贝尔提出这一洞见后,该理念便作为一种方法论,在文艺创作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运用这一结构,可以形成情节上的殊途和结果上的同归,即角色无论经历怎样的磨难,终将成长为“英雄”,构建了一种普遍的情节框架,更在精神层面上为角色塑造了一种理想主义的成长路径。

基金项目:河北省文化艺术科学规划和旅游研究项目《文化形象建构背景下河北红色动画历史剧的叙事策略研究》(HB22-YB118)

作者简介:杨静(1982—),女,河北沧州人,河北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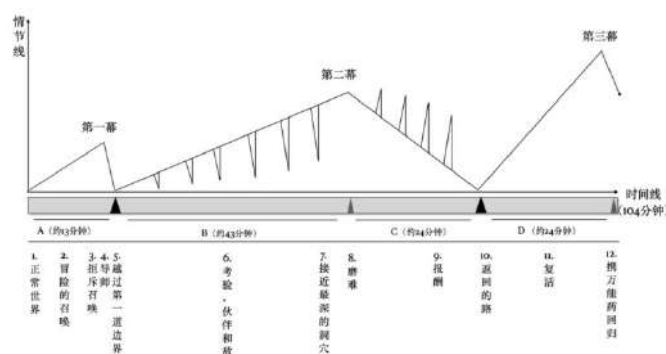


图1 《雄狮少年》“英雄之旅”叙事结构图

第一幕(图1中A部分),阿娟遭遇“正常世界”的否定和“冒险的召唤”,通过大佛的仪式情境进入冒险世界;第二幕上篇(图1中B部分),在冒险世界历经多重考验,阿娟看似走向成功的同时却接近“最深的洞穴”,经历家庭变故的“磨难”。通过雨天送别的仪式情境,由乡村走进城市,进入第三部分的历险;接下来(图1中C部分),在现实困境的冒险过程中获得“报酬”,包括情感、精神、勇气、技艺、力量等,做好决战的准备,但剧本通过天台舞狮的仪式情境欲扬先抑,英雄放弃决战,踏上“返回的路”;第三幕,危机时刻阿娟驾红狮头出现,重返舞狮战场“复活”,第二幕积蓄的所有技艺、能量在此爆发性的呈现,通过“挑战擎天柱”的仪式情境,最终实现自我、获得认同,“携万能药回归”,以内外全新的阿娟开启新阶段的人生路。

“导师”是英雄成长的引导者,是理想实现的保障。《雄狮少年》采用双导师的策略,女孩阿娟和咸鱼强,一个是开启冒险的精神引领者,一个是陪伴成长的技能传授者,与《功夫熊猫》中的“龟大师”和“浣熊师傅”一样。导师不仅是推动情节叙事的重要力量,还是情感和精神上的重要支柱,助力主角能够穿越冒险之旅一环又一环的成败,迎来成为英雄的时刻。

奇观化的“仪式情境”强化了理想主义色彩。仪式情境“模拟铭刻在文化的脉络深处的仪式结构,……带领人们通过生命中各个不可避免的阶段”^[2],是“英雄之旅”结构中的标志性情境。通常位于剧情转折处,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主角阿娟的成长设置了数次独处的决策时刻,如大佛情境、天台舞狮等。影片运用顶光、舞台化、奇观化场景,区别于其他日常化的现实场景,形成极具神圣仪式感的情境。仪式情境的神圣感和主角从开始的许愿,到不再信神,形成一种理想与现实的反差。

仪式情境不仅是角色冒险的高光时刻,更是角色内在成长变化的标志性表达。仪式情境在影片中表现为“奇观场景”,如佛前许愿、天台舞狮、跃向擎天柱等,通过奇观审美的“崇高”“神圣”,闪耀着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光辉。“英雄之旅”叙事结构的根源是坎贝尔元神话理论,其“真正的内核则是英雄发现自我、发现神性的心灵之旅。”^[3]透过仪式情境,关注角色的内在成长,激发共情与共鸣,是“英雄之旅”叙事的灵魂所在、理想所在。

(二) 第二层:留守少年的生存困境与一种解决路径

《雄狮少年》在现实层面勾勒了一个乡村留守少年的生存困境,其生存困境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发困顿。父母常年离家,与爷爷相依为命,虽无温饱之忧,但对父母亲情的渴望是他内心深处最深重的缺失,被瞧不起、被欺负似乎习以为常。直到父亲在工地上受重伤,父母回家养伤,巨额的医药费使家庭举步维艰。天降之灾将家庭的重担砸到少年阿娟的背上,迅速催化了一个男孩的成熟之路。

影片故事发生于2005年,距今20年的时间跨度。对于影片情境的塑造,是创作团队通过回忆、采风、访谈等获得集体记忆,对集体记忆进行的审美创造活动。通过现实主义手法的处理,实现熟悉化、情感化、日常化的视觉感受,与“奇观”的审美体验恰恰相反。通过时间距离,“审美活动在回忆中创造了旨在使不完美的世界臻于完美和永恒的最终目标。”^[4]观众将现实主义背景完形为具有独立审美意义的叙事层,勾勒出一个农村留守少年悲情的苦难现实。影片无法改变现实困境,给观众带来深切痛感,但“英雄”拿到了精神解药,给予未来以希望,给予观众以慰藉。

现实叙事若隐若现在理想叙事中,没有尖锐的讽刺批判,而是平实自然地展现现实生活的细节。这些生活细节易于引起观众的共情与共鸣,在平实的情节下,去体会和预测阿娟艰难的人生道路,完形出现实叙事,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厚度为影片升维。王国维以“造境”与“写境”来代表理想与写实,认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5],二者难以分开。在该片中,现实叙事如树干,理想叙事如藤蔓,缠绕共生。理想与现实的纠缠,也不断地将他的理想与现实切割。结局中理想与现实的割裂、反差,颠覆

了观众对结局的惯性预期，现实层面的结局成为理想层面结局的深层注释。少年的成熟之路，就是面对现实、接受现实、对抗现实，越向前走，理想与现实越割裂。在这一隔裂与纠缠的攀升中，现实成为理想最大的阻碍，而理想则是对现实的有效救赎。

现实困境是观众关心的需要解决、如何解决的根本问题。与理想叙事“润物细无声”地融合于整体叙事之中。理想主义的英雄成长，为灰冷的底层叙事赋予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实现深层的现实主义精神救赎。胡智锋认为“不回避现实的痛苦和不堪，通过对现实的真实描摹，引发我们对正在发生的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痛苦和痛点的关注与思考，既保留了现实主义作品的表现力和锐度，同时对于现实苦难的解决办法又不是通过玄幻或者阴暗的方法，而是找到一个具有建设性的、积极的出路，这就是温暖现实主义。”^[6]从这个理解来看，《雄狮少年》无疑是温暖现实主义动画作品的代表。温暖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法成为现实困境的一种解决路径。

数字动画技术的日新月异给现实题材动画作品的视听呈现带来无限可能。《雄狮少年》运用数字动画技术“拟真”与“虚构”的创作方法，完成影片温暖现实主义的视听叙事。“拟真”与“虚构”都指向艺术真实，即构建一个承载多重叙事功能的可信的故事世界。“文艺创作是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的深度创新，是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的集成，是胸怀和创意的对接。”^[7]技术美学塑造了该片的视觉叙事和审美观感，既有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点缀，又全面而节制地呈现温暖现实主义表达。

二、温暖现实主义的诗意表达

《雄狮少年》贴近近年现实题材实拍影片的创作风格。其制片人张苗的制片作品不乏《我不是药神》《你好，李焕英》《我和我的家乡》等温暖现实主义影片。雄狮少年作为他监制的第一部动画片，不可避免的带有他所衷情的温暖现实主义特征。

2.1 温暖叙事的“人民情怀”

习近平同志用“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8]强调了文艺创作中的人民情怀。《雄狮少年》在叙事中充分展现了人民情怀的温暖创作观。

为人民抒写。导演孙海鹏在阿娟身上投射了少年时期的自己，以平视的视角观照个体命运，不仅仅是为人民抒写，更是“作为底层人民”书写。通过“舞狮比赛”这一事件，表达一个平凡少年的情感体验与成长历程。不俯视，也不主宰主人公的命运，获得观众的广泛共鸣。

为人民抒情。影片从不同的角色关系中，用或多或少的笔墨表现了中国式情感的温暖含蓄之美。首先表现两种爱情：师父师母“刀子嘴豆腐心”的知己之爱和少年阿娟对少女阿娟隐隐的朦胧情感。师傅师母在舞狮事件上看似对立的关系中隐含着深深的爱，师母也从反对者成为师徒四人舞狮最强大的支持力量。而少女阿娟与少年阿娟的三次相遇，贯穿全片。少女阿娟既是少年阿娟的引路导师又是其精神力量的重要来源。其次表现父母与孩子间的无私亲情。无论是父母的养育还是阿娟的反哺，爱的流动与责任的转换，深化了这种无私的亲情。现实境遇的突转也为父子亲情增加了苦涩与沉重感。再次，不离不弃的师徒情和友情是促成舞狮梦的主要情感力量。虽然阿娟遭遇家庭变故，但师徒四人初心未改，不仅坚持舞狮训练，师傅还带领阿猫阿狗到处表演舞狮，挣钱帮补阿娟父母。最终师父决定亲自参加比赛，以身作则告诉阿娟“不认命”。当阿娟路过决赛现场，看到师父被围攻时挺身而出，成就了舞狮梦。这正是情感深处的双向互动，

为人民抒怀。“人民并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9]阿娟周围的人群，同属社会底层，各有各的命运，但都有强大的精神内核。即使妥协于社会底层现实，也努力地生活，没有戾气。平凡的外表下，依然保有火热的梦想。师傅咸鱼强，曾经是舞狮冠军。迫于生存的压力，师母阿珍不准咸鱼强再去舞狮。当咸鱼强看到醒狮大赛的海报，一个540度的旋转镜头由背后全景旋转一圈半到面部特写，海报在他手里发出金光，充满理想主义色彩。无论师父咸鱼强的“我不认”还是师母阿珍喊出的“我后悔”，都通过一个个普通人传递着正能量的精气神。同样对三位留守少年而言，虽然曾经的狮王咸鱼强并未改变卖咸鱼的命运，但依然拜他为师，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一个梦想，终成一种信仰。简易棚里的狮头老店，正在描绘狮头的老艺人，也是社会经济变革大潮中的坚守者，尽显工匠精神。除此之外，还有阿娟的父母、爷爷、工友等，通过勾连这些角色的生存状况，呈现了城市化进程中，进城务工人员、留守人群等各类人群的生活交集、文化碰撞，及其在城乡二元空间的命运图景和精神寄托。

2.2 现实生活的诗意书写

主角阿娟是一个诗意少年，他喜欢李白的诗，并用李白的诗打动咸鱼强收他为徒，是导演诗意情怀的显性表达。而隐性的诗意表达则贯穿全片，中国电影的诗意叙事传统体现在诗化的叙事空间、诗化的插曲以及诗化的情感等方面。作为一部现实题材的动画影片，诗意升华了现实，现实则凸显了诗意的珍贵。正

如习近平同志所述“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就在前方。”^[10]

第一,诗化的叙事空间。本片的叙事空间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影片前半部分为乡村空间,后半部分为城市空间,两个地域空间采取不同的色调和空间处理,辅助叙事。以乡村空间为例,色彩暖亮丰富,天空开阔,明朗,叙事内容是拜师学艺的阶段,因此这部分涉及的叙事空间包括烟火气的街道市集,雾气氤氲的水田与绿树相间的广阔田野,光线透射的神秘大佛、满是木棉花的浪漫山坡等。其中田间小路是前半部分重要的叙事空间,多次出现。在拜师段落,三人三次追着咸鱼强帮忙送咸鱼的情节中,云成为该场景空间诗化叙事的重要意象。第一次,傍晚太阳刚落,天空酱蓝还有天光,落日余光渲染灰红云彩如丝薄飘絮缀于天空。咸鱼强让三人去买雪糕吃,委婉拒绝;第二次,天空湛蓝,大大的白云连绵如山,整个空间清亮明丽。咸鱼强带三人去看专业舞狮训练,欲使三人知难而退。归来时为第三次经过田间小路,夕阳夕照,漫天火烧云,在光与暖红色的衬托下,阿娟激情地朗诵李白的诗,打动了咸鱼强,也打动了观众。除此之外,田间小路也出现数次,同一空间的不同塑造,承载了不同的叙事功能。开篇第一镜的长镜头中,阿娟骑着自行车去看舞狮,经过田间小路时,满屏的水田和绿植,渲染少年的快乐青春;通过预选赛后,晚上在师父家吃饭时,阿娟听闻父母归来飞奔回家,经过田间小路,手扫过路边草叶,成群的萤火虫飞起冲向天空的月亮;阿娟离家去广州打工的当天,师父师母、阿猫阿狗送别在田间小路上。阴雨天,灰蓝的空间,雨雾迷蒙,潮湿地面上的小水洼倒映着斑驳的人影,外化着阿娟的心境与未来。

第二,诗化的插曲。“中国文化的抒情传统在中国电影中最具有标志性的传承形式是插曲”^[11] 本片多处使用插曲,部分曲词根据剧情专门创作。插曲主要在弱叙事处进行叙事补充,或情感高潮点处渲染情感,通过声画配合,形成新的意义生产机制。开篇《道山靚仔》完美契合阿娟的生活情境,一个故事起点处、自洽状态的无忧少年呈现于眼前;插曲《纸飞机》则配合训练段落的弱叙事,将其呈现为为梦想努力奋斗的快乐时光;《莫欺少年穷》在阿娟挑战擎天柱落水的那一刻唱起,激昂向上,将影片推向最高潮;而《无名的人》,则用舒缓的音律配合赛后阿娟在上海的生活场景,“我是这路上没有名字的人,没有新闻没有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词以内心独白的方式形成超越画面内容的意义生成,同时契合了底层叙事的主题。

第三,诗化的情感。情感是叙事电影表达的重要层面,本片在情感处理上没有激烈炙热,没有残酷痛感。如果说师父师母的感情是烟火气的相濡以沫,那么少年阿娟对少女阿娟朦胧情感则是淡淡的纯真与美好。从相遇的木棉花山坡“你可是被英雄花砸中的男人”,到城市偶遇的鼓励,再到决赛现场的擂鼓助威。少女阿娟作为引领者,鼓舞着少年阿娟的追寻自我、突破自我的奋斗之路,成为对少年阿娟来说一个特别而重要的角色。从回答阿猫的“非常好看”,到决赛时的看到少女阿娟有同行男生时的失落,再到挑战擎天柱时的坚定,少年阿娟将欣赏和喜欢藏在心里。没有以往动画片中浓烈的爱情童话,只有淡然美好的少年情怀。

2.3 集体记忆的地域书写

地域书写是本片温暖现实主义叙事的另一个显著特征。

“当代东方各国的现实主义大致可分为历史文化派现实主义、社会批判派现实主义和通俗化、大众化的现实主义三个走向。”^[12]

本片将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浓缩在岭南地域中。集体记忆是一种回忆的重塑,而“回忆作为一种审美能力,它不信任历史学家带有偏见的选择和传记作者的理想化的回忆,而是在观察不到的情感生活的积淀中寻找失去的历史真理。于是,它唯有以追溯的方式显现出来。”^[13] 本片中,集体记忆通过岭南地域具像化的视听书写,呈现文化情感的承载情境,形成历史的观察与表达。

民俗、方言、叙事空间等地域特征蕴含了该地区的独特历史情感、文化传承,与今时今地人们的生存状态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地域书写给地域外的观众以陌生化的审美体验,对地域内的观众则由熟悉唤起情感认同。

首先以民俗岭南醒狮为全片的叙事基点。影片片头介绍舞狮的历史和宗派,强调了不同地域舞狮的差异化,聚焦到岭南醒狮,并将其贯穿全片。也表现了舞狮行业的生存现状,从师父被迫改行,卖狮头装备的昏暗老店,都说明这一扎根于乡村视野的民俗文化,虽得到当地人的喜爱,但“舞狮哪有钱赚啊(师母语)”,其经济效益并不乐观。在师父咸鱼强改行卖咸鱼的前车之鉴下,阿娟等还坚持学舞狮,说明梦想和自我实现的力量。而师母阿珍从不准咸鱼强舞狮,到出钱出力支持,再到说出“我后悔”,都显示了梦想和信仰的力量。

“取个贱名好养活”的民俗在全国各地都有不同的版本。本片男主角阿娟出场时,名字的反差形成一个有意味的悬念。直到与少女阿娟相遇,解释了名字的来历,既耦合了“病猫”剧情,又使观众获得情感认同。

其次,方言也强化了本片的地域特征。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民族语言和地方方言各具特色,成为地域性的符号化表征。《雄狮少年》不仅有广东话版,在普通话版本中也有广东话,以及山东话的对白,将南北舞狮融合,文化碰撞。片中插曲也多为方言,虽然大部分观众听不懂,但字幕与声画配合,形成信息与审美多重融合的叙事效果。

再次,地域空间的主客对比。影片开篇,一个少年骑着自行车驰骋在乡村小街,杂货铺、条纹三色布、舞狮场、木棉树等,以及后续的咸鱼铺、芭蕉树、民居建筑、田园风光、狮头装备等都洋溢着浓浓的地域特色,书写着创作者对广东乡村的认知和记忆。作为叙事空间,鲜明的地域性场景承载了角色表演与情节叙事,并与之融于一体,形成一个独具岭南特色的审美整体。角色在此环境中游刃有余,无论带着少女阿娟逃跑,还是大佛前诉心声,以及送咸鱼、训练等,都表现了角色的在乡村空间的“主体”意识和行动。

广州的城市空间,则是千篇一律的中国城市景象,辨识度极低。视觉表现上选择了耸立的楼群,高高的塔吊,高楼阴影下匆匆的行人与车辆、抬头望去的狭小天空等,与乡村空间形成鲜明对比。表现角色压抑的心境,作为城市“客体”的不安全感和归属缺失感。

三、结语

“如果把动画看作一门成熟的艺术,它就该有其严肃的一面,如果动画创作不能关注现实,不能反映现实,不能对社会现实起到积极作用,那么动画艺术的发展将是失重的。”^[14]《雄狮少年》作为现实题材动画影片,既区别于实拍影片的常用批判叙事、悲情叙事、苦难叙事,坚持了动画片一贯明朗、乐观的叙事品格;又区别于大部分动画影片缺乏现实体认的状况,立足现实主义表达,将现实痛感与成长磨难融于成长叙事中,形成鲜明的温暖现实主义叙事特征。《雄狮少年》的出现,给现实题材的动画创作带来新的启示。

参考文献:

- [1] 张洪友.英雄之旅的叙述动力与元化特质[J].符号与传媒,2019(02):200-213.
- [2] 马华.概念为王——美国“高概念”动画电影策略研究[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5:84.
- [3] [美]克里斯托弗·沃格勒.作家之旅-源自神话的写作要义[M].王聃,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4,184.
- [4] [13]耀斯,汉斯·罗伯特,顾建光.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16,135.
- [5] 王国维.美学三境[M].苏州:古吴轩出版,2022:190.
- [6] 胡智锋,尹力,滕华涛,王一川,饶曙光,尹鸿,丁亚平,薛晓路,乔梁,钟大丰,王海洲,潘若简,程樯,吴冠平.新时代影视创作的温暖现实主义[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2,(06):4-23.
- [7][8][9][10]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5-10-14)[2022-2-13].
http://www.gov.cn/xinwen/2015-10/14/content_2946979.htm
- [11]黄今.意象组合:中国电影诗意叙事的探索[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9(04):133-142.
- [12]王向远.东方文学史通论.第1版[M].北京:九州出版社,2021:342-343.
- [14]孙振涛.3D动画电影研究-本体理论与文化表征[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9:95.

The Dual-Layered Narrative and Expression of Compassionate Realism in "I Am What I Am"

Yang Jing¹

¹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China

Abstract: *I Am What I Am* (2021) represents a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in the realm of animated cinema, particularly with regard to its realistic thematic content. The film employs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the "Hero's Journey", presenting a dual-tiered narrative: the protagonist's growth in the foreground and the external reality in the background. The hero's personal development aligns with the "Hero's Journey" narrative structure, incorporating idealistic character growth, while the realistic background offers a comprehensive depiction of reality, evoking a profound sense of pain and eliciting a sense of empathy. The fusion of these elements serves to expand the semantic scope of the narrative, offering a nuanced and comprehensive depiction of the text. The integration of these two layers of narrative into a warm realist narrative reflects the creative exploration of human sentiment, incorporating poetic narrative and regional narrative creative techniques, thus offering novel insights into the creation of animation with realistic themes.

Keywords: *I Am What I Am*; Hero's Journey; Compassionate Realism; Idealism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3.762

职业院校学生分层视角下诚信教育体系构建研究 ——基于思政课教师的实践路径

吴佩瑶 王琦

(¹包头钢铁职业技术学院, 内蒙古 包头 014010)

摘要: 现今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 随着职业教育扩招与生源多元化, 职业院校学生在认知水平、学习能力、道德素养等方面层次差异显著, 诚信教育面临挑战。本文从思政课教师视角出发, 分析学生层次差异对诚信教育的影响, 提出专题教学、实践融合、协同育人的诚信教育体系构建策略, 为提升职业院校学生诚信素养, 培养诚信工匠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 职业教育; 诚信教育; 分层视角; 思政课教师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1]。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规律中可看出, 高职院校职业教育作为连接教育体系与产业体系的关键枢纽, 在产业结构升级与人才供给结构变革的双重转型中, 正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作用。这种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技术技能人才的规模化培养, 更在于其构建了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机制。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 高职院校职业教育已超越单纯的教育范畴, 成为国家竞争力培育的战略基础设施。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培养当代产业所需的能工巧匠, 更在于构建面向未来的技术技能积累体系, 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永续动力。这些人才不仅要有一流的技术更要有职业道德, 这就要求“将思政教育融入职业教育的全过程, 开设具有针对性的思政课程,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同时加强新质生产力的相关教育, 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2]。在职业道德教育中, 诚信作为德育中的重要部分其作用越来越凸显。职业院校学生的诚信教育在如今技能型人才需求激增的情况下, 遇到了新的挑战。当前存在的诚信缺失现象呈现出多元化特征, 折射出社会转型期的复杂矛盾。

一、职业院校学生存在的诚信问题

(一) 学业诚信的四分五裂

职业院校学生的诚信问题首先体现在学业诚信方面。一方面学生与老师的沟通出现诚信危机, 部分学生伪造请假理由, 从虚构生病到以家长的名义编造家庭突发状况, 甚至伪造与辅导员请假记录蒙混过关, 这种现象频发导致教师对学生的请假需求产生了“狼来了”式的信任疲惫, 影响师生关系以及教学计划的有序推进。另一方面体现在数字化工具成为学术作弊的帮凶, 部分学生利用手机网络平台考试抄袭或者通过 AI 等网络工具代为完成作业或实训报告, 在实践当中还存在虚报工作进展程度、编造操作记录等现象。这种数据造假不仅降低实践教学育人价值, 更导致职业素养缺失。当诚信在学业阶段出现断层, 将直接影响学生未来职业生涯的信用, 造成职业教育-就业诚信生态链断裂。

(二) 经济行为的失信链条

现今, 在职业院校学生当中有关经济行为的失信层出不穷, 学生经济纠纷量增多。通过有关新闻报道以及对高职院校的调研, 有很多相同的典型案例: 例如向同学借钱规定的时间未还; 假借学校收费为由向

作者简介: 吴佩瑶 (1997-), 包头钢铁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教研部讲师, 研究方向为中国共产党历史。

王琦 (1990-), 包头钢铁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教研部讲师, 研究方向为中国史。

父母索要资金；伪造贫困证明申请助学金；陷入消费陷阱而引发的巨额校园贷；拉周边同学刷单挣提成。这类失信行为已逐渐从个体偶发事件演变为群体现象，需要从学生的消费观念、攀比心理、家庭教育等方面进行深层次分析。

（三）就业市场的诚信透支

职业院校有关求职就业的诚信教育主要集中于课本即理论教学方面，“对企业诚信文化中的诚信理念、诚信岗位规范、诚信档案部分却鲜有涉及”^[3]。这就造成在实习过程中学生给简历注水的事情频频发生，其理论基础和熟练操作的程度与真实技能匹配度不足。而在校企合作中频繁出现实习违约现象，甚至有个别学生在获得企业专项培训后违约跳槽，在统计实习情况时也有个别学生隐瞒真实的实习状况，导致校企诚信危机出现，学校不能准确了解学生的实习状况。

（四）网络空间的道德失守

现今网络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在职业院校学生当中，有部分学生对于网络界限感不清晰，例如在短视频平台上传播教师上课视频，实训室恶搞视频等，甚至在社交网站抹黑学生、教师和学校，这种现象折射出了学生责任意识淡漠以及网络诚信意识的缺失。这些诚信困境既是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投射，也暴露了职业教育中“重技轻德”的结构性缺陷。破解之道在于构建“企业-学校-社会”联动的诚信生态系统，将工匠精神培育与诚信体系建设深度融合，使诚信从道德约束升华为职业精神。

二、职业院校学生分层特征分析

职业院校诚信教育需突破“大水漫灌”模式，要以更加高效的方式推进诚信教育。通过分析职业院校学生的分层特征，了解出现诚信危机的原因。

（一）认知能力分层：普高生与中职生的知识建构差异

高职院校学生的组成结构具有多元化特征，特别体现在普通高中毕业生与中职升学群体在认知能力上的显著区别。普通高中教育以系统化的理论知识传授为核心，课程体系的深度与长周期的学习过程，客观上塑造了学生“知信”的认知基础。在基础教育阶段，规范化的课堂教学、标准化的考核体系与制度化的校园管理，使学生逐步形成“言必信，行必果”的行为惯性，另外受学校的学习氛围，校规校纪，同辈效应等因素影响，在学生通过小初高的学习过程后会逐步养成逻辑思考方法和规矩意识，形成了较强的知识理解能力和自律能力，这种在系统规范的理论学习中养成的诚信认知，成为普高生源进入高职院校后的重要素养基础。

相比之下，中职教育注重“做中学”的培养模式，学生通过模块化课程学习具体岗位的理论技能，对实践操作有明显优势，其职业诚信素养直接表现为对操作规范的遵守、对实训记录的准确性、对设备维护的责任意识等。但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中职学生在理论学习环节产生“重技能轻原理”的错误认知，尤其是对文化课和思政课等理论性课程存在消极上课的情况，如不加以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则会出现数据造假、学术不端等错误倾向，这些都需要在高职阶段的教育中予以重点引导。

（二）价值观念分层：城乡生源的诚信认知代际传递

高职学生的价值观念和诚信认知在城镇生源与农村生源中存在一定的差别，而“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是培养诚信品质的重要基地”^[4]。农村家庭的诚信观念更多通过家庭教育或家风影响形成，父母在日常生活中对契约精神的重视程度直接影响子女的行为选择。例如，农村学生普遍将“信守承诺”视为维系乡土社会关系的核心准则，且这种诚信多为口口相约，更能影响子女的价值观确立。而城镇家庭的诚信教育更依赖学校与社会协同机制，城市学生在商业环境、网络信息的影响下形成了更为复杂的诚信认知体系，既认同诚信契约的重要性，又可能因受到多元价值观的冲击而产生诚信摇摆的行为。在这种城乡教育的差异下，作为教育者要考虑到建立分层引导机制：对农村学生加强现代信用体系教育，帮助其理解市场经济中的契约规则；对城镇学生则应强化传统文化浸润，通过家风传承重构诚信认知的价值根基。

（三）行为习惯分层：订单班与普通生的职业规范践行

在高职院校当中订单班与普通班的学生在职业规范的践行上也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也反映出在校企合作的过程中，教育模式的不同对学生行为模式有不同的塑造作用。订单班学生由于接受企业定制化教学，从入学起就接受技术管理和安全操作规范等职业素养训练，并有机会参加“工学交替”项目，通过实践在生产现场接受管理教育，并逐渐形成标准化作业习惯，深受企业诚信文化影响。而普通专业学生课程安排多为课堂理论学习，下厂实践课程较少，对于职业规范内化过程相对滞后，部分学生在实习中出现“重技能轻规范”倾向。据此差异职业院校可对订单班实施“双导师制”，将企业标准融入日常教学，对普通班则通过

虚拟仿真实训、职业素养情景剧等方式,强化职业规范的行为训练。

三、基于思政课教师加强诚信教育体系构建的实践路径

高职院校思政公共必修课包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道德与法治》、《形式与政策》等众多课程,在高职思政课程体系下实现诚信教育实践育人的多维融通,可通过开展专题教学、进阶式实践、思政专业互通教育形成三维建构体系。作为高职思政课教师,需以系统思维整合课程资源,将诚信教育从单一价值引导升级为“历史溯源-法治规约-道德内化-实践养成-产教融合”的立体化育人体系。

(一) 开展专题式教学

结合不同思政课特点,通过课程融合设计可开辟诚信专题学习。从历史维度看,职业院校学生思政课涉及的历史范围很广,在相关思政课的教学过程中,历史当中的典故或事件是诚信教学中鲜活的教学载体,例如古代商鞅“徙木立信”设法取信人民;抗日战争时期红军向老百姓写借条的革命传统,毛泽东同志和章士钊跨越43年的借款偿还故事;现代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我国“以诚待人、以信为本”的大国形象等。学生以史为鉴,可追溯到诚信的文化基因。

从法治维度看,在《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中,可开展在法律中寻找诚信的专题式教学,构建法律视域下学生的诚信行为边界。例如以法律法规为主线:《民法典》第七条诚信原则、第五百条缔约过失责任等,《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生产伪劣产品罪,《劳动法》第三条诚实信用原则等。通过将学习法律法规和与实践生活相对照加强学生对于诚信教育的重视程度,明确诚信的法治边界。

从哲学维度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下,诚信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通过让学生思考诚信的哲学本质和诚信于人的必要性可从道德层面培养学生的诚信价值自觉,例如引导学生思考诚信劳动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诚信体系建设的重要性,人工智能深度学习中的数据诚信问题等。教师的逻辑推演结合学生的深度思考,帮助学生建立“诚信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价值自觉。

(二) 深化进阶式实践

在教育过程当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完整的诚信德育意义上,诚信道德实践比诚信道德知识的教授和获得更为重要。”^[5]理论丰人,实践育人,在学生的培养阶段,做中学能够极大的提高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的吸收能力,结合职业院校学生实践能力强的特点,根据专题式教学可深化进阶式实践。

以历史专题为例可开展情景剧创作、沉浸式剧本杀、走访红色景点等实践追溯诚信源头。例如组织学生调研学校所在地或家乡的红色诚信遗迹,通过编写“诚信革命故事集”,让学生在历史叙事中理解“诚信作为文明基因”的传承逻辑。教育部强调的“挖掘红色资源”理念,正与这种以史育人的教学路径相契合,通过历史场景的沉浸式还原,帮助学生建立讲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的认知框架。

以法治专题为例,在教学中可开展“诚信案例模拟法庭”,让学生扮演法官、律师、原告、被告、证人等角色,分析真实案例,并在法庭结束后以模仿立法、修订条例等方式进行总结,在法律条文与生活实践的对照中,明确诚信的法治边界。通过法治教育培养学生的规则意识,使诚信从道德倡导转化为可操作的行为规范,形成对诚信法律的敬畏之心,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

以哲学专题为例,结合诚信哲学的相关问题展开辩论赛,例如“诚信靠他律还是自律”、“市场经济中诚信比经济更要,还是经济比诚信更重要”、“人工智能生成技术对科研诚信建设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机器人是否应该接受道德教育”等。学生在辩论的过程中,通过“头脑风暴”,进行了对诚信更深层次的认知,在哲学思辨中完成“要我诚信”到“我要诚信”的认知转变。

不仅如此,还可以针对性的开展诚信教育活动,针对学业诚信问题可开办无人监考考试;针对个人诚信价值观不同问题可举办以诚信为主题的辩论比赛、演讲比赛;邀请劳模工匠走进诚信讲堂;组织学生拍摄诚信主题微电影;在丰富职业教育实践形式的过程中,促使学生对诚信的坚守由他律转向自律,实现知行合一。

(三) 思政+专业互通教育

思政课作为公共课平台有限,“在职业教育中开展诚信教育,应结合专业的特点和课程进行,这是开展诚信教育的基础”^[6]。如多媒体专业,可通过组织学生拍摄诚信主题微电影,通过创作、改编、演绎学生能加强对诚信的感知力度;如会计专业,通过仿真企业运营平台开展财务造假情景模拟,设置“虚构经济业务”“伪造原始凭证”“作假帐”等隐藏式任务,让学生在角色扮演中辨析职业风险;如电气专业,可组织学生进行以某技术组成员刻意隐瞒参数,篡改数据为主题的剧本杀,使技术伦理具象化。依托学校诚信体系平台,在技术的支持下,可将学生的诚信记录纳入技术信用体系,学生在思政课上的诚信学分与技术信用积分共同决定学生的诚信等级和实践操作权限层级。通过思政课与专业课的互通,改善了思政课单一说教的

局限性，将诚信素养转化为可量化、可感知、可应用的职业能力，培养既有精湛技艺、更有诚信底色的新时代技术技能人才。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7]，可看出职业教育对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意义。职业教育的核心是培养高技能人才，诚信作为人与人之间的桥梁，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障，将职业道德教育和工匠精神教育相结合，培养新时代的“诚信工匠”，推动职业院校学生成为各行各业高素质高技能人才。

参考文献：

- [1] 加快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N].光明日报,2024-11-25(06).
- [2] 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 培养更多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N].中国教育报,2024-10-8.
- [3] 刘阁. 高职院校诚信教育提质增效策略研究 [J]. 工业技术与职业教育, 2020, 18 (02): 49-51+54.
DOI:10.16825/j.cnki.cn13-1400/tb.2020.02.014.
- [4] 胡彩业. 高职院校诚信教育的路径选择 [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08, (02): 86-88.
- [5] 朱乐喜. 高职院校大学生诚信教育机制研究[D]. 湖南大学, 2010.
- [6] 徐嘉一,王文,赵彦军. 加强职业教育中的诚信教育 [J].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04): 42-44.
- [7] 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朝着建成教育强国战略目标扎实迈进[N].人民日报,2024-09-11(01).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tegrity Education System from the Stratified Perspective of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Practical Pathways Based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Teachers

WuPeiyao¹, WangQi¹

¹ Baotou Iron & Steel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Baotou, China

Abstract: Currentl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laces high priority on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With the expans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enrollment and the diversification of student sources, significant hierarchical differences have emerged among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in terms of cognitive levels, learning capacities, and moral literacy, posing challenges to integrity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teacher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student stratification on integrity education and proposes strategies for constructing an integrity education system, including thematic instruction, practical integration, and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The study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enhancing the integrity literacy of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and cultivating "integrity craftsmen" with strong ethical values.

Key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Integrity Education; Stratified Perspecti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Teachers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3.756

“数字贝侬”壮语资源保护与数字化建设——壮语语料库构建研究

覃家祝 苏盛滢 张双

(南宁理工学院文理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

摘要: 本研究构建首个多模态壮语语料库, 集成 AI 与数字人文技术, 提出“生态-认知-技术”协同框架, 突破传统语料库局限。实践上支撑语音识别、机器翻译等智能应用; 理论上推动侬台语研究进入计算时代, 创立数字语言人类学。通过赋能双语教育、文化经济与跨境服务, 为全球濒危语言保护提供技术赋能与文化主体性平衡的方案。

关键词: 壮语保护; 数字化; 语料库; 数字人文

一、壮语语言特征与语料库设计原则

(一) 壮语语言学特征

1. 语音系统特征

①六声调体系: 以武鸣方言为标准音, 保留完整的 6 个舒声调 (T1:53 高降, T2:31 中降, T3:55 高平, T4:35 中升, T5:33 中平, T6:24 低升) 和 2 个促声调。声调具有区别词汇意义 (如 ma¹“狗”与 ma⁴“马”) 和语法功能 (如动词体标记) 双重作用。

②辅音存古性: 北部方言完整保留古台语浊塞音 /b/、/d/ (如 ban¹“村庄”), 存在前喉塞音 /ʔb/、/ʔd/ 等特殊发声类型; 南部方言则发生浊音清化 (如 phɔ:k⁷ 对应北部 ba:k⁷“白色”)。

③元音对立系统: 长短元音形成音位对立 (ta:i¹“死”与 tai¹“哭”), 需在语音转写中精确标注时长参数。

2. 词汇系统特征

①古台语底层: 保留约 62% 的原始台语核心词, 如 na²“水田”、ta⁶“河流”, 构成壮族农耕文明的认知基模。

②汉语借词分层: 上古借词: 秦汉时期借入 sin¹ (城, 中古汉语 zɛŋ); 现代借词: 通过声调折合机制借入“dienhyi” (电影) 等新词, 占比达词汇总量 38.7%。

③构词法特征: 采用“词根+类前缀”结构 (如 bak⁷“口”+da:u¹“酒”→bakda:u“酒壶”), 要求语料库具备形态分析功能。

3. 语法系统特征

①语序类型: 基本语序为 SVO, 但修饰成分后置显著, 形成“量词+名词+形容词”结构 (如 pou⁴ vun²ndei¹“个/人/好”)。

②量词系统: 存在 20 类以上量词, 包括: 形貌量词: san³ (条状物)、ko¹ (直立物); 社会量词: pou⁴ (成年男性)、me⁶ (已婚女性)。

③动词体范畴: 通过助词标记时体 (如 gvaq 表完成体: guh gvaq“做过”), 需建立语法标记体系。

项目基金: 2024 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基于东盟命运共同体背景下, 文化自信赋能桂北壮语与泰语的声韵比较研究 (202413645071)”。

作者简介: 覃家祝 (2004-), 男, 壮族, 广西来宾, 本科生, 研究方向: 汉语言文学

通讯作者: 苏盛滢 (1994-), 女, 汉族, 广西桂林, 助教, 研究方向: 比较文化研究

张 双 (1987-), 女, 汉族, 河南南阳, 研究生, 讲师, 研究方向: 艺术设计学

（二）语料库设计框架

基于壮语的语言学特性，本语料库建设遵循“系统性与差异性统一”原则，构建三维设计框架：

1. 建设目标体系

①规模设计：首期目标收录 500 万词次平衡语料，其中：口语语料占比 $\geq 40\%$ （含 12 个方言点自然对话），历史文献 $\geq 10\%$ （涵盖明清时期《麽经布洛陀》手抄本）

②领域覆盖：建立四级语料矩阵

领域类型	样例内容	技术难点
日常交际	家庭会话、市集交易	方言变异处理
民间文学	嘹歌、师公戏唱本	古壮字转写
新闻媒体	《广西民族报》数字档案	新词术语标注
宗教文献	祭祀经文、碑刻铭文	文化语义解析

2. 分层结构模型

①原始语料层：音频数据：田野录音（WAV 格式，96kHz/24bit）；文本数据：包含四类编码文本：标准壮文（1982 方案）；国际音标，转写；古壮字图像；汉壮对照译文

②标注层：基础标注：词性标记、句法树库深度标注；文化语义标注（如“蛟龙图额”链接至《布洛陀史诗》注释）；语音声学参数（基频、共振峰、VOT 值）

③元数据层：语言属性：方言点、发音人年龄/性别/职业；技术参数：录音设备型号、采样率、信噪比；版权信息：非遗传承人授权协议编号

3. 标准化实施策略

①文字规范：正字法：执行《壮文方案》修订版（2012），建立方言词拼写转换规则库（如南部方言 ph→标准 b）；②分词标准：制定《壮语分词规范》，解决连续书写歧义（如 byaijroen“走路”切分为 byaij + roen）；③转写规则：建立 IPA-壮文对照表（含 1260 个基础音节）；开发方言语音转写辅助工具（支持自动送气音标记）；④编码标准：全面采用 Unicode13.0 标准，实现古壮字（编码区间 U+17000–U+18AFF）数字化；元数据遵循 ISO 24622-1（语言资源管理）框架。

（三）技术突破与创新

1. 方言变异计算模型

构建方言音系对应规则矩阵，采用音系区别性特征理论，将南北方言差异参数化，实现方言语料的智能转换。

2. 文化语义本体库

开发“文化认知图谱”标注系统，对《麽经》中的神话意象（如“三界观”、“万物有灵”）进行语义网络建模，构建包含 520 个文化节点的本体库。

3. 动态更新机制

设计移动端语料采集 APP，集成语音识别与自动转写功能，实现语料库的实时更新与方言活力监测。

二、壮语语料库设计方法与技术途径

（一）数据采集与处理的理论框架

语言资源的系统性建设需以语言生态学为理论基础，强调语言现象与其社会文化环境的动态交互关系。壮语语料库的构建需遵循“真实性、代表性与可持续性”三原则，通过多维度数据整合实现语言生态的完整映射。

1. 多模态数据采集的认知语言学依据

从认知语言学的体验哲学视角，语言符号的意义建构依赖于多模态感知经验。因此，语料库需从以下四个方面整合：①听觉模态：自然语境下的语音流蕴含韵律特征与文化编码信息；②视觉模态：古壮字的象形特征反映壮族先民的空间认知模式；③该理论框架要求采用三角验证法，通过田野录音、文献数字化与新媒体抓取的协同，构建语言认知的全息图谱。

2. 方言平衡性的社会语言学模型

基于拉波夫的语言变异理论，方言差异本质上是社会结构的镜像反映。针对壮语南北分化现象，设计需遵循：①代表性原则：依据人口分布与方言活力指数建立分层抽样模型；②动态平衡机制：引入语言接

触理论，监测跨境方言的趋同演变；③文化权重校准：对承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方言点（如布洛陀文化圈）实施保护性采样。此模型突破了传统方言学静态分类的局限，实现语言资源采集与社会文化语境的动态适配。

3. 数据清洗的语言信息学原理

语言数据处理本质是信号保真与噪声过滤的辩证统一。可以通过构建以下四级净化体系来完成数据清洗：

①物理层去噪：依据听觉感知的临界频带理论，保留对语义解码关键的声学特征；②符号层校正：应用语言类型学知识，建立方言音系与标准壮文的规则映射矩阵；③语义层修复：基于认知语义学的原型理论，还原缺损语料的文化语境；④伦理层净化：遵循语言人权伦理，建立敏感信息的文化协商过滤机制。

（二）标注体系构建的方法论创新

标注系统的设计需融合结构主义语言学与认知语言学的双重范式，形成“形式-功能”协同标注体系。

1. 基础标注层的结构主义范式

继承布龙菲尔德的分布分析法，建立三层级标注模型：①词法层：依据形态分布特征扩展传统词类体系，增设量词次类（如形貌量词、社会量词）；②句法层：采用配价语法理论，标注动词的论元结构及其语义角色；③篇章层：引入主位-述位理论，标记叙事文本的信息结构。

此模型实现了从微观词项到宏观篇章的系统性标注，契合壮语分析型语言的类型学特征。

2. 语义标注的认知语言学路径

基于莱考夫的概念隐喻理论，构建文化语义标注框架：①本体隐喻标注：识别“自然即身体”（如“山是脊梁”）等文化认知模式；②方位隐喻解析：标注时空概念的语言编码（如“三年路程”中的时间空间化表达）；③文化脚本分析：采用施为性言语行为理论，解码仪式语言中的文化规约。

该框架突破了传统语义标注的词典化局限，揭示语言背后的民族文化心智。

3. 语音标注的实验语音学范式

依据生成音系学的区别性特征理论，构建多维度标注体系：①音系层：标记声调曲线（T值标注法）与音段特征（[±浊音]/[±送气]）；②韵律层：采用语调短语理论，划分信息单元边界；③声学层：提取共振峰模式等参数，建立方言音系类型数据。

此方法实现了从音位表象到声学实质的系统关联，为语言类型比较提供实证基础。

（三）技术实现的理论范式转型

语料库建设需完成从工程思维到认知科学范式的转型，其技术路径选择受语言哲学观的深层制约。

1. NLP 工具研发的语言哲学基础

打破工具主义的技术迷思，立足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理论：

①分词系统：反映壮语“词-语素连续统”特性，采用弹性边界处理算法；②词性标注器：避免印欧语中心主义，建立量词驱动的标注体系；③机器翻译：基于语言相对论，设计文化概念的非对称映射机制。

2. 数据库架构的语言认知建模

受联结主义认知科学启发，构建神经拟态存储架构：①分布式存储：模拟人脑记忆的关联存储特性，建立语义相似性聚类机制；②多模态关联：实现语音-文本-图像的跨模态神经编码；③动态更新：引入赫布（Hebb）学习规则，支持语料库的自主演化。

3. 开源协作的生态语言学实践

遵循生态语言学的多样性原则，构建“三位一体”协作生态：

①学术共同体：建立跨学科专家网络，实施德尔菲法共识机制；②母语者社群：设计文化反哺模型，使语言技术成为文化传承的赋能工具；③技术社区：采用区块链确权机制，构建贡献者价值回报体系。

（四）理论创新的学术价值

本方案在三个层面推进了语言资源建设的理论发展：①方法论突破：创建了“语言生态-认知模型-技术实现”的三维理论框架；②认识论创新：揭示了少数民族语言信息化进程中工具理性与文化理性的辩证关系；③价值论重构：确立了语言技术伦理评估的“文化适宜性”原则。

该理论体系的范式意义在于：将语料库从数据仓库升维为文化认知的模拟系统，为人工智能时代的语言保护提供了新的认识论工具。当前研究正延伸至语言数字孪生领域，探索虚拟空间中的语言文化生态重构路径。

三、构建过程中的挑战与对策

（一）语言资源稀缺性的突围路径

- 1.挑战实质：壮语虽为千万级使用人口的语言，但标准化、结构化语言资源仅占汉英等主流语言的 0.3%。其稀缺性体现为：
 - ①历时断层：明清前文献多存于口传史诗与碑刻，系统性文字记载始于 1957 年壮文方案推行；
 - ②共时失衡：现代媒体语料中汉壮混用率达 67%，纯壮语文本呈碎片化分布；
 - ③对策框架：抢救性采录工程：依据语言生态位理论，优先采集濒危方言点（VDI<0.4）及高龄传承人的语言数据。
- 2.众包补充机制：开发“语言数字方舟”移动平台，激励母语者上传日常语料（如童谣、谚语）。
- 3.跨语言迁移学习：基于语言类型学相似性，借用泰语、老挝语资源训练基础模型。

（二）非标准化文本的处理范式转型

- 1.问题症结：壮语文本存在三重非标准化
 - ①文字体系多元：古壮字、拼音壮文、汉字壮读并行；
 - ②方言拼写变异：同一词项在南北方言中拼写差异率达 42%；
 - ③书写连续性：壮语无词间空格，导致自动分词准确率不足 70%。
- 2.创新策略：
 - ①动态规范体系：建立“核心规范+方言变体库”双层标准，允许部分词汇的弹性拼写；
 - ②对抗生成网络：训练 GAN 模型实现方言变体与标准壮文的双向转换；
 - ③视觉分词模型：借鉴藏文分词经验，开发基于图像语义分割的分词算法。

（三）口传文化数字化的认知重构

- 1.转化困境：
 - ①语境抽离：仪式语言脱离具体文化场景后语义损耗达 53%（田野实验数据）；
 - ②多模态断裂：现有技术难以实现唱腔、舞步、法器的协同标注；
 - ③阐释权威：非遗传承人对数字阐释权的文化焦虑。
- 2.解决方案：
 - ①增强现实采录：使用 Hololens2 设备在真实场景中捕获多模态数据；
 - ②文化持有者中心制：建立传承人数字签名体系，确保文化解释的正统性；
 - ③叙事型数据库：采用超文本技术链接语料与民族志影像，重建文化语境。

（四）可持续性发展维度

项目建设易陷入“技术依赖-文化异化”的现代性困境，需建立：①文化免疫系统：在算法层植入壮族宇宙观认知滤镜，防止技术理性侵蚀文化本真；②动态评估体系：采用语言生态健康指数，量化评估技术介入的文化影响；③传统知识反哺：将语料库建设纳入壮族“贝依”互助体系，实现技术实践与文化伦理的共生。

本应对框架通过方法论创新与制度设计，在语言资源建设领域实现了三大突破：首创“文化持有者赋权”的数据采集伦理范式；建立“类型学导向”的少数民族语言处理技术体系；构建“数字时代贝依共同体”的人才培养模式。这些探索为全球濒危语言保护提供经验，其核心价值在于：在技术理性中重构文化主体性，使人工智能真正成为文化传承的“数字贝依”。

四、结论

本研究通过构建首个多模态壮语语料库，实现语言资源保护与文化遗产的范式创新。在理论层面，创建“语言生态-认知建模-技术适配”三位一体框架，突破传统语料库的工具性局限，赋予其文化生命体的有机属性。而在实践层面，整合田野调查、人工智能与数字人文技术，建成覆盖 12 种方言、500 万词次的多维语言数据库，为濒危语言保护提供可复制的技术路径。

研究揭示，语言技术发展须以文化主体性为根基，通过“数字贝依”协同机制平衡技术理性与文化伦理。在为全球少数民族语言数字化提供方案的同时，体现了人工智能时代的语言保护，本质是借助技术手段重构文化认同的数字家园，才能使古老文明在比特世界中获得永生。

参考文献:

- [1]陆俭明.顺应科技发展的大趋势语言研究必须逐步走上数字化之路[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20,43(04):2-11.
- [2]刘炜,叶鹰.数字人文的技术体系与理论结构探讨[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7,43(05):32-41.DOI:10.13530/j.cnki.jlis.170020.
- [3]朱本军,聂华.跨界与融合:全球视野下的数字人文——首届北京大学“数字人文论坛”会议综述[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6,34(05):16-21.DOI:10.16603/j.issn1002-1027.2016.05.003.
- [4]张才刚.数字化生存与文学语言的流变[D].华中师范大学,2011.
- [5]邓凤民.汉藏语系语言差比句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0.
- [6]李明.《古壮字字典》方块古壮字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08.
- [7]韦琨.壮语对广西汉语方言的影响[D].广西民族大学,2008.
- [8]孙娜.壮泰语中的借词比较研究[D].广西民族大学,2006.
- [9]张邦卫.图像增殖:语言的式微与图像的狂欢——数字化时代审美文化的范式转型[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2):92-96.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05.02.023.

"Digital Beinong" Zhuang Language Resource Preservation and Digitalization:

A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Zhuang Language Corpus

QIN Jiazhu, SU Shengying, ZHANG Shua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d Sciences, Nann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ning, Guangxi 53000,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constructs the first multimodal Zhuang language corpus by integrating AI and digital humanities technologies, proposing an "ecological-cognitive-technological" collaborative framework to overcome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corpora. Practically, it supports intelligent applications such as speech recognition and machine translation. Theoretically, it advances Kam-Tai language studies into the computational era and establishes digital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By empowering bilingual education, cultural economy, and cross-border services, this research provides a balanced solution of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cultural subjectivity for global endangered language preservation.

Keywords: Zhuang language preservation; digitalization; corpus; digital humanities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3.777

从传统生态文明到现代绿色发展：中国农村生态文明的转型叙事

傅丽君¹

(¹ 南京林业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论文探讨了中国农村生态文明转型的多维度路径，分析了传统生态智慧与现代绿色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重点研究了如何通过文化传承与创新推动农村绿色发展。论文首先回顾了中国农村生态文明的文化根基，强调了传统农耕文明中的生态智慧，如“天人合一”理念、节气管理与地方性生态保护实践的价值。接着，探讨了现代绿色发展理念与实践，包括绿色农业、绿色技术与乡村振兴战略，指出中国农村在绿色转型中的成就与挑战。最后进一步分析了地方性实践与全球视野的结合，提出通过借鉴国际经验和推动全球合作，中国农村能够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关键词：农村生态文明；绿色发展；传统智慧；文化传承

引言

我国农村在经历了长期的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后，面临着土地退化、水土流失、农业面源污染等一系列生态问题。目前，我国农村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面临的生态问题依然存在，化肥农药的过量使用、传统农业模式的局限性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亟需解决。然而，鉴往知来，继往开来。了解中国的传统生态文明智慧，才能为乡村振兴与绿色发展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持和实践经验，为现代农业提供生态保护的解决方案。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中国农村从传统生态文明转向现代绿色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将传统农业文化与现代绿色发展理念相结合，推动中国农村从地方性到全球性生态文明的转型，形成既适合中国农村的绿色发展路径又符合全球生态要求的可持续发展路径，讲好中国农村生态文明叙事。

关于传统生态文明与现代绿色发展的研究，近年来受到学界和政界的广泛关注。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将原住民传统生态知识与现代可持续发展理念相结合。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许多学者探讨了传统生态文明在应对气候变化、土地退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中的作用。例如，西方的“生态传统知识”^[1]研究强调本土社区对生态环境的认知与管理方式^[2]，这些传统知识在自然资源管理、气候适应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3]。近年来，我国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相关研究逐渐增多。国内诸多学者指出我国存在着“社会-生态新陈代谢断裂”^[4]、“生态自愈有限性与人类索取无限性的矛盾”^[5]等生态问题，在“天人合一”、农谚文明、农耕文化等传统生态思想的基础上，探讨了这些理念如何影响农业生产方式与生态管理^[6]。此外，关于传统农业技术^[7]的研究也较为丰富。然而，国内研究普遍侧重于传统智慧的总结与理论探讨，如何将其转化为现代绿色发展的实践路径，仍然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领域。本文将传统生态智慧与现代绿色发展进行融合研究，尝试在理论与实践层面找到二者结合的有效路径。通过分析中国农村不同地区的案例，探索如何将地方性生态文化与绿色发展理念相结合，提出适合中国农村的生态文明转型路径。其次，本文还将着重探讨传统与现代、地方与全球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中国农村如何在全球绿色发展的背景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发展模式，从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

作者简介：傅丽君（2000—），女，安徽合肥人，南京林业大学硕士研究生。

一、传统生态文明：中国农村生态文明的文化根基

（一）传统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

传统生态智慧的哲学基础不仅体现了“天人合一”思想的核心理念，也在农业实践中通过节气、轮作、休耕等制度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互动。民间的生态管理智慧则为地方性的环境保护与资源管理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为现代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文化根基。

1.“天人合一”思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基本框架

“天人合一”的哲学立场体现了古代中国对于宇宙秩序的理解，在实际应用上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农业生产模式、生态管理的方法以及环境保护的具体措施。具体而言，儒家学派提倡“仁民爱物”^[8]，将道德关怀扩展至非人类生命体，鼓励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尊重并保护自然环境；道家则强调“道法自然”，认为最好的治理方式就是让事物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变化；阴阳五行学说通过解释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及其相互作用机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内涵。这些哲学流派共同塑造了中国人独特的自然观，促进了古代社会对自然资源合理使用的认识，并为现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与智慧启迪。

2.传统农业与自然节律：自然与农业的和谐互动

中国古代农业社会高度重视自然界的节律变化，尤其是通过“节气”来指导农业生产。通过观察季节变化、气候特征以及动植物的生长周期，农民能够准确把握播种、耕作、收获等农业活动的时机，从而实现农业生产与自然节律的和谐互动。此外，传统农业的轮作与休耕制度，也是基于自然界的生态规律，通过合理安排作物的轮换与土壤休养，不仅能有效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还能保护土壤的肥力与生态环境的稳定。

3.民间智慧与地方性生态管理：水资源管理、土壤保护等

民间智慧在地方性生态管理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在中国农村，民间生态管理技术如水资源管理和土壤保护，往往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例如，古代的“龙潭水法”通过合理的水资源调度与分配，保障了农村的水利供给与农田灌溉；而“梯田”建设与“耕作休耕”制度则有效防止了土壤侵蚀与过度耕作，保持了土地的可持续生产能力。这些地方性生态管理方法，基于对自然规律的深刻理解，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

（二）传统生态文明在农村生态管理中的实践

中国农村的生态管理实践深受传统生态智慧文明的影响，传统农业技术不仅是生存的需要，也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

1. 传统农艺：如何通过传统的农业技术实现生态保护与资源循环

传统的农业技术，如轮作、间作、休耕等，不仅可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还能有效地避免土壤退化和养分流失，保护农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9]。例如，传统的“轮作”制度通过不同作物的交替种植，有效地减少了某一作物长期种植导致的土壤贫瘠问题，并有助于恢复土地的养分；而“间作”则通过合理搭配不同种类的植物，形成多样化的种植结构，增加土壤的生物多样性和肥力，减少病虫害的发生，从而降低了化学农药的使用。此外，休耕制度在古代农业中被广泛应用，可以让土地得到有效的休养生息，还能有效减少土地荒漠化问题。这些做法也正符合现代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的理念，强调减少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保持生态平衡。

2. 乡村文化与生态伦理：如何通过传统文化促进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

乡村文化与生态伦理息息相关，农村地区通过深厚的文化传统，培育了人们对自然的尊重与珍惜^[10]。例如，传统农耕社会中，人们通过合理的水利管理，如“沟渠灌溉”与“水车取水”来确保水资源的高效利用。村民们遵循“滴水不浪费”的原则，生活中处处体现着对水资源的节约。此外，民间常有“粮食打进仓，莫忘灾和荒”的谚语，倡导粮食的合理利用和食物的循环。传统文化中的“敬天爱地”精神，进一步促进了生态伦理的形成。农民通过对自然神灵的崇拜和祭祀活动，表达对大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例如，祭祀山川、河流等自然景观。此外，乡村文化中的“公田”和“共耕”制度，体现了集体合作与资源共享的理念，这种集体性的资源管理模式能够有效防止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浪费。

传统生态文明对现代绿色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如何从传统智慧中汲取绿色发展的元素，并通过现代化转化，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现代农业、绿色产业和可持续发展，是当前亟需解决的课题。只有通过文化转型与技术创新相结合，才能实现生态文明的真正可持续发展。

二、现代绿色发展：中国农村生态文明的转型路径

（一）中国农村的绿色发展现状

中国农村绿色发展现状呈现出多样化和持续推进的态势，种种实践不仅推动了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还为农村经济提供了新的增长动力，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1. 生态农业与绿色种植：有机农业、循环农业等的推广

生态农业与绿色种植是中国农村绿色发展的基础，通过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提倡生态友好型的耕作方式，提升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例如，江浙等地积极推进有机水稻、绿色果蔬和生态茶园建设，极大提升了农产品的质量与附加值。

此外，循环农业在农村地区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推广，尤其是在畜禽养殖与种植业相结合的模式中，粪肥通过科学处理变为有机肥料，实现了资源的高效利用与循环再生。

2. 农村绿色产业的兴起：绿色能源、绿色旅游、生态产品的开发

随着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入人心，农村绿色产业快速兴起，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绿色能源领域是其中的重点，农村地区大力发展光伏发电、风能和生物质能，为能源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绿色旅游则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优势，许多乡村利用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独特的乡土文化，发展生态休闲旅游和乡村民宿经济，吸引了大量城市游客。这种模式不仅拓宽了农村经济发展渠道，还促进了农村人口就业和传统文化的保护。同时，生态产品开发逐渐成为新兴领域。特色农产品的绿色品牌化、生态食品的标准化生产和市场推广，使得生态产品成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重要资源。通过网络电商平台的推动，农村生态产品逐渐走向全国市场，甚至进入国际贸易体系，增强了农村经济的可持续性。

3. 生态环境保护与乡村振兴战略的结合：实现农村经济与环境的双赢

生态环境保护是农村绿色发展的基础，而乡村振兴战略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政策支持。二者的深度结合推动了农村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双重改善，形成了农村经济与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近年来，国家在农村地区大力实施生态修复工程，如水土保持工程、生态湿地建设以及农田退耕还林等措施，使得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提升。此外，绿色村庄建设成为生态环境保护与乡村振兴结合的重要实践。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厕所革命、污水处理、清洁能源推广等措施全面推进，极大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

（二）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路径

中国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从传统生态智慧向现代绿色发展的重要转型中。这一过程中，如何从传统生态智慧中汲取绿色发展动力、实现现代技术与传统智慧的结合、并探索绿色发展理念在农村的本土化实施路径，成为推动农业与生态环境双重发展的关键。

1. 如何从传统生态智慧中汲取绿色发展动力，推动农业与生态环境的双重发展

传统生态智慧是中国农村长期生产与生活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在现代绿色发展中，充分汲取这种智慧，可以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思想动力与实践资源。例如，“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倡导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这一思想在现代生态农业中依然具有重要指导作用。通过遵循自然节律和生态循环，农村地区可以减少对化学肥料和农药的依赖，促进农业生态系统的平衡与恢复。此外，节气与农事结合的传统农业经验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农业气候风险管理方面也有借鉴意义。传统农艺技术如轮作、间作和休耕，不仅能提高土壤肥力，还能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将这些传统智慧融入现代农业，可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

2. 现代技术与传统智慧的结合：现代农业技术与传统农业管理方法的融合

现代绿色发展不仅要继承传统生态智慧，还要通过现代技术的引入，实现传统农业管理方法的优化升级。现代农业技术包括精准农业、物联网监测、生物技术和节水灌溉技术等，能够显著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率。例如，传统的农田水利管理与现代物联网监测技术的结合，可以实现精准灌溉和水资源高效利用，既减少了水资源浪费，又提升了作物产量。同样，传统的有机肥施用方法与现代生物肥料技术的结合，可以更好地改善土壤质量，促进绿色种植。此外，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使得农民可以实时监测土壤、天气和病虫害状况，从而优化种植策略，将传统经验与现代科学相结合，形成更具科学性和实践性的农业管理模式。

3. 绿色发展理念在农村的本土化实施路径：从地方实践到全国推广

推动绿色发展理念在农村的本土化实施，是实现全国范围内农村绿色转型的关键步骤。不同地区有着

各自独特的生态环境、文化背景和农业资源，因此绿色发展模式需要因地制宜，尊重地方特色，才能取得长远效果。地方实践是绿色发展理念本土化的重要切入点。许多地区通过发展地方特色的生态农业和绿色产业，形成了具有本地优势的绿色发展模式。例如，云南地区利用丰富的山地资源发展生态茶园，推广有机茶叶产业；江苏地区通过生态循环农业建设高标准农田，探索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模式。这些实践经验不仅推动了地方农村经济的发展，还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可借鉴的成功范例。在本土化实践基础上，应通过政策支持、经验分享和技术推广，将地方经验向全国推广，形成绿色发展全国联动机制。政府可搭建跨区域合作平台，促进不同地区之间的经验交流，推动农村绿色发展从地方探索走向全国实践，最终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推进。

三、中国农村生态文明的转型叙事：地方性与全球性的互动

（一）地方性实践与全球性视野

中国农村生态文明的转型不仅是地方性实践与全球性视野的结合，也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独特探索。通过地方性生态文明的实践，中国不仅传承和创新了本土生态智慧，还在全球绿色发展趋势中找到了自身发展的路径和角色。中国农村的生态文明深深扎根于本土的自然环境和传统文化之中，具有强烈的地方性特色。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地方性生态文明的核心要素得到了现代科技的支持与强化，实现了传统智慧与现代发展的有机融合。在全球化背景下，绿色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与国际绿色发展趋势相契合，尤其是在推动绿色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严峻，国际社会普遍强调绿色经济、清洁能源和循环经济等领域的发展，中国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也在这一背景下逐渐深化。例如，中国在推动绿色农业的同时，不仅采用国际先进的农业技术，还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推动绿色技术、生态农业和环保理念的国际交流与合作。通过与全球绿色发展趋势的对接，中国农村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不仅学习和借鉴了国际先进经验，还通过自主创新与地方特色相结合，塑造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绿色发展道路。国际环境的变化促使中国农村加速转型，推动中国在全球绿色发展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同时也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在地方性实践与全球性视野的互动中，中国农村生态文明建设通过本土智慧与现代科技的结合，为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发展提供了新的范式。

（二）地方性实践中的文化传承与创新

地方性实践中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是推动中国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动力之一。通过将乡村文化与生态文明结合，不仅能够增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还能够促进绿色发展。

1. 乡村文化与生态文明的结合：地方文化如何推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与绿色发展

中国农村的生态文明建设往往深深植根于地方的乡土文化。许多地区的生态管理理念和农业生产方式，与本地的传统文化有着紧密联系。在浙江省安吉县，传统的农耕文化与现代绿色发展理念得到了有机融合。当地农民长期以来遵循“天时、地利、人和”的自然规律，采用无公害的种植方式，这种传统的生态管理方法得到了现代有机农业的支持。安吉县通过保护传统农业技术，发展有机茶叶种植，成功推动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双重效益。安吉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不仅促使了生态保护，更通过绿色茶园旅游将地方文化与生态环境结合，为当地带来了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同样的，陕西省的“延安生态农业”项目。延安地区传统的农耕文化中有很多关于土地保护和水资源利用的智慧。当地农民依靠“轮作休耕”和“水土保持”的传统方法，保护了土地的肥力和水源。在现代化进程中，延安结合这些传统农业技术，引入了现代环保技术，推动了绿色农业的发展。通过实施生态农业，延安不仅提高了农产品的质量，还通过发展生态旅游和绿色产品市场，提升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延安的实践证明，乡村文化的传承不仅保护了自然资源，还为现代化的生态农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 文化传承与绿色发展的双向作用：如何通过文化传承增强农村生态文明的可持续性

文化传承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双向作用是中国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因素。通过传承乡村文化，可以增强当地居民的生态保护意识，而绿色发展则为文化传承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以四川省的“熊猫栖息地文化保护”项目为例，四川通过整合地方传统文化与绿色发展理念，保护大熊猫栖息地的同时，推动了当地的文化遗产和绿色经济。传统的四川地方文化与大熊猫生态环境息息相关，四川农民通过恢复传统的植树造林和防治水土流失的文化习惯，有效保护了生态环境。通过“文化+生态”的双重推进，四川不仅保护了自然资源，还促进了地方文化的传承，进一步推动了乡村振兴。在文化传承的同时，绿色发展为传统文化提供了新生机。贵州省的“苗族文化与生态旅游”项目是另一例。贵州的苗族文化中有着丰富的生态智慧，例如利

用天然植物进行草药治疗、尊重自然和节约资源等。当地政府通过推广生态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将苗族的传统文化与绿色旅游相结合，既保护了地方生态环境，又吸引了大量游客。绿色发展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增长，还为苗族文化的传承创造了新的空间。贵州的这一做法，证明了文化传承和绿色发展可以形成良性互动，共同推动地方可持续发展。

乡村文化的传承与绿色发展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中国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地方文化通过绿色发展得到了新的活力，而绿色发展通过传承和创新文化，为地方经济提供了新的支撑。中国农村生态文明的可持续性，正是通过将地方性文化与现代绿色发展理念相结合，在实践中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这一过程中，文化传承和绿色发展之间的双向作用，增强了中国农村生态文明的根基和活力，也为全球绿色发展贡献了中国的智慧与经验。

（三）中国农村生态文明转型的国际化经验与展望

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中国农村生态文明转型不仅需要借鉴国际经验，更应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通过对国际生态文明经验的借鉴，可以推动中国农村绿色发展，同时，中国农村的生态文明建设经验也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发挥示范作用，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借鉴。

1. 国际生态文明经验的借鉴：如何结合国际经验推动中国农村的绿色发展

在全球范围内，许多国家在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农业、环境治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例如，德国的“生态农业与循环经济模式”是全球可持续农业发展的典范。德国通过严格的有机农业认证体系、生态补贴政策 and 循环农业模式，实现了农业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中国可以借鉴德国经验，在农村推行更严格的有机农业认证体系，并鼓励农民采用生态循环农业模式，如秸秆还田、生态养殖等方式，实现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

此外，荷兰的“智慧农业”模式也值得借鉴。荷兰通过高科技农业设施，如智能温室、精准滴灌和数据驱动农业，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同时减少了资源消耗。中国农村在推进现代农业转型过程中，可以学习荷兰的经验，利用数字技术和智能农业设备，提高水资源和肥料的利用效率，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例如，在江苏、浙江等地，一些智慧农业示范园区已经开始运用物联网、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对农作物生长情况进行实时监测，提高了农业的可持续性。

2. 中国农村生态文明的全球性贡献：如何通过绿色发展与生态保护参与全球治理

随着中国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国的经验也在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示范。例如，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通过改善农村环境、发展生态农业和乡村旅游，成功推动了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这一模式已经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认可，并被推荐到多个发展中国家，帮助解决农村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问题。中国的农村生态整治经验不仅提升了国内的乡村生态环境，还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实践借鉴，成为全球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典范。此外，中国在荒漠化治理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尤其是“库布其沙漠治理”模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库布其沙漠是中国第七大沙漠，通过生态修复、绿色产业发展和政策支持，中国成功将大面积沙漠变成了可利用的绿地，并创造了可持续的经济收益。这一成功经验已被推广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非洲、西亚等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帮助当地改善生态环境，同时发展绿色经济。这一模式的全球推广，体现了中国在全球生态治理中的积极贡献。

结论

中国农村生态文明的转型是一个从传统生态智慧到现代绿色发展的动态过程。传统生态智慧，如“天人合一”理念、农耕文明中的自然节律管理以及地方性生态保护实践，为当代农村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根基和实践经验。在现代绿色发展阶段，生态农业、绿色产业和环境治理模式不断创新，推动了农村经济与生态保护的协同发展。同时，中国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正逐步实现从地方性实践向全球化贡献的转变，在借鉴国际生态文明建设经验的同时，也通过自身的绿色发展模式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借鉴。从传统到现代的生态转型路径，体现了文化传承与绿色发展的双向促进作用。一方面，传统生态智慧为现代绿色发展提供了思想资源和可行的生态管理模式；另一方面，现代绿色发展技术和理念为传统智慧的传承与创新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国家政策、技术创新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共同推动下，中国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将进一步走向可持续、高质量的发展道路。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探讨不同地区的绿色发展路径，分析区域性差异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同时，可深入研究绿色发展与传统文化传承的长效机制，探索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农村生态文化的可持续性，推动全球生态治理经验的共享与合作。

参考文献:

- [1] Huntington H P. Using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in science: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J]. *Ecological applications*, 2000, 10(5): 1270-1274.
- [2] Martin J F, Roy E D, Diemont S A W, et al.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TEK): Ideas, inspiration, and designs for ecological engineering[J]. *Ecological Engineering*, 2010, 36(7): 839-849.
- [3] Berkes F, Colding J, Folke C. Rediscovery of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as adaptive management[J]. *Ecological applications*, 2000, 10(5): 1251-1262.
- [4] 马佳妮, 叶超. 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中的生态文明演进路径[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64(06): 1-6+152. DOI:10.15991/j.cnki.411028.2024.06.019.
- [5] 刁生虎.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中华传统生态智慧的传承与发展[J]. *江苏社会科学*, 2022, (02): 12-25+241-242. DOI:10.13858/j.cnki.cn32-1312/c.20220325.019.
- [6] 卢丙华. 古代文学中的农业生态文明[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4, 45(12): 14+59.
- [7] 孙凡, 冯沈萍. 三峡地区传统农业技术蕴含的生态文明智慧[J].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5, 37(12): 25-33. DOI:10.13718/j.cnki.xdzk.2015.12.004.
- [8] 化秀玲. 儒家思想中的生态伦理智慧[J]. *人民论坛*, 2017, (04): 136-137. DOI:10.16619/j.cnki.rmlt.2017.04.059.
- [9] 赵立军, 徐旺生, 孙业红, 等. 中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与建议[J].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 2012, 20(06): 688-692.
- [10] 朱映占, 魏婷婷. 西南山地民族传统生态观的多维实践及当代价值——以基诺族为例[J].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2024, 16(05): 105-117+155.

From tradition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o modern green development: a narrative of transform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sation in rural China

Fu Lijun¹

¹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Abstract: This thesis discusses the multi-dimensional path of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rural ecological civilisation, analyses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al ecological wisdom and modern green development, and focuses on how to promote rural green development through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The thesis first reviews the cultural roots of China's rural ecological civilisation, and highlights the value of the ecological wisdom of traditional farming civilisation, such as the concept of 'unity of man and nature', the management of festivals and local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practices. Next, modern green development concepts and practices, including green agriculture, green technology and rural revitalisation strategies, are discussed, pointing out the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of China's rural areas in green transformation. Finally, the combination of local practices and global perspectives is further analysed, suggesting that by drawing o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promoting global cooperation, rural China can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global ecological civilisation.

Keywords: rural ecological civilisation, green development, traditional wisdom, cultural heritage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3.782

教育家精神引领下中学思政教师论道力行素养的提升

胡嘉俊¹

(肇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肇庆 526061)

摘要: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倡导的“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 本文深入剖析了“论道”与“力行”的核心意蕴, 并探讨了教育家精神与思政教师在实践中“论道并行”能力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论述中学思政教师提升“论道”与“力行”的教育家素养的重要性, 并提出了思政教师提升“论道”与“力行”素养的具体路径。旨在让思政教师在教育家精神的引领下, 不断提升专业素养, 确保思政课在培养学生思想品德方面的有效性和影响力。

关键词: 教育家精神; 思政课; 中学思政教师

2024年9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 “要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提高教师培养培训质量, 培养造就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1]。”中学思政教师如何将思政课中的“道理”讲得透、有体系、易理解, 不仅关乎学生价值观的形成, 更是对教师专业素养的一次深刻考验。这要求教师们具备“论道”与“力行”的教育家素养, 从而充分发挥思政课立德树人的作用

一、思政课“论道”的内涵

“论道”与“力行”作为一组辩证统一的教育理念, 最早见于《周礼·冬官考工记》的原始表述。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 原文中提及的“坐而论道”, 并非对这两种教学理念的正面描述, 反而在某种程度上, 它是对教师施教的一个警示。这里的“坐”, 并非简单地指静坐, 而是一种象征性的表达, 指的是仅停留于口头上的理论探讨, 但缺乏实质性的行动与实践。

在中学思政课的教学实践中, 我们常遇到“坐而论道”的教学倾向, 即教师过于侧重于理论知识的传授, 而忽略了与实践的紧密结合。这种教学方式虽然构建了知识的框架, 但往往使得理论知识变得抽象且脱离实际, 难以让学生领悟知识深层逻辑与现实意义, 激发学习热情与探索动力。在《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中明确指出, 高中的思政课应为以思想政治核心素养为主导的活动型课程, 着眼于思想政治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2]。因而, 思政课的论道是“做”而论道, 而非“坐”而论道。

在思政课的教学语境下, “论道”所蕴含的内涵与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的“思政课即讲道理”理念高度契合。这里的“道”, 是一个宏大的概念, 它囊括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富思想体系。然而, 在教学实践中, 我们面临着一个不容忽视的挑战: 由于学生认知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生活经验及知识背景的多样性, 部分学生难以直接、深入地理解和接受课本上的理论知识。

以高中政治部编版教材必修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例, 在实际教学的过程中, 部分学生基于私欲观念, 质疑未来公有制实现的可能性。

教师若未能将道理讲深讲透, 不仅削弱了思政课的教育效果, 还可能使学生在面对西方“普世价值”时失去抵抗力, 甚至动摇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自信。因此, 深入挖掘思政课的“道”, 回溯至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成为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

针对学生的疑问, 教师可从多方面进行引导。首先, 要帮助学生认识到私欲并非不可克服, 它在社会

作者简介: 胡嘉俊(1997—), 男, 广东佛山人, 肇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研究生。

主义建设中可以逐步引导和规范。教师可利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经典著作中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描述,让学生明白,私有制的存在让工人生产的产品越多,创造财富越大,反而越贫穷^[3]。因为其中的资本增值的部分,被资本家通过压榨工人剩余价值的方式夺走了。引导学生认识到,私欲并非不可克服,各种现存问题不是不能解决,它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是可以被逐步引导和规范的,直至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彻底消失。

此外,教师还可从马克思认识论的角度出发,帮助学生认识到自己当前认识的局限性。人的认识是具体的、历史的,具有反复性和无限性。学生们在思考共产主义实现的问题时,往往容易局限于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状况,而忽视了共产主义实现的一个重要前提——即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因此,教师应当引领学生确立辩证发展的视角,使他们认识到,在生产力持续进步与社会制度日益优化的驱动下,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思政教师“力行”的内涵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力行”这个概念有着重要地位。这种注重亲身实践的理念,和《淮南子·汜论训》中提的“身体力行”有共通之处。这个成语不仅精炼地总结了个人应持的行为准则,更反映了古代圣贤们对实践价值的深刻理解和执着追求。

古代智者普遍认同“知行合一”的理念,认为学到的道理必须能用在生活中才算有用。就像《礼记·中庸》里孔子说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便是这一理念的生动体现。其中,“笃行之”环节尤为关键,就是强调要把知识转化为实际行动,这和“力行”的践行理念一脉相承。古人通过这样的智慧告诉我们,真正的学问从来都不是纸上谈兵,而是要把知识应用到具体的生活实践中去。

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具有内隐性、延后性与持久性等特点,这意味着其效果并非即时显现,而是潜移默化、深远持久的。因此,思政教师的“力行”,绝非仅限于书本知识的传授,更在于自身对思政理论的认同与践行,确保知行合一。只有这样,才能为学生树立正面的榜样,产生一致性的影响,使思政教育的力量得以充分发挥。正如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所揭示的,学生在无形中会模仿并学习他们观察的对象,教师的言行举止对学生具有不可忽视的示范作用^[4]。

回望历史,孔子与墨子便是这样的典范。孔子不仅创立了博大精深的教育思想,更身体力行地践行“有教无类”,开创了私学教育的先河;墨子则以“兼爱非攻”为核心,不仅理论影响深远,更亲身投入社会公益,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这一理念的伟大。

课堂,作为思政教师“力行”的主战场,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关键环节。以统编版《道德与法治》七年级下册第三课第二框“青春有格”为例,教师在教授“止于至善”这一道德追求时,可以通过生动的案例和实际的行动来阐释“慎独”的内涵。比如,教师可以设计一个课堂小插曲,课前故意在教室放置一枚硬币,上课时捡起并询问学生是否注意到它的存在。通过这一情景模拟,引导学生思考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如何保持道德自律。利用具体情境进行“论道”解释,促进学生了对“慎独”的理解。随后,教师结合学生课堂语言及行为的表现,深入解析“慎独”的重要性,并鼓励学生培养这一美好品质,以达到“止于至善”的道德境界。

在教师的“力行”演示与实践指导下,学生不仅能够更深刻地理解理论知识,还能通过观察学习,将这些理论内化为自身的素养,从而增强对思想政治课的认同感与学习兴趣。这种教学方式,不仅提升了思政教育的实效性,更促进了学生道德品质与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实现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三、教育家精神与思政教师“论道力行”素养的关系

习近平主席在2023年9月致全国优秀教师代表的信中,阐明了中国教育家精神所蕴含的六大核心特质^[5]。其中“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的这些特质,与思政教师所追求的“论道力行”素养,构建了一个紧密相连、相互促进的有机的联系。

(一) “言为士则、行为世范”与“力行”

“言为士则”这一表述,深刻地揭示了教师在言论层面所应扮演的角色——即成为学生心中的道德楷模。教师的话语,应当蕴含着高尚的道德情操,不仅传授知识,更传递着正面的价值观与人生哲学,为学生树立起一个值得效仿的标杆。而“行为世范”则进一步强调了教师的榜样力量,它要求教育者不仅在言语上高标准、严要求,更要在日常行为中展现出卓越的品德与风范,成为学生成长道路上的灯塔,指引他们走向正确的道路与方向。

这种高尚的教育家道德情操,与“力行”的理念相通,共同构成了思政教师独特的人格魅力与教育力量。思政教师不仅要在理论上深入阐述道德的内涵与价值,更要通过自身的实际行动,将道德的力量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与感染。教师在课堂上通过用自己的言行举止,诠释道德的真谛,引领着学生向着更高尚、更纯粹的道德境界迈进。

(二) “启智润心、因材施教”与“论道”

“启智润心、因材施教”中的启智,即启迪智慧,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创造力;润心,则是以爱心和耐心滋养学生的心灵,帮助他们建立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而因材施教,则是根据学生的个性、兴趣和能力差异,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以实现最佳的教学效果。这种育人智慧,要求思政教师不仅要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和教育教学能力,还要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能够准确把握学生的需求和特点,从而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教育方案。

这特质的实现与思政教师“论道”素养紧密相连。思政教师作为思想的引领者和传播者,要想把思政课上好,需要清晰地阐述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重要思想,更要能够将这些理论转化为具体可行的行动指南,引导学生在实践中不断锤炼自我、完善自我。

四、中学思政教师“论道”与“力行”素养的提升路径

(一) 深化阅读,精细思考,强化“论道”能力

在思政课教师“论道”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知识的传递,更要关注知识的体系化构建与逻辑演绎。通过清晰的理论阐述与严谨的逻辑推理,引导学生深入思考,激发其探索欲与创造力。这一专业素养的提高,离不开教师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深入研读。教科书虽为从各种理论知识中提取的精华,但仅依赖其表面文字性表达的内容,难以让学生深刻理解理论的本质,从而实现知识的内化与迁移变得困难。因此,思政教师要提升课堂“论道”能力,熟读精思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途径。

1. 深化阅读是提升“论道”能力的基础

思政课教师应广泛涉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及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形成对思政知识全面、深入的理解。通过持续地阅读与学习,教师可以不断拓宽知识视野,丰富知识储备,为课堂教学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这不仅有助于教师自身对知识的全面掌握,还能为课堂教学提供丰富的素材与视角。

2. 精细思考是深化阅读的重要环节

在阅读过程中,教师应注重思考与分析,对所学知识进行深入地剖析与反思。这包括对理论背景、发展历程、内在逻辑等方面的思考,以及对理论在现实中的应用与启示的探讨。通过精细思考,教师可以更好地把握理论精髓,提升理论素养,为“论道”提供有力的支持。面对中学生特定的认知发展阶段,教师还需将复杂的理论知识与学生实际认知水平相结合、与教材相结合,通过创造性地转化,使抽象的理论变得生动具体,易于学生接受。

3. 强化“论道”能力是深化阅读与精细思考的最终目的

在评估一堂思政课的成效时,不应仅将眼光局限于课堂氛围的热闹与否,而应更深层次地考量教师能否触及学生的心灵深处,点燃他们思想的火花,以及这种触动与激发是否具有深远的意义。

思政课教师应将所熟读精思后的内容融入课堂教学中,通过生动的讲解、严密的逻辑、清晰的条理以及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引导学生深入理解思政知识,培养其思辨能力与创新能力。同时,教师还应注重与学生的互动与交流,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与需求,及时调整教学策略与方法,达到启智润心的作用。

(二) 自省躬行,“力行”习惯的养成

思政教师的“力行”,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行为的展现,更承载着德育示范的深远意义。他们的每一个行动、每一次选择,都在无形中为学生树立了道德的标杆,是学生模仿和学习的对象。因此,思政教师“力行”习惯的养成,不仅是个人职业素养提升的需要,更是增强教育示范效果、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保障。

1. 自省是“力行”习惯养成的前提

思政教师应具备自我反省与自我觉察能力,时刻关注自身的言行举止是否符合思政教育的理念与要求。通过自省,教师可以及时发现自身在思想、行为等方面存在的不足与偏差,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改进与提升。这种自我反省与自我觉察的过程,有助于教师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力行”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2. 躬行是“力行”习惯养成的关键

躬行,意味着教师需将所学知识与理论付诸实际行动,将抽象的道理转化为具体的行为示范。在这一

过程中,教师不仅要做到言行一致,更要勇于担当、积极作为,用实际行动诠释思政教育的真谛。通过躬行,教师能够让学生亲眼见证理论的力量,感受到思政教育在现实生活中的价值与意义。

躬行之所以成为“力行”习惯养成的关键,是因为它要求教师不仅要有深厚的理论功底,更要有坚定的信念和执着的追求。只有那些真正将理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教师,才能在学生心中树立起高大的道德形象,成为他们敬仰和学习的楷模。

此外,躬行还促进了教师自身的成长与提升。在实践中,教师会遇到各种挑战与困难,这些经历不仅考验着他们的意志与智慧,也促使他们不断反思与改进。通过躬行,教师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自己的优点与不足,明确未来的努力方向,从而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与综合能力。

3. 持之以恒是“力行”习惯养成的保障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思政教师的“力行”不仅是知识的实践转化,更是道德的示范引领。这一习惯的养成,离不开持之以恒的坚持与努力,它是确保“力行”得以深入骨髓、成为日常行为准则的坚实保障。

“力行”的第一层含义,是理论向实践的跨越。思政教师需将深厚的理论知识与复杂的社会现实相结合,通过实践来检验和丰富理论。“力行”的第二层含义,是以身作则,树立榜样。思政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更是道德的践行者。他们的言行举止、道德品质都会对学生产生深远的影响^[6]。

思政教育对人的教育,需要有一致性与持续性。这意味着思政教育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需要长期的、系统地努力。思政教师的“力行”习惯养成,同样需要持之以恒地坚持。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思政教育的一致性与持续性,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到全面、深入的思政教育。

综上所述,思政教师应当以教育家精神为指引,不断提升自身在“论道”与“力行”两方面的素养,确保能够深入浅出地为学生阐述思政课程中的道理,从而充分发挥思政课在培养学生思想品德方面的有效性和影响力。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朝着建成教育强国战略目标扎实迈进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J].河南教育(教师教育),2024,(09):2-3.
-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2017年版 2020年修订)[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2.
- [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3.
- [4][美]阿尔伯特·班杜拉.社会学习心理学[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22.
- [5]习近平.习近平致全国优秀教师代表的信[J].河南教育(教师教育),2023,(09):1.
- [6]武丽伟,李士达,卢红妙.加强教师师德建设的价值及完善路径探析[J].教育实践与研究(C),2024,(02):47-49.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pirit of educator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thical and practical qualities of middle schoo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ers

Hu Jiajun

School of Marxism, Zhaoqing University, Zhaoqing, Guangdong 526061, China

Abstract: By discussing the importance of enhancing the educational literacy of middle schoo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ers in "discussing the Tao" and "practicing the Tao", and proposing specific path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ers to improve their literacy in "discussing the Tao" and "practicing the Tao". Aim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er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pirit of educators, ensuring the effectiveness and influe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ultivating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moral character.

Keywords: educator spiri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Middle schoo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er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3.791

多元纠纷化解视域下网格员的角色定位及实现路径

张国润¹

(¹ 山东工商学院, 山东 烟台 264005)

摘要: 网格员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 在多元纠纷化解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基于文献分析和调查研究, 本文系统分析了网格员在多元纠纷化解中的角色定位与实现路径。研究发现, 网格员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存在角色认知偏差和行为困境等突出问题, 主要表现为角色界限模糊、职责认知不清、制度保障不足以及工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为此, 本文明确了网格员在多元纠纷化解中的四重角色定位: 示范者、信息收集者、纠纷化解者和法治宣传者。在此基础上, 构建了“强化角色认知-完善制度保障-统一规范行为标准”的实现路径。本文为厘清网格员在多元纠纷化解中的角色提供了理论支持, 针对性地解决角色认知偏差与困境问题, 有助于提升网格员的纠纷化解能力, 优化基层治理效能, 为基层法治资源整合和社会规范本土化提供法社会学解释框架, 为社会规范本土化重构拓建调适路径。

关键词: 多元纠纷化解; 网格员; 角色定位; 实现路径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通过“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以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 从而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为此, 全国各地积极探索将多元纠纷化解机制融入网格治理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但实践中依然存在不少问题, 其中网格员在多元纠纷化解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无论是认知层面还是行为层面均不清晰, 导致实践中网格员参与网格纠纷化解的力度不够,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基层矛盾化解的质效。反思网格员在多元纠纷化解中的角色定位并梳理其实践路径, 有利于更好地贯彻新时代“枫桥经验”, 助推基层治理现代化迈上新台阶。

一、网格员在多元纠纷化解中的角色定位

作为网格治理的中坚力量, 网格员在多元纠纷化解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本质上是网格这一治理基本结构内部网格员个人角色的定位问题, 政治学的结构-功能理论为此提供了很好的分析框架。阿尔蒙德认为, 政治角色首先是个人角色, 个人角色构成政治结构的基本单位, 并通过其不同分工在结构内部发挥作用, 共同维系结构的运行^[1]。而政治结构在体系政治学的结构-功能、过程和政策三个层次均行使多种功能。按照这一分析框架, 网格员在多元纠纷化解中扮演的角色具有多重性。

(一) 矛盾纠纷化解的示范者

将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入网格治理, 需要尽可能做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街道”, 将矛盾真正化解在基层。但对于基层民众而言, 矛盾产生后如何避免矛盾激化, 以什么样的方式和技巧解决矛盾, 囿于不同民众的态度、信念和价值准则差异, 不同个案呈现出不同的样态, 如果不加以引导和示范, 很难做到这一点。网格员在日常网格化管理和服务过程中, 与网格民众有诸多交往与联系, 也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 以怎样的态度和方式化解矛盾, 对网格员是一种考验^[2]。而网格员化解矛盾的态度和方式, 对网格民众具有示范效应。

作者简介: 张国润(2000—), 女, 山东潍坊人, 山东工商学院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网格员作为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的示范者,是网格结构在政治体系层面承担政治社会化功能的重要表现。政治社会化是个体通过多种途径的政治学习与社会实践,形成以社会政治文化为基本特征的政治态度、政治信念、政治准则和政治价值观的过程^[3]。通过网格员在矛盾纠纷化解中的示范效应,在个人层面,可以使基层民众通过观察、学习与实践,获得有关矛盾纠纷解决的知识、价值与规则,从而提升自身处理矛盾纠纷的态度和能力;在社会层面,可以传播“抓前端、治未病”的社会治理法治文化,从整体上提升基层民众关于矛盾纠纷化解的认知、情感和态度。

(二) 矛盾纠纷信息的收集者

作为新时代基层治理的末梢结构,网格为国家公共服务和管理职能的精细化落实搭建了新平台,但网格在整个治理体系中并非公共服务和管理的决策中心,更多时候是作为执行机构执行上级的各项决策。但上级的决策来源于现实的需求,这就赋予了网格员采集各类信息的职能。在基层纠纷多元化解背景下,网格员的信息收集职能得到了制度确认。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人民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建设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实施意见》指出,要完善矛盾纠纷排查梳理和风险评估机制,加强矛盾纠纷排查预防,主动加强与基层网格、专属网格的网格员等基层维稳单位的信息共享、联排联动,有针对性开展排查梳理、纠纷化解等工作。各地出台的网格化服务管理条例,也将网格员的信息收集职能列入其中。

网格员作为矛盾纠纷信息的收集者,是网格结构在政治过程层面承担利益表达与综合功能的体现。一方面,居民的日常社会生活诉求以及矛盾产生后的解纷态度和利益诉求,需要通过网格员的信息收集与上报传递给决策部门;另一方面,网格社区内有怎样的纠纷隐患及实际发生的纠纷数量、类型与解纷需求等,如果不加综合分析直接上报,则会给决策部门带来工作上的难题,因而需要网格员在上报之前对收集的信息作出初步的整理综合。通过网格员的利益表达与综合,为决策部门作出精准研判和决策部署提供便利,从而更加高效预防和化解基层矛盾纠纷。

(三) 矛盾纠纷的化解者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多元”,至少包含解纷主体多元、解纷方式多元和解纷依据多元三重涵义。就解纷主体而言,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的规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律师、专业技术人员、基层组织负责人、社区工作者、网格管理员、“五老人员”等均可以成为纠纷解决的主体。网格员作为解纷主体,可以充分发挥“人头熟、地头熟、情况明”的优势,通过现场核实情况,零距离了解群众纠纷矛盾,综合运用情理法,推进纠纷化解工作的顺利开展。网格员的解纷主体角色具体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对于案情简单、积怨不深的矛盾纠纷,可以直接以单独解纷者的身份现场予以化解;二是对于案情复杂、积怨较深的矛盾纠纷,可以作为协助者,协助更为专业的纠纷化解人员化解矛盾。

网格员作为矛盾纠纷的化解者,充分体现了网格结构在政策输出层面的分配功能。政治分配是政府或国家对资源、权利、利益等有形或无形财富进行的分配活动,其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公平正义。作为一种政治行为,政治分配的方式、过程和结果对国家、社会和个人均有着重要的影响。网格员作为解纷主体单独或协助解决纠纷的过程,实质上也是对权益进行分配的过程,通过这种分配,实现社区居民个体权益的保障与群体权益的共享,为构建和谐社区并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提供坚强助力。

(四) 法治宣传者

提升全体公民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性、基础性、保障性和长期性工程,也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和坚定捍卫者。《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八个五年规划(2021-2025年)》也指出了推进普法与依法治理相结合的法治宣传教育新路径和新要求。网格作为新时代基层治理的末梢,丰富了以“谁执法谁普法”为中心的普法责任制的实施路径。依托互联网技术和网格平台,积极推进“网格+互联网+法治宣传”行动,将法治宣传工作延伸到网格的每一个角落,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法治宣传新模式。

网格员作为网格法治宣传者,同样是网格结构在政治体系层面承担政治社会化功能的重要表现。打造以网格员为主要力量的法治宣传队伍,能够提升法治宣传教育的力度^[4]。通过网格员的法治宣传,不仅能够提升公民对法律法规的知晓度、法治精神的认同度和法治实践的参与度,培育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新时代公民,而且能够显著改善居民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夯实基层治理法治文化,维护网格社区的和谐平安,助推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迈上新台阶。

综上所述, 网格员的角色定位及其功能如图 1 所示。



图 1 网格员的角色定位及功能

二、网格员在多元纠纷化解中的角色困境

尽管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需要网格员在多元纠纷化解过程中扮演着多重角色, 但实践中无论是认知层面、制度层面还是行为层面, 网格员的角色承担面临不少困境, 制约了网格员在多元纠纷化解中的功能实现。

(一) 认知困境

认知作为一种思维模式, 是所有人类行为的内在逻辑^[5]。透过精确的认知活动, 人们能更为精准地把握事物的现象和本质并为后续行为奠定心理与情感基础。围绕网格员在多元纠纷化解中的角色, 无论是网格员自身还是社区居民和基层治理部门负责人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认知偏差。

就网格员而言, 其自身认知偏差主要表现在身份认同、角色认知和能力认知三个方面。笔者针对 76 名专兼职网格员的调查显示, 专职网格员将自身视为“政府工作人员”和“网格管理者”的分别达到 55.9% 和 38.2%, 兼职网格员将自身视为“临时工”和“网格管理者”的分别达到 59.5% 和 40.5%。不同类型网格员的身份认同差异直接影响着其在多元纠纷化解中的角色认知。角色认知方面, 所有网格员均认为自己有义务收集网格信息并进行普法宣传, 但在信息收集的具体类型上有较为明显的差异, 所有网格员均认为收集和核实基础数据属于自己的工作职责, 但在矛盾纠纷及隐患排查方面, 认知度只有 76.3%, 并且兼职网格员的认知度明显低于专职网格员。在作为矛盾纠纷化解的示范者和调解者方面, 网格员的角色认知度分别只有 27.6% 和 61.8%, 而兼职网格员的这两项角色认知同样明显低于专职网格员。能力认知方面, 认为自己能够单独胜任矛盾纠纷调处工作的只占 14.5%, 另有 47.3% 的网格员认为自己有能力成为矛盾纠纷调处的协助者。

网格员在多元纠纷化解过程中究竟应扮演怎样的角色在不同社区居民中也存在认知差异。笔者针对 200 名网格居民的调查显示, 95.5% 的居民对网格员的纠纷示范者和法治宣传者角色表示认同, 4.5% 的居民则表示对此无所谓。在信息收集者方面, 89% 的居民认同网格员的矛盾纠纷及隐患信息排查与收集工作, 且不同年龄和身份的居民之间无显著差异, 4.5% 的居民表示无所谓, 5.5% 居民持反对态度。在矛盾纠纷的化解者方面, 78.5% 的居民认同网格员独立或协助参与矛盾纠纷化解工作, 4.5% 的居民表示无所谓, 17% 的居民持不信任态度。在认同网格员矛盾纠纷化解者身份的居民中, 60 岁以上居民的认同程度明显高于 60 以下的居民, 农村社区居民明显高于城市社区居民。

基层社区部门负责人对网格员在多元纠纷化解中的角色认知也同样存在差异。访谈显示, 基层社区部门负责人对网格员在多元纠纷化解中的角色和责任大体持两种态度, 一种态度认为, 网格工作涉及基层治理的方方面面, 具有很强的综合性, 而矛盾纠纷化解只是网格工作的一部分, 没有必要过分强调和突出网格员在多元纠纷化解中的角色和责任; 另一种态度认为, 网格化治理在工作方式上实现了从粗放到精细的转变, 工作重点实现了从管理为主到服务为主的转变,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战略背景下, 依托网格推进新时代“枫桥经验”应该成为当前和未来网格工作的重点, 应该支持和凸显网格员在多元纠纷化解中的角色和责任, 真正实现“小网格”的“微治理”与“精服务”。进一步的问题在于, 即使有部门负责人认为应该凸显网格员在多元纠纷解决中的角色和责任, 但对于网格员的素质、能力和工作方式表示担忧。

上述不同主体的认知差异均会不同程度地制约网格员在多元纠纷解决中的角色功能实现。网格员的自我身份认同和角色认知差异决定了网格员参与多元纠纷化解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社区居民对网格员角色的

认知差异会对网格员作为矛盾纠纷化解者的工作压力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社区部门负责人的认知差异则会对网格员的工作内容、工作压力、监督和激励机制等产生影响。

（二）制度困境

制度是用以规范人与人之间交往并提供人们在交易中的激励结构的系列规则^[6]。为更好地推进基层治理工作，不少地方相继出台了网格化服务管理的地方性法规，有关部门也出台了政策文件以推进基层多元纠纷化解工作，但关于网格员在多元纠纷化解中角色定位及职责行使的激励机制存在明显不足。在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中输入“网格化服务管理条例”进行检索，2019年至2024年共有18地市出台网格化服务管理条例，笔者随机挑选12地市网格化服务管理条例展开研究，如图2所示，各地市对网格化管理重视程度逐步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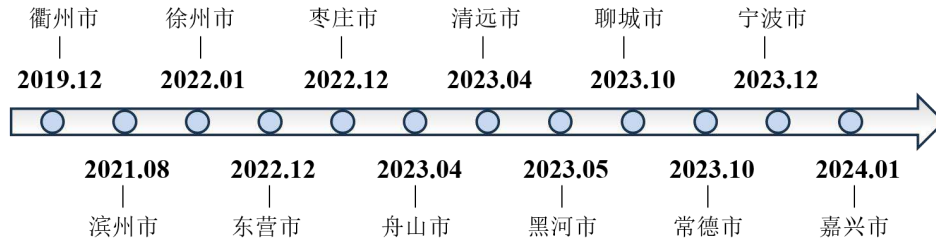


图2 2019-2024年我国各地市出台网格化服务管理条例的时间轴

1. 网格员角色定位不清

根据笔者对聊城等12地市网格化服务管理条例的整理发现，尽管所有地市均规定了网格员在多元纠纷解决过程中的信息收集和法治宣传职责，但在网格员的矛盾纠纷化解示范者角色，上述地方性法规均未提到。而在纠纷化解过程中网格员到底应该扮演单独调解者还是调解协助者抑或两种角色兼顾，上述地方性法规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如表1。其中只明确规定网格员应该协助开展纠纷化解工作的有嘉兴、聊城、黑河、枣庄、衢州、徐州6市，明确规定网格员既可主动调解也可协助调解的有清远、宁波、滨州3市，明确规定调解职责但未明确是协助调解还是主动调解的有常德、东营、舟山3市。而诸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快推进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央宣传部和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八个五年规划（2021—2025年）》等文件虽然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作为重要工作目标或内容，但均未明确界定网格员在多元纠纷化解中的角色。

表1 各地市网格化服务管理条例对网格员调解方式的规定

调解方式	城市
协助调解	嘉兴、聊城、黑河、枣庄、衢州、徐州
主动或协助调解	清远、宁波、滨州
未明确规定	常德、东营、舟山

2. 工作流程规范不完善

在各地市网格化服务管理条例中，尽管信息采集流程规范相对完善，充分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对信息进行分类处理，但对于矛盾纠纷化解的示范流程、具体化解流程以及法治宣传流程的规定仍显不足。具体而言，11个地市对网格员的法治宣传职责进行了详细的制度规定，唯独嘉兴市未对网格员的法治宣传职责进行相应的制度安排。这一现状表明，在网格化服务管理中，除信息采集之外，矛盾纠纷化解和法治宣传流程的规范化亟需加强，以确保网格员在各项职责中有效履职。

3. 激励机制不足

按照管理学的理论，激励机制涵盖薪酬激励、精神与荣誉激励和工作与职业发展激励等多个方面。有效的激励机制通过对组织成员精神和行为的双重引领，能够有效提升组织成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绩效，从而实现对组织及其成员的有序管理和有效管理^[7]。但目前关于网格员的激励机制存在明显不足。一是精神性表彰奖励的激励作用有限。从上述12地市网格化服务管理条例来看，所有地市均明确确立了或责成主管部门对表现突出的网格员予以表彰奖励的制度，实践中不少地方也定期对优秀网格员进行表彰，但由于表彰的覆盖面过小，再加上相应的精神性表彰难以与薪酬绩效或职业发展挂钩，对网格员的激励作用并不明显。二是职业发展激励不足。上述12地市中，仅有徐州、东营、嘉兴、黑河和舟山5市明确了职业发展激

励,规定在岗位晋升或事业单位招聘方面对于工作表现突出的专职网格员予以优先考虑。尽管如此,如何将制度层面的职业发展激励机制贯彻落实到位,依然需要相关主管部门在实践中采取切实有效的举措。

(三) 行为困境

上述认知偏差与制度困境直接导致了网格员在多元纠纷化解过程中的角色行为失范,进一步放大了网格员角色功能履职的不足。

1. 态度困境

态度是个体对特定对象的总体评价和稳定反应倾向,通常包含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三个成分,即态度的ABC模型。态度还具有行为倾向性,表明态度决定行为。调查数据显示,在网格员的工作态度方面,那些将自身视为“非政府工作人员”和“网格服务者”的网格员,其工作积极主动性显著高于将自身视为“政府工作人员”和“网格管理者”的网格员。同时,将自身视为“临时工”和“网格管理者”的网格员工作积极主动性最低。这一现象表明,网格员对自身角色的认知显著影响其在网格工作中的态度,而态度的影响力进一步影响了网格员角色履职的质量和效果。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笔者认为,政府的“兜底”功能以及体制内不合理的薪酬分配制度(即“干多干少一个样”)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后者的工作积极性。此外,那些将自身视为“临时工”和“网格管理者”的网格员,可能因对网格员工作职务的稳定性和长期性期待较低而表现出消极态度。因此,相关主管部门亟需加强对网格员身份的正确定位,并引导其改变工作态度,以提高工作积极性和整体工作绩效。

2. 能力困境

在综合能力方面,专职网格员在处理纠纷时通常表现出更强的专业性。然而,根据调查结果,仅有14.5%的网格员认为自己能够独立胜任矛盾纠纷调处工作,另有47.3%的网格员认为自己具备成为纠纷调处协助者的能力。基于心理学邓宁-克鲁格效应,个体对自身能力的评价本身就能够反映个体的能力。元认知能力的缺陷使任务表现不佳的个体通常无法认知到自己能力低下这一事实,而能力表现最好的人也会因为虚假一致性效应而无从获得准确的自我评价^[8]。因此,网格员对自身能力的自我评价与实际能力并不总是一致。一方面,网格员可能无法清晰认知自己的能力水平,这就需要相关部门采取积极措施,以激发网格员的信心和动力;另一方面,为了适应多元纠纷化解的需求,提升网格员的综合能力也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建立系统的培训和支持机制,将有助于提高网格员的专业素养和工作表现。

在专业能力方面,笔者通过对济南市、烟台市、潍坊市、吉安县和遂川县等五个地市的网格员招聘公告进行分析,发现网格员的招录通常侧重于综合素质和社区服务能力。这一现象表明,具备法学专业背景或接受法律相关专业培训的网格员并不占多数。这在需要相关法律知识和技能来化解矛盾纠纷时,必然会限制其作用的发挥。此外,城市网格员与农村网格员在专业能力上的差距更为明显。城市网格员的招录一般要求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而偏远农村地区对学历的要求则相对宽松,仅需应聘者能够熟练使用智能手机进行拍照、编辑和收发文件信息。这种差异不仅反映了城市与农村在教育资源和专业要求上的不同,也进一步影响了网格员在矛盾纠纷化解中的专业能力和工作效果。因此,提升网格员的专业培训和教育水平,尤其是法律知识的培训,显得尤为重要,以增强其在实际工作中的专业性和有效性。

3. 方式方法困境

有效的方式和方法能够显著提高工作效率,在多元纠纷化解工作中尤为重要。然而,网格员在实际操作中面临着方式方法的困境。访谈结果显示,网格员在处理纠纷时,有一部分人选择在矛盾发生后才介入化解,认为这样可以避免影响社区居民的和谐与稳定;而另一部分网格员则倾向于在潜在问题出现时便提前介入,以期通过早期干预来防止矛盾升级。因此,选择何种方式和方法以有效提升纠纷化解的质量和效率,成为一个亟待深入探讨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研究网格员不同介入时机的有效性和适用性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对不同介入策略的评估,可以为网格员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指导,从而优化其在纠纷化解过程中的决策,最终实现更高效的社区治理与和谐稳定。因此,相关部门应加强对网格员的培训,帮助其掌握多元化的纠纷化解技巧和策略,以便在实际工作中灵活运用,提升整体工作效果。

三、网格员在多元纠纷化解中的角色实现路径

(一) 认知提升

在提升网格员对自身身份认同、角色认知和能力的三个方面,首先应明确规定其在多元纠纷化解中的责任,并赋予其相应的权力,以增强其主人翁意识。^[9]这种身份认同的强化不仅能够提升网格员的工作积极性,还能使其在实际操作中更加主动和有效地履行职责。其次,针对社区居民对网格员在矛盾解纷工作中存在

的不信任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相较于司法力量,网格员的权威性较弱,且其纠纷化解的结果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10]。因此,通过宣传网格员在矛盾纠纷化解中的成功案例,可以显著提高其在这一领域的社会认可度,从而增强公众的信任感。这种信任不仅有助于提升网格员的工作效率,也能促进社区的和谐与稳定。第三,基层治理部门的负责人应给予网格员足够的信任,以充分发挥其积极性^[11]。网格化管理证明了这一群体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性和积极作用。因此,在矛盾纠纷化解过程中,也应积极调动网格员的主动性,为其在多元纠纷化解中担任信息收集者、矛盾调解者和法治宣传者等多重角色提供政策支持和必要的资源保。

(二) 制度完善

笔者对 12 个地市的《网格化服务管理条例》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各地市在网格员的角色定位及相关激励制度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因此,亟需完善网格员管理服务条例,以明确网格员在多元纠纷化解中的角色,并完善相应的激励保障制度,从而提升网格员的工作积极性。

首先,应统一制定《网格化服务管理条例》,使网格员的工作纳入法律和规章的框架。目前,国内尚未形成一部统一的《网格化服务管理条例》,且现有条例在内容上存在缺失。在国家重点推行网格化管理模式的背景下,相关部门有必要出台一部系统、科学的统一条例,以明确网格员的权利和义务,为其充分发挥角色责任提供法治保障。只有权责明确,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网格员的工作积极性。其次,需完善网格员的工作流程规范,继续探索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对信息进行分类处理。此外,应建立完善的矛盾纠纷化解示范流程、具体化解流程和法治宣传流程,以提高工作效率和效果。最后,激励机制的完善至关重要,这将有效激发网格员的工作积极性。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物质需求的满足是最基本的要求。因此,提高网格员的薪酬水平是提升其工作积极性的根本举措。实践中,精神和荣誉性激励的覆盖面较小且与薪酬挂钩的情况较少,因此应继续探索扩大精神与荣誉激励的范围,给予网格员在精神和物质层面上的双重激励,以应对复杂的工作挑战。此外,职业发展激励也应得到落实。正如美国著名法学家庞德所言:“法律的生命在于它的实行。”制度的有效性亦是如此,缺乏落实的制度将沦为空谈,毫无意义。

(三) 行为规范

1. 改变工作态度

网格员作为一线工作者,应具备扎根基层、心系群众的服务意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相关部门应对网格员的身份定位和工作态度提供积极的引导。网格员不仅是基层管理者,更是基层服务者,无论其身份是“临时工”还是“政府工作人员”,都应当具备强烈的职业认同感和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从诱因层面分析,工作的稳定性和长久性,以及不合理的薪酬分配制度,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网格员的工作积极性。因此,有必要建立合理的网格员工作机制及薪酬分配制度,以激励网格员的工作积极性,从而有效改善其工作态度^[12]。这种机制的建立不仅能够提升网格员的职业满意度,还能增强其对工作的投入感和归属感,最终推动整体社区治理的有效性和和谐发展。

2. 提升工作能力

工作能力的提升可分为两种类型:主动式提升和被动式提升。主动式提升是指个体意识到自身能力的不足,或为应对更具挑战性的工作而自发进行能力提升。将这种主动性视为网格员提升工作能力的内驱力,不仅能够增强网格员的工作积极性,还能为其在矛盾纠纷化解中有效履行角色提供切实可行的途径^[13]。另一方面,被动式提升则是指工作单位出于提升集体绩效的目的,为网格员提供培训和学习机会以增强其工作能力。通常情况下,单位会对网格员进行统一的职前培训,但这些培训往往仅停留在形式层面,或者内容缺乏针对性。因此,实施“因材施教”的培训方式显得尤为重要,这种方法能够为网格员的工作能力提供实质性的提升。在实践中,网格员可分为基础网格员、综合网格员和数治网格员。这三类网格员的工作内容各有不同,因此应根据其具体工作职责实施针对性的培训,以提高培训的有效性和网格员的整体工作能力。此外,工作能力的提升应包括理论与实践的综合发展。无论是主动式提升还是被动式提升,都应重视法律知识等理论的系统学习,同时注重实际解纷实践能力的锻炼与提升。

3. 创新方式方法

当前,社会矛盾处于高发态势,根据“基层预防调处优先”的工作思路,网格员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首先,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提高社区居民法治素质。在新时代法治宣传教育中,应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摆在首要位置,让习近平法治思想成为时代最强音^[14]。以习近平

法治思想为指导,持续不断提升全体公民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使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其次,应定期进行矛盾排查和分析,以发现潜在问题并提前介入。这一预防性措施不仅能够提高解纷效率,降低解纷成本,还能增强民众的信任感,最终实现社会和谐。同时,在纠纷化解过程中,网格员应将“情理法”相结合,通过情感沟通建立信任,道德伦理引导和解,法律规范保障公正,以此提升矛盾化解效率,减少矛盾升级最后,需加强对矛盾纠纷化解方案的后续跟踪与评估,确保其执行与落实,及时处理新生矛盾。此外,定期对矛盾化解工作进行评估总结,持续改进相关方式和方法,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与需求。

(四) 完善保障措施

为更好地实现网格员在多元纠纷化解工作中的角色,履行其职责,必须建立相应的保障措施。首先,充分发挥党员网格员的先锋模范作用^[15]。党的领导是做好多元纠纷化解工作的根本保证,党员作为先进分子,应积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仅要在思想上保持先进性,引导群众网格员,还要通过具体行动来激励和带动其他网格员,形成良好的工作氛围。其次,加强对网格员的统一职前培训。在培训内容方面,应强化法律知识、解纷技巧等方面的培训;在培训方式上,应进行创新,按照年龄阶段进行分层培训。针对年轻网格员,重点加强解纷经验的分享与实操培训;对于年龄较大的网格员,则应主要关注信息技术的使用培训,以提升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再次,完善相应激励保障措施。注重在网格内部挖掘网格管理员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充分利用口耳相传和自我内化的荣誉激励机制,给予网格管理员以充分信任,将他们从被动的被评价角色转化为为获得共同体承认而给予行动的行动者^[16]。此外,需以结果和竞争为导向,重新设计网格化社会治理的考核机制,提高整体待遇,并拉开内部差距,激励网格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后,扩大工作队伍,呼吁更多社会力量的参与。通过扩大公众的社会参与,吸纳文化程度高的中青年高素质人才加入网格队伍,为网格化社会治理注入新的活力和能量。

四、结语

网格员在多元纠纷化解中具有显著的结构价值,明确其角色定位并探索有效的实施策略,是提升积极性和有效性的关键。虽然当前在认知、制度、行为和方法等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但本文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优化路径。通过深入分析困境及相应解决方案,进一步加深了对网格员重要性的理解。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深化对网格员在多元纠纷化解中的作用,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并完善网格员参与多元纠纷化解机制,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落实提供实践经验,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更进一步。

参考文献:

- [1] (美)阿尔蒙德, (美)鲍威尔著;曹沛林译.比较政治学 体系、过程和政策[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
- [2] 刘锐,刘磊.权责分立与风险分配:网格化管理困境分析[J].求实,2020,(06):42-56+108.
- [3] 李涛.国家荣誉制度的创新发展:理论构造与法治路径[J].社会科学研究,2024,(06):134-141.
- [4] 李飞,庞正.在网格化社会治理中推进法治社会建设[J].法治现代化研究,2020,4(06):41-52.
- [5] 王淑雯,班颖超,苏冲,等.社会语言学概论[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21.
- [6] (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杭行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格致出版社,2014.
- [7] 《现代管理词典》编委会编委会著.现代管理词典 第3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 [8] 陈彦君,石伟,应虎.能力的自我评价偏差:邓宁-克鲁格效应[J].心理科学进展,2013,21(12):2204-2213.
- [9] 薛莉,房冠辛,吴蓉.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中国情境——基于南京市Q区社区治理创新的观察[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6(06):67-79.
- [10] 沈迁.党建嵌入社区网格化治理:实践形态、运行机制与内在逻辑[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22,(01):63-73.
- [11] 伊庆山.基层治理中网格化服务管理的实践经验与问题破解[J].领导科学,2022,(02):92-97.
- [12] 陆益龙,孟根达来.“吹哨报到”机制与城市基层的网格化治理[J].学海,2024,(02):39-49.
- [13] 李凤.技术悬浮于社会:基于县域网格化治理的反思[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23,(06):63-68.
- [14] 黄文艺,李奕.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社会建设理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02):59-67.
- [15] 向春玲.“红色网格”: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新探索[J].科学社会主义,2018,(05):107-113.

- [16] 张建,陈醉.我国网格化社会治理的实践逻辑及法理反思[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4(02): 128-138.

Role Positioning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Grid Members

Under the View of Resolution of Multiple Disputes

Zhang Guorun¹

¹ Shando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Yantai 264005, China

Abstract: Grid members are essential participants in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playing a key role in the resolution of multiple disputes.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survey research, this paper identifies the ambiguity in the role positioning of grid members in dispute resolution and clarifies four main roles that they should undertake: demonstrator, information collector, dispute resolver, and legal educator. Additionally, it explores the dilemmas faced by grid members at cognitive, institutional, and behavioral levels, and proposes practical solutions. This paper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clarifying the role of grid members in multiple dispute resolution and outlines implementation paths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helping to optimize the working mechanism of grid members and enhance their dispute resolution capabilities.

Keywords: Multiple dispute resolution; Grid members; Role positioning; Implementation path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3.720

明初江南重农抑商政策再解析——基于江南巨富沈万三为视域的研究

王琼平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 上海 201815)

摘要: 明朝建立后这种状况发生了逆转, 政策重新回到了“重农抑商”的轨道。朱元璋认为只有“重农”才能“富民”, 而要“重农”必须“抑商”。“重农抑商”政策在明初对于恢复和发展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 为国家的经济基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 其局限性也逐渐显现出来。

关键词: 明初; 重农抑商; 沈万三

一、前言

明朝开国之际, 由于元末长期战乱的影响, 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朱元璋称帝后, 着手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 稳定明初的社会环境, 为巩固王朝统治至关重要!

二、元明之际, 江南经济发展态势

所谓明初, 一般是指从洪武元年明王朝建立至宣德十年为止的六十七年, 又以洪武、永乐两代为主, 历史学家认为这段时期是“盛世”, 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比较稳定繁荣的时期之一, 但是明初也是处在一个由乱及治, 又由治渐趋动乱(靖难之役)的时期。由于长期的社会动荡, “土地荒芜”、“居民鲜少”乃普遍现象。朱元璋曾经说道: “新民望治, 犹疾忘医; 医有攻有保, 攻者伐邪, 保者扶衰; 民脱丧乱, 外邪已去, 今望扶衰。”^[1]朱元璋刚登基称帝的时候说道: “朕惟中国之君, 自宋运既终, 天命真人于沙漠……四方戡定, 民安田里”^[2], 从这句话当中可以看出, 朱元璋认为自己是人民生计来源的护卫者, 因为他告祭了天地, 可见朱元璋像历代帝王一样, 对土地的敬畏。大明王朝建立之初就是以长江流域为根据地, 从中国的东南方向进而包抄全国的, 最后问鼎中原, 夺得天下。大家也知道自五代十国以来, 江南就是富庶繁华之地, 在我国封建社会, 各个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也是客观存在的。

唐、宋以来, 就出现了经济重心的南移, 东南的生产力超越西北和中原地区的明显趋势。宋室南渡之后, 无论在人口密度、生产和消费水平、农业技术和单位产量、水利修建和利用收益、手工业以及商业的生产和经营等方面, 江南都属于全国领先地位了。

宋元时期都要仰仗东南的赋税来支持中央朝廷的财政开支, 南粮北运成为国家的经济命脉所系。富庶的江南也成为元明易代之时, 统治者加重赋税的一个重灾区了, 元朝末年, 蒙元统治者在江南地区攫取了高额赋税和大量的漕粮、钱物、劳役以维持其统治。就连朱元璋在领导反元斗争的檄文中也说到“贫极江南, 富夸塞北”, 可见当时江南的被盘剥的非常严重。清康熙年间, 苏州、松江两府绅士陆大鹏和邵元德, 曾在奏疏中对此做了说明: “苏州、松江两府为古扬州之域, 厥田下下。宋绍熙元年, 朱子行经界法, 吴民田每亩科粮五升, 民田之额始于此。元初, 苏郡增至三十六万, 松郡增至二十余万, 此加增之所自始也。”^[3]

综合来看, 每次朝代更迭的时候, 江南地区所征收的赋税只会是越来越重! 这样一来, 江南的民生问题肯定会越艰难, 导致社会矛盾尖锐, 朱元璋曾说, “我积少而弗多, 取给于民, 甚非得已, 亦皆为军需计用”。^[4]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明初几十年统治中全部依靠江南财政来维持帝国的运转。

作者简介: 王琼平(1981—), 男, 江苏苏州人,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讲师。

三、沈万三家族的兴起与元明易代之时经济政策的调整

周庄位于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也是笔者的家乡，是江南六大古镇之首，有“中国第一水乡”之誉。周庄镇旧名贞丰里，据史书记载，北宋元佑年间（1086年），周迪功郎信奉佛教，将庄田二百亩，捐赠给全福寺作为庙产，百姓感其恩德，将这片田地命名为“周庄”。1127年，金二十相公跟随宋高宗南渡迁居于此，人烟逐渐稠密，周庄元代时属苏州府长洲县。

元朝中叶，颇有传奇色彩的江南富豪沈万三之父沈佑，由湖州南浔迁徙至周庄东面的东宅村（元末又迁至银子浜附近），因经商而逐步发迹，使贞丰里出现了繁荣景象，形成了南北市河两岸以富安桥为中心的旧集镇。到了明代，镇廓扩大，向西发展至后港街福洪桥和中市街普庆桥一带，并迁肆于后港街。明代中期属松江府华亭县。沈万三利用白蚬江（即东江）西接京杭大运河，东北接浏河的优势，出海贸易，将周庄变成了一个粮食、丝绸及多种手工业品的集散地和交易中心，促使周庄的手工业和商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最突出的产品有丝绸、刺绣、竹器、脚炉、白酒等。

再来说说沈万三这个人，综合梳理资料和之前的很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发现，首先沈万三生卒年具体不详，但是有一条可以肯定的是，沈氏家族是元朝中叶从南浔迁到周庄的。陈兆弘在“明代经济史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的《明初巨富沈万三的致富与衰落》一文中说沈万三的发家，是从自己的勤劳垦殖开始的。“其先世以躬稼起家……大父富，嗣业弗替；尝身帅其子弟力穡”，说明沈万三依靠垦殖发富，他有了立业的根本。以后沈万三得到了汾湖陆氏巨资，使其财富的积累上更加丰厚。“沈万三秀之富得之于吴贾人陆氏，陆富甲江左…尽与秀”。^[5]这个陆氏是元代汾湖富户陆德源，他富甲江左，很欣赏沈万三的聪明才智和经商信用，觉得自己已经老了，于是看破了红尘，把自己家巨额财产如果不传给别人，一旦时局动荡，反而会酿成祸害。于是全部赠送给沈万三，自己去澄湖边的开云馆当了道士，直到去世。经过陆氏赠财，沈万三完成了原始积累，并且他得到了巨资后，一方面继续开辟田宅；另一方面他把周庄作为商品贸易和流通的基地，利用白蚬江（东江）西接京杭大运河，同时开展“国际贸易”，或者叫“通番”赚取了巨大财富。

据《吴江县志》载，“沈万三有宅在吴江二十九都周庄，富甲天下，相传由通番而得”。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也说：“苏州沈万三一豪之所以发财，是由于作海外贸易。”他是通过垦殖而积累原始财富的，接着善于利用别人的金钱，并大胆地“竞以求富为务”，开展对外贸易活动，扩大资本。从而使他迅速成为“资巨万万，田产遍于天下”的江南第一豪富。周庄“以村落而辟为镇”，也实为沈万三之功。通过以上的资料可以看出沈万三通过“垦殖”、“陆氏赠财”、“海外贸易”等手段积累了巨大财富。

元末明初，社会动荡加剧，据史料记载，当时南浔闹水灾，实在没活路了，沈家先人举家搬到周庄，沈家刚到周庄，财富平平，但是沈家能从自足的小农之家经营为地方巨富，得益于元代的相对宽松的经商环境，元代纵商政策也致使大地主和大商人阶级膨胀，土地兼并严重，贫富差异悬殊，社会动荡，最终爆发了元末农民起义。“富民多豪强，故元时此辈 欺凌小民，武断乡曲，人受其害”^[6]。元代重农的同时也实行保护和鼓励发展商业的政策，为推动海外贸易的发展，实行官本船法。至元“二十一年，设市舶都转运司于杭、泉二州，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蕃，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7]江南之地，元明之际受到沉重的盘剥，永乐迁都北京，江南地区的负担更为加重。原来当年就近供应南京的粮食及诸色用品，绝大多数都要按期如额转输到北京交纳。

洪武中叶，东南亦有运粮往北的，但主要只是为供给辽东等地边塞屯军之用，每年的数量不过三四十万石。迁都之后，政治重心北移，漕粮的数额一跃到二百万石，到永乐末年，达到近四百万石。除了一般漕粮以外，还有指定由苏、松、常、嘉、湖五府供应并负责运送交纳的白粮十六万石，被称之为“上方之玉食”。^[8]

明朝当时有官田和民田之分，二者征税的额度完全不同，按照朱元璋在洪武初年的规定，官田和民田分别应交纳给官府的税粮数目有极大的悬殊，一般民田，每亩不过三升五升，而其最下有三合五合者^[9]。朱元璋刚登上帝位，就在《初元大赦天下诏》中明确宣布，“各处荒闲田地，许令诸人开垦，永为已业”^[10]。当然重赋的同时，明初也进行了休养生息的政策，比如“粮长制”、鼓励垦荒、兴修水利，洪武二年，发松江、嘉兴民夫二万人开上海胡家港，将槽道与海口接通，七年至九年，在常熟县开奚浦，直达塘堰坝，二十三年修筑崇明县和海门县已溃决堤岸二万三千余丈，共役人夫二十五万人，二十四年，修筑宁波、奉化海堤四千三百余丈，筑上虞海堤四千丈、改建石闸，浚定海、鄞县的东眺湖，可以灌田数万顷，二十五年开凿溧阳良墅东坝河道，役夫三十五万九千人，二十八年，开凿松江的太平河，三十一年，径阳县的洪渠堰圯坏，派长兴侯耿炳文率军工修治，浚渠十万三千余丈，可灌五县之田万顷。^[11]

综合来看，明初统治集团还是比较重视农业发展。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明初也在推行种植多种作物的政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这政策本身符合江南社

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例如松江府,“地产木棉,行于浙西诸郡,纺织成布,衣被天下。而民间赋税,公私之费,亦赖以济”^[12],这些政策一方面为明代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积累了基础,也为周庄的沈万三发展海外贸易储备了贸易物资,然而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大环境中,士农工商依次等级,重农抑商是传统的治国策略。

元代大体继承了宋代的经济政策,在发展农业、畜牧业的同时也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商业,棉织业、印染业、丝织业、制瓷业等都有长足发展,商业也很活跃,尤其在对外贸易方面较宋代又有进步。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在江南出现了许多商业繁荣的大城市。

明朝建立后这种状况发生了逆转,政策重新回到了“重本轻末”的轨道。朱元璋认为只有“重农”才能“富民”,而要“重农”必须“抑商”,让主要劳动力固定在土地上。为此朝廷又建立起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把人分成“军、民、医、匠、阴阳诸色户”,一般农民不能脱离本身的户籍去经商,而商人也只能在本地经营,想去外地,手续十分繁杂。作为商人的沈万三难免会成为政府打压的对象,例如在当时实行粮长制,洪武四年设立粮长制,规制以纳粮万石的土地为一个单位,其中田土多者为粮长,督其乡之赋税。江南地区负担了国家最主要财政收入,也最先实行粮长制。在粮长制设立当年“户部奏浙江行省民一百四十八万七千一百四十六户,岁输粮九十三万三千二百六十八石,设粮长一百三十四人,”^[13]

明代设立粮长制的目的就在于以良民治良民,富民在一定程度上是沟通官民的桥梁,国家依靠富民实现其对广大的乡村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控制,既提高了行政效率又节省治理成本。粮长制作为国家制度其设立的初衷是为保证国家财源,而任粮长的富户在地方除是国家统治的代表外,更多扮演的社会角色是与国家利益相悖的地方豪强,也就导致他们在以国家的名义执行粮长任务时,更多考虑地方豪强团体的利益,因而粮长制“以良民治良民”的理想状态,不可能完全实现。粮长舞弊就是地方与中央利益矛盾问题的表现,后来矛盾不可调和,势必会遭到排挤打压,沈家当时还担任户部官职,例如沈茂和沈玠任官职掌,户部仓曹员外郎主管漕运、仓储出纳,广积库是户部属衙,管理库藏。^[14]

可见朱元璋先笼络江南富户是出于明初社会治理重建和国家统治机制建设运行亟需资金的现实考虑。然而不可避免的是,江南富户掌握经济命脉的形式与国家加强中央集权的要求存在根本利益分歧。朱元璋重用沈家为政府办事,地方势力和国家权力的冲突也随之相伴,朱元璋和沈家的关系也显得微妙。洪武二十六年蓝玉案发,沈家因为女婿顾学文利用粮长职权通奸被卷入到这场肃清政敌、排除异己的政治风暴中,借由蓝党之名打击以沈万三家族为代表的富户,最重要的就是削弱这些富户江南经济的把控。在蓝玉案当年便“令浙江、江西、苏松人毋得任户部”^[15]这意味着沈茂和沈玠不再担任户部官职,皇权赋予的沈家经济控制权力的合法性被剥夺。可以说,蓝玉案是打垮沈家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综合来看,明初对江南富户实行两面手段,一方面利用经济实力为新王朝服务,另外一方面把江南富户控制在可控的范围内,稍有突破,必遭打压。从而削弱了地方豪强地主占据优势的经济地位,进而实现了中央集权的目的。

四、朱元璋调整经济政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明朝初年为什么重新强调“重本轻末”呢?大概有以下几条原因

1. 朱元璋的小农思想影响,他出身卑微,经历曲折而丰富,曾经说过“天生烝民,所以立命者,衣与食也”,所以登基以后大力发展农业,奖励垦荒、解放奴婢、兴修水利、大量移民,通过这些措施使农业经济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2. 元朝土地兼并严重,民不聊生,赋税繁重,小农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作为封建统治的根基,小农经济体系在元朝已经名存实亡。
3. 元明之际,战争对社会经济的破坏,人口大量逃亡巩固新政权的关键首先要解决百姓的吃饭问题和朝廷的基本支出,集中全力恢复农业发展便成为首要任务。
4. 开国初,朱元璋勤俭节约,闻名于世,那些官僚贵族贪图享乐,败坏社会风气,这使他无法容忍的,再加上商业和商人常与逐利、享乐相联系,与崇俭的思想相悖,而务农重本则与抵御奢靡享乐一脉相承^[16]。结语:这种政策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对发展农业生产有好处,另外打压工商业会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导致明朝中后期经济结构无法转型且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

参考文献:

- [1]谈迁 国榷卷二. 北京:古籍出版社,1958.
[2]王崇武《明本纪校注》542 上海 1948 慕印本

- [3]嘉庆《松江府志》卷二一，《田府志》
[4]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五
[5]《周庄镇志》卷六·杂记
[6]明太祖实录 台北：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7]脱脱.元史 北京 中华书局，1976
[8]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二一，《江南》《北运 白粮》。
[9]杜宗植《上巡抚侍郎周忱书》载《日知录 集释卷一〇》
[10]《皇明诏令》卷一
[11]乾隆《江南通志》卷六三，《河渠志水利治绩》
[12]叶梦珠《阅世编》卷七
[13]明太祖实录.台北,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4]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北京：故宫出版社
[15]张廷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16]美 牟复礼 剑桥中国明代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Reanalysis of the Early Ming Dynasty's Policy of Emphasizing Agriculture and Suppressing Commerce in the Jiangnan Region — A Stud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hen Wansan, the Great Wealthy Magnate of Jiangnan

Wang Qiong-Ping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Tianhua College, Shanghai 201815

Abstract: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ing Dynasty, this situation reversed, and policies returned to the track of "emphasizing agriculture and restraining commerce." Zhu Yuanzhang believed that only by "emphasizing agriculture" could the people be "enriched," and to "emphasize agriculture," it was necessary to "restrain commerce." The policy of emphasizing agriculture and suppressing commerce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restoring and develop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the Jiangnan region and stabilizing social order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country's economic base. However, to a certain extent, it restricted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e and handicraft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its limitations gradually became apparent.

Keywords: Early Ming Dynasty; Emphasize agriculture and suppress commerce; Shen Wansan.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3.794

数据中介机构规范化的治理路径

张亚楠¹

(¹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河南行政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0)

摘要: 数据中介机构作为数据产业体系化的产物之一, 承担着数据共享流通的重要媒介作用。在数据权利顶层设计未定的情况下, 数据中介机构的规范化任重而道远。根据世界各国的发展实践, 数据中介机构呈现出三种基本分类、七种实践形态。依托可信理论, 数据中介机构成为链接数据生产者和数据需求者的重要一环, 在相关法律规范缺失的情况下, 数据隐私安全问题、中介机构可信问题、数据平台垄断问题都是制约数据中介机构规范化的痛点难点, 因而要针对性地探索数据确权机制、明确数据中介机构的基本义务、加强对数据中介机构的全面监管, 促使数据中介机构逐步进入规范化的路径。

关键词: 数据中介; 可信理论; 数据监管; 规范路径

一、数据中介机构的实践形式与主流分类

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的高速发展, 深刻地改变着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交往的传统方式, 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数字产业蓬勃发展, 数据作为互联网时代的重要介质, 已经成为除却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之外的第五大生产要素, 逐渐“进入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的各个环节中”[1]。因此, 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 数据中介机构的衍生是数据作为生产要素产业化、市场化的必然结果。

(一) 数据中介机构的提出

数据治理的规范化起源于欧盟、美国等国家, 欧盟于 2016 年 4 月通过《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以下简称 GDPR), 对法案的适用范围、个人敏感数据、问责机制、数据主体的八种相关权利、数据处理者、数据泄露者、数据保护官等制度做了严格规制; 美国于 2019 年通过了《开放政府数据法案》(以下简称 OGDA), 要求各联邦机构尽量开放联邦政府产生的大量元数据, 并且建立了数据保护官制度; 时至 2022 年 5 月, 欧盟在数据治理领域出台《数据治理法案》(以下简称 DGA), 主要针对 G2B 和 B2B 模式下的数据共享与再利用进行制度安排, 相较 GDPR 而言, 突出数据的利用价值, 对数据的开放、交换、利用做了进一步说明, 并且在法案中率先提出“数据中介机构”, 确认了这一机构的合法地位。

数据中介机构的产生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海量的数据可以借助这一中介发挥巨大潜能, 为个人与数据需求者建立一种供需桥梁与共享平台, 打通个人用户与数据需求者之间的交换渠道, 以一种相对公正的第三方平台协调双方的数据权利与矛盾, 畅通数据治理的体制机制。关于数据中介机构的定义, 学界和业界的范围有些许不同, 学界倾向于将数据中介机构的含义限定在 DGA 框架下, 业界倾向于将数据中介机构的定义扩大至数据经纪商等七个类别, 前者倾向于认为数据中介机构是通过技术、法律等手段将不确定的数据主体、数据保有人、数据用户之间联系起来的数据交换平台, 该平台本身并不实施向数据主体进行数据购买、加工再出售给数据用户的独立法律行为; 后者倾向于将参与数据居中处理的行为都纳入中介范畴。

(二) 数据中介机构的实践形式

数据中介机构旨在减少数据持有者与潜在数据使用者之间的信息差, 通过提供技术来实现数据的共享。依据国内外数据中介机构的实践, 目前业界主要有七种典型的数据中介机构: (1) 数据交易平台: 旨在解决信息不匹配问题, 通过交易平台将数据供需双方联络起来, 诸如我国成立的各种数据交易中心、数据交

基金项目: 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42400410569);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校级专项课题(ZX2021003);

作者简介: 张亚楠(1989—), 女, 法学博士,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决策咨询部讲师, 研究方向为行政法、数据法、网络法;

易所；(2) 数据经纪商：不同于数据交易平台，数据经纪商更加具有主动性，主要从事数据的收集、处理，包括购买数据集并将数据提供给需求者，自己既是数据提供方，也是数据需求方；(3) 个人信息管理系统：更加强调个人数据权，数据个体可以将授权给银行、政府、互联网等企业的数据权限通过 PIMS (Person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s) 系统进行管理；(4) 数据信托：依据信托原理，引入“信息受托人”概念，赋予数据信托机构忠实义务，由信托机构统一获得委托人的授权同意后，以机构名义对第三方进行数据输送，来“弥补数据流过程中的信任赤字”[2]；(5) 开放银行服务商：利用技术将银行、科技公司、第三方商户、用户等参与主体融入同一个生态圈，扩大获得数据的方式和范围，通过 API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增加数据的使用率；(6) 数据沙箱：主要针对个人敏感数据、涉密数据的安全访问，数据保管人通过技术将原始数据封存在可信环境中（“数据沙箱”），使得数据仅能“使用”而不可“视”；(7) 数据共享平台：主要由可被信任的第三方来链接数据需求方，第三方通常是公主体（如政府）或者私主体（如非营利性主体），这一机制可以实现数据在商业环境竞争者之间的良性循环。

（三）数据中介机构的主流分类

按照数据中介机构在数据供需双方的侧重点不同，以上 7 种典型数据中介总体上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以解决数据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为目标，主要包括数据交易平台、数据经纪商；第二类重在增强用户对个人数据权的掌控，通过技术控制、信托机制、标准数据接口来提高数据的流通效率，此类主要包括个人信息管理系统、数据信托、开放银行服务商；第三类重在通过创造可信生态环境圈，保护敏感、隐私等涉密数据，在保证数据原始性不被破坏的基础上实现数据的分析利用价值，此类主要包括数据沙箱和数据共享平台。

二、数据中介机构规范化的桎梏障碍

“由于在数据产权、市场流通、交易准则、技术标准、平台能力、企业信誉以及法律风险等关键领域缺少共识，并且没有高效且实际的交易方式，大数据交易平台和其他数据中介机构难以充分发挥作用，从而限制了数据交易的广度和深度。”[3]有学者认为，“数据中介机构”简单来讲就是出卖用户个人信息的公司。尽管目前数据中介机构有三种分类，七种形式，但这种“出卖”行为背后隐藏的法律关系异常复杂，同时面临的数据隐私风险、中介机构可信障碍、数据共享平台垄断等都会成为数据中介机构规范化的障碍。

（一）数据隐私安全风险

数据中介机构的多重实践形式取决于数据治理的具体环境，纵观三类数据中介机构，虽然通过技术保护在一定层面上减少了数据安全泄露，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数据隐私风险问题。电子化行政、电子化商业的更新迭代主要依靠人机互动，数据作为用户生产生活的电子痕迹，无处不在。网页浏览痕迹、网站购买记录、社交媒体 APP 上的观点发表与评论，经过数据中介机构全方位地搜集、加工与分析，几乎可以完整地得出网络用户画像。“平台通过分析用户画像对用户的特征和行为展开评价和预测，进而通过算法进行个性化的内容推荐并促成消费行为”。[4]价值偏好与信仰等涉及个人隐私的分析虽然可以为商业决策提供分析基础，但同时也侵犯着网络用户的隐私权。虽然第二类和第三类数据中介机构依托第三方机制能避免数据用户与数据需求者直接链接，但将这种数据隐私保护重担放在依靠自律的第三方机构显然不能长远，并且有可能触发数据保护的合法性。此外，数据中介机构获得用户的授权许可通常是通过用户与平台签订的自动化协议，数据中介机构能不能收集、收集哪些用户数据，一方面受到平台的限制，一方面受到用户的间接授权限制。当数据中介机构的体量足够宏大，那么作为数据经济的中介机构，就会成为对抗公主体进行社会决策、行政决策的强有力一方，用户数据隐私、数据安全保护风险就会进一步加大。因此，要警惕数据中介机构的无限、无序扩张。

（二）中介机构可信障碍

早在 2017 年，我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就提出，平台运营商所获得的数据本质上不属于自身，而归属于平台用户，运营商可以通过与用户签订智能化协议对用户数据进行加工分析，为外界提供数据分析的咨询类业务，但是数据能否进行合理定价、对外出售都属于法律监管的盲区。在数据治理领域，数据共享平台在公主体领域得到了蓬勃发展，电子化行政为政府数据的归集、治理提供了可能。“数字政府的运转离不开数据，而政府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所产生的数据属于公共数据的范畴。”[5]行政机关在进行社会事务的管理时，通过行使行政职能获得了大量政府数据，在此层面上，政府数据开放平台或者公共数据平台可以认为是广泛意义上的数据中介机构。但由于政府数据开放平台通常归属于大数据管理机关，因而此类数据中介机构天然地具有法律地位的合法性，面临的数据安全问题和隐私问题也更少。但是除却公主体范围的数据中介，数字经济市场的数据中介通常以“盈利性”为主要目标，用户数据只是其进行数据产业化、商业化的工具，对是否保护用户隐私、数据安全并非其第一要务，数据中介机构作为第三方信托单位，仅能依靠行业自律进行规制，用户在面临此种性质的中介机构时，天然地缺乏信任感。

（三）数据共享平台垄断

数字经济发展、数据产业体系化势必要求除了公主体之外的数据私主体参与，激发更大的数据产业活力，增加数据产业化投资。公主体性质的数据共享平台通常以公共利益的保护为目标，采取由上而下的方式推动政府数据开放发展。私主体性质的数据共享平台以盈利为基本目标，推动其研发新技术进行数据汇集、储存、分析、流通的关键在于数据产业化蕴含的巨大经济效益。当超大聚合数据平台形成并占据主要数据要素市场份额时，数据共享平台垄断必定会侵害用户及数据需求者的合法利益。“这种以互联网为中介的经济模式，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紧密结合，催生了与传统实体经济截然不同的互联网经济形态。”[6]一方面，数据中介机构将数据汇集在统一的平台，并通过技术手段和规则进行数据共享，汇集、聚合是发展的基本趋势；另一方面，数据行业进入门槛较高，率先发展的数据企业在占据数据产业先机时，更容易获得数据要素市场的支配地位。数据中介机构的发展趋势和垄断弊端相伴相生，在规范化的道路设计上既不能遏制发展活力，更不可放任其肆意扩张，因而如何在数据共享流通和数据中介机构规范化之间调和矛盾冲突，是预防数据共享平台垄断地位产生的重要议题。

三、数据中介机构规范化的治理路径

数据中介机构的产生无疑对数据产业化发展起到了重要助推作用，“数据的流通和共享增加了信息泄露、数据滥用和篡改的风险。”[7]不同于公主体性质的数据中介机构，在考虑共性的数据隐私、安全问题时，私主体性质的数据中介机构在隐私保护、数据安全、可信赖度、垄断地位方面更容易出现失范现象。因此在探讨数据中介机构的规范化上，应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出发。

（一）积极探索数据确权机制

“数据确权”一直都是数据治理领域的重要问题，在发挥数据资源价值的维度上，部分学者认为应适当鼓励数据产业的实践探索，“数据确权”在某种程度上会阻碍数据共享和数据产业的发展。但从数据产业长远发展以及国际化的视角来看，部分学者认为“数据确权”是前提，是基础，应将理论与实践相联系，尽快探索出数据确权的基本规则，切不可本末倒置。事实上，目前纵观国内外学界，数据确权的探索对数据开放、数据共享、数据产业发展、数据经济发展等意义重大。“只有将数据利益上升到权利，数据‘流得动，用得好’目标能真正实现，数字经济作为市场经济体系一部分才能有效运行。”[8]数据中介机构作为数据的汇集者和协调者，理应深刻把握数据权利的基本内容、数据权利的归属机制，遵从数据治理法律法规。数据不仅仅是一串物理代码，其所蕴含的属性价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用户的价值观、偏好、习惯甚至是个人隐私。如果为了促进数据共享利用，而忽视“数据”作为个人、企业生产生活的产物，最终是为“人”服务的，理应以“人”的价值追求为目标。数据中介机构的规范化，依赖着数据的确权机制，有利于厘清数据供需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明晰数据的内在构造，针对不同类型的数据赋予不同的权利内涵。

（二）明确数据中介机构基本义务

在数据中介机构的三种类型，七个实践分类中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就是“信托理论”，这是作为中介一方能被数据供需双方信任的前提。数据中介机构如果要在数据产业化发展中占据一席之地，“被信任”可以畅通数据供需双方进行数据共享的体制机制。数据中介机构的基本义务有两个：一是忠实义务，二是信托义务。

忠实义务主要指数据中介机构在处理数据权利主体之间的关系时，应最大程度保障数据主体能够顺利行使其基本权利，无论是数据生产者还是数据需求者，在第三方数据中介机构的协调下，数据生产者可以仅在授权规则下明示原始数据的基本权利，数据需求者可以在该中介平台获得合法的、对价的数据服务，不会因为数据生产者或者部分数据需求者的力量微弱而遭受歧视。信托义务是指数据中介机构在进入数据交易市场时，应履行严格的法律程序，对数据处理、数据安全、退出机制等方面如实向公众公布，“履行对数据处理者的监督和管理职责”[9]，如实向对应行政机关进行报备。在数据共享业务处理过程中，应按照既有的《数据安全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明确基本义务，制定的内部竞争规则应以合法合规为首要目标。

（三）加强数据中介机构全面监管

数据交易生态系统大致包括数据提供方、数据购买方、数据平台、平台监管方和中介服务方，各国按照不同的数据顶层设计，监管方式与力度也各不相同。以我国为例，数据中介机构大致包括数据交易平台、数据经济人、数据经济商，按照数据中介机构或可面临的隐私问题、可信义务、平台垄断等失范行为，必须加强全面监管。

《数据安全法》第三十三条指明“从事数据交易中介服务的机构提供服务，应当要求数据提供方说明数据来源，审核交易双方的身份，并留存审核、交易记录”；第四十七条针对性地给出了违反规定需要承担“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以及罚款等责任。但这仅是对数据中介商进行的结果性惩罚，缺少数据中介商进入数据市场的专业限制。不同于其他服务行业，数据中介机构提供

的数据服务以数据为基础,以共享流通为基本方式,以机构平台为基本载体,监管机构依法处罚的范围仅以法律法规为限,包括但不限于“数据集成、数据经纪、合规认证、安全审计、数据公证、数据保险、数据托管、资产评估、争议仲裁、风险评估、人才培养等”[10]因此要按照事前、事中、事后的基本思路进行全面监管,事前提高数据服务市场的准入门槛,提高入门的许可资质;事中加强数据监管机构的技术介入,敦促数据中介机构尊重数据生产者与数据需求者的基本权利,保障二者的基本权利在流通中实现一种均衡;事后要对数据中介的责任人加强管理,针对数据隐私泄露、数据安全保障和数据垄断地位的形成等问题进行重点监管和处罚,增加数据中介负责人的违法成本,化解数据中介的信任危机。

参考文献:

- [1]蓝庆新,张心平.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70(02):87-95.
- [2]丁凤玲,张楚玉.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治理革新:多元数据中介[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6(04):84-96.
- [3]刘银喜,吴京阳.数据资源配置的市场失灵及其矫正机制[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52(02):23-29.
- [4]刘晓春.人工智能时代用户画像的功能与治理:以未成年人保护为视角[J].网络法律评论,2024,26(00):47-59.
- [5]张雅雯,孟天广.生成式 AI 嵌入数字政府建设的法律风险与规制路径[J].社会学刊,2024,2(02):53-72+223-224.
- [6]贺利娟.互联网平台经营者数据垄断的法治实践考察[J].中国价格监管与反垄断,2025,(03):37-39.
- [7]杨云,李颖.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的价值意蕴、现实挑战与应对策略研究[J].产业创新研究,2025,(03):4-8.
- [8]申卫星.数据产权的力度和限度[J].东方法学,2025,(01):32-45.
- [9]梅贻哲,董新义.个人数据信托的方案建构:基于利益平衡的数据治理[J].南方金融,2024,(08):61-73.
- [10]程啸.论个人数据交易的合法性审查义务[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5,28(02):34-47.

The Standardized Governance Path of Data Intermediaries

Zhang Yanan¹

¹Decision Consulting Department, Henan Provincial Party Schoo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enan Administrative College), Zhengzhou,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products of the systematization of the data industry, data intermediari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as a medium for data sharing and circulation. In the absence of a clear top-level design for data rights, the standardization of data intermediaries is a long and arduous task.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practices of various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data intermediaries present three basic classifications and seven practical forms. Relying on the theory of trustworthiness, data intermediarie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link between data producers and data demanders. In the absence of relevant legal norms, issues of data privacy and security, the trustworthiness of intermediaries, and data platform monopolies are all pain points and difficulties that constrain the standardization of data intermediari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targeted data ownership mechanisms, clarify the basic obligations of data intermediaries, strengthen comprehensive supervision of data intermediaries, and promote their gradual entry into the path of standardization.

Keywords: Data Intermediary; Credible Theory; Data Supervision; Standardized Path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3.786

先秦两汉“孔子问礼于老子”文献用例

时尚¹

(¹ 苏州科技大学, 江苏 苏州 215000)

摘要: 在孔子问礼于老子被当作常识、典故运用到文献中时, 这个事件被赋予更多求学问礼之外的意义。其中有一个运用方式值得探讨: 孔子向老子问礼被凝练成孔子“师事”老子, 并被纳入选定的“师事”序列中, 着重强调“师”的意味。以“师事”序列为切入点, 可以分析孔子地位的变化及孔老关系的变化与影响, 指出经学背景下帝王之师观念蕴含的政治理想。

关键词: 孔子问礼, 师事, 孔老关系

一、《吕氏春秋》中的论述

《吕氏春秋·当染》载: 非独国有染也。孔子学于老聃、孟苏蓂、靖叔。……此二士者, 无爵位以显人, 无赏禄以利人。举天下之显荣者, 必称此二士也。皆死久矣, 从属弥众, 弟子弥丰, 充满天下, 王公大人从而显之, 有爱子弟者随而学焉, 无时乏绝。……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 不可胜数, 皆所染者得也。^[1]

《当染》是一篇完整的议论文, 思路清晰, 结构完整, 从生活中染丝需要得当, 引出治国治天下的王者也需要选择合适的大臣、受到得当的影响, 进而再引出学习同样需要选择合适的老师, 受到得当的影响。对王者治天下而言, 用人得当才能够取得“王天下, 立为天子, 功名蔽天地”的效果, 使王者获得“天下之仁义显人”的盛名; 称霸一方的诸侯治国用人得当也能“霸诸侯, 功名传于后世”。对学生学习而言, 择师得当才能够从“无爵位以显人, 无赏禄以利人”的窘况摆脱出来, 成就“举天下之显荣者”的功业。两相比较, “当染”是个人选择, 能带来的主要也是个人利益。但学习还可以带来长远地良性循环, “王公大人从而显之, 有爱子弟者随而学焉, 无时乏绝”, 好的老师可以教出好的弟子, 好的弟子又可以成为好的老师, 代代相承, 不过, 《当染》强调的是“王公大人”或王公大人的子弟可以求得名师, 使得家世更加显贵, 代代相传; 治天下治国相对而言要险恶得多, 即便“伤形费神, 愁心劳耳目”, 重其国、爱其身, 也会因为所染不当, 遭受“国残身死, 为天下僇”“国皆残亡, 身或死辱, 宗庙不血食, 绝其后类, 君臣离散, 民人流亡”的恶果, 沦为“天下之不义辱人”、“天下之贪暴可羞人”。

文章中出现了一个根据社会地位、政治权力确立的序列, 由高到低依次是 A 治天下的王者 > B 治国的国君 > C 王公大人 > D 无名无利的学者。ABC 三类人是否当染会影响到其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力, 但对于 D 无名无利的学者而言, 所染得当能带来利处, 获得名利, 所染不得当倒也不会有什么坏处, 好像名利是他们的“身外之物”, 得不到才正常。并且, 无名无利的学者所染得当能带来的最大好处竟然是帮助前来求学的王公大人获取和存续其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力。当时的社会现实是否也这么残酷, 并不能直接据此推出。但《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召集众门客所撰, 是政治势力整编学术思想的一次尝试, 凭借学识被召集撰书的学人将自己的境地写得如此难堪, 也可以想见无名利学者的为学不易。所以, 《当染》中的“孔子学于老聃”就只是一个学者的求学故事, 并没有更深含义。

《吕氏春秋·尊师》和《当染》有相似的行文结构, 身份区分更加明显, 并且已经开始表露“师”的特殊

基金项目: 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 出土简帛与秦汉时期算术问题相关研究 (KYCX24_3394)

作者简介: 时尚 (2000—), 男, 洛阳人, 苏州科技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

含义。

(1) 从名词使用上来说, 治天下治国的圣人贤者求教于人称“师”: 神农师悉诸, 黄帝师大挠, 帝颡项师伯夷父, 帝喾师伯招, 帝尧师子州支父, 帝舜师许由, 禹师大成赞, 汤师小臣, 文王、武王师吕望、周公旦, 齐桓公师管夷吾, 晋文公师咎犯、随会, 秦穆公师百里类、公孙枝, 楚庄王师孙叔敖、沈尹巫, 吴王阖闾师伍子胥、文之仪, 越王句践师范蠡、大夫种。此十圣人、六贤者未有不尊师者也。^[1]

而“学”适用于所有人——“凡学, 非能益也, 达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败之, 是谓善学。”主要是学“义”, 达到保全自己的目的: 子张, 鲁之鄙家也; 颜涿聚, 梁父之大盗也; 学於孔子。段干木, 晋国之大狙也, 学於子夏。高何、县子石, 齐国之暴者也, 指於乡曲, 学於子墨子。索卢参, 东方之钜狡也, 学於禽滑黎。此六人者, 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 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 以终其寿, 王公大人从而礼之, 此得之于学也。^[1]

(2) 从内涵上来说, 《尊师》确立了一个师道原则:

君子之学也, 说义必称师以论道, 听从必尽力以光明。听从不尽力, 命之曰背; 说义不称师, 命之曰叛。背叛之人, 贤主弗内之於朝, 君子不与交友。故教也者, 义之大者也; 学也者, 知之盛者也。义之大者, 莫大於利人, 利人莫大於教; 知之盛者莫大於成身, 成身莫大於学。身成则为人子弗使而孝矣, 为人臣弗令而忠矣, 为人君弗强而平矣, 有大势可以为天下正矣。^[1]

从外延上来说, 任何人, 即便是最位高权重的天子也受师道约束: 天子入太庙祭先圣, 则齿尝为师者弗臣, 所以见敬学与尊师也。^[1]任何人, 只要做好学问, 就应该获得相应的尊重: 故子贡问孔子曰: “后世将何以称夫子?” 孔子曰: “吾何足以称哉? 勿已者, 则好学而不厌, 好教而不, 其惟此邪!”^[1]

《尊师》在普遍意义上推广好学要求时, 以孔子作为代表, 是否暗示孔子在敬学尊师的原则中享有独特地位? 在没有足够的证据论证之前, 本文并不进行过度诠释, 但也不否认这个行文安排与后世尊奉孔子为“至圣先师”有太大巧合。

二、汉代诸书对该事例的使用

现存汉代文献中, 最早使用孔子问礼于老子事件的是《韩诗外传》: 哀公问于子夏曰: “必学然后可以安国保民乎?” 子夏曰: “不学而能安国保民者, 未之有也。”哀公曰: “然则五帝有师乎?” 子夏曰: “臣闻黄帝学乎大坟, 颡项学乎禄图, 帝喾学乎赤松子, 尧学乎务成子附, 舜学乎尹寿, 禹学乎西王国, 汤学乎贷乎相, 文王学乎锡畴子斯, 武王学乎太公, 周公学乎虢叔, 仲尼学乎老聃。此十一圣人, 未遭此师, 则功业不能著乎天下, 名号不能传乎后世者也。”诗曰: “不愆不忘, 率由旧章。”^[2]

《韩诗外传》很明显有一个既学且能“安国保民”的帝王序列, 以时间顺序从早到晚依次为黄帝、颡项、帝喾、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 孔子赫然位列其中。与孔子被排除在外的《吕氏春秋·尊师》神农、黄帝、帝颡项、帝喾、帝尧、帝舜、禹、汤、文王、武王、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句践序列对比, 还可以发现: 在《吕氏春秋》中, 周公仅仅是王者师 (“文王、武王师吕望、周公旦”), 在《韩诗外传》里, 周公变成了承接文王、武王的周代第三个圣王。周公和孔子这个“乱入”的变化应和孔子的“升格”一起作为研究以《韩诗外传》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政治观的材料。除周公和孔子外, 《韩诗外传》序列的条件比《吕氏春秋》更加严格, 只有从可考的五帝开始到成书时的圣王可以列在其中。帝王所“学”, 并不再着眼于对帝王个人社会地位、政治权力的影响, 而落脚于对国对民的政治意义。文献对师事的叙述已然转换视角, 为著者的政治主张作张本。但囿于《韩诗外传》的体例, 这一主张隐匿在“不愆不忘, 率由旧章”的释读中。

西汉末年的刘向《新序》中也有与《韩诗外传》近乎相同的段落。只不过微调帝王有师的序列, 换了几位帝王师的姓名: 黄帝学乎大真, 颡项学乎绿图, 帝喾学乎赤松子, 尧学乎尹寿, 舜学乎务成附, 禹学乎西王国, 汤学乎威子伯, 文王学乎铎时子斯, 武王学乎郭叔, 周公学乎太公, 仲尼学乎老聃。^[3]

并加一句评论: “夫不学不明古道, 而能安国者, 未之有也。”强调帝王之“学”对安国保民的积极意义。

《新序》紧接着记录了和《吕氏春秋·尊师》相近的段落, 完整保留了治天下治国的圣人贤者“师”事事迹, 并录《尊师》“善学”要义, 但与《新序》前文一致, 改“师”为“学”, 表露刘向搜集、整理文献的痕迹。收录两则师事材料的《新序·杂事》记载的全是帝王杂事, 刘向将两段与“学”相关的文字改动后编排在一起, 突出帝王之“学”, 具有讽谏帝王善学的政治意味。

东汉《白虎通·辟雍》整合“学”与“师”之间的关系, 完整论述古人求学尊师之道: 故学以治性, 虑以变情。故玉不琢, 不成器: 人不学, 不知道。……是以虽有自然之性, 必立师傅焉。《论语·子罕》曰: “五帝立师, 三王制之。传曰: 黄帝师力牧, 帝颡项师绿图, 帝喾师赤松子, 帝尧师务成子, 帝舜师尹寿, 禹师国

先生，汤师伊尹，文王师吕望，武王师尚父，周公师虢叔，孔子师老聃。”天子太子，诸侯世子，皆就师于外，尊师重先生之道也。^[4]

天子和诸儒对“帝王有师”达成共识，将尊师重道列为天子太子、诸侯世子的基本原则。诸儒的政治主张成为确定的政治实践原则。天子应该有师、天子应该尊师，“师”往往都包括儒者在内，师生关系可以形成儒者与政治最高权力的固定连结，儒者由此获得参与政治的特殊途径，以期实现“君臣关系”不能完全达到的政治愿景。由于“帝王师”的身份必须通过天子来确认，“帝王师”的政治权力必须通过实际官职和与天子的实际政治互动来实现，儒者在政治关系中仍然处于被动地位，往往达不到理想政治效果。

至《白虎通·辟雍》为止，帝王师的论述已经十分成熟。纵观前后汉，生从来都关切政治，汉代经学与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儒生探寻着理论上的入仕途径，也积极在现实中施展政治抱负，“帝王师”是儒生试图与天子达成的和谐关系。以西汉张禹为例，张禹善学《易》与《论语》，“经学精习，有师法”，经人推荐，“试为博士”。为太子讲《论语》时，迁光禄大夫官职。太子即位，即成帝，“以师赐爵关内侯”，张禹获封六百户的爵位，官职也逐步攀升，直至诸吏光禄大夫，“给事中，领尚书事”。在张禹与权臣不合自请辞官时，成帝力劝张禹继续从政，并给予丰厚赏赐和更高的官职爵位。张禹再次请辞成功后，成帝依旧给予他非常高的“如丞相”待遇，加爵，甚至违礼赐张禹帝陵近处的墓地；更重要的是，张禹虽然无官在身，又“特进为天子师”，定义国家大政，成帝每每听从张禹的意见。成帝驾崩，张禹仍事哀帝，获谥“节侯”。张禹非一人独荣，他的儿子、弟子也都成为当时显贵。张禹的个人经历实在是太成功，太接近儒生的理想状态，张禹的学问也因而尊贵，广为流传。《张禹传》中分两方面描述了经学帝师和天子的和谐关系：（1）“朕以幼年执政，万机惧失其中，君以道德为师，故委国政。君何疑而数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朕无闻焉。君其固心致思，总秉诸事，推以孳孳，无违朕意。”天子时刻重视个人道德，寻求明经义、知道德的经师作为帝师，并委以参与国政的权力，给予百分百的信任。帝师也安然地接受政治安排，在其位、谋其政。（2）“性与天道，自子赣之属不得闻，何况浅见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应之，与下同其福喜，此经义意也。新学小生，乱道误人，宜无信用，以经术断之。”^[5]天子通过向帝师学习经术，习得辨别合理经义的能力，并用经义经术处理政事，与臣民同享天下大治的善果。这两方面点明经学思想中天子和帝师、天子与帝师所代表的经义的关系，为天子和儒生提供了一步步“行动指南”。

至此，“师”彻底升华出学术之外的政治含义。东汉末年《潜夫论·赞学》载：天地之所贵者人也，圣人之所尚者义也，德义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学问也。虽有至圣，不生而智；虽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黄帝师风后，颛顼师老彭，帝善师祝融，尧师务成，舜师纪后，禹师墨如，汤师伊尹，文、武师姜尚，周公师庶秀，孔子师老聃。若此言之而信，则人不可以不就师矣。”夫此十一君者，皆上圣也，犹待学问，其智乃博，其德乃硕，而况于凡人乎？^[7]

周公和孔子的地位等同于历史上的圣君，这就造成理论与史实的矛盾。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周公的圣君地位可以通过考证周公是否称王得以化解，孔子的圣君地位却完全无法从历史角度自圆其说。而从思想的角度，孔子可以成为“素王”，成为五德终始说的一环，可以为孔子订做一套适用的解释框架使孔子的地位、经学的地位确定下来。正是今文经学完成了这一解释任务。

即便如此，在这个帝王师序列中，仍旧存在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子师老聃”。老子和孔子究竟是怎样的关系？从皇帝到周公，都能够选择一位贤臣作为老师，但孔子如何选择、怎样选择才能符合孔子的身份？作为素王的孔子没有贤臣，作为学者的孔子真有自己的老师。经学家于是沿用“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故事和用例，升华为“孔子师老聃”，没有再做进一步解释。当孔子和老子的地位发生变化，儒道关系逐渐紧张，“孔子师老聃”这个搁浅的理论问题就会成为进一步深化儒家学说的障碍。唐代韩愈一面在文论策论《师说》《进士策问十三首》中称引“孔子师老聃”“孔子问礼于老聃”，一面在研究著作《原道》中质疑孔子师老子的荒诞离奇，他为儒生也为自己作解——“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8]后世学者，主要是儒家学者对待“孔子问礼于老子”是否存在相应史实的争论也面临韩愈式的困境，是否承认存在孔老师生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竟然成为学者表明儒道立场、发展学术理念的阵地。

三、选择“孔子师老子”的原因分析

在战国文献中，孔子好学，所师甚众，“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9]而至汉代文献，被称为“孔子师”的只有老子和项橐。在上文的师事序列中，仅列孔子师老子。为何文献中会有这样的取舍？本文尝试逐步做出分析。

1. 孔子师项橐

孔子如何师项橐，在早期文献中没有详细记录。项的资料最早见于《战国策·秦策》^[10]、《史记·樗里子

甘茂列传》中甘罗引“大项橐生七岁为孔子师”为例请求年少为政。^[9]《新序·杂事五》闾丘邛引“昔有颛顼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项橐七岁为圣人师”^[3]，同为请求年少为政，但刘向刻意将闾丘邛之事编排于此，有劝学意味。《淮南子·说林训》“吕望使老者奋，项託使婴儿矜，以类相慕”将吕望、项橐一老一少并举，营造民间积极向学的氛围。高诱注云“项橐年七岁，穷难孔子而为之作师”，^[11]补充了项橐为孔子师的情节。王充《论衡》“项托七岁，其三四岁时，而受纳人言矣”，^[12]增加了项橐的神童色彩。

项橐的事迹难考，仅有“为孔子师”一事，在汉代已引起辩论。《淮南子·修务训》载：“项橐七岁为孔子师，孔子有以听其言也。以年之少，为闾丈人说，救敲不给，何道之能明也？”^[11]否认孔子能从项橐之言中学到“道”。王充《论衡》“云项托七岁，是必十岁，云教孔子，是必孔子问之。”彻底否认了孔子师项橐的真实性。^[12]但从《论衡》中王充与人的论辩可以看出项橐的事迹是时人信手拈来的常识。

文献中的项橐，几乎没有单独出现，总是代表着“以类相慕”的“类”运用在举例说明中，与项橐共同称引的神童有尹方、甘罗、颛顼等。项的事迹主要发挥“以类相慕”的作用，鼓舞同龄“婴儿”，为同样有抱负的少年神童所用，争取政治机会。汉代有很多见于史书的真实神童故事，如扬雄、郑玄、孔融等，其中齐鲁地区的神童最多。项橐作为齐鲁地区较早历史时期的神童，其事迹广泛流传，对当地的文化发展和童蒙教育应产生过积极影响。《隶释》卷一〇《童子逢盛碑》用“才亚后橐，当为师楷”赞扬年十二而天的逢盛，项橐成为同龄人的楷模，不仅反映出当时当地浓重的文化风气，也肯定了项事迹的文化意义。

除了以上材料外，孔子师项橐在经学文献中似有记载。董仲舒《举贤良对策》， “臣闻良玉不琢，资质润美，不待刻琢，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也。”颜师古《注》引孟康曰：“人，项橐也。”^[13]钱穆考证“汉儒相传，殆均以达巷党人即项橐也。”项橐被赋予不学而自知的特性。王充《论衡·实知》涉及项橐时正在与人争辩圣人是否不学自知、不问自晓。王充反对讖纬将圣人神化，认为学问定有来源，而这一神化过程可以追溯到董仲舒。项橐在这仅有的经学记载中也仍然只带有为学的意义，并没有前文“帝王师”的涵义，但开始带有神话色彩。这一性质决定了项橐不可能出现在帝王师序列中。

2. 孔子师老子

从可考的汤、文、武、周公师事故事，可以尝试分析为何只有孔子师老子被列入帝王师序列中。

汤以上各帝王之师难考，带有一定的神仙色彩。赤松子被列入《列仙传》；尹寿在道教著作《老子道德经序诀·太极隐诀》中被尊为“尹先生”；《汉书·艺文志》房中家著录《务成子阴道》三六卷，小说家著录《务成子》十一篇。文献中能考其事迹者除老子外，只有伊尹、太公望、虢叔三人。

汤和文王之师最初也不可考，后改师为伊尹、姜尚，带有明显的整编痕迹。《孟子》明确记载汤学于伊尹：“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13]《史记》、《左传》的虢叔仅在政治事件中有所行动，并没有师事记载。根据蔡邕《郭有道林宗碑》以“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实有懿德，文王咨焉”，《论语·微》、《白虎通》可能也是以虢叔懿德堪为王师。虢叔从“文王咨焉”至武王、周公时期，年岁已长，更宜为王师。《史记·齐太公世家》载文王招吕尚，又以之为谋士、军师，参与多次军事决策和行动。^[9]《荀子·臣道》以殷之伊尹，周之太公为“圣臣”。^[14]至刘向《说苑》在《君道》、《贵德》、《政理》、《指武》篇记录七次武王问太公，《佚文》又记武王问“贫富岂有命”，展现武王时常咨询太公的场景。文王、武王、周公三人承继，可能有共同的老师，因而将姜尚从武王、周公时期的老师提前至文王、武王时期，有一定合理性。而由汤“学于待子相”改为“师伊尹”，表现出文献整理者重新考量了“为师”的条件，将可考的文化传统中的从道者列入帝王师中，儒家的政治观成为整编帝王师序列的关键因素。

帝王之师序列中年代最晚的“孔子师老子”，是诸书中唯一相同的师事举例。相较于孔子所严事的其他人，孔子师老子影响最深远。孔子曾向子产、晏子、孟公绰、蘧伯玉学习政治思想和德行，向苌弘、师旷学乐，所学甚广。而孔子在向老子求学时，集中于问礼，探讨过求道，所学内容更深入，接近孔子思想的核心。且老子在先秦和汉代的学术地位远高于孔子师事的其他人，黄老思想一度被汉代统治者尊崇，将老子作为孔子师的代表完全可行。

除政治因素外，老子长寿，生平难考，以隐为务，与伊尹、太公望、叔之外的其他帝王师也有诸多相似特点。老子学说强调无名，无为而无不为，不会执着于“孔子师”的名分。种种因素促成汉代文献不约而同地将“孔子师老子”作为纳入帝王师序列的最佳选项。

参考文献：

[1]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3]赵仲邑.新序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7.
[4]吴则虞.白虎通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4.
[5]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6]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7]汪继培.潜夫论笺[M].北京:中华书局,1979.
[8]韩愈.韩愈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9]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4.
[10]范祥雍.战国策笺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11]何宁.淮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
[12]黄晖,刘盼遂.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22.
[13]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14] 沈啸寰,王星贤.荀子集解 [M].北京:中华书局,2022.

Case Study of the Literature "Confucius Asking about Rites and Laozi" in the Pre Qin and Han Dynasties

Shi Shang¹

¹ *Department of History,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Abstract: When Confucius' inquiry into etiquette was used as common knowledge and allusions in Laozi's literature, this event was endowed with more significance beyond learning and inquiring about etiquette. One of the application methods worth exploring is that Confucius asked Laozi for etiquette, which has been condensed into Confucius' "teaching" Laozi and included in the selected "teaching" sequence, emphasizing the meaning of "teacher". Starting from the sequence of "teacher affairs", we can analyze the changes in Confucius' statu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ucius and the elderly, and point out the political ideals contained in the concept of imperial teache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nfucian classics.

Keywords: Confucius asks about etiquette, teacher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ucius and elders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3.765

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的实践模式与理论阐释 ——以重庆市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探索为例

王思源¹

(¹ 南开大学, 天津 津南 300350)

摘要: 基层协商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实践样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制度载体保障基层协商民主实现。但由于街道一级缺乏同级人大制度安排, 街道群众参与制度断层、民主表达不畅、街道监督缺位等问题长期存在。在政治势能下沉和基层行动响应的共同推动下, 重庆市自2019年开始探索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本文从重庆市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的实践模式出发, 从党建多维整合、多方共同在场、治理网络嵌入、代表赋权增能四个维度考察制度运行机制, 进而回应此制度优势何以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重庆市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是推进协商式参与制度化、创新基层人大会议制度的有益实践, 有助于建构完整制度链条的全覆盖民主, 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键词: 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 全过程人民民主; 基层协商民主; 基层人大会议制度创新

一、问题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基层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1]。基层协商民主作为基层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 构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样态之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制度载体保障基层协商民主实现。完善基层人大会议制度体系和实践形式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贯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逻辑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基层治理日趋复杂化, “撤镇改街”进一步叠加了街道治理压力。而由于缺少同级人大会议制度安排, 街道层面参与制度断层、民主表达不畅、监督缺位等问题突出, 难以有效回应公众参与日益增长的参与街道公共事务的需求和意愿。当前, 许多地方人大聚焦基层“上面千条线, 下面一根针”的治理难题, 加快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单元, 形成了诸多创新性实践经验。2023年,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下发《关于探索推行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的指导意见》^[2], 提出在街道推行议事代表会议制度, 是推进协商式参与制度化、创新基层人大会议制度、建构完整制度链条的全覆盖民主的有益探索。基于此, 本文从重庆市的个案出发, 考察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的实践模式、理论逻辑和治理效能, 进而回应如何进一步将此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二、文献述评

党的十八大以来, 基层协商民主逐渐成为发展基层民主、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标志^[3]。如何在超大规模的现代国家中构建起上下左右贯通的意见沟通机制^[4]是关系民主实践体系建设的重要议题。在此背景下, 2022年6月浙江省委首先提出“打造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单元”的构想, 各地也逐步展开民主基层单元建设, 致力于激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神经末梢”。从定义来看, 基层单元可理解为是各级人大在乡镇街道和城乡社区具体实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载体^[5]。但由于基层单元建设是一项探索中的创制性工作, 对其具体做法的界定并不明确, 为各地人大的探索提供了空间^[6]。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实践有: 浙江省的人大代表联络站、上海市的基层立法联系点、重庆市的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等, 各地以其不懈探索绘制出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的生动画卷。

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是指在街道党的工作委员会领导下, 由人大街道工作委员会具体负责, 围绕街道民生事项和其他经济社会发展事项组织开展民主协商的议事制度。作为人大制度的基层创新实践, 街道

作者简介: 王思源(2004—), 女, 陕西汉中,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2022级本科生。

议事代表会议制度的运作机制、效能及存在困境等内容为政府与学界共同关注,相关研究主要从制度设计、制度主体、制度运作三个维度展开。就制度设计而言,宏观层面上学者指出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基层的拓展和延伸^[7],需实现与人大制度的有机衔接,强化其权威属性;微观层面上,有学者从代表制度、工作制度、职能规定^[8]方面对该制度的具体完善进行思考,同时也强调制度应随实践不断调整。就制度主体而言,一方面,议事代表是街道议事代表会议的主体,如何确定和产生议事代表是把“群众所盼”转化为“履职所能”的关键;另一方面,要促进街道居民积极参与议事协商和民主监督,在人大制度框架内考量如何嵌入协商民主机制^[8]。就制度运行而言,有学者从试点实践出发总结其良好运作的经验^[9],提出坚持党建引领、选好议事代表、发挥众议效能等做法;有学者阐释该制度的作用效能^[10],即通过建立起民主协商和多元参与机制,畅通了党委政府联系服务基层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抓手;有学者关注到该制度当前实践中存在的困境^[11],诸如试点各地思想不统一、法律制度有待完善、推进力度有待加强、民主实践融合度低等问题。

综上,学界对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探索,丰富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治理实践体系,但仍存在一定的拓展空间。研究内容上,现有文献主要是基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展开的规范性研究或是针对某地试点实践进行的经验总结,缺乏理论与实证的结合分析。研究对象上,学者多选取浙江省的成功案例进行分析,忽视了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等客观因素对民主建设程度的影响,研究成果的推广性较低;本研究选取位于我国西南地区的重庆市,弥补了在西部地区开展基层民主建设的空缺。研究视角上,当前关于基层民主单元建设的研究缺乏成熟的理论分析框架,而政治学领域的理论大多源自西方,因此需基于中国特殊国情和基层治理实践进行更为系统的探索,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充分的实践论据。

三、案例引入

重庆市属我国直辖市之一,集城市、农村、山区、库区于一体,治理环境复杂。全辖 38 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1022 个乡级行政区划单位。受行政规划调整影响,许多乡镇“撤镇设街”,目前街道 245 个,占比已近乡级行政区划单位四分之一。作为最贴近社会的政府机构代表,街道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基础性纽带,也是市域治理的基本单元,离不开群众的参与和监督。2019 年,重庆市部分区县开始探索试行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截至 2023 年底,全市 34 个区县的 171 个街道实施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明确将街道议事代表会议作为街道开展议事协商的民主参与平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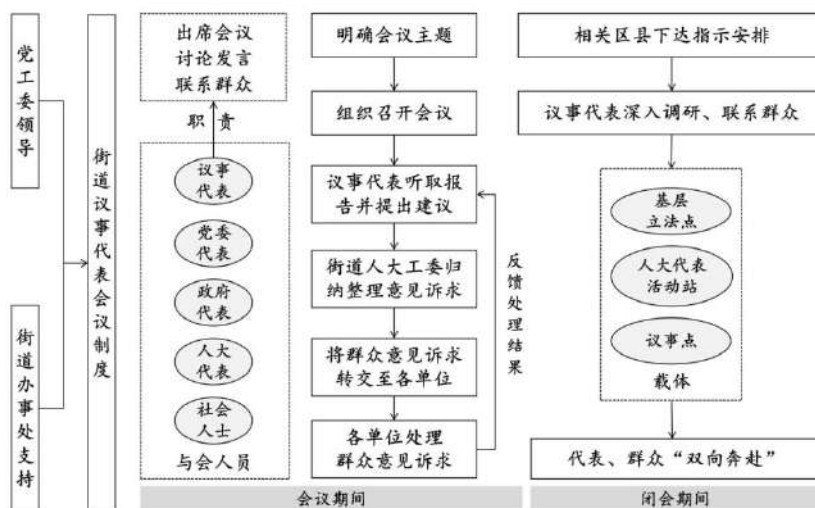


图1 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流程图

针对群众参与街道事务的制度断层问题,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在基层人大议事和社区居民议事间建立制度衔接,明确街道层面协商议事“谁来议、议何事、如何议”的问题,推动协商式参与制度化。针对群众对街道治理的监督缺位问题,重庆市赋予街道议事代表会议一定的监督功能,以提供一个正式的民主监督平台,促进参与式监督常态化。具体而言,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可以听取讨论街道辖区内经济社会发展、民生建设等方面的专项工作报告,票选街道民生实事项目,收集反映群众对街道工作的意见建议^[12]。

在议事主体上,街道议事代表是参与议事的核心主体,代表街道群众的共同利益。重庆市各区街道议事代表选举都基本遵循“推荐—协商—提名—审查—决定”的民主程序。人员组成来自于居民代表和社会各界

人士，辖区内各级人大代表也受邀参会，发挥其密切联系群众的作用。人选遵循混合式代表机制，综合考虑比例、结构和代表人基本条件，力求具有普遍代表性。部分区县街道还根据当地情况细化要求，如綦江区明确规定了妇女代表和专职干部所占比例，涪陵区将议事代表编入辖区内人大代表活动站和民情联络点。

表1 重庆市部分街道试点实践

地点	具体实践模式
鱼洞街道	“三个三”工作机制 严把“选、提、审”三道关卡 规范“前、中、后”三项流程 搭建“知、研、商”三个平台
鼎山街道	“邻里议事亭” 议事代表通过“邻里议事亭”走出去 群众通过“街道居民议事厅”走进来
七星岗街道	“小院议事厅” 人大代表、议事代表与群众面对面商议“关键小事”

在议事制度上，街道议事代表会议一般在年初和年中各召开一次，遵循“议近、议实、议小”原则，将协商议事重点放在街道群众“急难愁盼”的民生问题上，如老旧小区改造、道路建设、停车问题等，从而精准对接群众公共服务需求。此外，制度包含会前、会中、会后各个阶段的规范化制度流程，践行了“全过程”理念，真正让议事高效务实、民主“落地生根”。会前，议事代表以走访选民、举办座谈等形式倾听百姓声音，汇集民生问题；会中，代表们畅议街道事，票选重点民生项目；会后，发挥跟踪、反馈和评估机制作用，有力执行议事结果，形成公共事务办理的闭环机制，确保民生难题的最终解决。

四、理论阐释：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的生成、运转与效能

（一）制度生成的双向路径

1. 政治势能下沉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最大优势，也是政治势能的核心要素^[12]。党的二十大以来，习总书记多次强调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并进一步以党政联合发文的形式将该政府“行政任务”上升为党的“政治议题”^[13]，为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建设赋予党中央的“政治势能”和地方政府的“执行动量”，宏观上为街道民主政治建设营造了良好氛围。然而，顶层设计往往注重宏观规划而缺乏对制度具体如何执行的局部性、操作性说明，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的施行终究欠缺上位法的明文规定。进而，高政治势能如何下沉到基层并进行因地制宜的转化，发挥地方主动性是关键。

在链接国家和基层社会的过程中，基层党组织扮演着政治中心的角色，能促进利益、理念、资源的必要整合^[14]。在响应和贯彻上级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部署之下，相关县级党委带领县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到已开展街道议事工作的先进地区进行学习和调研，逐步钻研符合本地发展实际的街道议事代表会议模式；在县和街道人大达成共识后将此方案向上传达，得到县委领导肯定后，人大常委会召开会议对推进街道议事工作进行重点部署，进一步向下传导政治势能，帮助各个街道根据自身情况、特点自主开展组织，以实现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的全县覆盖。

2. 基层行动响应

全过程人民民主依赖于各层级主体的积极互动与广泛参与，需要人民与基层党组织运用理性对话与共识构建来实现双方的深度互动^[15]。而在街道党工委的领导下，如何充分调动群众积极参与议事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治理中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关键要素^[12]。

首先，街道议事以民生需求为驱动。街道是市域治理的基本单元，普遍面临常住人口规模较大、人员结构复杂、社会矛盾多元易发等治理难题；同时，街道也是一个行使实际公共权力的经济实体，但由于街道组织架构上权力机关的缺位，导致其运转缺乏有效监督。因此，群众内在拥有着对自下而上表达诉求的制度化渠道的愿望。其次，街道议事以基层组织动员为助推。地方党委和政府处于基层一线，以其统合性行动安排回应高位制度设计的推动，切实发挥其基层领导作用，在议事机构建立、议事代表确定、职责履行等环节都进行指导把关；同时，按照要求积极联系、走访辖区群众，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并及时反馈，实现干群“双向奔赴”，确保制度探索工作有序推进。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的产生既得益于自上而下的政治安排高位推动，也源于自下而上的民主诉求基层响应，两者共同形成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动力源泉^[16]。

（二）制度运转的四重维度

习近平指出,“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要强化制度执行力,加强制度执行的监督,切实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17]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依托党建引领,形成了多主体共同在场的参与平台,深度嵌入街道治理网络之中,并以赋权增能的方式保障与推动代表参与,提升了制度执行力和实际治理效能。

1. 领导维度:党建多维整合

民主运行有赖于协调整合多元主体的运行机制,而机制有效运行则离不开强有力政治权威的领导。^[18]协商民主涉及多元主体的利益协调和行为合作,因此更需要有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力量。在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运作中,街道党工委作为基层党组织的组织优势和政治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为制度运作提供根本保证。首先,街道党工委落实宣传党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的工作,强化思想领导。其次,依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创新基层人大制度”破题,整合可能的治理资源,发挥党组织的引领带动作用,领导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召开。同时,党承担“元治理”的任务,通过设定远景规划、营造良好协商氛围、强调协商精神,完成价值整合,从而增强协商团体的凝聚力。最后,参与会议制度规范确立过程,积极协调各方利益、及时进行补位,促进利益整合,确保协商活动规范开展。

2. 场域维度:多方共同在场

现代政治是场域政治,场域政治的核心是对话^[19]。街道是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协商的重要场域,在此场域内各主体展开对话离不开交流平台的搭建。街道代表议事会议制度为街道一级多元主体交流平台的构建创设了制度化空间。街道党工委、基层人大和议事代表等主体通过制度规范以参与议事协商的方式相连,通过理性对话构建行动共识。“共同在场”使得议事代表在信任合作为基础的场域内,通过正式渠道直接与事务执行负责人展开面对面对话,有利于明晰主体责任,增进主体的有效配合。此外,将民主化引入协商和决策过程,主体利益得以充分表达,增强了协商民主性、科学性,提升了民生实事落地效率。党建引领为核心、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协商格局由此形成。

3. 治理维度:嵌入基层网络

街道作为独立治理单元,日常需面对多样政策任务和复杂治理问题,面临较大治理压力。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以“议事协商”为核心,形成闭环工作机制,深度嵌入到街道治理网络之中,衔接了居民自治和社会治理的双重需求,有利于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具体而言,会议期间,协商会议从街道治理问题切入,关注与街道群众息息相关的民生议题,票选重要民生项目并协商项目方案;闭会期间,按照条块结合逻辑,议事代表被分别编入代表工作站和专业小组,依托人大联络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等载体深入到街道群众之中,展开常态化活动。会前,议事代表通过入户走访、座谈会等途径积极联系群众展开调研,充分汇集民众意见作为会议协商依据,也有助于精准对接公众公共服务需求,分担街道工作压力,提升治理公共性。会后,议事代表积极跟进办理过程,将结果成效、人民满意度作为协商成果转化的度量依据,并纳入街道综合考核之中,同时允许代表问责,形成对街道治理工作的有力监督。

4. 主体维度:代表赋权增能

议事代表是街道议事代表会议的核心主体,其参与意愿和履职能力是决定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能否成功运转的关键因素。无权事实和无权感的交互作用会削弱治理参与意愿^[20]。在弱权状态导致的低参与意愿前提下,议事代表难以真正发挥代表民众意见、参与街道治理的作用。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赋予了议事代表参与街道公共事务更充足的权利、机会和资源,使其得以切身感受到自己通过行使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对某些街道公共事务的影响,增强其责任感和使命感。议事代表的主体性得以彰显,自我效能感提升,参与协商的积极性被进一步调动。另一方面,街道开展多样化的街道议事代表培训,针对议事代表履职中的疑难问题组织专项学习,并鼓励代表“学以致用”,增强其履职自信心和行动力。由此,履职能力与履职意愿双双提升、相互促进,推动了街道议事代表的有效协商参与和制度的良性运转。

(三) 制度落地的三个实效

1. 衔接制度断层,完善人大架构

在乡镇改街道的历史背景下,基层人大出现了“断层”——乡镇人大消失而街道人大“缺位”、职能弱化。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的建立弥补了街道人大组织架构上的空白,也让街道人大作用的发挥有了队伍及制度的保障。街道人大工委通过议事代表会商议民生实事、督办意见建议、助力重大项目建设、开展工作评议等,推动街办事处和部门站所落实工作、解决问题,充分发挥人大代表联系服务群众的作用,真正实现了人大工作在街道的拓展和延伸。

2. 搭建议政平台,扩大政治参与

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是基层民主单元建设的实践载体,以“代表会议”的形式为居民议政搭建平台。在街道党工委领导的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下,一方面吸纳群众积极参选议事代表和参与议事活动,拓宽民

主参与渠道；另一方面，议事代表参与会议、听取街道重大民生项目的工作报道，进行观察、讨论和评议，发挥着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畅通“上情下达”和“下情上传”的渠道，填补了街道层面人民当家作主机制的内在缺失。

3. 推进民主议政，优化决策水平

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以议事协商为核心建立起民主议政和多元参与机制，通过代表会议汇集并回应民意。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事项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征求群众的意见建议，为街道科学民主决策提供有益参考。同时，建立完善议事成果的闭环落实机制，切实保障议事成果的有效评估与转化，完善决策从制定到落实的全流程管理，以民主决策程序的完善释放国家治理的实际效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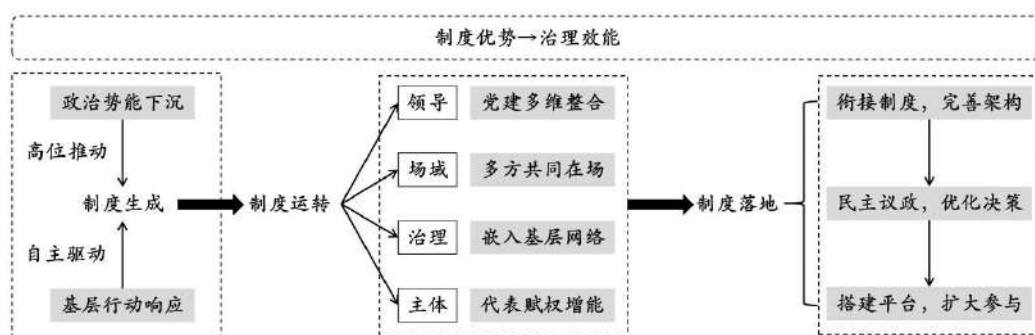


图2 分析框架图

五、结语

本文聚焦于重庆市推行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的试点实践，依循“条件——过程——结果”分析范式，将个案分析与理论阐释相结合，考察其制度如何在全过程人民民主顶层理念指导下逐步形成、正式运转到发挥成效的全流程，呈现了该过程中基层党、政府、群众等多元主体如何基于议事会开展民主协商活动，进而揭示其制度实践的底层逻辑，最大化链接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具体而言，本文从重庆市的复杂基层治理环境、历史行政规划不健全等现实困境出发，肯定当地推行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的必要性、明确其实践典型性。进一步，基于案例实践考察上升到理论阐释，以政治势能下沉和基层行动响应的双向路径构建该制度生成的条件维度分析；以党建多维整合、主体共同在场、治理网络嵌入、代表赋权增能构建该制度运转的过程机制分析；最后，从议政平台搭建、议政过程优化、制度架构完善进行结果维度分析，总结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对基层民主协商效能提升的作用。

综上，本文关注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单元建设实践载体之一的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对该制度的发展背景、生成路径、运作机制、作用效果进行实证与理论相结合的分析。基层民主始终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基石^[21]，当前学界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单元建设的研究方兴未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过程中如何更好的发展基层民主、夯实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础、进一步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值得未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探讨与研究。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重庆人大.市人大常委会印发四个指导意见[EB/OL].
https://www.cqrd.gov.cn/site/article/1211435383839543296/web/content_1211435383839543296.html, 2023-09-07.
- [3]任中平.全过程人民民主视角下基层民主与基层治理的发展走向[J].理论与改革,2022,(02):1-15+147.
- [4]汪仲启.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基层社会治理重构——以上海虹桥街道为对象[J].社会政策研究,2021,(04):107-123.
- [5]温州人大.深化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单元建设的调研与思考[EB/OL].
http://www.wzrd.gov.cn/art/2023/12/7/art_1382234_58921332.html#:~:text=%E6%B7%B1%E5%8C%96%E4%B%A%BA%E5%A4%A7%E8%B7%B5%E8%A1%8C,2023-12-07.
- [6]陈波.数智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单元建设的思考[J].人大研究,2022,(12):42-47.
- [7]李小健,陈敏.“议”出群众幸福感——九龙坡区人大常委会积极探索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J].中国人大,2023,(22):50.
- [8]本刊记者,余逊达.探索完善街道居民议事制度[J].浙江人大,2019,(05):22-24.
- [9]李书林,孙志国,董梦超.街道议事会:诠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实践[J].人大建设,2023,(01):24-25.

- [10]王傲,赵雨平,王杰.票选项目“由民作主”项目成效“大众点评”——合江县人大常委会探索实行街道居民议事会制度侧记[J].民主法制建设,2024,(04):48-49.
- [11]唐毓首,韦少雄.农村基层协商民主中村级议事协商的逻辑、困境与出路——基于主体、制度、程序三维视角的思考[J].理论导刊,2023,(04):49-54.
- [12]贺东航,孔繁斌.重大公共政策“政治势能”优劣利弊分析——兼论“政治势能”研究的拓展[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0,9(04):52-59.
- [13]陈晓运,刘循跃.依势而为:政治势能何以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以 R 村由“后进村”向“示范村”蝶变为例[J].岭南学刊,2024,(04):41-57.
- [14]徐丙祥.新时代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思考[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8,(04):25-32.
- [15]安德鲁·埃德加·哈贝马斯:关键概念[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22.
- [16]温顺生,兰成东.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发挥效能的运行机制与内在逻辑——基于广西村级议事协商试点村的扎根分析[J].长白学刊,2024,(05):10-21.
- [17]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继续沿着党和人民开辟的正确道路前进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J].旗帜,2019,(10):5-6.
- [18]徐楷森.中国共产党领导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逻辑[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6(01):35-44.
- [19]陈鼎.人民政协参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的运行逻辑与优化路径——以温岭市“民生议事堂”2.0 版协商平台为例[J].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01):155-164.
- [20]谭祖雪,张江龙.赋权与增能:推进城市社区参与的重要路径——以成都市社区建设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35(06):57-61.
- [21]陈绪新,孙丹薇.从善政走向善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伦理觉解[J].河南社会科学,2024,32(10):25-34.

Operational Framework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s of the Subdistrict Deliberative Council System: Evidence from Chongqing's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Neighborhood Governance

Siyuan Wang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Abstract: Grassroots deliberative democracy constitutes a vital operational modality of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While the People's Congress system serves as the institutional vehicle ensuring the institutional realization of grassroots deliberative democracy, the absence of corresponding People's Congress structures at the subdistrict level has perpetuated institutional gaps in citizen participation, impeded democratic articulation, and insufficient oversight mechanisms in urban grassroots governance. Driven by the dual dynamics of political momentum diffusion and grassroots implementation dynamics, Chongqing Municipality has been pioneering the Subdistrict Deliberative Council System since 2019. Through empirical analysis of Chongqing's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his study deciphers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s through four analytical dimensions: (a) multi-dimensional Party-building integration, (b) co-presence of pluralistic stakeholders, (c) embedded governance network architecture, and (d) representative empowerment dynamics. The findings elucidate how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transform into governance efficacy, demonstrating that this institutional design advances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consultative participation and innovates grassroots People's Congress operational protocols. As a replicable model, it contributes to constructing a comprehensive democratic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while propell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Keywords: Subdistrict Deliberative Council System,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Grassroots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Grassroots People's Congress Operations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3.797

“数据”到“画布”：人工智能何以推动乡村艺术再生与文化遗产

徐 鹏¹

(¹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上海 201209)

摘要：文章主要探讨人工智能（AI）在乡村艺术再生与文化遗产中的应用，重点聚焦于文化符号挖掘与重构、多元场景创设及协同演进机制等关键环节。研究首先从乡村艺术再生的概念与价值切入，阐释其与乡村文化传承之间的互动关系。接着分析乡村文化符号的定义与类型，剖析 AI 技术在文化符号挖掘的应用方式。在此基础上，探讨 AI 在乡村公共艺术、手工艺复兴与艺术教育等多元场景中的创新实践，进而提出 AI 驱动的乡村艺术与文化系统协同演进机制，以期为乡村文化遗产活化利用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关键词：AI 驱动；乡村艺术再生；乡村文化传承

乡村文化是乡村社会系统的重要构成，承载着历史记忆、文化认同与社区凝聚力。然而，现代化进程加速、乡村社会结构嬗变与城镇化外溢效应，使得乡村文化生态面临价值退化、文化符号衰微与艺术系统创新滞后等多重挑战。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加强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

人工智能（AI）作为文化治理与文化生产的新兴技术工具，凭借在图像识别、内容生成与效率优化等方面的能力，在非遗保护、文化创意设计与公共艺术等领域显现极大潜力^[1]。但现有关于 AI 介入乡村文化的研究较为碎片、单一，不足以阐明数字时代 AI 技术与乡村文化振兴的作用机制。基于此，研究将首先厘清不同概念间内涵与关系，其次探究 AI 技术在文化符号建构、多元场景创新中的应用与路径，最后提出 AI 驱动下乡村艺术与文化系统的协同演进机制，以期为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提供理论参考，为 AI 技术在乡村文化振兴中深度实践提供指引。

一、乡村艺术再生与文化遗产的内涵

1.1 乡村艺术再生的内涵

乡村艺术再生是一个涵盖文化、社会与经济多维度的综合过程，其核心在于通过艺术手段激活乡村内生文化力量，重构乡村文化生态，实现社会结构与经济模式的深度转型。与单一的艺术更新不同，乡村艺术再生不仅关注艺术形式的创新，还涉及乡村文化身份的重塑与文化基因的激活，其本质在于以艺术为媒介，唤醒乡村历史文化的潜能，推动乡村社会、经济与文化的系统性融合^[2]。

在文化层面，乡村艺术再生强调对传统文化元素的再发掘与当代表达，促进文化生态的重构与活化。通过艺术实践与创新，激活乡村特有的文化资源，实现文化认同的重建与价值升华。在经济层面，乡村艺术再生通过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推动乡村经济模式向“文化+”的复合型路径转型，摆脱单一产业依赖，增强乡村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社会层面，乡村艺术再生有助于提升乡村社区的凝聚力与文化归属感。借助艺术介入，激励村民参与乡村文化建设与治理，唤醒对本土文化的认同与自豪，促进社会资本的积累与社区活力的重塑。由此可见，乡村艺术再生是乡村振兴进程中的关键一环，其价值不仅在于艺术形式的复兴，更在于乡村文化系统的全面激活与重塑。

1.2 文化传承在乡村艺术再生中的角色

作为乡村文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传承不仅承载着历史记忆与价值认同，更为艺术再生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与灵感源泉。乡村艺术再生依赖于文化传承所保留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符号与历史叙事，这些元素为艺术再生提供了根基与生命力。文化传承通过保存和活化乡村的传统技艺、节庆习俗与民间故事等文化符号，形成“传承—创新”的动力机制，使乡村艺术在现代社会中能够持续焕发新的艺术表达与文

基金项目：数智赋能上海城市更新中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机制研究；2024 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编号(2024ECK009)

作者简介：徐鹏（1991-），男，博士，上海第二工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乡村环境设计

价值。同时，文化传承也是激发乡村社区凝聚力与文化自信的重要纽带。通过艺术再生过程中对本土文化符号的重组与再诠释，文化传承得以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促进乡村社区居民对乡土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进而推动乡村社会的和谐与持续发展。因此，文化传承既是乡村艺术再生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艺术创新与社会价值提升的内在驱动力，为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文化活力激发与艺术生态建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3 乡村艺术再生与文化传承的相互关系

乡村艺术再生与文化传承之间构成相辅相成、互为支撑的辩证关系。乡村艺术再生以文化传承为基础，通过对传统文化符号的激活与再创，推动乡村文化资源在当代语境中的转化与升华。而文化传承则为艺术再生注入历史深度与文化厚度，避免艺术再生产生“文化空心化”的风险。乡村艺术再生依托文化传承，能够打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隔阂，在继承乡村历史记忆与民俗传统的基础上，通过艺术创新实现乡村文化的活态再生。在此过程中，艺术再生通过现代艺术手法对传统文化元素进行重组与演绎，为乡村文化注入新的视觉语言与审美表达，提升乡村文化的传播力与影响力。

反之，文化传承也依赖于艺术再生的现代性激活。乡村艺术再生不仅为文化传承提供新的传播载体和表达方式，还能激发社区居民对传统文化的关注与参与，强化文化认同与乡土归属感。二者关系的核心在于传承与创新的动态平衡。缺乏文化传承，艺术再生将失去历史根基与文化内涵；缺乏艺术再生的创新介入，文化传承将停留在单一的保存与复述，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通过乡村艺术再生与文化传承的协同互动，乡村文化系统得以实现“文化积淀—艺术转化—价值提升”的良性循环，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

二、AI 驱动的乡村文化符号系统重塑

2.1 乡村文化符号的界定与类型

乡村文化符号作为乡村文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承载历史记忆、传递文化认同和维系社会秩序的功能。一般而言，乡村文化符号可划分为物质性与非物质性两类。物质性符号主要包括具有实体形态的文化要素，如建筑风格、民俗工艺、服饰图案及乡土器物，通常通过空间形态与视觉符号承载乡村的历史积淀与地域特征。非物质性符号则涉及无形的文化元素，包括节庆仪式、民俗信仰、方言俚语、民间传说等，其通过口耳相传、仪式实践等方式被延续，反映乡村社会的价值观与文化认同。二者相互交织，构成乡村文化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乡村艺术再生与文化传承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基础。

2.2 AI 赋能的文化符号数字化与创意转化

AI 技术在乡村文化符号的挖掘、重构与创新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显著提升了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处理能力与再生潜力。首先，在文化符号挖掘阶段，AI 依托图像识别、深度学习与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手段，能够系统性地采集并分类乡村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符号^[3]。在物质文化层面，AI 通过对乡村建筑、手工艺品、服饰图案等的图像识别与特征提取，实现文化元素的自动化标注与分类，构建可视化的符号数据库，支撑乡村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归档与管理。在非物质文化方向，AI 借助自然语言处理与语义分析技术，深入挖掘方言俚语、民间传说、节庆习俗等无形文化资源，并将其转化为结构化、知识化的语义网络，实现文化信息的系统化整理。其次，AI 技术还具备跨模态数据融合能力，能够整合乡村的图像、文本与音频等多类型数据，识别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符号间的潜在关联，为后续的文化设计与创新奠定基础。在符号重构与创新方面，AI 通过生成式对抗网络（GAN）、风格迁移等算法，基于已挖掘的文化符号数据，自动生成融合乡村传统元素与现代设计风格的新型视觉图案，广泛应用于乡村公共艺术、手工艺品与数字文创产品设计中，提升乡村文化产品的视觉表现力与文化识别度^[4]。同时，AI 还能够通过知识图谱与语义推理机制，深度解析传统文化符号背后的历史意涵与情感内核，推动符号的内涵重构与文化价值升华。借助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等技术，拓展文化符号的传播媒介与表现形式，将传统文化符号转化为沉浸式、交互式的艺术体验，丰富乡村文化的数字传播渠道与创新表达方式。

三、基于 AI 赋能的乡村艺术多元场景应用

3.1 AI 赋能乡村公共艺术

AI 技术为乡村公共艺术设计提供数据驱动的创作路径，在乡村空间文化营造中发挥积极作用。首先，AI 依托大数据分析模式识别技术，能够系统化整合乡村的地域文化资源、自然景观特征与居民行为偏好，辅助设计团队准确识别乡村空间中的文化符号与审美需求^[5]。这一过程不仅优化了公共艺术作品与乡土文化的关联性，也提升了作品与空间环境的适配度与文化表达的针对性。其次，AI 在空间设计层面，通过智能建模与可视化仿真系统，支持公共艺术与乡村空间的协调性设计，实现艺术作品在空间层级中的合理布局与功能性优化^[6]。此外，AI 还可以简化公共艺术项目的设计、建模与呈现流程，提升艺术设计的工程效率与资源利用率，为公共艺术在乡村公共空间的推广应用提供技术支持，降低实施成本，拓展乡村公共艺术的覆盖范围与实施深度。

3.2 AI 赋能乡村手工艺

AI 技术在乡村手工艺的设计开发与非遗技艺保护中展现出重要价值，主要体现在手工艺产品设计的智能化优化、技艺传承机制的数字化构建与产品市场化策略的科学化提升三个方面。在设计上，AI 通过深度学习与风格生成技术，可对乡村传统工艺元素（如纹样、结构与材质）的图像数据进行自动提取与结构分

析,生成符合现代设计语境与市场审美的创新型工艺产品,促进传统符号的当代表达,增强产品的艺术属性与商业价值。在传承方面,AI依托虚拟仿真与远程教学平台,重构了手工艺技艺的数字化传承机制,提升了乡村手工艺的传承效率与覆盖广度,为非遗技艺的保护与传播提供有效途径。此外,AI基于市场数据分析,对手工艺产品的消费结构、用户偏好与需求动态进行定量分析,为乡村手工艺的产品开发、价格定位与市场推广提供科学支撑,助力乡村手工艺实现设计创新与产业可持续发展。

3.3 AI 赋能乡村艺术教育

AI技术在乡村艺术教育中的应用,有助于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升乡村地区艺术教育的可及性与智能化水平。AI依托智能教学系统,对乡村学生的学习能力、认知水平与兴趣偏好的自动分析,可以精准匹配个性化的艺术教育方案,满足学生的差异化学习需求,缓解乡村地区因资源匮乏导致的艺术教育短板问题^[7]。AI系统结合作品评估与过程性反馈机制,能够在音乐、绘画与设计等基础艺术训练环节,提供实时分析与定制化指导,提升学生艺术学习的针对性与有效性。同时,AI辅助的创作工具,如智能绘图系统与音乐生成平台,可以降低艺术创作的技能门槛,为乡村学生提供了多样化的创作媒介。此外,AI技术通过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手段,拓展了乡村艺术教育的教学场景,提升了教学的互动性与沉浸感,为乡村文化振兴背景下的艺术人才培养提供了技术支撑。

四、AI 驱动下乡村艺术与文化系统的协同演进机制

4.1 生成模型与乡村文化创新的协同机制

生成模型作为人工智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乡村文化创新中具备显著的协同推动作用。一方面,生成模型能够依托深度学习算法对大量乡村文化数据进行特征提取与风格学习,自动生成符合乡村文化特色的艺术内容,涵盖视觉图案、空间设计与工艺造型等多个层面,显著提升乡村文化创作的效率与艺术表现力。例如,AI通过对非遗技艺、地方建筑元素与民间故事等多样文化资源的学习,生成融合传统审美元素与现代设计风格的新型文化符号,拓展乡村文化的艺术表达边界。另一方面,生成模型具备较强的跨领域融合能力,能够在视觉设计、数字媒体与公共艺术等多重应用场景中,灵活整合乡村文化符号与当代艺术语言,形成传统文化与现代创意协同共生的艺术表现体系^[8]。此外,生成模型的迭代学习机制还能够多轮次数据训练中,动态优化生成内容的文化契合度与表现多样性,进一步推动乡村文化在不同传播媒介中的活态演绎,丰富乡村文化产品的创意来源,为文化创新与乡村艺术再生提供系统性技术支撑。

4.2 知识图谱支持下的文化资源数字化管理机制

知识图谱在乡村文化资源管理中的应用,能够显著提升文化数据的系统性整合、关联性建构与智能化利用水平。通过对乡村历史遗迹、非遗技艺、民俗信仰、文化人物与民间传说等多维文化信息的语义建模,知识图谱能够建立具有高度结构化、层级化与网络化特征的文化知识体系,实现文化资源的精细化整理与深度关联^[9]。相较于传统的文化资源管理方式,知识图谱突破了数据分散与信息孤岛的问题,支持文化数据在管理、检索与应用中的高效流转与共享,提升乡村文化的数字治理能力。进一步地,知识图谱结合用户兴趣数据、行为路径与内容消费习惯,能够实现文化内容的智能推送与个性化推荐,提升文化产品的精准传播与用户匹配度。此外,知识图谱具备知识更新与语义推理功能,可动态整合新收集的文化数据,不断完善文化资源数据库,推动乡村文化资源的可持续数字化管理。该机制不仅服务于文化传承、艺术创作与公共教育,还可为乡村文化产业开发与数字乡村建设提供数据基础与决策支持,助力乡村文化生态的智能化治理与多维利用。

4.3 社区智能平台与文化共生机制

社区智能平台作为融合信息化管理与文化服务功能的数字系统,在乡村文化传承与社区治理融合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平台通过整合虚拟展览、文化资源库、在线学习、社区互动等模块,搭建起文化创作、学习与共享的数字化协作空间,成为乡村文化资源与社区居民之间的交互纽带。依托社区智能平台,乡村居民可通过移动端、PC端等多终端渠道,便捷访问乡村非遗项目、地方艺术作品与传统技艺资料,提升对本土文化的认知与参与意愿。同时,平台支持居民在虚拟空间内进行文化创作、作品展示与交流互动,增强村民的文化主体意识与社区文化认同感。此外,平台通过数据共享机制与社区治理系统的嵌入,推动文化资源在社区治理中的功能性应用,如支持乡村公共文化活动的策划、文化议题的讨论与村落文化规则的共建,促进文化传承、社区协同与社会治理的有机结合,进而打破传统乡村文化传承中社区参与度不足、文化传播半径有限的局限,推动文化资源与社区社会结构之间的共生互动,为乡村艺术活化、文化振兴与社区治理现代化提供数字化基础设施。

五、结语

本文探讨了AI技术在乡村艺术再生与文化传承中的应用机理,重点分析AI在文化符号挖掘、多元应用场景中的实践路径,提出AI驱动下乡村艺术与文化系统的协同演进机制,助力乡村文化遗产在现代语境下实现活态传承与再生利用。未来研究可进一步聚焦AI在不同地域与文化背景下的适配机制,深化对AI与乡村空间、社区治理及文化多样性之间协同关系的探索,完善AI技术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理论与实践框架。

参考文献:

- [1] 孙茂松.机器语言能力和人工智能助力乡村振兴[J].语言科学, 2022, 21(5):453-455.
- [2] 向勇.乡村性的重构: 中国艺术乡建的本土美学实践[J].民族艺术研究,2025,38(01):5-13.
- [3] 文丰安.人工智能助推乡村振兴发展的现状与路径探析[J].江淮论坛, 2022(6):65-70.
- [4] 吴瑜鹏.人工智能在数字乡村建设中的应用[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3, 44(10):97,122.
- [5] 常鑫.基于 CiteSpace 的国内设计赋能乡村振兴研究热点与趋势分析[J].包装工程, 2023, 44(4):358-367.
- [6] 徐鹏,沈静怡.数智技术赋能城市历史文化街区可持续更新策略研究[J].智能城市,2024,10(11):69-72.
- [7] 付卫东,汪琪.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价值意蕴,风险隐忧与策略调适[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24, 26(5):83-90.
- [8] 曹银山,邹照斌.类 ChatGPT 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乡村文化振兴:机遇,挑战和路径[J].图书馆, 2024(6):67-73.
- [9] 耿国华,高健,汤汶,等.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应用研究综述[J].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5,55(01):1-22.

Research on AI-Driven Rural Art Regeneration and Cultural Heritage Transmission

Xu Peng¹

¹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Shanghai Second Polytechnic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in rural art regeneration and cultural heritage transmission, focusing on cultural symbol mining and reconstruction, the development of diverse application scenarios, and the formation of a collaborative evolution framework. The study outlines the concept and relevance of rural art regenerat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cultural heritage practices. It further identifies types of rural cultural symbols and examines AI-assisted methods for their extraction and reinterpretation.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discusses AI-driven practices in rural public art, handicraft revitalization, and arts education. Finally, it proposes a preliminary framework for AI-supported collaboration between rural art and cultural systems, aiming to contribute to the sustainable acti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rural cultural heritage.

Keywords: AI-Driven; Rural Art Regeneration; Cultural Heritage Transmission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3.625

年画艺术的审美方向与趋势

孟祥泽¹ 赵千慧¹

(¹ 云南大学, 云南 昆明 650000)

摘要: 年画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新时代在保持传统精髓核心内涵的基础上, 不断融入现代元素, 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年画作品相互借鉴、相互影响, 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年画艺术风格。在发展过程中, 当代年画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 表现题材更加多样, 更多地关注现实生活和社会问题。艺术家们通过年画作品来表达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思考, 传递出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随着科技的发展, 年画艺术也开始与新媒体等相结合, 呈现出新的艺术形态, 带来新的审美体验。科技与艺术的结合, 使年画艺术更加贴近现代生活, 满足了人们多样化的审美需求。在全球化背景下, 年画艺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 其传承与发展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审美人类学; 年画艺术; 审美方向; 文化传承; 创新发展

本论文以审美人类学原理为理论框架, 深入探讨年画艺术的审美方向趋势与转变。通过对古代年画艺术来源的追溯, 剖析其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脉络, 揭示年画艺术与社会文化、民众审美观念之间的紧密联系。从大众视角下的普遍年画艺术审美出发, 详细阐述年画艺术特色, 包括其主题、色彩、题材、构图以及所蕴含的文化内涵等方面。进一步分析年画艺术审美方向转变的特征, 如从传统到现代的融合在构图、色彩和题材上的创新表现。深入探讨年画演变趋势的原因, 包括审美观念的多元化以及科技手段的引入对其产生的影响。阐述年画艺术趋势改变的意义, 如在文化传承、历史记录、经济价值提升、文化交流和民族自信增强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最后, 对年画艺术进行评价与反思, 提出在新时代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旨在全面展现年画艺术在审美人类学视域下的丰富内涵和多元价值, 为其传承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年画是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年画拥有独特的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形式。年画艺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深刻的审美意义与审美价值。从古至今, 年画都可以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现实的依据, 是人们审美形态意识的缩影。年画作为一种稳定存在的社会结构表征, 在保存稳定社会功能的同时在流传中不断丰富内涵, 扩展形式, 具有文化载体的作用, 体现出民众的审美取向与民俗民情。年画在历史舞台上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年画中蕴涵着一种教人敬畏、感恩、有度、为忠、为善、为孝、惩恶以及与自然植物、动物和谐相处的总体精神目标和理念^[1]。

通过年画艺术的创新与发展, 我们可以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让世界更加了解和欣赏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并对年画艺术进行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

一、背景——大众视角下的普遍年画艺术审美

年画的起源可追溯至人类远古时期的自然崇拜观念。“年”字早在公元前 16~11 世纪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中就已出现, 其字形很像一个人在收割。所以《说文解字》称“年”字“谷熟也, 从禾”。当田里的五谷收割完毕, 则意味着旧的一年过去, 新的一年开始了, 因此俗称春节为“过年”。在中国古代民俗中, 将一些祝贺过年的东西都冠以“年”字-如见面互相庆贺的话叫“年话”、门上和墙上贴的画叫“年画”、吃的糕叫“年糕”、走亲访友的礼仪叫“拜年”等等。

在中国古代, “年”字与谷物丰收紧密相关, 当田里五谷收割完毕, 旧年过去新年开始, 春节成为“过

作者简介: 孟祥泽 (2004-), 男, 山东济南, 云南大学汉语言文学在读, 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

赵千慧 (2004-), 女, 辽宁抚顺, 云南大学汉语言文学在读, 主要研究方向为外国文学。二位作者不分先后, 为共同第一作者。

年”的重要时刻。早期年画围绕驱凶、祈福展开，这与古人对自然力量的敬畏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密切相关。例如，在远古时期，人们认为通过绘制特定的图案可以驱赶邪恶的 spirits，保佑来年风调雨顺、人畜平安。

从广义上看，民间艺人创作并经由作坊行业刻绘和经营的、反映民间世俗生活的绘画作品均可归为年画类。其习俗反映了古人的精神信仰与生活习惯，随着社会发展，人类对自然的崇拜逐渐转变为对社会性人格神的崇拜与信仰，年画艺术形式也相应改变，围绕祈福纳吉主题展开，制作与售卖也成为春节相关的自发艺术活动。

从广义上说，凡民间艺人创作并经由作坊行业刻绘和经营的，以描写和反映民间世俗生活为特征的绘画作品均可归为年画类^[2]。年画习俗反映了古人的精神信仰与生活习惯。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的崇拜逐渐转化为对社会性的人格神的崇拜与信仰，年画的艺术形式也随之改变，年画逐渐围绕着祈福纳吉的主题展开。年画的制作与售卖逐渐发展为人们自发的，围绕春节展开的艺术活动。

年画在清代进入鼎盛期。清代是年画发展的鼎盛时期。康、乾年间国泰民安，为年画艺术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同时，通俗小说的风行也为年画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灵感来源。这一时期，年画出现了大量以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戏曲人物、演义小说等为内容的作品，在表现形式和艺术风格上更加多样化。例如，杨柳青、桃花坞等地的年画在构图、色彩和人物造型上各具特色，展现出不同的地域文化魅力。

清末，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社会矛盾激化，封建统治动摇，这些变化也在年画上得到充分体现。清末民初成为年画发展史上最后一个繁荣阶段，尽管社会动荡，但年画依然是民众表达情感、寄托希望的重要艺术形式，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复杂的社会政治局面和民众心态。在社会层面上由于康、乾年间国泰民安为年画艺术形式提供舒适的发展空间和环境；而这一时期通俗小说的风行又为年画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灵感元素。清初年画出现了大量以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戏曲人物、演义小说等为主要内容的作品。清末随着内忧外患的到来，国内外各种矛盾激化，封建统治动摇，这些政治局面的改变以艺术的形式充分反映在了年画上。清末民初时期也因此年画发展史上，成为年画回光返照的最后一个繁荣阶段^[3]。

虽然各地的年画艺术形式略有不同，但是能够统一的是，往往烘托表示红色的喜庆主题。年画主题鲜明，无论题材如何，年画的主题都非常集中。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吉祥心理根深蒂固。不论遇到什么困难，中国人都会从最乐观的方面去积极思考，说吉利话，办吉利事，年画欢乐喜庆吉利，热热闹闹，红红火火，让人感受到蓬勃的生命活力与乐观主义，怀揣着美好的期待，寄予着美好的理想。中华民族不怕吃苦，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来的精神与民族性格在年画中深刻体现出来。年画主题始终围绕着吉祥喜庆展开，体现了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吉祥心理。无论是神话传说中的神仙鬼怪，还是历史故事中的英雄人物，亦或是日常生活中的场景，都被赋予了吉祥的寓意。年画中，孩童抱鱼持莲花莲蓬象征连年有余、多子多福；画鸡代表吉利，画佛手或蝙蝠代表福，画花瓶代表平安等。这种主题表达了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在艰难的生活中给予人们乐观积极的精神支持。

即使在社会动荡时期，年画依然传递着积极向上的信息，鼓励人们坚守信念，从困境中寻找希望。例如，在战乱年代，一些年画作品通过描绘英雄人物的英勇事迹，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抗争精神，同时也寄托了对和平幸福生活的期盼。

值得注意的是，年画在表现人物形象的同时，也注重情感的传递和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使观者能够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情感与生活哲理。年画还通过具体形象的想象与联想，传达喜庆、祥和吉祥的愿望。比如，年画中的莲花和鲤鱼寓意“连年有余”，石榴寓意“多子多孙”等。

年画以鲜明的色彩为主要表现手法，经常采用红色、绿色、黄色等明快鲜艳的色彩，使画面充满节日喜庆的气氛。民间年画大多采用大红大黄等鲜艳火爆的色彩，往往人物生动可爱，造型喜庆，富有活力。例如，在一些传统年画中，绿色与红色相互映衬，形成强烈的对比，增强了画面的视觉冲击力；黄色则常用于点缀，为画面增添明亮和温暖的感觉。不同色彩的组合不仅满足了视觉审美需求，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象征意义。

年画的构图多样，南北方存在差异。北方年画如杨柳青、杨家埠等，人物形象夸张，线条粗犷有力，色彩鲜艳，展现出粗犷大气的风格。其构图往往注重突出主题，人物和场景布局简洁明了，以强烈的视觉效果吸引观众。例如，杨柳青年画中的人物形象高大饱满，面部表情生动，通过夸张的手法增强了艺术感染力。南方年画如桃花坞等，更加注重构图的精细和色彩的协调，整体色调以紫红色为主，呈现出细腻饱满、欢乐祥和的气氛。其构图讲究对称、均衡，画面元素丰富且错落有致，注重细节描绘和意境营造。例如，桃花坞年画中的山水、花鸟等元素相互映衬，营造出优美的田园意境，使观者感受到宁静与和谐。

年画的题材广泛，涵盖人神两类。人神题材包括各类武将门神、灶爷、财神、观音等，这些形象体现

了民众对神灵的崇拜和对美好生活的祈愿。例如，武将门神如秦琼、尉迟恭等，被认为能够守护家门，驱赶邪恶。灶爷则负责监督家庭善恶，财神象征着财富和好运，观音菩萨代表着慈悲和救渡。年画有很多贴近生活的主题，有耕织农作、民间传说、历史故事等，反映了民众的日常生活、劳动场景和文化遗产。耕织农作题材展现了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人们对丰收的渴望；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则通过生动的画面传递道德观念、历史知识和文化传统。比如，《白蛇传》《牛郎织女》等民间传说成为年画的常见题材，它们以艺术形式传播了爱情、善良、勤劳等价值观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伦理道德观念深刻影响、制约了民众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它渗透在民众的观念、行为、信仰、情感、思想等各个方面。年画通过各种象征、比喻、谐音等手法传递着儒家思想、历史传统、伦理秩序和生活知识等多重文化意义。

在中国传统社会，伦理道德观念深刻影响民众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年画作为民间艺术，成为这些观念的重要载体。它通过各种象征、比喻、谐音等手法传递儒家思想、历史传统、伦理秩序和生活知识等多重文化意义。例如，“莲”与“廉”谐音，莲花图案在年画中不仅象征纯洁美好，也寓意廉洁清正；“松鹤延年”图案则传达了长寿健康的祝愿，同时也体现了对高尚品德和长寿的向往。年画在民间不仅是一种实用的民俗艺术，其价值体系使其成为民间信仰的一部分。民众通过张贴年画，表达对神灵的敬畏和祈求，希望获得保佑和庇护。这种民间信仰与年画艺术相互交融，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景观，反映了民众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和对美好生活的精神追求。

二、年画艺术的审美方向趋势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人们物质水平的提高，文化水平的提高。群众对于年画艺术特点和呈现形式的要求转变。

例如在娃娃戏类年画中，常见孩童抱鱼持莲花莲蓬的图式，这象征了连年有余、多子多福。年画艺术虽然在绘制技法上发生了改变，但题材和创作模式却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从手工印制到机械印刷，从纸制载体到新材料呈现的图像喷绘技术，年画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传统特色，并在此前提下创新性发展。由此可见，年画艺术能够创新发展自身形式而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色，继承时代精神。

年画艺术的审美方向转变是一个复杂而多元的过程，它受到社会变迁、文化观念更新以及科技发展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以下是对年画艺术审美方向转变的特征分析：

（一）从传统到现代的融合

在传统年画的基础上，艺术家们开始融入当代元素，如电影、动漫等，使年画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这种融合不仅保留了年画的传统韵味，还赋予了其新的生命力和时代感。例如，现代年画在构图、色彩和题材上都有所创新，既保留了传统年画的吉祥寓意和美好祝愿，又加入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情感表达。

年画艺术在构图、色彩和题材上的创新是年画艺术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这些创新不仅丰富了年画的表现形式，也使其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

现代年画在构图上突破传统的对称、均衡等方式，更加注重画面的层次感和空间感。艺术家运用透视、重叠、分割等手法，使画面呈现出更丰富的视觉效果。例如，采用散点透视的构图方式，将不同时间和空间的元素巧妙组合，营造出独特的艺术氛围。像一些表现城市生活的新年画，将高楼大厦、街道行人、交通工具等不同元素在同一画面中呈现，展现出城市的繁华与活力。

同时，现代元素也融入构图中，使年画更贴近现代人生活。如借鉴现代绘画构图技巧，将现代生活场景、物品等元素融入，一些新年画中会出现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现代建筑等元素，反映当代社会的科技进步和生活方式变化。此外，一些艺术家还尝试打破传统的画面边界，采用不规则构图，使画面更具张力和现代感。

例如，一些新年画作品采用了散点透视的构图方式，将不同时间和空间的元素巧妙地组合在一起，营造出一种独特的艺术氛围。在构图中融入现代元素也是年画艺术创新的一个重要方向。艺术家们通过借鉴现代绘画的构图技巧，将现代生活的场景、物品等元素融入到年画中，使其更加贴近现代人的生活。

曾经年画色彩鲜艳、对比强烈是其显著特点之一。现代年画在色彩运用上更加注重对比与和谐的统一。艺术家们通过精心搭配色彩，使画面既具有视觉冲击力又不失和谐美感。在保持传统鲜艳色彩的基础上，适当降低色彩饱和度和明度，以符合现代人审美需求。比如，一些新年画作品在红色为主色调的基础上，加入了柔和的粉色、淡蓝色等色彩，使画面既保持喜庆氛围，又更具现代感和时尚感。

除传统色彩搭配外，现代年画尝试更多色彩组合方式。借鉴现代色彩理论，将不同色系色彩搭配，创

造独特效果。如冷色调与暖色调对比搭配,营造出不同的氛围和情感表达。一些表现冬季冰雪场景的年画,以蓝色、白色等冷色调为主,搭配红色的灯笼或人物服饰,形成鲜明对比,增强画面的视觉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

现代年画题材更加多样化,不再局限于传统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等。艺术家挖掘现代生活素材,创作出反映现实生活、时代精神的作品。以现代家庭生活为例,新年画作品展现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互动、现代家居环境、休闲娱乐活动等,反映当代家庭生活的温馨与和谐。城市风貌也是常见题材,描绘城市的高楼大厦、公园广场、商业街区等,展现现代城市的发展与变化。科技发展题材则体现了现代社会的科技进步,如航天探索、人工智能、网络通信等元素出现在年画中,激发人们对未来的想象和憧憬。此外,现代年画还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如环保、公益事业等,通过艺术形式传递积极的社会价值观。

艺术家在创作中注重创意性表达,将传统元素与现代元素巧妙结合。通过夸张、变形等手法对传统年画元素进行创意表达,使其更生动有趣。如将传统的门神形象进行现代卡通风格的改造,使其更具亲和力和时尚感。同时,借鉴现代绘画技法如抽象、立体等进行创作,使年画呈现出独特艺术风格。一些新年画作品采用抽象的线条和色彩组合来表现节日氛围,给人以新颖的视觉体验。

(二) 审美观念多元化影响下的创新

古代年画造型形式相对固定,受文人画影响,人物服饰、环境道具等形式要素多处于叠合状态,呈现古典传统美。而现代年画吸收西方绘画造型手段和透视观念,以写实化造型手法展现出与传统不同的面貌。在表现人物形象时,现代年画更注重人物的比例、结构和立体感,使人物形象更加真实生动。这种变化反映了现代审美观念对创新和多样性的追求,是对传统艺术形式的现代化改造,以适应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

传统年画多以古典浪漫主义风格为主,通过夸张、变形等手法表现吉祥喜庆主题,具有强烈装饰性和象征性。现代年画倾向于现实主义风格,以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创作原则拉近艺术审美与生活实践的关系。新年画以真实的生活场景为蓝本,描绘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工作和情感,使观众更容易产生共鸣。这种转变体现了现代审美观念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反映,强调艺术作品的社会功能,使其不仅具有审美价值,还能反映社会现实和时代精神。

传统年画在褻层层面体现老百姓辟邪祈福的文化心理,具有浓厚宗教和迷信色彩。现代年画更多主张破除迷信、崇尚科学、鼓励勤劳团结、爱党爱国等时代公德,一些新年画作品以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展现民族团结、科技创新、社会和谐等内容,引导民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这种变化反映了现代审美观念对科学、理性、积极向上的追求,以及对社会公德和道德规范的重视,使年画成为传播正能量的艺术形式。

古代年画作为春节装饰品,主要追求吉祥、喜庆、和谐等寓意。现代人审美需求呈现多样化,追求个性化、多样化和创新性艺术作品。现代年画在内容和形式上更加注重创新和多样性,以满足不同观众的审美需求。现在在一些针对年轻群体的年画作品,会采用时尚的设计元素、流行的色彩搭配和新颖的题材,如动漫风格的年画、创意主题的年画等,吸引年轻观众的关注和喜爱。同时,也有一些年画作品注重艺术品质和文化内涵的提升,满足艺术爱好者和收藏家的需求。

传统年画主要依靠民间市场销售和传播,具有浓厚地域性和民俗性。现代年画更多利用现代传播手段推广和销售,如互联网、电商平台等。网络为年画传播提供了广阔空间和便捷方式,人们可以通过网络浏览、下载和分享年画作品。一些年画艺术家和商家在电商平台开设店铺,销售各种类型的年画产品,包括传统纸质年画、数字年画、年画周边产品等。同时,社交媒体的兴起也为年画传播提供了新渠道,通过发布年画图片、视频等内容,吸引更多人了解和关注年画艺术,拓宽了年画的受众群体和市场范围。

三、年画演变趋势的原因

随着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变化,人们的审美观念也在不断更新。现代人对年画的审美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造型和色彩,而是更加注重其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因此,年画艺术家们在创作过程中需要更加注重对传统文化的挖掘和传承,同时结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进行创新。全球化进程加速了文化的传播与融合,各种外来文化思潮涌入中国,对民众的审美观念产生了冲击。例如,西方现代艺术观念中的抽象、表现主义等风格,影响了部分年画艺术家的创作思路,使他们尝试在年画创作中融入新的艺术元素和表现手法。

社会结构的变化也促使审美观念多元化。现代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形成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群体,每个群体都有其独特的文化背景和审美需求。城市中的白领阶层可能更倾向于简约、时尚、富有创意的艺术风格,而农村地区的民众可能仍然保留着对传统年画风格的喜爱,同时也逐渐接受一些新的变化。这种社

会阶层和群体的差异导致了审美需求的多样化,推动了年画艺术在题材、风格和表现形式上的创新。

教育普及与文化素养提升教育的普及提高了民众的文化素养,使人们对艺术的理解和欣赏能力不断增强。人们不再满足于传统年画的简单形式和表面寓意,而是开始追求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在学校教育中,美术教育的推广使人们接触到更多不同类型的艺术作品,拓宽了审美视野。学生在学习绘画、设计等课程时,了解到不同的艺术流派和创作方法,这会影 响他们对年画艺术的审美判断。文化素养的提升也使民众对艺术的创新和个性化有了更高的要求。他们希望看到具有独特创意、能够反映时代精神和个人情感的年画作品。因此,年画艺术家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创作水平,深入挖掘传统文化内涵,结合现代审美需求进行创新,以满足观众日益增长的审美期望。

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他们不仅关注年画的视觉效果,还注重其背后的文化故事和情感表达。因此,年画艺术家们在创作过程中需要更加注重对题材的选择和情感的表达。一些年画作品以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等为题材,通过生动的画面和深刻的寓意来打动人心;而另一些作品则以现代生活为题材,通过幽默诙谐的画风来展现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情感状态。

在古代,年画的造型形式相对固定,人物服饰、环境道具等形式要素多处于叠合状态,且受文人画影响较深,呈现出一种古典的、传统的美。随着时代的发展,新年画在形式语言上发生了显著变化。它吸收了西方绘画的造型手段和透视观念,以写实化的造型手法呈现出与传统年画大相径庭的面貌。这种变化反映了现代审美观念对创新和多样性的追求,以及对传统艺术形式的现代化改造。

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时代精神和审美观念,这些变化会直接影响年画的形式语言。在古代社会,人们的审美观念较为传统和保守,年画的形式语言也较为古朴、简洁,色彩搭配和图案设计都相对单一。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人们的审美观念更加多元化、个性化,追求新颖、独特和时尚的艺术形式,这促使年画在形式语言上不断创新,吸收了现代艺术的表现手法和风格,如抽象、变形、夸张等,以满足现代人的审美需求。

文化交流与融合是促使年画形式语言演变的重要因素。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年画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形式,也不断吸收和融合其他文化的元素。清代,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年画吸收了西方透视法等表现明暗起伏的画法,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年画的制作工艺从传统的手绘、木版套色水印,到现代的机械印刷、电脑制作等,经历了巨大的变革。这些制作工艺的发展为年画的形式语言演变提供了技术支持。机械印刷技术的出现,使得年画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同时也能够实现更加精细、复杂的图案和色彩效果,为年画的形式创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新材料的不断涌现也为年画形式语言的演变提供了物质基础。传统的年画主要使用纸张、颜料等材料,而现代年画则可以使用各种新型材料,如塑料、金属、丝绸等,这些材料的质感和光泽度与传统材料不同,能够为年画带来全新的视觉效果和触觉体验,丰富了年画的形式语言。

艺术家作为年画创作的主体,他们的个性和创造力对年画形式语言的演变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不同的艺术家有着不同的艺术风格和创作理念,他们在继承传统年画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个性和创意,创作出具有独特形式语言的年画作品。这些作品不仅丰富了年画的艺术内涵,也为年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年画的发展离不开传承与创新的有机结合。艺术家们在传承传统年画的制作工艺、图案题材和形式语言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创新和探索,使年画在保持民族特色和地域风格的同时,又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变化。这种传承与创新的互动关系,是年画形式语言演变的内在动力。

年画演变趋势所反映的审美观念变化主要体现在形式语言的多样化、艺术风格的现实主义倾向、文化功能的时代化以及审美需求的个性化和多样化等方面。这些变化不仅体现了现代审美观念对传统艺术形式的改造和升华,也反映了社会文化的进步和发展。总的来看,在我国传统年画作品中,其所描述的主要内容均与当时的社会生活之间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受众可以通过年画有效实现对于现实生活的感悟,从而进一步引导其对年画作品进行理解与认知,有利于实现受众情感的充分发挥与调动,对于年画艺术形式的繁荣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然而,就目前而言,部分年画作品的主题与题材并未有效与当今的社会生活相联系,从而不利于人民群众对于年画产生相应的情感。

随着科技的发展,电子化和数字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年画艺术的创作和传播中。这些技术为年画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和可能性。例如,通过3D技术、AR技术等手段,可以将年画作品以更加生动、立体的形式呈现给观众;同时,数字印刷技术也使得年画的制作更加便捷和高效。

在信息时代,网络对于年画的图像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便捷效能。虽然网络无法完全替代纸质年画在百姓生活中的切实作用,但它为年画的传播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更便捷的方式。人们可以通过网络浏览、下载和分享年画作品,从而更加便捷地了解 and 欣赏年画艺术。

由此可见,年画艺术的审美方向转变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创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艺术家们需要不断挖掘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内涵,同时结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进行创新;同时还需要积极引入科技手段来推动年画艺术的发展和传播。

四、年画艺术趋势改变的意义

年画艺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演变与改变承载着深远的意义。年画艺术通过不断改变,既保留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又融入了新的时代元素。这种改变使得年画艺术得以在保留其独特魅力的同时,更加贴近现代生活,满足当代人的审美需求,从而实现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新的年画艺术风格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多元文化需求,使不同群体通过年画产生文化共鸣在社区文化活动中,展示和制作具有现代风格的年画可以吸引不同年龄段和文化背景的居民参与,增进社区居民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增强社会的凝聚力。

它还可以促进文化认同。当人们看到经过创新的年画依然保留着本土文化的核心元素时,会增强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比如,海外华人在看到融合了现代风格和传统中国文化元素的年画时,会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自己与祖国文化的联系,从而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归属感。

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认识的加深和对艺术品收藏的热情高涨,年画作为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艺术品,其经济价值也得到了显著提升。一些精美的年画作品不仅成为家庭装饰的佳品,还成为收藏家们竞相追逐的对象。年画艺术风格的改变能够拓展年画的市场。在旅游市场,风格新颖的年画可以作为特色旅游纪念品吸引游客购买。比如,以旅游景点为主题、采用创意设计的年画在旅游景区销售火爆,为当地旅游业带来经济收益。在文化创意产业市场,经过艺术风格创新的年画产品可以作为文化创意商品进入商场、电商平台等销售渠道,创造出更多的经济价值。

它还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年画风格的创新可能涉及新材料的使用,这会促进材料供应商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为了制作风格独特的年画,可能需要新的印刷设备或制作工艺,这也会推动印刷、手工艺等产业的进步和发展。

年画的内容往往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风貌、人们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以及价值观念等。随着社会的变迁,年画中的主题、人物形象、色彩运用等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成为记录历史、反映时代变迁的重要载体。

在全球化背景下,年画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有助于增强民族自信心和文化自豪感。通过年画这一艺术形式,人们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和认同自己的文化根源,进而在全球化浪潮中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和独立性。

五、评价与反思

年画艺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还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与喜爱。以下是对年画艺术的评价与反思。年画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年画起源于古代的“门神画”,历经数百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它见证了中国春节文化发展,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历史变迁和民俗风情以及人们的审美追求,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年画在色彩上大胆使用红、黄、白、绿、黑等鲜艳颜色,形成充满活力的视觉效果。这种色彩运用不仅增添了节日的喜庆气氛,也体现了中国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并且年画的组成元素往往丰富多样,人物、动物、花鸟等形象栩栩如生,展现出民间艺术的独特魅力。年画往往通过图案和文字的结合,融入丰富的寓意和祝福。如“福”字、鲤鱼、蝙蝠等图案,都寓意着吉祥和幸福,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现代生活方式的变迁使得年画在民间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逐渐缩减。因此如何年画资源的保护和发掘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年画资源的保护和发掘必须符合民俗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然而在数字化的今天,纸质媒体的生存空间也在受到挤压,这样的大环境似乎使人预见到传统年画走向衰落的时代。因此弘扬传统固然重要,但求新求变方能找到出路。即使是古旧的文艺作品,只要选对了媒体载体,依然可以以适应时代的新面貌呈现。就像新式年画曾成功适应工业化时代一样,在未来,年画的艺术风格以及文化符号也不应止步于纸质媒体时代的框架中随着时代的发展,年画艺术面临着传承与创新的双重挑战。一方面,需要加强对传统年画的挖掘、整理和保护工作,确保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延续;另一方面,也需要积极探索年画艺术的创新发展之路,使其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审美需求和市场变化。

在商品经济时代,年画的市场需求逐渐萎缩,受众群体也趋于老龄化。为了拓展年画的市场空间,需

要积极培育新的受众群体，特别是年轻一代。可以通过举办年画展览、开展年画教育活动等方式，提高公众对年画艺术的认识和兴趣。

年画艺术的教育和普及工作至关重要。可以将年画艺术纳入学校美术课程或课外活动中，通过课堂教学和实践活动相结合的方式，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创作能力。同时，也可以利用媒体和网络平台广泛宣传年画艺术的价值和意义，提高公众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结语

年画艺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艺术魅力。面对新的挑战 and 机遇，将年画艺术传承发展下去，需要加强传承与创新、拓展市场与受众、引入技术与材料以及加强教育与普及等方面的工作，以推动年画艺术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参考文献:

- [1]李志刚.论武强年画的艺术特色和文化价值 [J] .美术,2006 (11):124-129
- [2]王树村.年画史 [M]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7, (23) 999.
- [3]张伟.中国年画的历史发展及其文化价值 [J] .上海工艺美术,1999. (3):12-13

The Aesthetic Direction and Trends of New Year Picture Art

Meng Xiangze¹, Zhao Qianhui¹

¹*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Abstract: The art of New Year pictures is a par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new era, on the basis of maintaining the core connot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essence, modern elements are continuously integrated, achieving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New Year picture works from different regions, ethnic groups,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learn from and influence each other, forming a rich and colorful artistic style of New Year picture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the expressive forms of contemporary New Year pictures are more abundant, and the themes are more diverse, with more attention paid to real-life and social issues. Artists express their observations and reflections on real life through New Year picture works, conveying positive values and a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the art of New Year pictures has also begun to combine with new media and others, presenting new art forms and bringing new aesthetic experiences. The combination of technology and art makes the art of New Year pictures closer to modern life and meets people's diverse aesthetic need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s a treasur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rt of New Year pictur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national culture and enhancing cultural confidence.

Keywords: Aesthetic Anthropology; New Year Picture Art; Aesthetic Direction; Cultural Inheritanc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3.812

抢险救援指挥课程思政的探索实践

冷强¹ 于晟伟^{1*} 何永明^{1*}

(¹ 中国消防救援学院, 北京 北京 102202)

摘要: 本文聚焦抢险救援指挥课程, 系统探讨课程思政的探索与实践路径。通过分析课程与思政教育的内在联系, 提出从课程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师资队伍建设以及考核评价体系等多个维度融入思政元素的具体策略, 旨在全面提升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职业道德水平与社会责任感, 为培养高素质抢险救援指挥人才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 抢险救援指挥; 课程思政; 人才培养

一、引言

随着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不断完善, 抢险救援工作在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愈发凸显。作为应急管理、消防救援等专业的核心课程, 抢险救援指挥课程承担着培养具备专业指挥能力与应急处置技能人才的重要使命。在新时代背景下, 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专业课程教学, 不仅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 更是培养具有坚定政治立场、高尚道德品质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高素质抢险救援指挥人才的现实需要。通过课程思政建设, 可以有效引导学生将个人职业追求与国家应急救援事业紧密结合, 为我国应急救援事业的长远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近年来, 随着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不断完善, 抢险救援工作在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愈发凸显。然而, 当前抢险救灾财务保障体系仍存在诸多问题。王星宇等学者指出, 需求测算不准确、军地协同机制不完善以及监督体系薄弱是当前财务保障体系的主要短板^[1]。此外, 宋丙剑发现, 消防救援队伍在跨区域协作中常因信息共享壁垒和资金调配权限不清而导致效率低下^[3]。针对这些问题, 王志明等学者从课程体系角度提出, 需加强财务保障的“全灾种”适应性设计, 以应对复杂多变的救援场景^[4]。在教学模式创新方面, 肖川等学者提出了“PBL 联合情景模拟”教学模式, 通过虚拟仿真技术模拟地震、洪涝等场景, 显著提升了学生的应急决策能力和团队协作水平^[2]。辛晶等学者较早构建了以实战为导向的抢险救援指挥实践教学体系, 强调案例分析与角色扮演的结合^[11,12]。冷强等学者进一步提出, 课程体系需融入“全灾种”理念^[7], 增设化工泄漏、建筑坍塌等模块化训练, 与李斌关于抗洪抢险能力建设的建议相呼应^[6]。尽管这些模式在提升学员临场应变能力方面效果显著^[2,11], 但其实施仍面临硬件投入高、跨学科师资不足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 陈宏伟建议通过校企合作优化实训资源^[9], 例如引入消防部队实战案例和智能仿真设备。贺嘉含和于志军等学者指出, 消防部队在装备、指挥体系和安全防护意识方面存在不足, 亟需改进^[8,10]。周庆等学者针对抗洪抢险提出, 前置备勤力量分散和物资调配效率低是主要短板^[5]。

抢险救援指挥作为应急管理领域的重要学科, 其教学目标不仅是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 更在于塑造其思想政治素养、职业道德水平和社会责任感。课程思政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改革方向, 旨在通过专业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 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然而, 如何在专业课程中有效融入思政元素, 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思政体系, 仍是当前教学改革中的关键问题。

当前抢险救援指挥课程的教学改革需要在财务保障、跨区域协作、课程设计以及实战能力培养等方面进行全面优化。本文旨在通过系统性分析, 提出切实可行的课程思政与教学改革路径, 为培养高素质抢险救援指挥人才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持。通过对课程与思政教育内在联系的深入分析, 本文提出从课程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师资队伍建设以及考核评价体系等多个维度融入思政元素的具体策略。研究旨在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为培养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的高素质抢险救

作者简介: 冷 强 (1981—), 男, 四川乐山人, 中国消防救援学院讲师。

于晟伟 (1995—), 男, 吉林长春人, 中国消防救援学院讲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研究生。

何永明 (1978—), 男, 江西南昌人, 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副教授。

援指挥人才提供参考。这一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为推动课程思政在应急管理领域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实践指导。

二、抢险救援指挥课程思政的可行性

(一) 课程内容富含思政素材

《抢险救援指挥》课程围绕各类灾害事故的救援指挥展开,涵盖地震、火灾、洪水、化学泄漏等多种场景。在这些真实案例中,救援人员展现出的舍生忘死、无私奉献、团结协作等精神,以及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科学决策的工作态度,都是宝贵的思政教学素材。此外,课程中的指挥原则、流程以及技术规范,也能与思政教育中的集体主义、科学精神、法治观念等有机结合。

(二) 目标导向高度契合

抢险救援工作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和社会性,要求指挥人员具备较高的政治觉悟、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课程思政的目标正是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升其思想政治素养。二者在人才培养目标上的高度契合,为课程思政的实施提供了明确的方向。

三、抢险救援指挥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一) 适应行业发展新要求

当前,抢险救援工作面临形势日益复杂,各类灾害事故呈现出多样性、突发性和复杂性的特点。这不仅要求指挥人员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更需要其拥有坚定的政治立场、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通过课程思政建设,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提升其在复杂环境下应对挑战、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好地适应行业发展的新要求。

(二) 弥补学生思想认识短板

部分学生对抢险救援工作的重要性 and 严肃性认识不足,存在职业价值观偏差、团队协作意识淡薄等问题。单纯的专业知识传授难以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而课程思政的融入,人民消防为人民,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始终贯彻课程始终。抢险救援案例情节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中能够通过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和道德观,增强其职业认同感和使命感,为其未来的职业发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四、抢险救援指挥课程思政的探索与实践

(一) 明确课程思政目标

在修订《抢险救援指挥》课程教学大纲时,将思政教育目标与专业教学目标有机融合,构建知识、能力与思政三维目标体系。学生需掌握抢险救援指挥的基本理论、原则、方法和技术,熟悉各类灾害事故的特点和处置流程,了解国内外抢险救援工作的发展动态。培养学生的灾害现场指挥决策能力、应急处置能力、团队协作能力以及沟通协调能力,使其能够在复杂多变的抢险救援环境中迅速、有效地开展工作。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培养其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意识;强化学生的职业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其深刻认识抢险救援工作的重大意义;培育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和奉献精神,提升其社会责任感和法治意识。

(二) 挖掘与整合课程思政内容

在教学过程中,引入大量真实的抢险救援案例,通过案例分析、讨论等方式,引导学生深入思考案例背后的思政价值。例如,在讲解汶川、泸定、尼泊尔、积石山地震救援案例时,介绍救援人员面对余震不断的情况,争分夺秒抢救生命的英勇事迹;在“三断”条件下,水陆空立体现代化救援理念,让学生深刻体会到生命至上的理念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分析火灾救援案例中,因个别人员违规操作导致事故扩大的教训,强化学生的法治意识和安全责任意识。在传授专业知识的过程中,巧妙融入思政教育内容。在讲解抢险救援指挥的基本原则时,将集体主义原则与指挥决策过程相结合,强调在救援工作中要以大局为重,服从统一指挥;在介绍救援方案制定方法时,融入科学精神和创新意识,引导学生树立实事求是、勇于探索的工作态度。

(三) 创新课程思政教学方法

精心选取具有代表性、启发性和时代性的抢险救援案例,组织学生进行深入分析和讨论。在案例讨论过程中,设置具有针对性的问题,引导学生从思想政治、职业道德等多个角度进行思考。例如,针对某化工厂爆炸事故救援案例,让学生讨论在救援过程中如何平衡救援效率与人员安全,以及在面临道德困境时应如何做出正确决策,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价值判断能力。创设高度仿真的抢险救援模拟情景,让学生扮演救援指挥人员、救援队员、受灾群众等角色,模拟完成救援任务。在模拟过程中,设置各种突发情况和道德冲突,如资源分配不均、救援风险评估等问题,考验学生的应急处置能力和道德抉择能力。通过情景模拟,使学生身临其境感受抢险救援工作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增强其职业责任感和团队协作精神。利

用在线教学平台,推送与抢险救援相关的思政教育资源,如先进事迹报道、专家讲座视频、政策法规解读等,供学生自主学习。同时,通过线上讨论区、作业互评等功能,组织学生围绕思政话题进行交流和讨论,引导学生深入思考。线下课堂则结合线上学习内容,进行针对性的讲解、案例分析和实践演练,实现线上线下教学的有机融合。

(四) 加强课程思政师资队伍建设

定期组织《抢险救援指挥》课程教师参加思想政治理论培训,邀请思政教育专家进行专题讲座,帮助教师深入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升其政治理论水平。鼓励教师参加思政教学研讨会和教学竞赛,学习先进的思政教学理念和方法,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政教学能力。将思政教学能力纳入教师绩效考核体系,从教学目标设计、教学内容融入、教学方法运用、教学效果评价等多个方面对教师的思政教学工作进行考核。对在课程思政教学中表现突出的教师给予表彰和奖励,激励教师积极开展课程思政教学改革。

(五) 完善课程思政考核评价体系

构建多元化的课程思政考核评价体系,将思政教育纳入课程考核内容。除了传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考核外,增加对学生思想政治表现、职业道德素养和团队协作能力的考核。例如,通过课堂讨论、小组作业、社会实践等环节,考察学生的价值观、道德观和团队合作精神;通过撰写心得体会、案例分析报告等方式,了解学生对思政教育内容的理解和运用能力。采用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全面、客观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果。过程性评价主要关注学生在课堂学习、小组讨论、实践演练等环节中的表现,及时反馈学生的学习情况,引导学生不断改进。终结性评价则通过期末考试、课程论文等方式,对学生的知识掌握和能力提升进行综合考核。

(六) 基于 BOPPPS 的课程思政教学方法创新

通过展示震撼的灾害现场视频、讲述感人的救援故事等方式,迅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引发他们对课程内容的兴趣。同时,提出与思政相关的问题,如“在救援过程中,救援人员的行为体现了哪些价值观?”引导学生思考,自然地导入课程思政主题。明确告知学生本节课的教学目标,不仅包括专业知识与技能目标,还详细阐述思政目标。例如,“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同学们将掌握抢险救援指挥的流程,同时深刻理解团队协作和责任担当在抢险救援工作中的重要性。”让学生清楚学习方向。通过课堂提问、小测验等方式,了解学生对之前所学知识和相关思政观念的掌握程度。例如,提问“在以往的抢险救援案例中,有哪些行为违反了职业道德?”根据学生的回答,调整教学策略,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采用小组讨论、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等多种参与式教学方法,让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过程中。在小组讨论环节,给出具有争议性的思政话题,如“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分配救援资源才符合道德原则?”组织学生进行讨论,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观点,培养其批判性思维和团队协作能力。在情景模拟中,创设复杂的救援场景,让学生扮演救援指挥人员,在模拟决策过程中,引导学生思考如何践行正确的价值观。通过课堂练习、案例分析报告等方式,检验学生对本节课知识和思政内容的掌握程度。例如,给出一个新的抢险救援案例,要求学生分析案例中救援指挥人员的决策是否合理,并从思政角度进行评价。根据后测结果,及时反馈学生的学习情况,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估。在课程结束时,对本节课的内容进行总结,回顾专业知识和思政要点,强调抢险救援工作中正确价值观的重要性,引导学生将所学的思政理念运用到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

五、课程思政实践成效与反思

(一) 实践成效

通过课程思政的实施,学生对抢险救援工作的政治属性和社会价值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爱国主义情怀、职业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明显增强。在日常学习和实践活动中,学生展现出更高的政治觉悟和道德素养,更加自觉地将个人成长与国家应急救援事业发展紧密结合。课程思政的融入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主动性,学生在课堂上更加积极参与讨论和实践活动,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更加深入。同时,通过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质,为培养高素质抢险救援指挥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 反思与展望

部分教师对课程思政的理解还不够深入,在教学过程中存在思政元素融入生硬、教学方法单一等问题;课程思政内容的挖掘还不够全面,部分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的结合不够紧密;考核评价体系还需进一步完善,对学生思政表现的评价标准还不够细化。未来,需进一步加强教师培训,通过专题培训、教学研讨、教学观摩等方式,帮助教师深入理解课程思政的内涵和要求,提升其课程思政教学能力。持续深入挖掘课程思政资源,加强思政内容与专业知识的有机融合,打造具有专业特色的课程思政教学内容体系。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细化的评价标准,全面、客观地评价学生的思政学习成果。此外,加强与行业企业的合作,将行业的最新需求和思政要求融入课程教学,不断优化课程思政教学模式,为国家应急救援事业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

六、结论

将思政教育融入《抢险救援指挥》课程,是适应新时代应急救援事业发展需求,培养高素质德才兼备、校队一体、教战融合的抢险救援指挥人才的重要举措。通过明确课程思政目标、挖掘与整合课程思政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完善考核评价体系等一系列探索与实践,能够实现思政教育与抢险救援指挥与技术专业教学的有机融合,提升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和专业能力。在未来的教学中,需不断总结经验,持续改进和完善课程思政教学体系,为国家应急救援事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参考文献:

- [1] 王星宇,李娇阳.优化抢险救灾行动财务保障机制的思考与探索[J].中国应急救援,2025,1:29-32.
- [2] 肖川,宁占金,宋丙剑,吴继承,王健.“情景模拟”教学模式在抢险救援指挥与技术专业实践教学中的应用研究[J].华东科技,2023,1:146-148.
- [3] 宋丙剑.我国消防救援队伍抢险救援行动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A].2022年度灭火与应急救援技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22:359-361.
- [4] 王志明,韩玉婷,李己华,侯亚欣.“全灾种”下抢险救援指挥与技术专业的课程体系调整优化[J].消防界(电子版),2021,7(07):73-75.
- [5] 周庆,方建钢,陈建.消防救援队伍抗洪抢险力量前置备勤的思考[J].中国应急救援,2021,1:37-41.
- [6] 李斌.加强抗洪抢险救援能力建设的思考[J].消防科学与技术,2020,39(11):1587-1588.
- [7] 冷强,汪雁,李瑞宝,胡中建,訾栓紧.抢险救援指挥与技术专业建设课程体系研究[J].消防界(电子版),2020,6(20):29-31.
- [8] 贺嘉含.浅析消防部队抢险救援中的问题及措施[J].消防界(电子版),2016,12:30.
- [9] 陈宏伟.加强优势专业建设以内涵发展提高消防学校办学竞争力[J].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16,3:4-7.
- [10] 于志军.抢险救援专业部队加快作战指挥系统建设探析[J].消防界(电子版),2016,2:48-49.
- [11] 辛晶,刘立文,王振雄,于力.抢险救援指挥与技术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研究[J].武警学院学报,2015,31(05):57-61.
- [12] 辛晶,刘立文,陈华,李向欣,高成耀.抢险救援指挥实践教学研究[J].武警学院学报,2011,27(10):73-74.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Emergency Rescue Command Course

Leng Qiang¹, Yu Chengwei^{1*}, He Yongming^{1*}

¹ China Fire and Rescue Institute, Beijing 102202,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emergency rescue command course and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al pat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ourse. By analyzing the intrinsic connection between curriculum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pecific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such as curriculum objectives,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methods, teacher team construction, and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system. The aim is to comprehensively enhanc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iteracy,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emergency rescue command talents.

Keywords: Emergency rescue command; Course ideology and politics; Talent training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3.824

红色教育基地对青少年文化认同影响研究——以焦裕禄同志纪念馆为例

芦昊翔¹

(¹ 河南大学, 河南 郑州 450000)

摘要: 本研究以焦裕禄同志纪念馆为案例, 探讨红色教育基地对青少年文化认同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研究基于认知-情感-行为模型, 将文化认同划分为文化知识、文化情感和文化行为三个维度, 以教育参观情况、传播内容和形式、沉浸式课堂参与为自变量, 通过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 采用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验证假设。研究为优化红色教育基地教育模式、增强青少年文化认同提供了实证依据, 并提出强化沉浸式教育体验和优化传播内容与设计的建议。

关键词: 红色文化; 红色教育基地; 青少年; 文化认同; 焦裕禄同志纪念馆

一、研究背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用好红色资源, 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 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 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红色教育基地作为红色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 是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 是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精神传承的重要载体。

焦裕禄同志纪念馆作为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之一, 以焦裕禄同志的感人事迹和奉献精神为核心, 承载了中华民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背景下, 青少年群体面临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西方价值观的冲击, 部分青少年对传统文化和革命精神的认同感有所弱化。因此, 探索通过红色教育基地有效提升青少年文化认同, 不仅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更是响应国家战略, 推动红色文化世代相传的重要一环。

本研究以焦裕禄同志纪念馆为案例, 通过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 分别采取教育参观情况、传播内容和形式、沉浸式课堂参与为自变量, 以青少年文化认同整体(基于“认知-情感-行为模型”划分为三个维度, 包含文化知识、文化情感、文化行为)为因变量开展相关分析及回归分析, 旨在探索红色教育基地对青少年文化认同各维度的影响及其路径机制。

二、研究假设与调查设计

(一) 研究假设

1. 认知-情感-行为模型 (Cognition-Affect-Behavior Model)

认知-情感-行为模型由霍尔布鲁克提出, 最早用于描述消费者的行为。在该模型中, 认知是指个人对某一问题或对象的信念、感知和想法。情感是指个人对某一问题或对象的情绪或感觉。行为意指行为意图或实际行动。该模型认为, 个体的态度形成通常经历“认知获取—情感回应—行为倾向”三个阶段, 这一过程可类比于青少年对红色文化的认同机制。因此, 本研究将文化认同划分为文化知识、文化情感、文化行为三个维度。

2. “使用与满足”理论

“使用与满足”理论关注受众如何主动选择和使用媒介以满足其特定需求。在红色教育基地的语境下, 青少年作为受众, 通过参观和参与教育活动, 寻求满足其认知、情感和社会需求。具体而言, 青少年希望通过参观了解革命历史、焦裕禄事迹等知识(认知需求), 体验红色精神并产生情感共鸣(情感需求), 进

基金项目: 河南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资助(XJ2024173)

作者简介: 芦昊翔(2003—), 男, 河南大学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红色文化传播。

而与同伴、家人共同参与集体活动（社会需求）。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 H1：教育参观情况正向显著影响青少年的文化知识。
- H2：教育参观情况正向显著影响青少年的文化情感。
- H3：教育参观情况正向显著影响青少年的文化行为。

3.红色教育基地的媒介化作用

红色教育基地作为一种特殊的传播媒介，通过其物质形态和符号系统传递红色文化信息。传播学中的媒介环境学派认为，媒介不仅是信息的载体，还通过其物理和符号特性塑造受众的认知和行为。具体而言，红色教育基地的馆藏资源通过历史文物、图片和文字展示，提供直观的视觉信息，帮助青少年构建对焦裕禄事迹的认知，进而影响其文化行为；纪念馆的空间布局和设计通过叙事手法引导参观者的情感体验，增强文化情感的共鸣，进而影响其行为。红色教育基地的馆藏资源与布局设计是红色文化传播的内容与形式，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 H4：传播内容和形式正向显著影响青少年的文化知识。
- H5：传播内容和形式正向显著影响青少年的文化情感。
- H6：传播内容和形式正向显著影响青少年的文化行为。

4.沉浸传播理论

沉浸传播是一种全新的信息传播方式，它是以人为中心、以连接列所有媒介形态的人类大环境为媒介而实现的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传播。其实现方式有两种，一是通过一定的叙事手法调动受众的情绪营造沉浸式情感，二是通过使用虚拟现实技术营造沉浸式环境。焦裕禄同志纪念馆与焦裕禄干部学院开发的沉浸式课程《您好，焦裕禄》通过现场演绎与演员同观众直接接触从而营造沉浸式情感，重现焦裕禄同志的生平事迹，使参与者如同置身于历史场景之中，通过情感共鸣深化其对红色文化的理解和认同，进而影响其日常的行为。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 H7：沉浸式课堂参与正向显著影响青少年的文化知识。
- H8：沉浸式课堂参与正向显著影响青少年的文化情感。
- H9：沉浸式课堂参与正向显著影响青少年的文化行为。

（二）调查设计

1.问卷设计

问卷中与文化认同有关的题目有 9 道，均以李克特量表形式呈现，分别是文化知识 3 道、文化情感 3 道、文化行为 3 道（见表 1）。

表 1 测量指标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问题
红色教育基地	教育参观情况	我在参观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时积极参与了教育活动。 我每年参观焦裕禄同志纪念馆的次数:_____次 纪念馆馆的展品内容信息丰富且易于理解。 纪念馆的设计吸引人，增强了我的学习兴趣。
	传播内容与形式	我参与了沉浸式课堂《您好，焦裕禄》，这让我更深入了解焦裕禄精神。 沉浸式课堂的互动体验让我对焦裕禄精神产生更强的情感共鸣。 参观后，我更了解焦裕禄同志的事迹和精神。
文化认同	文化知识	参观后，我比以往更多知道焦裕禄同志在兰考的工作和贡献。 参观后，我能列举出焦裕禄同志的几项主要成就。 参观后，我对焦裕禄同志的事迹更加感到敬佩。
	文化情感	参观后，我认为焦裕禄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观后，我在日常生活中会想起焦裕禄同志的教诲。 参观后，我愿意在日常生活中学习焦裕禄同志的奉献精神。
	文化行为	参观后，我会主动参与社区或学校的志愿服务活动。 参观后，我会向身边的人宣传焦裕禄同志的事迹和精神。

2.变量定义与说明

（1）红色教育基地情况：指在本研究中由教育参观情况、传播内容和形式、沉浸式课堂参与三部分组成，教育参观情况是指受访者是否积极参与纪念馆内活动及参观频次；传播内容和形式是指纪念馆的馆藏

资源和空间布局设计；沉浸式课堂参与主要指受访者对沉浸式课堂的具体感受。

(2) 文化认同：基于认知-情感-行为模型划分的三个维度，文化知识主要指青少年对焦裕禄精神的了解提升程度；文化情感是青少年的情感共鸣；文化行为主要指受访者是否考虑在现实中传播、践行焦裕禄精神的行动。

三、数据分析与结论

(一) 信效度检验

1. 信度检验

信度是指样本的可靠度，它可以检测出样本自身是否具有稳定性、再现性，即结果是否反映了被测者的真实特征，因此可以作为问卷修改的根据之一。当量表中同一组的题目整体的信度系数较高的时候，说明这组题目之间具有较高的一致性。根据目前已有的测量标准，本研究将信度的具体系数列举在表2中。

表2 可信度系数表

可信度	Cronbach Alpha 系数
不可信	$\alpha < 0.3$
勉强可信	$0.3 \leq \alpha \leq 0.4$
可信	$0.4 \leq \alpha \leq 0.5$
很可信	$0.5 \leq \alpha \leq 0.9$
十分可信	$0.9 \leq \alpha$

本研究运用 SPSSAU 软件对问卷社会认同量表题的信度进行了检验，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涉及变量的量表共有15个题项，总体信度系数为0.902。参照可信度系数表可知，问卷社会认同量表整体信度好。

表3 可靠性分析

Cronbach α 系数	项数
0.902	15

2. 效度检验

本研究采用 KMO 样本测度(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和巴特莱特球形检验(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进行判断。对问卷的效度进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以看到问卷总体 KMO 值为0.928，效度很好，适合提取信息；Sig 值为0，表明有显著差异。

表4 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0.928
近似卡方	1340.754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自由度
	91
	显著性
	0

(二) 分析与结论

教育参观情况、传播内容和形式、沉浸式课堂参与均会对文化认同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分别以教育参观情况、传播内容和形式、沉浸式课堂参与为自变量，以青少年文化认同整体(包含文化知识、文化情感、文化行为)为因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及回归分析。整体文化认同度以文化认同三个维度的李克特量表题的平均值。

1. 文化认同分析：

(1) 以教育参观情况为自变量

为了解教育参观情况是如何对青少年文化认同产生影响，本研究将青少年的教育参观情况与青少年的文化认同进行回归分析，同时为了进一步考察参观教育情况对青少年的文化认同程度的影响，本研究还细化研究指标，对文化认同的三个维度进行了统计分析。

结果如表5所示，教育参观情况与整体文化认同度、文化知识、文化情感、文化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故 H1、H2、H3 成立。

表5 教育参观情况对青少年文化认同影响的回归分析

整体文化认同度	文化知识	文化情感	文化行为
---------	------	------	------

回归系数	0.435	0.282	0.385	0.477
显著性	<0.01	<0.01	<0.01	<0.01

(2) 以传播内容和形式为自变量

本研究将传播内容和形式同整体文化认同度及其三个维度进行回归分析, 得出结果如表 6 所示。传播内容和形式与整体文化认同度、文化知识、文化情感、文化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故 H4、H5、H6 成立。

表 6 传播内容和形式对青少年文化认同影响的回归分析

	整体文化认同度	文化知识	文化情感	文化行为
回归系数	0.534	0.478	0.507	0.615
显著性	<0.01	<0.01	<0.01	<0.01

(3) 以沉浸式课堂参与为自变量

本研究将沉浸式课堂同整体文化认同度及其三个维度进行回归分析, 得出结果如表 8 所示。沉浸式课堂与整体文化认同度、文化知识、文化情感、文化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故 H7、H8、H9 成立。

表 8 沉浸式课堂对青少年文化认同影响的回归分析

	整体文化认同度	文化知识	文化情感	文化行为
回归系数	0.574	0.467	0.489	0.767
显著性	<0.01	<0.01	<0.01	<0.01

2. 焦裕禄同志纪念馆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焦裕禄同志纪念馆的各部分对青少年文化认同的影响, 本研究将教育参观情况、传播内容与形式、沉浸式课堂与青少年整体文化认同度进行相关性分析, 同时采用 Fisher's r-to-z 变换检验判断差异是否显著, 探究三者间对青少年文化认同影响的差异。

表 9 教育参观情况、传播内容与形式、沉浸式课堂参与对整体文化认同程度的相关分析

	教育参观情况	传播内容与形式	沉浸式课堂参与
相关系数	0.435	0.63	0.69
显著性	<0.01	<0.01	<0.01

表 10 Fisher's r-to-z 变换检验

比较对象	r ₁ (n ₁)	r ₂ (n ₂)	Z	p	差异显著性
沉浸式课堂参与 vs. 传播内容与形式	0.690 (177)	0.630 (237)	1.126	0.26	无显著差异
传播内容与形式 vs. 教育参观情况	0.630 (237)	0.435 (237)	2.978	0.003	显著(p<0.01)
沉浸式课堂参与 vs. 教育参观情况	0.690 (177)	0.435 (237)	4.011	<0.001	高度显著(p<0.001)

结果如表 9, 表 10 所示, 相关性分析表明, 沉浸式课堂参与 ($r=0.690$, $n=177$, $p<0.001$)、传播内容与形式 ($r=0.630$, $n=237$, $p<0.001$) 和教育参观情况 ($r=0.435$, $n=237$, $p<0.001$) 均与整体文化认同度显著正相关。Fisher's r-to-z 变换检验显示, 沉浸式课堂参与同传播内容与形式的相关系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1.126$, $p=0.260$), 而传播内容与形式显著强于教育参观情况 ($z=2.978$, $p=0.003$), 沉浸式课堂参与亦显著强于教育参观情况 ($z=4.011$, $p<0.001$)。这表明沉浸式课堂参与和传播内容与形式在促进青少年文化认同方面具有更强的作用。

3. 结论

本研究以焦裕禄同志纪念馆为案例, 通过问卷调查法和实证分析, 探讨了红色教育基地对青少年文化认同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以教育参观情况、传播内容和形式、沉浸式课堂参与为自变量, 以青少年文化认同 (包括文化知识、文化情感、文化行为三个维度) 为因变量, 进行了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 结果验证了所有研究假设 (H1-H9)。基于数据分析, 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 教育参观情况对青少年文化认同的正向影响

数据显示, 教育参观情况与整体文化认同度、文化知识、文化情感和文化行为均存在显著正向关系。这表明, 青少年通过参与焦裕禄同志纪念馆的参观活动, 能够有效提升对红色文化的认知水平、情感共鸣

以及践行意愿。参观频次和活动参与度是影响文化认同的重要因素。

(2) 传播内容和形式对青少年文化认同的正向影响

传播内容和形式对整体文化认同度、文化知识、文化情感和文化行为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纪念馆的展品内容和空间设计通过直观的信息传递和叙事性布局,有效增强了青少年对焦裕禄事迹的理解、情感认同和行为倾向。丰富的展品和吸引人的设计是提升文化认同的关键媒介。

(3) 沉浸式课堂参与对青少年文化认同的正向影响

沉浸式课堂参与同整体文化认同度、文化知识、文化情感和文化行为均呈现显著正向相关。沉浸式课堂通过情景再现和互动体验,使青少年更深入地理解焦裕禄精神,激发强烈的情感共鸣,并显著促进其将红色文化内化为日常行为,尤其在文化行为维度上的影响最为突出。

(4) 不同教育方式对青少年文化认同影响的比较

相关性分析表明,沉浸式课堂参与、传播内容和形式和教育参观情况均与整体文化认同度显著正相关。Fisher's r-to-z 变换检验进一步显示,沉浸式课堂参与和传播内容和形式的相关系数无显著差异,但两者均显著强于教育参观情况。这表明,沉浸式课堂和传播内容和形式在促进青少年文化认同方面具有更强的效果,而传统参观活动的影响相对较弱。

综上所述,红色教育基地通过教育参观、传播内容和形式及沉浸式课堂参与,能够显著提升青少年对红色文化的知识积累、情感认同和行为实践,从而增强其文化认同感。其中,沉浸式课堂参与和传播内容和形式因其更高的相关性和回归系数,表现出更优的教育效果。这为优化红色教育基地的教育模式提供了实证依据。

四、对策与建议

(一) 强化沉浸式教育体验以提升文化认同

研究表明,沉浸式课堂参与对青少年文化认同的影响最为显著,尤其在文化行为维度上表现突出。沉浸式教育通过情景再现和互动体验,让青少年身临其境地感受焦裕禄精神的内涵,能够激发强烈的情感共鸣,从而深化他们对红色文化的理解与认同。为此,红色教育基地应优先发展沉浸式教育模式,设计多样化的课程内容,例如通过角色扮演、实地模拟等方式再现焦裕禄事迹。同时,结合虚拟现实(VR)等现代科技手段,增强教育内容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使青少年在参与中沉浸式体验文化价值。此外,提升教育者的专业能力至关重要,确保他们能够引导青少年在活动中形成文化归属感,并将红色文化内化为行为认同。这种方式不仅能显著提升教育效果,还能为青少年成长提供精神指引,培养其爱国情怀和责任意识。

(二) 优化传播内容与设计以增强文化传播效能

研究发现,传播内容与设计的优化对青少年文化认同的影响远超传统参观活动,是提升教育效果的关键因素。红色教育基地应改进传播方式,使焦裕禄事迹的呈现更加生动、直观。例如,通过丰富展品形式、优化空间布局,或融入多媒体技术和艺术化设计,营造引人入胜的参观氛围,引导青少年在参观中逐步建立情感联系,增强文化认同的深度与广度。此外,应顺应时代特点更新内容,将焦裕禄精神与当代社会价值相结合,贴近青少年生活实际。同时,拓展线上教育渠道,利用互联网平台开展直播参观、在线展览等活动,突破地域限制,让更多青少年接触红色文化。通过优化传播内容与设计,教育基地能够有效激发青少年对红色文化的兴趣,培养其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确保文化传播效能最大化。

综上所述,强化沉浸式教育体验和优化传播内容与设计是提升青少年文化认同的有效路径。这两项措施相辅相成,既注重教育过程的参与性,又强调传播形式的创新性,能够帮助青少年在实践中深化对焦裕禄精神及红色文化的认同,为其成长注入正能量。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 徐雪峰. 黑龙江省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用与开发研究[D].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2009.
- [3] 董锦娜,王红艳. 红色旅游对红色文化认同的影响机理研究——基于敬畏情绪的中介[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4,38(04):191-198.
- [4] 张超,苏士梅. 红色纪念建筑作为记忆媒介的复合空间叙事研究——以红旗渠纪念建筑为例[J].未来传

播,2024,31(02).10-19

- [5] 杜玉改. “使用与满足”视角下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的思考[J].传播与版权,2024,(01):100-102+106.
[6] 刘昱君. B 站陪伴式学播用户的使用与满足研究[D].中南大学,2023.
[7] 李天一. 沉浸式传播视角下的助眠类播客研究[D].中国传媒大学,2023.
[8] 喻国明. 未来媒介的进化逻辑:“人的连接”的迭代、重组与升维——从“场景时代”到“元宇宙”再到“心世界”的未来[J].新闻界,2021(10)54-60.

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red education bases on youth cultural identity——Taking the Comrade Jiao Yulu Memorial Hall as an example

Lu Haoxiang¹

¹Henan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Comrade Jiao Yulu Memorial Hall as a case study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red education bases on youth cultural identity and its mechanism of action. Based on the cognitive-emotional-behavioral model, this study divides cultural identity into three dimensions: cultural knowledge, cultural emotion, and cultural behavior. With educational visits, communication content and form, and immersive classroom participation as independent variables, data were collected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correlation and regression analyses were used to verify hypotheses. The study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optimizing the educational model of red education bases and enhancing youth cultural identity,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strengthening immersive education experience and optimizing communication content and design.

Keywords: Red culture; Red education base; Youth; Cultural identity; Comrade Jiao Yulu Memorial Hall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3.826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在文化创意产业中的应用与发展趋势研究

张彦清¹

(¹乌克兰国立大学, 乌克兰, 基辅, 01601)

摘要: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作为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重要成果，正逐步渗透并重塑文化创意产业的创作机制与传播生态。本文以文化创意产业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了 AIGC 的技术演进脉络与应用路径，聚焦其在影视、数字艺术、互动娱乐、广告营销、虚拟人等子领域的典型实践。通过案例剖析与归纳比较，探讨 AIGC 在提升内容生成效率、推动产业链重构、丰富文化表达方式等方面的优势，同时也深入分析其在版权归属、技术伦理、文化价值与平台治理等方面的潜在风险。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构建人机协作创作机制、完善法律伦理体系、推动开源生态建设与提升全民数字素养等对策建议，以期为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数智化转型提供参考依据与决策支持。

关键词: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文化创意产业；AIGC；技术伦理；产业变革

一、引言

在全球科技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尤其是大模型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加速演进，文化创意产业（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CCI）正处于一场深刻的范式变革之中。AIGC（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作为人工智能赋能内容生成的重要形态，不仅打破了传统创作的时间与成本边界，更在深层次上重塑了内容生产的主体结构与传播机制。该技术从实验性工具迅速成长为内容产业的新型基础设施，正逐步渗透至新闻传媒、影视制作、广告设计、游戏开发、数字艺术等多个文化子行业，成为推动文化生产智能化转型的关键驱动因子。

从内容生成模式来看，AIGC 与传统的 PGC（Professionally Generated Content）和 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相比，具备显著的“自动生成—快速扩展—个性适配”的优势。PGC 强调内容质量与专业度，UGC 则突出大众参与与互动性，而 AIGC 则基于大规模语言模型（LLM）、生成对抗网络（GAN）、扩散模型（Diffusion Models）等算法机制，依托海量数据训练与跨模态语义理解，实现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多模态内容的智能生成。在实际应用中，AIGC 不仅承担“创作助手”的角色，更逐步演进为“内容主体”，其创作速度、组合可能性与风格迁移能力远超人类单一创作者，从而拓展了文化内容的边界，也重塑了创作逻辑。

根据斯坦福大学“AI Index 2024”报告，AIGC 工具的使用频率和产业渗透率持续攀升。以 ChatGPT、Midjourney、Runway ML 等为代表的新一代生成平台，已被广泛应用于教育、营销、艺术、设计、娱乐等多个场景，形成从内容生成到商业变现的全流程服务体系。与此同时，国内的百度文心一言、阿里通义千问、字节豆包等本地化模型亦快速迭代，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数据语义与文化适配能力，推动 AIGC 在本土文化语境中的深度实践。

然而，技术的迅猛发展也伴随着多重挑战的显现。一方面，AIGC 在创作效率提升的同时，也引发了有关著作权归属、算法偏见、伦理操控与文化均质化等一系列争议。内容生成的“黑箱机制”难以溯源，导致法律适用范围模糊，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尚未能有效回应 AI 内容的权利分配与责任认定问题。另一方面，生成内容的泛娱乐化倾向可能弱化文化创意的精神深度与人文关怀，造成“技术驱动优于价值引领”的偏颇。因此，如何在推动 AIGC 赋能文化创意的同时，实现技术合理应用与价值有序治理之间的平衡，已成为学界与产业界亟待回应的核心议题。

此外，AIGC 还对文化创意产业的产业链条产生深远影响。内容创作、制作、分发与消费等各环节正向自动化、平台化与个性化方向发展，原有的“内容—媒介—受众”三元互动模型，正逐步演化为“算法—平台

作者简介: 张彦清(1997—)，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现代文化产业管理。

—用户”驱动的新型传播生态。在此过程中，算法平台不仅作为技术工具，更成为掌控流量分配与内容曝光的话语中枢，对创作者、内容类型与舆论风向形成强力影响。这种“平台中介化”趋势虽提升了内容效率，却也对中小创作者的生存空间、多样化表达与文化公平性构成潜在威胁。

综上所述，AIGC 技术作为文化创意产业转型的重要引擎，既带来前所未有的创造力解放，也伴随深刻的制度重构与价值博弈。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以下三个维度展开分析：一是梳理 AIGC 的核心技术逻辑与演化路径，明确其生成机制与产业基础；二是剖析 AIGC 在文化创意各细分领域中的典型应用实践，揭示其赋能模式与平台机制；三是结合政策法规与伦理治理，提出构建开放、包容与负责任的 AIGC 发展路径，以期为数字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二、AIGC 的技术逻辑与演化脉络

AIGC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 的兴起，标志着人类进入以“生成能力”为核心的新技术纪元。其本质是人工智能从“感知世界”迈向“再创造世界”的关键转变，背后蕴含着多种技术体系的融合演化，尤其以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与跨模态学习为基础的生成模型最具代表性。本节将系统梳理 AIGC 的关键技术构成与发展阶段，从核心模型演进、算法架构升级、数据支持体系到应用接口生态进行深入分析。

(一) 关键技术构成

1. 自然语言处理 (NLP) 与大型语言模型 (LLM)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是 AIGC 的语言理解与生成核心。近年来，以 Transformer 为基础架构的预训练模型（如 GPT、BERT、T5）已成为主流。这类模型依托大规模文本语料进行无监督学习，通过上下文建模能力实现语言语义、逻辑、风格的高度模拟，具备写作、摘要、翻译、对话、问答等多种能力。GPT-3 与 GPT-4 的出现使语言生成能力跨入“类人”阶段，其规模分别达到 1750 亿与万亿级参数，支持 Zero-shot 与 Few-shot 学习，使得 AIGC 生成的文本更加流畅自然，风格多样。此外，ChatGPT 通过 RLHF（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机制增强对话自然性与安全性，成为文本 AIGC 应用的重要分水岭。

2. 图像生成模型

图像内容生成方面，主要依赖生成对抗网络 (GAN)、变分自编码器 (VAE) 与扩散模型三大类。其中，GAN 由生成器与判别器构成，通过博弈训练逐步生成逼真图像，是早期图像 AIGC 的主力；VAE 则通过概率图模型构建编码-解码结构，注重潜空间结构解释性；近年来，扩散模型（如 Stable Diffusion、Imagen、DALL·E 2）逐渐成为主流，其训练过程通过添加与去噪“逐步重建图像”，生成质量与控制能力显著优于传统 GAN。以 DALL·E 系列为例，其可实现从“文本到图像”的直接生成，通过 CLIP 对图文语义的嵌套学习，实现高质量的语义图像映射；而 Stable Diffusion 则以开源、可控、低资源部署等优势，成为社区最活跃的 AIGC 图像工具。

3. 多模态建模技术

多模态生成是 AIGC 的未来方向，其核心在于实现跨语言、图像、音频等异构模态的信息对齐与融合。当前主流的跨模态模型如 Flamingo、GIT、PaLM-E 等，已经具备“图文对话”、“视频问答”、“图生文”、“文生视频”等复杂交互能力。Sora 作为视频生成领域的代表，可通过单一提示词生成连续帧结构的高分辨率动态影像，并保持时空一致性、物理逻辑与镜头语言的一致性。Make-A-Video、Phenaki 等技术则通过扩散模型+Transformer 架构，融合图像生成与时间建模模块，实现短时长的视频生成。

音频领域，Jukebox、AudioLM 与 MusicLM 等模型使得 AIGC 能够生成音乐、语音、音效等多类型音频内容，其在配乐、配音、音频创意等方面的应用潜力不断扩大。

4. 提示词工程与语义引导机制

提示词 (Prompt) 作为 AIGC 创作的“指令语言”，成为影响生成效果的核心要素之一。近年来，“提示词工程 (Prompt Engineering)”成为新兴技术门类，研究如何通过设计结构化、情境化、任务导向的 Prompt，实现对生成内容的引导与控制。例如，“ChatGPT + Chain-of-Thought Prompting”可以引导模型进行逐步推理；而“Midjourney + 风格嵌入提示词”可精准控制图像的画风、配色与构图逻辑。这一发展趋势反映出 AIGC 正在从“被动生成”走向“用户协同创造”的新阶段。

(二) 发展阶段概览

AIGC 的技术演化呈现出“模型驱动—多模态融合—平台生态化”的三阶段特征。

1. 探索期 (2014—2017)

该阶段以 GAN 的提出与早期图像生成实验为主。2014 年，Goodfellow 首次提出生成对抗网络，为内容生成打开了新路径。2015 年~2017 年间，各类变种 GAN（如 DCGAN、Pix2Pix、CycleGAN）逐步实现图像合成、风格迁移、图像上色等功能，但受限于训练不稳定、生成模糊等问题，尚未形成实际应用生态。

2. 成长期 (2018—2020)

进入 Transformer 主导时期, NLP 领域涌现出 BERT、GPT-2 等大模型, 模型规模从千万级上升至百亿级, 开始支持零样本与小样本迁移。文本生成质量大幅跃升, 文本 AI 助手、写作工具、翻译系统等初步商业化。

图像生成方面, StyleGAN (2019) 实现高分辨率人脸生成, DALL·E 原型发布, 引发“文本到图像”风潮。音乐生成、语音合成等也初步展开探索, 为多模态融合奠定技术基础。

3. 跃迁期 (2021—至今)

该阶段标志着 AIGC 全面商业化落地。OpenAI 的 GPT-3 与 ChatGPT 引发生成式 AI 热潮, 模型参数超过千亿级; DALL·E 2、Imagen、Stable Diffusion、Midjourney 等图像生成平台相继推出; Meta、Google、Microsoft 等纷纷构建 AI 生成工具矩阵。

与此同时, 各类插件接口 (API)、网页工具 (SaaS)、创作平台 (如 Notion AI、Adobe Firefly) 构成完整的“生成即服务”生态。开源项目如 Hugging Face、OpenMMLab 为研究者和开发者提供丰富资源与接口, 推动 AIGC 从“科技试验”迈向“通用工具”。此外, 随着多模态融合趋势增强, GPT-4、Claude、Gemini 等模型不仅支持文本输入, 更逐步支持图像、语音、视频理解与生成, 推动“AGI 预备阶段”的理念形成。

(三) 平台生态与开源格局

在 AIGC 技术的发展过程中, 平台生态的构建与开源社区的推动发挥了关键作用, 形成了全球范围内多元协同的产业格局: 一方面, OpenAI、Google DeepMind、Meta、Anthropic 等科技巨头依托强大算力与算法能力, 主导了语言模型与多模态模型的标准制定和 API 输出; 另一方面, Canva AI、Adobe Firefly、Runway ML 等商业平台将 AIGC 嵌入创意办公场景, 降低内容创作门槛, 实现“低门槛+高效率”的生产机制。同时, Hugging Face、Stability AI 等开源社区持续推动模型与工具链的开放共享, 提升了全球范围的技术普惠性。尤其在中国, 百度文心一言、阿里通义等本土大模型正加速推进中文语义适配与本地化部署, 构建“国产 AIGC”产业路径。

AIGC 技术正沿着“模型规模化—算法融合化—场景多模态—平台服务化”的方向演进, 未来将朝向普惠共享、智能协同与创意驱动的综合平台基础设施发展, 成为文化创意产业数字化升级的重要底座。

三、文化创意产业的 AIGC 应用生态

在数字化浪潮与智能化变革的推动下, 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以创意为核心、以内容为载体、以科技为引擎的复合型产业体系, 正成为 AIGC 落地应用最活跃的前沿阵地。AIGC 不仅赋予传统创作环节以算法生成能力, 更通过对视觉、听觉、语义等多模态内容的重构, 深刻影响了内容创作逻辑、用户交互体验以及产业链条结构。

影视行业向来是文化创意产业中对技术极度敏感与依赖的领域。AIGC 技术正在从“辅助创作”逐步走向“协同主创”, 在剧本撰写、场景设定、镜头分镜、台词生成、角色动作设计、后期渲染等多个环节中实现全面嵌入。以 Sora 为代表的文本到视频生成模型, 可根据自然语言描述生成拟真度极高的视频片段, 极大缩短预演制作周期, 降低中小制作团队试错成本。例如, 在剧本创作阶段, 基于 GPT-4 或 Claude 等语言模型的剧本生成工具可以完成情节架构、人物对白与背景描写的初稿生成, 助力编剧团队快速完成多版本初稿对比。在分镜设计与情绪板制作方面, AI 可将脚本转换为图像草图, 自动推荐镜头长度、拍摄角度与灯光布置, 实现前期预设的可视化。在后期合成方面, AI 语音合成与换脸技术已逐步应用于配音、口型匹配、CG 角色渲染等环节, 典型案例如《曼达洛人》中数字卢克的再现。这一趋势催生了“AI 影视制作管线”的新范式, 为低成本影视创作、虚拟制作 (Virtual Production) 与沉浸式剧场提供技术基础。

AIGC 为视觉艺术创作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想象力与生产力。图像生成模型如 Midjourney、DALL·E、Stable Diffusion 使艺术创作摆脱对手绘技巧的高度依赖, 仅需输入文本描述, 即可生成具有独特风格的视觉作品。这种基于提示词 (Prompt) 的创作模式, 使艺术家从“技能操作者”转向“理念指导者”, 极大拓宽了大众艺术创作边界。艺术家通过 AIGC 可实现风格迁移、元素重构、动态合成、色彩仿真等功能, 形成新型视觉表达语言。例如, AI 可以模仿梵高、毕加索、草间弥生等艺术大师的风格生成作品, 亦可将现实照片重构为赛博朋克、浮世绘等审美体系的图像。在设计产业中, AIGC 已深度嵌入到广告创意、包装设计、界面设计 (UI/UX) 等流程中。Canva AI 提供的 AI 设计助手, 可在用户输入产品属性后生成完整的广告文案与主视觉图稿; Adobe Firefly 则支持智能补全、图层分离、图文融合, 提升效率的同时拓展创意思维边界。

同时, “AI+NFT”艺术形式的兴起亦为数字艺术带来新的价值机制。艺术家通过 AI 生成系列作品并在区块链平台上铸造成 NFT, 不仅保障作品版权, 还形成“数字收藏—社区传播—艺术金融”的新生态。

游戏、动漫、沉浸式叙事与虚拟现实是 AIGC 应用增长最快的子领域之一。当前主流的 AI 游戏工具如 AI Dungeon、Inworld AI、Charisma AI 等已实现角色性格塑造、动态对话生成与剧情自动推进, 用户与 AI 角色之间的互动超越既定脚本, 转向“开放式剧情生成”, 增强了游戏沉浸感与再玩性。

AI 可根据玩家行为实时生成支线任务、对话响应与场景内容, 为游戏开发者节省大量脚本设计与程序配置工作。例如, Ubisoft 等大型工作室已部署 AI 工具进行关卡设计与剧情测试, 使 AI 成为“内容伴创者”。

在 VR/AR 领域, AIGC 可协助构建复杂三维虚拟环境。通过“文本生成 3D 模型”的技术, 开发者可在元宇宙空间中快速生成交互式场景, 应用于沉浸式展览、教育模拟与文旅导览等。未来, 随着图形渲染与交互引擎的协同优化, AIGC 将在 Metaverse 内容生态中扮演“世界生成器”的角色。

AIGC 改变了广告的制作方式与传播逻辑, 核心在于“内容自动生成+精准用户定制”。传统广告制作周期长、成本高, 难以快速响应市场变化; 而 AIGC 可依据用户画像、消费偏好、地域文化等变量, 自动生成不同版本的广告文案、视觉图像乃至短视频。典型平台如 Runway ML、Copy.ai、Jasper AI、DeepBrain 等支持多语言、多平台、多形式的内容输出, 使中小企业无需聘请广告团队也能完成品牌推广与社交媒体运营。以 Facebook Ads 为例, AIGC 已被整合进动态广告组件, 用于实时组合标题、描述、配图, 提高点击率与转化率。此外, AI 驱动的 A/B 测试和多版本内容生成能力使品牌可以“用数据说话”, 通过短时间内大量试验获取用户反馈, 从而形成“生成—投放—优化”的闭环营销策略。未来 AIGC 将进一步整合眼动追踪、情绪识别等感知技术, 实现“情绪驱动型广告”的智能生成。

数字人 (Digital Human) 与虚拟偶像是 AIGC 应用的高端形态, 其综合运用了语音合成、表情迁移、动作捕捉、三维建模等前沿技术, 具备高仿真度、持续在线与情绪表达能力, 广泛应用于直播、带货、品牌代言、数字导览、教育陪伴等场景。

当前国内代表如 AYAYI、柳夜熙, 国际上如 Lil Miquela、Imma 等, 已形成成熟的虚拟 IP 商业模式, 涵盖时尚走秀、影视出演、游戏联动、实体联名等多种形式。AIGC 在此过程中的作用包括但不限于: 生成互动剧本、语音内容、动作指令、场景视觉等, 是“虚拟人格构建”的关键支撑。

在 IP 孵化方面, AIGC 可辅助完成角色背景设定、视觉风格统一、衍生故事拓展等工作, 实现“内容-形象-商业-社群”的一体化构建逻辑。数字人未来将在政务宣传、文博导览、教育问答等领域实现大规模落地, 成为人与 AI 共处的媒介界面。

四、AIGC 驱动下的产业结构转型

随着 AIGC 技术在文化创意产业中的深度渗透, 其不仅催生了一系列新型创作工具和内容形态, 更对整个产业结构、创作生态及消费逻辑产生了显著冲击。传统依赖手工创作与线性分工的模式正在让位于以算法驱动为核心的协同型、平台型、数据导向型新模式。

AIGC 实现了文化内容创作模式的根本变革。传统内容创作以人工构思与手工执行为主, 强调创作者的经验、技巧与艺术直觉。AIGC 的出现, 使创作者通过“提示词驱动”即可调用模型生成初稿或作品草图, 在写作、绘画、音乐、视频等多个领域极大提高了创作效率与灵感迭代速度。

提示词工程 (Prompt Engineering) 正逐渐成为核心创作能力。以 ChatGPT、Midjourney 为代表的内容生成平台, 使创作者无需深度编程知识, 即可通过精细化语言设计获得期望作品, 这一模式拓宽了内容创作的参与边界, 推动“人人皆可创作”的实现。例如, 教育工作者可借助 AI 自动生成教学视频脚本; 新闻编辑可以快速生成新闻摘要与导语; 设计师借助 AI 图像工具形成多版本初稿进行比选。

同时, AIGC 催生出如“提示词工程师”“AI 艺术策划”“模型微调设计师”等新兴职业。这些岗位对创意逻辑、数据理解与人机交互有更高要求, 标志着文化创意产业正向技术复合型人才结构转型。传统艺术创作者的身份也在发生转变——他们不再是孤立的创意源头, 而是 AIGC 系统的调度者、审美引导者与内容把关人。

值得注意的是, AIGC 创作方式的变革并非完全取代人工创意, 而是推动人机协同的融合范式。创作者从具体执行中解放出来, 转向更具抽象性与战略性的创意构建与作品指导角色。

AIGC 的引入打破了传统文化创意产业“内容创作—生产加工—内容分发—受众消费”的线性链条, 形成以平台为中心、技术为驱动的模块化协作网络。产业参与者不再依据职能分层协作, 而是在内容生成平台中通过 API 接口、数据调用、模型接入等方式形成动态价值共创机制。

以图像内容产业为例, 过去一幅商业海报的生产往往涉及文案策划、插画师、摄影师、排版设计师等多方协作, 而现在借助 Canva AI 或 Adobe Firefly, 用户只需输入关键词, 平台即可调用图像模型、排版模板与风格滤镜一站式完成内容输出。这意味着平台方、算法方与用户共同构成“内容生产共同体”, 传统分工被高度整合与压缩。大量中小型内容服务公司转向以“模型调用+服务定制”的方式嵌入到产业链之中, 形成“内容即服务 (Content-as-a-Service, CaaS)”的新商业模式。在这一模式下, 平台提供底层算力与模型能力, 内容服务商基于客户需求完成提示词编排、输出审核与优化定制。然而, 平台主导型结构也带来了内容话语权的集中风险。一方面, 平台算法对作品曝光度、传播路径甚至审美倾向的控制力增强; 另一方面, 创作者的收入机制日益依赖平台流量逻辑, 可能削弱其内容独立性与艺术实验性。这要求在平台治理与算法透明方面建立更加平衡的规则体系。

IGC 技术使文化产品的供给方式从以内容方为中心的单向推动转变为以用户为中心的即时响应。在传

统媒介中，内容制作具有周期性与不可逆性，创作者往往依赖经验判断用户偏好，形成“先生产后消费”的流程；而在 AIGC 加持下，内容生成可实现按需定制、实时调整，构建出“边消费边生成”的互动模式。这一变化首先体现在社交媒体内容的定制化生成上。例如，品牌主可依据受众兴趣标签生成个性化短视频广告；教育平台依据学生学习记录动态推送定制化讲义；新闻平台基于用户兴趣图谱由 AIGC 自动摘要、重写新闻事件，使其更具贴合度与可读性。其次，AIGC 驱动“长尾内容”的规模化供给。过去由于人力与成本限制，内容创作往往聚焦大众题材与主流审美，而如今，AI 可以实现垂类兴趣内容的高频次、高效率覆盖。例如，小语种翻译文学、小众文化亚文化、个性化表情包、私人回忆视频等，都可通过 AIGC 自动生成与分发，提升内容的文化多样性与表达权利平等。此外，用户身份也从“内容接收者”转向“内容共创者”。在众多 AIGC 平台中，用户通过与 AI 交互输入提示词、调整风格参数、选择审美导向等方式介入创作过程，实现“参与即生产”的内容生成逻辑。这种“去中心化内容协同”正形成新的文化消费范式。

五、AIGC 面临的核心挑战与治理路径构建

随着 AIGC 技术在文化创意产业中的快速拓展，其生成内容所展现出的创新潜能与效率优势已成为数字内容生态的重要增长极。然而，这一技术也带来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法律、伦理、文化与市场结构问题。当前，AIGC 技术仍处于“高速演进—规则滞后”的阶段，内容生成责任不明、信息传播失控、文化表达趋同与平台垄断倾向日益突出。为确保技术发展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与文化多样性，必须构建起系统化、可执行的治理机制与政策支撑体系。以下从挑战识别与对策建构两方面展开综合分析。

（一）版权归属与知识产权认定难题

AIGC 内容的创作主体模糊不清，是当前法律实践中的首要难题。传统著作权制度基于“创作行为的人身性”逻辑，即创作人需具有自然人身份，体现主观能动性与独创性。而 AIGC 生成的文本、图像、音频等内容，是由算法模型基于用户提示、训练数据与概率分布自动完成的，难以套用现有的“作者-作品”归属逻辑。目前各国司法实践尚未形成统一标准。美国版权局曾裁定“完全由 AI 生成的作品不得享有版权”，但亦有学者主张算法开发者或提示词设计者可被视为共同创作者。中国在《著作权法》《民法典》中暂未对“AI 生成内容的著作权归属”作出明确规定。在此背景下，需推动立法或司法解释明确以下几点：1) 如何界定“算法辅助”与“算法主导”的边界；2) 提示词是否构成创作实质贡献；3) 数据训练者是否享有数据成果的权利预期；4) 平台方是否对 AIGC 内容承担版权义务。建议设立“算法署名”“生成声明”等法律制度，并推行“版权注册+内容溯源”机制，以提升 AIGC 作品在流通过程中的法律确定性。

（二）虚假信息传播与伦理风险扩散

AIGC 的内容生成能力同样被用于制造伪造新闻、恶意图像、合成语音、虚构视频等信息干扰手段，显著加剧了数字传播环境中的“真实性危机”。尤其是“深度伪造”（deepfake）技术，已被广泛用于政治操控、网络诈骗、网络暴力等非法行为，严重扰乱舆论生态与公众判断力。

这类风险的技术根源在于模型训练数据的不透明与输出逻辑的不可预测性，加之当前平台内容审查机制滞后，使得虚假内容的生成与传播呈现“高效、低成本、难识别”的特征。

（三）文化内涵弱化与审美趋同现象

尽管 AIGC 在形式上实现了内容的多样性，但由于其训练数据多来源于主流语料与视觉模板，导致生成内容趋向“平均化”“标准化”。这种文化“低语境化”的趋势，容易削弱作品的思想深度、在地性元素与文化温度。更为严重的是，一旦生成模型基于“数据偏好最大公约数”进行内容输出，可能会压制非主流文化、少数民族语言、区域性艺术风格的表达，造成“审美收敛”与“文化同质化”现象，从而侵蚀文化多样性基础。

（四）模型垄断与平台话语权集中

当前全球高质量 AIGC 模型高度集中于少数科技巨头，包括 OpenAI、Google DeepMind、Meta、Anthropic 等。这些企业不仅控制着底层算力资源、模型参数优化与用户接口，还掌握着模型训练语料、市场定价权与内容审核机制，形成事实上的“算法霸权”。在平台经济结构中，这种“模型垄断+平台统筹”的双重优势，使得中小创作者、创业团队甚至国家级平台难以与之竞争，导致文化创意产业的权力结构进一步向中心化倾斜。

（五）应对策略：构建多元协同的治理机制

基于上述挑战，AIGC 治理不能仅依赖行政命令或单一监管部门介入，而应构建“政府引导+行业自治+公众参与+技术协同”的多维治理结构，具体策略包括：

1. 建立“人工创意引导—AIGC 生成—人工复审优化”三位一体创作机制，既保留人类创意判断，又提升

内容生成效率。推动创作者转型为“创意指导+AI 调用+价值审核”的新型岗位群体。

2.修订《著作权法》《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等相关法律,引入“生成声明”机制,明确提示词设计者与平台方的权利义务。同时,设立 AIGC 内容伦理审查标准,强化平台方的内容质量把关责任。

3.推动建立国家级 AIGC 数据资源中心,提供高质量语料、图像、音视频等训练数据集,支持模型评估测试平台建设。对优质开源模型进行政府补贴与评优激励。

4.将 AIGC 纳入信息素养教育体系,在中学、高校、职业培训中开设提示词编写、模型调用、伦理判断课程,培养“数字创意力+技术应用力”兼备的新型人才队伍,避免“技术工具化、审美空心化”的风险。

六、结语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作为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重要应用形态,正深刻改变文化创意产业的内容生产模式、产业协同机制与用户交互逻辑。AIGC 在影视、数字艺术、互动娱乐、广告传播和虚拟人等多个子领域快速落地,显著提升了创作效率、丰富了表达手段,并催生“提示词工程师”“AI 创作策划”等新型职业形态,推动文化创意从“手工生成”迈向“算法协同”的新时代。与此同时,AIGC 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挑战:生成内容的版权归属与法律主体不明确,虚假信息传播与伦理风险难以防控,训练数据同质化引发文化表达趋同,技术与平台资源集中化加剧模型垄断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对创作者权利、内容安全、文化生态构成威胁,也对法律制度与产业治理能力提出新的要求。因此,本文建议从四个方面构建 AIGC 发展的治理机制:一是鼓励人机协同创作机制,强化人工创意与算法生成的融合关系;二是修订版权法规,确立“算法署名”“生成声明”等权利义务认定框架;三是建设国家级开源模型与数据平台,打破技术壁垒,推动生态多元;四是强化全民 AIGC 素养教育,提升内容辨识能力与创意能力。唯有技术演进与制度创新同步发力,才能实现 AIGC 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深度赋能与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 蔡子凡,蔚海燕.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的演进历程及其图书馆智慧服务应用场景[J].图书馆杂志,2023,42:34
- [2] HU ZIYANG. AIGC Related Context: A New Communication Culture For Human[J].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Art Studies, 2024, 14:921-931
- [3] 刘邦奇,聂小林,王士进,等.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未来教育形态重塑:技术框架,能力特征及应用趋势[J].电子教育研究,2024,45
- [4] 庄冬冬,任若安,孙捷.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赋能服装品牌数智化转型路径研究[J].丝绸杂志,2024,61
- [5] 张静蓓,虞晨琳,蔡迎春.人工智能素养教育:全球进展与展望[J].图书情报知识,2024,41:15-26
- [6] 李白杨,白云,詹希旎,李纲.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的技术特征与形态演进[J].图书情报知识,2023,40:66-74
- [7] TAN M. Reflection on the Value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J]. Journal of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anagement Science, 2025, 5:42-47
- [8] 杨宗凯,王俊,吴砥,陈旭.ChatGPT/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教育的影响探析及应对策略[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41:26
- [9] 詹希旎,李白杨,孙建军.数智融合环境下 AIGC 的场景化应用与发展机遇[J].图书情报知识,2023,40:75-85
- [10] LOU Y. Human creativity in the AIGC era[J]. She Ji: The Journal of Design, Economics, and Innovation, 2023, 9:541-552
- [11] 郑世林,姚守宇,王春峰.ChatGPT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影响[J].产业经济评论,2023,3:5-21
- [12] 郭振华,申宰旭.AIGC 视域下文化遗产文创产品设计路径研究——以山西地域为例[J].设计,2025,10:13
- [13] 黄江杰,汤永川,孙守迁.我国数字创意产业发展现状及创新方向[J].中国工程科学,2020,22:55-62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 (AIGC) in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Yenching Zhang¹

¹ *Drahomanov National Pedagogical University, Kiev, Ukraine*

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 (AIGC), as an important achievem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recent years, is gradually penetrating and reshaping the creation mechanism and communication ecology of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Taking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technical evolution context and application path of AIGC, focusing on its typical practices in sub-fields such as film and television, digital art, interactive entertainment, advertising marketing, and virtual humans. Through case analysis and inductive comparis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dvantages of AIGC in improving content generation efficiency, promoting industrial chain reconstruction, and enriching cultural expression methods.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deeply analyzes its potential risks in copyright ownership, technical ethics, cultural values and platform governance.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such as building a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ve creation mechanism, improving the legal ethics system,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n open source ecosystem, and improving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all people,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basis and decision-making support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my country's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Keywords: AIGC;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AIGC; technological ethics;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3.818

论《韩非子》对《左传》战争素材的改造策略及其思想史意义

李显坤¹, 钱嘉怡¹

(¹ 西北师范大学,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 本文聚焦于《韩非子》对《左传》战争素材的改造策略及其思想史意义。《左传》以“礼”为纲, 构建了涵盖战前合法性赋予、战中暴力约束、战后道德评判的战争叙事结构, 展现春秋时期重礼风貌。而《韩非子》则通过“选择性截取”与“去道德化重构”的改造策略, 对城濮之战、鄢陵之战等战争素材分析, 批判其不合时宜礼制, 将《左传》战争素材转化为法家思想论证工具, 进而确立法家战争叙事体系。同时, 探讨儒家思想在核心价值、人性认知、秩序建构等方面的冲突, 阐述《韩非子》改造《左传》战争素材在思想史方面的意义, 即: 推动法家理论系统化与实用化、革新历史解释模式、解构传统礼制伦理与重构社会治理逻辑。

关键词: 《左传》; 《韩非子》; 战争素材; 改造策略; 思想史

《左传》与《韩非子》分别代表先秦史学与法家思想的最高成就。前者以“礼”为纲, 构建道德化的战争叙事; 后者以“法”为本, 将历史事件转化为“法、术、势”的支撑材料。本文通过文本分析, 探讨《韩非子》对《左传》战争素材的改造策略及其思想史意义。

一、礼制规范下的战争叙事结构

《左传》战争叙事是以周代礼乐文明为根基, 构建了一套以“礼制”为纲领的叙事框架。其战争书写并非单纯记录军事行动, 而是将战争嵌入礼制规范之中, 展现春秋战争的重礼风貌。在《左传》的战争叙事中, 对礼制的叙述堪称贯穿始终, 也必然将自己潜在的立场与价值取向渗入行文之中。尤其是在重要战争叙事中, 基本形成“战前—战中—战后”的完整闭环。

(一) 战前: 礼制赋予战争合法性

春秋时期的战争讲究师出有名则直, 师出无名则曲。出兵必有正当的理由, 无正当理由难以出师, 体现了对师出有名的重视。出师须遵照尊王、尊盟主、亲夏远夷、不伐丧、不讨有礼、不伐无罪等原则, 不守礼亦成为重要的征伐原因, 诸侯之间的以师相救也是礼的体现。《左传》中每一场重大战役的爆发, 均需通过特定礼仪程序获得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包含两层意涵:

其一, 确认军事行动的正当性。《左传》曾记载“凡师有钟鼓曰伐, 无曰侵, 轻曰袭。”^[1]强调出师之前, 要备齐钟鼓, 公开讨伐敌国的理由, 以树立大义的名分。如鲁隐公九年, 《左传》记载:“宋公不王。郑伯为王左卿士, 以王命讨之, 伐宋。”^[2]郑庄公身为周王室的卿士, 便是通过讨伐宋国对周天子的冒犯, 来树立自己的有礼, 彰显其“尊王攘夷”的政治姿态。又如晋国在城濮之战前举行“大蒐礼”, 僖公二十七年, 《左传》记载:“于是乎蒐于被庐, 作三军, 谋元帅。”^[3]通过演习选拔将领、整饬军纪, 暗示其军事行动符合周礼“天子六军, 诸侯三军”的等级规范。这类仪式不仅具有军事训练功能, 更能通过“礼”的程序将战争合法性内化为道德共识。

其二, 获取神权与祖灵的庇佑。春秋各国遇到战事, 首先要占卜、祈祷。通用龟卜来决定是否进行战争、预测对各国战争的吉凶如何, 祖先是否庇佑。此类卜筮行为将胜负归因于天命, 而非单纯军事强弱, 进一步凸显礼制框架下战争的“神圣性”。例如:《左传》僖公十五年, 秦晋韩原之战前, 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 得“归妹之睽”, 史苏预言“不吉”, 暗示后来战争结局。僖公二十五年, 王子带之乱, 晋文公使卜偃卜纳王之战, 得到的结果是:“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4], 但事关重大, 于是又进行了筮, 结果也为吉,

作者简介: 李显坤(2001—), 男,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先秦文学与文化;

钱嘉怡(2002—), 女, 西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社会工作、先秦文学与文化。二位作者不分先后, 皆是第一作者。

因而下决心帅师纳王。此外，战前还会通过“告庙礼”等将军事征伐与祖先意志绑定，将战事告知祖先以祈求祖先的庇佑，表示遵从祖先之命出征，使战争从世俗冲突升华为“代天行罚”的正义之举。例如：鲁隐公十一年，“郑伯将伐许，授兵于大宫。”^[5]鲁庄公八年，“治兵于庙，礼也。”^[6]鲁庄公四年，楚武王斋戒以“授师子焉”。

（二）战中：礼制对暴力行为进行约束

在两军相争的战场上，礼制亦发挥着重要影响。春秋时期的战争虽不可避免，但贵族阶层仍试图以礼制约束暴力，形成独特的礼制规定，传达对战争的价值取向，宣扬一种克制守礼的战争观念。

第一，不可以下犯上。当在战争中遇到敌方的国君时，不可因追求胜利便忽视君臣界限，一定要保持克制守礼。例如：桓公五年，周天子率师讨伐郑庄公时，郑将祝聃在射伤周桓王后，请求追击，被郑庄公制止，强调“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7]以示不敢以下犯上。除了面对周天子时不可以冒犯失礼，在遭遇诸侯国君主时，《左传》亦强调要恭谨执礼，例如：成公十六年，晋楚鄢陵之战，“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8]郤至多次在战场中遇见楚共王，皆有礼觐见。韩厥在回应下属应该追击郑成公的建议时，亦强调“不可以再辱国君。”^[9]可见，在《左传》的叙述中，即便是在两军相争的战场上，并非一片混乱无序的状态，同样需要遵循“不可以下犯上”的礼制规范。

第二，不可灭国。例如：僖公二十二年，《左传》记载：“伐邾，取须句，反其君焉，礼也。”^[10]在取得胜利后，鲁国便有礼地将俘获的国君送还，表现出对当时战争礼制的遵循。再如：隐公十一年，郑庄公在攻克许国后，亦没有借机吞并对方，而是强调：“吾子其奉许叔以抚柔此民也，吾将使获也佐吾子。”^[11]将国政交还于许人，以示自己并没有灭国之心。这一合礼的行径得到《左传》的大肆赞赏：“郑庄公于是乎有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12]

第三，不重伤，不擒二毛，不以阻隘也。僖公二十二年泓水之战中，宋襄公与楚军于泓水旁交战，期间，宋司马两次抓住楚军在渡河中及渡河后阵型散乱的机会，建议宋军出击，均遭到宋襄公的拒绝。宋襄公坚持“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13]。其实宋襄公坚守的“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的原则，与晋军将领在鄢陵之战中坚持的“不可以再辱国君”的理念并无本质区别，都是当时战争中礼制规范的内在要求。不对已受伤的敌人进行二次伤害，不俘虏头发斑白的老者，禁止利用地形优势突袭未列阵之敌。值得注意的是，此类礼制应与贵族身份密切相关。春秋战争多为车战，从车战制度看，春秋战争多为贵族车战，作战双方需列阵后以战车对冲，偷袭将被视为破坏规则。即使宋襄公战败，仍被《公羊传》评价为“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14]。

（三）战后：礼制框架下的进行道德评判

在《左传》的战争叙事中，对礼制的叙述堪称贯穿始终。在大战之后，《左传》关于战争叙事并没有结束。战争结束后，《左传》常以“春秋笔法”“君子曰”“仲尼曰”等形式进行总结，其评判标准始终围绕礼制展开。

第一，献捷。例如：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战，晋文公虽取胜，但《左传》更强调其“君子谓是盟也信，谓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15]。因其战后“献楚俘于王城，行饮至之礼”，恪守“尊王”之礼。周襄王赐其“彤弓一，彤矢百”。《左传》着重突出行礼时周王室及晋文公双方所采用的礼节，对其赞曰。又如：庄公三十一年，齐国在取胜后，向鲁国献捷，《左传》记载：“齐侯来献戎捷，非礼也。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诸侯不相遗俘。”^[16]献捷礼只应在诸侯与周王间进行，诸侯之间不应互相献捷对这一非礼的行径予以明确地批判。

第二，援助。“凡侯伯，救患、分灾、讨罪，礼也。”^[17]春秋战争中诸侯间的援助是礼的重要体现。诸侯间相救，有时救盟国或附属国，有时救同姓、救邻国，而救护周天子更是其义务所在。王子颓、王子朝之乱都有众诸侯勤王。例如：鲁成公十五年，晋侯因曹成公杀宣公太子自立而讨曹成公。鲁襄公元年，诸侯为宋讨其叛臣鱼石等。齐桓公曾救鲁乱，杀哀姜，后又与诸侯救邢、卫。诸侯间的相互救助虽有称霸、管理诸侯事务、承担义务、唇亡齿寒等因素，也不乏礼义温情的成分。

战后道德总结评判，不仅是对战役结果的评价，更是对礼制存续的焦虑。正如昭公二十五年《左传》所言：“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18]当战国时代礼崩乐坏，《左传》的叙事结构实际上成为儒家对理想社会秩序的追忆。

二、《韩非子》对《左传》战争素材的改造策略

《韩非子》对《左传》战争叙事的征引，并非简单复述历史，而是通过“选择性截取”、“去道德化重构”的策略，将历史素材转化为法家思想的论证工具。这一改造过程既体现战国时期法家对传统史学的解构，需以现实需求为导向重构历史叙事，也彰显其“以史证法”的实用主义取向。

（一）选择性截取——从全景叙事到单一因果链

《韩非子》摒弃《左传》的多维叙事，如政治背景、道德评价与礼制细节。针对《左传》中频繁出现

的占卜、梦境、灾异等神圣化元素，韩非子在《饰邪》篇提出“龟策鬼神不足举胜，左右背乡不足以专战。然则恃之，愚莫大焉。”^[19]，仅选择性提取符合法家逻辑的片段，构建单一的因果链条。

例如：在解析城濮之战时，《左传》详载战争背景“宋人使门尹般如晋师告急”^[20]与战后“献楚俘于王，驷介百乘”献捷礼的建构合法性，通过“晋侯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盥其脑，是以惧。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21]的解梦，将战争结果归因于“天”助也。还交代了晋文公流亡期间受楚成王礼遇：“及楚，楚子飧之”，强调晋文公“退避三舍”的礼让美德。

而《韩非子》关于“城濮之战”素材的选用和改造时，并没有对战争的前因后果进行全面的书写。而是聚焦于舅犯与雍季关于战争的计划，以及晋文公赏赐舅犯与雍季的先后次序，进行探讨，借用仲尼之言“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时之权，又知万世之利。”^[22]强调晋文公“知时势”，将战争胜负归因于“战阵之间，不厌诈伪”的这一实用原则。舅犯主张“诈敌”是为“一时之权”，而雍季反对是因“诈民”将破坏长远法治。韩非子借此晋文公“先赏雍季”的案例，实为强调权术需服从法治框架，着重国家的长远利益，而非单纯推崇诈伪。

又如鄢陵之战司马子反一事，《左传》记载：

子反命军吏察夷伤，补卒乘，缮甲兵，展车马，鸡鸣而食，唯命是听。晋人患之。苗贲皇徇曰：“搜乘补卒，秣马利兵，修陈固列，蓐食申祷，明日复战。”乃逸楚囚。王闻之，召子反谋。谷阳竖献饮于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见。王曰：“天败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晋入楚军，三日谷。范文子立于戎马之前，曰：“君幼，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书》曰‘唯命不于常’，有德之谓。”

楚师还，及瑕，王使谓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师徒者，君不在。子无以为过，不谷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赐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实奔，臣之罪也。”子重复谓子反曰：“初隗师徒者，而亦闻之矣！盍图之？”对曰：“虽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侧，侧敢不义？侧亡君师，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23]

不难看出，《左传》载鄢陵之战司马子反一事是多重因素交织，将晋军纪律、楚王战略失误、子反渎职、天命观念交叉汇融成一篇，详细记录了楚共王与晋厉公的交战过程，包括子反的战前准备、晋军的策略、楚王的反思以及子反的自责与死亡，并借楚王之口“天败楚也夫”反映当时的“天命控制论”。

韩非在鄢陵之战的改写中，依旧采用了单一因果链。仅保留“子反醉酒——楚王斩首”的关键情节。《韩非子》所载：

奚谓小忠？昔者楚共王与晋厉公战于鄢陵，楚师败，而共王伤其目。酣战之时，司马子反渴而求饮，竖谷阳操觞酒而进之。子反曰：“嘻！退！酒也。”谷阳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饮之。子反之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绝于口而醉。战既罢，共王欲复战，令人召司马子反，司马子反辞以心疾。共王驾而自往，入其幄中，闻酒臭而还，曰：“今日之战，不穀亲伤。所恃者，司马也，而司马又醉如此，是亡楚国之社稷而不恤吾众也。不穀无复战矣。”于是还师而去，斩司马子反以为大戮。故竖谷阳之进酒，不以觶子反也，其心忠爱之而适足以杀之。故曰：行小忠，则大忠之贼也。^[24]（《十过》）

故曰：小知不可使谋事，小忠不可使主法。荆恭王与晋厉公战于鄢陵，荆师败，恭王伤。酣战，而司马子反渴而求饮，其友竖谷阳奉卮酒而进之。子反曰：“去之！此酒也。”竖谷阳曰：“非也。”子反受而饮之。子反为人嗜酒，甘之，不能绝之于口，醉而卧。恭王欲复战而谋事，使人召子反，子反辞以心疾。恭王驾而往视之，入幄中，闻酒臭而还，曰：“今日之战，寡人目亲伤。所恃者司马，司马又如此，是亡荆国之社稷而不恤吾众也。寡人无与复战矣。”罢师而去之，斩子反以为大戮。故曰：竖谷阳之进酒也，非以端恶子反也，实心以忠爱之，而适足以杀之而已矣。此行小忠而贼大忠者也。故曰：小忠，大忠之贼也。若使小忠主法，则必将赦罪以相爱，是与下安矣，然而妨害于治民者也。^[25]（《饰邪》）

删除了《左传》中的战争细节、道德反思和天命观，仅聚焦于司马子反因醉酒误事而被楚共王处决的情节，韩非子将子反之死简化为“小忠”（竖谷阳献酒）导致“大忠之贼”的典型案列，以论证法家“行小忠则大忠之贼”的核心观点。《韩非子·饰邪》篇，则用此案例再次论述“小知不可使谋事，小忠不可使主法”这一观点。

（二）去道德化重构——从“君子曰”到“故曰”

《韩非子》以功利标准取代《左传》的道德评价，采用“因果链简化”“人性预设强化”等方式，否定天命观念，解构血缘伦理，否定道德效用，进而删除《左传》中关于“仁德”“天命”的讨论，消解“礼”的伦理权威，将战争素材为自己所用，阐述法家核心思想。

如鄢陵之战司马子反之死一事，《韩非子》批判“竖谷阳奉”小忠行为，将《左传》中楚王对子反的宽恕被彻底否定，儒家道德化标准被去除。《韩非子》以“好利恶害”的人性预设为根基，将竖谷阳献酒行为界定为“以私害公”的典型案列。通过遮蔽历史复杂性，如晋军战术优势、楚国后勤等问题，制造出“一人误国”的简单因果链，为“严刑峻法”提供经验证据。

又如僖公五年假道伐虢一事，《左传》载：

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之。晋不可启，寇不可翫。一之谓甚，其可再乎？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

公曰：“晋，吾宗也，岂害我哉？”对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将虢是灭，何爱于虞！且虞能亲于桓、庄乎，其爱之也？桓、庄之族何罪，而以为戮，不唯偪乎？亲以宠偪，犹尚害之，况以国乎？”

公曰：“吾享祀丰絜，神必据我。”对曰：“臣闻之，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

亲，惟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物。’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冯依，将在德矣。若晋取虞，而明德以荐馨香，神其吐之乎？”

弗听，许晋使。宫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腊矣。在此行也，晋不更举矣。”

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虢公醜奔京师。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执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从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归其职贡于王，故书曰：“晋人执虞公。”罪虞，言易也。^[26]

《左传》通过宫之奇“唇亡齿寒”的谏言，构建了此前“亲仁善邻”的伦理原则与“惟德是依”的天命观双重解释体系。宫之奇的三重劝谏策略：以“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类比虞虢关系，以晋国历史反证虞公的宗族信任，以“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否认对虞公的祭祀辩护，折射出春秋时期部分价值观念，而虞公“吾享祀丰絮，神必据我”的反驳，则暴露了礼制实践中仪式主义对实质道德的背离。《韩非子》则载：

虞君欲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不听宫之奇，故邦亡身死。故曰：“咎莫憯于欲得。”^[27]（《喻老》）

晋献公以垂棘之璧假道于虞而伐虢，大夫宫之奇谏曰：“不可，唇亡而齿寒，虞、虢相救，非相德也。今日晋灭虢，明日虞必随之亡。”虞君不听，受其璧而假之道。晋已取虢，还反灭虞。此二臣者，皆争于腠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则叔瞻、宫之奇亦虞、郑之扁鹊也，而二君不听，故郑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谋也。”^[28]（《喻老》）

昔者晋献公欲假道于虞以伐虢。荀息曰：“君其以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赂虞公，求假道焉，必假我道。”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宝也；屈产之乘，寡人之骏马也。若受吾币不假之道，将奈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币。若受我币而假我道，则是宝犹取之内府而藏之外府也，马犹取之内厩而著之外厩也。君勿忧。”君曰：“诺。”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赂虞公而求假道焉。虞公贪利其璧与马而欲许之。宫之奇谏曰：“不可许。夫虞之有虢也，如车之有辅。辅依车，车亦依辅，虞、虢之势正是也。若假之道，则虢朝亡而虞夕从之矣。不可，愿勿许。”虞公弗听，遂假之道。荀息伐虢，克之，还反，处三年，兴兵伐虞，又克之。荀息牵马操璧而报献公，献公说曰：“璧则犹是也。虽然，马齿亦益长矣。”故虞公之兵殆而地削者，何也？爱小利而不虑其害。故曰：顾小利，则大利之残也。^[29]（《十过》）

《韩非子》改造：假道伐虢事件中，遮蔽晋国战略布局、虞国夹在晋、虢之间的缓冲国地位地缘困境，一方面，否定道德警示的现实效用。韩非子将灭国归咎于虞公“贪璧马之利”的个体决策失误，批判虞公“贪小利忘大患”，告诫君主要以次为借鉴，不要重蹈覆辙。另一方面，将战争素材为自己所用，阐述法家核心思想。把现实中的政治斗争的具体经验，上升到哲学高度“咎莫憯于欲得”、“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谋也。”使之具有普遍性意义。

三、借春秋战争“礼制叙事”确立战国“法家叙事”

《韩非子》以“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为方法论内核，对《左传》战争叙事素材进行改造，通过案例重塑、话语转换与价值重估，对战争不合时宜礼制的批判，确立法家战争叙事的历史解释体系，完成从“礼制叙事”向“法家叙事”的转型。

（一）对战争不合时宜礼制的批判

韩非子对《左传》“战争”礼制的批判，一方面，聚焦于其与现实需求的根本性断裂。礼制作为宗法社会的特定历史产物，在“争于气力”的战国时代已丧失现实合理性，将礼制伦理贬斥为不合时宜的道德枷锁。《韩非子·五蠹》提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30]在此框架下，《左传》推崇的“亲亲尊尊”原则被斥为“守株待兔”式的迂腐：“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31]又如城濮之战中晋文公“尊王”之礼在《韩非子》中被刻意淡化，转而强调其“斩颠颉以明法”的权谋实践，以此证明道德叙事与“大争之世”的格格不入。

另一方面，韩非子直指礼制原则在战争中的荒谬性。如《左传》宋襄公“不重伤，不禽二毛”，韩非子斥之为“此乃慕自亲仁义之祸”^[32]；鄢陵之战中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33]的贵族礼仪，被批判为“不知权变”的愚行，揭示礼制伦理在战国兼并战争中已沦为“弱国之盾”而非“强国之矛”。

（二）确立法家战争叙事的历史解释体系

在解构《左传》“礼制叙事”权威的基础上，韩非子以服务现实政治，推动变法实践为指向，以“世异则事异”的变革逻辑为核心，重构战争叙事的历史解释体系。其改造《左传》战争素材的行为，本质上是一场历史解释权的争夺，旨在将历史书写从儒家“道德教化”转向法家“政治实用”，根本动力在于为法家变法提供历史依据。

如在《五蠹》中，韩非子提出“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34]的论断，回应战国时社会结构剧变与思想交融趋势的双重压力。韩非以“守株待兔”寓言讽刺固守周礼的荒谬性，强调“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又将鄢陵之战中郤至“趋风”行礼的贵族风范，被批判为“不知权变”的愚行。又如城濮之战中晋文公“尊王”之礼，在列国诸侯争斗激烈的战国时代，更是彻底被抛弃。不难看出，战争素材的改造，实则也是旨在证明战国“大争之世”必须抛弃礼制束缚，转而依赖“法、术、势”。

四、儒法思想内核的冲突

（一）核心价值的冲突

《左传》以“礼”为战争叙事的终极价值尺度，强调“礼以顺天，天之道也”，将军军事行动纳入天道伦理的范畴。其战争书写始终贯穿着“存亡继绝”的宗法精神，如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晋文公献捷时恪守尊王礼制，本质上是对周代“亲亲尊尊”等级秩序的维护。而《韩非子》彻底解构了礼制的神圣性，提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将战争合法性从天命转向现实利益。例如其对城濮之战的改写，删去晋文公“退避三舍”的报恩之礼，仅保留“兵不厌诈”的战术逻辑，暗示道德承诺在政治博弈中的无效性。

（二）人性认知的冲突

儒家相信“克己复礼为仁”，《左传》通过君子“趋风行礼”“不重伤”等情节，预设贵族阶层具有道德自律的可能。鄢陵之战中郤至三遇楚王而执礼，被赞为“勇而知礼”，实为对人性向善的期许。而法家以“人性自利”为出发点，韩非子直言“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35]。其笔下的战争参与者皆为理性计算者：虞公贪图“垂棘之璧”而亡国，证明“顾小利，则大利之残也”；宋襄公固守“不鼓不成列”反遭耻笑，被斥为“不知世变”的迂腐典型。这种对人性的悲观认知，彻底否定了礼制伦理的现实基础。

（三）秩序建构的冲突

《左传》试图通过礼制重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宗法秩序，其战争叙事中的“献捷于王”“诸侯相救”等情节，本质是儒家“以礼治国”理念的投射。而《韩非子》主张“事异则备变”，认为战国乱世中“争于气力”才是生存法则。其对假道伐虢事件的解读，刻意忽略虢国地缘困境，强调虞公因“私利”，无“法度”约束而亡国，侧面证明了法治理论的现实可行性，二者对秩序根源的不同认知，折射出宗法封建制与君主集权制的根本矛盾。

五、《韩非子》改造《左传》战争素材的思想史意义

（一）推动法家理论的系统化与实用化

韩非子对《左传》战争叙事的改造，本质上是对法家思想的系统化整合与实用化转型。通过剥离《左传》中的礼制伦理与道德评判，他将历史经验提炼为“法、术、势”三位一体的理论框架，推动法家从零散的策略主张升格为完整的治国学说。例如：在阐释城濮之战时，刻意省略晋文公“献俘于周”的礼制细节、“退避三舍”的道德体现，转而，以此论证“战阵之间、不厌诈伪”的实践智慧。这种对历史素材的选择性裁剪，使战争案例成为“法、术、势”的实证支撑，进而将法家思想从战术层面提升至国家治理的方法论高度。韩非子更以泓水之战为例，批判宋襄公“不鼓不成列”的礼制坚守为“不知时变”，主张“诈伪”与“时变”是制胜关键，彻底否定道德对军事行动的约束，标志着法家思想完成了从道德依附向实用主义转向。

（二）历史解释模式的革新与实证方法论的确立

韩非子对《左传》战争叙事的重构，突破了传统史学的静态礼制框架，建立起动态化、功利化的历史解释模式。他提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核心命题，以春秋车战与战国步骑混战的差异为例，说明战术必须随时代演进调整，进而推及制度变革的必然性。这种动态历史观彻底瓦解了《左传》“以礼释史”的僵化逻辑，揭示“治民无常，唯法为治”的现实规律。同时，韩非子引入“参验论”方法论，强调“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要求历史分析必须基于经验证据。例如《有度》篇列举大量事实，说明君主能否坚决推行法治，是决定国家强弱的关键。《亡征》篇，韩非列举了四十七种可能导致亡国的征兆，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军事、外交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对历史上许多政权兴衰存亡事例进行总结，凸显出实证分析对历史解释的优先性。这种历史观与方法论的双重革新，推动中国古代史学从道德说教向经验研究转型。

（三）传统伦理的解构与社会治理逻辑的重构

韩非子通过对战争伦理的批判性改造，彻底解构了儒家以德治国的理想范式，重构了基于人性自利论的社会治理逻辑。他以战争中的背叛行为为切入点，揭示“人性恶”的本质，指出君臣、军民关系本质是利益交换，主张以严刑峻法替代道德感召。这种功利化转向在战争叙事中体现为对“灭国兼地”的合法性辩护：韩非子将战国吞并小国解读为“争于气力”的必然选择，否定《左传》“不可灭国”的礼制约束，使战争目标从有限惩戒转向无限扩张。通过战争案例的反复论证，韩非子完成了对传统伦理的祛魅，迫使思想界直面权力的现实逻辑，为战国末期“以力兼人”的统治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为秦汉中央集权体制提供了理论准备。

参考文献：

- [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16:266.
- [2]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16:70.
- [3]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16:486.
- [4]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16:471.

- [5]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修订本) [M].北京:中华书局,2016:78.
- [6]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修订本) [M].北京:中华书局,2016:188.
- [7]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修订本) [M].北京:中华书局,2016:144.
- [8]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修订本) [M].北京:中华书局,2016:970.
- [9]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修订本) [M].北京:中华书局,2016:971.
- [10]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修订本) [M].北京:中华书局,2016:429.
- [1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修订本) [M].北京:中华书局,2016:80.
- [12]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修订本) [M].北京:中华书局,2016:82.
- [13]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修订本) [M].北京:中华书局,2016:434.
- [14] 李雪勤.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 (修订本) [M].北京:中华书局,1999:246.
- [15]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修订本) [M].北京:中华书局,2016:510.
- [16]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修订本) [M].北京:中华书局,2016:271.
- [17]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修订本) [M].北京:中华书局,2016:304.
- [18]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修订本) [M].北京:中华书局,2016:1620.
- [19] 周勋初.韩非子校注 (修订本) [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139.
- [20]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修订本) [M].北京:中华书局,2016:497.
- [2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修订本) [M].北京:中华书局,2016:501-502.
- [22] 周勋初.韩非子校注 (修订本) [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407.
- [23]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修订本) [M].北京:中华书局,2016:973-974.
- [24] 周勋初.韩非子校注 (修订本) [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65-66.
- [25] 周勋初.韩非子校注 (修订本) [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141-142.
- [26]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修订本) [M].北京:中华书局,2016:335-340.
- [27] 周勋初.韩非子校注 (修订本) [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177.
- [28] 周勋初.韩非子校注 (修订本) [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181-182.
- [29] 周勋初.韩非子校注 (修订本) [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65.
- [30] 周勋初.韩非子校注 (修订本) [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551.
- [31] 周勋初.韩非子校注 (修订本) [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549.
- [32] 周勋初.韩非子校注 (修订本) [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323-324.
- [33]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修订本) [M].北京:中华书局,2016:970.
- [34] 周勋初.韩非子校注 (修订本) [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548.
- [35] 周勋初.韩非子校注 (修订本) [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513.

On the transformation strategy of war materials in Zuo Zhuan and its significance of ideological History

Li Xiankun¹, Qian Jiayi¹

¹ Li Xiankun,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China

¹ Qian Jiayi,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ransformation strategy of Han Feizi to the war materials of Zuo Zhuan and its ideological history significance. Zuo Zhuan takes "rites" to construct a narrative structure of war covering the pre-war legitimacy, the constraints of violence in war and post-war moral judgment, showing the style of heavy rites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On the other hand, through the transformation strategies of "selective interception" and "demethalizing reconstruction", Han Feizi analyzed the war materials such as Chengpu and Yanling, criticized their outdated propriety system, and transformed the war materials of Zuo Zhuan into demonstration tools of legalist thought, and then established the narrative system of legalist war. At the same time, discusses the Confucianism thought in the core values, human cognition, order construction conflict, reform the "left" material in the history of war, namely: promote legalism theory systematic and practical, innovative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mode, deconstruct the traditional ritual ethics and reconstruct social governance logic.

Keywords: Zuo Zhuan; Han Feizi; war materials; reform strategies; history of thought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3.776

他者性视域下虚假机智的内涵、表征及优化

杨玲¹

(¹ 杭州师范大学经亨颐教育学院, 浙江 杭州 311121)

摘要: 虚假机智是施加带有虚伪的和自私的影响的机智, 不受爱护和为他人着想的动机驱使。“他者性”视域下, 虚假机智的目的并非为“他者”、主体间的交往具有同一性和非现实性、实施缺乏责任主体。虚假机智主要表征为沉溺私利, 偏离“为他者”本质; 麻木谄媚, 瓦解“我”与“他者”差异; 过分炫耀, 掩盖狡诈窥探行为。以他者性伦理思想为参照, 真诚“面对”, 构建“我”“他者”关系, 回归机智本质; 承担责任, 倾听他者回应, 尊重他者差异; 適切反应, 多重行动审视, 注重移情体验有利于虚假机智的优化。

关键词: 虚假机智; 机智; 他者性

一、前言

虚假机智是施加带有虚伪的和自私的影响的机智, 不受爱护和为他人着想的动机驱使^[1], 不由无私地真正地指向他人的“他者性”和利益性所驱动。从其背后的哲学理念分析, 关系哲学中的“他者”理论对虚假机智的认识和优化有借鉴作用。他者理论由列维纳斯提出: 他者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并且以“面容”的方式展现于“我”, 是不具有同一性的个体, 是绝对差异化、个性化的个体^[2]。基于他者性理论, 从差异性、同一性、对称性、主体责任角度把握虚假机智的内涵, 理解虚假机智的概念表征, 探求其优化路径对教师专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他者性视域下虚假机智的内涵与特征

何为虚假机智? 范梅南在阐述普通机智和教学机智之间的关系时提出, 机智是一种与他人相处的临场智慧和才艺, 具有人际间和规范性的特点, 《韦氏大学词典》将机智定义为“一种对言行的敏锐感, 以与他人保持良好的关系或者避免触犯别人”。虚假的机智是施加带有虚伪的和自私的影响的机智, 不受爱护和为他人着想的动机驱使^[1]。从教育学上说, 虚假机智的动机是为了孩子利益之外的某种别有用心目的去捉弄和控制孩子; 从机智本质上来看, 是否以学生为本是衡量真假教学机智的主要指标^[3]。从哲学理念分析, 虚假机智以交往为载体, 但交往过程未走出个人主体的漩涡, 交往主体间对话平等性存在差异, “为他者”的责任主体缺失。从他者视角来看, 虚假机智的目的并非为“他者”、主体间的交往具有同一性和非现实性、实施缺乏责任主体。

(一) 虚假机智的目的并非为“他者”

虚假机智以个人的利益达成为目的。虚假机智破坏了机智的固有目的——为他人着想的目的。虚假机智是了某种目的去捉弄和控制他人, 其产生的交往关系有主体-客体间、主体间的关系, 交往关系存在着平等或不平等性, 无论是基于主体性还是主体间性的交往视角, 虚假机智的目的都只是为了维护自我的利益, 而并非他者的利益, 是一种不平等的利益关系交易; 在利益关系的驱动下, 交往主体间会因为自我的利益而博弈、竞争, 甚至发生冲突, 导致机智的利己化倾向, 进而导致情感关系的离散。随着虚假机智的实施, 主体间的偏向物质利益性的交往, 弱化了精神交往。“人类在他们的终极本质上不仅是‘为己者’, 而且是‘为他者’”^[2], 他者性视角下, 虚假机智体现了“为己者”的利益本质, 消解了他人的利益诉求。

(二) 虚假机智的交往具有同一性和非现实性

虚假机智带来的交往关系是同一性的关系。虚假的机智是带有虚伪和自私的影响的机智, 是为了自我的目的而试图操纵别人的行为。操作对方达到自我的目的的过程, 是“他者”自我的消解而走向与“我”同化的

过程,“他者”被还原为“我”,我与“他者”差异性被忽视,逐渐走向同一性。虚假机智面临着对孩子的征服、占有和改造。虚假机智的实施者在“唯我论”的视角下与孩子进行对话,孩子作为实施主体之外的客体,被实施者纳入其意志性框架中,意识被实施者逐渐同化,孩子面临着意识被消解与占有、行为的被改造与控制、需求被弱化。

虚假机智的交往具有非现实性,虚假机智的实施带有要求对方的回应的目的性,他者性视域下,强求他人与自己发生一种相互性的关系是一种理想性的伦理关系,我不能对他人有所要求,我只能要求自己为他人负责。例如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为了维护教学秩序的正常进行而“机智”地回避学生的自身无法立即解决的提问,或要求学生停止继续提问课堂内容范畴之外的问题,要求学生作出的行为变化即是要求对方给予回应的表现,此时学生被迫做出的行为变化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情景,此时虚假机智的实施无法回避学生的需求,具有非现实性。

(三) 虚假机智的实施缺乏责任主体

他者性以他者界定主体,主体成为为他者负责的伦理主体。以他者性视角思考机智,机智交往间“我”对“他者”有无限的责任,“我”是责任的主体。列维纳斯认为“面对言说必须回应”还内隐着一种父对子式的单向性无限责任关系,这就要求在机智实践中重构主体之间的伦理责任,而虚假机智间的交往是一种只求己欲的交往,根本上无法超越利益对等交换的精致利己生活^[4]。

虚假机智是为了自我的利益而行动,不具有对“他人”利益的责任,意味着责任主体的消逝。从利益角度分析,虚假机智行动只需考量自身需求,不需要将“他者”的需求纳入“我”的责任意识,“他者”的需求被弱化,“我”只需要承担“我”的责任,我对“他者”的责任弱化,承担“他者”责任的主体就不复存在了。我对他人无限的责任指责任的自觉性^[4]。列维纳斯认为教师对学生实施机智时所承担的责任,或者父母为子女承担起来的责任是一种无限的、自觉地责任,对他人负责而不要求他人对我负责。但虚假机智的实施主体缺乏心甘情愿、义无反顾地承担责任的意愿,不具有单向性的责任,“我”实施虚假机智只是为了达成某种“我”的目的。

三、他者性视域下虚假机智的表征

(一) 沉溺私利, 偏离“为他者”本质

在不妨碍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前提下运用合理的手段获取自身的利益是被允许的^[5]。例如教师具有合法的权利使得部分人选择教师作为职业,而若教师只顾及一己私利而不履行相应的义务是偏离教师职业本位的现象。从机智的本质来看,虚假机智包庇了主体藏匿于其中的获取私利的目的,表征为对他人的控制行为,使机智偏离了原本避免触犯到他人的本质;从教育学上看,虚假机智偏离了机智的固有目的,即为他人着想的目的;他者性视域下,虚假机智中目的和手段的偏离导致了“他者”的消亡。

首先,虚假机智表征为拒绝回应他者的诉求,使他者在交往的过程中缺失。虚假机智实施主体沉溺于一己私利,用利益蒙蔽了他者的诉求,放弃了他者而负责的目的,拒绝了对他者需求的回应,同时也导致了他者的个性被遗忘和抹杀,造成了他者的缺失。例如在近期发生的多位学生举报课题组教授学术不端事件中,教授本可以多花精力去满足学生的需求,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但花费精力去满足学生的需求会导致减少谋取自己利益的时间和精力,教授沉溺于一己私利,拒绝回应学生的发展诉求,多此占有学生的成果,最终东窗事发。因此,拒绝他人诉求同时也否定了自我的存在价值。

其次,虚假机智表征为要求对方同等的回应或是更高的回报。当虚假机智的主体专注于获取自身利益时,主体的需求完全指向物质方面,并且通过行为要求对方产生相应的物质汇报甚至是更高额度的物质回报,在此情况之下,主体对他者就不具有单向度的责任,导致他者的身份的丧失,完全沦为虚假机智实施主体的附庸。虚假机智违背了他者性视域下的为他伦理关系,导致他者差异、个性等身份的消逝。

最后,虚假机智表征为主体自我的物化。利益主义的操作下使虚假机智的目的完全沦为物质利益的交换,将机智的实施变成了以物易物的商品交换。主体在通过行为获取他者物质利益的同时,也忽视了自身的存在,本质上也自身物化为商品进行交易,精神上的交流和共鸣被逐渐弱化甚至消逝。

(二) 麻木谄媚, 瓦解“我”与“他者”差异

那些“太没有”机智的人,即虚假机智的人,对他人的利益不敏感,具有情感的麻木不仁和对他人阿谀奉承的表征,并且对给他人留下过分刻意的印象不敏感。他者的独特性是绝对的,这意味着我不能同化他者,必须尊重他者,聆听他者的声音,向他者开放^[2]。那些使用虚假机智的主体表现得对他者责任的冷漠或是对他者的阿谀奉承,无法聆听他者的声音,尊重他者的差异。

首先,虚假机智表征为情感上的麻木。他者性视角下,虚假机智的实施者陷入“唯我论”,面对他者时将他的关系视为“我”与“它”的关系,并且由于利益主义的束缚难以超越这种关系,难以实现精神的相遇,难以向他者开放,因此表征为情感上的麻木,并且不敏感于他人对自己由情感麻木造成的刻意表征,进而表

现为对他人的谄媚或是漠视。例如服装店员为让顾客买下衣服在顾客试穿时过度夸赞。

其次, 虚假机智表征为失去对他者差异性的保护。实施虚假机智的主体放弃对他者的责任, 他者视角下, 无法建立起“我”与“他者”的关系, 面临的仍然是主体视角对他人的占有和改造, 将他人向自我的同化, 消解了与他人之间存在的差异, 同时也就失去了对他者差异性的保护, 例如母亲劝要女儿不要嫁给外国人, 实则母亲本身就歧视外国人, 想让女儿在思想行为上与自己保持一致, 抹杀了自己与女儿的差异。

最后, 虚假机智表征为对自我的泯灭。虚假机智的实施过程中, 主体性也渐渐流失, 主体将对他人的责任漠视或是转移到外部环境中, 自己就不具有对他人的责任, 无法根据他者来证明自身的存在, 此时主体性也就消逝了, 例如教师将对学生的责任转移到家长、学校、社会上, 而自己放弃了对学生的责任, 放弃了作为教师的义务, 实质该人也抹杀了自己作为教师的主体性。

(三) 过分炫耀, 掩盖狡诈窥探行为

太过炫耀的机智行为是值得怀疑的, 因为他可能违背了机智的本质, 隐藏着某种自私的目的。在实施机智的过程中, 所体现出来的神态、表情和语言能够被他人感知, 同时也可以从他人的神态、表情、姿势中窥探出他人内心所想, 但受自私的利益所驱使, 这样的行为是狡诈的行为, 是受个人利益支配的虚假机智。

首先, 虚假机智表现为行为的狡诈。狡诈的“机智”不能够代表他人的利益, 并且提供给他人的信息是歪曲和具有偏向性的, 在微妙的事情面前采用非直接的、遮掩式的态度来对待, 掩盖了行为的真正目的。他者面对这样狡诈的行为, 面临的是他者性的“绑架”, 他者被迫给予虚假机智实施主体无限的宽容与包容。例如大学生期末考试时防止别人取得比自己更好的成绩伪装透露给同学错误的考试知识。

其次, 虚假机智以探取他人内心思想。一方面, 利益主义驱动的下的伪装和窥探体现的是虚假机智戴上了虚伪的面具而达到本质的目的, 实则是对自己主体性的不认同, 想通过“他者”的回应来了解自己达到个人目的行为的可行性, 另一方面, 窥探蕴含着不良的社交动机, 无法让顺利的社会关系成为可能。例如在进行投票选举前, 候选人主动和群众沟通并打探群众对自己的意见, 讨好可能为自己投票的群众, 这样的行为带着自身利益的目的窥探他人的内心, 是虚假的机智。

最后, 虚假机智以过分的炫耀来显示。真正的机智, 不但不炫耀, 反而非常地细腻^[1]。机智具有整体性, 难以通过描述和区分描述一个具有机智的行动, 即使我们能够认识到机智是作为一种品质存在的。例如某人在团队游戏活动中带领团队表现较好, 但炫耀自己的行为并试图让别人明白自己的付出, 这样的行为是虚假的机智。

四、他者性视域下虚假机智的优化

以他者性伦理思想为参照, 从“我”与“他者”伦理关系、差异性、主体责任三个角度出发: 真诚“面对”, 构建“我”“他者”关系, 回归机智本质; 承担责任, 倾听他者回应, 尊重他者差异; 适切反应, 多重行动审视, 注重移情体验有助于虚假机智的优化。

(一) 真诚“面对”, 构建“我”“他者”关系, 回归机智本质

首先, 虚假机智以自我为中心, 要突破“唯我论”, 要真诚“面对”他者。列维纳斯他者性的核心思想是“面对他者”^[2]。“面对他者”, 首先是他者作为一个不可还原为自我的主体, 而且面对的不仅仅是可见的面孔, 更有不可见的精神。所以, 面对“他者”, 不只是面对面的“看见”, 更有精神上的“相遇”^[4]。在实施机智行动前, 做好与他在思想上的碰撞与内心的袒露的准备, 通过“看见”和“相遇”成就他者的他者。真诚是突破虚假的关键, 只有脱去伪装, 卸下防备才能有自我的袒露, 进而能够接受他者的袒露, 机智没有虚伪的意味, 只有真诚地实施行动才能为“他者”的实现做铺垫。

其次, 从“我”“它”关系向“我”“他者”关系的转化才是使机智远离个人利益主义的重心。虚假机智的实施主体间所建构的关系是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面临改造和占有的伦理关系, 要跳出利益主义的漩涡, 就要将对方看做“他者”, 认为他者并不是为我而生的, 或者并不是为我同一的主体。从“它”向“他者”的转换是客体向异于我的主体的转换, 才有利于回归机智的本质, 即为他人着想的目的。

最后, 回归到为他人着想的目的是从根本上转化虚假机智的方法。再实施行动之前, 思考行动的目标是什么, 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表征机智, 都不应该违背为他人着想的目的, 反之, 若在行动前已经持有利己的目的, 行为就难以逃脱虚假机智的陷阱, 因此, 在实施机智行动前, 将行动目标设立在为他人着想的角上, 能够避免虚假机智的产生。

(二) 承担责任, 倾听他者回应, 尊重他者差异

首先, 机智行动要求自觉承担起对他者的责任。机智的“他者性”意味着需要对他者具有无限的责任, 这个责任并非指责任的广泛性, 而是指责任的深度, 即责任的自觉性。例如, 教师要主动承担起对学生的责

任, 为学生的发展付出, 而不要求学生回报, 当然学生也应该承担起对教师的责任。若机智的行动能够构建起双向的主动责任, 即为“他者的他者”而产生的责任, 就能够破除虚假机智下责任主体消逝的窘境。

其次, 倾听与回应是承担起对他者责任的表现, 有利于虚假机智向机智的转化。虚假机智以单方面的话语霸权, 否定了他者需求的声音, 倾听有利于为他者的回应做准备, 同时是与他者进行精神交流和尊重他者差异的先决条件。只有倾听他者的声音, 才能破解主体与客体间的单向话语霸权的局面。他者在伦理上是第一位的, 回应使虚假机智的转化成为可能, 无限的责任同样要求对他者无限地回应。

最后, 尊重他者差异能够消解虚假机智实施中对他人的占有和改造。列维纳斯认为, 他是他, 但不可还原为我心中的那个“他”^[4]。尊重他者的差异能帮助建立起“我”与“他者”的伦理关系, 认为他者与我具有绝对的差异, 避免在实施机智行为时强迫对方认同我的观念或是控制他人的行为; 充分尊重他者的差异有利于突破主体主观上对他人的改造欲和征服欲, 充分肯定他者的独特性, 也就避免了主体与主体间的同一化, 能够在实施机制时充分尊重他人的需求。

(三) 适切反应, 多重行动审视, 注重移情体验

首先, 适切的反应是指在一定思想的指引下作出的行动, 要求行动具有流畅性、方式的多样化且合乎情理。虚假机智同样要求实施机智的主体在短时间内迅速对情景做出反应, 但这样的反应可能是引起别人察觉到刻意的或是谄媚的^[6]。因此, 行为的流畅性和行动方式的多样化能够突破虚假机智给人生硬的印象; 方式的合乎情理能够改变虚假机智给人留下太显眼的感受, 让行为变得温和而细腻。

其次, 对行动进行多重的审视能够避免虚假机智的重复产生。机智的行为是难以通过规定性的描述来界定的, 虚假机智也是如此, 有时主体并不能意识到自己实施的机智是虚假的, 并且认为主体的行动符合机智的要求, 这时根据机智的本质多次对行为进行反思和审查, 能够辨别行为是否是虚假机智, 进一步优化^[6]。

最后, 移情有助于行为实施主体对他者的体验。他者性强调每个人都是差异性存在, 都是异于他者的身体性存在, 借由身体所感受的世界和所形成的对自身、他者、事物及世界的感知、认识、体验和理解也存在差异^[5], 移情能够帮助主体理解和感知“他者”在交往情景中对虚假机智的感观, 从而能够进行认知自我反馈, 若该行为对他者产生了消极体验, 主体就能从行为的元认知中感受到并且产生行为优化的意愿^[7]。

参考文献:

- [1] 马克斯·范梅南著, 李树英译. 教学机智--教育智的意蕴[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1: 171-172.
- [2] 冯建军. 他者性教育: 超越教育的同一性[J]. 教育研究, 2021, 42(09): 14-23.
- [3] 李允, 李如密. 教学机智的意蕴、要求及修炼[J]. 教育科学研究, 2008(06): 7-11.
- [4] 冯建军. 他者性: 超越主体间性的师生关系[J]. 高等教育研究, 2016, 37(08): 1-8.
- [5] 蔡霜, 黄道主. 教师师德失范的表征与规避路径——基于“他者性伦理思想”的分析[J]. 教师教育学报, 2022, 9(04): 37-47.
- [6] 钟启泉, 刘徽. 教学机智新论——兼谈课堂教学的转型[J]. 教育研究, 2008(09): 47-52.
- [7] 杨建朝, 单文宣. 他者性视域下教师教育情怀: 意蕴、生成与培育[J]. 当代教师教育, 2023, 16(02): 9-15.

The Connotation, Manifestations, and Optimization of False W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therness

Ling Yang¹

¹ *Jing Hengyi School of Education,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China*

Abstract: False Wit refers to a form of cleverness that exerts hypocritical and self-serving influence, unmotivated by care or consideration for oth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therness, False Wit manifests three core contradictions: its purpose is not oriented toward the "Other"; its intersubjective interactions exhibit homogeneity and unreality; and its implementation lacks accountable agents. Key characteristics include an obsession with self-interest that deviates from the essence of "being-for-the-Other"; obsequious numbness that dissolve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Self" and the "Other"; and excessive ostentation that masks cunning surveillance. Guided by the ethical framework of Otherness, optimizing False Wit requires: sincere "facing" to reconstruct the "Self-Other" relationship and restore the essence of true wit; assuming responsibility by listening to the Other's voice and respecting their alterity; and enacting measured responses through multi-dimensional reflection and empathetic engagement.

Keywords: False Wit; Wit; Otherness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3.798

“杯葛”的源起及其在当代台湾地区文化中的嬗变

张义明¹

(¹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 “杯葛”(Boycott)泛指一种抵制活动。在当代台湾地区,“杯葛”兴起自上世纪末的立法机构,是由党团主导的,以停缓议事、阻挠程序进行为手段的政治抵制活动。它糅合了政治抵制行为与议会暴力行为,成为带有台湾地区特色的政治文化现象。随着各党派民意代表席位的消长,“杯葛”的滥用已超出政党政治策略的范畴,丧失了合理性。它反映出当前台湾地区政党政治陷入内耗,折射出民粹文化对台湾地区民众生活方式的深度入侵。这种畸形性的文化也暴露出政党政治主导下台湾地区民众文化认知的割裂倾向。梳理“杯葛”文化发展的源流及其演变,结合 2014 年台湾地区部分“台独”势力策动的非法冲击所谓“立法机关”的事件,有助于认清政党斗争的本质,亦能更好地理解当代台湾地区政坛纷乱现象的成因。

关键词: 杯葛; 议会; 民粹主义; 政治娱乐化

“杯葛”,即英文词 boycott 的英译。其本意为“抵制”,指“与个人、团体或国家断绝全部或部分关系”^[1]。它源于 19 世纪末英国公爵欧勒的田庄经理人杯葛(Charles Cunningham Boycott)欺压佃户后遭联合抵制的事件。自 20 世纪初,“杯葛”一词被广泛使用于各类中文出版物,旋即与“抵制”一词混用。随着时代变迁,中国大陆业已将“杯葛”一词替换为“抵制”,主流媒体难觅“杯葛”一词的踪迹。但在当代台湾地区,“杯葛”一词仍被广泛使用,被赋予了与“抵制”相比更为丰富的内涵,并从经济抵制行动扩大至政治抵制行动。时至今日,“杯葛”现象已成为研究当代台湾地区政坛时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在发挥政治博弈功能之余,它的畸形性得到凸显,并以民粹形态介入到台湾地区百姓的日常文化生活中,是当代台湾地区政党政治缠斗闹剧的写照。

一、“杯葛”的本土化和政治化

“杯葛”系音译词。1920 年太蕤在《民觉》发表题为《我的杯葛主义的观察》一文,文中提到:“boycott 这句话,在中国流行快了一年了,简直成了社会上一个问题。”^[2]其陈述或可反映“杯葛”一词流行的语境。不满于“一战”后列强的分赃,中国有识之士对日、英等国抵制洋货的运动如雨后春笋般铺展开来。张伯泉在《杯葛》一文中赞扬了人们抵制日货的行为,谓其“识者,莫不称为快”。但同时他也夹杂着对这一抵制浪潮的忧虑:“中日原为唇齿之邦,吾人又何忍弃好寻仇,而言抵制哉。”^[3]这或是作者对 1919 年抵制日货运动失控后造成严重后果的反思。以至于十年后抵制日货运动再次兴起时,仍会以 1919 年之混乱作为反面典型:“当年秩序纷乱,军队巡街,日侨被殴,华商之拥有日货者,迫焚于市。”^[4]张伯泉的文章着重分析在抵制日货这一经济行动中诸主体的不同动向,虽有提及政治上的“杯葛”,但始终没有将其置于论述的中心位置。与该文类似,此时期各报刊中“杯葛”的对象多为帝国主义列强,国人以抵制洋货的经济行动试图反制其侵略行径。

自 1919 年抵制日货运动后,中国民众或自发、或在政治团体的领导下,开展多次对日、英、法等列强的“抵货”运动,其中以抵制日货尤甚。以至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各类报刊对“杯葛”一词进行解释时,不乏直接将其视为“同盟经济绝交”或“抵货”运动者。此时人们凡说起“杯葛”,多为国与国之间的抵制商品运动,系“一种报复行动”,亦为“经济上压迫力量”^[5]的行动。当作者提及与政治选举等有关的抵制活动时,一般会冠以“政治杯葛”(political boycott)以示区分,意为“协约不选举某人为总统或某项官职者”^[3]。而此类政治行动难以在民国时代“军政”“训政”的土壤中得到孕育。

直到中国国民党退居台湾地区,并恢复议会政治、以及后续“解严”并开放“党禁”,“杯葛”才重新被赋予具有普遍性的政治含义。而究其政治意味发端的历史,仍可上溯至 20 世纪 40 年代后由国民党主导的议会

作者简介: 张义明(1995—),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大众文化理论。

政治。一如李敖所说,“一切所谓‘议会政治’,在国民党统治之下,说破了,只是有名无实而已。”^[6]在1946年召开的国民大会,仅有青年党等小党派参与,可谓是国民党的“一言堂”,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抵制;退居台湾地区以后的“万年国会”时期,从1969年起才开始有“党外”人士担任民意代表。少数有异见的民意代表,乃是“吃国民党剩下的鸡骨头”,很难发表实质性意见。一旦有威胁到统治的异见性提案,国民党便会祭起“纪律”以动员民意代表以压倒性多数将其否决。“解严”以前的台湾地区,所谓“党外”人士并无施展拳脚的空间,而随着“党禁”的解除,台湾地区政治光谱日益复杂,派别纷立,党派团体之间的对抗才日益白热化。民进党源自反抗国民党专政的所谓“党外”人士,固然会采取逢国民党必反的态度。它善于操弄街头政治,鼓动民粹,其创始人暴力问政、围攻议会等行为,也为后来“杯葛”活动横行埋下了种子。

某民进党创始党员在80年代曾以“暴力问政”闻名。其于1987年殴打他人的行为,被视为当代台湾地区第一起“议会暴力”行为,1988年其更是因跳上立法机构主席台殴打时任副负责人而广受注意。1989年1月17日,民进党煽动民粹,以“诉诸群众”的方式包围立法机构,并殴打、侮辱其他民意代表,引发震动。此后的三十余年间,议会“杯葛”始终与“议会暴力”深度捆绑,党团围绕立法、“阁揆”发表施政报告等发生的政治“杯葛”,多造成武力相向的局面。

蓝营与绿营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并非全然来自其政见之异同,更多则是源于“统独”等大政方针之尖锐矛盾,以及国民党身披涉及族群问题的历史包袱。纵然千禧年后的国民党试图弱化政治颜色,试图“由深(蓝)入浅(蓝)”,甚至走向中立,但大众观感的转变并非一朝一夕即可达成之事。因而在选票和使命的双重掣肘下,蓝绿的对抗日益尖锐,这也促成了在立法机构与县市议会中,党团之间的冲突与对撞。

值得注意的是,“杯葛”作为抵制活动并非某一国家或地区的“专属”。具有台湾地区特点的“杯葛”政治文化现象,则是更晚近的诸如“朝小野大”的分立政府等政治更迭所引起的,这也催生了后续诸如“程序杯葛”(亦称“技术性杯葛”)等现象。在各国家、地区的议会政治质询环节中,激情演说者将愤懑转化为武力,上演“全武行”的事件并不罕见,但像当代台湾地区,以党派、群体进行勾连,试图以“正当程序”拖延立法、议事正常流程的进行,并延宕数十年以至于成为“传统”的现象则较为少见。根据所谓《立法委员行为法》,占据主席台、阻挠议事、胁迫他人、携入危险物品等系非“理性问政”的违规行为,但仍然屡禁不止。当代台湾地区的政治“杯葛”,混杂了利用常规政治博弈的“程序杯葛”与非常规的“暴力问政”模式,使得其颇具台湾地区“特色”。当局对“杯葛”现象模棱两可的态度一定程度上源于其对“法统”的因循,故而导致“杯葛”现象在当代台湾地区成为屡见不鲜的政坛乱象。

二、议会“杯葛”:台湾地区政治缠斗乱象之体现

当代台湾地区的“杯葛”现象集中体现于立法机构和各县、市议会之中。从历史发展来看,2000-2016年间是台湾地区政治“杯葛”的一段高潮期。民进党第一次主政时期,台湾地区政坛处于“朝小野大”的格局,国民党为首的泛蓝阵营多次对当政的民进党的立法、政策规划进行抵制;而随着政党轮替,绿营则有样学样,对当政者的诸多议题进行抵制,并煽动组织藉由政治抵制引起的社会活动。从延长议事流程以拖延立法,到霸占主席台、封锁机构大门,再到拳脚相向、使用各类道具互殴,议会“杯葛”活动日趋成为台湾地区媒体关注度较多、影响力较大的政治话题。

由于“程序杯葛”这一将一般议案暂缓编入议程的方式具有合法性,法案的推迟延宕则在立法机构内屡试不爽。民进党第一次当政时期对监察机构负责人的提名因“朝小野大”的状况而反复搁置,司法部门一度裁定此种行为违反所谓“宪法”,但其也不得不申明“从良性的角度而言,(杯葛)可促进更广泛之政治参与和讨论,有助于形成更周全的政策或解决方案。”曾长期担任立法机构的负责人也曾向媒体重申:“虽然霸占主席台是不应该的事,但是警察权并没有法律授权,任何警察都不能妨碍或干预司法。”然而,媒体对“杯葛”的态度并不像政客那般宽容。据统计,台湾地区“中时新闻网”近十年(2012-2021)来的各类新闻、评论以“杯葛”为题者共有636条,其中涉及立法机构和各县市议会政治“杯葛”的高达491条,占总数的约77%,平均每7天便有一条相关新闻。“议事瘫痪”“妨害公务”“倒阁”“突袭”“占领”等高频词汇反复出现,正如“杯葛”行动的套路般使民众眼花缭乱。“多少年来,几无例外,只要新任行政机构负责人就职向立法机构提出的第一份施政报告,总是无法顺利上台。”当代台湾地区立法机构的“杯葛”行为已经从政治策略演化为政党缠斗的伎俩,几乎将民生福祉置之度外。此种逢对方必反的态度已不再是某一个街头政治党派的特点,已经融入台湾地区的政治生态之中。

议会的政治“杯葛”需诉诸党团的合纵与连横,民意代表个体难以独立完成。由于民意代表发言的时间会受到一定限制,各党团为了“杯葛”相关议题,会使用各类阻绝议程的手段。其中,立法机构的程序委员会在提案环节可视其轻重缓急来决定排入议案的顺序,而民意代表则可借审查之由申请复议、干扰议事等手段

阻挡议案通过。为了使法案、议题顺利通过，立法机构还会召开临时会，以至于近年来休会期仍有常态化的临时会，讨论多为重要性较低的非突发性议题，被社会各界广泛诟病为缺乏“民主宪政”精神的体现。

纵然有学者认为，当代台湾地区议会中“政党对于没有争议性的法案则有共识不去阻绝，而倾向将之通过，创造双赢的局面。”^[7]但在诸重大议题上，为了获取更多的声量，蓝营和绿营之间往往呈现出两极化特点，其互相之间的攻讦则置社会公义于不顾，为了反对而反对，从而瘫痪议事进程，使政策影响下的经济社会发展趋于停滞。例如，在开放美国牛肉入台和含“瘦肉精”美国猪肉入台议题方面，由于执政党地位的变动和议会席位数量的变化，国民党和民进党对相似事件的决策与认知发生了陡转。民进党以“时空背景不同”搪塞，实则已经陷入了政党恶斗的泥淖。

三、“杯葛”以民粹姿态入侵民众生活

台湾地区两大党派对开放美国肉制品进口一事的态度反复无常。当政者因所谓“外交”利益考量，力图开放含瘦肉精美牛、美猪等入台，而在野党势必会对此进行反对。无论在野党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无论其宣称如何为民众考虑，其煽动民粹以阻挠对方达成政治利益的真实目的已然图穷匕见。而议会“杯葛”活动和其煽动的有组织的民众抗议活动成为其操弄手段的两个向度，以传递“民众的声音”为幌子，让民众为其牟取政治利益的过程背书，俨然是以民粹姿态入侵普通民众生活的表现。

有学者认为，台湾地区“选举民粹”^[8]正抬头于民进党主政的第一次政党轮替时期。民进党擅长利用“异质性矛盾”，从而“在民众中制造严重的对立和冲突”^[9]。它一贯试图操纵“省籍”“族群”等敏感话题，并为反对者冠以“历史罪人”的大帽子。这些议题在台湾地区民众中颇有市场。而本不擅长操弄民粹的国民党，也照猫画虎，试图利用民粹式民主的手段来争取选票。

“选民有时候支持民粹政党，并非他们喜欢民粹，而是这些民粹政党没有讲实话。”2012年，时为在野党的民进党因反对美牛开放，其立法机构党团进行了五天四夜、超过120小时的全体总动员，以霸占主席台的方式阻挠时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对相关法律事项进行修改。而数年之后，时过境迁，民进党当政时期也力推含瘦肉精美国猪肉进口，此时作为在野党的国民党也对此进行“杯葛”，一度被称为“焦土战争”。国民党不仅在议会祭出猪内脏作为攻击道具，另组织“秋斗”游行，并组织“泛蓝”媒体撰写评论以抨击民进党视人民为无物，“把人民当猪头”。但就两党宣传的话术与实际行径来看，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中，两党都放弃了自身原则，模糊政见。其为人民谋福利是假，为收割政治利益是真。

另一个典型的案例则是2014年由部分“台独”势力策动的非法冲击所谓“立法机关”的事件。民进党煽动民粹，并将其美化为一场正面的抗争事件。从政治策略来看，该事件是民进党及绿营反对两岸签订“服贸协议”的“杯葛”行为的扩大化，但从更广泛的文化层面来看，它则是“台独教改二十年的成果总验收”^[10]。该事件的诸位始作俑者，政治观点甚至比民进党的台独路线更为激进，但他们的行径仍大体在民进党控制的范围之内。无论台独势力如何将其粉饰为一场正义的活动，其阴谋终因其明显的“绿色”旗帜而彻底暴露，而大多数民众则是被裹挟于其中，难以发出质疑的声音。

在操弄民粹的社会运动中，组织者藉由所谓“民意”，行违法违规之事。民进党在该事件中煽动激进分子对政府机关进行冲击的行为，实质是“僭越代议制民主”^[11]，试图损毁业已岌岌可危的政府权威。在议会政治“杯葛”难以奏效之时，民进党选择以煽动民粹的方式开展更大规模的街头政治运动，从立法机构内部和外部分别展开攻势。该事件上承自与民进党有关的另外两场事件，分别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这些事件具有较高相似性和关联度，体现了民进党街头政治的“路径依赖”。

民进党对两岸议题的操弄、给反对党“抹红”等行为，充分反映出该党试图以大陆“威胁”为幌子来控制民众，而其一贯的政治话术则是将反对者推向“极化”。在“非蓝即绿”的政党斗争中，“杯葛”行为激化了台湾地区社会不同政见间的冲突，促使民众政治观念乃至文化认同产生割裂。围绕在以“蓝”和“绿”为中心的台湾地区人民，难以过问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是非，而只能以选边站队的方式簇拥在理念相近的人群周围。从历史经验来看，曾跃升为“第三大党”的“亲民党”、所谓“时代力量”都是某一阵营的侧翼，并不具备主导某一颜色的实力。而近年来号称新“第三大党”的台湾（地区）民众党，虽持中间路线的立场，但其立场不够鲜明，预期发展也不甚明朗。无论台湾地区社会多少人呼吁“走第三条道路”，建立“第三党”，他们的政治光谱颜色或无法跳脱蓝绿色的差别，或只能在蓝绿色间显得无比黯淡，这也是台湾地区民粹化民主政治体制下难以刨除的痼疾。

四、“杯葛”做秀与政治娱乐化

当代台湾地区的议会“杯葛”本为政党主导下的行为。然而在议会暴力的加持下，台湾地区的“杯葛”更沦

为某些政客的个人秀，并带有相当强烈的娱乐化倾向。

2016年民进党再度上台后，国民党在立法机构的席位已无力抗衡绿营的绝对多数。与街头政治出身的民进党相比，国民党在议会斗争中的“战力”较为孱弱，且党内多股势力各怀心思，缺乏团结。在议会“杯葛”中，国民党党团常装模作样，看似声势浩大，有做戏之虞。纵然有所谓“甲级动员”和各种道具的加持，却也难掩其做秀的真面目。而民进党，则更是在“翻版”国民党的基础上，更善于动用党纪武器来威慑党员，以打造一致对外的团结假象。

台湾地区数量繁杂的政党从体制上而言几乎都是国民党的翻版。胡适早在1947年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及：“中山先生终究是爱自由讲容忍的人，所以在他的政治理想系统里，一党专政不是最后的境界，只是过渡到宪政的暂时训政阶段。”^[12]然而他为“宪政”张本并未换取后来国民党“准备结束训政”的趋势，直到80年代这一局面才得以改变。李敖则指出：“民进党在走国民党的老路”^[6]。他认为，民进党选择使用与国民党几乎完全一样的体制，呈现出亦步亦趋的姿态。故而李敖对此时的正当乱象已经呈怀疑态度，并提出了相应的构想：“政党是松散的……这种政党是自由结合的：竞选前来也欢迎、去也随便……他们没有庞大的党工人员，他们有的是共同理想与政见的结合。”^[6]然而李敖的观点最终也只能流于一种理想。在看似迥异的政治光谱中，国民党、民进党两个党派的政治逻辑何其相似。

在2021年美国瘦肉精猪肉进口一事中，本被誉为“战斗蓝”的几位政客在议会和媒体上的反差，更引起大陆网友的反感。近年来，国民党在“统独”立场上的摇摆不定，使大陆民众对其好感日益下滑。身为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素有“女战神”之称的某位政客，和民进党籍民意代表就猪肉进口一事共同接受媒体采访，二人似依据剧本来出演宣传片一般，片中二人互动亲密，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这样的惺惺作态，引起了不少关注台海问题的大陆网民反弹。该政客在议会“杯葛”上因“战斗”而捏造的人设，也因此饱受质疑。

此外，在政党“杯葛”时使用各类道具，被认为是带有政治做秀意味的体现。李敖曾使用“芭比娃娃”等道具来喻事明理，引发了议员、民意代表等在质询环节使用道具的热潮。而在议会“杯葛”时，政党党团会利用各类制品作为辅助“武器”，以引起立法机构更为混乱的局面。在冲突结束之后，更有两党议员被爆出私交甚笃，而在立法机构里的大打出手只不过是表演给民众看的戏码。

政客本身的自我营销行为，也是“政治娱乐化”的一部分。不同的是，综艺节目中对政客的模仿可被视为消解政治严肃性、权威性的尝试，但它们都保留了一定程度的趣味性、亲民性。当政客力图打造自身人设并努力获取曝光度的时候，其试图掩盖问题的意图就更加明显。作为曝光声量极高的政治活动，在立法机构内的议事流程不仅由官方进行直播，亦在各类媒体、自媒体的添油加醋中不断发酵。当代台湾地区议会中，民意代表已然将“杯葛”这一非常规行为当成了自己工作的一部分。党团和民意代表共同参与的“杯葛”行动看似以“双赢”的方式拉抬了两方面的声量，但挂在嘴上的民主政治正深陷泥淖，他们却视而不见。

五、结论

当代台湾地区的政治“杯葛”使得民主进程日趋僵化，围绕两党缠斗的社会氛围非但没有温和多元化，反而更加撕裂，陷入无休止的非蓝即绿的争斗。“杯葛”本身作为政治博弈的策略，本应成为政党协商崭新的突破口。然而台湾地区的政治“杯葛”演变为畸形的内耗和做秀，对其政治文化生态造成多方面的消极影响。令人担忧的并非仅是“杯葛”所带来的议会停摆，其所衍生的社会层面的相互抵制更令人感到忧虑，在“极化”标签分裂各政党支持者的社会大环境下，个人的处境也会随政党政治的风潮摇摆不定。

两党政治“极化”愈演愈烈，政治“杯葛”无休无止的状况，恐怕难以被两党自身所改变。台湾地区的民主社会面临的诸多疑难杂症，或需要通过体制的“内科手术”才能治疗。

参考文献：

- [1] 夏征农. 大辞海·世界历史卷[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1: 281.
- [2] 太蕤. 我的杯葛主义的观察[J]. 民觉, 1920, 1(1): 144.
- [3] 张伯泉. 杯葛[J]. 政学丛刊, 1920, 1(3): 50-52.
- [4] 反日消息: 十一、星洲侨胞杯葛日货之概况[J]. 反日周刊, 1928(6): 98-100.
- [5] 经济智识[J]. 国货月刊, 1935(11): 37.
- [6] 李敖. 民进党研究[M].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9: 65, 278, 284-285.
- [7] 叶怡君. 法案审议与议程阻绝——立法机构第三届到第六届的分析[D]. 台湾(地区): “中正大学”硕士论文, 2009: 37.

- [8] 尹茂祥, 钟厚涛. 台湾地区民粹主义的政治演进及影响[J]. 台湾 (地区) 研究, 2020(2): 60-68.
- [9] 王程. 民粹主义在台湾: “民粹式民主”的生成及其危机[J]. 台湾 (地区) 研究, 2022(1): 72.
- [10] 江振滔. 颜色革命的机制——以 2014 某台独事件为例[D]. 台湾 (地区): “中国文化大学”硕士论文, 2022: 19.
- [11] 李龙. 从某台独事件看台湾 (地区) 民主[J]. 台湾 (地区) 研究, 2014(6): 89.
- [12] 胡适. 胡适全集: 第 22 卷[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685.

The Origin of "Boycott" and Its Evolu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Culture of the Taiwan Region

Zhang Yiming¹

¹*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China*

Abstract: Generally speaking, Boycotting is a counteracting activity. In contemporary Taiwan region, the boycott emerged from the legislature at the end of the last century. It refers to political boycotts led by parties that use the suspension of proceedings. It is a combination of political boycott and parliamentary violence, has become a uniqu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phenomenon with Taiwan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Boycotting abused as parties' popular representation changes. It reflects the current vicious fight between political parties in Taiwan region. It also reflects in populism of Taiwan region. The boycott has changed some cultural views of Taiwanese regional people. Analyzing the culture of boycott helps us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political party struggle, also helps to understand the confusing current situation.

Keywords: boycott; parliament; populism; political entertainment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3.569

张灵慧¹、杨宁²、刘泳志¹、王婷¹、肖璐²、傅丽丽¹

(¹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社工部, 上海 闵行区 201102, ²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上海 徐汇区 200237)

摘要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治疗性合唱对慢病儿童社会融合、社会适应及社会支持的预实验效果。方法: 采用自身前后对照的预实验设计, 通过网络招募方式, 选取 13 名曾在同一儿童专科医院接受治疗的慢病儿童作为研究对象。干预过程为期 5 周, 每周一次线下集体训练, 内容涵盖合唱排练和简单舞蹈排练。在干预前后, 使用社会融合、社会适应、社会支持量表对慢病儿童进行测量。结果: 经过治疗性合唱干预, 慢病儿童在社会融合、社会适应和社会支持方面均表现出显著差异(P 值分别为 0.001、0.003 和 0.008, $P < 0.05$)。此外, 患儿的自我效能感后测分数也有所提高。结论: 治疗性合唱中的结构化训练安排、干预因素以及社会支持平台搭建等要素, 对慢病儿童的自我效能感和社会融入具有积极影响。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扩大样本量, 延长干预时间, 以全面评估其长期效果, 并探讨不同类型合唱活动或与其他干预方法的联合效果。

关键词: 治疗性合唱; 慢病儿童; 社会融入

1 引言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过去十年间, 我国儿童慢性病的发病率增加了近 30%, 目前约有 10%至 20%的儿童患有慢性疾病¹。以内分泌疾病、哮喘、肾病和血液病为主的儿童慢性病患率总体呈现上升趋势², 例如, 我国大中城市 1 型儿童糖尿病的年发病率增幅约为世界平均增幅的 3 倍³。儿童慢性病的发病率持续上升, 成为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重要挑战。慢病儿童可能面临体能下降、学业延迟、社交障碍、心理压力以及生活质量的下降等多重问题⁴⁻⁵, 不仅严重影响患儿的身心健康, 还阻碍他们及其家庭充分参与社会活动, 导致社会融入困难⁶⁻⁷。因此, 探讨如何有效提升慢病儿童的社会融入度显得尤为重要。

社会融入是社会领域研究中研究个体、群体及环境之间融合关系的概念。吉登斯提出社会融入指社会所有成员均享有公民资格, 具备政治权利并承担义务, 包括有机会参与社会互动⁸。本文认同有学者提出的慢病儿童的社会融入概念, 即慢病儿童通过自我调适和搭建社会网络支持, 在其生活空间中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关系, 从而减少社会排斥风险, 并获得尊严感和满足感, 提升生活质量的过程⁹。

治疗性合唱结合了音乐与医学, 通过集体歌唱促进身心健康, 强调参与感和疗愈效果¹⁰。治疗性合唱通过音乐的节奏、旋律与和声提升情绪, 激发大脑中的多巴胺分泌, 同时集体歌唱产生的共鸣振动有助于放松身体、缓解压力。研究表明, 合唱能增强信任感和合作倾向¹¹, 音乐治疗对儿童及其家庭有显著心理社会支持, 提升社交、情绪和语言能力, 以及提高儿童对焦虑和疼痛的管理能力¹², 改善学习效能和心理健康¹³, 并有效管理焦虑和疼痛。已有研究还发现, 合唱干预提高了自闭症儿童的日常生活能力和人际认知功能¹⁴。因此, 本研究旨在通过治疗性合唱这一干预方式, 为慢病儿童提供新的心理支持和社会融入途径。

基金项目: 上海市医苑新星青年医学人才培养资助计划 (编号: 沪卫人事[2022]65 号)

第一作者: 张灵慧, 上海市闵行区万源路 399 号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通过网络招募方式,选取到 13 名曾在同一儿童专科医院接受治疗的慢病儿童作为研究对象。这些儿童均为自愿报名,且家长或监护人已同意参与研究。研究对象包括患有不同类型慢性疾病的儿童,如糖尿病、哮喘、血液病等。研究对象包括患有不同类型慢性疾病的儿童,这些儿童均需要长期随访治疗,且在社会融入方面面临不同程度的问题。

2.2 研究目标²

本次研究希望通过“小彩虹慢病儿童合唱团”的活动,探讨以下两个研究目标:

1. 探索在治疗性合唱过程中,慢病儿童的情绪变化和自我评价是否发生显著变化。将通过情绪日记和自我评价问卷来测量这些变化,以评估合唱活动对儿童情绪管理和自我认知的潜在影响。
2. 评估治疗性合唱对慢病儿童社会融合、社会适应与社会支持的促进作用。我们将通过相关量表和家长的反馈来考察这些方面的变化,以了解合唱作为一种集体活动,如何在这些方面提供支持。

2.3 研究设计

本研究为自身对照干预研究,13 名慢病儿童在 5 周的时间内,每周一次线下集体训练,并在训练结束后完成线上家庭作业。在第一次线下训练前和最后一次表演后,分别使用相关量表对慢病儿童进行测量。

2.4 干预措施

合唱团的教学、指导和排练工作由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学生完成,组织协调工作由医务社工负责。干预内容包括学习一首歌曲和简单舞蹈动作,并在训练结束后参加医院慈善晚宴的公开表演。干预过程中,特别注重结构化训练安排、干预因素以及社会支持平台搭建等要素的实施。

1. 结构化训练安排:每次排练都在医务社工和合唱老师的带领下依次进行热身练习¹⁵、合唱训练、总结分享三个环节。在第一次活动中,有破冰、活动介绍、人员介绍、制定契约、歌曲背景学习等环节。在最后一天活动结束后有活动总结、表彰患儿和分享会等活动。

2. 干预因素:就合唱目标、训练形式、团队契约、表彰总结作为合唱过程的干预因素。医务社工事先和合唱老师沟通合唱目标和执行要素,合唱训练不过分追求艺术效果,而是以鼓励社交互动和自信表演为主,如活动中两两一组完成训练,促进儿童之间的互动;给每位儿童单独练唱机会,并根据个体化情况及时表扬赞赏反馈提升其自信¹⁶;同时合唱老师注意调动合唱团儿童对歌曲的情感¹⁷;医务社工在每次活动过程中发挥组织协调、强调契约精神及应急干预的作用。在最后一次表彰时对每位小朋友的表现进行针对性点评表扬并发放了活动证书。

3. 社会支持平台搭建:此次活动过为儿童提供同辈支持平台,通过介绍合唱团背景以及制定契约,约束合唱团成员之间相互包容接纳、正向影响和促进激励。同时积极链接外部社会资源,为合唱团儿童提供 3 场公开演出机会,进行儿童精神风貌的展示,促进儿童社会融入,以治疗性合唱的方式开展生命教育的社会倡导。

根据小彩虹合唱团的活动安排,本次研究采用了无对照组的前后测设计,观察儿童在五次合唱活动前后的变化以考察本次活动对儿童的社会融合、社会适应和社会支持的影响。

2.4 资料采集与测量方法

本研究使用图片工具笑脸评定测量表 (Smiley-face Assessment Scale) 来记录活动过程前后的儿童情绪变化 (见图 1),该图片工具包括 7 个代表不同情绪的表情图片和活动自我表现评分,图片从左往右依次计分为 1-7 分,记录每个儿童参加活动前和活动后的情绪得分与自我评价表的分数,分数越高代表情绪越好,自我评价越高。



图 1 笑脸评定测量表

本研究使用了社会融合量表、社会适应量表和青少年支持量表，共包括 38 个条目。儿童的社会融合情况使用社会融合量表，包括 9 个条目，内容涉及儿童日常的社会融入感受和行为，例如“我感到格格不入，非常孤独”，量表适用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五点计分，总分越高代表儿童的社会融入效果越好。儿童的社会适应使用了社会适应量表，该量表包括 19 个条目，例如“在陌生人面前，我常无话可说，以至感到尴尬。”本量表有三个选项，分别为“是”“不确定”和“不是”，被记录为 0 分、1 分和 2 分，总分越高代表儿童的社会适应能力越好。儿童的社会支持情况适用青少年支持量表，包括 10 个条目，如“我经常能够得到同学、朋友的支持”，同样采用李克特量表五点计分，总分越高代表儿童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充足。同时，本次研究设计了儿童的背景问卷来了解儿童的基本情况。数据收集后，采用 SPSS 21.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对慢性患儿前后测分数进行配对 T 检验，查看 P 值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以确保研究结果的科学性。

3 结果

3.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样本 13 名儿童，年龄范围为 5-10 岁，其中女孩 8 名，男孩 5 名。所患类型为一型糖尿病及其他内分泌遗传代谢疾病、精神性口吃、杜氏肌营养不良、硬皮病、急性 B 淋巴细胞白血病（结疗随访）等。（见表 1）。

表 1 基本信息

指标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5	38.5
	女	8	61.5
年龄	5-7 岁	4	30.8
	8-10 岁	9	69.2

3.2 自我效能感的变化

经过五次合唱团活动，儿童的情绪得分和自我评价显著提高，此差距具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 ）（见表 3）。这表明合唱团活动对儿童的自我效能感具有积极影响。

表 2 方差齐性检验

	莱文统计	自由度 1	自由度 2	显著性
情绪变化	.065	2	7	.938
自我评价	4.714	2	7	.005

表 3 儿童情绪变化和自我认知配对样本 t 检验

		N	平均值	标准差	配对差值	显著性 (双尾)
情绪变化	笑脸评定表前测	13	3.00	1.080	0.268	0.000
	笑脸评定表后测	13	6.46	0.519		
自我评价	自我评价前测	13	81.31	5.648	1.253	0.000
	自我评价后测	13	95.00	3.266		

3.3 社会融入的变化

合唱团活动还显著提高了慢病儿童的社会融合、社会适应和社会支持水平 ($P<0.05$) (见表 5)。这表明治疗性合唱对慢病儿童的社会融入具有积极作用。

表 4 方差齐性检验

	莱文统计	自由度 1	自由度 2	显著性
社会融合	.449	2	7	.655
社会适应	1.755	2	7	.241
社会支持	2.634	2	7	.140

表 5 儿童的社会融合、社会适应和社会支持配对样本t检验

		N	均值	标准差	配对差值	显著性 (双尾)
儿童社会融合	SI前测	13	27.15	9.045	2.336	< 0.001
	SI后测	13	43.23	1.739		
儿童社会适应	SA前测	13	38.00	11.676	3.413	0.003
	SA后测	13	50.38	7.388		
儿童社会支持	SS前测	13	42.31	6.316	1.898	0.008
	SS后测	13	48.31	2.594		

3.4 综合分析

由此可见,治疗性合唱对儿童的正向情绪促进、自我评价、社会融合、社会适应、社会支持均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些发现支持了合唱作为提升慢病儿童社会融入度的一种有效干预手段的假设。通过分析发现,慢病儿童前后测在社会功能和自尊心方面的提升,与其参与合唱活动的频率和积极性密切相关。这表明,治疗性合唱训练能够通过集体活动和团队合作,有效提升慢病儿童的社会功能和自我效能感。

4 讨论

4.1 治疗性合唱的影响机制

在参加治疗性合唱的过程中,结构化训练安排、干预因素、社会支持平台搭建的三个组成要素能够促进慢性病儿童的自我效能感和社会融入。治疗性合唱活动不仅让慢病儿童在愉快的音乐环境中学习合作,还通过共同完成音乐作品增强了他们的成就感和归属感。具体来说,治疗性合唱通过多种机制对慢病儿童的社会融入、社会适应、社会支持等方面产生影响。首先医务社工以合唱为载体进行干预,在活动破冰、合唱训练、总结分享进行结构化设计,使其不仅是单纯的合唱训练,而是成为对儿童社会心理成长具有影响的干预行为,因此在后续类似活动设计中注意结构化训练的设计。其次,带有治疗性的合唱有利于儿童情绪抒发,通过共同练习歌曲不但加强彼此的情感联结,合唱老师和医务社工及时的嘉奖、鼓励和表彰更是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对其进行社会融合与社会适应起到积极作用。社会支持包括提供支持的正式关系和非正式关系的社会支持网络,以及通过社会支持网络所提供的实质性、情绪性、信息性、自尊性支持。最后,医务社工链接资源为儿童提供院内排练和院外公开演出机会,搭建了平等、接纳、良性互动的同辈支持和社会支持平台,这些平台通过定期组织音乐课程,让孩子们有机会参与从排练创作到舞台表演的全过程。活动结束后社会工作者针对部分慢病儿童及家长进行了简单的访谈,主要了解参与合唱团对慢病儿童的影响:

“咱们每个人都是最棒的!”(患儿 1)

“希望我们继续再一起玩。”(患儿 2)

“在这里我的孩子和所有正常孩子一样的自信。”(家长 1)

“看到孩子从最初拘束到后面和大家一起玩耍、一起排练,看得出来他在这里真的很开心。”(家长 2)

“虽然没有问过别的孩子生什么病,但大家都心照不宣相互接纳和支持,没有歧视,更多的是同病相怜的善意鼓励。”(家长 3)

“慢性病对自己家来说是一个梗,但是这个活动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很好的,我们就是正常的小朋友。”

(家长 4)

“我家小朋友去学校里讲这个（合唱团）经历，大家都羡慕她。”（家长 5）

由此可见，合唱团活动显著提升了慢病儿童的自信心和自我效能感。

4.2 与现有研究的比较

本研究结果与前人研究具有一致性，证明了音乐疗法尤其是合唱活动在提升特殊群体社会行为方面的有效性。同时，本研究更侧重于慢病儿童这一特定群体，为音乐疗法在儿童心理健康和社会融入领域的应用提供了新的视角。

4.3 研究结果的意义

研究表明，包含治疗性合唱在内的艺术疗愈类活动对慢病儿童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因此，在医务社工的实践中可增加相关的病友俱乐部活动，以完善儿童的正式和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搭建社会支持平台，并更多探讨不同艺术疗愈形式对慢病儿童针对性干预的影响。同时，慢病儿童参与各类艺术演出也为医务人员和社会群体提供看见这类群体真正需求的机会，对改善儿童的生活质量、倡导儿童社会融入问题的社会关注、促进儿童的全人健康有积极作用。因此，在医院和社区中推广合唱活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本研究也为医务社工的实践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5. 研究不足和展望

尽管本研究结果具有积极意义，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扩大样本量、延长干预时间以全面评估其长期效果，并探讨不同类型合唱活动或与其他干预方法的联合效果对慢病儿童社会融入的具体影响。同时，还可探讨音乐干预方法在不同文化和社经背景下的适用性。通过跨文化和跨社经背景的研究，可以为全球范围内提升慢病儿童的生活质量提供更多的理论和实践支持。

参考文献

- [1] 潘慧,左青怡,杨筱,陈适,赵丽.体、卫、教融合的主动健康模式是青少年慢病防控的重要手段[J].协和医学杂志,2024,15(1):211-216.
- [2] 张国成.重视儿童慢性病对生长发育的影响[J].发育医学电子杂志,2017,5(4):198-201.
- [3] 罗飞宏.儿童 1 型糖尿病的诊治与展望[J].临床儿科杂志,2022,40(5):321-327.
- [4] 刘婷婷,刘伟,冯蕊.学龄期儿童慢性病患病情况及相关行为特点[J].中国卫生工程学,2020,19(02): 212-214.
- [5] Puhr A,Ruud E,Anderson V.et al. Executive function and psychosocial adjustment in adolescent survivors of pediatric brain tumor[J].Dev Neuropsychol,2021,46(2):149-168
- [6] 刘倩,莫霖,唐心悦,余璐,刘洋.儿童和青少年癌症幸存者创伤后成长现状及影响因素[J]. 中国护理管理, 2021, 21 (05): 674-679.
- [7] Ernst M,Brahler E,Wild P S,et al. Loneliness predicts suicidal ideation and anxiety symptoms in long-term childhood cancer survivors[J].Int J Clin Health Psychol.202121(1):100201
- [8] 徐丽敏.“社会融入”概念辨析[J].学术界,2014,(7):84-91.
- [9] 陈美旭,吕利明,杨晓霞,任燕语.儿童癌症幸存者社会融入的研究进展[J].护理学杂志,2022,37(22):98-101.
- [10] 王斐.团体音乐治疗对于脑瘫儿童社交功能的作用[J].中外企业文化,2021,(5):108-109.
- [11] Anshel, A., & Kipper, D. A. (1988). The influence of group singing on trust and cooperation.JOURNAL OF MUSIC THERAPY, 25(3), 145-155
- [12] 李力红,马帅.合唱对个体发展的促进作用[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247-252.
- [13] 李筱,傅丽丽,张灵慧,钟艳霞.慢性患儿音乐活动的成效探索——以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小彩虹慢性病儿童合唱团”活动为例[J].中国社会工作,2019,(30):23-28.
- [14] 汪春兰.音乐疗法在自闭症儿童社会情感培养中的应用[J].炫动漫,2023,(18):256-258.
- [15] 唐懿姝.合唱声乐训练探析[J].黄河之声,2023,(13):174-177.
- [16] 李语檬.音乐合唱教学对幼儿歌词技巧的训练[J].黄河之声,2024,(12):142-145
- [17] 张艺林.探究情感启示在合唱指挥中的功能及运用[J].黄河之声,2024,(18):162-165.

A pre-experiment research on the effects of therapeutic choir on children with chronic diseases in social integration

Linghui Zhang¹, Ning Yang², Yongzhi Liu¹, Ting Wang¹, Lu Xiao², Lili Fu¹

¹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Children`s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²School of Social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he research aimed to explore the pre-experimental effects of therapeutic choir on children with chronic diseases in terms of social integration, social adaptation, and social support. Methods: Adopting a pre-experimental design with before-after study, we recruited 13 children with chronic diseases online, who had previously received treatment at the same pediatric hospital. Within 5 weeks of intervention, an offline group training was organized weekly to conducted choir rehearsals and simple dance rehearsals. Measurements were made through the relevant scales on social integration, social adaptation, and social support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Results: After the therapeutic choir intervention, these children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n social integration, social adaptation, and social support (P-values were 0.001, 0.003, and 0.008, respectively, $P < 0.05$). Additionally, the post-intervention scores showed that self-efficacy of the children was also enhanced. Conclusion: Therapeutic choir activities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children with chronic diseases in the aspects of self-efficacy and social integration owing to structured training, interference and a social support platform. A larger sample size would be expected in future research with a longer intervention period to make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long-term effects, and explore the joint effects of different choir activities or other intervention methods.

Keywords: Therapeutic choir; Children with chronic diseases; Social integration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3.827

基于自然辩证法视角浅谈足球运动的技术动作发展

梅润¹ 杨林² 杨墨堃¹

(1 南宁师范大学, 广西 南宁 530199, 2 北部湾大学, 广西 钦州 535011)

摘要: 足球是全球范围内最受欢迎和广泛传播的体育运动之一, 无论国籍、种族、宗教或文化背景如何, 足球都能够跨越界限, 将人们连接在一起。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案例分析法以及哲学分析法。旨在足球技术动作中, 自然辩证法通过对足球技术动作发展阶段与规律进行分析, 了解足球运动技术动作发展的过程与方向, 从而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掌握足球运动技术动作。研究得出发展路径: 对立统一规律与技术动作发展、量变质变规律与技术动作提升、否定之否定规律与技术演进、科技人才观突破人才的堵点。结论为: 需遵循“守正创新”的辩证原则、传承经典技术的精髓、拥抱科技革命范式革新、构建“科研-训练-比赛”发展体系。旨在为广大足球运动员和爱好者提供一定帮助和参考建议。

关键词: 自然辩证法; 足球运动; 技术动作; 发展

一、引言

自然辩证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构成, 揭示自然规律与科技演进法则, 提供认识与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论, 体现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科技观与方法论的有机统一^[1]。足球运动作为人类身体文明的典型载体, 其技术动作的演进本质上自然辩证法规律在运动领域的具象化呈现。在全球化与科技革命双重冲击下, 现代足球技术发展已超越单纯的生物运动范畴, 演变为包含生物性、技术性、社会性的复杂矛盾系统。传统研究多聚焦于技术动作的生理机制或训练方法等单一维度, 未能揭示其内在的辩证运动规律。自然辩证法视角下, 足球技术的生成与嬗变始终遵循对立统一、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三大规律: 生物机能与意识创造的矛盾推动技术突破, 装备革新与身体感知的异化倒逼训练范式重构, 全球化标准与在地化特质的博弈催生新技术生态。本文通过解构技术发展中的多重矛盾关系, 揭示足球运动技术的双重革命揭示, 在阐述运动技术的发展路径, 为突破技术训练瓶颈提供哲学方法论支撑。

二、双重革命性研究意义

(一) 为技术训练创新提供哲学依据

对立统一规律作为唯物辩证法的核心法则, 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根本联系与内在动力。其本质在于矛盾的辩证运动: 对立面的同一性(相互依存、转化)与斗争性(相互排斥、冲突)构成事物存在的双重逻辑; 矛盾的普遍性(贯穿一切领域)与特殊性(具体形态差异)体现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 矛盾的不平衡性(主次矛盾及矛盾主次方面)则规定了系统演进的方向性。三者共同构建了事物从量变到质变的动态发展机制^[2]。对立统一规律揭示攻守技术的共生关系, 指导训练中的“矛盾模拟”; 量变质变规律强调万次触球积累后的技术质变, 为周期训练计划提供理论依据; 否定之否定规律阐明技术风格的螺旋上升, 帮助教练把握创新方向。

(二) 深化对足球本质的哲学认知

技术动作不仅是肌肉记忆, 更是“攻守矛盾”“虚实相生”等辩证范畴的具象化。理解技术演进中的否定之

作者简介: 梅润(2001-), 男, 汉族, 贵州毕节人, 硕士在读, 研究方向: 体育文旅, 民族传统体育, 体育教学与训练, 足球训练与理论。

杨林(2000-), 男, 汉族, 贵州贵阳人, 硕士在读, 研究方向: 民族传统体育、体育旅游、体育教学。

杨墨堃(2000-), 男, 汉族, 陕西铜川人, 硕士在读, 研究方向: 体育教育与训练。

否定,就能洞察足球运动作为"社会缩影"的深层规律——从野蛮对抗到战术博弈,恰是人类文明辩证发展的微观投射。这种哲学升维,使足球超越体育范畴,成为解读社会演进的动态密码。

（三）问题的提出

自然辩证法作为一种揭示自然界普遍联系和发展规律的哲学方法,如何应用于足球领域,以揭示足球技术动作发展的内在规律?具体而言,本研究旨在探讨自然辩证法中的对立统一、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等原理,如何帮助我们理解足球技术动作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以及这些原理如何指导我们科学地分析和优化足球技术训练,从而提高运动员和运动兴趣爱好者的技术水平和比赛表现。

二、攻防之间藏规律,绿茵场上证辩证

绿茵场上的攻守博弈,是动态演绎的哲学典籍。锋线突破与铁卫封堵构成矛盾两极的辩证对话,攻守态势在否定之否定中螺旋上升。直塞撕裂防线、弱旅铜墙铁壁终被绝杀,生动诠释量变到质变的规律。三中卫体系显整体与局部辩证,高位逼抢交织必然与偶然,点球大战终局矛盾转化——足球战术的每个细节,都在书写唯物辩证法的鲜活注脚。

（一）对立统一与攻防矛盾的永恒博弈

自然辩证法中的对立统一规律,在足球运动的攻防矛盾中得到了生动诠释。攻与守作为一对矛盾体,既对立又统一:进攻旨在突破防线,防守则力求遏制威胁,二者相互依存、相互转化。比赛中,一次成功的抢断能让防守方瞬间转为进攻主导,而前锋的积极回防也能化解对手的攻势,这种角色转换体现了矛盾双方的渗透与贯通。足球战术的演变,从早期“全员进攻”到现代“攻守平衡”体系,正是对攻防矛盾的不断协调与优化。这种永恒博弈,既是比赛魅力的源泉,也是足球运动发展的核心动力。

（二）量变质变与积累爆发的跃迁

唯物辩证法指出,事物是量和质的统一,经历量变(数量变化)和质变(质态飞跃)。量变和质变相互渗透,量变中含部分质变,质变具有量特征。改革开放是量变与质变交织的持续发展过程^[3]。自然辩证法中的量变质变规律,深刻揭示足球运动积累与爆发的内在逻辑。球员每日训练中的技术打磨、体能储备,是量变的积累;比赛中关键进球、扑救,则是质变的爆发。山东泰山通过青训与引援的沉淀,从低谷跃升至中超前列;而青岛足球困局,恰是量变缺失导致的质变难产。中国足球长期依赖外援单打独斗,忽视整体积累,终陷退化循环。唯有在高强度对抗、科学训练中持续积累,方能在赛场实现质变飞跃。量变是根基,质变是升华,二者共同书写足球运动的突破篇章。

（三）否定之否定：战术与体制的螺旋进化

否定之否定规律展示事物内在矛盾驱动的螺旋发展,经旧质消解与新质重构,实现自我更新与超越,体现历史演进统一^[4]。足球技术演变深刻体现否定之否定规律,早期长传冲吊被西班牙传控足球否定,后者强调短传渗透;但传控体系又被高位逼抢战术革新,通过积极压迫打破控球节奏。每次技术迭代均是对前者的扬弃:否定单一模式,继承核心要素,催生新风格。这种“传统→创新→再创新”的螺旋循环,推动足球技术持续进化,既是竞技规律使然,也是辩证法在绿茵场的生动实践。

三、影响足球技术动作发展的因素

影响足球技术动作发展的因素包括生理、心理、技术训练、环境、规则变化、装备发展和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生理因素涉及身体素质、年龄发育和性别差异,直接影响技术动作的完成。心理因素如认知能力、情绪状态和自信心,影响技术动作的选择和执行。技术训练因素包括训练方法、量与强度以及教练员水平,对技术提升至关重要。环境因素如场地和气候条件,以及比赛规则的变化,都会对技术动作产生影响。装备的科技进步,如球鞋和足球的性能改进,同样重要。此外,不同地区的足球文化背景和教育体系,也会影响技术动作的风格和普及。综合考量这些因素,有助于更有效地进行足球技术训练,提升运动员技术水平。

四、足球技术动作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运动员自身因素对技术发展的决定性影响主要体现在生理基础、心理特质、训练转化和自我驱动四个层面。生理基础方面,身体素质为技术动作提供了物质支撑,骨骼肌肉的发育程度决定了动作的幅度与稳

定性,而神经传导速率则影响着技术动作的响应速度;心理特质方面,空间认知能力决定了技术决策的质量,抗压心理则确保了在关键时刻动作的稳定性,运动员的“大心脏”特质使其能在关键比赛中完成高难度射门;训练转化方面,本体感觉能力影响动作矫正的效率,运动记忆容量则决定了技术掌握的速度,运动员刻进骨子的球感,小罗、梅西等人的球感便是神经可塑性优势的体现;自我驱动方面,学习意愿是技术进化的催化剂,C罗对足球艺术的执着追求使其“任意球”技术日益精进。

五、运动员本体因素对技术动作发展的影响

运动员本体因素对技术动作发展的影响遵循辩证运动规律。生理条件作为技术发展的物质基础(肯定阶段),骨骼肌肉等机能提升为技术创新提供可能。但生理限制与技术目标的对立构成矛盾(否定阶段),通过科学训练突破制约,实现技术升级(否定之否定)。心理因素与技术动作形成动态循环:认知能力指导动作精细化,而技术固化又强化心理稳定性。该过程本质是生理-心理要素的辩证统一,量变积累与质变突破(技术革新)螺旋演进方式,最终推动运动技术持续发展。

六、技术动作发展的突破路径

(一) 对立统一规律与技术动作发展

攻守对立在技术动作中展现为动态的映射关系是进攻技巧(例如穿裆过人)与防守技巧形成矛盾的两端,它们既相互对抗又相互依存。这种矛盾推动了技术的演变——防守技术的加强激发了更为巧妙的进攻手段,而进攻技术的创新又促使防守技术更加细腻。技术要素之间存在着辩证的紧张关系是速度与准确性往往呈现出一种反向关系,力量与灵活性也常常相互制约。然而,矛盾同样催生了融合与创新,技术的量变积累导致了质变,这体现了量变质变的规律。

(二) 量变质变规律与技术动作提升

量变质变规律在技术突破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技术积累的量化过程是这一规律的具体体现。在足球等技术密集型活动中,运动员的技术进步是通过无数次的练习和积累实现的。这些练习构成了技术的量化过程,每一滴汗水都是量变的见证。随着技术积累的不断加深,质变瞬间成为可能。首先,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没有足够的量变,就不会有质变的发生。其次,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当技术积累达到一定阈值时,技术水平的提升便会在一瞬间实现。质变的辩证特征还体现在其突发性和显著性上。技术突破往往在一瞬间发生,这一瞬间,运动员的技术水平从一个层次跃升至另一个层次,表现出显著的不同。这种质变是不可逆的,一旦发生,便标志着技术的飞跃和提升。因此,技术积累的量化过程和质变瞬间的辩证特征共同揭示了技术突破的本质:它是通过长期的量变积累,最终达到质的变化,这一过程既是渐进的,也是突变的,体现了量变质变规律的深刻内涵。

(三) 否定之否定规律与技术演进

否定之否定规律在足球动作技术发展体现为技术的不断革新与升华。初始阶段,运动员掌握基本技术,这是技术的肯定阶段。随后,随着比赛需求提升,原有技术被运动员和教练否定,通过训练和创新,发展出更高效的技术动作,这是技术的否定阶段。最终,这些创新技术经过实践检验和优化,形成更为成熟的高级技术形态,实现了否定之否定。这一过程使得足球技术不断循环上升,从简单到复杂,从低效到高效,推动了足球运动的整体发展。

(四) 科技人才观突破人才的堵点

自然辩证法视角下,足球人才发展遵循矛盾运动规律,技战术素养积累与赛事突破体现质量互变。面对技术传承与人才断层、训练科学化与基层保障不足的矛盾,需构建辩证统一的培养体系。民间足球生态需改善物质条件,实现人才培育的螺旋上升。足球人才培养是系统工程,需统一主体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融合传统与现代,建立全面培养机制,激活足球人才的特殊生产力。科技人才观提到,“要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形成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5];为营造人尽其才的政策环境,国家在足球人才培养和保护中应差异化满足人才需求,实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首先,培养中不仅要提升思维,还要深化足球内涵,塑造运动员的“形”与“神”。其次,对民间足球俱乐部和培养基地,应提供物质支持,确保资源充足。便于让他们能全身心投入足球人才培养工作中,才能更好的发展足球技术^[6-7]。

七、结语

自然辩证法作为揭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哲学武器,为解析足球技术动作演进提供了深邃的

理论框架。本文通过解构对立统一、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三大规律在绿茵场上的具象化呈现,揭示了足球技术发展的内在动力:攻防矛盾的对立转化推动战术革新,量变积累的持续深化催生技术质变,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循环实现风格跃迁。足球技术动作绝非孤立存在,而是生理机能、心理特质、训练体系、装备科技与社会文化多重因素辩证作用的结果。运动员本体要素的辩证运动,生理条件的物质支撑与精神意志的能动突破,构成了技术发展的双螺旋结构。量变积累的微观迭代与质变飞跃的宏观突破,则共同绘制出技术演进的动态轨迹。面向未来,足球技术动作的发展需遵循"守正创新"的辩证原则。既要传承经典技术的精髓,更要以开放姿态拥抱科技革命带来的训练范式革新。通过构建"科研-训练-比赛"三位一体的发展体系,实现技术积累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唯有把握自然辩证法的理论精髓,方能在全球化竞技浪潮中,推动中国足球技术实现真正的凤凰涅槃。

参考文献:

- [1] 贾子明.从自然辩证法视角谈运动竞技与训练[J].体育视野,2023,(07):116-118.
- [2] 邓岚,沙爱龙.对立统一规律在高中生物学教材中的体现及教学运用[J].生物学教学,2025,50(02):83-85.
- [3] 贾丽民.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唯物辩证法意蕴探赜[J].长白学刊,2025,(01):20-30.
- [4] 肖剑.“否定之否定规律”研究再反思[J].黑河学院学报,2024,15(08):44-46.
- [5] 叶婷,谢相和.从自然辩证法的角度来看待体育观的发展[J].体育风尚,2021,(03):143-144.
- [6] 刘佳月.透过自然辩证法解析体育教学[J].当代体育科技,2021,11(08):36-38.
- [7] 刘真.用自然辩证法的角度看待校园足球开展中所存在的问题[J].当代体育科技,2018,8(05):255-256.
- [8] 刘世宇.《自然辩证法》的自然观对黑格尔自然观的继承与超越[J].今古文创,2025,(11):79-81.
- [9] 《自然辩证法研究》2025年重点选题[J].自然辩证法研究,2025,41(02):146.
- [10] 刘凯亚.恩格斯辩证法思想的哲学内蕴与价值重估[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4,45(05):109-116.
- [11] 黄蓝敏,甘建宇,孔凡明,等.成熟度与青少年足球人才识别:方法、影响与展望[J].中国体育科技,2024,60(06):10-20.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ical Movements in Footbal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alectics of Nature

Mei Run¹ Yang Lin² Yang Zhaokun¹

1.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199

2. Beibu Gulf University, Qinzhou, Guangxi 535011

Abstract: Football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and widely spread sports worldwide. Regardless of nationality, race, religion, or cultural background, football can cross boundaries and connect people together. Dialectics of nature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Marxism. It is a science that studies the general and specific laws of development in nature and human society, guiding us to study the objective world and its laws of mo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 itself. In football technical movements, dialectics of nature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stages and laws of football technical movements, understands the process and direction of football technical movement development, and enables us to better grasp football technical movements. This article combines dialectics of nature to analyze the phenomena presented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football technical movements, aiming to provide certain help and reference suggestions for football players and enthusiasts.

Keywords: Dialectics of Nature, Football, Sports Techniques, Actions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3.832

乡村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现状、挑战与策略

赵赞¹ 曾丽妃¹

(¹ 湖南工程学院 计算科学与电子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4)

摘要：在全球聚焦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乡村绿色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成为联结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与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布局的关键纽带。本文通过深入且全面的研究，精准剖析我国乡村绿色经济的现实发展态势，系统梳理当前面临的阻碍，并从科技创新驱动、产业深度融合、政策优化支持三个维度，创新性地构建推动乡村绿色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策略体系。旨在为乡村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的完善提供支撑，同时为实践提供切实可行的操作指南，助力乡村在经济与生态协同发展的道路上稳健前行。

关键词：乡村振兴；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驱动；产业深度融合；政策优化支持

一、引言

乡村在我国生态体系中占据着无可替代的关键地位，宛如一幅自然馈赠的锦绣画卷，广袤的土地上蕴藏着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山川、河流、森林、田野等构成了乡村独特的生态景观，这些资源不仅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宝贵财富，更是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石。发展乡村绿色经济，已然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其重要性不言而喻^[1]。

从生态层面来看，这是守护绿水青山的必然选择。在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当下，乡村绿色经济发展能够有效维护生态平衡，减少环境污染，保护生物多样性。通过推行绿色种植、生态养殖等模式，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避免过度开发与浪费，让乡村的生态环境得以休养生息，持续焕发生机与活力。从经济角度而言，乡村绿色经济为乡村经济增长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绿色产业的蓬勃兴起，如绿色种植、生态养殖以及乡村生态旅游等，如同星星之火，逐渐形成燎原之势^[2]。绿色种植摒弃了传统农业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的模式，采用绿色环保的种植技术，生产出高品质、无污染的农产品，满足了消费者对健康食品的需求，从而在市场上获得更高的价格优势，为农民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生态养殖注重动物的生长环境与福利，遵循自然规律，生产出的畜禽产品品质优良，深受市场青睐。而乡村生态旅游更是凭借乡村独特的自然风光、民俗文化等资源，吸引了大量城市游客，带动了当地餐饮、住宿、农产品销售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新引擎^[3]。

尤为重要的是，乡村绿色经济发展对改善民生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随着绿色产业的繁荣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让农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增收。以往外出打工的农民纷纷选择回乡创业就业，既照顾了家庭，又增加了收入，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提高^[4]。在绿色经济的带动下，乡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逐步提升，城乡经济、收入差距逐渐缩小，为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双碳”目标和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的时代大背景下，发展乡村绿色经济更是迫在眉睫。这不仅高度契合绿色发展理念，顺应了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潮流，更是乡村实现可持续繁荣，达成经济、生态、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乡村绿色经济的发展，将为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贡献重要力量，同时也将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强大动力，让乡村成为人们向往的诗意栖居之地^[5]。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24C0369)；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项目(HNJG-20230965)；2023年度湖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湘教通〔2023〕237号)

作者简介：曾丽妃(2004—)，女，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大数据分析。

通信作者：赵赞(1993—)，女，硕士，研究方向为经济和教育统计分析；

二、乡村绿色经济发展现状

（一）绿色农业发展初显成效

在当今时代，各地积极投身于绿色农业模式的探索与实践，犹如一场绿色革命在广袤的乡村大地悄然兴起。以长江中下游水稻主产区为例，科技的力量正深刻改变着传统农业的面貌。农户借助先进的土壤光谱检测仪器，能够精准测定土壤养分含量，如同为土壤进行一次全面体检。随后，操控带有智能变量施肥系统的农机，根据土壤养分状况进行精准施肥。这一创新举措，不仅大幅减少了化肥的使用量，有效降低了面源污染对土壤和水体的危害，还实现了水稻产量的稳步增长和品质的显著提升，同时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农业生产经济效益。数据显示，采用这种精准施肥技术后，化肥使用量平均减少了 20%-30%，水稻亩产量提高了 10%-15%，农户的经济效益得到了明显改善。

与此同时，全国绿色农产品认证工作也在稳步有序地推进。山东烟台的果农堪称践行绿色理念的典范。在果园选址阶段，他们充分考虑土壤质量、光照条件以及周边生态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精心挑选出最适宜苹果生长的土地。在种植过程中，严格遵循绿色技术规范，采用物理、生物手段防治病虫害。例如，悬挂糖醋液诱捕果蝇，释放捕食螨捕食红蜘蛛等害虫，坚决禁用高毒农药，从源头上保障了苹果的品质安全。在施肥环节，优先选用有机肥与缓释肥，并严格控制肥料用量，确保土壤养分均衡，为苹果树的生长提供良好的土壤环境。通过这些努力，烟台果农成功打造了多个绿色苹果品牌，其产品以色泽鲜艳、口感鲜美、绿色安全的特点，不仅畅销国内高端商超，还远销欧亚等国际市场，赢得了国内外消费者的广泛赞誉和高度认可。目前，烟台绿色苹果的市场份额逐年递增，出口量占全国苹果出口总量的相当比例，为当地农业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二）乡村生态旅游蓬勃兴起

随着城市居民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对乡村生态环境向往的日益加深，乡村生态旅游如同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迅速成为乡村绿色经济的新增长点。众多乡村充分挖掘自身的自然风光、民俗文化等独特资源，精心开发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旅游项目，如充满农家风情的农家乐、温馨舒适的乡村民宿、趣味十足的生态采摘等，为游客提供了亲近自然、体验乡村生活的绝佳机会。

云南丽江周边的一些乡村，凭借优美的田园风光与独特的纳西族文化，成功打造了集农家乐、乡村民宿、民俗体验于一体的特色旅游品牌。在这里，游客可以漫步在如诗如画的田园间，欣赏到四季变换的美景，感受大自然的宁静与美好。走进农家乐，品尝到地道的纳西族美食，领略当地独特的饮食文化。入住乡村民宿，体验纳西族传统的建筑风格与温馨的居住环境，仿佛置身于一个世外桃源。参与民俗体验活动，如手工制作纳西族传统服饰、学习纳西族歌舞等，深入了解纳西族的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这些特色旅游项目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光旅游，据统计，丽江周边乡村旅游的游客接待量逐年攀升，年增长率达到了 15%-20%，带动了当地餐饮、住宿、农产品销售等相关产业的繁荣发展，实现了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的华丽转身。

浙江省安吉县同样是乡村生态旅游发展的成功典范。安吉县凭借得天独厚的良好生态环境，坚定不移地走绿色发展之路，大力发展乡村旅游。通过精心打造“白茶小镇”“余村”等一批特色乡村旅游品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在“白茶小镇”，游客可以参观白茶种植园，了解白茶的种植、采摘、制作过程，品尝清香四溢的白茶，还可以购买到正宗的安吉白茶作为伴手礼。而在“余村”，游客亲身感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实践，欣赏到美丽的乡村风光，体验到乡村休闲旅游的乐趣。安吉县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不仅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增长，还极大地改善了乡村的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提升了乡村的整体形象和知名度。安吉县乡村旅游收入连续多年保持高速增长，占全县 GDP 的比重不断提高，成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三）农村清洁能源利用逐步推广

在农村地区，清洁能源的利用正日益受到重视，并得到广泛推广，为乡村绿色经济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太阳能热水器、太阳能路灯等太阳能设备在广大农村地区如繁星点点，广泛应用。太阳能热水器的普及，让农民享受到了便捷、清洁的热水供应，既节省了传统能源的使用成本，又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太阳能路灯的安装，照亮了乡村的夜晚，方便了村民的出行，同时也为乡村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农村地区太阳能热水器的普及率已超过 50%，太阳能路灯的覆盖率也在逐年提高。

部分地区还积极探索大规模清洁能源利用模式，建设了风力发电场、光伏电站。这些清洁能源项目不仅为农村地区提供了清洁、可持续的电力供应，还通过并网发电，将多余的电能输送到电网，为国家能

源事业做出了贡献。例如,在内蒙古一些风力资源丰富的农村地区,大规模建设风力发电场,一排排洁白的风力发电机矗立在广袤的草原上,成为一道壮观的风景线。这些风力发电场每年发电量可观,不仅满足了当地农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还为当地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

在一些畜禽养殖大县,通过建设沼气工程,巧妙地将畜禽粪便转化为宝贵的能源。畜禽粪便经过发酵处理后产生沼气,沼气可用于农户生活用气,如做饭、照明等,既解决了畜禽养殖污染问题,又实现了能源的循环利用。同时,沼气发酵后的沼渣、沼液还是优质的有机肥料,可用于农田施肥,提高土壤肥力,促进农作物生长,形成了“畜禽养殖-沼气生产-农田施肥”的生态循环农业模式。目前,全国已有众多畜禽养殖大县建设了沼气工程,有效推动了农村地区的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保护,促进了乡村绿色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乡村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 科技创新能力不足

乡村绿色经济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支撑,但目前我国乡村地区科技投入相对不足,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一方面,农业科技研发与乡村实际需求存在一定脱节,一些先进的绿色农业技术难以在农村地区有效推广应用;另一方面,农村地区缺乏专业的科技人才,农民整体科技素质不高,制约了绿色技术的普及与应用。

(二) 产业融合深度不够

虽然乡村绿色产业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各产业之间融合程度较低。以乡村生态旅游为例,许多地方的旅游项目仅停留在简单的观光层面,与农业、农产品加工业等产业的融合不够紧密,未能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产业附加值较低。此外,乡村绿色产业的品牌建设滞后,缺乏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知名品牌,市场竞争力有待提升。

(三) 政策支持体系有待完善

国家虽出台了乡村绿色经济发展政策,但推行时问题频出。政策规划阶段,未充分调研乡村资源、产业及发展基础差异,致使政策难以切中各地绿色经济发展痛点。同时,配套细则漏洞多,操作流程与执行标准不明确,基层人员落实政策时无所适从,严重削弱了政策扶持效力。农村金融服务与乡村绿色产业发展需求脱节。信贷产品类型少,额度审批、抵押物要求严苛,乡村绿色企业和农户资产规模小、抵押物少,融资困难。此外,农村金融服务地域覆盖不足,偏远乡村金融网点少,乡村绿色产业在项目启动、扩产时易因资金短缺而停滞,阻碍乡村绿色经济发展。

四、乡村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策略

(一) 强化科技创新驱动

1、加大农业科技研发投入,鼓励科研机构与高校围绕乡村绿色经济发展的关键技术问题开展联合攻关,如绿色种植养殖技术、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等。

2、加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建设,建立健全农业科技推广体系,通过举办技术培训班、科技下乡等活动,提高农民对绿色技术的接受与应用能力。

3、吸引和培养农业科技人才,通过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大学生、专业技术人才到农村创新创业,为乡村绿色经济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二) 推进产业深度融合

1、以乡村生态旅游为龙头,推动农业与旅游、文化、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旅游产品,如农事体验、民俗文化表演等,延长旅游产业链,提高产业附加值。

2、加强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培育壮大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提高农产品精深加工水平,打造一批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产品品牌,提升乡村绿色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3、利用互联网技术,发展农村电商,拓宽乡村绿色产品销售渠道,促进乡村产业与市场的有效对接。

(三) 完善政策支持体系

1、制定更加细化、具有可操作性的乡村绿色经济发展政策,加大对绿色农业、生态旅游、清洁能源等产业的扶持力度,如设立乡村绿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给予税收优惠等。

2、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乡村绿色产业的信贷支持,开展绿色信贷业务,为乡村绿色经济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3、建立健全乡村生态补偿机制,对积极发展绿色经济、保护生态环境的乡村地区和农户给予合理补偿,

激发乡村地区发展绿色经济的积极性。

五、结论

乡村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乡村可持续繁荣的关键。当下，其发展面临多重挑战。科技创新上，研发资源向乡村投入少，前沿技术适配乡村需求能力弱，阻碍绿色技术应用。产业融合层面，各产业协同联动机制缺失，乡村生态旅游、绿色农业等组合松散，未形成高效产业链。政策支持体系也不完善，部分政策未兼顾乡村差异，实施细则不明，金融扶持乏力，难推动乡村绿色经济发展。面对挑战，可从三方面突破。一是强化科技创新，加大对乡村绿色科技投入，搭建产学研平台，促进前沿技术落地。二是推进产业融合，围绕特色产业打通上下游，构建生产、加工、文旅一体化产业链。三是完善政策支持，出台精准政策，优化金融服务，拓宽乡村绿色产业融资渠道。借此助力乡村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生态宜居、经济繁荣乡村，为民族复兴筑牢根基。

参考文献：

- [1]卫欣怡.产业技术创新如何驱动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效应分析[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25,40(02):31-40.
- [2]李润,丁伊丽.数字经济、绿色金融与绿色创新高质量发展——基于长江三角洲 41 个城市的经验证据[J].现代商业,2024,(22):64-70.
- [3]罗司琴.人工智能赋能湖南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J].市场周刊,2024,37(28):62-65+162.
- [4]金亚亚,付晶园,陶鹤,等.甘肃省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研究[J].甘肃科技纵横,2024,53(05):13-18.
- [5]徐永燕.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D].信阳师范大学,2024.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Green Economy: Current Situation,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ZHAO Zan¹, ZENG Lifei¹

¹*School of Computational Science and Electronics, Hunan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Xiangtan 411104,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global focus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green economy has become a crucial link connecting the strategic goal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with the overall layou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rough in - depth and comprehensive research, this paper accurately analyze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rural green economy in China,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current obstacles, and innovatively constructs a strategic system to promote the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green economy from three dimension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 driven, deep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optimized policy support. The aim is to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r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at the same time, offer practical operation guidelines for practice, helping rural areas move forward steadily on the path of coordinated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development.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green econom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driven; deep industrial integration; optimized policy support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3.831

AI 时代小语种专业象征资本的重构

黄振鑫

(东北大学, 辽宁 沈阳 110057)

摘要: 在全球化和人工智能双重冲击下, 小语种专业的传统象征资本正经历系统性衰弱。机器翻译、语音识别等技术的普及, 使得小语种专业的象征资本价值逐渐下降, 从曾经的“精英专业”逐渐变成“失业代言词”。近年来, 小语种专业面临专业过剩、学生能力不精、分数线降低甚至被取消的困境。本文以布迪厄的象征资本理论为基础, 分析小语种专业象征资本衰弱的原因, 并提出应对策略。例如, 通过“语言+专业”模式, 结合跨学科知识和实践能力, 提升小语种专业的竞争力和社会认可度, 从而重构小语种专业的象征资本。^[1]

关键词: 小语种专业; 象征资本; 重构

一、引言: 小语种专业的历史发展与其象征资本的变化

小语种专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国际交往的增加, 小语种教育逐渐被视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时期, 小语种能力被认为是知识分子和国际化人才的重要标志, 尤其是在翻译、外交、国际商务等领域, 掌握小语种技能被视为进入高薪职业的“入场券”。许多高校纷纷设立小语种专业, 培养具备扎实语言基础和文化理解能力的人才, 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

进入 21 世纪后,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 小语种专业的重要性愈加凸显。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将小语种教育纳入国家教育体系, 不仅强调语言技能, 还注重跨文化交流能力, 文学素养的培养。此时, 小语种专业不仅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 也成为学生追求高社会地位和经济回报的重要途径。

然而, 随着科技的进步, 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崛起, 小语种专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机器翻译、智能语言处理等技术的发展, 使得传统语言能力的稀缺性逐渐降低, 从而影响了小语种专业在社会中的象征资本地位。曾经被视为“精英专业”的小语种专业, 如今却面临着过剩、竞争激烈以及市场需求变化等困境。这一转变不仅使得许多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遭遇瓶颈, 也促使高校重新思考小语种教育的定位与发展方向。

二、布迪厄象征资本理论及其在小语种专业中的体现

布迪厄的象征资本理论指出, 象征资本是一种通过社会认可积累的非物质性资源, 其价值取决于特定社会场域(如教育、职业)的集体信仰。它能够转化为经济资本(如高薪收入)、社会资本(如职业网络)和文化资本(如专业知识)。在教育领域, 象征资本通常体现为文凭、技能认证、院校声誉等符号化资源, 这些资源赋予持有者在社会竞争中的差异化优势。^[2]

基于布尔迪厄的象征资本理论, 传统小语种专业的价值体系由四个维度的资本构成: 其一, 语言能力资本, 表现为通过专业训练获得的稀缺性语言技能(如会议同传、专业文献翻译)及其权威认证(如 CATTI、DELF), 这些技能在跨国交流场域中形成职业壁垒; 其二, 文化资本, 体现为对对象国文学传统、历史脉

作者简介: 黄振鑫(2001—), 男, 硕士, 研究方向为跨文化交际。

络和社会文化的系统性掌握，这种深度的跨文化理解能力构成专业人员的独特优势；其三，制度资本，来源于顶尖外语院校（如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教育认证，其价值不仅在于知识传授的质量，更在于院校品牌所蕴含的社会认可度；其四，职业资本，表现为与外交官、国际组织专员等精英职业的制度化关联。这四类资本形成相互强化的关系网络——以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专业为例，毕业生通过语言等级认证（DELF C2）展现的专业能力、对法兰西文化的学术化理解、母校的学术声誉这三重保障，通常能够顺利进入外交部或跨国企业工作，实现从文化资本到社会地位的有效转化。

三、 挑战：AI 时代小语种专业象征资本的衰弱

3.1 语言能力资本的稀缺性下降

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机器翻译和语言处理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许多传统上依赖人工的翻译和语言服务工作逐渐被 AI 所取代。在法律、医学等专业领域，过去需要高端翻译服务的工作现在越来越多地依赖于 AI 翻译工具。例如，在法律文件的翻译过程中，AI 不仅能够提供初步翻译，还能通过智能算法进行校正和优化。这种技术的应用降低了对专业翻译人员的需求，尤其是在一些常见语言的翻译中，导致高端翻译和小语种等稀缺外语技能的市场溢价逐渐下降。

3.2 文化资本的边缘化

尽管深度理解目标语言国家的文学和历史仍然重要，但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跨文化沟通的需求更多地体现在实用性和即时性上。AI 工具可以快速提供文化背景信息，降低了对深度文化理解的需求，从而使得文化资本在某些场景下边缘化。在国际商务谈判中，以往需要具备深入文化理解的小语种专业人士，现在可能只需利用 AI 工具快速获取相关文化背景信息。这种变化可能导致企业更倾向于招聘能够熟练使用这些工具的人，而非具备深厚文化知识的人。这种趋势可能导致小语种专业学生在求职时面临新的竞争压力，他们需要不仅具备语言能力，还需掌握如何有效利用 AI 工具来获取和处理信息。

3.3 制度资本的贬值：

在 AI 技术的普及背景下，小语种专业的制度资本面临贬值趋势。传统小语种教育模式的滞后也使得问题更加复杂。许多小语种专业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方案未能及时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仍然保留传统的内容，比如语言学、文学、国别区域研究，跨文化交际，导致培养出的毕业生缺乏核心竞争力，无法有效转化其语言能力为象征资本。例如，一些小语种专业毕业生在实际工作中发现，他们的语言学理论知识和文学作品分析能力并不能直接应用于职场需求。^[3]

具体表现为高校小语种专业的招生分数和位次逐年下降，这反映了社会对传统文凭认可度的变化。以下是辽宁省部分高校外语专业在 2023 年高考中的最低分和位次数据（见表 1）：

表 1 辽宁省招生物理组部分高校外语专业高考最低分及位次

院校名称	专业名称	23 年最低分	23 年位次	22 年位次
北京外国语大学	英语	645	3192	2110
北京外国语大学	德语	643	3437	2429
北京外国语大学	日语	634	4714	3171
上海外国语大学	法语	632	5045	2918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阿拉伯语	585	14877	13211
西安外国语大学	德语	560	21957	16836
西安外国语大学	日语	553	24161	14694
西安外国语大学	葡萄牙语	553	24161	18862
天津外国语大学	法语	567	19887	15912
天津外国语大学	日语	555	23491	14371
四川外国语大学	英语	580	16139	13534
大连外国语大学	德语	525	34033	26229

大连外国语大学	法语	523	34784	27361
大连外国语大学	意大利语	502	43135	29276
大连外国语大学	葡萄牙语	502	43135	31209

从表中可以看出,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等知名院校的语言专业在 2023 年的最低分和位次均出现了明显下降。例如,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专业的最低分从 2022 年的 2429 位次降至 2023 年的 3437 位次,日语专业同样显示出下降趋势。尤其是西安外国语大学日语专业,其最低分降至 553,位次达到 24161,这一变化尤为显著。

这种趋势不仅反映了对传统名校文凭的认可度降低,也表明高校小语种专业课程往往仍然侧重于传统语言技能和文化知识的传授,未能及时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这导致许多毕业生在就业时缺乏必要的实践经验和技术技能,进一步加剧了文凭贬值现象。

3.4 职业资本的重构

随着具备小语种能力的人才数量激增,以及公务员考试和外交官选拔竞争日益激烈,传统小语种专业所赋予的象征资本在就业市场上的优势逐渐减弱。职业资本的重构意味着传统小语种专业的培养目标和内容需要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职业需求。这种调整本身就是象征资本衰弱的表现,因为它表明传统的象征资本体系已经无法满足当前的市场需求。高地位职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增加,意味着单纯的语言能力和文凭已经不足以构成有效的职业资本。例如,外交官和对外联络部门等高地位职业对人才的需求正在发生转变。虽然小语种能力仍然是必要条件,但越来越苛刻的选拔标准表明,这些职位更青睐具备复合型技能的人才。除了语言能力,还需要具备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数据分析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四、 应对: 复合专业对小语种专业象征资本的重构

根据布尔迪厄的资本转化理论,当某种资本形态贬值时,行动者会通过资本重组来重建竞争优势。复合型专业的出现,正是小语种专业将语言文化资本与其他资本(如技术资本、经济资本)进行杂交的主动策略。这一策略不仅能够满足市场对多元化人才的需求,还能提升小语种专业的竞争力。

通过将语言能力与专业技能相结合,学生可以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更具优势。例如,掌握德语和车辆工程知识的学生,不仅可以在汽车制造企业中从事技术研发工作,还可以担任跨国项目的协调和沟通角色,充分发挥语言和专业技能的双重优势。此外,复合型专业的设置还能促进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仅需要掌握语言技能,还需要具备相关专业领域的知识和实践能力。这种综合素质的提升不仅有助于学生在就业市场上脱颖而出,还能为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现如今已经有很多高校开始双学位学士培养或者进行高校之间联合培养,比如复旦大学“俄语/德语+计算机科学”,厦门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类+会计学/财务管理”,东南大学“日语+电子科技与技术”,西北政法大学和西安外国语大学的“德语/法语+法学”,北京语言大学分别和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化工大学联合培养等等。总之,小语种专业通过转向复合人才培养模式,重新定位自身,不仅能够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挑战,还能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中重构自己的象征资本。这种转变不仅是小语种专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五、 困境: 复合型小语种专业在高考录取中的实践障碍

然而,尽管复合型小语种专业在理论上具有显著优势,但是其实践效果却并未完全反映在高考录取分数线上。以北京语言大学为例,尽管该校推出了多个复合型小语种专业(如表 2 所示),但这些专业的录取分数线并未出现显著提升,反映出小语种专业在吸引高分考生方面仍存在挑战。

表 2 北京语言大学在北京高考录取情况

年份	专业	最低分	最高分	平均分	最低分排名
2024	德语(涉外林业工程人才实验班)	593	593	593	12095
2024	西班牙语(涉外矿产资源人才实验班)	594	594	594	11907
2024	西班牙语	596	611	602.67	11548

2024	法语（涉外化工人才实验班）	595	605	600.67	11725
2024	法语	598	610	603.2	11157
2024	阿拉伯语（涉外石油人才实验班）	600	614	606.67	10787
2023	西班牙语	600	621	607.6	10348
2023	法语	601	615	608.4	10168
2023	德语	602	615	609	9999
2023	阿拉伯语（涉外石油人才实验班）	611	613	612	8329
2022	西班牙语	602	615	606.4	8398
2022	德语	604	617	609.2	8125
2022	法语	604	616	616	8125

这表明，复合专业所构建的新型象征资本在高考录取中尚未体现出明显的竞争优势，其价值转化仍面临一定障碍。这可能与市场对复合小语种专业象征资本的认知不足、培养模式不成熟以及宣传力度不够等因素有关。

5.1 市场认知不足

当前，市场对复合专业象征资本的认知不足，严重限制了其价值转化。尽管复合专业旨在培养跨学科能力和创新能力，但就业市场对这些新兴专业的认可度仍然有限。企业对复合专业毕业生所具备的象征资本（如跨学科能力、创新能力等）缺乏系统的评估机制，导致其象征资本难以有效转化为高薪就业和社会地位。这种认知差距直接影响了学生对复合专业就业前景的信心，降低了报考热情，进而导致专业分数线走低，进一步削弱了其象征资本的社会认可度。以“涉外林业工程人才实验班”为例，其就业方向不够明确，象征资本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更加凸显，难以吸引高分考生和用人单位的青睐。比如目前市场上对同时具备高水平林业工程技术和优秀语言能力的人才需求量究竟有多少？这需要进行市场调研来验证。如果市场需求不足，那么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就面临着就业困境，其象征资本自然也就难以体现。此外，即使市场需求存在，若用人单位对复合型人才象征资本（如跨学科能力和语言水平）缺乏明确的评估标准，也会进一步削弱该专业的吸引力和竞争力。^[4]

5.2 培养模式的制约

当前，复合型专业的象征资本积累——尤其是跨学科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正面临着培养模式不成熟的系统性制约。以北京语言大学为例，传统的四年本科制要求学生既要精通外语又要掌握理工科知识，这种课程设置上的简单叠加导致学习负荷过重，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语言教学与专业课程之间缺乏有机整合，造成知识体系割裂、学习效率低下。与此同时，师资队伍建设要求极高，真正具备跨学科教学能力的教师严重不足，而现有的教师评价体系又难以激励教师开展跨学科教学创新。比如以阿拉伯语（涉外石油人才实验班）的教师，最好是已经完成博士学位的石油技术讲师，并且他还在中东地区留过学，所以这种人才少之又少。更关键的是，实践环节的生态尚未形成，短短四年学生难以获得真正有效的实习或科研项目来衔接理论知识与实践应用。这些结构性短板共同制约了复合型人才核心能力的培养，使得象征资本的积累难以实现质的突破。要破解这一困境，必须从课程体系的深度融合、师资队伍的重构以及实践平台的实质性建设三个维度进行系统性的培养模式改革。^[5]

3. 宣传不足

当前小语种复合专业面临严重的市场认知障碍：一方面存在显著的信息不对称，学生和家长仍固守“小语种即纯语言专业”的传统认知，对“阿拉伯语+石油工程”等复合培养模式的就业前景缺乏了解；另一方面高校的招生宣传存在明显的符号表达失效，仍沿用“培养国际化复合型人才”等模糊表述，未能有效传递行业合作企业、毕业生起薪等差异化优势，导致新型“语言+专业”复合能力的价值共识难以建立。尽管这些专业尚处于发展初期，缺乏量化数据支持，但改进宣传策略，清晰地展现专业优势和就业前景，对于提升市场认知和吸引优秀学生至关重要。

六、制度性壁垒：职业资格与深造路径的困境

复合型专业在具体实践中还面临诸多制度性限制, 使得其象征资本难以充分转化为实际竞争力。例如, “小语种+法学”这类交叉组合虽然拓宽了知识视野, 却可能因法考报名资格的限制而无法获得法律职业准入资格, 导致专业优势被政策壁垒消解。^[6]同样, 在深造阶段, 复合专业学生往往陷入两难: 研究生招生体系通常只认可单一学科背景, 使得本科阶段的跨学科积累难以延续, 既无法同时攻读两个硕士学位, 也难以在单一学科考研中获得竞争优势。这些制度层面的刚性约束, 不仅削弱了复合专业的现实价值, 更在客观上形成了“跨学科培养单一学科认证”的结构性矛盾, 使得复合型人才的职业发展路径被迫窄化。这种培养体系与社会认可度之间的脱节, 成为制约复合专业长远发展的深层瓶颈。

七、结语与未来展望

在 AI 时代的背景下, 小语种专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传统的象征资本正在逐渐衰弱。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小语种专业的终结, 而是预示着其发展方向的转变。通过与其他专业的结合, 小语种专业可以重构其象征资本, 实现可持续发展。

高校、企业和社会各界需要共同努力, 提升对复合型小语种专业的认知, 加强宣传推广, 优化培养模式, 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只有在不断适应和创新中, 小语种专业才能重新获得社会认可, 实现价值转化。未来, 小语种专业将通过多元化的发展路径, 为学生提供更广泛的职业选择和更高的社会地位。

通过积极应对挑战, 小语种专业不仅能够在 AI 时代立足, 还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找到新的发展机遇。期待一个更加多元化、更具竞争力的小语种专业时代的到来。

参考文献:

- [1] 窦强. “专业+外语+现代技能”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究——以西安翻译学院学前教育专业为例[J]. 陕西教育(高教), 2021, (08): 18-19.
- [2] 布尔迪厄. 国家精英[M]. 杨亚平,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 [3] 郑燕虹, 蒋洪新. 知行合一: 外语教育改革与探索[J]. 中国外语, 2025, 22(01): 4-9.
- [4] 李田新. 企业与外语人才双向需求调查与研究[J]. 高教学刊, 2020, (12): 136-140.
- [5] 黄琼英.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地方本科院校外语专业发展对策研究[J]. 科教文汇, 2022, (24): 1-5.
- [6] 任忠诚, 冯旭彤.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外语+法律”复合型法治人才潜在需求研究[J]. 外语教育与应用, 2024, (00): 49-62.

AI Era: Reconstruction of Symbolic Capital in Minor Language Majors

Huang Zhenxin

Foreign Studys College,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China

Abstract: In the face of dual impacts from globalization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traditional symbolic capital of minor language majors is experiencing systemic decline. The widespread use of machine translation and speech recognition technologies has led to a gradual decrease in the value of symbolic capital in minor language majors, transforming them from once "elite majors" into "synonyms for unemployment." In recent years, minor language majors have faced challenges such as oversupply of graduates, students' lack of proficiency, lower admission scores, and even cancellation of programs. This paper, based on Bourdieu's theory of symbolic capital,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 decline in symbolic capital of minor language majors, explores the underlying social and technological factors, and proposes coping strategies. For example, by adopting a "language+professional" model that combines 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skills, the competitiveness and social recognition of minor language majors can be enhanced, thereby reconstructing their symbolic capital.

Keywords: Minor Language Majors; Symbolic Capital; Reconstruction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3.482

高 月¹

(1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山东 青岛 266000)

摘要: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 讲好中国梦的故事, 讲好中国人的故事, 讲好中华文化优秀的故事, 讲好中国和平发展的故事。”国际中文课堂作为“讲好中国故事”的有效途径, 也应发挥其文化传播的作用。汉语教学有着诸多内容, 而其中的成语教学堪称宣扬文化的“宝藏”。成语有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 渗透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审美特质及价值取向。汉语学习者通过对成语的学习掌握, 不仅可以提高汉语水平和文化素养, 还有利于中国文化在非灌输或说教的方式下“走出去”。因此做好成语教学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旨在分析成语教学过程中出现的跨文化交际误解现象, 究其本质, 找出相应对的策略。以期汉语学习者能够正确地掌握成语, 成语中蕴含的中华文化能走向国门。

关键词: 跨文化交际误解; 成语教学; 对外汉语教学; 文化;

一、成语教学的重要性

(一) 成语教学是响应国家让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途径

成语, 是中华语言文明历经千百年来风霜捶打、历史筛选存留下来的语言精华。其中不仅有浓缩的历史故事和文化内涵, 还有中国民族秉承上千年的哲学思想、民族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成语教学浓缩了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风俗和价值观等方面的教学, 在教授语言知识的同时可以让汉语学习者更能直观地感受到中华文明的魅力。在国际中文教学中, 通过成语也可以让学生以小见大, 感受到中国积淀千年的传统智慧。随着习总书记“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声音”“树立好中国形象”倡议的提出, 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成语教学不失为一种润物细无声的传播中国文化、树立文化自信的方法手段。

(二) 成语教学是提高汉语学习者中文表达、文化素养的有效方法

成语富有深刻的思想内涵, 简短精辟, 且其含义比词的更为丰富, 而语法功能又相当于词, 所以在中文表达中有时可通过成语组造出更符合语境的精简语句。所以对于汉语学习者来说, 通过成语学习可以提高其词汇深度, 增强其中文表达能力。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成语中所蕴含的中华文化涉猎之广、之深, 可以让汉语学习者在学习语言知识的同时全面详致地领略中华文化的魅力。使成语中所蕴含的儒家思想、道家文化在潜移默化中提高汉语学习者的文化素养。因此, 成语教学不仅有利于提高汉语学习者的中文表达水平, 还有利于对其文化素养产生深刻的影响。

(三) 成语教学是国际中文词汇教学与研究的重要内容

成语是汉语熟语中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存在。就其数量而言, 以 2009 年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成语大词典》为例, 粗略统计该词典收录汉语成语 22000 多条, 其中常用的约 3000 多条。根据国家汉语水平考试委员会考试中心编写的《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修订本)》(以下

简称《大纲》),列出的8822个词语中,“四字格”成语只有127条,而且多属于丁级词(甲级:0条;乙级:2条;丙级:14条;丁级:111条)。《大纲》中对于成语的要求多体现在对汉语水平有较高要求的丁级词汇中。这一方面反映出成语在词汇教学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从侧面印证了成语学习对于汉语学习者来说是有一定的难度。²

二、国际中文教育中成语教学存在的跨文化误解现象

笔者曾听说过这样一种观点:跨文化交际中所产生的误解主要是来自于双方语言交际中的理解偏差,所以通过语言学习,了解对方语言的语音、语法和地道的用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跨文化交际的误解都可以迎刃而解。而事实上,跨文化交际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交际双方运用同一种语言,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下,具有跨文化思维、辨别跨文化差异和克服跨文化干扰能力的一种交际活动。³要想成功达到交际目的了解语言背后的文化差异就必不可少,对于常用的语言词汇如此,对于明显难于平常词汇的成语更是如此。

笔者将通过下述五个案例,详细分析在跨文化交际中成语教学存在的跨文化误解现象。

(一) 非本民族的思维方式会导致跨文化交际误解

成语是一种高度凝练的固化语言形式,它融入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不同民族思维方式的差异会导致对成语的理解产生偏差,这种差异在中西不同文化圈之间体现的最为明显。笔者身边就出现过这样的例子,例如:我们国际中文教师在讲类似于“陆绩怀橘”“愚公移山”类的故事成语时,为了让学生更好理解其中的内容深意我们会将成语背后的故事讲出来。但这对于一些西方文化背景的学生来说会产生一种困惑:中国人为什么要赞扬偷盗?为什么要选择一条愚蠢的方法并一直坚持?作为一个具有正确价值观的正常人我们都知道偷盗是不可取的,愚公选择挖山的道路也是愚不可及的。但是我们所讲的“陆绩怀橘”“愚公移山”这两则成语故事所赞扬的是其背后的精神哲理,而不是事情本身。我们讲这两则故事的目的是通过这两则故事所蕴含的道理来宣扬中华文化的孝道和坚持不懈的精神,而部分西方文化圈的同学所看到的是故事中个人的行为而非整体事件。当然,若真要细究故事中的主人公的行为,其实也无伤大雅。像“陆绩怀橘”这则成语故事中,陆绩所盗的橘子是放在桌子上本就是供客人品尝的,陆绩带走也无妨。若是将“陆绩怀橘”变成“陆绩怀金”,笔者相信这则故事再怎么歌颂陆绩对母亲的孝心也不会有人传颂。再言“愚公移山”,故事的主人公的名字就是“愚公”,“愚公”蠢笨者也。可见成语故事本身也点出了愚公行为是愚笨的。

归根结底这是由于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文化圈因为文化差异所产生的思维逻辑上的不同。以西方欧美国家为代表的学生他们遵循的是线性思维方式,强调个体本位,推崇逻辑思维。所以对于类似于“陆绩怀橘”“愚公移山”类的成语,这类学生他们会将目光集中于故事主角的行为上,而不是整体的事件上。这是与我们集体主义文化圈偏抽象意识,重直觉思维所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同样的情况对于东亚文化圈的日本、韩国、泰国等国家的汉语学习者来说很少会出现上述的问题。

(二) 语义文化层面了解不足导致跨文化交际误解

中国语言表达中有一种极具特色的表达方式名为“言尽意余”,这种语言表达方式在成语中也有充分的体现。主要体现在其词义的理解之上,相当一部分成语在了解其字面意思之后还需要明白其比喻、引申等方面的意义。一但只知其一不晓其二,汉语学习者就很有可能错过成语背后所蕴藏的深刻哲理。例如:“庖丁解牛”一词,绝大多数汉语教材和汉语教师都会告诉学生这个词的意思是“比喻经过反复实践,掌握了事物的客观规律,做事得心应手,运用自如”。但是中国人的言尽意余、借物喻人的表达习惯使“庖丁解牛”还有一层更为深刻的哲理:这个成语它同时还揭示一种养生处世的方法。庄子以刀喻人,以牛体组织喻复杂的社会,以刀解牛喻人在社会上处世。庄子认为,人应当找到一条能够适应社会的生存道路,回避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就不会受到伤害。⁴而这层含义如果没有教师引导解释,外国汉语学习者很难自行领会其意的。

再比如:“凤毛麟角”一词,比喻珍贵而稀少的人或事物。绝大多数学习者通过学习都会知晓“凤凰的毛”

²家中媛:《基于文化传播视角的对外汉语成语教学探索》,河北: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3年,第1页。

³唐骋:《浅析跨文化交际误解现象及其对外语教学的启示》,安徽:安徽文学(下半月),2017年,第118-120页。

⁴周啸天:《古文鉴赏》,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9年,第101页。

和“麒麟的角”是十分稀有的东西,但是相当一部分同学只会将这两部分的语义简单拼凑,认为成语比喻的是不存在的东西。在不了解成语比喻义、引申义的情况下使用成语是极易导致跨文化交际产生误解的。

(三) 部分词语的文化差异会导致跨文化交际的误解

1. 数字文化词差异

在汉语中有很多包含数字的成语,但是数字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在不同的文化中会有不同的理解。比如:深受基督教文化和东正教文化影响的俄罗斯文化认为偶数代表着恶魔,奇数代表好运和祝福。但是我们中国文化却是与之完全相反的,我们反而认为偶数代表的是吉利,我们在送花、送礼一定会送双数。所以对于“好事成双”“双喜临门”“两全其美”“八面玲珑”“六六大顺”等含有数字成语的成语,俄罗斯学生会因为何用偶数而产生疑问。

2. 动物文化词差异

所谓动物文化词是指在特定的语言中反映了特定社会文化意义的动物词。不同文化背景的语言会对相同的动物词赋予不同的意义。例如:笔者曾经在教授成语“藏龙卧虎”时遇到过一次跨文化交际的问题。当笔者解释“藏龙卧虎”意为隐藏着未被发现的人才、隐藏不露的人才时,学生提出他理解“虎”可视为人才,但是却不理解“龙”为何有同样的道理。经过详细的询问笔者才突然惊觉,学生是一位英国的9岁小学生,在他的文化背景以及知识储备下他只见过西方文化里的龙,而并没有意识到笔者所讲的龙与他所知的龙是完全不一样的。西方的龙是邪恶残暴的象征,是“会飞的蜥蜴”;而中国的龙象征着吉祥与祥瑞,是“鳞虫之长”。再例如:蟾蜍在中文里会有对月亮的联想,像“玉兔银蟾”“折桂攀蟾”等都能联系想到月亮,但是英语里面的蟾蜍不仅没有相同的意思,反而对应的含义是讨厌或鄙夷的人或物。同样的动物文化词还有:“猪狗不如”的猪、狗,“一龟一鹤”的乌龟等。

3. 颜色文化词差异

成语中颜色词的教学与非成语中的对外颜色词教学一样常常未受重视,极易被忽视。例如:笔者曾观摩学习过一堂高级汉语课,课中学到“衣紫腰黄”这一四字成语时老师仅解释成语的字面以及引申的意思,即身穿紫袍、腰佩金银鱼袋的大官装束,亦指做大官。而对于官员为什么穿紫色的衣服,鱼袋为何是金色的并没有做详细的阐释。这可能使得学生在潜意识里认为“衣紫腰黄”可以随意替换成“衣绿腰红”等等,因为学生并不了解紫色和黄色在中国文化中所象征的意义,从而可能也无法理解为什么是“紫气东来”而不是“红”气东来”,为什么“紫袍玉带”而不是其他颜色的衣袍等等。

(四) 学习者目的语民族情怀的缺失可能导致跨文化交际的误解

中华上下五千年,在悠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凝聚出了独属于我们的民族情怀。成语不仅是我们中华文化的承载者,也是我们中华历史的见证者,在成语中可以感受到中华民族丰富而深沉的民族情感表达。例如:“刎颈之交”所象征着同生共死的友情,“赤心报国”后那拳拳爱国之心,“殚智竭力”背后的家国责任等。但是由于汉语学习者缺少目的语的历史积累和情感共鸣,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有时在对成语的使用时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误用,从而造成误解。例如:关于“舍生取义”这个成语背后所蕴含的家国情怀,集体至上的原则,愿意为正义事业牺牲自我的大无畏精神无一不体现中华民族的义利观和民族情怀。当我们中华民族在交际中使用这个成语时,会由内而外地迸发深切的民族自豪感,但对于一些学习者来说,由于民族情怀的缺失可能在使用时没有像本民族人一样感同身受。

(五) 教师成语能力水平不足导致跨文化交际的误解

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化中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成语,要想从庞大的成语宝库中整理出精髓、理解透彻并运用于课堂教学中,这是一件极其不易的事情。这对汉语教材和汉语教师都提出了极大的挑战。例如笔者曾听同事讲过一位教师把“目无全牛”误解成“缺乏整体观念”的意思,并且在课堂上带领同学们以此意造句,造出了“小明开会总是迟到,他是一个目无全牛的人”诸如此类的句子,误人子弟之深可想而知。这只是成语含义上的错用,还有成语用法、引申比喻义以及褒贬色彩等因为教师能力不足导致教学过程中出现误解的事情,也是屡见不鲜的。汉语教师作为学生在课堂上获取知识的第一道关卡,其能力水平在成语教学中是至

关重要的。

三、成语教学中的跨文化误解现象对国际中文教学的启示

(一) 国际中文教学中成语教学重点分析

笔者针对上述在成语教学中存在的跨文化误解现象,将成语教学的重点分析放在了语义和语用两个主要方面。对于一个非目的语文化背景的语言学习者来说,其原有的母语语言习惯会影响新语言的学习,也就是会受行为主义心理学中的迁移理论的影响。而对于那些原有知识体系中完全没有相应概念的学习者来说,不建立起相应的含义对于整条成语应用也是无法使用的。所以笔者认为在语义和语用两大主要方向下,还需着重分析知识负迁移和空缺的内容。比如:

1. 物质文化方面的成语

物质文化层面是浅层文化,也是在教学过程中利用多媒体教学技术最容易建立概念的一大层面,所以教学的重点应该放在对词义的整体理解上。比如:“钩心斗角”一词,“心”即宫室的中心,“角”即屋角。“钩心”指的是各个屋角向着屋室的中心,“斗角”是指各个屋角彼此相对。教师通过讲解字义并配以图片辅助,学生可以很好的了解“钩心斗角”具有“宫室结构错综精密”的字面含义,但是对于其又喻“各人用心思明争暗斗”的引申意义和象征意义不甚明白,这时则需要教师进行详细地阐述。再比如:“高山流水”一次,“高山”“流水”所代表的意思都十分简单易懂,所以有先当一部分汉语学习者认为这是形容山水的成语,所以这时就需要教师着重讲解其背后有关“知音难觅”“乐曲精美”的引申义。

2. 制度文化方面的成语

制度文化是指种种社会政治和生活习惯,是人类在社会事件中建立的各种社会规范和理论体系,汉民族的制度文化对应着汉族人的社会分工与合作的需要,体现着汉民族社会和规范中的文化内容。⁵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成语中有相当一部分数量体现了汉民族各个方面的制度文化。对于这部分成语,教学重点应该集中在填补空缺,建立文化概念。比如:代表中国古代社会最基本行为准则的“三纲五常”;能体现宗法制度的“尊卑有序”、“光宗耀祖”等;能反映中国古代婚姻观的“父母之命”、“门当户对”、“传宗接代”和“相夫教子”等;也有能反映社会礼仪的“三跪九叩”、“弹冠相庆”和“打拱作揖”等;还有体现法律的“十恶不赦”等等。有关制度文化方面的成语反映了中国社会方方面面,内容之深、之广需要教师着重准备。

3. 心理文化方面的成语

心理文化属于文化的深层文化,指的是以社会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观念体系。这类成语它主要包含了汉民族的传统观念、思维方式、宗教信仰和审美情趣等方面的内容。针对这方面有关的成语,教师的教学重点应放在三个方面:一是了解语义,二是理解汉民族的思维方式,三是体会成语中所蕴含的汉民族的民族情感。以“杀身成仁”为例,首先需讲解词义,该词应重点讲解“仁”的概念。因为“仁”是儒家提倡的仁爱观,孔子还将“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讲解完“仁”和“不惜舍弃自己以成全仁德”的词义后,教师需要带领学生体会成语中反映出的汉民族关于品德的传统观念,以及其背后的价值观念和民族气节。与之相似的反应传统观念成语还有:关于“义”的“天经地义”、“深明大义”;关于“和”的“以和为贵”、“政通人和”;关于“稳”的“未雨绸缪”、“谨言慎行”等。

还有体现汉民族思维方式的成语,如:反应辩证思维的“否极泰来”,反应具象思维的“口蜜腹剑”等。还有反应审美情趣的成语,如:“入木三分”、“浓墨重彩”等。从汉民族宗教衍生而来的成语教学重点也应如此,比如说:源于道教“旁门左道”、“呼风唤雨”,源于佛教的“三生有幸”、“大千世界”、“单刀直入”等。

(二) 对国际中文成语教学的启示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得知,成语在跨文化交际中产生误解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语言基础薄弱,对于汉语词汇的积累量不够导致不理解成语词汇的含义。二是对中华文化缺乏深度的认识以及缺乏对不同文化应用的差异性认知。因此,身为国际中文教育的从教者,我们要引以为戒,既需要认识到只提高学生的应用成语的汉语交流能力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帮助学生避免因受本国语言规则习惯或文化思维方式而产

⁵ 刑福义:《文化语言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22页。

生跨文化交际的误解。要知道,一个会使用成语的汉语学习者,在语言交际过程中交际的对方是会默认其知晓甚至精通目的语言的文化,在先入为主的观念下,面对对方的冒犯会认为对方是故意为之,从而极易导致跨文化交际失败。

Rumellhart认为:“学习者对输入材料中信息的理解建立在他是否具有相关的背景知识并能及时激活这些知识。否则,输入信息就激活不了应激活的图式,理解也就无从谈起。”⁶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可以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应对策略。

1. 弥补词汇空缺

成语理解本质上是词汇含义的理解。汉语成语是中华民族土生土长的本土语言文化,具有独特的内容,有许多是其他民族所没有的。当学生学习的成语中有些词汇含义在其原有的知识体系中无法找到与之对应的概念,那么学习者自然而然无法理解成语相应的内容。所以我们可以成语学习前,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在汉语学习过程中引入一定量的空缺词汇,为后续的成语学习打下基础。比如说:中国特有的器具“鼎”,在学习“一言九鼎”、“大名鼎鼎”等词汇之前就可以引入学习,这对后续学到含有“鼎”的成语时提供了知识储备。当然,这对教师与教材都提出了极大的考验。

2. 引导与启发相结合

对于一些学生汉语词库中已有的词汇元素,或者学生已接触过的汉民族思维方式、表达习惯等,教师可以通过合理引导,启发学生通过联想来猜测词义。比如:对于“之乎者也”这样的词汇,教师可以通过学生原有知识体系中已有的“酸甜苦辣”加以引导,酸甜苦辣是四种味觉、四个形容词拼凑在一起的四字成语。而“之乎者也”中的四个字都是古代汉语中的四个虚词,也是四个字拼凑在一起的四字成语。在了解了四个字的含义后可以借由“酸甜苦辣”来引导学生们对“之乎者也”的推测。再比如:“水深火热”一词,可以让学生们想象一下一个人在深水之中、热火之中是什么样的感受,再通过情景造句加以引导,学生基本上可以猜出“水深火热”一词代表的是“人民生活极端痛苦,如同处在深水热火之中”。

3. 中外对比

跨文化交际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际的活动。背景文化的不同就意味着对主客观世界的认识不同,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对比来进行学习,让学生们认识到双方文化地不同,以包容的态度进行学习,从而可以有效地避免在跨文化交际中产生误解。教师可以从传统观念、词汇的内涵意义还有对等翻译三个方面来进行对比。比如说:中国人“安土重迁”,中华民族奉行小农经济,从而形成了浓厚的家乡观念。而有些西方人不理解中国人对家乡的依恋,理解不了“落叶归根”、“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等成语背后浓浓的乡愁,这是因为他们绝大部分的经济制度是游牧经济,在传统观念中对家乡的观念没有很重,习惯迁徙,随遇而安。所以可以通过对比让学生了解中外传统观念方面的差异。再比如:“狐狸”一词在英语中具有“狡猾”、“诡计多端”的意思,俄罗斯童话和语言中,“狐狸”也同样是阴险狡猾、小人的角色。所以学习者通过对比自己国家的文化,可以很好的理解到“狐假虎威”一词是带有贬义色彩的。再比如说:有些成语在学习者的文化知识体系中是有对等翻译的,像“破釜沉舟”与英语里的“burn one's boat”极其相似,“一路顺风”与俄语中的“К чёрту”也是有对等翻译的,“隔墙有耳”与“Walls have ears”更有异曲同工之妙。

参考文献:

- [1]陈晓娣.对外汉语教学中成语的研究与教学[D].陕西师范大学,2009.
- [2]郭蕊云.跨文化交际中中俄文化差异——以称谓、饮食、邀约为例[J].中国民族博览,2022,(10):118-120.
- [3]家中媛.基于文化传播视角的对外汉语成语教学探索[J].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3,35(01):67-70.
- [4]刘定慧.对俄汉语教学中的中俄文化差异[J].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33(05):48-50.
- [5]刘敏.故事教学法在对外汉语成语教学中的应用[D].兰州交通大学,2024.
- [6]唐骋.浅析跨文化交际误解现象及其对外语教学的启示[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7,(06):118-120.
- [7]魏玉红,李欣.“讲好中国故事”视域下汉语成语教学策略[J].汉字文化,2023,(09):148-153.

⁶ D.E.Rumellhart: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8]许晓迪.对外汉语教材成语编写原则初探[J].文学教育(上),2021,(10):174-175.

[9]张可心.对外汉语故事类成语教学探析[J].汉字文化,2023,(23):87-89.

[10]朱亚姣.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成语教学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8.

Analyzing the Phenomenon of Cross-cultural Misunderstanding in Idiom Teaching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Gao Yue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East China), Qingdao 266000, Shandong

Abstract: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proposed: “We should tell the st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story of the Chinese dream, the 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 the story of the excellenc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story of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As an effective way to “tell the story of China”, the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classroom should also play its role of cultural disseminatio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has a lot of contents, and the teaching of idioms can be called a “treasure” for promoting culture. Idioms have rich national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permeate the unique way of thinking, aesthetic qualities and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Through learning and mastering idioms, Chinese learners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ir Chin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cultural literacy, but also contribute to the “going out” of Chinese culture in a non-instructive or didactic way.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do a good job in teaching idiom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analyze the phenomenon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misunderstanding that occurs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idioms, to investigate its essence, and to find out the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analyze the phenomenon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misunderstanding in the teaching of idioms and to find out the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so that Chinese learners can master idioms correctly and the Chinese culture contained in idioms can go out of the country.

Keywords: Keyword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misunderstanding; idioms teaching;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culture;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3.808

德布雷媒介学思想的逻辑架构与学术脉络

许子炎¹

(¹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24)

摘要: 德布雷媒介学思想逐步成为当代显学。这篇文章抽丝剥茧地提炼了各章中媒介学理论的建构逻辑。这包括德布雷媒介学思想的两重批判意识与问题意识, 以及研究的范畴、对象、路线、类型、价值立场、方法、注意事项和最终人文关怀等。本文还尝试根据本书及作者经历论证德布雷媒介学思想的学术脉络。本文认为, 德布雷媒介学可以回归到媒介环境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经典西方文艺作品等学术脉络之中。

关键词: 媒介学; 德布雷; 逻辑架构; 学术脉络

一、引言

德布雷媒介学思想逐步成为当代显学。在 CSSCI 中检索“媒介学”“媒介域(圈)”“德布雷”等关键词, 研究捕捉到近百篇核心期刊论文。德布雷媒介学已成为当代显学。德布雷将媒介学视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1-9]主要内容还是非史学的研究: 比如对媒介圈下一阶段的理论猜想, 或是对这一思想的介绍、分析和解读。中国大陆学者利用德布雷媒介学来开展的研究表现在 3 个方面: 1. 德布雷媒介学理论的中国本土化历史研究。2. 德布雷媒介学的传播思想史研究。3. 德布雷媒介学视角下的中国文化传播(传承)研究。

但, 文献中少见对德布雷媒介学思想本身的逻辑架构梳理和学术脉络分析。而这些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德布雷媒介学的思想实质, 进而避免程式化的套用或误用。

二、德布雷媒介学的逻辑架构

一个学科的身份是由其范畴而非其对象界定的。比如研究对象同为一张桌子, 物理学关注其重量、密度等, 化学则关注其燃点、酸溶解性等。那么以研究对象划分学科或学术分工, 按照人文社科的自然主义视角, 很有可能是武断的。^{[10]228}在许多学科所折射的人类的光影中, 只有人是实在的。因此, 对象是虚幻的。几乎所有人文社科都声称自己在观察人类。这些声明中, 只有“人”是切实存在的。其他学科仅在以不同视角折射人的各个方面: 人的说话(语言学)、生产(经济学)、欲望(心理学)、群居(社会学)、统治(政治学)、学习(教育学)等。那么, 媒介学的视角就无需在特别的对象或对象领域中抽离出来。或者说, 以实在论, 除了人, 其他学科所承诺的对象也大概是虚幻的。所以, 媒介学也仅是观察人类的一个视角, 并和其他人文社科共享同一个研究对象——人。^{[11]3-4}其中超越传播(communication)的传承(transmission)视角, 就是媒介学。传播, 研究共时态的人与人的相互作用, 介质是空间; 传承, 研究历时态的代与代的相互作用, 介质是时间。进而, 媒介学的批判意识在于, 技术发展让我们驯化传播, 而这与传承不平衡。我们面临“传承危机”。“传承危机”是指一切偏向于时间的文化遗产都面临危机。这与我们今天所谈的“文化遗产传承”有所不同。“传承危机”指代与代之间的文化遗产普遍被传播技术干扰。而“文化遗产传承”则是保护有目录记载的文化遗产的行政努力。正因传承视角, 媒介学的问题意识是, 文化遗产“存在的物质和社会条件是什么?”^{[11]20}

媒介学认为, “媒介即信息”是一种思想混乱。媒介只随象征信息的变化而变化。事实信息则不然。比如, “2+3=5”的观点, 无论被写在什么材料上、用什么语言; 也无论是被说出来与被写出来, 显然都是对的。事实信息, 无关媒介。但在宗教信息中, 这一观点却倒显其巧妙。由于传承载体具备社会和材料的双重特性, 那么媒介显然构成象征信息的一部分。媒介泛指: “1. 符号表示的整体过程(清晰连贯的话语、书写符号、

作者简介: 许子炎(2001—),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传播学。

类似的图像等) 2. 社会交流规范 (说话或者作家所使用的语言) 3. 记录和存储的物理载体 (石块、羊皮纸、磁带、胶卷、光盘) 4. 同流通方式相对应的传播设备 (手抄本、影印本、数字版)。^{[11]37-38} 基于与象征信息的关系, 媒介学建构一个决定了一定类型的控制性信仰、具有独特时间性和团体组建方式的宏观范畴: 媒介圈 (也译作“媒介域”)。媒介圈赋予集体特征或一个时代的风格特征。曰“圈”, 为类比生物圈。类似地, 这种圈的认识无法直接从经验当中产生, 正如一个人眼镜被打碎后才会意识到眼镜的存在一样。但这便是媒介学的特点: 比较往往产生于改变之后。媒介圈囊括人类文化生态系统与文化团体。媒介圈通过技术革命更迭, 新旧交融, 并重塑了社会关系。

一如斯特劳斯对民族学的解释, 媒介学也只是“认识的新形式, 而不是知识的特殊来源。”媒介学关心“能够改变意识、认识和运输的设备品质”。^{[11]89} 媒介学研究是物质与文化的关系研究, 而非媒介物的研究。这一研究领域存在两个视角: 一是通过技术的象征作用自下而上进行, 二是通过象征物的技术条件自上而下进行。就“象征技术-象征物”的系统, 我们产生 3 类研究: 1. 系统内的相互作用研究; 2. 系统间的相互作用研究: 一种新象征技术诞生带来不同“象征技术-象征物”系统的无限变化; 3. 系统转移的相互作用研究: 一种新象征物诞生重塑了特定象征技术的社会地位, 进而带来各个系统间的转移。例如, 社会主义思潮诞生重塑了铅版印刷的社会地位。这促动整个“媒介圈”各个系统之间转移变动。从事铅版印刷的技术精英们涌现了大量的工人先锋。^{[11]85}

媒介学关心的问题“不是分析符号世界, 而是要明白由符号发展成的世界。”^{[11]111} 漫长且具有强大规模的传承现象, 如何改变世界而非仅停留于想法, 就是媒介学的最终研究对象及其存在的主要原因。媒介学, 希望能将思想抑或是意识形态“去观念化”, 从而超越思想历史研究思想的接替过程与载体。一个思想, 改造世界的能力越强, 就越难被捕捉到它的传承载体。基督教何以收获如此多的信徒? 这是基督教回避的。共产主义思潮何以影响世界进展? 这也似乎也很少被共产主义阵营提及。这对于媒介学研究者是一个挑战。然而, 思想必然依靠中介传承。作为象征符号传承工具的媒介被媒介学解构为物质性组织载体 (OM) 物质性组织载体分为 1. 语言编码 (汉语、拉丁语、英语等) 2. 组织范围 (城市、学校、教堂) 3. 形成模式 (信息的概念结构) 和组织性物质载体 (MO) 组织性物质载体分为 1. 物理载体 (声波、赫兹电波等) 2. 表达方式 (文章、图像、声音等) 3. 运输设备 (印刷、道路、网络等) 的内外两方面。媒介学提倡在这些因素中交叉研究。德布雷的 1992 年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便是如此研究的。这篇文章已被译入中国大陆, 被收录在《媒介学宣言》书后。题名为《图像的生命与死亡: 从西方的角度看图像的历史》。^{[12]1-87}

符号学对符号附着载体的忽视, 使得媒介学往往在符号学的任务完成后才发挥作用。媒介学相信中介的双重身份, 这与符号学不同。而心理学在恒定领域中考察象征性传承的心理结构。比如经典的阿多诺 (Adorno) 研究, 认为每个人心里都需要“具有权威性的人物”, 所以就可以确定说在人身上存在一个稳定的“潜在的法西斯主义”心理结构。但, 法西斯主义最终收获亿万受众, 同样也依靠法西斯主义的喇叭、话筒、广播。这些载体本身不仅推动象征性传承, 也应当成为象征性传承中心理结构的一部分。媒介学则关注情感因素的媒介基础, 即不同载体中情感支配上的细微差别。这其中包含了象征性传承的秘密。社会学很少关注象征性传承; 其次, 技术并没有被社会学视为一个特殊复杂的现实来研究。对于托克维尔, 技术等于是简单的个人统一化; 对于迪尔凯姆, 技术相当于工作分工; 在韦伯这里, 技术是世界的理性化过程……对于大多数社会学家而言, 人类的行为被认为是和技术相对而独立的。批判社会学也直接将矛头直指象征统治, 将其等同为霸权主义。这也是对技术的无视。直至近年才有社会学家 (布鲁诺·拉图尔、安托涅·亨尼昂等) 对社会学提出质疑。语用学不仅同样剥离了符号和载体, 也如同心理学一般直接关注传播而非传承。传承 (代与代之间的) 很少依靠主体对主体的直接作用完成。比如当代中国学生为什么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甚至其中许多人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难道是马克思和当代中国学生直接产生传播吗? 至少解释这个传承问题, 我们无法调用符号学、语用学或心理学对于人际传播的研究规律。因为最基本的研究范畴已经发生了改变。媒介学可以被视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区别在于, 媒介学有鲜明的现实批判意识。

媒介学的另一个批判意识在于, 揭示宏大叙事的形成过程。这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媒介学需要警惕对技术前景过于乐观的估计。媒介学与其预言最新的媒介动态, 不如关注媒介历史。媒介学研究人员应当成为“考古-现代主义者”。^{[11]201} 媒介学关心在技术全球一体化背景下, 各个民族文化的震荡。这种考古最终要落在对技术试图统一各种文化所引发的“冲击-回应”的现代主义思辨当中。这实际上大大扩充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研究视野。以往的“冲击-回应”思考往往局限在“文明冲突”的叙事中。但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本身依靠媒介完成。媒介转型和文化冲击相伴共生。更要紧的是, 文化冲击是通过几个世纪才能见到效果的。如今深入中国人内心的“科学、民主”等观念, 也是依靠几代人间的传承才实现的。那么, 考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动荡, 显然更需要媒介学考察象征性传承的经典理论。

三、德布雷媒介学的学术脉络

德布雷媒介学参考的思想来源包括媒介环境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典文艺作品等。媒介学思想的学理性是建构在对媒介环境学派的批判与继承之上的,这是学术脉络的主要来源。但学理之外的学术立场、价值等源自马克思主义信仰。德布雷曾于1965年追随切·格瓦拉于玻利维亚开展红色革命。德布雷20岁考入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25岁取得哲学教师资格,同年到古巴,在玻利维亚追随切·格瓦拉。德布雷于27岁被捕,33岁回到法国。期间接受了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采访。故德布雷是放弃了在反法西斯战胜国担任教师的安逸生活,而选择为马克思主义献身革命。这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较高层次的信仰。故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意识,成为德布雷媒介学思想的主要学术脉络之一。本书字里行间夹杂着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的句子。此外,德布雷还在书中反复强调对于西方文艺作品以及相邻学科(符号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的思想资源的捕捉和借鉴。

(一) 媒介环境学派

德布雷媒介学建构了“传承”这样一个区别于“传播”的独特研究范畴,并依此区别了媒介学同其他学科的区别。在阐述“传承”与“传播”间的差异时,德布雷调用了“时间”和“空间”的学术概念,强调传承的时间性。这和英尼斯的传播偏向理论是高度相似的。德布雷论证媒介学中传承的纪念物时,和英尼斯论证偏向时间的传播一样着重分析了石头、碑文等纪念物。^{[11]24-27}区别在于,英尼斯依然是将共时态的传播区分为偏向时间和空间两类。但德布雷在此基础上直接将研究范畴确定为代与代之间的相互作用之上,将媒介学确立为历时态的传承视角。那么,德布雷媒介学思想的基本观察点是依靠对英尼斯传播偏向理论的批判和继承来实现的。尽管,德布雷没有指名道姓地提出英尼斯。

在德布雷看来,不同人文社会学科无非是视角不同。而历时态的传承视角依然包括了德布雷无心探讨的知识传承。故德布雷详细地开展对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这一观点的批判:德布雷将信息分为象征信息和事实信息两类,进而将“媒介”与“信息”的联动仅仅局限在象征信息之中。德布雷否认事实信息也随着媒介的变化而变化。媒介学最终以象征性传承为基本研究范畴,显然是可以回归到经典媒介环境学派的学术脉络之中的。对媒介环境学派经典理论的批判与继承,德布雷找到了新的研究领域,进而才展开对“物质性组织-组织性物质”载体系统的研究范式论证。

(二) 西方马克思主义

如果说媒介学在对媒介环境学派的批判与继承中开发出一片学术圈未被开垦的地,那么德布雷对这片地开垦方式的建构无不透露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于这方面,德布雷在本书中表现得尤为谦抑。略显牵强地说,德布雷在核心系统“物质性组织-组织性物质”的阐释中,表达出了他的唯物主义信念。“物质”成为德布雷理解媒介的基本视窗。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还是最明显地表达在全书大段对于基督教传承过程的剖析中。这些剖析也是德布雷为说明其研究范式所举的例子。但以他的博士论文和博士导师资格论文中对“宗教唯物主义”的论述来看,德布雷不仅准确反映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对宗教的基本观点,而且创新地剖析了这一观点。德布雷也于书中引用过这句马克思的原话:“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也是现实生活痛苦的镇定剂。”德布雷在本书中详细剖析了基督教何以收获如今十几亿受众这一问题,进而将基督教极力回避(其他收获无数受众的思想亦然)的传承过程再现于本书之中。德布雷长期关注的客体就是宗教,他认为揭露宗教等宏大叙事传承的媒介过程就是以唯物主义的观点解构欺骗的运作过程。这种宗教唯物主义的认知既是贯穿于本书之中的、德布雷为演示其开创的研究范式所举的研究范例,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点的注脚和进一步发展。这些研究意义并不是作者强加的,而是德布雷希望实现的。德布雷在本书中说明,其希望对于宗教唯物主义的解读能够阐释清楚为什么宗教不仅是“麻醉人民的鸦片”,还是“现实生活痛苦的镇定剂”。这是德布雷媒介学思想回归到马克思主义学术脉络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德布雷媒介学思想又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发展。德布雷对此的表现相对明显。这体现在德布雷对媒介学两重批判意识的阐释之中。宏大叙事的批判意识产生于20世纪50、60年代的西欧知识分子之中。它的批判对象包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宣传批判,特别是美苏两国的宏大宣传批判。这后来成为典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意识。德布雷对宗教传承的批判,意在揭露“天然正确的”宏大叙事何以俘获如此多的受众。媒介学的物质载体体系,被德布雷认为是解构宗教在内的宏大叙事发展受众这一过程的方法。这种解构的方法被德布雷认为是揭露欺骗形成的唯物主义批判手段。另一重批判意识也缘于经典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即传播技术何以破坏文化。自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就致力于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为基础批判文化工业中传播技术对文化的破坏。德布雷

显然也是在回应这一议题；但区别在于，德布雷摆脱了蔑视大众文化的精英主义视角，也没有就此忽视流行文化中的大众抵抗力量，而是以相对客观的“传播-传承”范畴划分来阐释媒介技术对文化遗产的干扰。这里的“文化”显然也是精英主义视角下的文化，并且这里的“干扰”也是指注意力分散、数字劳工等当代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逻辑，故“传承危机”也可以回归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脉络。那么媒介学的两重批判意识——宏大叙事唯物主义批判和“传承危机”，显然都批判和继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批判意识，并提出了新的理解视角。

（三）经典西方文艺作品

德布雷的文学积累深厚，在本书中引用过“大智若愚”等中国传统谚语。故其许多论证细节来源于经典西方文艺作品。比如第3章标题“这个将毁灭那个”就摘自雨果的《巴黎圣母院》。^{[11]73-75}但这并非是“两张皮”的借用。德布雷在这篇文章中从媒介学视角详细分析了雨果对印刷术摧毁教堂的担忧，并依此来指出媒介学关心媒介关系系统而非媒介实体。散落于书页各处的对经典西方文艺作品的引证表明其十分重视对先贤著作中媒介学思想的挖掘。德布雷指出许多文艺作品背后的媒介学思考，比如瓦来里的《无所不在的攻占》对电视的预言和传播与传承的思考、巴尔扎克的《幻灭》与包含印刷与纸张在内的“文学链”思考以及马拉美的《有灵魂的文字》对不同载体和书写法所产生的不同叙述效果等等，不胜枚举。这一点也是德布雷在本书中明确表明的：“媒介学的目的是要将以往的观察研究，那些‘著名作者’的零散的直觉和概况性的东西变成形式化的东西并加以综合分析。”^{[11]102}他在本书中梳理了从柏拉图到当代作家的文艺作品中值得挖掘的媒介学思想。媒介学的学术脉络也和经典西方文艺作品的发展密不可分。

自不必多说的是，德布雷媒介学思想显然还受无数相邻学科的影响。比如德布雷捍卫媒介学合法性时使用的“代与代之间的相互作用”，和齐美尔保护社会学合法性时强调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如出一辙。民族学谦虚地指出自己是“认识的新形式而不是知识的特殊来源。”德布雷直接照搬至媒介学。凡此种种。

四、结语

这篇文章抽丝剥茧地提炼了各章中媒介学理论的建构逻辑。这包括德布雷媒介学思想的两重批判意识与问题意识，以及研究的范畴、对象、路线、类型、价值立场、方法、注意事项和最终人文关怀等。本文还尝试根据本书及作者经历论证德布雷媒介学思想的学术脉络。本文认为，德布雷媒介学可以回归到媒介环境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经典西方文艺作品等学术脉络之中。

本文认为，未来还有3个方面理论价值应当得到关注：其一，德布雷媒介学显然不希望其研究者仅仅完成了档案的整理，它更希望能够通过史学研究关注到当下全球媒介进程中最为现实的技术文化问题。德布雷自己指出的是：在全球技术一体化背景下，不同文化震荡加剧的问题。这个现代主义问题可以通过媒介学对物质载体的分析，探讨不同文化形成和震荡的成因。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和智能媒体时代的发展，难道不是在制造更多文化的冲突么？这种技术发展背景下的各个文化间的冲突，理应成为考古的分析对象。

其二，德布雷媒介学不应仅仅被当作一个程式化的客观分析工具来使用，它还有其作为灵魂的批判意识。许多已有史学研究仅以其分析了某段文化传承现象，这种庸俗化解读会影响媒介学的学术生命力。对于宏大叙事的唯物主义批判不应仅仅局限在对德布雷媒介学思想史的分析，还应作为“批判的武器”来对更多具有欺骗性的宏大叙事社会思潮开展批判。而这种批判也是媒介学的唯物主义灵魂。未来还应有更多从象征性传承层面开展针对现实社会思潮的唯物主义宏大叙事批判的史学研究。

其三，如何在新媒介技术环境中应对文化遗产危机，似乎应当是当下更为严峻的问题。但这一问题被关注得还不够。而这一问题除了常规从社会科学角度予以调查研究，也可以从当代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予以象征性传承范畴的关照。以物质载体体系为基本视角，研究可以考察传统文化如何传承至今，并思考该文化在当下技术进展中的传承危机问题；进而从物质载体体系的视角，给出具有实效的文化遗产建议。这些对文化遗产的关注也应当成为反哺当代传播政治经济学、关照最新媒介技术进展的史学问题意识。

参考文献：

- [1] 许加彪, 程伟瀚. 理论引进与知识创新: 德布雷媒介学的中国本土化历程及省思[J]. 传媒观察, 2023, (11): 47-53.
- [2] 胡翼青, 张婧妍. “媒介世”: 物质性语境下传播理论研究的演进[J]. 编辑之友, 2022, (4): 128-140.
- [3] 马英俊. “文化”与“技术”: 论德布雷媒介学“合二为一”的历史[J]. 新闻大学, 2021, (4): 57-68+121.
- [4] 吕清远. 媒介学中的身体问题与身体研究的媒介学理路——探访一种中介化的身体传播思想[J]. 新闻大

- 学,2022,(7):1-13+116.
- [5] 朱振明, 付佳洁. 德布雷媒介学研究中的“物质性转向”[J].全球传媒学刊,2022,9(5):73-86.
- [6] 董卫民. 作为“中间体”的南宋皇城遗址: 媒介学视野下 地方复现与遗产传承[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1(5):149-156.
- [7] 张勇锋. 从“媒介革命”到“革命媒介”: 延安新秧歌运动再考察[J].新闻大学,2020,(10):55-68+120.
- [8] 董倩. 革命典型的“分身”与再塑——“南京路上好八连”早期传播的媒介学考察[J].探索与争鸣,2021,(5):139-151+180.
- [9] 彭志翔. 从纸上到街头: 工人是如何“运动”起来的——基于“五四”后《晨报》和《民国日报》的媒介学考察[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3,30(5):113-125+128.
- [10] 奥德里库尔. 技术、人类科学[M].巴黎: 人文出版社,1987.
- [11] 雷吉斯·德布雷. 媒介学引论[M].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
- [12] 雷吉斯·德布雷. 媒介学宣言[M].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The Logical Structure and Academic Venation of Debray's Media Theory

Ziyan XU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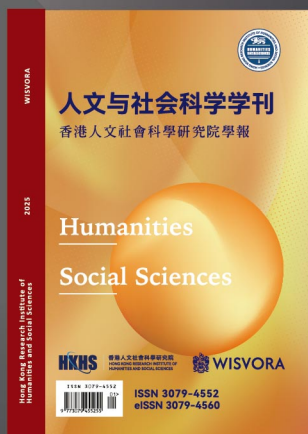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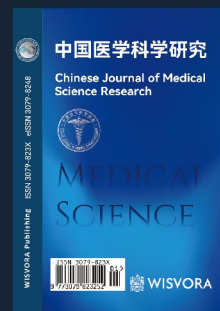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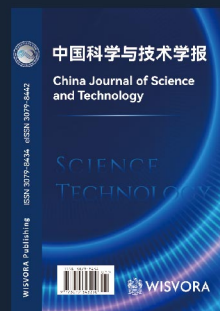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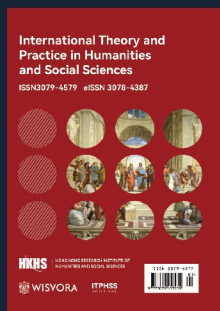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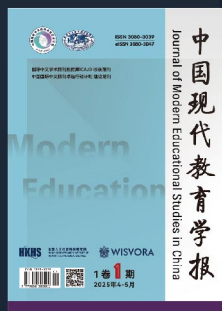
¹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Abstract: Debray's media theory has gradually become a prominent discipline in contemporary academia. This article meticulously dissects and distills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logic of media theory presented in each chapter. This encompasses the dual critical and problem consciousness of Debray's media theory, as well as the scope, objects, approaches, types, value positions, methods, precautions, and ultimate humanistic concerns of the research. This article also attempts to trace the academic lineage of Debray's media theory based on this book and the author's experiences. It is argued that Debray's media theory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academic lineages of the media ecology school, Western Marxism, and classic Western literary works.

Keywords: media theory; Debray; logical structure; academic venation

WISVORA 出版社：专注于学术出版管理，WISVORA 出版社提供期刊编辑、论文出版和国际索引、期刊创办、期刊托管等服务，增强学术研究的全球传播和影响力。

www.wisvora.com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是由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学术期刊，致力于为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一个高质量的学术交流平台。本刊重点关注学术研究中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应用，旨在探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核心议题，促进知识的广泛传播与共享。作为一份面向全球中文学术界的专业期刊，本刊倡导跨学科、跨文化视角的学术探讨，为学术界和实践领域之间搭建桥梁，推动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与应用。

Online ISSN 3079-4560
Print ISSN 3079-4552

ISSN 3079-4552



学术赠阅

权责声明

期刊所刊载的评论、意见、观点等均出自文章作者个人立场，不代表本出版社的观点或看法。对于文章任何部分及文内引用材料给任何个人、机构、及其财产所带来的任何损失及伤害，本出版社均不承担任何责任。我们郑重声明，本出版社的出版业务，不构成对任何产品商业性能的保证，也不表示本社已承认本社出版物中所述内容适用于某特定用途。如有疑问，请寻找专业人士协助。